

新华  
国际政治  
精·品·文·库

THE TRUTH ABOUT THE SOVIET  
UNION: REFLECTIONS  
ON 101 IMPORTANT  
QUESTIONS

# 苏联真相

## 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

中

陆南泉 黄宗良 郑异凡 马龙闪 左凤荣 主编



仅供个人阅读研究所用，不得用于商业或其他非法目的。切勿在他处转发！

本电子书制作者

新华出版社



THE TRUTH ABOUT THE SOVIET  
UNION: REFLECTIONS  
ON 101 IMPORTANT  
QUESTIONS

# 苏联真相

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

中

陆南泉 黄宗良 郑异凡 马龙闪 左凤荣 主编



新华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苏联真相：对 101 个重要问题的思考 / 陆南泉等主编. —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 10

ISBN 978 - 7 - 5011 - 9404 - 9

I. ①苏… II. ①陆… III. ①苏联—历史—研究 IV. ①K5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91145 号

---

## 苏联真相：对 101 个重要问题的思考

---

主 编：陆南泉 黄宗良 郑异凡 马龙闪 左凤荣

责任编辑：刘 飞

特约编辑：江建明

封面设计：王小明

出版发行：新华出版社

地 址：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网 址：<http://www.xinhupub.com> <http://press.xinhuanet.com>

邮 编：100040

印 刷：北京新魏印刷厂

开 本：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108

字 数：1550 千字

版 次：2010 年 10 月第一版

印 次：2010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5011 - 9404 - 9

定 价：246.00 元 (全三册)

---

温馨提示：本社“新华版短信书友会”新书直订 发短信至：13651277005

本社图书策划中心诚征品位畅销选题 发邮件至：[xhchzx@163.com](mailto:xhchzx@163.com)

购书热线：010 - 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010 - 63072012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010 - 63073969

---

# 目 录

|          |         |
|----------|---------|
| 序一 ..... | 阎明复 (1) |
| 序二 ..... | 李凤林 (3) |
| 前言 ..... | 主 编 (1) |

## 第一编 十月革命与列宁时期

|                               |       |
|-------------------------------|-------|
| 1. 1917 年革命前的俄国是什么样的国家? ..... | (3)   |
| 2. 十月革命前俄国经济有何特点? .....       | (16)  |
| 3. 列宁为什么说俄国苦于资本主义不足? .....    | (34)  |
| 4. 二月革命真相如何? .....            | (46)  |
| 5. 布尔什维克党是怎样夺得政权的? .....      | (61)  |
| 6. 十月武装起义是怎样进行的? .....        | (78)  |
| 7. 布尔什维克党为什么能够取得和巩固政权? .....  | (84)  |
| 8. 列宁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是如何发展变化的? ..... | (94)  |
| 9. 什么是军事共产主义, 其后果如何? .....    | (106) |
| 10. 新经济政策及其意义和教训是什么? .....    | (120) |
| 11. 新经济政策为什么夭折了? .....        | (139) |
| 12. 列宁是怎样认识与发展党内民主思想的? .....  | (159) |
| 13. 列宁“政治遗嘱”产生了怎样的风波? .....   | (170) |
| 14. 谁是保存列宁遗体的始作俑者? .....      | (180) |

## 第二编 斯大林时期

|   |       |
|---|-------|
| 15. 斯大林是怎样一步一步登上最高领导岗位的？ .....                  | (191) |
| 16. 如何评价斯大林推行的工业化政策？ .....                      | (214) |
| 17. 如何看待苏联农业全盘集体化及其后果？ .....                    | (242) |
| 18. 如何认识 20 世纪 30 年代苏联的“大清洗”运动？ .....           | (263) |
| 19. 20 世纪 30 年代乌克兰大饥荒的原因是什么？ .....              | (280) |
| 20. 20 世纪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苏联缘何进行对庸俗社会学的批判？ .....   | (286) |
| 21. 斯大林是怎样控制意识形态的？ .....                        | (301) |
| 22. 斯大林模式是怎样形成的？ .....                          | (311) |
| 23. “苏联模式”是“可疑”的“假命题”吗？ .....                   | (329) |
| 24. 中国领导人是如何看待斯大林模式的？ .....                     | (336) |
| 25.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                | (344) |
| 26. 布哈林及其理论的真相如何？ .....                         | (354) |
| 27. 托洛茨基何许人也？ .....                             | (367) |
| 28. 斯大林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是列宁主义的著名原理吗？ .....           | (391) |
| 29. 斯大林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实质及其危害是什么？ .....                | (399) |
| 30. 斯大林是如何破坏党内民主的？ .....                        | (408) |
| 31. 如何评价斯大林与希特勒签署的条约与协定？ .....                  | (426) |
| 32. 如何评价斯大林的“东方战线”？ .....                       | (444) |
| 33. 如何全面正确评价斯大林在二战中的作用？ .....                   | (458) |
| 34. 为什么说了解战后斯大林的政治“清洗”是认识赫鲁晓夫<br>“解冻”的钥匙？ ..... | (479) |
| 35. 斯大林战后缘何不思改革？ .....                          | (493) |
| 36. 外蒙古是怎样从中国分离出去的？ .....                       | (503) |
| 37. 斯大林对外部世界的认识有哪些误区？ .....                     | (519) |
| 38. 冷战与斯大林有何关系？ .....                           | (539) |
| 39. 斯大林模式移植到东欧的后果是什么？ .....                     | (555) |
| 40. 如何评价斯大林在新中国建立和巩固中所起的作用？ .....               | (567) |

41. 斯大林最后同意打朝鲜战争的原因是什么? ..... (589)
42. 缘何必须突破对斯大林的“两个凡是”? ..... (606)
43. 俄罗斯在重新评价和肯定斯大林吗? ..... (620)

### 第三编 赫鲁晓夫时期

44. 如何解析赫鲁晓夫的“解冻”? ..... (645)
45. “贝利亚事件”真相如何? ..... (669)
46. 如何评价赫鲁晓夫反对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秘密报告》? ..... (687)
47. 能说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忘恩负义”吗? ..... (717)
48. 如何解析赫鲁晓夫提出的“三和路线”? ..... (734)
49. 如何看待赫鲁晓夫提出的全民国家和全民党问题? ..... (747)
50. 中苏关系破裂原因何在? ..... (757)
51. 赫鲁晓夫上台后缘何首先抓农业改革? ..... (777)
52. 如何评价赫鲁晓夫时期的改革? ..... (799)
53. 赫鲁晓夫下台的真实原因是什么? ..... (813)
54. 如何看待苏联和东欧国家去斯大林模式的改革? ..... (818)

### 第四编 勃列日涅夫时期

55. 如何在苏联历史上给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定位? ..... (827)
56. 勃列日涅夫时期经济体制改革缘何停滞不前? ..... (847)
57. 为什么说苏斯洛夫是“灰衣主教”? ..... (865)
58. 勃列日涅夫时期对第三世界扩张造成了什么严重后果? ..... (878)
59. 勃列日涅夫为什么大搞军备竞赛? ..... (895)
60. 勃列日涅夫时期为什么会出现“持不同政见者”? ..... (911)
61. 勃列日涅夫是如何扼杀“布拉格之春”的? ..... (926)
62. 苏联入侵阿富汗造成的严重后果是什么? ..... (939)

## 第五编 戈尔巴乔夫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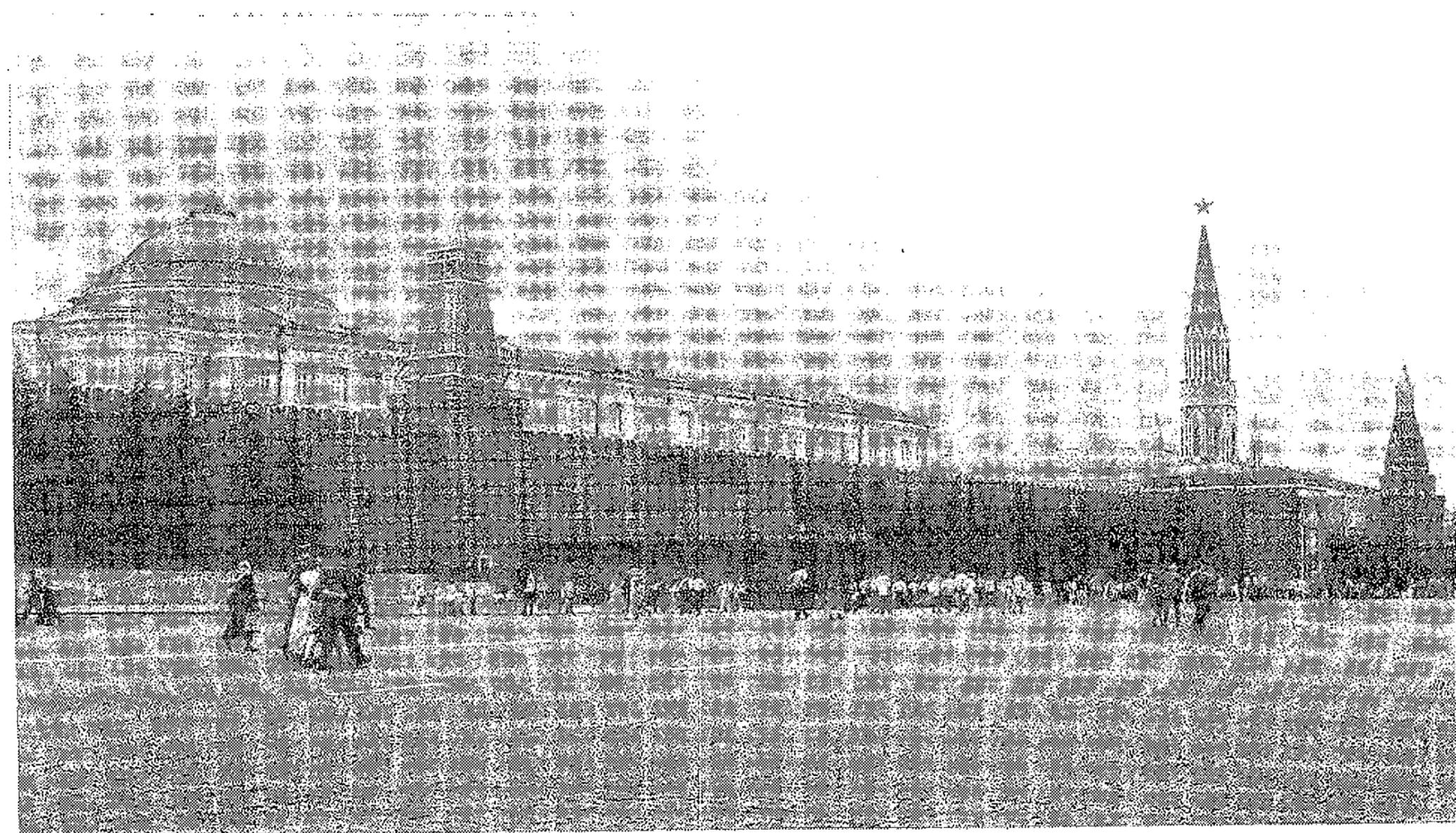
- 63. 戈尔巴乔夫缘何要对体制进行根本性改革? ..... (959)
- 64. 戈尔巴乔夫是怎样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 ..... (978)
- 65. 戈尔巴乔夫时期对外经济体制进行了哪些改革? ..... (993)
- 66. 戈尔巴乔夫是怎样当上最高领导人的? ..... (1005)
- 67. 戈尔巴乔夫缘何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 (1022)
- 68. 所谓戈尔巴乔夫在土耳其美国大学讲话的真相如何? ..... (1034)
- 69. 如何评价戈尔巴乔夫对外政策的新思维? ..... (1042)
- 70. 戈尔巴乔夫在中苏关系正常化中起了什么作用? ..... (1057)
- 71. 戈尔巴乔夫在德国统一问题上的立场是如何变化的? ..... (1070)
- 72. “8·19”事变的前因后果如何? ..... (1081)
- 73. 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在联盟解体中起了什么作用? ..... (1114)
- 74. 苏联人为何“不珍惜”苏联? ..... (1134)
- 75. 如何认识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的原因与苏联剧变的关系? ..... (1144)
- 76. 邓小平是如何看待和应对苏东剧变的? ..... (11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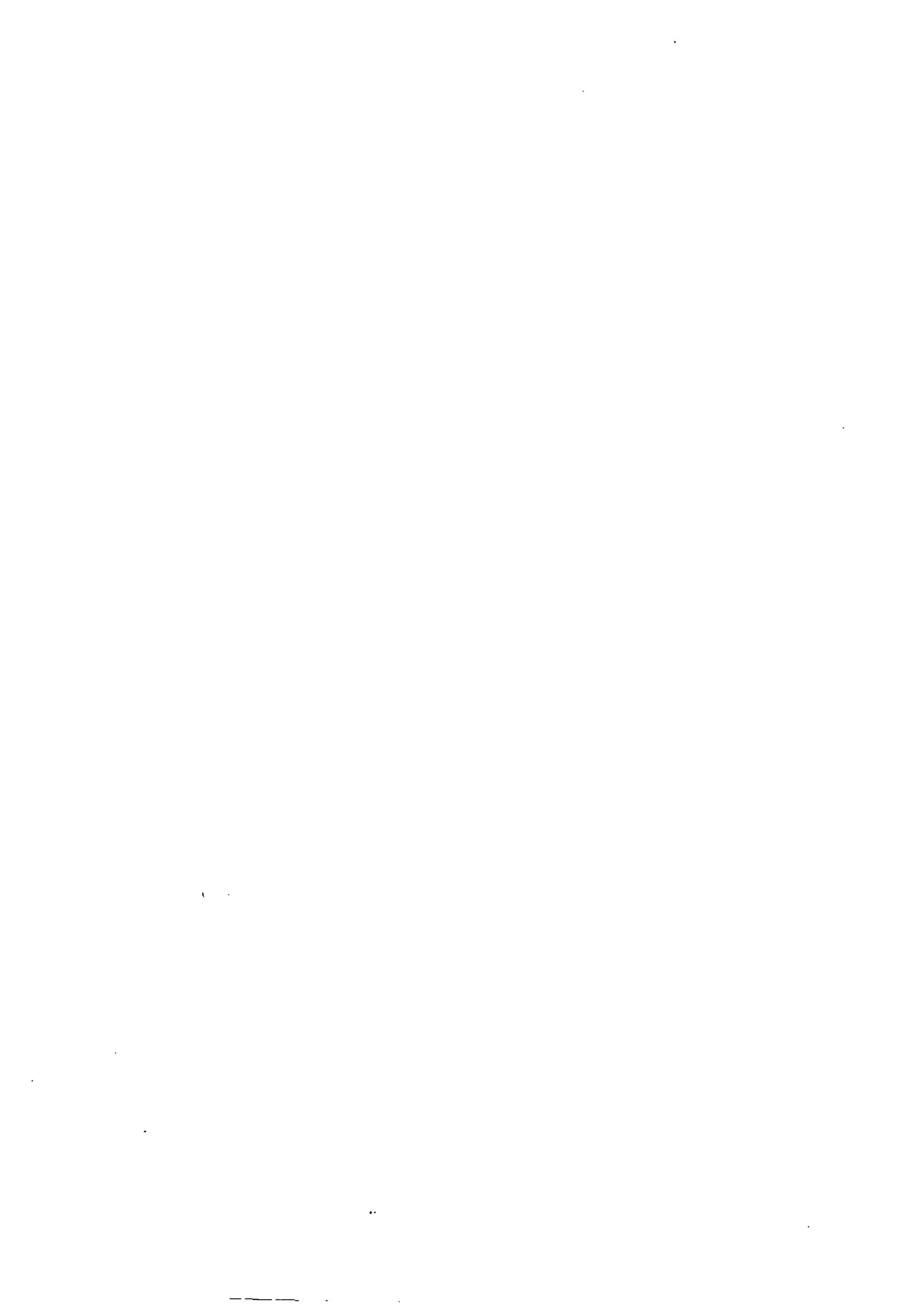
## 第六编 苏联剧变的原因与教训

- 77. 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 (1179)
- 78. 究竟是何种制度性因素导致苏共垮台? ..... (1187)
- 79. 为什么评价苏联历史要坚持正确的观点和方法? ..... (1204)
- 80. 为什么说“文化统制主义”是苏联剧变的原因之一? ..... (1216)
- 81. 苏联在文化建设中有哪些经验教训? ..... (1227)
- 82. 对外扩张与苏联剧变是什么关系? ..... (1246)
- 83. 民族问题对苏联解体起了什么作用? ..... (1263)
- 84. 如何评价苏联经济建设成效问题? ..... (1277)
- 85. 法制建设的缺失与苏联剧变是什么关系? ..... (1288)
- 86. 苏联特权阶层形成的原因及对苏联剧变的影响是什么? ..... (1299)

|                                      |        |
|--------------------------------------|--------|
| 87. 东欧剧变与苏联历来的东欧政策是什么关系? .....       | (1314) |
| 88. 苏联所有制理论在改革过程中有何变化? .....         | (1337) |
| 89. 苏联商品经济理论在改革过程中有何变化? .....        | (1350) |
| 90. 为什么说中国改革开放是对苏联模式的突破? .....       | (1376) |
| 91. 邓小平对中苏大论战的看法给我们提供什么启示? .....     | (1390) |
| 92. 为什么不能从苏联剧变中得出不能搞政治体制改革的结论? ..... | (1416) |
| 93. 科学发展观与苏联模式的发展观和发展战略有何异同? .....   | (1425) |
| 94. 苏联最高权力是怎样交接的? .....              | (1435) |
| 95. 苏共执政合法性是如何丧失的? .....             | (1446) |
| 96. 苏联共产党是个什么样的党? .....              | (1457) |
| 97. 苏联领导人的收入是多少? .....               | (1465) |
| 98. 苏共党内实行怎样的监督机制? .....             | (1474) |
| 99. 历史教科书问题如何纠缠俄罗斯? .....            | (1483) |
| 100. 《莫洛托夫访谈录》说明了什么问题? .....         | (1522) |
| 101. 我们应该从苏联剧变中吸取什么教训? .....         | (1559) |
| <br>                                 |        |
| 苏联大事记 .....                          | (1579) |
| 本书作者简介 .....                         | (1658) |

# 第三编 赫鲁晓夫时期





## 44. 如何解析赫鲁晓夫的“解冻”？

杨存堂

《解冻》是苏联犹太人文学家伊利亚·爱伦堡为自己1954年发表的一部中篇小说题的书名。作家通过这部小说试图揭示斯大林去世后苏联社会生活的种种变化。后来，人们用“解冻”来概括斯大林之后到20世纪60年代苏联文学的复苏现象。现在有些俄国学者甚至把“解冻”用做一个历史时代的标志。

由于种种局限，对苏联文学的“解冻”，当年我国国内没有全面介绍，后来深入研究也不够，因而存在许多不符合实际的评论。不久前，笔者写了一篇《文学的“解冻”——20世纪俄罗斯文学曲折发展的一个解扣》<sup>①</sup>的文章，试图把苏联文学的“解冻”放在俄罗斯文学发展的总进程中去研究，提出了一些个人的见解，希望与同道讨论。在这里笔者想就上面的题目继续表述自己的看法。

### 文学“解冻”的历史背景和原因

解冻是一种自然现象，既然用它来比喻社会生活的变化，那么，在研究这种社会现象的时候也应该像研究自然变化的过程一样，先从文学是怎样“封冻”入手，追寻“解冻”的历史背景和原因。关于苏联文学“解冻”的背景和原因，至少要考虑到以下几点：

第一，十月革命以前俄国就有着光辉灿烂的文学传统。19世纪上半叶，俄

---

<sup>①</sup> 该文最初刊载于《陕西师大学报》2007年第6期，修改后收于沈志华主编的《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一书。

国尚处在落后的农奴制度和沙皇专制制度的统治下，俄罗斯文学便得到了高度发展，由普希金开端，相继出现了果戈理、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诃夫等一大批世界著名的文学家，开创了俄罗斯文学的“黄金时代”。到19世纪末至20世纪的最初十年，俄罗斯文学再次出现辉煌，被称为俄罗斯文学的“白银时代”。这个时期的俄罗斯文学，群星荟萃，个性鲜明，不仅作家数量和作品数量明显增多，而且在审美立场和创作技巧上有了质的变化。如果说，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主要是在批判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发展，那么，到世纪之交，艺术流派与思潮发生了大的改变，审美观念多元化，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平行发展，出现了多层面的文学现象。以高尔基为代表的一批作家继承了19世纪俄罗斯文学传统把现实主义推向一个新阶段——新现实主义。他们把大写的人、大地的主人、革命者推向首位。在他们的作品中，人是世界的主人，是自由的斗士，是胜利者。除了高尔基，新现实主义的还有列·安德烈耶夫、伊·普宁等著名世界的大作家。起源于西班牙和墨西哥的现代主义几乎同时在俄国很快发展起来，亚·勃洛克、А·别雷、И·安宁斯基、安·阿赫玛托娃、奥·曼德尔斯塔姆等大诗人为其代表。俄罗斯的现代主义先后出现了象征主义、阿克梅派、新农民派和未来派。现代主义的各派在审美思想上有一定的差异，而总的倾向是与现实主义相对立，否定现实主义美学中严格的因果决定论，否定其社会或历史环境对人的必然决定论，维护人的个性和人不受历史时间因素束缚的权利。世纪之交的俄罗斯文学不仅继承和发展了19世纪的优良传统，而且几乎同世界的最新美学思潮同步，把俄罗斯文学推向一个崭新的阶段。“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俄罗斯文学的高度发展不只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文学财富，还标志着俄国独立的知识分子队伍的产生。

第二，斯大林的政治高压政策打断了20世纪20年代文学的复兴。十月革命后苏联文学经历了一条曲折的发展道路。托洛茨基在其《文学与革命》一书中说：由于革命和内战，“十月革命似乎以自己的直接行动扼杀了文学。诗人和艺术家沉默了。”<sup>①</sup> 革命与文学发生了冲突，在多种审美思想基础上蓬勃发展的文学大潮被打断。坚持单一意识形态和一党专政的布尔什维克把信仰其他世界观的知识分子看成潜在的敌人，贬低“白银时代”的文学，把世纪之交的文学家归诸

---

<sup>①</sup> 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外国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54页。

地主资产阶级的营垒，企图建立纯粹的无产阶级文学。一大批文学家被迫逃到国外，另一些文学家转做其他工作，最早投向革命的只有少数文学家。创造无产阶级文学的设想未取得多少成效。只是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文学才得到复苏的机会。20年代苏联文学由复苏而达到一定的复兴。“白银时代”的一批老作家跨入新时代，不同的美学思想和流派继续存在，出现了许多文学团体和小组，一批数量可观的新作家成长起来，创办了一些新的文学期刊。最能说明问题的是，苏维埃年代一些重要的代表作品基本上产生于这个时期。20年代的文学复兴是在“白银时代”开辟的道路上的继续发展，或者说是在“黄金时代”、“白银时代”文学传统影响下的复兴。

到20年代末，随着斯大林领袖地位的完全确立，文学复兴和发展的势头被打断。各种文学团体和小组被解散，文学自由讨论的风气遭扼杀。在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口号下，人道主义被否定。不仅一批对文学复兴有很大贡献的“白银时代”的散文作家、著名诗人失去发表作品的权利，而且曾热情为苏维埃政权歌唱的马雅可夫斯基也遭冷遇，他的戏剧《澡堂》被停演。1932年4月，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改组文学与艺术团体》的决议，声明：“几年以前，当新经济政策初期特别活跃的异己分子在文学界具有很大影响、而无产阶级文学干部队伍还很薄弱的时候，党曾经在文学和艺术领域用一切办法帮助成立和巩固单独的无产阶级组织。”<sup>①</sup> 新经济政策时期“特别活跃”而“具有很大影响”的作家被打入“异己分子”的队伍，20年代文学的复兴实际上被否定。1934年8月21—31日，在联共（布）中央书记日丹诺夫领导下举行的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制定了作家协会章程，作家协会成为文学家唯一合法组织。章程规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苏联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根本方法，它要求艺术家们要从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地具体描写现实。并且，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的具体性必须和那种以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sup>②</sup>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被尊为苏联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唯一理论和方法，此前所存在的其他所有审美思想和方法都被罢黜。“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仅要作为

---

① 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3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② 引自《苏联文学艺术问题》，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1页。

一种审美观，而更重要的是一种政治要求。艺术变成创造艺术神话的工具。人被放到历史的进程中，要被改造、教育、塑造成适合社会主义的“新人”，即标准环境中具有标准性格的人。结果人失去了自我价值。文学的研究和认知功能退到第二、第三位，主要功能变为进行宣传教育。作家协会实际上成为限制作家自由创作、打击迫害作家的工具。在30年代的大镇压中，作家协会帮助镇压机关逮捕和杀害了许多优秀的作家。另一些持不同审美思想的著名诗人、散文作家、剧作家虽逃过镇压却失去了发表和出版作品的权利。即使执行当局文学路线而得到认可的作家也必须处在严格的监督与检查之下，稍有不慎就会受到怀疑和打击。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不论是在前线工作的1000名作家，还是留在后方的2/3作家，都为战胜法西斯而进行战斗，但党和国家机器对作家的监督和控制却更加严厉。由于作家协会在作家中影响不好，便改由党中央宣传部的领导人亚历山德罗夫等直接监控文学家的活动，甚至由党中央书记处对一些作家作出批评或处理的决定。1946年针对列宁格勒《星》、《列宁格勒》杂志和左琴科、阿赫玛托娃两位作家开始的对知识分子的又一次整肃运动，文学家首当其冲，文学界又遭受了一次沉重的打击。

从20年代末到斯大林去世之前，对文学领域采取的这一系列严厉监控和政治高压政策，除牺牲了一批著名作家，所导致的另一个后果，就是使20年代复兴后出现的波浪汹涌的文学大潮，分裂成了几条支流：侨民文学队伍，国内的“潜流文学队伍”和公开活动的文学队伍。十月革命后逃到国外的侨民文学家，后来有的回国，有的死亡，人数已经减少，而30到50年代的大镇压又使一些新的成员加入到侨民文学家队伍。另一些不能公开发表作品的作家，或者从事翻译，或者潜入地下写作，其作品只能收藏起来。在国内公开活动的作家队伍中不乏有名的作家，也出了不少名作，但文学活动的环境极不正常也不健康，使许多作家经常处于尴尬和难堪的境地。像肖洛霍夫、列昂诺夫等著名作家，甚至连紧跟党的路线长期担任作家协会领导的法捷耶夫，也没有逃脱受批评的境遇。在这种环境下，许多作家被推上“无冲突论”和“粉饰现实”的道路。当时最风行的是两类作品：一类是极力宣扬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另一类是不顾事实的“歌颂升平”，虚构高大完美的“英雄人物”形象。这些作品千篇一律，矫揉造作，刻板旧套，缺少美学价值。到斯大林去世前，苏联的文学处于严重危机和畸形发展之中，形象地说就是“封冻”状态。对于文学艺术存在的这种情况，甚至马林

科夫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也不得不承认：“有许多平庸乏味的灰色作品，有时简直是歪曲苏联现实的粗制滥造的作品。”<sup>①</sup> 苏联文学已经到了不进行一场变革已走投无路的境地。

第三，斯大林的去世为苏联文学“解冻”提供了机遇。苏联实行领袖政治，国家没有走上法治的道路，没有建立起按照民主程序更换领导人的制度，即使是斯大林这样的领袖人物也未能避免“人亡政息”的命运。斯大林去世后，苏共新领导集团迅速开始清理斯大林的政治遗产，文学领域也同时发生了“解冻”。

### 文学“解冻”的进程与赫鲁晓夫的作用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的去世开始了苏联历史的新时期。站在时代潮流前面的文学家首先感受到社会气候的变化。爱伦堡在《人·岁月·生活》一书中回忆，他决定写一本中篇小说并立即写下书名《解冻》的时候，曾想到1953年的4月。这年4月，对俄国来说不只意味着春天的即将来临，而且还是一个难忘的特殊时期。斯大林去世才一个月，国内的政治生活已经发生变化：“医生案件”平反、公布了苏联人民演员米霍埃尔斯被谋杀的消息。<sup>②</sup>

列宁格勒女诗人O·别尔戈丽茨也是这年4月，在《文学报》发表的《谈谈抒情诗》一文中提出：作家“不可能没有个人表现”，呼吁诗歌中“多一些真诚和解放”。她批评：在“很多抒情作品中缺乏主要的东西：没有人情味，没有人。”一些诗人“一听到个性这个词”竟“不寒而栗”。这是文学界发出的最早呼声，要求文学回到它的主题，即人和人的感情上来。5月1日，《文学报》打破了多年来官方庆典的传统，在第一版刊登了整整一栏爱情诗。

6月23日，作家协会理事会主席团决定重新吸收1946年被开除的阿赫玛托娃和左琴科为作协成员。作家兼评论家K·丘科夫斯基得知这一消息以及《鳄鱼》杂志有可能发表左琴科沉默时写的短篇小说后，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包

---

<sup>①</sup> 马林科夫：《在联共（布）第19次代表大会上的总结报告》，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70页。

<sup>②</sup> （俄）爱伦堡著，冯江南等译：《人·岁月·生活》（下），海南出版社1999年版，第481、483页。

括绝大多数文学家和艺术家将获得新的生命!”<sup>①</sup>

7月25日，作家谢尔文斯基因非党诗人谢赫捷尔的诗集被出版社拒绝而给马林科夫写信。信中说：作为作协会员的专业作家不去找作协，而找自己的文友，说明“他对作协已不寄希望”。接着批评笼罩在作协内部的“恶劣气氛”，“距社会主义艺术家自由创造、自由争鸣的纯洁气氛太远了”。写信人还批评党中央宣传鼓动部，早在战争时期，为了把作家协会控制在自己的视野中，在作家中选拔了几十名“有关系”的文学工作者，把他们安插到文学界各个部门，正是这些人占据了领导岗位，进而成为全俄无产阶级作家协会和各杂志、丛刊、出版社编委会，甚至斯大林文学奖金评选委员会的头目。他们拥有无限权力，官官相护，相互纵容，充分肯定自己，清除竞争对手，最终脱离作家，成了广大作家所深恶痛绝的帮派。<sup>②</sup>

8月22日《文学报》以И·沙米亚金《幸福时刻》小说的命运为例，批评“一些编辑和评论家不正确地帮助作家，促使他们伪造和通过不妥当的方法粉饰现实”，号召作家在这种情况下应勇敢地对抗批评者的非难。

诗人瓦·特瓦尔多夫斯基主编的《新世界》，在文学的“解冻”时期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杂志的8、9月号上连载了费·潘菲洛夫的《伏尔加河——母亲》。小说主人公大声疾呼：“忘掉规划，想想人民的需要吧！”<sup>③</sup>潘洛娃的《一年四季》揭露了一个利己主义者和投机家的上层人物。作曲家阿·恰恰图良说：“创作问题不能用官僚主义方法来解决。”<sup>④</sup>爱伦堡在《旗》杂志10月号上也提醒读者：艺术上的统计和工业上的统计完全是两码事，契诃夫和高尔基，他们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喜欢什么时候写就什么时候写，而不受行政官员和作家协会的监督。

《新世界》杂志12月号发表了弗·波梅兰采夫《论文学的真诚》一文，作者大胆而激烈地批评了苏联文学的现状。他认为，创作需要才华，首先要有真

①（俄）尤·阿克秀金：《赫鲁晓夫的“解冻”与1953—1964年苏联社会情绪》，俄罗斯政治百科出版社2004年版，第81页。

② 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8卷，第91—92页。

③（苏）马·斯洛宁著，刘峰译：《苏维埃俄罗斯文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338页。

④（苏）马·斯洛宁著，刘峰译：《苏维埃俄罗斯文学》，第337页。

诚。有些作品之所以“装腔作势”、“矫揉造作”，“人物和环境全是凭空捏造出来的”，就是因为作者缺乏“真诚”。他指出，“一切公式化，一切非出自作者本意的，都是不真诚的”。而最坏的乃是“粉饰现实”。“粉饰现实”源远流长，表现手法形形色色，五花八门：“凭空杜撰永庆升平的景象”；掩盖生活中实际存在的“丑事和坏事”；回避矛盾和斗争。他告诫作家：“你如果总是要看某人脸色行事，你就是个坏作家。”千万不要干“估价行情”的蠢事。他还批评一些评论家“发出的不是声音，而是回声，没有自己的独到见解，而只是四处散播别人授予他的东西”。他甚至说：“那些追随斯大林奖金的颁发而写的文章，一般说来只是点胡椒面，而不是文学的概述。”<sup>①</sup>波梅兰采夫的这些言论，立即引起了共鸣。古比雪夫的一位读者在信中写道：“普通的诚实人”早就发现这种丑恶的现象，并且愤恨至极，作家替老百姓说出了“大胆、实在而又公正的话”。这位读者还表示：“所有有头脑、热爱真理的人们，都会理解您。”<sup>②</sup>作家B·杜金采夫在一次读者座谈会上也说：“我认为，波梅兰采夫的巨大功劳在于，他第一次大声喊出了诚实的必要性，他是在向我们的良知呼吁。”“因循成习的不诚实，不只是一个文学问题，而是全社会的通病。”<sup>③</sup>

12月5日，丘科夫斯基同费定会见了文化部长波诺马连科后，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波诺马连科向他们叙述了自己朴实的自由主义新纲领，并告诉他们，他给莫斯科高尔基艺术剧院的导演和演员说了，今后演出从首长的监督下解放了。<sup>④</sup>12月6日，马雅可夫斯基的《澡堂》被停演了1/4世纪之后，经过重新排练，在莫斯科讽刺剧院上演。不过，就在1954年初，波诺马连科却被调任哈萨克斯坦党中央第一书记，而文化部长改由原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长亚历山德罗夫担任。这里已经包含某种玄机。

《新世界》杂志在1954年的3月号上发表了特瓦尔多夫斯基的长诗《山外青

---

① 北京大学俄罗斯苏联文学研究室编：《关于“解冻”及其思潮》，第254—270页。

② 俄罗斯国立文学艺术档案馆：第1702库，第6卷宗，第72分卷，第69页，转引自马龙闪《苏联剧变的文化透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94页。

③ 俄罗斯国立文学艺术档案馆：第1702库，第6卷宗，第77分卷，第52页，转引自《苏联剧变的文化透视》，第294页。

④ （俄）尤·阿克秀金：《赫鲁晓夫的“解冻”与1953—1964年的苏联社会情绪》，第81页。

《山天外天》的一部分。这是诗人对时代的感受、体验和思考的叙事诗，表达了“人的自我独立——是他伟大的保证”。“解冻”文学的典型特征就是强烈要求表现过去被压制了的人的个性，它的内在自由，他的尊严，它的责任感。在这首长诗中有“伟大列宁从不是神/也没有叫人造神”的诗句。<sup>①</sup> 4月号刊登了列宁格勒大学副教授Ф.阿勃拉莫夫《战后散文中的集体农庄人》评论文章。作者大胆触及了“最神圣的东西”——斯大林奖金获得者的作品，批评了巴巴耶夫斯基、马尔采夫、尼古拉耶娃及其他作家的“模范作品”，说他们不惜用粉红色油彩把平日集体农庄生活描绘成光辉灿烂的节日景象，嘲笑了巴巴耶夫斯基的《金星英雄》和尼古拉耶娃的《收获》千篇一律的主人公、互相雷同的俊男俊女。这一年，阿勃拉莫夫发表了自己的长篇小说《兄弟姐妹》。这是“解冻”时期头一部比较成功的描写北方农村生活的作品。

就在这个时候，爱伦堡的小说《解冻》在《旗》5月号与读者见面。这部小说打破了苏联文学的“常规”，没有把注意力集中于生产问题上，没有着力塑造正面的理想人物，而是把眼光移到实际生活中存在的普通人及其道德伦理冲突上，即普通人的爱情、对职业的态度和个人幸福等问题上。小说中几对从强制和镇压时代过来的男女，不能正常地表达自己的感情，冷漠呆板，唯恐自己变得直率和随和，生活并不幸福。在春寒之后，他们开始了自己的追求。小说揭露厂长茹拉甫廖夫，为了取得上级的信任，只抓生产和新技术革新，不顾职工生活，结果职工居住的简易房倒塌，造成灾难。玩世不恭的画家沃洛佳只画能捞到好处的宣传画，画技衰退，而他的同学萨布罗夫甘于寂寞和忍受生活的贫困，坚持创作，精益求精，取得了很大成绩。作者告诉人们要真诚对待一切。这部小说不算杰作，但它却打动了人心，成千上万的人竞相阅读。9月23日在莫斯科发行单行本，当晚就销售一空。

这就是文学“解冻”头一年的大体情况。少数作家勇敢地站出来，通过发表文章、给领导人写信、发表创新作品、在有关会上发言，尖锐地批评文学存在的现状，要求结束斯大林的文学政策，维护作家独立自主的创作权。这些作家分散在不同地区或单位，问题从不同角度提出，采取不同的表达方式，发表这些言论

---

<sup>①</sup>（俄）符·阿格诺索夫著：《20世界俄罗斯文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95页。

和作品的也是个别刊物，说明这些行动是自发的，而不是有组织的。当然，正像爱伦堡提到的，文学“解冻”的出现与苏共新领导迅速清理斯大林晚年的个别案件有关系。而有的学者却把文学“解冻”同赫鲁晓夫直接联系起来，认为是他主导的。这种看法并不符合事实。现在已经知道，斯大林去世后，首先提出反对个人崇拜的是马林科夫，而最早提出并推动对斯大林晚年一些案件进行清理与平反的是贝利亚。赫鲁晓夫作为党中央委员会的书记当时的主要心思在谋取最高领导权上。直到1954年5月爱伦堡《解冻》小说发表、文学“解冻”已历经一年以后，赫鲁晓夫才关注这件事。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爱伦堡把他的一部小说命名为《解冻》，从而创造了一个用来描绘斯大林死后时期的流行名词。可是，我们领导核心不能完全同意他用‘解冻’来表示那个时期的特征。”“我们领导成员包括我在内是赞成解冻的，但我们觉得必须批判爱伦堡的立场”。“我们有点慌张”，“我们害怕解冻可能引起洪水泛滥，这将使我们无法控制它并把我们淹死。洪水会溢出苏联河床的堤岸，并形成一股会冲破我们社会所有堤坝的浪潮。”<sup>①</sup>这段话清楚地表明，包括赫鲁晓夫在内的苏共新领导对文学的“解冻”虽然赞成，但又害怕它变成冲破一切堤坝的洪水，因而主张对爱伦堡采取批判的态度。从此以后，赫鲁晓夫开始过问文学领域的事。赫鲁晓夫是根据自己政治斗争的需要，对文学“解冻”采取不断变换的策略，有时利用，有时又压制和打击，总的原则是要把它置于党的控制之下。这种态度贯穿此后文学“解冻”的整个过程中。正是由于赫鲁晓夫采取这种不断变换的态度，才使文学“解冻”运动出现种种曲折，不是一个持久和连续的过程，有时“解冻”，有时又刮来寒流。文学“解冻”运动因而也就变成一场不断的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

在爱伦堡《解冻》发表前后，特瓦尔多夫斯基把自己的新诗《焦尔金在阴曹》交给《新世界》编辑部征求意见。对这部作品，有的编辑赞扬，有的则表示担心。K·西蒙诺夫从《阴曹》的话语中看到对政治局明显的暗示，正式反映到党中央。中央书记П·波斯佩洛夫转给了赫鲁晓夫。赫鲁晓夫被其中一节——“山鼠”士兵压迫国王——激怒，开始对文学家采取行动。作家协会的实际首脑、理事会第一书记、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A·苏尔科夫在苏共中央所属社会科学院讲话时指责了《新世界》杂志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5月25日，《真理报》

<sup>①</sup> 赫鲁晓夫：《最后的遗言》，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38页。

刊登了苏尔科夫《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旗帜下》的文章，首先把打击的矛头指向波梅兰采夫的《论文学的真诚》，指责该文“有害”，因为他“反对共产主义思想，反对党的列宁主义文学原则”。他还批评了其他杂志和作家，如批评佐林的剧本《客人》攻击党的传统。结果这个剧在叶尔莫洛娃剧院公演的第二天就被文化部勒令停演。

6月6日，《共青团真理报》发了一篇《肯定生活——这是我们文学的力量所在》的专论。文章说，“共产党对我们的作家关怀备至”，希望他们用“鲜明的艺术形式”把“先进的思想灌输到广大读者中间”。但是，最近一个时期，一些作家“匆匆忙忙制造了不少作品，其中的主人公是些骗子、无赖、政治上道德上蜕化分子”。文章点名批判了佐林的《客人》等作品，对于爱伦堡的《解冻》的评论是：“乍一看来，好像如实地描绘了生活，勇敢地激烈地提出了当代许多尖锐问题。然而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由于主要强调了生活的阴暗面，这样就歪曲了生活的真实。”<sup>①</sup> 作协第一书记苏尔科夫在6月15日《文学报》刊登的《改进对作家思想工作》一文中，也有一段专门说到爱伦堡及其小说《解冻》的文字。其中说道：“我们必须严肃地、有原则地批评他的中篇小说的一些缺点。”<sup>②</sup>

7月17日和20日，《文学报》发表了主编西蒙诺夫题为《伊·爱伦堡新的中篇小说》的长篇评论文章。这位作协负责人继续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政治原则，对小说的内容和所描写的人物进行了批判性的分析，认为小说中的人物是苏联社会中“少见的”，“在他们的生活里看见的坏事多，好事少”，把这些细节加在一起，“小说中就造成一幅阴暗的背景”。西蒙诺夫用了多半篇幅通过对小说中的几个艺术家形象的分析 and 批评，指责作家歪曲了苏联文艺界的状况。他分析说，由于作者“观察的草率和肤浅”不仅影响了“作品的思想性”，而且“对作品的艺术性也有不良影响”。在他看来，“这篇小说比起伊利亚·爱伦堡最近15年来所创作的一切文学作品都要坏”。他的结论是：“这篇小说虽然有好的

① 北京大学俄罗斯苏联文学研究室编：《关于〈解冻〉及其思潮》，第143页。

② 北京大学俄罗斯苏联文学研究室编：《关于〈解冻〉及其思潮》，第147页。

篇页，但整个小说，对我们文学来说，却是作者的一个令人痛心的失败。”<sup>①</sup>

从作家协会第一书记苏尔科夫到《共青团真理报》、《文学报》，这么集中地针对爱伦堡及其“解冻”文学开展批判，只能说明这是一种有组织的行动。组织者当然是赫鲁晓夫领导的党中央委员会，因为不论是作家协会，还是《共青团真理报》、《文学报》，都受党中央的直接领导。7月17日，特瓦尔多夫斯基给赫鲁晓夫写信，为讨论《新世界》杂志工作的相关问题和自己未发表的长诗，请求接见。赫鲁晓夫在党中央讨论这个问题时，指责《新世界》发表了有争论的作品及特瓦尔多夫斯基的长诗《焦尔金在阴曹》。他认为应当从这样的立场来批评特瓦尔多夫斯基的缺点：“敌人指望斯大林死后党的路线将修正，但是他们错了。”赫鲁晓夫承认，这类“偏向”的部分责任应当由党的领导来负。“我本人有过错，对个人崇拜阐明不够，使知识分子产生幻想。”他明确表示：“现在，我们实行的和将要实行的是此前党的工作所创造的所有经验的路线。我们是列宁主义者，我们是斯大林主义者。”<sup>②</sup>赫鲁晓夫的这个表白基本上符合他在处理文学“解冻”问题上的立场：他仍是斯大林主义者，只是在策略上有所变化。8月3日，决定解除特瓦尔多夫斯基《新世界》杂志主编的职务。

尽管赫鲁晓夫和文学界的领导人对爱伦堡的《解冻》和《新世界》杂志采取了批判和“纠偏”措施，但是，这些作家的行动却引起了相当大的共鸣。爱伦堡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以及西蒙诺夫等所进行的批评和评论反而引发了“要不要揭露社会的阴暗面？文学如何表现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以及正面人物该不该有缺点？”等问题的广泛讨论。普罗托波波娃在《共青团真理报》发表文章，坚持日丹诺夫“苏联文学应当善于表现出我们的英雄人物”的观点，认为“塑造理想人物的形象目前已成为当代苏联文学带根本性的重大问题。”<sup>③</sup>多数作家不同意这种意见。别里阿什维利在《文学报》上发表的《现实人物和臆想人物》一文中指出，普罗托波波娃等主张写理想中正面人物的人，实际上对社会“阴暗面视而不见”，“硬要把主人公内心斗争抹杀掉”。他们所谓的正面人物是“某种特殊

---

① 西蒙诺夫的文章原载《文学报》，汉译见《关于〈解冻〉及其思潮》，第148—179页。

② （俄）尤·阿克秀金：《赫鲁晓夫的“解冻”与1953—1964年苏联的社会情绪》，第86页。

③ 北京大学俄罗斯苏联文学研究室编：《关于“解冻”及其思潮》，第288页。

类型的人”，是“无罪的天使”，实际生活中并不存在。他认为，正是主张写理想人物的人把作家拖进“无冲突论”的泥坑。<sup>①</sup> 凯特琳斯卡娅说，醉心于塑造“理想”人物，势必导致说教气味。“最糟糕的莫过于编写那些早在自己脑袋里构思好的纯属正面人物了。”这些人物“完全成熟”，“无所不知”，“一贯正确”，可惜缺少了生命力。<sup>②</sup> 留里科夫说，这一争论是与蛮横的简单化和公式主义的争论。塑造正面的理想人物是强迫文学接受一种“伪善要求”。作家塑造自己的形象不是从配方出发，而是从实际出发。用玫瑰色来描绘天使的圣像，这些圣像绝不能代替生动的形象。“假如引向无冲突、引向粉饰现实、引向歪曲生活真实性的‘理想人物’这一概念占了优势，那么文学就将遭到毁灭。”<sup>③</sup>

为了把文学界出现的这种要求“解冻”的情绪和行为控制在党的领导能够控制的范围之内，决定召开作家代表大会，统一思想。但在会前，卡维林、卡扎凯维奇等7名作家发表了《致同事们的公开信》，表达了作家对作协组织的不满和改组作协的具体建议。信中说：在各种刊物、各种座谈会和代表会议上，“年年可以听到对作协的责备”。“它的工作徒劳无益”，“这一庞大臃肿的机构无法弄清我们文学中的复杂现象”，“作协领导很少了解作家的生活和工作情况，很少考虑他们的真正的创作兴趣”。“作协已经由创作组织变为某种管理文化事业的行政机构。”公开信建议，撤销作协的各种委员会，由一些著名作家通过杂志、出版社、报刊组织创作，培养青年作家，把作协变为集体的创作组织。<sup>④</sup>

在12月召开的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作协第一书记苏尔科夫作了《苏联文学的现状与任务》的主旨报告。他仍然认为，在党的路线指导下，20年来文学的发展状况是：“好”或甚至比“好”还多一些。报告人不好直接反对作家揭露社会的黑暗面，因为新领导正用揭露斯大林时期的黑暗面来树立自己的威信。所以，便使用了一个听起来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相容的名词“心灵状态”，说：“一个作家如果陷入了狭小的‘心灵状态’，就必然要遭受失败。”“一些很有经验的作家，如伊·爱伦堡在中篇小说《解冻》中和维·潘诺娃在长

① 北京大学俄罗斯苏联文学研究室编：《关于“解冻”及其思潮》，第290—291页。

② 北京大学俄罗斯苏联文学研究室编：《关于“解冻”及其思潮》，第296页。

③ 北京大学俄罗斯苏联文学研究室编：《关于“解冻”及其思潮》，第300—301页。

④ 卡维林、卡扎凯维奇等7人《致同事们的公开信》，见《关于〈解冻〉及其思潮》一书，第302—304页。

篇小说《一年四季》中的失败，完全不是这些作者集中注意去批评生活中黑暗的现象而造成的。批评是他们不可剥夺的权利。糟糕的在于他们违反了方法上的客观法则，站在抽象的‘心灵状态’的不牢固的基础上，将作者对于苏联人的任意的、主观的看法与社会的人之个性发展的规律对立起来。”<sup>①</sup> 西蒙诺夫比苏尔科夫要实际一些，他在《散文发展的几个问题》的补充报告中，不得不从苏联作家协会的章程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义来检查苏联文学中之所以存在“无冲突论”、“粉饰现实”等现象。他认为，该定义的第二句，即“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会使人们产生“并不是任何真实性和历史的具体性都能够为这个目的服务”的错觉。因此，战后“一些作家和批评家常常随心所欲地解释这个公式”，“他们竭力‘改善’现实，其借口就是要在发展的趋势中表现现实”。他又说：“最近几十年来在我们各个艺术领域滋长起来的热衷于伟大人物和宏伟事件的倾向，无论怎么说都是和‘个人崇拜’和片面理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的任务有关的。”<sup>②</sup> 西蒙诺夫建议删除章程中有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义的第二句。大会的前7天很沉闷，只是在作家奥维奇金发言以后才活跃起来。奥维奇金不同意苏尔科夫对文学现状的估计。他说：“近年来文学里出现了许多灰色的、平庸的、粗糙的东西，不仅出现了，而且混到最高地位，混到了所谓带头地位，或者说得激烈些，混到了文学的代表地位”，成为“看齐的目标”。<sup>③</sup> 他批评颁发文学奖金的制度不对头，不民主，没有估计到读者的意见，没有估计到公正的批评意见。他还批评西蒙诺夫作为《文学报》主编发表了不少论文，搅乱了一切标准，把平庸拙劣的东西捧上了天。肖洛霍夫也说：“近年来杂志上和书市上充塞着许多灰色平庸的文学作品，这股潮流泛滥成灾。”<sup>④</sup> 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试图把文学的“解冻”引向新领导能够控制的范围，大会对作家协会的章程作了某些修改，同时，把曾受到批评的特瓦尔多夫斯基、潘诺娃、格罗斯曼等都选入作家协会新的执行委员会，恢复了阿赫玛托娃作协成员资格。但是，文学“解冻”的势头并

① 北京大学俄罗斯苏联文学研究室编：《关于“解冻”及其思潮》，第203页。

② 北京大学俄罗斯苏联文学研究室编：《关于“解冻”及其思潮》，第22—25页。

③ 北京大学俄罗斯苏联文学研究室编：《关于“解冻”及其思潮》，第306页。

④ 北京大学俄罗斯苏联文学研究室编：《肖洛霍夫在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的发言》（节录），见《关于“解冻”及其思潮》，第310—313页。

没有被压下去，广大作家坚决要求维护自己的权利，反对用政治来压制文学。领导上不得不答应，今后不再随意逮捕或监禁作家。

1955年1月，赫鲁晓夫迫使马林科夫辞去部长会议主席职务，这虽不能看成文学“解冻”的直接结果，但苏共领导层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无疑会影响文学的“解冻”运动。这一年，文学“解冻”开始涉及对斯大林时代某些历史的讨论。5月7日的《文学报》发表了《苏联文学的爱国主义主题》的专论。文章指责，在某些描写卫国战争的作品中，个人崇拜的影响起了不好的作用。“对战争初期的困境常常轻描淡写。”<sup>①</sup>接着沙季诺夫中将在《伟大崇高的题材》一文中说：“战争初期常常被理想化”，臆造出来一个“积极防御”的神话。<sup>②</sup>同时，开始对斯大林时期遭到清洗的作家恢复名誉，先后被恢复名誉的有巴别尔、布尔加科夫、梅耶霍德、维谢奥利和基尔雄；还包括“山隘”派的伊万·卡达耶夫；“锻冶场”的诗人基里洛夫、格拉西莫夫、巴赫米季耶夫；犹太诗人戈洛德内和别尔格森；还有共产党员作家考尔左夫、雅申斯基、谢列布里亚科娃等。为了出版被迫害者的作品设立了专门编辑委员会，有选择地出版了一些作品，如布尔加科夫的剧本、巴·瓦西里耶夫的诗歌和阿·维谢奥利的小说；对帕乌斯托夫斯基、李金和卡达耶夫的短篇小说作了修改后提供给读者。此后，官方承认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伟大的俄罗斯经典作家。阿赫玛托娃被《文学报》誉为“俄罗斯诗坛上天才和崇高的作家”。革命后在国内首次出版了蒲宁的作品集，特瓦尔多夫斯基写了前言。普拉东诺夫的一些作品也开始发表。而新创作的大部分文学作品，逐渐冲破官方的模式，出现了更多不同风格的、情节更加新颖的、故事内容的展开更加自由的作品。

1956年2月举行的苏共二十大是赫鲁晓夫时代的里程碑。赫鲁晓夫在这次大会上作了反对斯大林<sup>③</sup>的秘密报告。他把苏联自三四十年代以来出现的种种严重问题，归结为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造成的后果。代表苏联作家协会在会上发言的苏尔科夫仍大谈苏联文学的成就，既没有对斯大林时期的文艺政策及其后的“解

① 北京大学俄罗斯苏联文学研究室编：《关于“解冻”及其思潮》，第34页。

② 北京大学俄罗斯苏联文学研究室编：《关于“解冻”及其思潮》，第36页。

③ 本书用“反对斯大林”、“非斯大林化”的通常说法，但不认同赫鲁晓夫是“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结论，实际上，赫鲁晓夫的改革并没有突破斯大林体制的基本框架。

冻”作出正确评论，也没有对作家协会的工作进行自我批评。在他后面发言的肖洛霍夫则谈到苏联文学的落后问题。他不同意苏尔科夫以出版了多少书来夸耀文学的成绩，他说苏联有 3773 人参加作家协会，但大都是“死灵魂”。“在近二十年当中，我们出版的富有智慧的好书是有数的”。肖洛霍夫在分析“文学落后的原因”时，一方面批评了大部分作家不同人民交往，不了解生活。在莫斯科大约住着 1200 个作家，他们生活在“三角形的迷魂阵里：莫斯科—别墅—疗养地”，不到工厂，不到农庄，“白白地浪费生命和才华”。另一方面，尖锐地批评了作家协会，“作家协会一直被看成是一个创作集体，却蜕化成一个行政机构，由利欲熏心的法捷耶夫把持着，他什么都干，就是不帮助作家从事写作”，“为什么过去的 15 年中，竟没有人告诉他，作家协会不是一个军事组织，更不是一座监狱，没有一个作家再想在总书记法捷耶夫面前立正。”<sup>①</sup> 法捷耶夫没有得到在大会上发言的殊荣，而且从原来的中央委员被降为候补委员。

苏共二十大以后的第三个月，也就是 5 月 13 日，法捷耶夫留下一封给苏共中央的信后自杀身亡。法捷耶夫在信中说：“我为之献身的艺术已被党的自负而无知的领导所断送”，“文学干部在当权者罪恶的纵容下，或从肉体上消灭，或被折磨致死，其人数之多，甚至历代沙皇暴君做梦也难想到。”“文学——这最神圣的事业——遭到官僚主义分子和人民当中最落后分子的蹂躏”。“列宁死后我们被贬低到小孩子的地位，被意识形态恫吓，这一切被称为‘党性’。”“我被变成一匹拉重车的马”，从事“官僚主义的事务”，“落到头上多少吆喝、训斥、教训，还加上众多的纯粹思想意识罪过”。法捷耶夫终于对斯大林时期文学和他自己的处境作了如此刻骨铭心的哭诉。他悔恨交加，感到“作为作家，我的生命失去任何意义”。<sup>②</sup> 法捷耶夫的自杀引起了很大的震动。法捷耶夫死后，西蒙诺夫在一篇文章中，用相当篇幅叙述了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被批判的经过，以及作者痛苦的修改过程。应该说，法捷耶夫实际上也是斯大林制度及其文学政策的牺牲品。

---

<sup>①</sup> 肖洛霍夫在苏共二十大的发言见《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734—748 页。汇编中的译文同其他人的记述有出入，这里的引证参考了其他记述。

<sup>②</sup>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28 卷，第 108—109 页。

苏共二十大对文学的“解冻”无疑是一次大的推动。1956年文学“解冻”的规模与范围迅速扩大。首先，出现了一批批判个人崇拜和评价斯大林时期重大历史事件的文学作品。肖洛霍夫的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就在这一年发表。小说叙述了一个普通战士索科洛夫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遭遇。索科洛夫在战争中诚实地打仗，被法西斯俘虏，经历了地狱般的磨难。胜利之后，迎接他的仍是残酷的现实。作家以极大的同情描写这个人物，实际上是对整个民族命运的极大关注。在那样的年代，索科洛夫的遭遇，每一个俄国人都可能碰上。肖洛霍夫的小说对苏联的战争文学产生很大影响。此后许多此类作品，如库罗奇金的《战争就是战争》、沃罗比约夫的《牺牲在莫斯科郊外》和西蒙诺夫后来写的《生者与死者》、《军人不是天生的》等，都把注意力转向对战争的全面深入的分析，不只叙述战争的胜利进军，而且也反映出出现过的严重失利，特别注意分析战争和人民、战争和民族命运的不可分的关系。

1956年秋季，《新世界》杂志发表了弗·杜金采夫的《不仅仅是为了面包》，涉及过去根本不能涉及的大镇压的问题。小说叙述了一个叫洛帕特金的知识分子的遭遇。他是一名物理教师，从事一项铁质排水管的离心铸造机的设计，屡遭失败，后来引起军方的兴趣，但却涉嫌“泄露国家机密”被捕，送到北极地区的集中营。多亏一位正直的法官对案件的前后不一产生疑问，才得以复查。斯大林死后，洛帕特金回到莫斯科，恢复了名誉，发明的机器被采用。但是，当年同他对立并打击他的德罗兹多夫并没有受到惩罚，还做了副部长。这部小说主题思想简单，结构松散，记叙冗长，从美学的角度看，并没有很高的价值，但却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和《解冻》一样，它表达了人们一种普遍的情绪。涉及当年镇压情况的作品还有加·尼古拉耶娃的《征途中的战斗》、尤里·邦达列夫的《寂静》、维·涅克拉索夫的《吉拉·格奥尔基耶夫娜》、西蒙诺夫的《生者与死者》等。

“解冻”文学实际上超越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调子。杜金采夫的小说已经间接地对整个制度提出疑问。德罗兹多夫之所以不受追究还能高升，就是因为他的后面有一大群党的领导人、院士、将军、专家、行政官员。除了杜金采夫，其他作家也突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束缚，把注意力转向社会制度和人民大众生活和精神的剖析。达·格拉宁的《个人的意见》、尼·日丹诺夫的《回乡途中》、亚·雅申的《杠杆》等，针砭了苏联官僚制度。尼古拉·威尔塔《险峻的山峦》详细描述了一个组织得很差的集体农庄，通过合理地处理人们之间的友谊

而获得新生。菲·潘菲罗夫因《伏尔加河——母亲》曾受批评，但他仍写了这部小说的续集《沉思》，描写了一个集体农庄为了建立起虚假的表面的繁荣和幸福而不惜牺牲一切。还有一些作家开始描写了各种各样的婚恋和社交生活。这在过去理性主义和禁欲主义占主导地位的时候，是不允许的。

诗歌复兴是1956年文学“解冻”的又一热点。革命初期一度走红的叶赛宁、马雅可夫斯基以及老诗人阿谢耶夫、吉洪诺夫等的诗集重新火起来，供不应求。一批青年诗人叶·叶甫图申科、安·沃兹涅先斯基、B·阿赫马杜琳娜等初露头角，积极参与诗歌活动。还有一些在斯大林时期不走运的中年诗人如鲍·斯鲁茨基、叶·维诺库罗夫、维·鲍科夫等这时候也活跃起来。“诗歌节”那天，诗人们举办各种活动，朗诵诗歌。莫斯科有一万多名年龄不同的人聚集在体育馆听取诗人们的朗诵。诗歌的内涵和艺术手法也发生了变化，大部分诗人趋向哲理诗和抒情诗。诗人们也开始形成不同的派别。中年诗人继承马雅可夫斯基、帕斯捷尔纳克和茨维塔耶娃的派别。年轻的叶甫图申科、沃兹涅先斯基、阿赫马杜琳娜和奥库扎瓦开始形成新的先锋派。俄罗斯文学发展都是以诗歌打头阵，诗歌复兴与繁荣往往预示着散文将出现新的倾向。

苏共二十大以后不久，国内发生了第比利斯事件，赫鲁晓夫的地位受到挑战，1956年10月又发生匈牙利事件，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受到批评。赫鲁晓夫退缩了，1957年初，他又转向肯定斯大林，因此，对文学“解冻”也采取了压制的态度。1957年的春夏，几次召开文学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会议，赫鲁晓夫亲自发表讲话，要求知识分子正确对待斯大林的成绩与错误，继续为共产主义建设事业服务，反对异己思想的影响渗入文学艺术。他点名批评了杜金采夫和在《莫斯科文艺》季刊上发表诗作《最重要的》的阿利格尔。他说：“《不仅仅是为了面包》满怀偏见地引用了一些反面的事实，对我们的立场作了歪曲的叙述，被国外反动派利用来反对我们。”<sup>①</sup>此后不久，作家协会理事会书记处向第三次全体会议提供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苏联文学发展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不仅批评了杜金采夫，还批评了西蒙诺夫不久前在《新世界》杂志发表的《谈谈文学》和克朗在《莫斯科文艺》发表的《作家随笔》，指责他们“给那些需要阐明的问题造成混乱”。这个报告几乎重新肯定了30年代以

---

<sup>①</sup> 《赫鲁晓夫言论集》第7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145—146页。

来包括 1946 至 1948 年的一系列决议在内的党的文学路线。重新肯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苏联文学的唯一方法。报告竟然指责兄弟国家波兰的扬·科特、普希博斯和托埃普里茨以及匈牙利的卢卡奇、南斯拉夫的维德马尔等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敌人”。<sup>①</sup> 这是向文学“解冻”刮来的一次强烈的寒流。

不过，这股寒流时间并不长。在 1957 年 6 月的党内权力斗争中，赫鲁晓夫把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打成“反党集团”，清除了党中央主席团内的对手，1958 年 1 月，集党政大权于一身。他似乎要对文学艺术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1958 年 5 月，党中央委员会作出撤销 1948 年 2 月谴责穆拉杰利的歌剧《伟大的友谊》决定的决议。决议认为日丹诺夫对作曲家们的评价是“没有根据的和不公正的”，因而否定了过去对穆拉杰利和著名的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哈恰图良、普罗科菲耶夫、谢巴林米亚斯科夫斯基等的谴责。可是，就在这一年又发生了粗暴地对待帕斯捷尔纳克的事件。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曾属未来派，20 年代成为先锋派诗歌的大师和领袖，但却被扣上“虔诚的唯心主义”的帽子，一直受压制和打击。战后 10 年，帕斯捷尔纳克埋头写作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位医生，又是一名诗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到国内战争年代的历史变乱中，他虽尽职尽责，救死扶伤，却历尽苦难。作者没有否定革命，也没有赞扬革命，只是通过自己的作品表现“人与历史”的这一重要主题。作者还写了《日瓦戈诗作》作为小说的最后一章。这是一部抒情史诗，内含十分深刻的寓意。1955 年底小说完成后，作者就把书稿寄给了《新世界》和《旗》杂志。《新世界》退回小说，在有阿加波夫、费定、西蒙诺夫等签名的退稿信认为，小说歪曲了十月革命的历史作用，不能刊出。1956 年 5 月，意大利电台驻莫斯科记者、共产党员谢尔捷奥·安杰洛在作家协会的工作人员陪同下到帕斯捷尔纳克家做客。帕斯捷尔纳克把自己的小说手稿给了他一份。安杰洛把它交给了米兰出版商菲尔特里内利。1957 年 1 月，帕斯捷尔纳克还同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签订了出版合同。1957 年 11 月，《日瓦戈医生》在意大利出版，西方其他国家相继也有译本出版。这部小说受到西方著名作家的称赞。1958 年 10 月 23 日，帕斯捷尔纳克以其“在现代抒情诗和伟大的俄国小说的传统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被授予

---

<sup>①</sup> 北京大学俄罗斯苏联文学研究室编：《关于“解冻”及其思潮》一书第 124—139 页编入了这个报告的节录，引文见该节录。

诺贝尔文学奖（5年前他就曾获这项奖金的提名）。苏共中央书记苏斯洛夫立即向中央打了一份要求采取严厉措施的报告。主席团在当天就作出决定，指示在《真理报》发表文章，批判小说的内容，揭露“国际反动派煽动冷战的手段”；通过西蒙诺夫劝阻作家发表拒绝奖金的声明；组织并公布一批作家的表态文章。在上面的政治导向下，国内很快掀起了一场声讨作家的狂潮。克格勃领导人竟以驱逐作家出国相要挟。帕斯捷尔纳克被迫给赫鲁晓夫写信，并向瑞典诺贝尔评奖委员会声明放弃奖金。这期间，克格勃对帕斯捷尔纳克进行了多方面的调查和监控，苏联总检察长鲁坚科还传讯作家，并建议褫夺帕斯捷尔纳克国籍，驱逐出境。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已经准备了文件，只是在国际压力下，苏共中央主席团才决定放弃这一措施。<sup>①</sup> 虽然帕斯捷尔纳克没有被驱逐出国，但却被安置在莫斯科郊外的一处偏僻处所，在克格勃的监控下生活。作者曾写了一首《诺贝尔奖金》表达自己忧愤心情的讽刺诗，又一次受到威胁。帕斯捷尔纳克1960年5月离开了人世。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说：他当年没有读《日瓦戈医生》，如果读了，可能就不会那么处理。其实，当时跟着政治指挥棒批判和声讨帕斯捷尔纳克的作家和群众，大都没有读过《日瓦戈医生》，因为作品还没在国内出版。对待一部重要文学作品的这种做法，充分暴露了这个体制的不严肃和赫鲁晓夫的主观随意性。

1959年召开了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一次非常代表大会，通过了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物质基础的七年计划。5月28日，在克里姆林宫召开第三次作家代表大会，赫鲁晓夫在大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措辞谨慎，语气相当温和，甚至做出同被批判过的作家和解的姿态。他宣布说：“杜金采夫从来不是我们的敌人，不曾是苏维埃制度的反对者。”他还声明：“我不是文学家，因此也不觉得自己有责任分析你们的文学著作。”“你们不要把这些问题的解决推给政府。”<sup>②</sup> 这次大会在组织上让康斯坦丁·费定取代苏尔科夫当选为作家协会总书记，斯米尔诺夫取代柯切托夫担任《文学报》主编，特瓦多夫斯基和潘菲洛夫不仅恢复了《新世界》编辑职务还被选为作家协会副书记。但在苏共中央给大会的祝词中仍然明确要

---

<sup>①</sup>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8卷编入了苏共中央和苏联国家机关因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在国外出版并获诺贝尔文学奖而作出的决定和采取措施的文件。

<sup>②</sup> 《赫鲁晓夫言论》，世界知识出版社1966年，第122、129、136页。

求，“苏联作家必须鼓励人民为共产主义奋斗，必须按照共产主义的原则教育他们，必须在他们身上培养高尚的道德品质和坚决抵制资产阶级思想和道德……”这就清楚地表明党的领导仍然坚持斯大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基本立场。

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文学“解冻”继续保持着良好的势头，一些作家深入思索时代的伟大和悲剧。在1961年10月召开的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苏共新纲领，赫鲁晓夫提出了一个建设共产主义计划，同时又一次掀起非斯大林化的高潮。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发生了赫鲁晓夫支持发表索尔仁尼琴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的事。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生于1918年，是革命后成长起来的青年知识分子。1941年10月，他参加了卫国战争，曾获得过二级勋章和红星勋章，担任炮兵上尉。因在通信中同战友交流自己心中的疑虑被捕，判刑8年，后来又流放哈萨克斯坦。在服刑期间，深入思考了国家悲惨命运的根源，后来就走上了文学的道路。在创作大型史诗作品的同时，1959年完成了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小说主人公伊凡·杰尼索维奇是一个普通农民，战争期间参了军，勇敢地打过仗，负伤后还没彻底好，就又返回前线，被俘后逃出来，却与成千上万的被包围者一道进了自己的劳改营。小说通过犯人杰尼索维奇一天的劳改营生活，揭露苏联劳改营的暴虐，刻画主人公的内心尊严、勤劳、勇敢、有良心、向往自由的品质。一天浓缩了一个人一生的命运。这篇小说能够在《新世界》1962年第11期发表，是因为特瓦尔多夫斯基通过第一书记的助手请示了赫鲁晓夫。赫鲁晓夫读了以后不顾主席团委员的反对，坚持发表。小说开拓了斯大林时期历史的又一个主题——劳改营生活，发表后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赫鲁晓夫所以赞赏并坚决支持发表这部小说，是因为他认为作品符合党性，就是说他认为符合他非斯大林化的精神。他甚至提议授予索尔仁尼琴列宁文学奖。由于几个保守派领导人的反对，才未通过。此后他又提议把叶甫图申科的诗作《斯大林的继承者们》发表在《真理报》上。

苏共二十二大以后不久，赫鲁晓夫在国内外都遇上新的难题。农业收成下滑，食品供应紧张，政府大幅度提高肉类和食品的价格，引起人民普遍不满。1962年6月，罗斯托夫州新切尔卡斯克发生了群众性抗议事件，政府进行了血腥镇压。10月份，赫鲁晓夫又把导弹和核武器偷运到古巴，引发了同美国的一场严重的核对抗。加上他坚持把地方党委分成工业委员会和农业委员会等，给党的领导工作造成混乱，在领导集团内遇到挑战。赫鲁晓夫对文学艺术工作者，对知

识分子又转而采取粗暴的高压政策。1962年底，在马涅什艺术大厅参观美术展览时，信口开河地指责抽象派青年艺术家的作品“乱涂”，“驴子用尾巴涂还要好些”，同雕塑家恩斯特·涅伊兹韦斯内发生争论。接着，赫鲁晓夫先后召开了四次同创作界的知识分子的会见会。与会者都是赫鲁晓夫邀请来的客人，名义上是要听取他们的意见，但他却粗暴无礼，专横跋扈，不但当着大家的面用粗俗不堪的语言侮辱雕塑家涅伊兹韦斯内，而且随心所欲地评论和批评一些作家和艺术家，竟然威胁青年诗人沃兹涅先斯基“滚出俄国”。赫鲁晓夫在会见会上作了这样一段总结发言：“我们在这儿听了发言，也同大家交谈了。但最后由谁来解决问题呢？在我国，应由人民来解决。而谁是人民？党是人民。谁是党呢？我们。我们就是党。也就是说，将由我们来解决，我这就来解决。”接着他又换一种说法：“情况常常是这样：一位上校同一位将军争论起来。上校说的全对，非常正确。将军听呀听，无言以对。可他听腻了上校的话，于是站起来说：‘是这样，你是上校，我是将军，向右转！’上校只得转身退出——他得执行命令！同样如此，你们是上校，我呢，对不起，是将军。向后转！请吧。”<sup>①</sup>赫鲁晓夫用常常讲给别人听的这则寓言故事，来比喻他和作家的关系，充分暴露了他对文学艺术的家长式的统治态度。

赫鲁晓夫的这种转变并没有挽救他走出困境。在1964年的10月终于被他的亲密战友赶下台。赫鲁晓夫的继承者勃列日涅夫部分地回归斯大林主义，文学“解冻”进入低潮。只是到80年代中期以后才又有了转机。

## 文学“解冻”的作用和意义

文学艺术同社会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它有自己的发展逻辑和规律。应该说，斯大林之后出现的文学“解冻”，是俄罗斯文学发展逻辑和规律的产物。文学“解冻”受着两大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一个是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党和政府的态度；一个是作为文学主体的作家队伍的组成。关于前者我们在上面已做了介绍和分析，关于后者还需做些补充说明。当时，在苏联作家队伍组成中不仅包括不

---

<sup>①</sup> M·罗姆《与赫鲁晓夫的四次会面》，原载《星火》1988年第28期，转引自阿克秀金：《赫鲁晓夫》，东方出版社1990年版，第148页。

同年龄、不同文学类别的作家，而且他们还有着不同处境、不同地位和声誉、持不同的美学信仰和派别倾向，等等。因此，作家们对文学“解冻”所持的态度和提出的要求也就存在差异。前面已经说到，“解冻”是由少数人开的头，更多的人是逐步参加进来的。这些主动参加的作家无疑是推动文学“解冻”的主力。即使这些人对文学“解冻”的要求和目标也不尽相同。一些老作家像阿赫玛托娃、左琴科等关心的是自己发表作品的权利。在作家协会担任职务的作家一般紧跟领导，一开始就持批判和反对的态度，而像西蒙诺夫等后来改变了态度。也有作家一直站在维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立场上，把“解冻”作为“修正主义思潮”进行批判。我们中国人比较熟悉的符·柯切托夫就一直持保守立场，在“解冻”时期发表的小说《叶尔绍夫兄弟》、《州委书记》，前一部是按照过去写工业题材的模式，描写“好工人”和“坏工程师”之间的斗争，主题是批判艺术中“资产阶级思潮”；后一部是写“党的正确路线代表”杰尼索夫同滥用职权的“坏蛋”进行斗争，主要的矛头则是对着现代派。<sup>①</sup>作家队伍的这种组成不免造成文学“解冻”过程中的种种争论和斗争。正因为文学“解冻”受这两大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就使它不是一个连续发展的过程，有时“解冻”，有时又出现寒流，一直处于“解冻”之中，始终没有出现新的季节。赫鲁晓夫下台以后，随着勃列日涅夫部分回归斯大林主义，文学“解冻”陷入低潮，还发生了审判作家、驱逐索尔仁尼琴等严重事件。只是到了80年代中期以后，文学“解冻”才又得到转机，最后达到俄罗斯文学的再复兴。尽管文学“解冻”实际上是个过渡阶段，但它却留下了光彩夺目、有声有色的一页。因此，文学“解冻”在苏联文学和俄罗斯文学发展史上的作用和意义是不可否定和抹杀的。

第一，文学“解冻”突破了斯大林的政治樊篱，开始了苏联文学发展的新时期。如果把作家们在不同场合的言行集中起来，那就是，要求独立地自由地从文学的角度反映和描述社会生活的权利，反对政治对文学的粗暴干预，反对通过作家协会对作家进行严厉的行政管理，反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实际上作为政治标准的所谓“根本审美方法”，反对严厉的书报检查制度，不容许再对作家滥施镇压。这些要求和目标虽没有完全达到，但是在许多方面已经或者开始突破。过

---

<sup>①</sup> 符·柯切托夫还有一部《你到底想要什么?》小说，批判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潮，在苏联发表以后反映很差，没有出版单行本。

去被剥夺了发表作品权利的一些著名作家重新获得了这一权利。大多数老作家的地位和创作环境有了大的改善，使他们获得了新的创作活力。各种美学思潮开始复活。在“解冻”的环境下成长起一批有思想、追求新的艺术方法的新作家，如小说作家 A·格拉吉林、B·阿克肖诺夫、B·马克西莫夫；诗人 E·叶甫图申科、A·沃兹涅先斯基、P·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等，为日后文学发展积蓄了宝贵的力量。这些人在 70 年代以后成为俄罗斯的文学主将。特别应该指出的是，文学“解冻”给了索尔仁尼琴这位未来的文学大师出台的机会。如果仍在斯大林时期，他很可能被埋没。索尔仁尼琴后来以他的《癌病房》、《第一圈》，特别是《古拉格群岛》享誉世界，晚年还写了史诗小说《红论》。他去世后，受到现在俄国领导人梅德韦杰夫和普京高度赞誉。文学“解冻”还给尤里·特里丰诺夫提供了出名的机会。这位作家早在 1950 年就以长篇小说《大学生》获得过斯大林文学奖金。但是，因为隐瞒了父亲被镇压的历史，一直受压制。直到 1963 年才发表长篇小说《解渴》。这部描写卡拉姆运河的建设和记者生活的小说，提出的道德问题的深度、复杂程度以及那个年代所鲜见的人物性格的矛盾，创造了艺术世界的先河。从此他被列入著名作家的行列。“解冻”时期，文学作品的数量很多，出现了大量内容新颖，艺术水平很高的作品。其中老作家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命运》和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以及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还有特瓦尔多夫斯基的长诗《山外青山天外天》和《焦尔金在阴曹》成为“解冻”文学的主要代表作，不论在内容的深度上，还是在审美思想和艺术手法上都起了标志和划时代的作用。

第二，文学“解冻”使被分裂的三支文学支流开始汇合，俄罗斯文学在世界上重新展现光彩绚丽的姿态。“解冻”时期，在国内的出版物部分解禁，有了侨民文学家的信息。在新版的高尔基论文与书信集中，重新出现了普宁、巴尔蒙特等的名字。而且还编辑出版了伊·普宁作品集。普宁早在 1933 年就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第一个获此殊荣的俄罗斯作家。同时，一些 30 年代被镇压的作家和被迫转入地下的作家的作品也陆续出版。前者有巴别尔、皮利亚尼克等，后者有 M·布尔加科夫、安·普拉东诺夫等。这里也要特别提一下 M·布尔加科夫。他是十月革命后由一名医生转为文学家，是一名果戈理式的讽刺文学家，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就已出名。他的长篇小说《白卫军》被改编成《土尔兵一家的日子》，上演后得到观众的热烈赞誉。据说斯大林看后也表示赞赏。但由于他所写

的大量讽刺小说受到批判，被戴上“十恶不赦”的大帽子，所写剧本和小说都被扼杀，甚至弄到衣食无着的地步。他无奈给斯大林写信，才在莫斯科艺术剧院谋得一个职务。从此，就埋头写他的长篇史诗《大师与玛格丽特》。这部小说写了9年，前后修改8次，直到他去世的1940年才完稿。小说结构复杂，寓意深刻，艺术价值极高，是苏联文学中的一部杰作，但一直未与读者见面。文学“解冻”中，《大师与玛格丽特》终于和读者见面。这也是文学“解冻”的一项功德。还有一位在20年代就成名的大作家安·普拉东诺夫，他所写的《切文古尔镇》、《地槽》都是闻名世界的大作，也是文学“解冻”以后才得到同苏联读者见面的机会。由于以上两支文学队伍的作品在国内出版，加上上面第一点所提到的那些作品，三支力量汇合，显示出俄罗斯文学的光辉成就。继1958年帕斯捷尔纳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后，1965年肖洛霍夫也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加上1970年获此奖的索尔仁尼琴、1987年获此奖的移居美国的诗人布罗茨基，近40年内苏联共得了4个诺贝尔文学奖。苏联文学重新取得了在世界上的重要地位。

第三，文学“解冻”还开了斯大林之后思想解放运动的先河。继文学之后，“解冻”也波及历史学、经济学、语言学等领域，在苏联形成了一次思想解放运动。这一思想解放运动推动了苏联改革。

## 45. “贝利亚事件”真相如何？

王桂香

“贝利亚事件”是斯大林逝世后苏联政坛上的重要政治事件，几十年以来，对此事件的说法不一。

苏共中央七月全会结束后，1953年7月10日苏联媒体首次公开报道了“贝利亚事件”，作为苏共中央的机关报——《真理报》刊登了简讯：苏共召开中央全会，讨论了马林科夫代表中央主席团所作的报告《关于贝利亚的反党、反国家罪行》，指控贝利亚破坏苏维埃国家，为国外资本家服务，企图把内务部凌驾于政府和苏联共产党之上，全会通过决议取消贝利亚的中央委员会资格，并把他作为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人民的敌人而开除出党。<sup>①</sup>同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也发布公告，解除贝利亚所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和内务部部长的职务，把贝利亚的罪行案件交苏联最高法院审理。“贝利亚事件”后，各出版机关和图书馆奉命销毁了有关介绍贝利亚的所有资料，苏联大百科全书中原有贝利亚的条目也奉命被用新印的其他内容进行粘贴。苏联当权派对“贝利亚事件”的“正统说法”沿用了近半个世纪，受此影响，在苏联社会意识中贝利亚被与国家安全和内务机关的大规模镇压运动、阴谋钻营和专横暴戾连在一起，“贝利亚事件”的真实面目鲜为人知。

苏联解体后，新解密档案材料为人们了解事实真相提供了依据，尤其是莫斯科国际“民主”基金会出版的《贝利亚在1953年，苏共中央七月全会速记记录

---

<sup>①</sup> Правда. 10 июля. 1953.

及其他文集》,① 更是集中了从斯大林逝世到贝利亚被枪决之间苏联当局的一些有关的原始资料,有关贝利亚事件的档案开始被公开,为我们了解“贝利亚事件”的真相提供了帮助。

随着当年档案文献的解密,贝利亚在1953年引起了许多俄罗斯史学家以及文学家的兴趣,涌现了一些论述贝利亚及贝利亚事件的专著,② 论文以及相关书籍的专门章节。评论不一,争论激烈,一些人仍视他为血腥恶魔政治家、阴谋家;另一些人则认为,贝利亚在镇压中的过错并不比从莫洛托夫到赫鲁晓夫这些政治局委员的过错大,只是他在1953年夏激烈的政治斗争中被打败,不然,激进改革的主要发起人的形象是会与贝利亚的名字联在一起的。为了能够冷静地、客观地、历史地评价贝利亚和“贝利亚事件”,首先让我们一起了解一下贝利亚的主要国务活动。

### 贝利亚的主要工作

从苏联百科全书中消失了近半个世纪的贝利亚重新拥有独立的条目。苏联政治精英百科辞典——《绝密人物生平百科》③ 记载:贝利亚自20年代初领导高加索肃反委员会,1931年起任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38年11月起被

---

① Лаврентий Берия. 1953: Стенограмма июльского пленума ЦК КПСС и др. документы. М.,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Фонд “Демократия”. 1999. 512С. (Россия. XX век. Документы).

② Рубин Н. Лаврентий Берия: миф и реальность. М., “Олимп” и Смоленск, “Русич”, 1998. Антонов – Овсеенко А. Берия, М., “Изд – во АСТ”, 1999. Некрасов В. Ф. Берия: Конец карьеры. М., 1991. Серго Берия. Мой отец – Лаврентий Берия, М., “Современник”, 1994. Серго Берия. Мой отец Берия в коридорах сталинской власти. М., ОЛМА – ПРЕСС, 2002. Мухин Ю. Убийство Сталина и Берия. М. 2002. Жуков Ю. Н. Тайны Кремля: Сталин, Молотов, Берия, Малеев. М., ТЕРРА – Книжный клуб, 2000. Топтыгин А. Лаврентий Берия. Неизвестный маршал гос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М., Яуза, Эксмо, 2005. Кремлёв С. Берия. Лучший менеджер XX века. М., Яуза; Эксмо, 2008.

③ Зенькович Н. А. Самые закрытые люди.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биографий, Москва: “ОЛМА – ПРЕСС Звездный мир”, 2002. С. 49—55. 绝密人物指苏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局、书记处委员们。

任命为内务人民委员（即内务部部长）<sup>①</sup>，1939年春当选为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候补委员。1941年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后来称部长会议副主席），负责主抓煤炭、石油和金属工业及重工业、军工综合体，随后进入国防委员会，负责监督飞机、坦克、武器、弹药的生产，因卫国战争中的突出贡献晋升为苏联元帅，曾被授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及一系列勋章、奖章。战后任国防委员会特别委员会主席，负责领导研制原子弹工作。自1946年3月起当选为政治局委员，斯大林逝世后，贝利亚担任部长会议副主席兼任内务部部长（国家安全部也并入其中），期间提出一系列纠正以往错误的大胆举措，1953年6月26日被当局秘密逮捕，12月23日被枪毙。简言之，贝利亚是苏联40—50年代高层领导集团的核心人物之一。

斯大林时期，贝利亚调入中央工作后参与的重大事件主要有：出任内务人民委员迅速整顿国家安全机关，1939年开除7372人，更换了3/4的领导干部，急剧缩减国家安全机关中的犹太人，剔除了波兰族、拉脱维亚族、日耳曼族干部，显示出他具有不惜一切代价完成任务的精明能力<sup>②</sup>。从劳改营、教养院分别释放了22.36万人和10.38万人，但同时也逮捕许多人，镇压活动并没终止；领导内务人民委员部对侨居墨西哥的托洛茨基实施暗杀；<sup>③</sup>整肃外交部，<sup>④</sup>为苏德“合

---

① 贝利亚想进联共（布）中央做党务工作，并不热衷于内务人民委员的职位（参见（俄）列·姆列钦：《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第200页）；贝利亚的儿子谢尔戈还进一步讲述了其父亲对这一任职的不情愿，并曾借口自己是非俄罗斯族人不便担任此职，但没有得到斯大林的同意（参见Серго Берия. Мой отец Берия в коридорах сталинской власти. М., ОЛМА - ПРЕСС, 2002. С. 52）。内务部与安全部曾合分分：1941年2月分为两个委员部；7月斯大林又把它们合成内务人民委员部；1943年4月又分为两个委员部；斯大林逝世后国家安全部又并入内务部，统一归贝利亚领导。

② 参见（俄）列·姆列钦：《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202页。

③ 贝利亚的儿子谢尔戈在其书中指出，贝利亚是不同意暗杀托洛茨基的，认为托洛茨基已没有什么政治影响力了，且完全处于监视中，构不成威胁（Серго Берия. Мой отец Берия в коридорах сталинской власти. М., ОЛМА - ПРЕСС, 2002. С. 79）。

④ 1939年5月李维诺夫外交人民委员（即部长）被斯大林解除职务后，外交部共有2500人被逮捕。

作”排除“干扰”；参与“卡廷事件”，<sup>①</sup>奉命接管棘手的波兰战俘约有25万人，<sup>②</sup>根据1940年3月5日政治局通过决议秘密处决2.2万名前波兰军官；<sup>③</sup>指挥强制性的民族迁徙行动<sup>④</sup>；负责领导原子弹的研制工作。领导苏联情报机关从国外获取原子弹研制的机密，并负责原料铀的开发，1945年秋任原子弹特别委员会主席，负责组织工作并督促保障完成任务。1949年秋苏联第一枚原子弹爆炸成功，为此联共（布）中央和部长会议专门嘉奖贝利亚列宁勋章和一等斯大林奖金，也有人称之为“苏联原子弹之父”。其后，贝利亚继续负责主抓苏联氢弹的研制工作，结果比美国早一年研制出来，为苏联的大国地位提供了军事保障。

斯大林逝世后，熟知苏联国内外局势的贝利亚，向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迅速提出了一系列纠正错误的大胆举措和提案，并亲自主抓落实一些议案，展现了其政治生涯另一面——精明能干的政治家、尝试改革的先行者。

斯大林逝世后，首先是贝利亚主动搞起苏联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他签署绝密文件，下令成立专项侦查小组重新审查斯大林晚年的“医生案件”、“被捕的原苏联国家全部工作人员案”、“前苏联军事部的领导被控案”、“明格列尔案件”以及“1951年从格鲁吉亚共和国强制迁移公民案”、“前苏联空军领导人和苏联航空工业部的领导被控案”。<sup>⑤</sup>根据重新审查的结果，贝利亚迅速向苏共中央主席团递交了上述一系列案件<sup>⑥</sup>的复审报告和予以平反的提案，并指出，“被捏造的‘医生案件’曾在苏联国内外轰动一时，给苏联的威望造成严重的政治损

① 有人辩解说卡廷事件是战前为防后患、先发制人地消灭不喜欢苏联的波兰军官。

② 食品短缺且缺少押送、看管他们的部队，其中约4万战俘交给了德国，14万被强制到北方伐木。

③ 有人说是贝利亚提议的，但其儿子谢尔戈说：贝利亚是主张留下这些富有作战经验的波兰军官来抗击德国的，但遭到伏罗希洛夫、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等人的反对，斯大林赞同他们的主张，下令处决，为此险些罢免贝利亚的内务人民委员职位（Серго Берия. Мой отец Берия в коридорах сталинской власти. М., ОЛМА – ПРЕСС, 2002. С. 77—78）。

④ 根据国防委员会1944年第5073号和第5309号令，将车臣人和印古什人、巴尔卡尔人等少数民族强制迁往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驱逐人口多达47.9万以上。

⑤ Лаврентий Берия. 1953: Стенограмма июльского пленума ЦК КПСС и др. документы. С. 17 ~ 19. Так же см.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 1996, №4.

⑥ 上述这些“案件”仅仅是众多的冤假错案的一小部分，是贝利亚挑选出来的有重大影响案件或是与高层领导集团成员关系密切的案件，但也都不是贝利亚直接参与的案件。

失”，因此提议“在报刊媒体上发表为此案平反的公告”<sup>①</sup>。苏共中央主席团批准了上述报告，其涉案人员都得到了平反，并恢复了名誉。

贝利亚坚持把他签署的案件复审报告和其他材料附在苏共中央主席团的相关决议后面，分发给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以及各地方州委书记等人，贝利亚展示给社会的是反对滥用职权和反对政治迫害的勇士形象，也许他有以此赢得民心捞取政治资本的动机，但无法否认，贝利亚的复查报告和提议平反议案的积极意义，它拉开了苏联平反冤假错案的大幕，实属难能可贵，在当时起到了打破社会政治僵局、提高领导集团威信的作用。

其次，1953年3月26日贝利亚还向苏共中央主席团递交了大赦草案报告。报告指出劳改营、监狱和集中营服刑的犯人多达252.64万人<sup>②</sup>，占1951年初苏联总人口的1.39%<sup>③</sup>，造成监狱、劳改营人满为患，实行大赦正是苏联当时的客观现实所决定的。大赦草案提议释放上百万人<sup>④</sup>，获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批准，1953年3月28日《真理报》头版刊登了“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大赦令”。它带给苏联社会的震动是很大的，“给被判刑剥夺自由在5年以上者的刑期减半”条款扩大了大赦的受益人群，使大赦的意义不只局限于释放103.2万人回家，影响很广，对稳定社会情绪也起到一定作用。但“大赦令不适用于反革命罪”犯人（这一提法是苏联政治犯的代名词），使广大的政治迫害受害者继续含冤服刑，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无论是贝利亚还是其他高层领导人，都不可能完全告别斯大林时代，他们也无意于一下子抛弃原有的专制管理模式，所做的只是对其进行修补

---

① 1953年4月3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作出为“医生案件”平反的决议，决议后附有关于平反此案的内务部公告。本决议连同贝利亚的提案报告、内务部特别侦查委员会的决议，一起分发给苏共中央委员、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第一书记、边疆区党委和州委第一书记。4月4日，在中央级报刊上刊登了平反公告。

② Лаврентий Берия. 1953: Стенограмма июльского пленума ЦК КПСС и др. документы. С. 19 ~ 21.

③ 1951年初苏联人口总数为1.816亿。

④ 因犯渎职罪、经济罪和某些军职罪被判5年以下徒刑的犯人（所犯罪行对社会不构成严重危害），以及孕妇、未成年人、老人（男性为55岁、女性为50岁），共有100多万人，截至1953年8月10日共释放了103.2万人（大赦令不适用于因反革命罪、匪徒行为、盗窃巨额社会财产和蓄意杀人罪而判刑的犯人）。См. “Лаврентий Берия. 1953: Стенограмма июльского пленума ЦК КПСС и др. документы”. С. 398.

而已。

此外，贝利亚还递交了关于限制苏联内务部特别会议权限的报告<sup>①</sup>，提议修改刑法内容，从法律上纠正镇压范围过大的做法和减少民众的不满，明确提议取消某些经济罪、失职罪的刑事责任，对日常违法行为主张通过行政和纪律措施予以惩罚。<sup>②</sup> 贝利亚曾向米高扬谈过其主要想法：“应当恢复法制，不能容忍国内目前这种状况。我们逮捕了許多人，应该释放他们。应当精简内务部……”<sup>③</sup>

改革户籍管理是贝利亚提出的另一项影响较大的对高度专制管理模式进行修补的缓和举措，因为自由往来和居住的限制越来越引起国民的不满，中央主席团谈论并通过了贝利亚的“取消护照加注和特别受理地区”报告。贝利亚还对不给农民发放国内护照（长期有效的多页身份证件）的做法提出尖锐批评，签署内务部第00357号令，规定在其他地区找到工作的农民可领取临时护照。这一措施冲击了苏联集体农庄体制，因此遭到其他领导人的反对，贝利亚被逮捕后这项措施也被取消。<sup>④</sup>

贝利亚在其递交给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报告中也间接地谈到农业问题——大量农庄庄员收入很低，主张“发展农庄的公有经济和提高农庄农民的物质福利，首先降低山区和半山区农庄的农产品国家采购定额和规定的现金支付定额”。<sup>⑤</sup>

在完善民族政策方面，贝利亚向苏共中央主席团递交了关于乌克兰西部、立陶宛、白俄罗斯形势的报告，提出起用地方民族领导干部来替换俄罗斯籍最高领导人的举措，预防爆发非俄罗斯族的民族反抗，这是一种应急性的缓解紧张关系的举措。对此甚至其政治竞争对手赫鲁晓夫后来也承认其正确性。<sup>⑥</sup>

① 贝利亚在健全法律保护制度方面所作出的努力也是有其局限性的，尽管是主动提出了限制苏联内务部特别会议权限的报告，但还没有做到从根本上取缔这一违反司法审理程序的内务部特别会议。

② 《Лаврентий Берия. 1953: Стенограмма июльского пленума ЦК КПСС и др. документы.》. С. 398.

③ Там же. С. 167.

④ Источник, 1994. №4, С. 11.

⑤ Лаврентий Берия. 1953: Стенограмма июльского пленума ЦК КПСС и др. документы. С. 46—49、62.

⑥ “贝利亚在这个问题上所持的立场碰巧倒是正确的”，见（俄）《赫鲁晓夫回忆录》，张岱云等译，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476页。

在改善国际关系方面，秘密谋划苏联和南斯拉夫关系正常化，密切关注民主德国的严峻的政治、经济局势，主张修改对德政策，大胆地提出极具政治冒险性的尝试——主张在民主德国放弃移植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建设，放弃在农村建立集体农庄的方针，主张在民主德国推行和平德国方针，但遭到莫洛托夫等人的坚决反对，最终导致东柏林的6月骚乱，苏联动用武力进行镇压。

苏联高层领导集团采纳上述部分提议，是面对斯大林时期错误造成的严重现实危机所作的自救反应，旨在争取民心、恢复正常秩序，一定程度上缓解、消除了民众心中的不满，缓解了已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这也说明，继斯大林之后，无论何人将执掌国家管理大权，都必须改革原有的高度专制的管理模式，作出顺应民心的举措。

苏联著名资深外交家、国务活动家奥·特罗扬诺夫斯基曾评价说：“虽然当时的第一号人物是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而实际上起主导作用的却是贝利亚……他是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择手段的人，他还是一个拥有非凡智慧和巨大组织才能的人。”<sup>①</sup> 这一评价恰恰说明了贝利亚在1953年春的积极作为。

贝利亚的上述一系列改革措施，大体上是符合当时苏联的社会现实，显示了其管理才能，但同时也引起了苏联高层政治精英们的不满和猜疑。贝利亚把国家安全部并入内务部后迅速进行人事变动，先提议更换各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及6个区和49个州的内务部领导人，<sup>②</sup> 随后更换了各地方中级领导层，如出任乌克兰内务部部长梅什克立即撤换了18名乌克兰各州内务部管理局长。<sup>③</sup> 这种人事变动被贝利亚的同僚们视为“极其危险的行动”，他们本来早已对从斯大林时代继承下来的国家安全机关在社会中具有特殊作用（包括对推荐和调转党务、国务和经济干部拥有决定权）怀有不满，因对权势日盛的贝利亚的共同的恐惧而联合起来，密谋以宫廷政变的方式逮捕贝利亚，这一结果就是“贝利亚事件”。

---

① Трояновский О. А. Через годы и расстояния, История одной семьи. М., “Вагриус”. 1997. С. 171.

② РГАНИ, Ф. 4, ОП. 9, Д. 32, ЛЛ. 152, 233, Цит. по: Пыжикова. Хрущевская оттепель. М., “ОЛМА – ПРЕСС”. 2002. С. 88.

③ РГАСПИ, Ф. 17, ОП. 53, Д. 3283, ЛЛ. 45, 109—110. Цит. по: там же. С. 88.

## “贝利亚事件”始末

苏联官方是在1953年7月10日的《真理报》上公开发表了文章开头提及的极为简略的报道。当时苏联官方对何时、何地、如何逮捕贝利亚的，没有任何公开报道，一直是人们心中的迷案。

事实上，贝利亚是1953年6月26日在克里姆林宫参加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时被突然逮捕的，是根据党的高层领导者们的密谋实施的，依靠以朱可夫元帅为首的军人特别武装小组采取行动，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B·璠莫夫评价说，“这在苏联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sup>①</sup>

马林科夫在中央七月全会上说，关于贝利亚问题最初始自6月12日中央主席团的一次例会，讨论完贝利亚提交的关于白俄罗斯局势的报告之后，开始私下里秘密商议的。

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承认是他首先向马林科夫提出贝利亚的危险性，并表白已同国防部部长布尔加宁谈过多次，从而说服了马林科夫同他结成反对贝利亚的政治联盟。随后的一周多时间里，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分头同主席团某些成员就解决贝利亚问题进行了秘密谈话，马林科夫态度的转变对主席团其他委员的态度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赫鲁晓夫比较顺利地说服了卡冈诺维奇和萨布罗夫，但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最初并不赞同赫鲁晓夫的提议，对逮捕贝利亚持不积极态度，后来由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出面才被说服。莫洛托夫不仅积极支持搞垮贝利亚，而且首先主张采取极端措施。马林科夫最初也没能说服别尔乌辛，后由赫鲁晓夫出面解决。最后才找米高扬谈话，他同意解除贝利亚现任职务，但主张用同志式的方法让其改抓经济工作。可见，在秘密策划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赫鲁晓夫、布尔加宁、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

经过周密的谋划准备，于1953年6月26日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出其不意地将贝利亚逮捕。据赫鲁晓夫讲，是安排莫斯科防空司令莫斯卡连科和朱可夫元帅等11位元帅和将军参加了武力逮捕贝利亚的行动，会上赫鲁晓夫、布尔加

---

<sup>①</sup> Лаврентий Берия. 1953: Стенограмма июльского пленума ЦК КПСС и др. документы. С. 9.

宁、莫洛托夫等发言，揭发、批判贝利亚，随即对贝利亚进行武装监护。<sup>①</sup>晚上才把贝利亚从克里姆林宫秘密送到莫斯科卫戍部队禁闭室，次日又把他转到防空司令部的仓库进行关押，直到审讯和审判结束。<sup>②</sup>

据查证，6月26日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没有留下任何速记记录，目前能找到的能说明这次会议的唯一官方文件，是收藏在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内的马林科夫在中央主席团会议上的发言草稿——“关于贝利亚问题的决定第10号记录，于1953年6月26日”。<sup>③</sup>该文件显示，会上并没有列出贝利亚具体的有真凭实据的犯罪事实，只是笼统地谴责贝利亚及其副手们将内务部凌驾于党和政府之上，导致内务机构有机会滥用职权，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并有针对性提供今后任务——对内务部机构进行治理整顿，使其处于党的监督之下，为党和政府服务；而在“怎样纠正？”项下，对贝利亚的处理意见——“解除其部长会议副主席职务、任命为石油工业部长？”旁写有“缓议”一词，<sup>④</sup>可见主席团成员们对这项处理意见是存在不同看法的。

6月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作出“关于贝利亚反国家罪行”决议，解除贝利亚部长会议副主席和内务部部长的职务，取消他曾获得过的一切荣誉称号和勋章，<sup>⑤</sup>移交苏联最高法院审理。

6月29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通过了《关于立案侦查贝利亚反党和反国家罪行》的决议，并委托赫鲁晓夫一手提拔的、其职务也是这次会上批准的苏联总检察长Р·鲁坚科，负责贝利亚事件的侦查，由其确定专案组成员名单，立即着

---

① Хрущев Н.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Избранные фрагменты., Москва, “Вагриус” 1997. С. 279—282.

② 贝利亚的儿子认为其父亲是6月26日当天被打死的，但据考证，从7月1、2日贝利亚亲笔写给主席团的检讨信来看，至少7月初贝利亚还没有被枪毙。

③ АП РФ, Ф. 3, ОП. 24, Д. 463, Л. 135—137. Цит. по: Лаврентий Берия. 1953: Стенограмма июльского пленума ЦК КПСС и др. документы. С. 69—70.

④ АП РФ, Ф. 3, ОП. 24, Д. 463, Л. 135—137. Цит. по: Лаврентий Берия. 1953: Стенограмма июльского пленума ЦК КПСС и др. документы. С. 69—70.

⑤ АП РФ, Ф. 3, ОП. 24, Д. 464, Л. 107—108, Цит. по: там же. С. 397. 7月10日《真理报》公布的上述决议却删掉了这句话，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伏罗希洛夫于7月15日致苏共中央的报告明确说明，在6月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决议中包括“取消贝利亚曾获得过的一切荣誉称号和勋章”，并附上该决议文本。

手揭露和调查贝利亚及其副手们进行反党、反国家的罪行。<sup>①</sup>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紧急撤换总检察长并责其调查贝利亚事件的这种做法，很难让人相信对贝利亚案件的侦查和取证工作是公正的、客观的，换言之，它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操纵最高法院特别法庭判处贝利亚死刑做好了事先准备。之所以撤掉原总检察长Г·萨福诺夫，赫鲁晓夫解释说“他没有博得我们的信任，我们怀疑他能否客观审查贝利亚案件”。<sup>②</sup>

根据6月27日赫鲁晓夫签署的决议<sup>③</sup>，7月2日至7日，苏共中央匆忙召开全会，着重揭露和批判了贝利亚的反党和反国家罪行，这就是苏联历史上有名的“苏共中央七月全会”。贝利亚没被允许参加，在这次会上马林科夫作了关于贝利亚反党和反国家罪行的报告，赫鲁晓夫、莫洛托夫、伏洛希洛夫、卡冈诺维奇等主席团主要成员及部分代表都发了言，从思想上、政治上检举、声讨贝利亚的罪行。与会代表们的发言把贝利亚勾画成血腥刽子手、帝国主义的间谍、贪恋权力的阴谋家、道德败坏的野心家。七月全会通过了关于贝利亚反党、反国家罪行的决议。

7月10日的《真理报》除了刊登了本文开头提到的简讯之外，还发表了社论《党、政府、苏联人民的不可摧毁的团结》，指责贝利亚“企图把内务部凌驾于党和政府之上”，并列了4条罪行：“第一，企图利用内务部中央和地方的机构来反对党和党的领导、反对苏联政府，根据对他个人的忠诚来提拔内务部的工作人员；第二，企图阻挠农业方面最重大的迫切问题的解决；第三，企图破坏苏联各族人民的友谊，企图在苏联各族之间制造纠纷，并唆使各加盟共和国中的资产阶级民族分子进行活动；第四，蓄意阻挠执行党中央委员会和苏维埃政府关于巩固苏维埃法律和消除某些违法乱纪情况的指示，并多次企图曲解这些指示。”根据新解密的档案文献显示，上述罪名均摘自未发表的苏共中央“七月全会”关

① АПРФ, Ф. 3, ОП. 24, Д. 463, Л. 138. Цит. по: Там же. С. 9, 72.

② (苏)尼·赫鲁晓夫著,张岱云等译:《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491页。俄罗斯历史学家В·瑙莫夫在其文章中也明确使用了这句话,Наумов В. П. Был ли заговор Берии? Нов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о событиях 1953 г. //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8. сен. - окт. №5. С. 32.

③ АПРФ, Ф. 3, ОП. 76, Д. 23, Л. 11. Цит. по: Лаврентий Берия. 1953: Стенограмма июльского пленума ЦК КПСС и др. документы. С. 71.

于贝利亚罪行的决议。<sup>①</sup>

7月29日，苏共中央主席团通过决议，取消贝利亚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资格。

12月7日，苏联最高监察院通报说，完成了对贝利亚案件的侦讯工作，结论是贝利亚组织了与苏维埃国家为敌的阴谋叛国集团<sup>②</sup>，并重复了《真理报》社论中罗列的上述罪行。<sup>③</sup>

12月23日，苏联中央报刊发表公告：苏联最高法院特别法庭对贝利亚一案进行了秘密审判（18日至23日），判处贝利亚及其“同伙”死刑，没收其财产，不得上诉，并立即执行枪决。

审判贝利亚的程序完全是按照苏联30年代至40年代的政治诉讼程序的传统进行的，先由苏共中央全会作出决议（关于贝利亚的旨在颠覆苏维埃国家以有利于外国资本主义、其表现为居心险恶地企图把苏联内务部置于政府和苏联共产党之上的反党反国家的犯罪），预先就决定了几个月后才举行的庭审的判决结论，并且采取的是缺席审判，被告本人不被允许参加庭审，也就无从作出解释和申辩。

就这样，苏联最高法院特别法庭顺从地执行了党和国家领导的意志，判处枪决贝利亚并直接在关押处执行。至此，“贝利亚事件”落下帷幕。

在中央向各级党组织传达的贝利亚案件的文件中，除了列举中央决议中所讲的贝利亚罪行外，还填补了有关贝利亚个人生活的荒诞无稽的无篇幅材料，不仅是从肉体上消灭贝利亚，而且还要把他的名声彻底搞臭。自此贝利亚便被人为地塑造成恶贯满盈的阴谋钻营、道德败坏的帝国主义间谍，是大规模清洗运动和冤假错案的罪魁。

---

① РГАНИ，Ф.2，ОП.1，Д.28，ЛЛ.25—37.

② 成员有贝利亚及其助手梅尔库洛夫、德卡诺佐夫、柯布洛夫、戈格利泽、梅希克、弗洛齐米尔斯基。

③ 此外，“侦讯结果”中增加贝利亚的“历史罪行”——指控贝利亚在内战时期曾与外国情报机关有勾结。

## 七月全会和贝利亚的三封悔改信

苏共中央七月全会的主要议题是检举、揭发、批判贝利亚，讨论马林科夫的报告《关于贝利亚反党和反国家罪行》，赫鲁晓夫主持了开幕式。从七月全会速记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马林科夫的报告，还是赫鲁晓夫的讲话，以及其他委员的发言，对贝利亚的指责主要是政治性的，他们都步调一致地按照主席固定的调子对贝利亚进行指控、上纲上线并自我洗刷，他们极力把斯大林逝世后贝利亚通过中央主席团采取的一系列措施，说成是贝利亚企图把内务部凌驾于党和政府领导之上，把纠正民族政策上的错误说成挑拨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把其处理民主德国问题的建议说成“帝国主义的代理人的罪证”。

新近出版的解密档案材料首次全文发表苏共中央七月全会（1953年）的完整材料，它向我们揭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七月全会的会议速记记录竟然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原始的会议速记记录，即未经修改的反映全会上实际讲话的速记记录（原件现保存在俄罗斯国家现代史档案馆）；另一个是会后经过修改的速记记录，也就是作过修改（变动、增删）的交付印刷的速记记录。

1953年9月18日苏共中央主席团通过决议〔“关于出版七月全会和九月全会（1953年）速记稿”〕，定于10月1日前出版。决议明确要求“对发出速记稿尚未核对的同志在一周时间内核对自己的讲话……”此决议为变动、修改七月全会速记记录打开方便之门，从七月全会到十月初，苏联高层政治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变化，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九月全会上被正式批准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成为党的第一把手，跃居到马林科夫的前面，许多委员们根据时局的变化对自己的讲话稿作了彻底修改，由于七月全会后贝利亚在党的宣传中受到致命的批判，以至于委员们以前关于同贝利亚关系密切、关于内务部部长的智慧和经验的讲话变得不合适了；要求减少贝利亚改革国家内外政策计划的材料，这一切均由对“敌人、卑鄙的阴谋家、外国情报机构间谍”——贝利亚的指控所取代。许多委员不仅修改个别细节、事实和措辞，而且还改变原来讲话的意思，有的发言稿还被怀

疑是重写的。<sup>①</sup> 值得一提的是，赫鲁晓夫和莫洛托夫的发言也都作了重大修改。

狱中的贝利亚曾先后给苏共中央委员会和中央主席团写了三封信<sup>②</sup>，为我们了解贝利亚事件的起因及贝利亚的国务活动都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重要材料，也是贝利亚能为后人留下的唯一能表明他自己对该事件的态度宝贵资料。7月1日写的第二封信，手稿长达9页，可以视其为无法参加七月全会的一个书面发言，他诚恳地请求原谅：“我对自己的全部行为作了最严厉的反省，严厉地责骂自己。我对您（指马林科夫）的态度在性质上特别严重和不能原谅。我是百分之百地错了。”他承认坚持要把内务部的报告同中央决定一起散发的想法是错误的，认识到这样做在一定程度上贬低了中央决定本身的意义，“从我方面来说坚持散发报告是愚蠢的，是政治考虑不周，更何况您曾告诫我不要这样做”。贝利亚信中还回忆了与马林科夫以及其他主席团成员之间的昔日多年的工作友谊和相互提携，也间接地表白了自己在国务活动方面所做过的成绩和工作，并请求“安排做点工作吧！哪儿都行，任何需要的工作、最细小的工作都行……在任何一个边区和州、国营农场、农庄、建筑工地，恳求您不要使我失去成为一名积极的建设者……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我仍将忠于我们亲爱的党和苏联政府”。

次日，贝利亚给主席团所有成员写了封短信，恳请大家立即干预，“有人想不经审判和侦查就迫害我，5天关押后一次审问也没有……难道作为中央主席团委员不应要求对他的案件仔细审理，提出指控，要求解释，讯问证人？……对一位中央委员和自己的同志不经审判和弄清情况在地下室蹲5天5夜后处死他，难道是最唯一的和正确的解决方法？……我断言，只要愿意进行调查，一切指控将被撤销……我请马林科夫同志和赫鲁晓夫同志不要固执，给同志平反难道不好吗？”一连串简短的语句表达了贝利亚无助的心情，也间接地说明贝利亚对没有被允许参加中央全会的彻底失望，同时他确信其同僚们拿不出什么不牵扯他们自己的真凭实据的指控。

负责监管贝利亚的 K. C. 莫斯卡连科将军在其回忆录中证实说：“所有这些

---

① Лаврентий Берия. 1953: Стенограмма июльского пленума ЦК КПСС и др. Документы. С. 13.

② Лаврентий Берия. 1953: Стенограмма июльского пленума ЦК КПСС и др. Документы. С. 71—79, 有关信件内容的引用均引自此文，以下不再一一做注。

信我们都呈递给了主席团委员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后来我们得到指示，不许再给他纸、铅笔、钢笔，也就是禁止他写，我们就遵照执行。”<sup>①</sup>由此可见，后来贝利亚连申述权也被完全剥夺了，他的竞争者们竟然连他手中的笔都害怕。

事实上，贝利亚的这些信不仅没有拿到中央全会上宣读，甚至没有让中央主席团全体委员审阅，他的请求也没有得到批准，其同僚们为了保全自身，把贝利亚作为造成斯大林时代所犯下错误的主要罪魁，以此来洗刷自己，这正是贝利亚的悲剧之所在，他最终成了斯大林体制的囚徒。

### “贝利亚事件”深层原因

斯大林逝世后，政治精英们开始对国家权力重新分配。1953年3月5日晚召开的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联席会议，会上经贝利亚提议确立马林科夫为部长会议主席，贝利亚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赫鲁晓夫任苏共中央书记；此外，会上还通过了一项“绝密”议案：苏共中央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授权马林科夫、贝利亚和赫鲁晓夫采取措施，整理斯大林同志的文件，无论是正执行使用的文件还是档案文件。对此有评论认为，“它是了解随后发生各种事件实质的关键，实际上它说出了斯大林主要接班人的名字，正是他们很快就得决定，这三个人中谁将成为头号人物”。<sup>②</sup>

由此我们不难理解，马林科夫同意与赫鲁晓夫结成反对贝利亚的政治同盟的动机所在。另外，贝利亚的儿子谢尔戈曾在书中披露：“我父亲搞了一份马林科夫的材料，包括他的所有活动以及根据他主动提议所犯下的罪行（马林科夫参与了集体化和所有清洗运动）。我父亲曾对他说：‘算你走运，这些材料在我手里，不过以后你做事要明智些。’”（逮捕贝利亚及其家属后，马林科夫曾亲自找贝利

---

<sup>①</sup> Лаврентий Берия. 1953: Стенограмма июльского пленума ЦК КПСС и др. Документы. С. 10.

<sup>②</sup> Лаврентий Берия. 1953: Стенограмма июльского пленума ЦК КПСС и др. Документы. С. 7.

亚的儿子索要贝利亚手中的档案，无获而归非常恼火)<sup>①</sup>当然，贝利亚手中掌握的不只有马林科夫的“把柄”，还有主席团其他成员的类似的“把柄”，正是对这种威胁的担忧，使他们联合起来反对贝利亚，以此解脱各自与过去错误的干系。

历史学家德·沃尔科戈诺夫在其书中的讲述也证明了这一点：“当贝利亚被逮捕时，赫鲁晓夫下令把保存有斯大林发给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许多文件的贝利亚私人档案也‘全部都带走’。为此成立的专门委员会，出于‘善意’考虑，没翻看也没去读，就执行命令把11袋文件全部都烧毁了呀！很可能，这些文件都是独有的一份呀！……党的高层领导们害怕，这些文件中有他们的黑材料，斯大林发给贝利亚的许多命令和决议，都被扔到专门委员会点起的火堆上烧了，永远成了历史的秘密。”<sup>②</sup>

在分析“贝利亚事件”时，作为研究苏联战后时期的著名学者叶·祖布科娃谈论说，“贝利亚事件”是斯大林逝世后苏联高层权力斗争的产物，是苏联集权政治的产物。“事件”产生的真正原因是贝利亚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使其作用日益显赫，而这些措施触动了他的同僚们的权势欲，引起了他们的惶恐，使他们担心会影响到自己的切身利益。在数年期间里，内务部获得了过多的权力，实际上已经超出了党的监督范围。他的同僚们不无理由地看到了这里存在的对自己以及自己生存的现实危险性，是恐惧感使他们联合起来共同反对贝利亚，把贝利亚从政治舞台上清除掉。事实上，逮捕贝利亚、削减强力机关的过大的权力，这既符合赫鲁晓夫的利益，也符合马林科夫的利益。

贝利亚的儿子在其回忆录中写道，“父亲是一位追究真实结果的务实的国务活动家”，“父亲错在，过高地估计了周围同僚们对举措议案的赞同，同时也没有充分估计到他们施展阴谋诡计的‘才华’”。<sup>③</sup>

贝利亚成了斯大林时代错误的主要承担者，他的政治竞争对手们也极力地把一切都推到贝利亚身上，中央主席团成员以及中央委员们在七月全会上的发言就

---

① Серго Берия. Мой отец Берия в коридорах сталинской власти. М., ОЛМА – ПРЕСС, 2002. С. 345.

② Волкогонов Д. Семь вождей. кн. 1. М., 1996. С. 260—261.

③ Серго Берия. Мой отец Берия в коридорах сталинской власти. М., ОЛМА – ПРЕСС, 2002. С. 13.

集中地体现了这一点。1955年赫鲁晓夫访问南斯拉夫时，在公开声明中就曾把过去破坏苏南关系的罪责统统推到贝利亚和阿巴库莫夫身上，引起铁托极大的不满。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所作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中，也极力把贝利亚同战后斯大林的镇压活动绑在一起：“斯大林极重的猜疑心被卑鄙的奸细、可恶的敌人贝利亚巧妙地加以利用……正是贝利亚向斯大林‘抛出’了他和他的心腹一手炮制的材料……斯大林是从贝利亚和阿巴库莫夫那里获得了某些伪造材料……在策划五花八门的肮脏可耻的案件中，我党的凶恶敌人、外国间谍机关的走狗、骗取了斯大林的信任的贝利亚起了最卑鄙的作用。”<sup>①</sup> 赫鲁晓夫在各种场合曾多次不厌其烦地解释贝利亚问题，而且往往前后说法不一致。

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B·璘莫夫、Ю·希卡乔夫在《贝利亚在1953年，苏共中央七月全会速记记录及其他文件集》的序言中评论说，“实际上，‘贝利亚事件’是政治局反对其某成员的阴谋，这场阴谋的全部要素俱在：极端保密、秘密起草指控条款、认真推敲行动计划、幕后进行密谈、分配角色和组织执行逮捕的武装军官小组”；“贝利亚被剪除后，斯大林逝世后争夺党和国家领袖的斗争第一阶段宣告结束。在这场斗争中，赫鲁晓夫是最大的赢家：他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大大加强”。<sup>②</sup>

究其实质来说，“贝利亚事件”是斯大林时代的产物，是苏联集权专制体制的产物，他也因此成了斯大林时代一切错误的“替罪羊”。

### “贝利亚事件”的平反问题

根据现已公布的档案史料来看，1953年指控贝利亚所犯的罪行——背叛祖国、组建反苏联阴谋团伙、从事恐怖主义活动、担任过秘密间谍，是属于当时为了权力斗争的需要而凭空捏造的，确实存在罪名不符的问题。但1999年10月和

<sup>①</sup> Хрущев Н. О культуре личности и его последствиях. Доклад первого секретаря ЦК КПСС тов. Хрущева Н. С. XX съезду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25 февраля 1956 года // Доклад Н. С. Хрущева о культуре личности Сталина на XX съезде КПСС. Документы, М., “РОССПЭН” 2002. С. 95, 99.

<sup>②</sup> Лаврентий Берия. 1953: Стенограмма июльского пленума ЦК КПСС и др. Документы. С. 8. С. 11.

2000年5月，俄罗斯最高法院军事法庭两次驳回贝利亚亲属要求给贝利亚平反的上诉。

为此，笔者走访了一些俄罗斯著名学者以及普通民众。有学者认为，尽管“贝利亚事件”确实存在罪名不符，但给贝利亚平反仍是不现实的。其原因在于：一方面，贝利亚长期以来一直被塑造成一个血腥镇压、阴谋钻营的帝国主义间谍，臭名昭著，在俄罗斯民众的意识当中埋下了很深的怨恨；另一方面，自1938年起贝利亚曾长期担任苏联内务部部长的职务，对斯大林时期的大规模镇压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尽管斯大林的亲信们在这方面每个人也都有罪责，但在人们的意识和记忆深处，已经很难把贝利亚与斯大林的错误分割开来。<sup>①</sup>

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罗伊·麦德维杰夫在回答笔者就这一问题的提问时，也明确表示“贝利亚事件”很难给予平反，因为确切地说，它不是司法问题，而是政治问题。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弗拉基米尔·米亚斯尼科夫在接受笔者的提问时也明确表达了类似观点。他认为，俄罗斯学术界依据新公布的档案对“贝利亚事件”及贝利亚在苏联历史上的作用进行重新评价，这是正常的，它能勾画出其真实历史面目，更接近客观事实。弗·米亚斯尼科夫院士回忆说，1953年3月斯大林突然逝世时，他正值大学时代，曾目睹了当时的历史进程，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陷入无法自控的悲痛之中，客观地说，贝利亚当时表现得很冷静，操办一切事情。可以看出，贝利亚对如何使国家继续向前发展是怀有信心的，但有的学者把贝利亚捧成英明的改革家，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过分夸大了其主张和作用。弗·米亚斯尼科夫院士进一步指出，“贝利亚事件”是苏联当时高层权力斗争的结果，但要给贝利亚平反会造成社会上思想混乱，因此他认为，不会予以平反。鉴于经贝利亚之手曾有几万无辜政治犯被枪杀，他强调说，即使是再过50年、100年，也仍然不会给贝利亚平反。

《贝利亚在1953年，苏共中央七月全会速记记录及其他文件集》一书版权页上的内容简要中，赫然写道：“靠造假做法指控贝利亚所犯的罪行是凭空捏造的”，但关于他所犯的真正暴行——组织大规模镇压运动，却只字不提。

---

<sup>①</sup> 这是笔者在与俄罗斯著名教授安·索科洛夫、叶·祖布科娃交流时他们表达的共同观点。

贝利亚自 1938 年底起开始担任国家机器——内务人民委员部部长，无论在 30 年代末至 50 年代初的一些重大事件中扮演何种角色——是主动、积极倡议者还是主要参与、执行者，也无论他所做的一切是为了维护以斯大林为首的苏维埃政权或是政治需要还是生性残酷，他对其在任期间苏联国内某些大规模的清洗和镇压活动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当然，贝利亚对当局所犯的罪行是负有责任的，其实，瞬间变为严酷的审判官的贝利亚的‘亲密同志’——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赫鲁晓夫、伏罗希洛夫、米高扬、布尔加宁也一样负有责任……多年来，贝利亚在社会意识中成了残暴统治者的象征，成了他自己所犯一切罪行和归咎于他的斯大林政权的罪行‘替罪羊’”。<sup>①</sup>

---

<sup>①</sup> Лаврентий Берия. 1953: Стенограмма июльского пленума ЦК КПСС и др. Документы. С. 11.

## 46. 如何评价赫鲁晓夫反对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秘密报告》？

杨存堂

1956年2月25日，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报告是在没有邀请兄弟党代表参加的秘密会议上作的，没有公布报告文本，因而就被称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秘密报告》像是一颗重磅炸弹，使听报告的人大为震惊，许多人目瞪口呆。据一位与会者回忆：“大厅里鸦雀无声，没有坐椅的嘎吱声，没有咳嗽声，更没有窃窃私语声。大家谁也不看谁，谁也不吭声——或许是因为意外，或许是出于惊慌和恐惧。所有人都深感震惊。”<sup>①</sup> 报告在苏共党内、共青团内的传达引起了很大震动，出现了激烈的争论。《秘密报告》经美国《纽约时报》公布以后，国际上同样反响强烈、议论纷纷，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中国共产党后来在中苏大论战中批评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认为是“捏造了大量谎言”，“全盘否定斯大林，丑化了无产阶级专政，丑化了社会主义制度，丑化了伟大的苏联共产党，也丑化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sup>②</sup> 这也是“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的主要内容之一。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是苏联社会主义实践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件大事。事件已过去了50多年，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已告一段落。事件本身已经成为历史

---

<sup>①</sup>（俄）亚历山大·多布罗沃利斯基《震惊世界的代表大会》，《莫斯科共青团员报》2006年2月22日。

<sup>②</sup>《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与发展》，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学家研究的对象，而至今不论在俄国还是我国国内仍存在着种种不同的看法。历史研究首先要廓清事实，然后用历史学家的眼光进行分析与评论。笔者在这篇文章中试图用已公开的历史档案追述《秘密报告》准备和出台的过程以及报告的主要内容。

### 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准备和出台的过程

《秘密报告》并没有列入苏共二十大的正式议程，报告是在大会议程已经基本进行完以后才作的，人们自然就会产生一些疑问：作这个报告的决定是什么时候、怎样作出的？报告稿是什么时候和怎样准备的？这些问题同“秘密报告”一样也是秘密，长时间外人不得而知。苏联解体后公开的苏共档案中，有一份1956年7月赫鲁晓夫同意大利共产党会谈记录。赫鲁晓夫告诉意共代表：关于个人崇拜“问题的决定不是在筹备代表大会时作出的，而是在大会进行过程中作出的”。<sup>①</sup>这个说法当年同样并没有公布。赫鲁晓夫下台以后，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仍然说：是大会快要结束时才通过作这个报告的决议。他说：在一次会间休息，主席团房间里只有中央主席团委员在场时，“我终于鼓足了勇气”，“提出了一个问题，波斯佩洛夫的报告怎么办？过去处决、逮捕的事情可怎么办？大会要闭幕了，我们没作交代代表就要分赴全国各地了，我们可是已经知道遭到清洗的人清白无辜，他们并不是‘人民公敌’，他们都是好人，忠于党，忠于革命，忠于列宁的苏联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事业。人们要从流放地返回。我们现在不会再关押他们了。要考虑一下如何遣送他们回去”。赫鲁晓夫说，他的话音未落，大家就群起而攻之。经过几番激烈的争论，最后才同意由他在会上作这个报告。<sup>②</sup>赫鲁晓夫的说法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苏共新领导反对个人崇拜和对斯大林历史遗产的清算不是从苏共二十大才开始的。斯大林逝世以后，马林科夫在1953年3月10日的中央会议上就提出了反

---

<sup>①</sup> 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6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00—501页。

<sup>②</sup> （俄）尼基塔·谢·赫鲁晓夫著，述弢等译：《赫鲁晓夫回忆录》（全译本）第3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149—1152页。

对个人崇拜的问题。而贝利亚则很快重新审查和平反了斯大林时期的一些案件。贝利亚被逮捕后，马林科夫在中央七月全会的报告中，继续批评个人崇拜。七月会议之后，苏共中央在向东欧国家共产党通报会议的情况时，莫洛托夫在宣读全会文件后进行的解释性发言中也提到个人崇拜问题。他告诫，为了避免重犯个人崇拜的错误，应该坚持集体领导。1954年，赫鲁晓夫重新审查了列宁格勒等案件，并为其平反。不过，自1953年7月全会以后，在赫鲁晓夫及其他领导人的讲话中，都把大镇压的责任推到贝利亚和阿巴库莫夫身上，直到苏共二十大之前不久，并没有把个人崇拜、非法镇压同斯大林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而且，赫鲁晓夫领导下的党中央所掌握的舆论工具一直仍在宣扬斯大林。在1954年斯大林逝世一周年之际，《真理报》发表的纪念性文章，实际上就是斯大林生前出版的《斯大林传略》的缩写。同年12月，为斯大林诞辰75周年举行了广泛的庆祝活动，《真理报》开辟了专栏，刊登纪念逝世领袖的文章，列宁图书馆举办了纪念性的展览，有的地方举行了群众集会，还颁发了“争取各国人民之间和平”的斯大林国际和平奖。在1955年6月准备苏联领导人访问南斯拉夫的文件时，赫鲁晓夫和米高扬还坚持把苏南关系破裂的责任推到贝利亚和阿巴库莫夫身上。为此，他们同莫洛托夫之间还发生了争论。在访问南斯拉夫同铁托等会谈时，赫鲁晓夫等把一切责任推到贝利亚身上，极力为斯大林辩护，遭到了对方的“哑然失笑，并反唇相讥”。只是在访问南斯拉夫之后，赫鲁晓夫才“真正感到我们的观点有误”。<sup>①</sup>

在准备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过程中，经赫鲁晓夫、米高扬以及中央书记处成员的思考 and 讨论，把“非斯大林化”作为大会的主旨。在为赫鲁晓夫准备的《关于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中只突出列宁，大量引证列宁的语录，而对斯大林只提到一次，还是在时间副句当中。根据档案：在1955年11月5日的主席团会议上讨论关于12月21日，即纪念斯大林诞辰时，赫鲁晓夫提出，只在报纸上刊登这个日期，不举行集会。卡冈诺维奇认为，应该在工厂里集会。伏罗希洛夫也说，如果不举行集会，人们将会反感。布尔加宁和米高扬不主张集会，理由是“要显示同以前的区别”，“不用束缚自己”。米高扬还提出：我们“有斯大林奖

---

<sup>①</sup>（俄）尼基塔·谢·赫鲁晓夫著，述弢等译：《赫鲁晓夫回忆录（全译本）》第2卷，第1156页。

金，而列宁却没有。应该认真想一下，为什么没有人提出这个问题？”卡冈诺维奇针对赫鲁晓夫的反驳说：“从这一立场攻击我没有理由。我支持中央反对个人崇拜的路线。我同你，赫鲁晓夫，没有差别。但有一些微小差异。没有反对你的斗争意图。我建议形成决议——怎样纪念斯大林的生日？”萨布罗夫说：“赫鲁晓夫提出的问题正确。”<sup>①</sup> 根据会议记录，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没有出席这次会议。莫洛托夫这时正在日内瓦参加四国外长会议，马林科夫缺席的原因不详。这是代表大会之前在主席团内围绕斯大林问题发生的第一次争论。

大约就在此前后，赫鲁晓夫和米高扬开始找一些恢复了名誉的知情人交谈大镇压与斯大林的关系问题。据现有资料可知：赫鲁晓夫找过 A·B·斯涅戈夫，他是一位老布尔什维克，早年在乌克兰做过赫鲁晓夫的领导，20世纪30年代初，曾担任过联共（布）外高加索边疆区党的组织部长和政治局委员，同贝利亚共过事，也认识米高扬。1937年、1939年两度被捕，被监禁15年。1953年审判贝利亚时把他从监禁地提出来作证。1954年被召回莫斯科，得到平反并恢复党籍，被派到内务部担任政委。米高扬同 O·Г·沙图诺夫斯卡娅谈过话，她是1916年入党的老党员，曾在莫斯科做组织工作，赫鲁晓夫认识她，后来遭流放，1953年获释，恢复了党籍，分配到中央监察委员会工作。

这期间，米高扬曾单独向赫鲁晓夫报告过根据后者的指示由 Л·С·邵武勉准备的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大部分代表以及由他们选出的大部分中央委员被镇压情况的调查资料。米高扬告诉赫鲁晓夫，将向主席团提出建议：建立有威望的委员会研究内务部、监察机关、最高法院全部文件以及仔细准备向代表大会报告关于镇压的全部案件。鉴于问题的重要，委员会应当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组成（赫鲁晓夫、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米高扬及其他人）。赫鲁晓夫同意，但提出了一些修正：第一，我们的负担很重，实际上仔细研究所有问题对我们来说很困难。第二，这个委员会应由有威望的同志组成，但不应该包括同斯大林工作上很接近的政治局委员。他提出组织以苏共中央书记 П·Н·波斯佩洛夫作为头头的委员会的建议。米高扬尽管说，全部委托他不可能，因为他过去和现在都保留有很深的斯大林情绪，但仍同意赫鲁晓夫的意见。米高扬后来回忆说，

---

<sup>①</sup>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 Черновые протокольные записи заседаний. Стенограммы.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я. В 3 т. М., РОССПЭН. 2003. Т. 1. С. 57.

赫鲁晓夫“想把这个问题作为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想法，提在中央主席团会上讨论”。<sup>①</sup>

在1955年12月31日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讨论“与平反有关的问题”时，根据赫鲁晓夫的建议，成立了波斯佩洛夫委员会，调查十七大当选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被镇压的情况。其成员包括阿里斯托夫、什维尔尼克、科马罗夫，“委托他们翻阅所有资料”。<sup>②</sup>委员会还吸收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谢罗夫、国家安全委员会书记处书记多布罗霍夫、国家安全委员会档案统计处负责人普列特涅夫、国家安全委员会特别机关负责人卡里斯托夫和苏联检察机关的副军事总检察长捷列霍夫。<sup>③</sup>

会前，米高扬收到O·Г·沙图诺夫斯卡娅给他的一封信。沙图诺夫斯卡娅在信中说，这封信是根据米高扬的请求，“再次阐述一下，有一次我曾经对您说过的事情”。她说，她从阿尔曼水产工业企业监狱医院医生基尔恰科夫、护士杜霞·特鲁尼娜那里得知，原彼得格勒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梅德韦季曾告诉他们，基洛夫被杀害以后，斯大林到列宁格勒亲自审问凶手尼古拉耶夫，尼古拉耶夫当场交代，是国家政治保卫局迫使他干的。尼古拉耶夫刚说完这些话，立即有几支纳甘手枪击打他的头部，他被拖了出去。<sup>④</sup>赫鲁晓夫十分重视沙图诺夫斯卡娅提供的材料，决定在这次主席团会上宣读。布尔加宁还没有读完信，伏罗希洛夫就大喊起来——“撒谎！”，接着表达自己的看法：这说明契卡分子（基洛夫的警卫人员）参与了谋杀的事实。莫洛托夫说：“事情牵连到老契卡人员。”但他订正说：“我们三个人一起同尼古拉耶夫谈话的，斯大林是当着我们的面同尼古拉耶夫谈话的。没有打他。”米高扬则说：“当事件发生时，斯大林很激动。契卡人员插手了这件事。”赫鲁晓夫说：“如果追查下去，将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应该找来医生、司机和库普利亚诺夫。对司机进行审查。”别尔乌辛、萨布罗夫、基里琴科、马林科夫提议：“查查雅戈达的案卷；叶若夫的案卷；梅德韦杰夫的

---

① А·И·米高扬《往事的回忆》，转引自（俄）阿克秀金著：《赫鲁晓夫的解冻与1953—1954年的苏联社会情绪》，莫斯科：РОССПЭН，2004年版，第155页。

②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 Т. 1. С. 79.

③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 Т. 1. С. 79.

④ АПРФ, Ф. 3, ОП. 24, Д. 446, ЛЛ. 19—20. 沙图诺夫斯卡娅给米高扬的信。

侦讯案卷。”<sup>①</sup>

波斯佩洛夫委员会成立后就对委托他们的事情全力以赴，不只审阅内务部、监察机关和最高法院的档案，而且由委员会成员、中央书记阿里斯托夫指示各个地方的契卡人员向中央主席团呈报 1937—1938 年各个地区镇压情况的资料。地方上的镇压情况十分惊人，仅在车里亚宾斯克州这两年内就逮捕了 25000 多人，其中 13000 多人被处以极刑。在对 943 名被判决有罪的人的归档侦讯案卷的重新审查中，当时只有两个人被认定确实犯有对他们指控的罪行。这也证明了这些镇压到底有多少根据。<sup>②</sup> 委员会不断向赫鲁晓夫报告对案件审阅的情况。

1 月份，赫鲁晓夫一方面主持主席团会议讨论了总结报告的修改稿和第六个五年计划中的一些发展指标，另一方面认真思考和筹划对波斯佩洛夫委员会提供的材料如何处理。1 月 20 日，他收到 A·B·斯涅戈夫的来信说：“从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起到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我每次都参加了。由于你所知道的原因，我没有参加第十八和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我请求发给我通用来宾票，使我能够出席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当天，赫鲁晓夫就把这封信分发给中央主席团委员和候补委员以及中央书记。<sup>③</sup> 之后，出现了“邀请出席代表大会的恢复了名誉的老布尔什维克名单”，该名单由包括沙图诺夫斯卡娅、斯涅戈夫和米尔恰科夫在内的 12 人组成。后来又出现了另一个由 13 人组成的名单，由首都各个区委以前的书记及赫鲁晓夫本人的前助手构成。赫鲁晓夫邀请这些人参加代表大会的目的显然是为了有助于对斯大林问题的讨论。1 月 30 日，主席团根据赫鲁晓夫建议，作出了《关于在监禁地服刑的被判刑人员》的 No II184/LIV 号决议，成立了苏共中央下属党委会，它们享有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授权，并被派往各地的集中营，审理那些因政治罪和职务犯罪正在服刑的被判刑人员的案件，以便就地作出释放他们的决定。<sup>④</sup>

2 月 1 日，赫鲁晓夫采取了一个非同寻常的行动，把原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特别案件调查局副局长罗多斯叫到主席团会议上进行

①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 Т. I. С. 79—80.

② (俄) 阿克秀金著：《赫鲁晓夫的“解冻”与 1953—1964 年苏联社会情绪》，第 156 页。

③ 斯涅戈夫信的原件在 РГАНИ. Ф. 1. Оп. Д. 1. Л. 44—45。

④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 Т. I. С. 919—920.

审问。赫鲁晓夫要求他：“讲一下波斯蒂舍夫、柯秀尔的情况，你们是怎样把他们宣布为敌人的？”罗多斯回答说：“这是上面的错误。对轻微刑事犯罪的人们，都被归入这类案件的管辖范围之内。斯大林有责任。”主席团会议的讨论由此转到大镇压同斯大林的关系问题上。阿里斯托夫问：“我们是否有足够的勇气说出真相呢？”赫鲁晓夫冒出了一句话：“大概叶若夫也没有罪，一个老实人。”米高扬提起了1934年12月1日通过的反恐怖法令。波斯佩洛夫说：“还规定了被逮捕人员的指标。”谢罗夫说：“有这样的规定。”赫鲁晓夫提出，“也许还可以对报告作一些补充”。“责成谢罗夫、鲁坚科和委员会调查图哈切夫斯基案件，以及贝奈斯在1936—1937年关于图哈切夫斯基（亚基尔）集团给斯大林写的信”。这时，莫洛托夫提出：“应该承认斯大林是伟大的领导人。”米高扬立即反击莫洛托夫说：“而你，莫洛托夫，曾支持他。”卡冈诺维奇说：“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许多事情可以重新考虑，但是，斯大林终究还是当了30年的领袖。”莫洛托夫接着又说：“在报告里不能不说，斯大林是列宁事业的伟大继承者。我坚持这一点。”米高扬则说：“就历史问题来说，可以说是发疯。”萨布罗夫也说：“如果事实是准确的，难道这是共产主义？这是无法原谅的。”马林科夫没有像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那样表示反对，他说：“应该正确地看待事实。正确地提出问题。应该向党说明。”布尔加宁明确表示：“应该向党说明全部真相，说明斯大林是什么样的人，应该采取这样的路线，不能再糊涂下去了。我不同意莫洛托夫的意见，不同意伟大继承者的说法。”苏斯洛夫也说：“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我们已经知道了许多可怕的事情。不能以任何理由宽恕这一点。不能再吹嘘了，个人崇拜造成了巨大的危害。”在这样的形势下，伏罗希洛夫表示：“党应该了解真相，但是，应该根据现实情况的要求来报告。应该考虑周全，不能不分青红皂白。”莫洛托夫又说，“我同意伏罗希洛夫的观点，应当恢复真相”，“真相就是在斯大林领导下社会主义取得了胜利。对不正确的事情应该进行衡量，可耻的事情也是事实。在代表大会之前我们未必能搞清楚”。赫鲁晓夫最后总结说：“大家表述的意见基本上是正确的。为了党的利益应该作出决定。斯大林忠诚于社会主义事业，但是，他使用了残酷野蛮的手段。他毁灭了党。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泯灭了人所具有的一切神圣的东西，而让所有的人都屈从于他个人的意志。”但是，他又宣布，“在代表大会上不谈关于恐怖问题。应该制定一个方

针——给予斯大林以自己的地位。只宣传马克思和列宁。加强对个人崇拜的批判”。<sup>①</sup> 历史学家对赫鲁晓夫在波斯佩洛夫发言后所说的“也还可以对报告作一些补充”，有不同理解。有人认为这里所说的“报告”是指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因为“关于个人崇拜”的报告这时还没有提出来。这个理解有道理。那么，又怎么解释赫鲁晓夫在最后所说的“在代表大会上不谈关于恐怖问题”的话呢？笔者认为，这前后两句话反映了赫鲁晓夫思想的变化。说前一句话时赫鲁晓夫还想在总结报告中作一些补充，而说后面一句话时，他已开始考虑应该另作一个报告，专门谈镇压等问题，所以在总结报告中就不谈恐怖问题了。

从2月3日开始，斯大林的名字被从官方文件中取掉。这一天最高苏维埃授予伏罗希洛夫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在其贺信中称伏罗希洛夫为“伟大列宁忠诚的学生、共产党和苏联国家杰出的活动家之一”，没有了斯大林。

2月9日，波斯佩洛夫委员会向主席团提交了长达70页的《苏共中央关于30年代大规模镇压行动的报告》。这份报告限于国家在1935—1940年间进行镇压的情况，没有涉及20年代到30年代初对“社会异己分子”的镇压以及1940—1950年的镇压。报告说，在1935—1940年以反苏活动遭到逮捕的共有1920635人，其中被处决的有688503人。而1937—1938两年被逮捕的就有1548366人，其中被处决的有681962人。这两年镇压浪潮波及党务机关、苏维埃机关和经济组织的领导干部，以及军队和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的指挥人员。绝大多数共和国、边疆区和州的党和苏维埃机构的领导人几乎全部遭到了逮捕，被逮捕的还有数量众多的城市和地区组织的领导干部。有的机关三分之二领导干部遭到逮捕。十七大选举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有98人被逮捕和枪决。1966名代表被逮捕1108人，其中848人被枪决。报告用了以下7个题目说明这期间的大镇压对苏联法律的粗暴践踏及其手段的残暴：

(1)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关于开展大规模镇压行动的命令。报告指出：1937年年中，叶若夫下达了镇压带有民族特征，或以前在国外居住过，与外国有联系的没有任何罪行的人的命令；1937年7月25日，叶若夫签署在5天内逮捕所有德国公民，包括在军队和工厂工作的人；1937年7月30日签署命令，从8月5

<sup>①</sup>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 Т. 1. С. 95—97.

日起，镇压共和国、边疆区和州的原富农分子、反苏维埃分子和犯罪分子。命令成立三人小组，被逮捕人员划分两类，一类立即枪决，二类监禁8—10年。简化逮捕和审讯的方法，内务部机关首长在没有任何材料的情况下只根据名单逮捕。被逮捕者包括：波兰人和波兰共产党的领导人连斯基—列辛斯基、温什利赫特、奥尔斯基、普鲁赫尼亚克、贝斯特科夫斯基等；从中东路返回的所有苏联公民；朝鲜人和拉脱维亚人；住在苏联的外国职业革命家和兄弟党的领导人。到1938年9月10日，审理各民族和外国人227986人，枪决172830人，其他惩罚46912人，退回补充调查的只有5124人。1937年8月15日叶若夫命令逮捕叛国者的妻子，以及15岁以上的子女，剥夺自由5—8年。

(2) 人为制造的反苏维埃组织、集团和各种中心。报告说，除了要求揭露哥萨克暴动组织、间谍分子和破坏分子集团以及波兰军事组织，制造了右倾托洛茨基分子、间谍恐怖分子、颠覆破坏分子和各种组织和中心。在西伯利亚揭露了33个反苏维埃组织。凡揭露的这些组织都以当地党政领导为中心。基辅州揭露了87个暴动组织，365个破坏小组。内务部虚构了列宁格勒恐怖中心，列宁格勒州内务局局长扎科夫斯基要求被捕的老干部罗森布吕姆按照他的要求交代中心机构。该中心有4—5名领导人——丘多夫、乌加洛夫、斯莫罗金、波泽金，每个分支机构2—3人。

(3) 关于在审判过程中对法制的粗暴践踏。报告揭露的践踏手法有，肉体惩罚和严刑拷打，极其消耗体力的连续数小时的审讯、恐吓和诱供。对强逼出来的供词不进行调查。三人小组在完全没有材料的情况下作出判决。审讯记录是被告不在场的情况下制造的。在这部分列举了波斯蒂舍夫、柯秀尔、艾赫、鲁祖塔克、丘巴尔、叶夫多基莫夫、拉夫连季耶夫（卡尔特韦利什维利）、温施利希特、布柳赫尔、科马罗夫等10个重要领导人的冤案。

(4) 关于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里的“阴谋”。报告说，由于内务部机关人员不够，就调来其他部门的党员，这些人对非法行为感到气愤，结果遭逮捕。叶若夫承认，逮捕了14000名契卡人员。内务部管理局长绝大多数遭逮捕，边疆区和州的管理局干部三分之二遭逮捕。绝大多数被指责参加右倾托洛茨基集团和内务部内部的阴谋活动。

(5) 在监督内务人民委员部审讯工作方面检察机关对苏维埃法制的破坏。报告指出，检察机关纵容并直接参与破坏法制。检察院只在审讯材料上盖章，确认

起诉书和向法院寄发卷宗材料。苏联副检察长罗金斯基在对被告没有按刑法典58—8条提出指控的情况下也把这条罪状写进起诉书。检察长维辛斯基和叶若夫在一天之内就制造出几百份死亡判决书。

(6) 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的司法专横。报告说，内务人民委员部把案件交给军事法庭时事先规定了惩罚措施。叶若夫1937—1938年给斯大林提交了383份名单，共涉及44465名党、苏维埃、共青团、军事和经济组织的领导干部，其中绝大部分被枪毙。军事法庭根本不按规定程序审理，开庭只用15—29分钟就判决了。对军事人民委员会副主席梅日劳克、国防工业人民委员鲁希莫维奇、教育人民委员布勃洛夫、乌克兰中央书记波波夫、联共中央副部长斯捷茨基等许多人都都在20分钟内宣判。

(7) 关于非司法机关审理的案件。报告揭露，1938年11月之前绝大多数囚犯由内务部管理局三人小组判罪。后来便由叶若夫和维辛斯基组成的两人小组判罪，1937年12月29日一天他们两人就审理1000名囚犯名单，判处992名死刑。1938年1月10日两人审理了1667人的名单，1月4日1569人，1月15日1884人，1月16日1286人，1月21日2164人。内务部一个原负责人沙皮罗交代说，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名单都是由采萨尔斯基和米纳耶夫准备的。一个晚上审理200—300份材料，实际上只盖盖章而已。内务部领导人叶若夫和弗里诺夫斯基、检察院领导人维辛斯基和罗金斯基对这些文件不作任何核查，就在上面签字。

波斯佩洛夫委员会报告认为，以下两个文件对大规模镇压起了决定作用：基洛夫被暗杀后，1934年12月1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决议，为普遍破坏苏维埃法制的行为开辟了可能性；1936年9月25日斯大林和日丹诺夫从索契给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和其他政治局委员的电报，直接推动了内务人民委员部进行普遍逮捕和枪决的行动。同时，斯大林在1937年2、3月会议上提出的与“两面派分子”斗争的口号和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的论断为普遍镇压行动提供了理论依据。1937年被枪决的人数与1936年相比，几乎扩大了3倍。托洛茨基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已在1935—1936年和1937年上半年镇压。1937年大规模镇压的是党和苏维埃干部。报告说：“病态怀疑的心态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传播，在党组织中撒下了相互不信任的种子。”对囚犯采取肉体惩罚是以斯大林的名义批准的。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首先是因为中央委员会，作为集体机关，实际上已经丧失了对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的影响力。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仅仅是为了讨

好一个人。这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列宁主义的“个人崇拜”所造成的恶果。<sup>①</sup>

主席团当天讨论波斯佩洛夫委员会的报告。赫鲁晓夫说：“很清楚，斯大林已经不能再作为一名领袖了。如果所有的人他都想消灭的话，他还算什么领袖呢？应该有勇气说明真相。意见是：一定要向党的代表大会说明，需要考虑的是应该怎样说明，该由谁说明？如果不说的话，那就是我们对党的代表大会不诚实了。也可能，委托波斯佩洛夫起草报告说明一切。理由是：个人崇拜，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手中，集中在不诚实的人手中。在什么地方说？在代表大会闭幕会上？”对于赫鲁晓夫的建议，莫洛托夫表示：“应该在代表大会上说。而且不仅仅说这些内容。在民族问题上斯大林是列宁事业的继承者。30年来我们一直生活在斯大林领导下，我们已经实现了工业化。在斯大林之后我们成了一个伟大的政党。个人崇拜是存在的，但是，我们也是这样谈论列宁，谈论马克思的。”卡冈诺维奇说：“历史是无法欺骗的，事实是无法抹杀的。赫鲁晓夫提出听取报告的建议是正确的，报告是要听取的。”但他又说：“我赞成莫洛托夫的意见，要冷静行事。报告最好从政治角度去起草，以不使30年代的历史含糊不清。”伏罗希洛夫认为，“应该作更充分的准备”，“任何闪失都将招致不好的后果”。他们三人虽同意在代表大会上说明情况，但是要求全面评价斯大林。而其他人则持不同的态度。布尔加宁认为，赫鲁晓夫的意见正确。“党员们已经看到，我们对斯大林的态度起了变化。如果不向代表大会说明的话，人们将会说我们胆怯。应该把斯大林的作用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二个阶段斯大林不再是马克思主义者了。在个人崇拜的基础上，说明斯大林与党的关系。”米高扬说：“我们不能不向代表大会说明。在1934年以前，表现很英勇，而在1934年以后，暴露了许多可怕的东西。篡夺了政权，把一切权力掌握在一个人手中。”别尔乌辛说：“在报告里，不需要谈正面的东西。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有害。篡夺了政权，取缔了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枪毙干部使我们在重工业方面已经丧失了速度。”马林科夫同意向代表大会说明情况，但他显然从另一个角度出发，“我们将体验到一种欣慰——我们替

---

<sup>①</sup> 波斯佩洛夫委员会的报告名称是《苏共中央关于30年代大规模镇压行动的原因的报告》，见 АПРФ, Ф. 3, ОП. 24, Д. 489, Доклад ЛЛ. 23—91. 正本。汉译见李丹慧主编的《国际冷战史研究》第1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4—215页。

同志们辩护了。不说明斯大林的作用，就不能为同志辩护”。阿里斯托夫表示不赞成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谈话里出现的“不应该说”。他说：“那是恐怖的年代，欺骗人民的年代。人们想把他造成神，最后造出的却是一个魔鬼。所有人热衷的是讨好斯大林。党没有丧失威信，威信已经丧失殆尽。”<sup>①</sup>

赫鲁晓夫最后作结论说：“关于应该向代表大会进行说明这一点已经没有了分歧。存在细微的差别，需要考虑。我们大家都同斯大林一起工作过，然而这不应该束缚我们。不应该无所作为，也不应该犹豫不决。应该彻底地揭露所谓的个人作用。在代表大会上应该作报告。”“在代表大会上作一报告，吸收所有中央书记参加。由谁来作报告，考虑一下。也许还可以在原中央委员会的全体会议上说一下，我们准备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后来作出两项决定：一、2月13日下午3点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大厅召开中央全会，讨论与召开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有关的问题。二、向苏共中央主席团全体委员、苏共中央主席团全体候补委员和苏共中央全体书记分发未发表的列宁《致代表大会的信》以及《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的文件，并向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介绍这些文件。<sup>②</sup>

由赫鲁晓夫在代表大会的秘密会议上作“关于个人崇拜”报告的决定是在2月13日主席团会上作出的。这已是代表大会开幕的前一天，会上讨论了大会的一系列组织问题。在会议记录中“关于个人崇拜”报告人问题的议题下，列了米高扬、苏斯洛夫、别尔乌辛、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基里琴科、莫洛托夫、波诺马连科、苏斯洛夫和波斯佩洛夫的名字，没有发言内容，接着就是“通过由赫鲁晓夫作报告”。<sup>③</sup>在这次主席团会议通过的《关于召开苏共中央全会》的决议中指出：“责成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同志召开苏共中央全会；把中央主席团认为必须在代表大会的秘密会议上作关于个人崇拜的报告的要求提交中央全会；批准赫鲁晓夫同志为报告人。”<sup>④</sup>关于报告人的确定，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说：“应当由谁来作报告？我建议由波斯佩洛夫来作。理由是他研究过这个问题，他是委员会主任，我们大家正用着的报告就是

①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 Т. 1. С. 99—103.

②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 Т. 1. С. 99—103.

③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 Т. 1. С. 105.

④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 Т. 2. С. 198—199.

他起草的。因此他无须准备：他可以把这份报告改成大会报告，在大会上一念就行了。其他人纷纷表示反对，建议报告由我来作。我感到难为情：我在总结报告中对此只字未提，接着再作第二个报告？我推辞了。然而他们反驳我说：“要是现在不由你来作，让也是中央书记之一的波斯佩洛夫同志来作，那问题就来了：为什么这个赫鲁晓夫在报告中只字未提，波斯佩洛夫却在发言中谈到这么重要的问题。赫鲁晓夫不会不知道或者说不会不正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就是说，也许领导层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分歧？波斯佩洛夫讲的是他个人的意见？”这个论据占了上风，于是我就同意了。决定由我来就此作报告。”<sup>①</sup> 赫鲁晓夫所说的也许是这次会上的讨论情况，但无记录可查。不过，还有一种说法：上次主席团会议已决定中央全会（十九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会）2月13日下午3点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厅召开，在主席团讨论这个问题时，中央委员们已经集合在会议厅里等候，所以没有怎么讨论就作出了决定。<sup>②</sup>

在作出由赫鲁晓夫在代表大会的秘密会上作《关于个人崇拜》报告的决定后，在接着召开的中央全会上赫鲁晓夫报告了这一决定。他告诉与会者：“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不止一次地对斯大林死后的形势交换了意见，对一些材料进行了认真的研究，感到并认为有必要在非公开会议上作中央委员会关于个人崇拜的报告，并提交代表大会讨论。主席团决定由我——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作这个报告。”他还问与会者：“有没有反对意见？”与会者高喊：“没有！”<sup>③</sup> 但是，直到这时还没有报告的文本。由波斯佩洛夫和阿里斯托夫起草的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稿直到2月18日才写完。这个报告稿以波斯佩洛夫委员会报告为基础，增加了以马克思主义观点谴责个人崇拜、用列宁的“政治遗嘱”批评斯大林的内容。报告稿指出：“约·维·斯大林的怀疑心到了病态地步”，“导致出现大灾难，导致在1937—1938年对许多无辜的人进行大规模镇压，导致贝利亚—阿巴库莫夫犯罪团伙制造‘列宁格勒案’，导致产生屈辱的‘医生谋杀

---

①（俄）尼基塔·谢·赫鲁晓夫著，述弢等译：《赫鲁晓夫回忆录》第2卷，第1152页。

②（俄）尤·阿克秀金：《赫鲁晓夫的“解冻”与1953—1964年苏联社会情绪》，第163页。

③（俄）鲁·格·皮霍亚著，徐锦栋等译：《苏联政权史（1945—1991）》，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150页。

案’。”这份报告稿详细讲述了联共（布）十七大代表的命运，列举了30年代对一系列党和国务活动家进行镇压的给人以深刻印象的事实。但是报告稿小心翼翼地回避斯大林周围的一些人所应该承担的个人责任，把所有罪责推到斯大林和“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工作人员摆脱了党的监督”。此外，报告稿没有涉及1940年的镇压，没有对40年代到50年代发生的事件提出看法和评论。<sup>①</sup>

赫鲁晓夫看了这个报告稿感到不满意，2月19日把一名女速记员叫到他那里去，亲自口授了他自己的报告稿方案。赫鲁晓夫强调了一些方面，改变了按先后顺序叙述的方式和构思框架。他首先回答了一个必然会提出的问题：为什么党的领导人对斯大林的专横听之任之？赫鲁晓夫说：“斯大林一点也听不进别人的意见，他不是通过说服和做细致的工作……而是采用压服、强加于人和要求别人采纳他的意见的方式，如果谁表示反对或者试图证明自己是正确的，谁就可能被清除出领导集体，并随后被立即消灭。”赫鲁晓夫援引了波斯佩洛夫起草的报告稿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话指出：“我党进行的与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右派分子的残酷而有益的斗争是必要的和可以理解的，斯大林在这场斗争中起到值得肯定的作用。”但是，赫鲁晓夫对党内斗争方法的合理性表示怀疑，他回忆说，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对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提出过尖锐批评，但是十月革命后仍然让他们当了政治领导人。赫鲁晓夫说：“以托洛茨基分子为例……要知道，在托洛茨基周围也有不是资产阶级和地主出身的人……他们中许多人积极参加过革命和巩固革命成果，为什么非要把他们消灭？我相信，如果列宁还活着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赫鲁晓夫补充了战后的列宁格勒案、医生谋杀案、米格列尔案，同样把这些案件的责任推到斯大林身上。他说：“医生谋杀案，这可能吗？这不是医生谋杀案，而是斯大林制造的案件，因为根本就没有医生谋杀案……”赫鲁晓夫认为，评价斯大林在战争和战后事件中的作用同样十分重要。他给战争年代的斯大林画了一幅丑恶的肖像画。他认为，战争初期，斯大林看来毫无领导军队和国家的能力，整整一年没有签署命令。赫鲁晓夫问道：“这一段时间总司令在何处呢？他胆怯了，害怕了。我们国家当时的处境多么艰难，这是斯大林领导无力的结果。”赫鲁晓夫强调说：“老实说，我和其他同志从战争一开始到战争结束都是负责任的，我们承担了战争的重负，我们当然知道斯

<sup>①</sup>（俄）鲁·格·皮霍亚著，徐锦栋等译：《苏联政权史（1945—1991）》，第151页。

大林在战争中起了什么作用。这不是斯大林的作用，而是我们党发挥了作用，是党培养的人发挥了作用……”他把战争毫无准备的责任、把基辅附近、1942年在哈尔科夫附近被包围的责任推到了斯大林身上。说到哈尔科夫战役，赫鲁晓夫回忆说：“我把电话打到斯大林的别墅，但是接电话的不是斯大林，而是马林科夫。我对马林科夫说，我想向斯大林本人报告，斯大林让马林科夫告诉我，让我对马林科夫讲。我再次请求说，我想给斯大林报告严重局势……斯大林居然不移大驾接电话……还是让我同马林科夫讲。”赫鲁晓夫在口授中列举一些事实时常常即兴发挥，流露出对不久前的过去惶恐不安，对斯大林诚惶诚恐，对斯大林生命最后几年苏联领导人相互角逐的局面心有余悸。赫鲁晓夫往往一个问题还没有说完又说起另一个问题，常常不按先后顺序讲述。但是赫鲁晓夫有自己的逻辑，那就是尽量把往昔所有不好的东西的责任推到斯大林和贝利亚身上，从而恢复共产党的威信，恢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誉。<sup>①</sup>

据谢皮洛夫的回忆，在作上述口授的前四天，赫鲁晓夫曾要求谢皮洛夫起草一份报告稿。在赫鲁晓夫2月25日的报告时，谢皮洛夫发现自己所写的句子不时出现，但整个稿子是经过别人重新写过的。这就是说，在赫鲁晓夫作报告以前已经有了波斯佩洛夫和阿里斯托夫起草的报告稿和赫鲁晓夫的口授稿，加上谢皮洛夫起草的稿子，赫鲁晓夫还拿到米高扬、萨布罗夫等就外交关系以及战时对非俄罗斯民族的压制提出的文字稿，<sup>②</sup> 这些就成为赫鲁晓夫的报告稿的基础。至于这几份稿子是怎样变成赫鲁晓夫正式报告稿的，目前还没有找到直接的证明。

按照党章规定，党代表大会的开会期间，上届中央委员会及其主席团和书记处就失去全权，这个时间发生的所有问题应当或者由大会，或者大会主席团解决。但是，赫鲁晓夫不顾这一规则，2月22日又召开了一次中央主席团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讨论了召开来莫斯科参加苏共二十大的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问题，同时审查了宣读“秘密报告”的一些问题，决定在选举之后的秘密会议上宣读报告。可能赫鲁晓夫当时作了一个让步，保证不翻腾1936—1938年公开审判的案

---

<sup>①</sup> 关于赫鲁晓夫口授报告稿的介绍参考了（俄）鲁·格·皮霍亚著，徐锦栋等译：《苏联政权史（1945—1991）》，第151—153页。

<sup>②</sup> 据（美）威廉·陶伯曼《赫鲁晓夫全传》提供的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92页。

件。莫洛托夫在1957年的中央全会上回忆说，在二十大，我们中央主席团委员们决定不就这个问题讲话。<sup>①</sup>

所以，在代表大会上作《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报告的决定是代表大会开幕以前就作出了。秘密报告的稿子是在代表大会开会期间起草的。那么，赫鲁晓夫为什么要说决定是在代表大会举行期间作出的呢？从上面提到的赫鲁晓夫同意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会谈记录中可以看到，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对事先没有通知他们，突然揭露个人崇拜，在自己工作中“引起休克”，给党“带来了严重困难”，有意见。对苏共领导这种做法的不满、有意见，不只是意大利共产党，许多国家的共产党都有强烈的反映。赫鲁晓夫这种说法显然是为对付兄弟党而作出的一种辩解。“秘密报告”对于没有参加苏共二十大的人，特别是其他国家共产党来说，是很突然的；但说这是“突然袭击”，则是不准确的。

### 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内容

2月25日上午，苏共二十大召开了最后一次大会。代表们只能凭特别请柬与会，除了大会代表，一些老布尔什维克和党中央的机关干部也应邀参加。会议一开始，布尔加宁就宣布由赫鲁晓夫作《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从形式上看，这项内容似乎是追加的，实际上是经过了精心的安排。用俄国史学家皮霍亚的话说，就“非斯大林化”的宗旨而言，秘密报告则是“最高潮”。

关于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消息，早在1956年的2月底到3月初，就在一些国家开始传播，6月4日，美国《纽约时报》甚至公布了全文。我国是在1988年出版的《赫鲁晓夫回忆录》中首次公布《秘密报告》全文的，是从英文转译的。但国内绝大多数人对报告的概念仍来自五六十年代对赫鲁晓夫的批判文件，因而至今对这个报告存在着种种不完全合乎实情的看法，在一些学术著作中仍重复“九评”的观点，甚至继续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追寻苏联垮台的原因。笔者一开始就指出，要评价历史首先要弄清事实，赫鲁晓夫在其《秘密报告》中到底讲了些什么？是捏造了大量谎言，还是有一定事实依据？在这一节笔者将根据《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第3期刊登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

<sup>①</sup> 《苏联共产党最后一个“反党”集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83页。

原件，对其内容作尽量如实而全面的介绍。

赫鲁晓夫在报告一开始就明确指出：“斯大林去世后，党的中央委员会严格地、一贯地执行这样的方针：绝不容许那种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格格不入的对个人的吹捧，绝不容许把他变成像神灵一样的具有超自然品质的某种超人，这个人俨然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无所不能，替所有人思考，他的一举一动永远正确。”<sup>①</sup> 报告点明，许多年来，关于斯大林就灌输这种概念。接着，赫鲁晓夫声明：“这篇报告的任务，并不是要对斯大林的生平与活动作出全面的评价。有关斯大林的功绩，早在他生前即有人撰写了相当数量的书籍、小册子和著作。斯大林在准备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国内战争、争取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已经尽人皆知。人人都清楚，现在要说的是对于党的今天和明天都有着巨大意义的问题，即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怎样逐步形成的，这种个人崇拜在一定阶段成了对于党的原则、党内民主、革命法制的许多极其严重的巨大的歪曲的根源。”“鉴于并非人人都清楚个人崇拜在实际生活中曾引起了怎样的后果……已造成多么巨大的损失，党的中央委员会认为必须向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汇报有关这个问题的材料。”在阐明了报告的宗旨和任务后，报告人引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两段语录以及列宁关于人民群众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作用、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党内生活准则的论述，说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是严厉谴责个人崇拜的表现的”。报告特别引出列宁1922年12月给下次党代表大会的信中评论斯大林的两段话，以及克鲁普斯卡娅因斯大林对她粗暴无礼给加米涅夫的信和列宁就此事给斯大林最后通牒式的信，说明列宁生前就对作为党的总书记的斯大林的“粗暴”、“任性”、“不容人”等缺点十分“担心”，并建议把他调离这个岗位。赫鲁晓夫说：“斯大林身上的缺点在列宁生前尚处于萌芽状态，近年来即发展成为斯大林严重的滥用权力行为，这给我们党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这些说

---

<sup>①</sup> 苏联官方当时没有公布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在世界上广泛传播的是当年6月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表的本子。直到1989年《苏共中央通报》第3期才根据苏共档案中的稿子予以公布。据公布者说，当时没有速记记录，所公布的是根据赫鲁晓夫1956年3月1日提供给主席团的修订本。这里所用的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赫鲁晓夫回忆录（选译本）》附录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尼·谢·赫鲁晓夫同志向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报告（1956年2月25日）》。文中引文较多，不一一注明具体页码。

明，赫鲁晓夫的报告并不是全面评价斯大林的功过，而是集中论述对斯大林个人崇拜及其造成的严重后果，而且对斯大林的批判是根据马克思和列宁的言论，是以他给党的事业造成的严重损失为依据的。

赫鲁晓夫指出，列宁历来强调党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领导作用和意义，指出布尔什维克作为执政党的重大责任，号召严格遵守党内的一切生活准则，实行集体领导。他说，革命后，在十分严峻和困难的条件下列宁一直接时召开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党的中央委员会，一切重大问题都在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上讨论解决，从不搞独断专行。在列宁刚去世的那几年，斯大林还按时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后来就愈来愈滥用权力，这些原则就受到粗暴的违反。从十八大到十九大 13 年不召开党代会，“中央全会几乎没有开过”。“对党、对党的中央委员会的专横态度，在 1934 年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以后更是暴露无遗”。赫鲁晓夫还强调，列宁在对人的处理、进行干部工作中的“英明”，对人进行耐心细致的工作，善于通过整个集体从坚持思想原则立场出发对人施加影响，而不是通过强制的办法率领人们前进，即使对犯了错误人也主张宽容和耐心。他说：“斯大林则同列宁这些特点格格不入”，“抛弃了列宁的说服教育方法，从思想斗争的立场转而走向行政压制的道路、大规模镇压的道路、恐怖的道路”。对于斯大林的功绩，除了在说明主题时做的明确表述外，他还特别肯定了斯大林在 20 年代反对托洛茨基分子、右派、资产阶民族主义者斗争中的“积极的作用”。他说：这是“党同自己队伍中那些反对列宁主义的原理的人、同敌视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政治路线进行的重大政治斗争。这是一场顽强、艰苦、却必不可少的斗争，因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和布哈林分子的政治路线实质上是要导致资本主义复辟，导致向国际资产阶级投降”。他说，如果没有这场斗争，“我们不会有强大的重工业，不会有集体农庄，我们就会在资本主义的包围面前解除武装，束手无策”。这就清楚地表明，赫鲁晓夫既不否定苏联共产党领导下的苏联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也不否定斯大林在二十年代进行的党内斗争和斯大林的“资本主义包围下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也不否定斯大林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道路和路线。

在《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中，赫鲁晓夫确实揭露了斯大林时期大量鲜为人知的、使人触目惊心的错误事实，甚至可以称为“罪行”。报告的第二部分主要揭露 1934 年以后斯大林对党的干部的镇压情况，说明“个人崇拜给党

的利益造成多么大的损失”。不过，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镇压情况的揭露做了严格限制：时间限于1934年以后，范围只涉及对党内的干部的迫害和镇压。他指责说，当时“社会主义已在我国基本胜利，剥削阶级已经基本消灭，苏联社会的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敌对的党派、政治派别和团体的社会基础大大削弱，党在思想上的敌人已从政治上被彻底粉碎”，斯大林却提出一个“人民敌人”的概念，对那些没有犯下反党反苏罪行的人进行镇压，使“许多忠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党的杰出活动家和普通工作人员成了斯大林专横的受害者”。赫鲁晓夫批评了斯大林对广大党政干部的镇压。报告说：“中央委员会掌握了许多足以证明斯大林对党的干部粗暴的恣意妄为的事实，成立中央主席团下设的党的专案组”，“查阅了内务人民委员部档案中的大量材料和文件，确认了许许多多对共产党员制造假案、提供伪证、触目惊心的破坏社会主义法制、因而导致无辜者死于非命的事实。现已查明，1937—1938年间被宣布为敌人的许多党的、苏维埃的和经济部门的工作者，实际上从来就不是敌人、间谍、破坏分子等等，他们其实始终是正直的共产党员，然而却横遭诬陷，有的因经不住野蛮拷打，自己给自己加上无奇不有的严重的不可思议的罪名。”报告引用了波斯佩洛夫委员会报告中关于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超过一半的代表和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70%被镇压的数字后说：“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是以胜利者的大会载入史册的”，完全不可思议“会选举产生一个大多数为敌人的中央委员会”。“当选大会代表的都是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积极的建设者，其中许多人曾在革命前的地下活动中和内战前线为党的事业进行忘我的斗争，他们勇敢地同敌人搏斗，不止一次地视死如归，面不改色。怎么能够相信这样一些人竟然在季诺维也夫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和右派分子已经被粉碎、社会主义也已取得伟大胜利的时期，充当起两面派，投入社会主义敌人阵营呢？”报告说：“这是斯大林滥用权力的结果，他开始对党的干部搞大规模的恐怖。”赫鲁晓夫解释，为什么在党的十七大之后，针对积极分子的大规模镇压变本加厉了呢？“因为斯大林当时已经凌驾于党和人民之上，他已经根本不把中央委员会和党放在眼里了。”斯大林认为自己可以决定一切，其他人只能起统计员的作用。赫鲁晓夫重述了波斯佩洛夫报告中指出的发动大规模镇压三个文件，证明大规模镇压应由斯大林负责。

赫鲁晓夫特别提出对谋杀基洛夫的案件的怀疑。他说：“应当说，同基洛夫同志遇刺有关的情况中，至今仍有许多令人费解和莫名其妙的地方，需要进行最

仔细的调查。有理由认为，杀害基洛夫的凶手尼古拉耶夫曾经受到负责保护基洛夫安全的人员中什么人的帮助。在刺杀的一个半月以前，尼古拉耶夫曾因为可疑而被捕，但是放掉了，甚至没有对他进行搜查。最令人生疑的是，1934年12月2日基洛夫的贴身警卫被带去审问时，却因‘车祸’死亡，而陪同人员无一人受伤。基洛夫遇刺后，列宁格勒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领导人均被撤职和受到很轻的处罚，却在1937年被处决了。不妨认为，处决他们是为了销毁策划刺杀基洛夫的罪证。”赫鲁晓夫还举出了原政治局候补委员埃赫在遭诬陷和残酷折磨中给斯大林的申诉信、原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鲁祖塔克在军事法庭上的无罪申述，以及罗森布吕姆在法庭上揭露内务部审判官员用严刑拷打迫使他炮制列宁格勒暗害总部等案件的过程，指责斯大林不仅不同他们谈话，也不改变这些案子。报告揭露，当时形成了一种恶劣的做法，由内务人民委员部拟定其案件由军事法庭审理的人员名单，事先就定好了这些人判刑轻重。报告说，1937—1938年斯大林收到383份名单，涉及成千上万人，全都得到他的批准。赫鲁晓夫说，大规模镇压对党的政治与道德状况产生了消极影响，助长了病态的疑神疑鬼心理蔓延，许多滥用权力行为都是根据斯大林的指示，根本不顾及什么党纪和苏维埃法律的准则。使用肉刑，通过拷打，让犯人失去知觉，丧失理智，丧失尊严，提供假供词

报告的第三部分揭露“斯大林的独断专行导致了卫国战争过程中特别严重的后果”。赫鲁晓夫批评许多小说和学术著作把斯大林描写为“料事如神”，说“苏军几乎是按照斯大林事先拟定的战略计划使用了所谓的‘积极防御’策略”，“把德军放进来直到莫斯科和斯大林格勒城下”，“才转入进攻并打败敌人”，从而把苏联军队和人民取得的这一“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全都归功于斯大林的统帅天才”。报告批驳了苏联在战争初期的悲惨遭遇是所谓德国对苏联袭击的“突然性”结果的论点，指出斯大林不相信、不理睬战争爆发前丘吉尔、苏联外交官和军方提出的有关德国准备进攻苏联的许多警告，“并未采取足够的措施来使全国做好防御准备并排除突然袭击的因素”。他说，战争初期就暴露出军队装备很差，缺少反击敌军所需要的足够数量的火炮、坦克和飞机。敌人入侵苏联领土时，无论换下来的旧武器还是打算采用的新武器都不够，高射炮的情况很糟，没有安排打坦克的穿甲弹的生产。许多筑垒区旧武器换下来了，新武器还没有装上，连应召服役的军人使用的步枪都不够。赫鲁晓夫说：“说到这里，不能不提下面这件事。希特勒军队入侵苏联之前不久，当时任基辅特别军区司令员基

尔波诺斯写信给斯大林说，德军已向布格河畔开进，正加紧进攻准备。他建议在边境构筑牢固防御阵地，迁出 30 万居民，建立几个强大的筑垒带，挖反坦克壕沟、修战士的掩体等等。莫斯科回答说：“这是挑衅，不必给德国人提供向我们开始军事行动的口实。”赫鲁晓夫说，甚至法西斯军队已经开始进攻以后，莫斯科还下令不要还击。“这种粗心大意，这种对显而易见的事实的置若罔闻”，导致“战争爆发的头几个小时和头几天，敌军在我国边境地区摧毁了大量飞机、火炮和其他军事装备，消灭了大量我军干部，打乱了军队的指挥系统，使我们无法阻止敌军进入我国腹地”。报告还批评斯大林 1937—1941 年根据诬陷材料，除掉了为数众多的军队指挥干部和政工人员，致使战争初期缺少合格的指挥官。赫鲁晓夫说：“我国在战争初期面临可怕的危险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斯大林对国家和党的错误领导方法造成的。”不然，“我们在这场艰苦的战争中的伤亡就会少得多”。报告还批评“斯大林在干预军事作战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神经过敏和歇斯底里，也使我军损失惨重”。赫鲁晓夫重述了口授报告稿中 1942 年红军在哈尔科夫地区遭受失败损失几十万军队的情况，说“这是斯大林坚持错误作战计划造成的”。赫鲁晓夫甚至指责斯大林“按地球仪指挥战争”。报告还批评说，从 1941 年底开始，斯大林就不再采取从敌人两翼迂回到敌人背后的大规模机动作战的战术，而是要求不断地正面进攻，以夺取一个又一个村庄。我们因此伤亡很大。报告还指责，斯大林有意贬低甚至诬蔑朱可夫等著名指挥人员。赫鲁晓夫批评电影《攻克柏林》，说里面只有斯大林一人活动，“斯大林顶了所有的人”。报告下结论说：“保证卫国战争取得胜利的，不是斯大林，而是整个党，苏联政府，是我们英雄的军队，我军天才的统帅和勇敢的士兵，是全体苏联人民。”

报告的第四部分是讲斯大林粗暴践踏列宁民族政策、战后制造列宁格勒等案件和南斯拉夫关系上的错误行为。报告说，当卫国战争在各条战线上都出现有利于苏联的转折时，斯大林却强迫一些民族大规模迁离自己的家园。1943 年末，将全体卡拉恰耶夫人从居住地强制迁出。12 月末，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的全体居民也遭此厄运。1944 年 3 月，全体车臣人和印古什人被强制迁离家园，车臣—印古什共和国不复存在。1944 年 4 月，全体巴尔卡尔人被从卡巴尔达—巴尔卡尔自治共和国强制迁往遥远的地方。赫鲁晓夫说：“乌克兰人免遭这场厄运，是因为他们人数太多，无处可迁。否则斯大林连他们也要强制迁出的。”他说：“怎么能够把个别人或者个别集团的敌对行为的责任推到整个民族身上，连妇女、儿

童、老人、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都不放过，使他们遭受大规模的迫害、困苦和磨难呢？”接着，赫鲁晓夫讲到使沃兹涅先斯基、库兹涅佐夫、罗季昂诺夫、波普科夫等遇害的所谓的“列宁格勒案件”，“现已查明，这是一起假案。”他说，战后“斯大林变得更加任性、更爱发火、更加粗暴了，他的猜疑心变得尤其严重。迫害狂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列宁格勒案件是斯大林对党的干部恣意妄为的结果。”赫鲁晓夫解释说：斯大林极重的猜疑心被贝利亚加以巧妙利用。许多案件由斯大林一人亲自处理，大多数政治局委员都不了解全部情况。赫鲁晓夫还讲了米格列尔民族主义案件。他说：“格鲁吉亚不曾有过任何民族主义组织，数以千计清白无辜的苏联人成了牺牲品。”赫鲁晓夫又转到“医生谋杀案”上，“其实什么案件也谈不上”，斯大林仅凭季马舒克的一封信，“就得出苏联有从事暗害活动的医生的结论，下令逮捕医学界一批著名的专家”。他说：斯大林亲自指示怎样进行审查，怎样审问犯人，给犯人戴上镣铐，进行拷打。他还揭露，斯大林给原国家安全部部长伊格纳季耶夫说：“你如果弄不到医生的口供，就要你脑袋。”赫鲁晓夫认为，在策划五花八门的肮脏可耻的案件中，贝利亚起了卑劣的作用。他说，早在1937年，原卫生部部长卡明斯基就揭露贝利亚曾替木沙瓦特间谍机构卖过命。因为斯大林相信贝利亚，卡明斯基因而丧命。赫鲁晓夫又举出斯涅戈夫给党中央关于贝利亚迫害外高加索党委书记卡尔特韦利什维利的信，说在1931年斯大林要让贝利亚担任外高加索第二书记，卡尔特韦利什维利不同意，后者因此而受到迫害。他还说米高扬和卡冈诺维奇可以证明。他还讲了贝利亚迫害凯德罗夫的过程，并说军事法庭根据凯德罗夫的申诉已宣告其无罪，贝利亚还是枪决了他。赫鲁晓夫还揭露，贝利亚曾迫害奥尔忠尼启则兄弟。赫鲁晓夫说，斯大林的恣意妄为不仅表现在对国家内部发生的问题解决上面，而且在苏联的国际关系领域也有所表现。在“南斯拉夫事件”中，“斯大林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赫鲁晓夫说：“有一次，我从基辅到莫斯科”，“斯大林就南斯拉夫问题对我说：‘我只要动一动小指头，铁托就会完蛋，他就会消失……’”

报告的第五部分揭示说：“个人崇拜能够有如此骇人听闻的规模，主要是斯大林千方百计地鼓励和支持对他的个人颂扬。”赫鲁晓夫举出了斯大林亲手写进《斯大林传略》一书中的7段自我吹嘘的文字。比如：对列宁之后自己的活动自我评价说：“在这场同不坚定分子和投降主义者、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同布哈林一伙和加米涅夫一伙进行的斗争中最终形成了列宁去世后我党的领

导核心……它捍卫了列宁的伟大旗帜，使党团结在列宁遗训的周围并带领苏联人民走上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康庄大道。这个核心的领导者以及党和国家的领导力量就是斯大林。”在这本书的样本中原有这样一句话：“斯大林是今日的列宁”，斯大林觉得这句话不够有力，便亲自改成：“斯大林是列宁事业当之无愧的继承人，或者照我们党内的说法，斯大林是今天的列宁。”斯大林在书中特别加上论述自己军事天才的文字：“斯大林进一步发展了苏联的先进军事科学，斯大林同志阐明了关于决定战争命运的经常起作用的因素，关于积极防御和反攻与进攻的规律、关于现代条件下各兵种和武器协同作战、关于坦克集群和空军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关于作为最强有力的兵种的炮兵等原理。在战争的各个阶段斯大林的天才都能找到完全估计到形势特点的正确决定。”“无论在防御还在进攻中都表现出斯大林的作战艺术。斯大林同志以天才的洞察力识破了敌人的计划，并予以反击。在斯大林同志指挥苏军的战役中，无不体现了军事作战艺术的光辉典范。”报告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党中央的一个特设委员会编写的，《斯大林传略》的原稿中写道：“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在斯大林同志的领导下，在他亲自直接参与下编写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斯大林觉得不满意，在出版时就改成：“1938年出版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该书由斯大林同志执笔并得到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的赞同。”赫鲁晓夫说，这本书把党的一切活动与斯大林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赫鲁晓夫问道：“难道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可以这样来写自己，可以把对自己个人崇拜搞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吗？”赫鲁晓夫批评斯大林对列宁不尊重，把一切都说成是斯大林起了主要作用。赫鲁晓夫还批评，斯大林亲自批准以自己的名字为大企业和城市命名，特别指出，斯大林于1951年7月2日亲自签署了苏联部长会议关于在伏尔加—顿河上建造斯大林纪念塑像的决定。

报告的第六部分指责：“个人崇拜助长了党的建设和经济工作中错误方法的泛滥，导致了对党内民主和苏维埃民主的粗暴践踏，导致了单纯行政命令、各种畸形现象、对缺点的掩盖和对现实的粉饰。我国出现了大量的阿谀奉承者、好吹捧者和骗子手。”赫鲁晓夫说，斯大林几十年如一日，几乎从不外出，只有1928年1月去了西伯利亚了解粮食收购的情况。凡是稍微关心国内情况的人都看到了农业的严峻形势，斯大林却毫无觉察。“他仅仅从电影上去研究国内和农业情况。”他特别指责，斯大林1953年建议向集体农庄庄员加征400亿卢布税款。赫

鲁晓夫说：1952年集体农庄和农庄庄员向国家交售的全部产品才得到262.8亿卢布。

赫鲁晓夫在报告的第七部分说：“我们所取得的历史性胜利，要归功于党及其为数众多的地方组织的组织工作，归功于我国伟大人民的忘我劳动。”“绝非如个人崇拜盛行时期所试图描绘的那样是斯大林个人领导的结果。”他说：“斯大林晚年所形成的领导实践已成为苏联发展道路上的一个严重障碍。”接下来他把话题转到：“有些同志可能提出这样的问题：中央政治局委员当初都干什么去了，为什么他们没有及时站出来反对个人崇拜，直到最近才这样做？”赫鲁晓夫解释说：“首先应该考虑到，政治局委员对这个问题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看法，最初他们许多人积极支持斯大林，因为斯大林是最坚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之一……可是后来，斯大林愈来愈滥用权力，开始迫害著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用恐怖手段来对付正直的苏联人。”那时“试图站出来反对毫无根据的怀疑和指控的做法，只会使反对者惨遭迫害”。为了说明当时的政治气氛，赫鲁晓夫举出布尔加宁一次在汽车里对他说的话：“有时候去见斯大林，他把你当成朋友叫去，你在斯大林那里坐着，却不知道过后会把你送到哪里去：是回家呢还是进监狱。”赫鲁晓夫辩解说：“这种气氛使任何一名政治局委员都陷于极其困难的境地。”他又说，斯大林晚年用各种小组代替政治局，许多事情不经政治局讨论。斯大林荒唐的怀疑伏罗希洛夫是英国奸细，多年来事实上被剥夺了参加政治局工作的权利。安·安德烈耶夫也排除在政治局之外。斯大林有一套整治老政治局委员的计划。十九大以后成立了有25名委员的主席团，目的就是要搞掉老政治局委员。在十九大以后的第一次中央委员会上，斯大林在讲话中就给莫洛托夫、米高扬作了鉴定，加上莫须有的罪名。“不排除这种可能：假如斯大林在领导岗位上多待几个月，那么本次代表大会就不会有莫洛托夫和米高扬的发言了。”

在报告的第八部分提出了克服个人崇拜的几项措施：第一，从思想理论上根除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格格不入的个人崇拜。第二，坚持列宁主义的集体领导原则，遵守党的生活准则，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第三，恢复苏联宪法中体现的苏联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赫鲁晓夫在报告的最后告诉与会者：“我们应当十分严肃地对待个人崇拜问题。这个问题我们不能泄露到党外，更不能上报纸。”

赫鲁晓夫滔滔不绝地讲了将近5个小时。关于作报告的具体情况，有关回忆录的作者说法不一，有人说，他是照本宣读的，有人则说，他登上讲台后便抛开

讲稿“自由发挥”，还有人肯定说，赫鲁晓夫在报告中直接点名指责了伏罗希洛夫等。据俄罗斯国家档案馆的说法，这次报告没有录音也没有速记记录，因此无法辨析这些相互矛盾的说法。在俄罗斯国家档案馆保存的是报告后第4天即3月1日赫鲁晓夫向主席团提供的文本。这个文本在文字上作了润色和加工修改：注明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和其他著作语录的出处以及某些文件通过的日期，加入了报告人离开报告稿的插话，并指出代表们对报告某些论点的反应。1989年《苏共中央通报》公布的就是这个文本。

赫鲁晓夫讲完以后，主持会议的布尔加宁建议不要对报告进行讨论，也不要提问题。接着，根据布尔加宁的提议通过了如下决议：“听取了尼·谢·赫鲁晓夫同志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赞成中央委员会报告的论点，并委托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继续采取措施，确保完全克服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格格不入的个人崇拜，消除其在党务、国务和思想工作的一切领域里所造成的后果，严格执行党的生活准则和由伟大列宁制定的党的集体领导的原则。”最后，布尔加宁强调：“目前还不能公布尼·谢·赫鲁晓夫同志的报告以及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但是，这些材料将寄发给各级党组织。”<sup>①</sup>

### 应当怎样看待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

赫鲁晓夫曾是斯大林的亲信，是斯大林领导圈子里的人，对于斯大林执政时期的真实情况比较了解，深知问题的严重性，如果对斯大林执政时期的问题不向大会代表作出说明和交代，作为后继者就得不到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信任，就站不住脚。只有以斯大林为戒，避免重蹈覆辙，才能提高自己的威信，维护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在中国封建王朝的历史上，一般都是后一个朝代编修前一个朝代的历史，这样做的目的在于汲取前朝衰落的经验和教训，表明新王朝代替旧王朝的理由，从而树立新王朝的权威。在实行领袖政治的苏联，却存在着另一种情况：列宁和斯大林去世后，新的领袖都是在激烈的争夺和斗争中产生。列宁领导党和国家的时间比较短，苏联的社会主义处于开创阶段，他去世后，斯大林、托

---

<sup>①</sup> РГАНИ, Ф. 1, ОП. 2. Д. 17, ЛЛ. 89—90. 汉译见李丹慧主编的《国际冷战史研究》第1辑，第227页。

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竞相发表演说和论著来阐释列宁的理论和策略，以表示自己对列宁事业的忠贞。最后，斯大林以他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与路线战胜了其他领导人，确立了自己的领袖地位。斯大林领导党和国家达30年，国家的建设事业和国防力量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积累了大量的严重问题。斯大林之后，他的继承者则竞相批判斯大林，清理斯大林时期的各种案件，以表示他们与斯大林之不同。赫鲁晓夫采取了后发制人的策略，先搞掉着手清理斯大林政治案件的贝利亚，接着又解除了最先提出反对个人崇拜的马林科夫的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然后才把反对个人崇拜的口号同斯大林时期的大镇压等问题统一在一个题目下，作了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虽然上面说到的这两种情况在性质和表现方法上不一样，但目的却有相似之处。赫鲁晓夫采取这一惊世骇俗的行动首先是出于维护苏联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确立和巩固自己的领袖地位的需要。

要对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内容作出客观公允的评论，就要对报告中揭露的事实和材料进行仔细的分析和核实。从上面的引述可以看出，赫鲁晓夫报告所揭露的事实和材料大体上来自几个方面：波斯佩洛夫委员会的报告及其他有关人员的报告；一些知情者提供的事实和材料；赫鲁晓夫及其亲近者的亲身感受。报告中确实有未能核实的事实，如关于对基洛夫谋杀案的怀疑与推测；也有明显带着主观情绪的地方，如说斯大林按照地球仪指挥战争、依靠电影指导农业等；也有为自己进行辩解的说辞，如关于哈尔科夫战役失利原因的解释等。不过，经过苏联共产党对有关案件的复查，包括二十大以后继续审理各种案件，戈尔巴乔夫时期对大镇压的复查，以及学者对斯大林时代历史的研究（包括戈尔巴乔夫时期的填补历史空白点），直到苏联解体以后根据档案进行核对，证明赫鲁晓夫的报告揭出的事实大部分有根据，完全没有根据的很少。而且，赫鲁晓夫报告所揭露出的事实只是斯大林时期实际存在的一部分。大镇压是赫鲁晓夫揭露的头一个问题。波斯佩洛夫委员会已报告了1935—1940年以反苏活动的罪名遭到逮捕和处决的总人数、1937—1938两年被逮捕和被处决的人数，赫鲁晓夫报告并没有引用这些数字，只讲了1934年以后对党的干部的镇压，举出十七大代表和十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遭镇压的数字。十七大一半代表和十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70%遭到镇压，这个数字确实惊人，但同1935—1940年镇压总人数比较，则是一个很小的数字。根据戈尔巴乔夫时期对三四十年代至50年代初镇压材料的复查证明，实

际镇压的人数要比波斯佩洛夫委员会报告的数字更大。苏共中央政治局 1988 年 12 月 25 日的《大镇压事件复查委员会的简要报告》说：“现已重新审查了涉及 1586104 人的 1002617 件镇压性质刑事的案件。根据这些案件 1354902 人获得平反，其中包括非执法机关案件的 1182825 人。”“研究国家安全机关文献资料确定，1930—1953 年间根据由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国家全部等机关起诉的刑事案件有 3778234 人受到镇压，其中被判极刑（枪决）的 786098 人。在被镇压的人中间由执法机关判处的 1299828 人（其中枪决 129550 人），非执法机关判处的 2478406 人（其中枪决 656548 人）。”“尚未重新审理的有 1575958 件，涉及 2192130 人，其中非执法机关受理的 738866 件，判处 1097293 人（其中枪决 395125 人）。”报告说：“所有非法院判决的受害者将自动恢复名誉。”<sup>①</sup> 这个报告既说明了斯大林时期镇压的巨大规模，也说明镇压严重的非法性。赫鲁晓夫报告没有涉及大镇压总人数，也没谈到 20 年代末到 30 年代初以工业党、劳动农民党等名义对科技知识分子的镇压，也没谈到农业集体化运动中对广大农民的残酷镇压。据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核实，1929—1933 年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逮捕了被划为富农的 519000 人，追究刑事责任；1930—1931 年间将 356500 农户、总人数 1680000 人从苏联欧洲部分强制迁往北部地区和西伯利亚。<sup>②</sup> 事实表明，对斯大林时期的大恐怖、大镇压绝不能用“肃反扩大化”给以简单化的概括。关于斯大林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种种错误，是按照赫鲁晓夫自己的思路加进去的，是赫鲁晓夫揭露的第二个大问题。而就在这一部分讲到战前斯大林对军队干部的镇压时只是笼统一提，并没有涉及镇压的具体情况。实际上那次镇压对苏联红军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具有摧毁性，30 年代的 5 位元帅 3 人被枪杀，16 名集团军司令、副司令 15 人被枪杀，67 名军长中 60 人被枪杀，199 名师长中 136 人被枪杀，4 名海军高级将领全被枪杀，6 名海军上将全被枪杀，15 名海军中将 9 名被枪杀。全部 17 名集团军政委、副政委及 29 名军级政委中的 25 名牺牲。这一镇压与战争初期的严重失利有直接关系。关于斯大林的错误所造成的后果，赫鲁晓夫也只是说，如果没有那些错误苏

---

① 《苏共中央政治局大镇压事件复查委员会的简要报告》，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0 卷，第 624—635 页。

② 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30 卷，第 626 页。

联在战争中的牺牲会少得多，并没有指明苏联损失了多少人。在赫鲁晓夫时期，已经知道反法西斯战争中苏联共牺牲了 2100 万人（斯大林时期宣布苏联战争中死亡 700 万人），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这个数字增加到 2700 万。相比之下，德国在那次战争中总共死亡 600 万人，胜利者比战败者牺牲的人数要多好几倍。这就涉及关于评价战争胜否的标准问题，从消灭敌人、保护自己的战争基本原则来说，斯大林领导的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付出的代价不是太惨重了么？！关于战争后期强迫迁徙少数民族问题，赫鲁晓夫在报告中只提到 5 个民族，而实际上全体被迫迁徙的有 13 个民族，如果包括部分迁徙的在内，则涉及 23 个民族。所以，斯大林的错误确实是相当严重的，他给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如果不深入研究事实，不顾错误所造成的后果，仅仅以“功大于过”、“成绩是第一位的，缺点和错误是第二位的”、“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等概念进行定量性的评论，难免曲解问题的本质。

赫鲁晓夫的这一行动并不违背共产党提倡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自律原则和不断总结历史经验与教训的要求。斯大林的错误及其对苏联社会主义实践造成的严重影响是客观存在。如果赫鲁晓夫不站出来进行揭露，以后还会有其他人起来揭露。作为历史学家，在几十年后的今天如果把苏联解体的原因还往赫鲁晓夫身上推，就太缺乏历史意识了。应该看到，赫鲁晓夫这一行动包含着很大的潜在的积极的启迪意义。在苏联共产党的历史上，甚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赫鲁晓夫第一次以批判的态度对待苏联共产党的执政史，特别是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及其严重后果予以揭露与批判，这就为总结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与教训、重新认识社会主义，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料。我们知道，在此之前，苏联官方的舆论工具一直给人民灌输这样的观念：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苏联共产党为之奋斗的事业代表着人类历史发展的方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最美好的社会制度。同时还宣传，党的领袖代表和体现着党的意志，是真理的化身。在斯大林时代，斯大林被尊崇为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尤其是通过《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学习和宣传，把斯大林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论说成唯一正确的理论，把斯大林在特殊的条件下为苏联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斯大林提出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说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路。是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战胜一切敌人，取得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一个又一个胜利的。不仅斯大林成了人们心目中的

神，苏联的社会主义也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天堂”。经赫鲁晓夫对苏联实际存在的严重负面现象这么一揭露，不仅破除人们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而且也使人们对苏联，对社会主义制度有了比较实际的认识。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围绕如何评价斯大林的功过、如何看待苏联社会主义体制、社会主义要不要改革、如何改革等重大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这些讨论推动了各社会主义国家进一步探索符合本国情况的道路。这就是赫鲁晓夫报告的启迪意义。

不可否认，赫鲁晓夫的报告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和问题。他把斯大林的错误概括为“滥用权力”、“专横暴虐”、“恣意妄为”、“践踏了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苏维埃法制”，把它归结为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及其严重后果”。赫鲁晓夫并没有认真分析产生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社会和历史根源，仅仅把造成问题的原因简单地归之于斯大林的“粗暴、任性、不容人”的个性和“病态的疑神疑鬼”、“迫害狂”心理以及“自大狂”、“不容异见”、“贪权”、“残暴”等不良品质。而且说：“斯大林极重的猜疑心被卑鄙的奸细、可恶的敌人贝利亚加以巧妙地利用。”人的性格、品德、心理状态对人的行为会产生一定的影响，特别会影响大人物作出的决策和选择。但是，有这些缺点和毛病的斯大林怎么就做了苏联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为什么就接受他并容忍他的执政达30年？这里当然既有社会和历史的原因，也有制度上的原因。在俄国历史上不只产生一个斯大林这样的人物。俄罗斯人崇拜皇权，追求大俄罗斯的强国主义，他们迷信超凡脱俗的个人，缺乏个体的主体意识，缺乏民主的素养。这乃是产生斯大林现象的历史和文化根源。从社会制度上说，列宁在建党初期就放弃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民主原则，确立了布尔什维克式的民主集中制，实际上就是集中主义的原则。党的领袖就是党的意志和权威的体现。苏维埃国家一建立就是共产党一党执政的集权国家。斯大林执掌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以后，党和国家制度进一步集权化，斯大林成为至高无上的主宰。对他的个人崇拜就是在这样基础上形成的。

赫鲁晓夫在口授报告稿和作秘密报告的时候，极力想解释清楚：政治局委员们为什么没有阻止斯大林错误的发生？但是，他解释得很蹩脚、很费力，因为在他的头脑中有一个迈不过去的门槛，那就是既要批判斯大林，又不能触动党和国家的制度，还要为政治局委员、为他自己开脱和辩护。所以只能千方百计地把一

切责任推到斯大林身上，推到贝利亚身上。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事与愿违，欲盖弥彰。有句名言说得好：德国皇帝的不好，要在德国臣民身上找原因。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被崇拜者有责任，崇拜者也有责任。斯大林时代发生的这一切严重错误和罪行，斯大林要负主要责任，但领导集团的每个人都有一份责任。当年他们唯斯大林之命是从，不仅积极拥护，而且竭力颂扬，他们实际上都是斯大林政策的积极推行者。在上面提到的戈尔巴乔夫时期关于大镇压复查报告中就罗列了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贝利亚、伏罗希洛夫、日丹诺夫、马林科夫、米高扬、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安德烈耶夫、柯秀尔、苏斯洛夫等 12 人参与大镇压的具体活动及其罪行。这些人中，不仅有现在对揭露大镇压持反对和怀疑态度的，也有对揭露持积极态度的，也有被斯大林镇压或者被排挤的。作为斯大林当年的亲信，现在有所觉悟站出来对他进行揭露和批评，也应该进行自我批评，如果把一切错误推给斯大林，把一切功劳都记在自己身上，就不是一个真正的负责的政治家。正因为赫鲁晓夫采取这样的不正确态度，他也就不能正确总结经验，批判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后来又重蹈覆辙，犯唯意志论错误，搞对自己的个人崇拜。

赫鲁晓夫在报告的最后还讲了这样一段话：“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上面讲到的一切都是斯大林生前、在他的领导下、经他同意搞起来的，而且他深信这是为捍卫劳动人民的利益、使之免遭敌人的暗算和免遭帝国主义阵营的攻击。他是从捍卫工人阶级利益、劳动人民利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胜利的立场出发看待一切的。不能说这是刚愎自用者的行为。他认为，为了党的利益、劳动人民的利益，为了捍卫革命成果，需要这样，这才是真正的悲剧！”这段话充分表明，赫鲁晓夫对斯大林评论的基本态度，他没有把斯大林一棍子打死，对斯大林的批判留有余地，并且没有触及最根本的要害即苏联的体制问题。所以，说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是不合乎实际的，即使是“否定”的，他也没有否定到点子上，没有看到斯大林犯种种错误而得不到及时纠正的根本原因是苏联的体制。

## 47. 能说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忘恩负义”吗？

左凤荣

经常会读到这样的词句：“1956年苏共二十大，为斯大林唱了十多年赞歌的赫鲁晓夫突然调转枪口，大肆谩骂这位‘自己的生身父亲’。赫鲁晓夫别有用心地诋毁斯大林造成了思想混乱，引发广大群众的信仰危机。”在中国这个重视伦理的社会里，赫鲁晓夫的行为被认为是不讲道德的，是忘恩负义的可耻行为，说明赫鲁晓夫人品有问题。我们在仔细研究了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态度变化的轨迹后发现，事实并非如此，无论是赞颂斯大林，还是反对斯大林，其中虽然不乏政治因素，但赫鲁晓夫总的来说是真诚的，是从感情出发的。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态度的改变也不是一夜之间突然发生的，而是逐渐变化的，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所作的反斯大林的报告也不是他的个人行为。

### 赫鲁晓夫的升迁之路

1894年4月17日，赫鲁晓夫出生在库尔斯克州卡利诺夫卡村。他的祖父尼卡诺尔·谢尔盖耶维奇和父亲谢尔盖·尼卡诺维奇都是农民，他的外祖父曾是农奴，在沙皇的军队里当过25年兵，他的母亲克谢尼娅·伊凡诺夫娜也是农民，赫鲁晓夫的父母给他起名叫尼基塔。依照俄罗斯人的习惯，赫鲁晓夫的全名是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一家的生活是清苦的，他的父亲不得不在冬天农闲时到城里去找工作，赫鲁晓夫也不得不从刚懂事起就参加劳动，主要是给人家放牧牲畜。冬天，

庄稼都收割了，牲畜无须人放牧了，他才有机会跟同村的女教师学习读书认字。幸运的是，赫鲁晓夫的老师莉季娅·米哈伊洛夫娜是个无神论者，也是个革命者，她向赫鲁晓夫灌输了初步的政治意识，使他开阔了眼界。

1908年，在赫鲁晓夫14岁时，他的父亲不得不离开了祖祖辈辈生活的土地，来到乌克兰顿巴斯地区的煤矿当矿工，赫鲁晓夫一家也迁到了这里的尤索夫卡镇（1924年改名为斯大林诺，1961年又改名为顿涅茨克）。赫鲁晓夫一家的生活仍然很艰苦，他的母亲给人家洗衣服，他本人则步行到4公里以外的学校去上学，放学后和休息日则要去洗刷矿井的锅炉，以图挣几个戈比。但是，就是这样的学习也没能持续多久。从15岁起，他便开始在一家德国人开办的工厂里学习钳工手艺，他所在的车间负责维修当地矿井使用的设备。在“矿井大学”里，赫鲁晓夫不仅学到了他引以为豪的钳工技术，而且受到了工人运动的洗礼，确立了革命信仰。1905年，俄国第一次大革命的风暴席卷了全国，也席卷了尤索夫卡。在这次革命的推动下，尤索夫卡的青年们开始阅读革命书籍。赫鲁晓夫生性活泼、好动，又颇有天资，善于与人交往，是个活跃分子，他积极参与了政治活动，与一个名叫潘捷列伊·马希尼亚的矿工成了知心朋友，并通过马希尼亚开始接触文学和政治书籍，其中包括《共产党宣言》。1915年3月，赫鲁晓夫参与领导了鲁钦科夫矿的大罢工，并取得了胜利，迫使矿主答应了罢工者的要求。1917年3月（俄历二月），俄国爆发了二月革命，统治俄国长达300年的罗曼诺夫王朝被推翻，沙皇封建专制统治也随之崩溃。各地纷纷建立苏维埃，尤索夫卡也是如此。赫鲁晓夫被选进鲁钦科夫矿的工人代表苏维埃，并负责监督逮捕当地的警官和建立工人纠察队。尽管赫鲁晓夫还不是一名布尔什维克，但他全心全意支持布尔什维克，积极投身党的工作，在布尔什维克鼓动成立的一个军事委员会任职。

1917年12月，尤索夫卡的苏维埃转到了布尔什维克手中。由于赫鲁晓夫积极支持布尔什维克，在促成尤索夫卡市苏维埃政权转到布尔什维克手中一事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被选为矿业五金工人联合会主席。很快，乌克兰成了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的战场，白卫军占领了顿河流域的几个重要据点，卡列金将军率领的哥萨克军队向尤索夫卡逼近。为了保卫革命成果，建立了工人赤卫队，赫鲁晓夫参加了尤索夫卡无产阶级赤卫队第一团，和他的同事达尼洛夫一起领导鲁钦科夫矿工营。1918年，在战争的烽火中，赫鲁晓夫正式加入了布尔什维克，成了一名共产党员。工人的武装力量没有阻止住白卫军的进攻，资本家又回来进行

反攻倒算。1918年春，德国军队也侵入了乌克兰，在乌克兰建立了傀儡政府，并占领了顿巴斯，赫鲁晓夫成了反革命政权通缉的对象。他既要躲过反革命政权的搜捕，也要躲过德军的盘查。历经艰险，赫鲁晓夫回到了故乡库尔斯克州，担任了卡利诺夫卡村的农民委员会主席，领导农民分地主的土地。此时，苏维埃政权面临国内外敌人的联合进攻，苏维埃政权处于危急中，3/4的国土被国内外敌人占领，重要的原料、燃料、粮食产地相继失守，列宁号召工农拿起武器，开赴前线，保卫祖国。

赫鲁晓夫响应党的号召，抛家舍子，应征入伍，在血与火的战场上接受考验。他被分配到一个步兵师的政治部工作。1919年春天，他开始担任第九步兵师第七十四团第二营政治委员。赫鲁晓夫在战斗中身先士卒，他所在的部队与兄弟部队配合，于1920年歼灭了邓尼金的主力，并从叶卡捷琳诺达尔方向突破白匪军的防线，于3月27日解放了诺沃罗西斯克。

1921年夏，乌克兰又遭受严重旱灾，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赫鲁晓夫的妻子加琳娜也死于这场饥荒，给他留下了5岁的儿子和3岁的女儿。顿巴斯的情况也很糟，成千上万的矿工离开矿井，外出逃荒。正是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赫鲁晓夫回到了顿巴斯，他的肩上压着两副重担：一方面，他要承担党委托的重任，完成他所不熟悉的经济管理工作；另一方面，他要支撑起自己那个不完整的家，既当爹，又做娘，抚育一双不懂事的儿女。

赫鲁晓夫是一个敢于向生活挑战的人。他精力充沛，干事总是生气勃勃。他深信，苏维埃俄国很快就会跃入共产主义天堂。他被任命为鲁钦科夫矿的副矿长，他以自己的热情和行为感染和鼓舞着矿工们。他召开会议，发表讲话，用共产主义理想激励矿工；他还亲自下矿井采煤，动手维修矿井设备。在当时干部十分缺乏的情况下，赫鲁晓夫备受重用，党组织拟任命赫鲁晓夫为一个大矿——帕斯图霍夫矿的矿长，却被赫鲁晓夫拒绝了。他要求去做一名学生，补习文化，于1923年进入了顿巴斯矿业技术学校（1935年改名为矿业学院）附设的一所工农速成中学学习。

在通常的情况下，学院应该由地方党组织派专职党委书记来开展政治工作，但由于当时党员少、干部短缺，党委书记只能从学院学生党员中选举产生。在当时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学生们渴望成为专家，谁都不愿做政治工作，无奈之下，赫鲁晓夫又干起了老本行，被选为学院的党委书记，这使赫鲁晓夫不能专

心学习。学习期间，赫鲁晓夫没有获得多少科学文化知识，却另有收获。他认识了在区委党校教政治经济学的教员尼娜·彼得罗夫娜·库哈尔丘克。她出生在乌克兰霍尔姆省的瓦西列夫村的一个农民家庭，她的家庭也不富裕，但比赫鲁晓夫的家境好，在她12岁时，父亲把她送到卢布林市的叔父那里，进了四年制不完全中学。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她中断了学业，在叶甫洛基主教帮助下进入敖德萨的霍尔姆玛丽亚女子学校，且享受公费，于1919年毕业，留在母校工作，1920年成为布尔什维克党的地下党员，并到敖德萨省城和农村开展工作，她还到过波兰前线当宣传员。1920年秋，尼娜·彼得罗夫娜进入莫斯科斯维尔德洛夫大学，参加为期6个月的培训。1922年秋，她奉调到尤索夫卡，在此与赫鲁晓夫相识。他们于1924年结为伉俪。尼娜·彼得罗夫娜有素养，工作能力强，办事有条理。赫鲁晓夫把他与前妻所生的6岁的女儿和8岁的儿子带进了这个新家庭，尼娜后来给赫鲁晓夫生了2个女儿和1个儿子。她独自管起了这个家，使赫鲁晓夫能够专心致志地工作。

1925年，经过3年的学习，赫鲁晓夫从矿业学院附属的工农速成中学毕业了，被任命为顿巴斯彼得罗夫斯克—马林斯基区的区委书记。该区包括1个较小的城市、3个大市镇、11个村庄和彼得罗夫斯克煤矿。此时正值国家工业化时期，整个社会生机勃勃，人们满腔热情地忘我地建设这个新社会。作为主管该区全面工作的一把手，他很少坐在办公室里，时而走到田头，时而下到矿井，用他极富感染力的讲话鼓舞人们，以他身体力行的工作作风去解决实际问题。随着工业化的进展，采煤机、推土机、装卸机、输送机和电力机车等运到了彼得罗夫斯克矿山，力量单薄、无力耕种土地的农民被吸纳进入了矿山，赫鲁晓夫做区委书记的当年，彼得罗夫斯克矿的煤产量即从2600万普特增加到3600万普特，农业也获得了大丰收。

由于赫鲁晓夫在彼得罗夫斯克—马林斯基区政绩突出，1926年底，他被调到了尤索夫卡担任区委副书记，他已成为乌克兰出类拔萃的年轻干部。赫鲁晓夫步步高升也得益于当时的社会大环境，联共（布）大力提拔工农出身的干部，以此来改变干部的结构，体现政权的无产阶级性质。赫鲁晓夫本人的才能和业绩使他具备了进一步升迁的基本条件，他对党忠诚，善于在群众中做工作，肯干实干。此外，卡冈诺维奇的提携和重用也是不可或缺的条件，因为苏联的干部政策实质上是一种任命制，得不到上级领导的赏识则难以被委以重任。1928年初，

正是在卡冈诺维奇的关怀和提议下，赫鲁晓夫走出了顿巴斯地区，来到了当时的乌克兰首府——哈尔科夫，担任了乌克兰共和国组织部副部长。

赫鲁晓夫未能适应在哈尔科夫的工作，他生性好动，不习惯坐在办公桌后面通过一大堆表格和档案了解现实世界，于是，他又三番五次请求卡冈诺维奇给他换工作。不久，杰姆钦科调到基辅任市委书记，他要求赫鲁晓夫也去那里领导组织部工作，赫鲁晓夫欣然同意。赫鲁晓夫在基辅也没有待多久，他又抓住了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1929年，莫斯科工业学院要招收100名学员，这一消息令赫鲁晓夫又动了心。莫斯科工业学院不是一般的高等学院，它是联共（布）中央和苏联政府为培养大企业领导、共和国及中央一级的经济及工业领域高级领导干部而设立的。学院的招生对象是十月革命前入党的工业企业领导，赫鲁晓夫并不符合条件，但他自有办法，他找到主管该院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卡冈诺维奇，经这位主管书记的特批，赫鲁晓夫于1929年9月成了莫斯科工业学院的学员。入学后，便又重演了在工农速成中学的一幕，再次当上了学院的兼职党委书记，实际上他根本就没有时间学习。

在他入学之时，莫斯科工业学院的党委书记是哈哈列夫，他是1906年入党的老党员，他周围的一群“老革命”支持布哈林、李可夫等所谓的右倾分子。一入学，赫鲁晓夫便成为“右倾路线”的积极反对者，并成为一个人崭露头角的积极分子，他们的反右倾斗争得到了中央委员会的支持，从而扭转了工业学院的形势。赫鲁晓夫从此声名显赫，一下子成了全党反右倾的典型，也成了为斯大林所关注的人物。此后，赫鲁晓夫在工业学院开始了他捍卫党的现行路线的斗争，他时而开会批判那些把学院当成政治斗争避风港的“游手好闲分子”，时而批判某些人的右倾机会主义言行。一批又一批的“老革命”被开除出工业学院，工业学院成了反击反对派的典型，学院党组织通过的决议常常登在《真理报》上，成为其他党组织工作的榜样。在苏联人民经受“大转变”所带来的痛苦之时，赫鲁晓夫开始飞黄腾达。

1931年1月，在卡冈诺维奇的安排下，赫鲁晓夫代替有右倾倾向的希林成为莫斯科鲍曼区的区委书记。同年2月，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一起成为莫斯科市委委员及市常务委员会委员。经过6个月在鲍曼区的“见习”后，7月，赫鲁晓夫又在卡冈诺维奇的推荐和斯大林的批准下，当上了莫斯科最大的一个区——红色普列斯尼亚区的区委书记，该区的前任书记柳京也是因为不同意斯大林的“大转

变”方针而被撤职的。又过了6个月，即1932年1月30日，赫鲁晓夫出任莫斯科市委第二书记，开始作为卡冈诺维奇的得力助手活跃于苏联的政治中心。从1933年起，他又兼任莫斯科州委第二书记。1934年，在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39岁的赫鲁晓夫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1935年，卡冈诺维奇被任命为交通人民委员，赫鲁晓夫接替他担任了莫斯科市委和莫斯科州委第一书记。

1938年1月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赫鲁晓夫被选进主席团。随后，在同时举行的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赫鲁晓夫又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他进入了苏联党和国家的最高决策层，成了苏联10位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他填补了右派分子被镇压而留下的权力真空，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赫鲁晓夫成了弄潮儿。

1938年初，深得斯大林信任的赫鲁晓夫担任了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同时担任基辅州委和市委第一书记。乌克兰在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中，是仅次于俄罗斯联邦的第二大共和国，号称“欧洲的粮仓”，又是苏联重要的工业基地。赫鲁晓夫在乌克兰当政之初，把柯秀尔留下的绝大部分人作为托洛茨基分子、布哈林分子和民族主义分子清洗了，但他实际做的没有喊得欢，他对各级干部不是逮捕，而主要是降职使用。他清醒地认识到，他来乌克兰，并不是来搞大恐怖的，而是要把乌克兰的工农业搞上去。赫鲁晓夫在工作中也表现出了灵活性，他赞成给集体农庄庄员多一点宅旁园地，鼓励他们多养自留畜、种自留树，而不像有些干部那样唯恐庄员的自留地扩大会损害社会主义。在苏联，由于实行义务交售制，粮价定得很低，往往低于成本，农庄庄员从农庄中得不到多少报酬，他们的生活主要靠宅旁园地，城市副食品供应的20%—30%也靠宅旁园地。赫鲁晓夫此举深受乌克兰人的欢迎，也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到1939年8月，乌克兰农庄庄员的餐桌上、城市商店里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各类农副产品供应充足，价格低廉，人们的脸上现出了满意的微笑。

在卫国战争中，赫鲁晓夫是活跃在前线的少有的政治局委员，他参加了许多重要战斗，成为一名中将。1944年2月6日，他被任命为乌克兰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同时他仍兼任该共和国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这一年赫鲁晓夫满50岁，在4月17日他生日这天，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发来了贺电，人们把他称为“斯大林的真正战友”。

1946年是个大旱年，也是赫鲁晓夫仕途首次遭受挫折的开端。从1945年秋

季起，乌克兰遭受了严重的旱灾，但乌克兰仍要向国家提供4亿普特的粮食（仅比1940年规定的数字略低），而乌克兰收获的粮食仅有两亿普特，大大低于国家的需要，而且乌克兰自身也需要粮食，乌克兰再次出现了饥荒。作为一个加盟共和国的当家人，赫鲁晓夫并不掌握粮食，他只能求助于斯大林。赫鲁晓夫曾在斯大林的眼皮底下工作过，也曾无数次参加过斯大林的冗长的宴会，他很了解斯大林，如果斯大林听到乌克兰不仅不能完成粮食征购任务，反而要伸手向国家要粮，肯定十分愤怒。但作为乌克兰共和国的首脑，他又不能不对一方百姓负责，他怀着侥幸心理希望不经斯大林而通过斯大林手下某位大员疏通此事，或者斯大林能详细看他的科学论证报告，从而发善心。赫鲁晓夫指派以斯塔夫钦科为首的农业专家和经济专家小组，实事求是地估价乌克兰的农业生产，写出详细报告，报告搜集了大量材料，并得出了合乎逻辑的结论：乌克兰完不成国家规定的粮食征购量，需要国家救济。赫鲁晓夫思忖再三，还是向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部长会议递交了文件，请求发给粮食定量分配卡，以便分给农民救灾。当时在索契度假的斯大林，马上给赫鲁晓夫发来了一封电报，称赫鲁晓夫是个靠不住的人物，说他写的备忘录想证明乌克兰自顾不暇，说他的要求是荒谬绝伦的。

赫鲁晓夫还有两件令斯大林不快的事。一件是关于春小麦问题，斯大林要在乌克兰推广春小麦，而赫鲁晓夫认为春小麦不适合乌克兰，在乌克兰春小麦不如冬小麦高产，乌克兰南方更是如此，应该让集体农庄选择该种冬小麦还是春小麦。但不顾赫鲁晓夫的反反对，1947年2月苏共中央全会的决议仍指出：“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春小麦的生产异常落后。全会认为，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逐年减少春小麦这种珍贵粮食的播种面积，而把肥沃的黑土用来播种价值比较小的饲料作物特别是大麦，这是不能容忍的。1947年乌克兰地区集体农庄的春小麦播种面积应当比1946年增加18.2万公顷，而达到75万公顷，保证以后几年继续扩大春小麦的播种面积。”<sup>①</sup>另一件是意识形态问题。战后初期，苏联百业待兴，经济恢复工作千头万绪，各级党政干部都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恢复经济上，相对而言，社会政治气氛比较宽松，赫鲁晓夫又是一个实干家，他擅长的是抓实实在在的事，加上1946年乌克兰又遭旱灾，他操心的中心问题是吃饭问题。但是，斯大林却没有忘记抓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

---

<sup>①</sup> 《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五分册，中文版，第216页。

他要肃清苏联士兵越境作战所受到的西方文化的影响，因为苏联士兵看到的景象并不像苏联宣传的那么糟，相反，过惯苦日子的苏联人倒有些羡慕西方的富足，这是斯大林所不能容忍的。斯大林担心乌克兰的民族主义情绪会日益增长，于是，1946年7月26日，联共（布）专门作出了《关于乌克兰党组织对党和苏维埃的领导人员的训练、选拔和配备问题的决议》，指出乌克兰党组织低估了“思想工作的重要性”，忽视了“对报刊上出现敌对的资产阶级思想组织大规模的批评”。赫鲁晓夫自然要对此承担责任。

以上种种情况，似乎使斯大林改变了对赫鲁晓夫的态度，赫鲁晓夫的政治生涯前途不妙。1947年3月，卡冈诺维奇被任命为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失去了乌克兰党的一把手的宝座，帕托利切夫被任命为乌克兰中央委员会主管农业的书记，斯大林想以此加强乌克兰春小麦的播种。新领导到任约10天后，赫鲁晓夫又以“个人请求”的方式被解除了基辅州委书记的职务，赫鲁晓夫保留了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虽然他仍是政治局委员，但斯大林已不那么信任他了，报纸上关于赫鲁晓夫的报道渐渐消失了，甚至在6月召开的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全会上也没有看到赫鲁晓夫的身影。

1947年12月，斯大林任命卡冈诺维奇为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卡冈诺维奇奉调回莫斯科，乌克兰人民松了一口气，赫鲁晓夫也顿感轻松，他又重新担任了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人民委员会主席一职则由他的亲信杰·谢·科罗特钦科担任。

1949年12月，斯大林再次把赫鲁晓夫召到身边。原莫斯科州委书记波波夫被任命为城市建设部部长，赫鲁晓夫被免去在乌克兰的职务回首都接替波波夫，赫鲁晓夫又开始了新的政治生涯。听到赫鲁晓夫奉调莫斯科，许多乌克兰人恋恋不舍，乌克兰著名作家旺达·利沃夫娜竟在赫鲁晓夫面前失声痛哭，她不断说：“你怎么能走？你怎么能离开乌克兰？”对赫鲁晓夫怀有这种感情的不止她一人。赫鲁晓夫对乌克兰的历史文化、风俗人情有深厚的感情，他的夫人尼娜·彼得罗夫娜出生于乌克兰人聚居的村庄，会讲乌克兰语，与乌克兰人有良好的关系，受她的感染，赫鲁晓夫在乌克兰党政军界、教育科学界、文艺界都有一批交往密切的朋友，他被乌克兰人当成是“自家人”，而不是莫斯科派来的监督者，这是赫鲁晓夫获得的最为宝贵的财富。在苏联高级领导人物中，像赫鲁晓夫这样深得一方民众发自内心爱戴的领导人是有少见的，这也许是日后赫鲁晓夫能战胜竞争对手

成为斯大林继承人的原因之一吧。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领导了反对贝利亚的斗争。6月26日贝利亚被逮捕，同年12月被以叛国罪处死。苏联著名作家西蒙诺夫在评价此事时说：赫鲁晓夫在逮捕贝利亚一事中能起主要作用是无可争议的，因为他实际上比其他人更能明察秋毫、才智过人、干劲十足和坚决果断，同时，贝利亚低估了赫鲁晓夫，低估了他的品格，他那深藏不露的、与生俱来的、纯粹乡下人的机敏和狡黠，低估了他的健全的头脑和性格的力量，而把他当成其貌不扬、愚昧粗鲁的傻瓜。

贝利亚被除，悬在党和政府头上的利剑被砍断，提高了党的威信，同时也提高了赫鲁晓夫的个人威信。他于1953年9月正式成为苏共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他以党的名义统领国家安全机关，并把自己的亲信安插其中。此后，赫鲁晓夫顺应民意，开始为斯大林时期的受害者平反，到1953年底有1000余人被恢复了名誉，其中包括莫洛托夫的妻子、加里宁的妻子、赫鲁晓夫的大儿媳、卡冈诺维奇的弟弟，等等。此举使赫鲁晓夫声望大增。

赫鲁晓夫还有两项动议受到人民的欢迎：一是结束“有害的”生活方式。战后，斯大林的习惯是夜间工作，上午睡觉，不仅一些会议在夜间召开，而且他经常深夜给主席团成员、部长，加盟共和国首脑、州委书记打电话，所以，从上到下都随斯大林调整作息时间，使工作杂乱无章，干部疲惫不堪。在赫鲁晓夫的建议下，苏联最高苏维埃发布一项命令：从1953年9月1日起结束“有害的”生活方式，全联盟和各加盟共和国党政机关工作人员早9点至下午6点为工作时间（中间含1小时午休），地方机关工作人员上午10点到下午7点为上班时间，此举受到了普遍欢迎。另一项是开放克里姆林宫。斯大林时期，这里是群众的禁地，只有持特别通行证的人才能进入。在赫鲁晓夫的建议下，克里姆林宫向群众开放，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人都不再在克里姆林宫居住，群众只要买一张门票，便可以到这里来休息、参观古老的建筑群、观赏奇珍异宝。1953年12月31日，青年们在克里姆林宫举办新年舞会，从此，对莫斯科的青年和儿童来说，在克里姆林宫举办新年舞会成了传统，苏联人民为多了一个游览和集会的好场所而笑逐颜开。

1954年11月，赫鲁晓夫成立了一个新机构——苏共中央总部，取消了马林科夫掌管的苏共中央办公厅。赫鲁晓夫完全掌握了党的机关，他越来越多地决定

国家的大政方针，马林科夫的部长会议主席一职也渐渐名存实亡。

列宁格勒案件被揭露打击了马林科夫。1955年2月8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马林科夫提出了辞去部长会议主席一职的申请，马林科夫被降职为部长会议副主席和电力部部长，同时，他仍是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

苏共二十大后，赫鲁晓夫在党内的地位进一步稳固，他开始在国内进行一系列的改革，这些措施引起了党内高层一些人的不满，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人想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罢免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则坚称他是中央委员会选出的第一书记，主席团无权罢免。在朱可夫的帮助下，全国各地的中央委员赶往首都，在1957年6月22—29日召开了中央全会。参加这次全会的代表是苏共二十大选出来的，在309名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和监察委员中，有215名同志报名要求发言，其中在会上发言的有60名。几乎所有发言者都支持赫鲁晓夫，谴责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谢皮洛夫等人，有人谴责他们阴谋反党，有人则追究他们参与大清洗的责任。6月29日，在莫洛托夫一票弃权的情况下，全会通过了《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把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从中央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中清除出去，撤销谢皮洛夫的苏共中央书记的职务，并将他从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和中央委员中清除出去。赫鲁晓夫彻底战胜了竞争对手，巩固了权力。

1958年3月27日，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布尔加宁被解除了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其军衔也从元帅降至上将，他被任命为国家银行行长。在伏罗希洛夫的提议下，赫鲁晓夫当选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为了加强党对军事部门的一元化领导，成立了最高国防委员会，赫鲁晓夫任主席。这样，赫鲁晓夫也像斯大林一样，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了，达到了权力的顶峰。后来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对此进行了检讨，他说：“我常常批评斯大林一人身兼两职，一个是政府的职务，一个是党的职务。我除了担任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外，又兼任了部长会议主席，就意味着在我这受到了某种程度的削弱——像是臭虫正在吮吸我的血液和损坏我的抵抗力。我将让历史来对这个问题作出最后的判断。”<sup>①</sup>

---

<sup>①</sup> 赫鲁晓夫：《最后的遗言》，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45页。

## 赫鲁晓夫改变对斯大林的态度事出有因

赫鲁晓夫与斯大林首次相见是在1925年12月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当时他只有发言权，而没有表决权。赫鲁晓夫所在的顿巴斯代表团的莫伊谢因科请求斯大林与他们一道合影留念，斯大林愉快地答应了。在摄影过程中，摄影师彼得罗夫指挥大家照相，斯大林开玩笑说：“彼得罗夫喜欢发号施令，可是在我们这儿发号施令是不行的，不许发号施令！”大家很为斯大林的民主精神所感动，“我们觉得，斯大林的确是一个作风民主的人，他发表这种意见不是偶然的，这句玩笑话本质上符合斯大林的天性。随后在代表会议期间，斯大林的讲话，他的一些即兴插话，也都使人对他产生好感。我越来越对这个人物怀有深深的敬意”。<sup>①</sup>初次相见，斯大林给他留下了极好的印象，他深信，斯大林就是党，就是党的正确路线的代表，这种独具一格的判断，使他在苏联20年代纷繁复杂的党内斗争中始终紧跟斯大林，从而得到信任和提拔。

在此后的几年里，不断有关于斯大林为人谦虚、民主作风好的佳话传到顿巴斯。一次，顿巴斯矿区的一批学生到莫斯科观光，领队列·阿·里姆斯基决定询问一下斯大林是否可以接见这个学生代表团。他打电话到克里姆林宫，立即接通了斯大林本人，斯大林同意接见他们。在接见中，里姆斯基提出请斯大林给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斯大林诺（尤索夫卡）的工人写封贺信，斯大林断然拒绝，并严肃地说：“我不是地主，工厂的工人们也不是我的农奴，我不会给他们写信，也不喜欢别的人这样做。”<sup>②</sup>此事在顿巴斯传为美谈。赫鲁晓夫更加深信，斯大林是一个颇具民主精神、平易近人、能正确对待自己的人。

赫鲁晓夫是斯大林理论和政策的坚定拥护者，他在反右倾的浪潮中青云直上，也是斯大林清洗老布尔什维克的直接受益者。20年代末30年代初他就有机会参加斯大林的家宴，“斯大林在这些家宴上显得很有人情味儿，令我印象深刻。

---

<sup>①</sup>（俄）尼基塔·谢·赫鲁晓夫著，述弢等译：《赫鲁晓夫回忆录》（全译本）第1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3页。

<sup>②</sup>（俄）尼基塔·谢·赫鲁晓夫著，述弢等译：《赫鲁晓夫回忆录》（全译本）第1卷，第20页。

我更加对斯大林充满敬意，既把他当做其身边的人无出其右的政治活动家，又把他当做一个普通人”。<sup>①</sup>他对斯大林的歌颂也是真诚的，也是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推波助澜的重要人物。

俄罗斯人具有很强的皇权思想，他们习惯于把成绩归功于最高领导人。列宁去世后，联共（布）党内便掀起了对列宁的个人崇拜。从1929年斯大林50寿辰开始，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逐渐发展起来了，特别是随着反对派被击败，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完成，苏联人民的生活开始好转，斯大林在党和群众中的威信提高。1934年召开了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被称为“胜利者的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布哈林、加米涅夫等前反对派成员也都加入了颂扬者的行列。赫鲁晓夫的迅速崛起，得益于斯大林的提拔和信任，他真诚地认为斯大林是伟大而正确的。在十七大召开前，赫鲁晓夫就把斯大林称为“天才的领袖”，“我们的导师和领袖”，“最伟大的布尔什维克战略家”。在十七大上，赫鲁晓夫颂扬斯大林的调门很高，只有他把斯大林称为“天才的领袖”。20世纪30年代，赫鲁晓夫虽然目睹了党的许多活动家、优秀的红军将领被送上了断头台，但他并没有怀疑斯大林政策的正确性。

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怀疑是从卫国战争初期的失利开始的，苏联遭受的巨大损失使他直观地感到对红军将领的清洗损害了党和国家的利益，也表明斯大林并不总是英明的，战争初期斯大林的萎靡不振和战争进程中斯大林的一些指挥失误也刺激了赫鲁晓夫。经过卫国战争初期的失利和基辅失陷，赫鲁晓夫开始怀疑斯大林这个“天才领袖”的天才，但他仍小心翼翼、十分谨慎地行事。

1948年1月24日是乌克兰苏维埃政权成立30周年纪念日，赫鲁晓夫在讲话中突出颂扬了斯大林。他援引了斯大林1917年12月所说的关于俄罗斯人民和乌克兰人民是兄弟和同志的一段话，他说：“到了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30周年和庆祝乌克兰苏维埃政权建立30周年纪念日的时候，乌克兰人民是团结一致的，空前紧密地团结在布尔什维克和自己的领袖斯大林同志的周围。乌克兰人民过去、现在和将来始终忠于列宁斯大林的伟大事业。”“我们伟大的领袖斯大林的英明的、久经考验的领导是我们在争取建立共产主义社会斗争中取得胜利的保证。”

---

<sup>①</sup>（俄）尼基塔·谢·赫鲁晓夫著，述弢等译：《赫鲁晓夫回忆录》（全译本）第1卷，第55页。

他带头高呼：“我们的英明领袖、乌克兰人民最好的朋友——敬爱和伟大的斯大林万岁！”<sup>①</sup>如果说20世纪30年代赫鲁晓夫颂扬斯大林是出自内心的尊敬与敬佩，那么经过卫国战争初期的失利、战后春小麦之争等事件后，赫鲁晓夫的颂扬恐怕更多是巩固自己政治地位的需要，当然也还有对斯大林的崇敬之情，毕竟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取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

1949年12月21日是斯大林70寿辰。在庆祝仪式上，毛泽东坐在斯大林右边，赫鲁晓夫坐在斯大林左边，足见斯大林对赫鲁晓夫的信任。赫鲁晓夫在当天的《真理报》上发表了歌颂斯大林的文章，称：“斯大林同志最伟大的功绩就在于他同人民的敌人——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布哈林分子以及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进行了残酷的斗争，捍卫了列宁学说的纯洁性和我们党的统一与钢铁般的团结。”斯大林一直守在每一个苏维埃共和国的摇篮边，慈父般地保护和帮助他们成长，因此，“我国各族人民怀着无比的热情，怀着做儿女的心情，把伟大的斯大林称之为自己的生身父亲、伟大的领袖和天才的导师。”“光荣属于生身父亲、英明导师、党和苏联人民以及全世界劳动者的天才领袖斯大林同志。”在个人崇拜盛行的社会大背景下，赫鲁晓夫对斯大林进行颂扬也是生存的需要。

在斯大林晚年，赫鲁晓夫是斯大林小圈子中的人物，经常参加斯大林的夜宴，近距离观察到斯大林的生活和为人。他也时常感到不安全，担心哪一天斯大林不高兴把他也送进集中营，斯大林在他心目中的光环渐渐退去。审查贝利亚案件和了解大清洗的内幕，使赫鲁晓夫了解了另一个他不知道的斯大林，动摇了他对斯大林的崇拜。

1954—1955年间，在全国范围内审讯贝利亚的同案犯。这种审讯是公开进行的，数以千计的当地党员、干部、知识分子以及前政治犯都能参加，这对动员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在中央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和总检察院领导下建立了几个特别委员会，负责调查斯大林时期的暴行，包括30年代几次大审判和对军队的清洗。在调查贝利亚事件时，赫鲁晓夫发现，斯大林本人才是苏联大清洗、大恐怖的核心人物，是无数冤案的始作俑者，赫鲁晓夫感到受骗了，被愚弄了。因此，他要揭露斯大林，要为自己树立维护正义的形象。

---

<sup>①</sup> 《赫鲁晓夫言论》第二辑，第152—153页。

苏联检察机关收到犯人及其家属的无数封请求信，要求为无辜者平反，但这一工作进行得很慢，1955年被释放者还不到1万人，大多数是30年代党的领导人。审讯贝利亚及其亲信，为克里姆林宫“医生谋杀案”、“列宁格勒案件”及一些受害者平反、恢复名誉的消息也传到了集中营和劳改场，大量的政治犯要求平反，有些集中营甚至发生了武装暴动，如西伯利亚诺里尔斯克的卡皮塔尔纳亚矿区、哈萨克的肯基尔集中营的犯人们弄到了武器，苏联政府动用了装甲车和坦克才把暴动平息下去。被迫害者及其家属要求恢复名誉的呼声、全国人民对大清洗的谴责、全体党员要求恢复党内正常民主生活的要求，汇成了一股强大的潮流，促使赫鲁晓夫向斯大林发起冲击，这是赫鲁晓夫挺身而出提出反对个人崇拜的社会基础。

1955年5月，赫鲁晓夫、布尔加宁、米高扬和谢皮洛夫访问南斯拉夫，此事促成了苏南关系的恢复，对推动赫鲁晓夫起而反对斯大林也起了作用。5月26日，赫鲁晓夫、布尔加宁、米高扬、谢皮洛夫一行抵达贝尔格莱德机场，以铁托为首的南斯拉夫党政领导人到机场迎接，赫鲁晓夫在机场发表了讲话，他公开承认苏方对过去：“发生的一切衷心地感到遗憾，并且决心消除这个时期中的一切芥蒂。”但赫鲁晓夫把苏南关系破裂的责任归咎于贝利亚等“人民的敌人”。赫鲁晓夫的讲话并未被翻译成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在会谈中气氛也很紧张。赫鲁晓夫把苏南关系破裂的责任归之于贝利亚，铁托十分不快。铁托等南斯拉夫领导人清楚地表明，苏南关系破裂是斯大林一手造成的，遭到赫鲁晓夫等人的驳斥。但后来赫鲁晓夫逐渐了解了事情的真相，认识到自己维护斯大林是多么虚伪，南斯拉夫人的看法是有道理的。

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当然也有政治方面的考虑。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共产党开始对斯大林时期的内外政策进行调整，但党内有分歧，以莫洛托夫为代表的一批人，包括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马林科夫等人主张沿着斯大林的航线走下去；以赫鲁晓夫为主要代表人物的一派希望改变斯大林的内外政策，走改革之路，但赫鲁晓夫这一派人在苏联最高领导层并不占优势。为了提高自己的威信，为改革扫除障碍，他必然要拿斯大林开刀，与党内其他高级领导相比而言，赫鲁晓夫在斯大林的错误泥潭中陷得比其他人要浅。

1955年7月，苏共中央全会决定于1956年2月14日召开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这是斯大林死后召开的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的准备过程中，围绕

要不要反对个人崇拜，要不要向全党通报斯大林的问题，苏共党内展开了激烈争论。赫鲁晓夫建议彻底调查斯大林时期发生的事，老政治局委员中的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均在1926年进入政治局）、卡冈诺维奇（1930年进入政治局）对此不热情，米高扬也不支持他，马林科夫更反对，只有“年轻的”主席团成员：布尔加宁、萨布罗夫、别尔乌辛等人支持他。总的看，赫鲁晓夫的支持者在中央委员会中也不占多数，赫鲁晓夫本人也并非置身事外，他也没有生活在另一个时代，在大清洗的年代里，他先是做“京官”，后又来到多事之地乌克兰，他的双手也沾染了鲜血，揭露斯大林，弄不好也会危及自身，但赫鲁晓夫义无反顾地要做这件事，他认为必须对代表们可能提出的为什么现在还有这么多人关在监狱里和现在对他们将如何处理的问题作出回答。在此，一个政治家的良心和道德感无疑起了作用。作为从平民中成长起来的领袖，赫鲁晓夫朴素善良的愿望、对广大受害者的同情，使他无法对此无动于衷。

## 作《反对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 不是赫鲁晓夫的个人行为

1955年12月31日召开苏共中央全会，赫鲁晓夫提出了关于大规模平反的问题，根据速记记录，没有任何争论。全会决定成立以中央书记波斯佩洛夫（主席）和阿里斯托夫为首的委员会，负责审查1937—1940年大镇压的资料。党的监察委员会主席什维尔尼克及其副手科马罗夫也参加。苏联总检察长鲁坚科和克格勃主席谢罗夫也有义务参加其活动，该委员会的工作很有成效。

1956年2月1日在苏联中央主席团会议上，在询问了从监狱中找到的前国家内务人民委员会、国家安全委员会特别事务侦查处的副主任罗托夫后，苏共领导层感到震惊，那些令人发指的大镇压，正是斯大林自己有计划进行的。阿里斯托夫问：“赫鲁晓夫同志，你有勇气说出真相吗？”赫鲁晓夫说：“在报告中也许还需要补充（这些内容）。”别尔乌辛、布尔加宁、米高扬支持赫鲁晓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等人则强调斯大林的功绩，莫洛托夫说：“但是，斯大林作为伟大领导人的地位应该承认。”“在报告中不能不说斯大林是列宁事业的伟大继承者。”卡冈诺维奇说：“可以重新认识许多事，但30年前斯大林就成了国家首脑。”伏罗希洛夫：“党应该知道真相，但是应该这样描述，如何被命运

操纵。受当时的局势所支配。但是，我们带领国家沿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之路前进。有斯大林的成分吗？有，有很多例证，赫鲁晓夫同志，说出来是对的，但应该好好想想。”莫洛托夫：“与伏罗希洛夫一致，应该恢复事实真相，事实是在斯大林的领导下社会主义胜利了，当然有丑事，这也是事实。”布尔加宁说：“应该向党说出全部真相，斯大林代表他自己，应该采取这样的路线，不要做傻瓜，党的十七大中央委员会的成员都被他消灭了。不能同意说斯大林是伟大的继承者。”年轻的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不仅对斯大林的大镇压表示震惊，还对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表示了怀疑，如萨布罗夫说：“如果相信事实，难道这是共产主义吗？这是不能原谅的。”苏斯洛夫说：“最近几个月，我们知道了可怕的东西。不应该对此无动于衷。斯大林对德文斯基说：一个区剩 10—15 人就够了。”赫鲁晓夫：“斯大林献身于社会主义事业，但也动用了一切残酷的手段。他消灭了党，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人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神圣的。”<sup>①</sup>从以上主席团成员的辩论中我们看到，他们都不反对说出斯大林时期的真相，但在揭露的程度上有所不同。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强调苏联是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建成社会主义的，其他人则对把斯大林当成马克思主义者和列宁的继承人表示怀疑。

1956年2月9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再次召开，会议听取了波斯佩洛夫委员会的报告，这份报告指出，在大镇压时期，从1937—1940年以反苏维埃活动罪共逮捕1920635人，其中688503人被枪决。赫鲁晓夫努力让大家相信，必须在代表大会上向代表说明，不仅是大镇压，而且还有关于斯大林的作用等问题，应该有勇气讲清楚，如果不说，则说明对代表大会心不诚。他建议由波斯佩洛夫准备报告并在代表大会闭会时宣读，特别要对产生个人崇拜的原因——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手中，特别是不诚实者之手，加以说明。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强调，不应该光说这些，苏联在斯大林的领导下生活了30年，进行了工业化，进行了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党成了一个伟大的党等。布尔加宁建议以1934年为界分成两个时期来评价斯大林，强调个人崇拜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不能把一切功劳都归于斯大林。萨布罗夫反对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的立场，他们试图在领袖的活动中找出肯定的方面，但这并不像卡冈诺维奇说

<sup>①</sup> 《消息报》网站 [www.izvestia.ru](http://www.izvestia.ru) 2006年2月13日。

的那样是缺点，而是犯罪。针对莫洛托夫关于苏联在斯大林领导下成为强国的说法，萨布罗夫提请注意斯大林在战争中的作用（战争初期的失利）和造成的国际紧张局势（与芬兰的冲突，谋求黑海海峡、柏林危机、朝鲜战争）。最后，赫鲁晓夫对会议进行了总结，他指出，对于向代表大会说明大镇压的情况，没有分歧。谁作报告成了问题，赫鲁晓夫建议让波斯佩洛夫作，遭到大家的反驳，如此重要的报告不应该由一名书记作，而应该由第一书记作。

1956年2月13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决定赫鲁晓夫作《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这次会议决定委托赫鲁晓夫召集中央全会，在会上提出中央主席团认为必须在闭会时作关于反对个人崇拜报告的建议。当天召开的中央全会通过了这一建议。

由此可见，要不要在代表大会上作揭露斯大林错误的报告的问题在代表大会召开前已经解决了，并没有争论。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反对斯大林，并不是因为其道德品质恶劣，是时间的推移和大量他以往所不知晓的事情真相的披露让赫鲁晓夫改变了对斯大林的看法，动摇了他对斯大林的崇敬。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既是当时苏联社会发展的需要，也得到了苏共中央的赞同，并不是赫鲁晓夫的个人行为。当然也不排除赫鲁晓夫想借此捞取政治资本的因素，同样更不能否认赫鲁晓夫的责任感和道德感。赫鲁晓夫打开了监狱和集中营的大门，恢复了人们被践踏的荣誉与尊严，千百万家庭不能不感激他。“对于那个时代——这是革命性的措施，首先是在精神和道德领域。”<sup>①</sup>“不应该忘记，赫鲁晓夫揭露了斯大林主义，为千百万人平反，在苏联社会重塑了新的氛围。”<sup>②</sup>值得强调的是，赫鲁晓夫揭露了斯大林统治的残暴性，但他不能容忍人们对斯大林所建立的社会主义体制的怀疑。

---

① Стенограмма круглого стола посвященного 50 – летию ХХ съезд КПСС. www. gorbv. ru 10. 04. 2006. С. 3.

② Стенограмма круглого стола посвященного 50 – летию ХХ съезд КПСС. www. gorbv. ru 10. 04. 2006. С. 51.

## 48. 如何解析赫鲁晓夫提出的“三和路线”？

左凤荣

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政治报告中提出的关于国际局势发展的几个原则性问题，被中国人概括为“三和路线”，在中苏大论战时期被中共痛批。时间过去了几十年，今天如何来客观地看待这些问题呢？

### 和平共处、和平竞赛与和平过渡：现实的选择

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本是列宁的思想。在国内战争结束后，列宁认识到世界革命不会很快到来，苏俄要生存必须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斯大林在处理与资本主义国家关系时，对和平共处的长期性重视不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渐趋紧张，甚至发展到了尖锐对抗的地步，双方爆发了冷战。

斯大林去世后，苏联新领导人面对危机重重的苏联社会，需要把主要精力放在解决民众的吃饭问题上，这就要求有一个宽松的国际环境，与资本主义国家改善和发展关系是必然的选择，于是，苏共进行了一系列政策调整。1956年召开的苏共二十大，是斯大林去世后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新领导人必然要在理论上有所创新，为自己的政策调整提供理论支撑。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代表苏共中央委员会作总结报告，他在报告中谈到现代国际局势发展中的几个原则问题时说：“这就是关于两个体系的和平共处问题，关于现代防止战争的可能性问题以及关于不同的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

问题。”<sup>①</sup> 赫鲁晓夫在表达苏共对这些问题的立场时说：“列宁关于社会制度不同的各国和平共处的原则，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国外交政策的总路线。”他强调苏联奉行和平政策，革命不能靠武力输出，“当我们说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体系的竞赛中社会主义体系必将取得胜利的时候，这决不意味着，胜利将通过社会主义国家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内政进行武装干涉来实现。我们确信共产主义生产方式胜利的依据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决定性的优越性”，“我们认为，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不仅仅是能够共处，而且还应当前进，改善关系，加强彼此的信任，实行合作”。<sup>②</sup> 关于防止战争的问题，赫鲁晓夫强调，由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及其力量的强大，“和平力量就不仅具备了防止侵略的精神手段，而且具备了防止侵略的物质手段。此外，还有一大批拥有数亿人口的其他国家正在积极地反对战争。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今天成了一支巨大的力量。拥护和平的运动已经产生，并且已经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因素”。<sup>③</sup> 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问题，赫鲁晓夫是从革命与建设两个角度谈的，他提到中国和东欧国家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都有自己的特殊的形式，至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演进，“说我们把暴力和内战看成是社会改造的唯一途径，这是不符合事实的。”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争取了以无产阶级、劳动者的群众革命运动为依据的议会的稳定的多数，就可以为若干资本主义国家和过去的殖民地国家的工人阶级，创造实现根本社会改造的条件”。<sup>④</sup> 从赫鲁晓夫的论述中我们看到，赫鲁晓夫所论证的“和平共处”与“和平竞赛”是联系在一起的，表现了他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心，在谈到“和平过渡”问题时并没有否定非和平过渡的可能性，他还谈到了防止新的世界大战的可能性问题，中国共产党把他的这些思想概括为“三和路线”并不全面。

赫鲁晓夫政策的重点在于改善苏联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加强彼此的信任，进行合作，这为和平共处增加了现实的内容。赫鲁晓夫改变了斯大林不让步、不谈判的做法，提出为了和平的利益应该相互妥协、相互让步，考虑对方的

---

①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上），第35页。

②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上），第35、36、37页。

③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上），第38页。

④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上），第41、42页。

利益，“对于我们苏联人，列宁的和平共处原则是对外政策的总路线，和平共处——这不只是在两个体系间没有战争，而是还在于它们之间和平的经济竞赛和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接触与合作。社会主义国家从这一点出发：在现在条件下完全有在两大体系间制定具体而现实的纲领，包括发展贸易，共同帮助弱小的国家实现工业化，在改造自然界方面共同采取行动等等”。<sup>①</sup> 对于科技水平相对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与资本主义国家加强经济文化交流，是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

在赫鲁晓夫看来，和平共处的实质是不用战争手段解决两种制度之间的矛盾，而是通过和平竞赛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赫鲁晓夫说，“列宁的和平共处原则，是我国对外政策的总路线，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旗帜，是所有各国人民期望的目标。让理智战胜狂妄，让解决国际生活中争论问题的谈判方式代替危险的‘实力较量’的方法吧”，<sup>②</sup> “和平与和平共处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和平共处不单纯是没有战争，不是战争与战争之间的暂时的、不稳固的停战，这是两个对立的社会制度的共处，它建立在相互放弃用战争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的基础上”。<sup>③</sup> 1960年1月，赫鲁晓夫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指出，“我们主张每一种社会制度在和平发展过程中显示出自己的优越性，让每个国家的人民自己选择拥护哪一种社会制度”，“和平共处——这意味着意识形态对立的国家应该彼此和平共处，彼此并肩存在、共处。‘共处’这个词就是这样来的。如果世界上只有一种意识形态，在所有国家里只有同一种的社会制度，那么，就不会存在敌对的制度了，就根本不会产生我们现在所谈论的那种共处问题了。那时，只是生存，而不是共处了”。但世界上存在两个阵营，“这两个阵营的国家的政策是建立在完全不同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和平共处的问题，也就是说，如何使世界免遭在本质上敌对的两种体系之间，这两种体系占统治地位的两类国家之间发生军事冲突的灾难这一问题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必须努力使两种制度之间不可避免的斗争变成只是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变成和平竞赛——或者用资本家更容易理解的言论说——竞争。因此每一方都尽可能地向人们显示自己的优越

① 《列宁主义的和平共处方针》，载（苏）《共产党人》1957年第11期，第5页。

② 《真理报》，1962年12月13日。

③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0页。

性，但是，应该排除用战争作为解决这种争端的手段。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所理解的共处”。<sup>①</sup> 两种制度的和平共处可以说是一种现实的选择，赫鲁晓夫的目的是为社会主义在和平经济竞赛中战胜资本主义创造有利条件。

为了改善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赫鲁晓夫也采取了许多切实行动，与美国等国家达成协议，从奥地利撤军，推动日内瓦谈判，改善与美国的关系，他甚至开创先例，成为首访美国的苏联最高领导人。但是，和平共处并没有像赫鲁晓夫宣称的那样成为苏联外交的总路线，实际上仍是一种策略手段，赫鲁晓夫的思想中仍存在许多“左”的色彩。

### “左”倾色彩浓厚的“三和路线”

赫鲁晓夫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他对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充满信心，正如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所说：“我会见过的一些苏联领导人一贯坚信，资本主义已注定灭亡，而俄国的共产主义将统治全世界。这种发展的结果对他们来说是完全肯定的。在长时间的谈话中，赫鲁晓夫曾一再努力使我明白这一点。‘你们是注定要灭亡的，’他一再试图叫我记住，‘而我们将统治全世界！’我相信他确实是一本正经的。”阿登纳得出的结论是：“从其国土的广袤、它的专制政体以及这个国家里的共产主义狂热性来看，我认为这些还将在长时间内对其他各国人民构成巨大的危险，它不仅是肉体的，而且是精神的，对这种危险人们还戒备得不够。”<sup>②</sup> 1960年1月赫鲁晓夫在最高苏维埃的报告中仍强调：“正在取代腐朽资本主义社会的是一种新的、公正的社会，这种社会能为每一个劳动者保证平等条件和一切福利。在这种新社会的大道上开满了自由、平等、富裕和平和的美丽花朵，它的胜利的进军是阻止不住的。历史发展的规律就是这样。”赫鲁晓夫的儿子说，在与肯尼迪会谈时，“父亲向美国总统证明，过不了多久，苏联就会把美国远远抛在后面，资本家将会哀求着允许他们进入社会主义，什么条件都行”。<sup>③</sup>

---

① 《赫鲁晓夫言论》第14辑，第55页。

② 《阿登纳回忆录》（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57页。

③ （俄）谢·赫鲁晓夫：《导弹与危机——儿子眼中的赫鲁晓夫》，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442页。

赫鲁晓夫对社会主义的过分自信和对资本主义的盲目否定，制约了苏联的改革，是其改革只在原地打转。这是其改革走不出斯大林模式的重要原因。

在苏共看来，两种制度之间关系的主调仍是斗争。意识形态上从来没有过，现在也不可能有和平共处，意识形态上可以斗争，但国家关系要和平，“不能把意识形态斗争问题同国家之间的关系混淆起来，必须保持在意识形态斗争的阵地上，而不是在国际关系上使用武力”，<sup>①</sup>“任何一种社会过程，包括国际事件在内，在阶级社会里必定带有阶级性，而这些事件的制造者即不同阶级利益总要在这一过程中得到反映……在对外政策范围内——国际关系范围内——也在持续不断地进行着不可调和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和平共处既消除不了这种斗争，也不会使这种斗争缓和，它只是把斗争限制在不容许使用武器的和平范围内。在资本主义总危机第三阶段的今天，两种意识形态——共产主义的和资产阶级的——斗争空前未有地尖锐了”，<sup>②</sup>“决不能把有利于国家间和平共处的让步同原则上的让步，同涉及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意识形态的本质的让步混淆起来。这里既根本谈不到什么让步，也根本谈不上什么迁就。如果要在原则上让步，在意识形态问题上让步，那么，这将意味着滚到我们的敌人的立场上去。这将意味着政治上的质变，对工人阶级事业的背叛。谁要是走上这样的道路，谁就是走上了背叛社会主义事业的道路，当然就应该对他开火，展开无情的批评”。<sup>③</sup>和平共处不等于承认资本主义的稳固性，也不意味着两制可以“永久共居”。为此，赫鲁晓夫建立了华沙条约组织，制造了第二次柏林危机，修筑了柏林墙。

苏共仍过高估计自身的实力，过低估计资本主义的生命力，没有认识到两种制度共存的长期性。苏共强调现时代是以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为主要内容的，是两个对立的社会体系斗争的时代，是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革命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崩溃、殖民主义体系消灭的时代，是越来越多的人民走上社会主

---

① (苏)安·安·葛罗米柯主编：《和平共处——苏联对外政策的列宁主义方针》，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204页。

② (苏)安·安·葛罗米柯主编：《和平共处——苏联对外政策的列宁主义方针》，第101页。

③ (苏)尼·赫鲁晓夫：《没有武器的世界——没有战争的世界》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版，第337页。

义道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胜利的时代。<sup>①</sup> 资本主义从上到下，包括它的经济制度、国家制度、政治和意识形态，陷在不可避免的瓦解过程中。它已无可挽回地失去了控制人类大多数的权力。现在决定人类历史发展的主要内容、主要方向和主要特点的，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是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力量。苏共相信：“垄断资产阶级就是用核武器也不能阻挡历史发展的确定不移的进程。人类已经认清资本主义的真面目。成亿的人已经看到，资本主义就是经济混乱和周期性的危机、经常性的失业和大批人的贫困、生产力极度浪费的制度，就是一直带着战争威胁的制度。人类不愿意也不会容忍历史上已经过时的资本主义体系。”<sup>②</sup> 苏共仍信奉斯大林时期制造的这些教条，看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的新发展与新变化，更没有现实地解释为什么柏林墙这边的居民不顾性命地往西方跑，而西方人却不向往社会主义的天堂。

为了与美国进行和平竞赛，苏联开始与美国争夺第三世界。斯大林时期对第三世界关注较少，赫鲁晓夫把争取不发达国家当成与资本主义进行和平竞赛，争取社会主义在全球胜利的重要内容。非洲的殖民地的革命燃起了关于世界革命的崇高理想，加纳的恩克鲁玛、几内亚的塞古·杜尔都宣布自己忠于马克思主义，得到了苏联的大力支持。输出革命，扩大社会主义势力范围，与美国争雄，把自己看成是社会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头儿，恶化了苏联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

### “三和路线” 成效有限

如果苏共真正奉行“三和路线”，按事务本身的逻辑，应该把主要注意力放在解决本国人民生活问题上，把发展战略的重心放在国内，而不是与美国的争夺上。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赫鲁晓夫虽然说和平竞赛，但在实践中仍与美国针锋相对，双方在中东、拉美展开了公开争夺。当1959年古巴发生革命之时，卡斯特罗并未公开宣布自己的主张，他的弟弟宣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赫鲁晓夫很高兴，因为社会主义革命就在美国的眼皮底下发生了。苏联在经济、政治、军事上等多方面大力支持古巴。赫鲁晓夫把保卫古巴看成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阵营威信

<sup>①</sup> (苏)瓦·达·索科洛夫斯基主编：《军事战略》，战士出版社1980年版，第390页。

<sup>②</sup>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1402—1403页。

的问题，努力向拉丁美洲人民证明，苏联是可以依靠的，为此他冒险向古巴运送导弹。但是，事情发展的结果使赫鲁晓夫看到，卡斯特罗并不完全听命于莫斯科，也许会把苏联引向战争，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苏联在古巴安装导弹的军队擅自打下了一架U-2飞机，让赫鲁晓夫十分紧张，他担心苏美间会因此发生战争。苏联最后作出让步，从古巴撤走了导弹。对于赫鲁晓夫来说，“10月份的这13天是意味深长的。一个时代结束了。一个一切靠武力解决或以武力相威胁的时代结束了。过去是以武力对抗武力。现在任何一场危机都可能导致相互毁灭”。<sup>①</sup>但赫鲁晓夫并没有因此在发展核武器上止步，而是加大了发展核武器和军事工业的步伐。

苏联的军事工业仍在快速发展，下表反映了苏联军事工业综合体生产能力的变化情况（1956—1965）<sup>②</sup>：

表1 苏联军事工业综合体生产能力的变化情况（1956—1965）

|           | 企业数   |       | 企业工人数（万人） |        | 总产值（以1964年价格计算，亿卢布） |         |
|-----------|-------|-------|-----------|--------|---------------------|---------|
|           | 1956年 | 1965年 | 1956年     | 1965年  | 1956年               | 1965年   |
| 国防工业部     | 210   | 196   | 111.18    | 111.85 | 293.65              | 483.6   |
| 航空工业部     | 220   | 192   | 97.22     | 123.14 | 271.50              | 426.62  |
| 造船工业部     | 135   | 188   | 38.3      | 55.1   | 157.00              | 275.33  |
| 无线电技术工业部  | 216   | 290   | 38.3      | 80.66  | 104.60              | 345.40  |
| 电力工业部     |       | 204   |           | 39.11  |                     | 153.90  |
| 通用机械制造工业部 |       | 62    |           | 43.40  |                     | 143.39  |
| 总计        | 781   | 1132  | 285.00    | 453.2  | 826.75              | 1828.24 |

在1956—1965年的十年间，“骨干”军事工业的数量增加了50%，其工人数也增加了50%多，按可比价格计算，其总产值增加了21倍。<sup>③</sup>战前就存在的

①（俄）谢·赫鲁晓夫著，郭家申等译：《导弹与危机——儿子眼中的赫鲁晓夫》，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684—685页。

② 资料来源：俄罗斯国家经济档案馆，全宗4372，目录76，卷宗320，第5页。

③ Смонов Н. С. Военно - промышленный комплекс СССР в 1920—1950 - е годы: темпы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оста, структура,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и управления. М., 1996. С. 294.

立足于备战的苏联经济畸形结构不但没有得到纠正，反而进一步强化。1940年重工业占整个工业产值的比重为61.2%，1955年上升到占70%，1960年这一比例达到72.5%。<sup>①</sup>其结果首先导致了民用消费品产量的降低。

为了达到在和平竞赛中战胜资本主义的目标，苏共强调：“目前主要的是，要不断发展社会主义国家和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争取使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在绝对产量方面超过资本主义体系。这将是社会主义的伟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胜利。第一个走上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道路的我国所取得的成就，正在促进并加速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中的其他国家向共产主义前进。”<sup>②</sup>但苏联在经济上与美国进行的竞赛成效不佳。



1959年10月9日，赫鲁晓夫在大会上发表演说。（新华社稿）

① Тимошина Т. М.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М., 2000. С. 310.

②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19页。

1956年苏共二十大所制定的第六个五年计划，规定五年内工业产量增加65%，其中生产资料生产增加70%，消费品的生产增加大约60%。在这一计划执行的过程中，1959年苏共二十一大批准了发展国民经济的七年计划，修改了第六个五年计划。七年计划提出了要在3—4年时间里使苏联的肉、黄油、牛奶产量赶上美国，说明赫鲁晓夫认识到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性。但是，赫鲁晓夫急于求成，这一计划是极不现实的，因为1956年美国生产了1600万吨肉，苏联只生产了750万吨，二者的差距不是短时间内能消除的。很快，在畜产品产量上赶上和超过美国的口号变成了一句空话，成了历史的笑柄。

从1960年开始，苏联开始实行七小时和六小时工作制，从1960年10月1日起开始取消赋税，实行了8年制义务教育。“通过为劳动人民服务的公共设施来提高人民的福利。”国家用于社会保险金、优抚金、助学金、免费教育和免费医疗及其他公共设施的开支，从1958年的2150亿卢布增加到1959年的2300亿卢布。在赫鲁晓夫执政的10年里，工人的平均名义工资从1953年的67.9卢布增长到1964年的98.7卢布，差不多提高了50%。1965年与1960年相比，每千人的电视机拥有量从22台增至67台，电冰箱从10台增至29台，洗衣机从13台增至59台。居民的食品结构有所改善，10年间肉的需求量增长了70%，鱼增加了29%，油增加了34%。从1956年起实行新的退休制度，给所有在国有经济部门工作的工人、职员以物质保障，1959年有2000万人拿到了养老金，比战前的40年代高4倍。<sup>①</sup>赫鲁晓夫加快了住宅建设，尽管赫鲁晓夫时期建筑的住宅质量不高，后来被称为“赫鲁晓夫的贫民窟”，但是，对于缺少住房的人来说，这总比没地方住好。改善居住条件的人，1952年有540万人，1954年有650万人，1956年有780万人，1957年有1010万人，1958年有1150万人，1959年有1260万人，1960年有1200万人，1961年有1130万人，1962年有1120万人，1963年有1100万人，1964年有1030万人。<sup>②</sup>拨给工厂土地，让工人自行解决食品不足的问题，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一些好转，但与苏联的国际地位仍是极不相称的。

赫鲁晓夫对农业很重视，增加了对农业的投入。1954—1955年国家

---

<sup>①</sup>（俄）奥·列依鲍维奇：《改革与现代化（1953—1964）》，彼尔姆1993年版，第154、155、159页。

<sup>②</sup>《1970年苏联的国民经济》，莫斯科1971年版，第545页。

投资有 344 亿卢布，比整个第四个五年计划时期高 38%。用于发展农业的支出占国家预算支出的比重从 1950 年的 7.6% 增加到 1955 年的 18%，1953—1954 年对农业的投资增加了 3 倍。<sup>①</sup> 同时，减少了农业税，提高了农产品收购价格，扩大了农民的宅旁园地，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了一些好转，但是，他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斯大林时期形成的“剪刀差”，从 50 年代末开始，赫鲁晓夫又开始往老路上走，大搞集体农庄合并运动，缩小宅旁园地，阻碍了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农产品价格背离价值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如果说 1928 年购买一公斤糖要卖 7 公斤小麦，那么 1962 年要卖 14 公斤小麦，1965 年 2 月则要卖 15—16 公斤。<sup>②</sup>

从 60 年代初开始，苏联的经济状况不佳，食品的价格开始提高，引起了人们的不满，甚至出现了大规模的骚乱。1962 年 6 月 1 日赫鲁晓夫发表电视讲话，宣布提高一些商品和其他畜牧产品的价格，其中肉价提高 30%，黄油价格提高 25%。苏联部长会议向人民发通告称：这是临时性的措施，待食品丰富后，价格会降下来。但人民不相信，既不信苏联的食品将会丰富，也不相信价格将会下降。

在新切尔卡斯克、南方的亚历山德罗夫和中部的穆罗姆以及哈萨克的铁木尔套，工人们自发地举行了抗议集会，但大都化解了。新切尔卡斯克电气机车厂 2 月份提高了工作指标，导致工人工资下降，物价又要提高，工人当然不满，工人开始罢工，厂长傲慢无理，激怒了工人，工人提出的口号是“我们要吃肉，要吃黄油，要提高工资！”6 月 2 日，他们打着旗帜，排队向市委大楼行进，手里拿着列宁像和鲜花，声势很大。石油机械厂和第 17 工厂也有工人加入进来，人数达到 5000 多人。当地领导求助于军队，游行越过了设置的封锁线，双方发生冲突。“根据对 1962 年 6 月 1—2 日在新切尔卡斯克流血事件的调查材料，这次总共死亡 25 人，50 多人受了枪伤，20 多名平民被打死和打伤。在冲突中受伤的 86 名军人中有 9 名被送进了医院。”<sup>③</sup> 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发生这样的事，是令人痛心的。

---

① Тимошина Т. М.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М., 2000. С. 307.

② Хрестоматия по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истории (1946—1995). М., 1996. С. 77.

③ (俄) 谢·赫鲁晓夫：《导弹与危机——儿子眼中的赫鲁晓夫》，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508 页。

下表反映了1965年，也就是赫鲁晓夫刚刚下台时，苏美人均消费物质财富的情况（单位：美元，苏联也按美国价格计算）<sup>①</sup>。

表2 1965年苏美人均消费物质财富情况

|              | 苏联  | 美国   | 苏联是美国的百分比 |
|--------------|-----|------|-----------|
| 用于消费的物质财富总和  | 564 | 1542 | 36.6      |
| 其中：食品，包括酒精饮料 | 325 | 505  | 64.3      |
| 食品，不包括酒精饮料   | 258 | 439  | 58.8      |
| 非粮食类商品       | 168 | 905  | 18.5      |

下表反映了1965年苏联和美国工业工人的实际收入情况（以美元为单位）。

表3 1965年苏联和美国工业工人的实际收入

|                              | 苏联    | 美国    | 美国是苏联的倍数 |
|------------------------------|-------|-------|----------|
| 工业中工人的平均工资                   | 121.7 | 423.2 | 3.5      |
| 退休金、补贴、免费教育、医疗和其他支付和优惠       | 80.2  | 57.5  | 0.7      |
| 算上退休金、补贴、免费教育、医疗和其他支付后的月平均工资 | 201.9 | 480.7 | 2.4      |
| 纳税                           | 10.0  | 43.2  | 4.3      |
| 扣除包括附加支出的税收后的平均月工资           | 191.9 | 437.5 | 2.3      |
| 考虑到失业者                       | 191.9 | 422.1 | 2.2      |

从中可以看到，苏联人的生活水平、消费水平远不及美国。

苏联宣传说：“用国际法上的话来说，和平共处要求遵守各国人民自决的原则，这意味着每个民族不仅有权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各国人民不仅有权按自己

<sup>①</sup> 俄罗斯国家经济档案馆，全宗1562，目录33，卷宗6378，第69—81页。转引自Хрестоматия по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истории (1946—1995). М., 1996. С. 82—83.

的意愿来选举政府，而且当一国人民认为旧的社会经济制度已成为过去而应该选择新的社会经济制度的时机已经到来的时候，有权更迭这种制度。”<sup>①</sup>但是，这只是指的社会主义阵营以外的国家，当东德、匈牙利、波兰发生危机时，苏联并没有让那里的人民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而是进行干涉，包括直接出兵。一直到1986年，苏联都在宣传和平共处是阶级斗争的特殊形式。这种解释意味着苏联的领导人首先关心阶级的利益，也就是关心世界范围内“工人事业”的胜利，这种解释使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人怀疑苏联对建立互不干涉内政和承认各国人民独立解决各自事务权利的诚意。

值得注意的是，苏共仍人为地缩小和平共处的适用范围，仍把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排除在和平共处之外。由于赫鲁晓夫只把和平共处看成是阶级斗争的特殊形式，和平共处被当成了非和平共处、军事冲突、战争的对立面，其目的是战胜资本主义，所以不适用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至于说到社会主义国家，它们之间没有对抗性的矛盾，没有斗争和仇视……因此将‘共处’一词用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上未必恰当。在它们之间的关系中起作用的是友好和互助的原则，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sup>②</sup>认为把和平共处原则应用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是摒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团结一致的学说，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实质远远超出了和平共处原则的范围。“这种相互关系是特殊的相互关系，它不可估量地更为广阔、更为深刻，其基础是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这种国际主义为建立只是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所固有的新型的国际关系开辟了广阔天地。”<sup>③</sup>

总之，“三和路线”作为赫鲁晓夫的对外政策理论，既有新的东西，更有旧的痕迹。赫鲁晓夫强调战争不是时代的主要特征，强调避免战争，发展经济，是符合时代要求的；他注意到了核战争对人类的危险，强调和平共处的必要性和长期性，努力争取和平，也产生了积极影响。但是，他仍然用阶级斗争观点评价国内外事物，把和平共处看成是阶级斗争的特殊形式，其原则出发点不是各国的利

---

①（苏）安·安·葛罗米柯主编：《和平共处——苏联对外政策的列宁主义方针》，第202—203页。

②（苏）尼·赫鲁晓夫：《争取持久和平与和平共处》，莫斯科1958年，第106—107页。

③（苏）安·安·葛罗米柯主编：《和平共处——苏联对外政策的列宁主义方针》，第62页。

益平衡，而是力量平衡，仍奉行追求军事实力的政策；把和平共处建立在意识形态对抗的基础上，与和平竞赛相联系，当成社会主义对抗资本主义的手段，结果必然否定和平共处是普遍的国际关系准则，把阶级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损害了其他国家的国家利益；仍然坚持不切实际的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对苏联所处社会发展阶段估计过高，对资本主义生命力估计过低，经常强调资本主义的危机和灭亡的必然性，导致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命力估计不足，忽视其经验，不能很好地借鉴和吸收资本主义有益的东西。赫鲁晓夫的理论仍带有“左”倾色彩和那个时代的烙印。

## 49. 如何看待赫鲁晓夫提出的全民国家和全民党问题？

郑异凡

1961年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新的苏共纲领，这个纲领正式提出了“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的理论。纲领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保证了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但是在建立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它本身也发生了变化，随着剥削阶级的消灭，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职能——镇压剥削阶级的反抗这一职能也就消亡了。无产阶级专政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从国内发展的任务看，它在苏联已不再必要。“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产生的国家，在新的阶段即现阶段上已变为全民的国家（общенародн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变为表达全体人民的利益与意志的机构”，“作为全民组织的国家将保存到共产主义取得完全的胜利”。<sup>①</sup>“由于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由于苏维埃社会的一致的加强，工人阶级的共产党已经变成苏联人民的先锋队，成了全体人民的党（партия всего народ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扩大了自己的指导作用。”<sup>②</sup>

赫鲁晓夫在关于党纲的报告中对此作了高度评价，他说：“党的纲领草案中提出并解决了共产主义理论与实践中的一个新的极其重要的问题，即工人阶级专政的国家转变为全民的国家，这种国家的性质和任务以及它在共产主义下的命运的问题。全民的国家——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的新阶段，是社会主义国家组织

---

<sup>①</sup>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44—245页。

<sup>②</sup>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第275页。

转变为共产主义社会自治的道路上的极重要的里程碑。”<sup>①</sup>又说：“作为工人阶级政党而产生的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成了全体人民的党。”<sup>②</sup>

“全民国家”问题的出现，不是赫鲁晓夫或少数人灵机一动的产物，而是苏联官方关于苏联社会发展阶段提法的变动所必然提出来，并且需给以恰当回答的问题。

我们知道，国家是个历史范畴，有其发生、发展以至消亡的过程，在它发展的每个阶段都会出现该阶段国家的性质、职能问题。在无产阶级推翻了资产阶级的统治之后，建立了性质截然不同的专政，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剥削者的专政，这时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但是往下发展，问题就出来了。无产阶级专政完成了镇压剥削阶级反抗，并最终消灭了资产阶级以及其他一切剥削阶级的任务之后，这个专政的性质起不起变化？这个专政还有保留的必要没有？

这个问题不是20世纪60年代初赫鲁晓夫第一次提出的，早在30年代中期，苏联讨论并通过斯大林宪法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已作为现实问题提出来了。

在1930年代中期，斯大林宣布苏联消灭了阶级（实际上只是消灭了剥削阶级），这就出现了当时国家的性质问题。这个问题在马列主义经典著作里没有现成的答案。斯大林承认：“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某些一般原理还不完备、不充分。”<sup>③</sup>显然，套用现成的公式已经不行，必须针对苏联社会主义发展的实际去寻找答案。1936年联共党刊《布尔什维克》杂志发表了哲学家帕·弗·尤金的《论社会主义下的国家》一文，提出“人民国家”的概念，文章明确宣布“我们苏维埃国家已成为社会主义的、人民的国家”。<sup>④</sup>这是国家学说中的一个新提法。

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的理论中，“人民国家”历来是个被否定的概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批判过“人民国家”的说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说法也被中国用来批判赫鲁晓夫的“全民国家”理论。不过简单地

---

①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第353—354页。

②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第390页。

③ 《斯大林文选》上册，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51页。

④ 《布尔什维克》1936年第8期。

引用某些语录并不能解决问题，必须对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一些论述结合当时的历史情况以及他们对社会主义的看法作全面的分析。

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曾批判过“人民国家”的用语，其基本出发点就是国家是阶级镇压的工具，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任务是镇压剥削阶级的反抗，而一旦阶级被消灭，国家也就随之消亡，因此不可能出现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人民国家”，因为在可以谈论“人民国家”的时候，国家已经消亡。恩格斯给倍倍尔的信中说得很清楚：“既然国家只是在斗争中、在革命中用来对敌人实行暴力镇压的一种暂时的设施，那么，说自由的人民国家，就纯粹是无稽之谈了：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需要国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sup>①</sup>

根据当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的设想，恩格斯的这段话是完全正确的。当时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是没有阶级、没有国家的社会。“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国家就会自行解体 and 消失。”<sup>②</sup> 因而国家只存在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

当然，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绝不会是毫无组织的处于无政府状态的社会，因此马克思还提出一个“共产主义社会中的国家制度”<sup>③</sup> 问题。但马克思在这里说的已不是“国家”（Staat），而是换了一个词“国家制度”（Staatswesen，俄文是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ь）。这个词有两种含义：国家制度；国家机构、组织、措施等等的总和，国家之一切事宜。《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三版除上述解释外，还加了一个说法：“指社会政治组织体系（机制）”。第二种解释和《苏联大百科全书》的解释可能更接近马克思的本意。马克思是这样提问的：“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国家制度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换句话说，那时有哪些同现在国家职能相类似的社会职能保留下来呢？”<sup>④</sup> 可以看出，他所说的要保留的不是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而是同现在国家职能相类似的某些社会职能。

这里提出的实际上是国家社会职能的变化问题。当然，他没能对这一问题作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32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2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14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14页。

出直接的回答，正如列宁后来说的，“要对这个问题作出科学的解答，只有依靠确实证明了的科学材料。”<sup>①</sup> 在马克思的时代，由于缺乏社会主义的实践，是不存在这种确切证明了的科学材料的，这个问题有待于以后的实践去回答。

1917年在十月革命前夕，列宁对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探讨，尽管这时候无产阶级尚未执掌政权，但是通向政权的大门已清晰可见，而不像马克思和恩格斯那时那样遥遥无期。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一方面充分肯定了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他已着手探讨共产主义社会初级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下的“国家制度”问题。

过渡时期需要国家去镇压资产阶级以及其他剥削者的反抗，对于这一点，列宁重申了巴黎公社失败的教训，提醒人们千万不要忘记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是资产阶级消灭之后，即社会主义社会里还要不要国家？列宁认为，“国家正在消亡，因为资本家已经没有了，阶级已经没有了，因而也就没有什么阶级可以镇压了。”如果问题仅仅到此为止，那么列宁的观点就同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一模一样了。但是列宁并没有就此止步，他紧接着指出：“国家还没有完全消亡，因为还要保卫那个确认事实上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权利’。要使国家完全消亡。必须有完全的共产主义。”<sup>②</sup> 这恐怕是马克思主义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在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之前，即在社会主义社会还需要国家，并且不是从阶级矛盾的角度，而是从社会主义社会本身的内在矛盾（存在“资产阶级权利”）的角度论证了国家存在的必要性。这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一个发展，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下的国家制度”这一提法的进一步阐释和发挥。

如果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下还需要国家，那就必然会出现这个国家的性质问题。在一个没有阶级，至少是没有剥削阶级的社会里，这是什么样的国家？继续把它叫做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否合适？《国家与革命》中没有明确提出这个问题，虽然社会主义阶段仍保留国家这一论断本身就包含有这一问题。列宁也没有回答这一问题，因为在那时这仍然是个理论问题，而不是个迫切需要解决的实践问题。俄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列宁所关注的是如何坚持无产阶级专政，镇压阶级敌人的反抗的问题，并且列宁把消灭阶级问题看得比较复杂，需要的时间比

---

① 《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3卷，第188页。

② 《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3卷，第196页。

较长，是一个需要几代人努力才能解决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列宁自然不会花精力去设计未来的国家组织。不过，列宁也曾偶尔议论过这类问题。1920年布哈林在《过渡时期经济学》中曾谈到无产阶级专政的消亡问题，他写道：“一旦无产阶级取得决定性的世界胜利，无产阶级国家制度的增长曲线就开始急剧下降。因为国家政权的主要的和基本的任务，如镇压资产阶级的任务，将会结束，外部的强制规定开始消亡：首先消亡的是陆军和海军，这是最尖锐的对外强制工具；其次是惩罚和镇压机关、系统；然后是劳动的强制性质，等等。”列宁对布哈林描述的消亡次序提出了相反的看法，他在旁批中问道：“是不是相反呢？起初是‘然后’，然后是‘其次’，最后是‘首先’。”<sup>①</sup>也就是说，先消亡的是劳动的强制性质，然后是惩罚和强制机关，最后是陆海军。这大概是因为列宁估计到社会主义国家将同帝国主义国家长期并存，因此有可能先消亡的只能是对内的强制，而不是对外强制的工具陆海军。这里多少包含了只要帝国主义存在，社会主义的国家，包括它的军队就仍然需要保留这一科学的结论，至少可以从这段批语中引申出这一结论。

当然无产阶级国家的发展趋势仍然是大家关心的一个理论问题。1926年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加里宁在一篇对外宣传的文章《苏维埃政权在为实现民主做些什么》中对此作了这样的预测：“无产阶级国家将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资本主义关系的逐渐消除、资本家的消失而逐步转变为具有新的含义和内容的全民国家（общенародн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sup>②</sup>这恐怕是在苏联最早出现的“全民国家”的设想了，不过由于苏联当时所处的环境，这也还是理论上的推测，而不是现实的总结。

20世纪30年代初，斯大林通过全盘集体化两三年内就消灭了“富农”阶级，也消灭了农村的小农经济。这样到30年代中期，苏联就宣布国内不存在剥削阶级，也不再存在作为小生产者的农民阶级了。按照哲学家尤金的说法，当时存在的是“社会主义工厂的劳动者”，“农村社会主义经济的劳动者”和“社会

---

<sup>①</sup> 见列宁：《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论》，人民出版社版1976年第2版，第63页。

<sup>②</sup> 《加里宁选集》第2卷，莫斯科1960年版，第75页。

主义国家的机关劳动者”。这种说法如果成立,<sup>①</sup> 那就出现几个问题:一是在没有剥削阶级需要镇压的情况下,还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观点,在这种情况下显然不再需要专政了。二是还要不要国家?这个问题列宁回答过,为了维护“资产阶级权利”,国家是需要的(当然还有组织生产等经济职能和文化教育职能)。斯大林后来补充一点,只要存在帝国主义,那么不仅社会主义社会下需要国家,在共产主义社会下仍然需要国家的存在(斯大林这样说是打算单独一国搞共产主义建设)。三是既然还需要国家,那么这是什么性质的国家?斯大林没有回答。公布苏联宪法草案后,有人说这是“放弃无产阶级专政”。斯大林在回答这种批评时只说,这是“扩大工人阶级专政的基础,使专政变成对社会实行国家领导的更灵活、因而也更强大的体系”。<sup>②</sup> 他的理论家尤金对此作了明确无误的回答:“毫无疑问,在一个由城乡自由劳动者组成的社会里,国家只能是这些劳动者的国家,即人民的国家。”<sup>③</sup> 应该说这个回答是合乎逻辑的,并且这已不仅仅是理论的探讨,而是对当时苏联社会的现实状况作出的理论概括。尤金的说法没有遇到公开的反对。官方的提法称,当时的苏联国家为“工人和农民的社会主义国家”。1936年《布尔什维克》杂志为十月革命十九周年发表的社论写道:“我们的国家是工人和农民的社会主义国家。它的创造性的、改造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我们的国家完全有权代表全体人民,因为它体现全体人民的利益,保障全体苏联公民有幸福的今天和更美好的未来。”<sup>④</sup> 尽管这里没有用“人民国家”的说法,但说的仍然是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全体人民的国家。从此以后,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提法就越来越少见。

赫鲁晓夫在解释苏共第三个党纲的时候说:“自然,当社会主义在我国完全地和最终地获得了胜利之后,当我们进入了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时期的时候,使无产阶级专政成为必要的那些条件消失了,这一专政的国内任务完成了”,苏联的工人阶级“主动地把自己专政的国家变成全民的国家”。<sup>⑤</sup>

① 当时苏联社会是否已发展到这一阶段,这是需要专门探讨的问题,已超出本文的任务了。

② 《斯大林文选》上册,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98页。

③ 《布尔什维克》1936年第8期。

④ 《布尔什维克》1936年第21期,第3页。

⑤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54页。

赫鲁晓夫宣布“全民国家”比斯大林时期的理论家尤金晚了四分之一世纪。所不同的只是尤金把专政限定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这倒是符合马克思当年的提法的），而赫鲁晓夫则把它延长到他所说的社会主义完全胜利之时，并且把它正式写入了苏共党纲。

看来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国家的发展得经过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到人民（全民）国家，然后再逐步消亡这么几个阶段，而不是从无产阶级专政直接进到国家消亡阶段。原因很简单，在社会主义社会一要防御帝国主义，二要保护事实上的不平等这一“资产阶级权利”。但是由于国内已没有阶级需要镇压，因此这个国家就不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了。这里有一个问题尚需澄清一下：人民国家有没有镇压和强制的职能呢？应该说这种职能依然存在，不同的只是实行强制的对象已不是一个阶级，而是人民内部社会秩序的破坏者。列宁在谈到共产主义社会“没有人需要加以镇压了”时特意解释说，“这里所谓‘没有人’是指阶级而言，是指对某一部分居民进行有系统的斗争而言”。<sup>①</sup>至于有个别人捣乱，需要对之实行强制，加以镇压，这是可能也是必然的，但对付这种人已无须无产阶级专政，用不着实行镇压的特殊机器，通过正常的司法程序即可。事实上无论是宣布“人民国家”的30年代的苏联，还是把“全民国家”载入党纲的60年代的苏联，都从来没有在实践上放弃过镇压和强制。尤金的文章在宣布“人民国家”之后，随即用大量篇幅论述了强制及强制机关的必要性。而在实践上镇压得还非常厉害，例如30年代的大清洗。这反映了斯大林在理论上的不彻底性，或理论上的矛盾。他一方面宣布苏联已消灭剥削阶级，有时甚至说已经消灭了阶级，同时却又提出随着社会主义的胜利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的理论，在国内实行大规模的镇压。为了自圆其说，只好把所有被镇压的人都当成帝国主义国家派遣的“间谍”、“特务”，从而在“人民国家”里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

赫鲁晓夫上台后，一方面批判了斯大林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理论，一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为斯大林时期被错误镇压的人物恢复名誉，这是很得人心的措施。但是，如果仅仅就事论事为某些公民恢复名誉，那么广大人民群众，甚至高级干部，仍然会缺乏安全感。这就有必要从更高的高度论证国家政权的性质，把组织管理社会主义经济的职能提到首位，而把广大人民群

---

<sup>①</sup> 《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3卷，第192页。

众心有余悸的镇压职能压缩到最低限度，这在当时是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的。因此“全民国家”理论在苏联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客观形势的需要，它有利于安定人心，促进全国安定的局面。不过就实际效果而言，这个口号对苏联的政治生活并没有起多大的积极的或消极的作用。赫鲁晓夫和他的继任者们并没有从“全民国家”出发，采取切实的措施让广大人民群众参加国家的管理，行使当家做主的权利，而这一根本问题不解决，任何“全民国家”的口号都只能是口号而已。

在阶级社会里的国家，首先是镇压的工具，但是它的职能并不限于镇压，它还起“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的作用。<sup>①</sup>现代国家更是大量介入国家的经济生活，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发挥调节经济的作用。剥削阶级社会是如此，无产阶级执政之后情况更是如此，除了镇压职能外，国家的社会经济职能在迅速发展，并且随着阶级矛盾的逐步缓和，经济职能的作用变得越来越大，而作为阶级统治形式的国家的性质也随着逐步发生变化。国家在不同阶段的职能，特别是性质的变化，是值得认真研究探讨的问题，正确认识当前国家的职能和性质，有助于准确作出决策，避免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方向性的错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苏联的“全民国家”的理论和实践是值得我們认真研究的。

解释了“全民国家”问题之后，再谈“全民党”问题就比较容易了。

政党同国家一样属于历史的产物，是阶级社会里阶级斗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因此，它也有一个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的开头有一段充满辩证法的议论，他说：“像一个人一样，有他的幼年、青年、壮年和老年。中国共产党已经不是小孩子，也不是十几岁的年青小伙子，而是一个大人了。人到老年就要死亡，党也是一样。阶级消灭了，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一切东西，政党和国家机器，将因丧失作用，没有需要，逐步地衰亡下去，完结自己的历史使命，而走到更高级的人类社会……必须懂得，消灭阶级，消灭国家权力，消灭党，全人类都要走这一条道路的，问题只是时间和条件。”<sup>②</sup>

毛泽东的这段话尤其适用于年岁更大的苏联共产党。苏联共产党成立于1898年（当时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通过的第一个党纲规定党的任务是推翻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4卷，第170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73页。

沙皇专制制度，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十月革命胜利后在俄国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1919年通过第二个党纲，这是一个建立在无产阶级专政基础上的开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的纲领。这个纲领到30年代末宣布苏联已经建成社会主义的时候，已显得过时，需要予以修改。联共中央曾经打算制定新的党纲，但一直没有能够实现。直到1961年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才通过第三个党纲。这时离宣布消灭阶级的1936年的“斯大林宪法”已经有四分之一世纪。在这段期间国家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党的性质是不是也应当发生变化呢？过去共产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党，现在还能继续称无产阶级专政的党吗？赫鲁晓夫这样描绘苏共的三个纲领依据的阶级力量：“在党通过第一个纲领的时候，跟着它走的是不大一批先进工人。在党通过第二个纲领的时候，跟着它走的是工人阶级、劳动农民的基本群众。现在，跟着党走的则是全体苏联人民。”<sup>①</sup>所以苏共第三个党纲写道：“工人阶级的共产党已经变成苏联人民的先锋队，成了全体人民的党。”<sup>②</sup>

从1936年斯大林宣布消灭了剥削阶级，建成了社会主义之时起，苏联的国家性质，党的性质也必定随之变化，根据社会发展实际重新定义定性是不可避免的。如何定义定性尚可推敲，据此给苏共戴上“修正主义”的帽子则是缺乏充分根据的。

不过，从现实情况看，苏联那时是否已经进入全面开展共产主义建设的阶段，甚至苏联是否已经建成社会主义，苏联的社会主义是否像所说的那样已经取得“完全的最终的胜利”，都是问题。例如国内的镇压虽然已不具有斯大林时代那样的规模，但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而实施的镇压并不罕见，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关进集中营的人少了，进“精神病院”的多了；反革命罪少了，“流氓罪”多了，驱逐出境的少了，吊销护照的多了……总之，还是变着花样压制“异端”。这个国家是不是能够说是代表全体人民的国家，还是个问号。官僚特权阶层最终形成，在俄国现在通常把这个阶层叫做“在册权贵”（номенклатура），即由上级任命的登记在册的享有特权的高级官员。这时的国家实际上首先代表的是“在册权贵”的利益，他们享有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特权，把持和侵占社会主

---

①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98页。

②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75页。

义资产，剥夺人民的自由平等权利，他们同广大人民群众之间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这是导致苏联解体的重要因素之一。不过这已经是另一个问题了，有待专文阐述。

在结束本文的时候，还需要重申，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无论国家还是政党，都有其发生、发展以至消亡过程，国家和政党是不能永远存在的，否则，共产主义就来不了。这就是辩证法！

## 50. 中苏关系破裂原因何在？

左凤荣

1950年2月，中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国站在了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阵营一边，成了社会主义阵营的成员，与苏联形成了结盟关系。但是，从50年代中期起，中苏关系逐渐降温，后来又不断恶化，到1960年中苏同盟关系实际上已经破裂，此时中苏同盟虽然在形式上还存在，但无论是党的关系，还是国家关系都已经恶化了。关于中苏同盟破裂的原因，我国领导人和大多数学者的解释是：根本原因是苏联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对待中国的不平等态度，“真正的实质问题就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sup>①</sup> 戈尔巴乔夫认为，中苏关系破裂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毛泽东不接受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揭露个人崇拜的方式和反对个人崇拜，另一个原因是中国对苏联拒绝提供核技术不满，苏联不向中国提供核技术，是因为赫鲁晓夫有了不扩散核武器的意识，同时他也想保持对中国的影响。<sup>②</sup> 也有学者指出，“中苏关系最终破裂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范式和准则中的某种结构性失衡，而不应仅仅去追究哪一方的责任。”<sup>③</sup> 但作者没有对此进行详细论证。

中苏同盟本身就是一种不平等的国家关系，不可能充分尊重双方的国家利

---

<sup>①</sup>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5页；刘克明：《中苏关系40年的历史教训》，载《东欧中亚研究》2000年第1期。

<sup>②</sup> Горбачёв М. С. Реформы и жизнь.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в 2 - х тт. Кн. 2. М., 1995. С. 430—431.

<sup>③</sup> 沈志华：《赫鲁晓夫、毛泽东与中苏未实现的军事合作》，载《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5期。

益，因此也难以维持长久。中苏同盟破裂的直接原因，用毛泽东的话说是“他们想影响我们，我们想影响他们”。<sup>①</sup> 苏联影响中国从共产国际成立后就已开始，新中国成立后实行“一边倒”方针，宣传“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从1956年苏共二十大揭露了斯大林问题后，破除了对苏联和斯大林的迷信，中国本应该走一条符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实际上却把斯大林模式的做法部分地在中国以放大的方式又实践了一遍，政策总的趋向是“左”。毛泽东相信，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只有一种，中国共产党所坚持的才是正确的，并要求苏共完全接受中共的看法与主张，这等于向苏共的国际共运领袖地位提出了挑战，这是苏共不能接受的。两党关系的恶化自然会影响到两国的关系。

### 中苏同盟不协调，埋下隐患

与美国争夺势力范围，是苏联建立社会主义阵营的初衷；中国倒向苏联一边，也是出于对付美国威胁的考虑。但是，这种同盟关系并不是两个平等国家的联盟，它首先是建立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基础上的。

从斯大林开始，所谓的国际主义原则并不是以是否有利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为判断标准，而是以是否有利于苏联，是否有利于维护苏联的利益为判断标准。斯大林把苏联的利益等同于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各国共产党人的国际主义义务变成了“保卫苏联”，苏共把对苏联的态度作为检验革命者和国际主义者的标准。1926年斯大林就说：“苏联无产阶级的‘民族’任务和国际任务融合为一个共同的任务，即从资本主义压迫下解放各国无产者的任务；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利益和各国革命运动的利益完完全全融合为一个共同的利益，即社会主义革命在世界各国的胜利。”<sup>②</sup> 斯大林这一观点实际上是把苏联的利益凌驾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利益之上，其他国家的革命利益必须服从苏联一国的国家利益。谁决心“绝对地、无条件地、公开地和忠实地捍卫苏联，保卫苏联，谁就是革命者，因为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国家。谁决心绝对地、毫不动摇地、无条件地捍卫苏联，谁就是国际主义者，因为苏联是世界革命运动

---

① 《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283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5页。

的基地，不捍卫苏联，就不能捍卫并推进世界革命运动”。<sup>①</sup> 各国共产党必须放弃自己的“民族”任务，首先服从和服务于所谓的国际任务，紧跟苏联这个“旗手”走。

在实践上，斯大林一直都要求国际共运服从和服务于苏联的战略需要，苏共的政策就是各国共产党的政策，而不管这一政策是否符合各国的实际。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提出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反法西斯斗争上来，1939年8月23日苏德条约签订后，苏联转而要求各国共产党放弃反法西斯斗争，实行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政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甚至说，政府在反德国法西斯的战争中胜利，对于人民是最危险的事。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共产国际政策才转为要求各国共产党加强反法西斯斗争，但反对建立工农政权，压制南斯拉夫共产党，要求南共考虑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1943年，斯大林为了便于与罗斯福、丘吉尔谈判，巩固它们之间的联盟并保证在战后瓜分世界，突然宣布共产国际解散。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东欧民主国家的建立，苏联于1947年组建了社会主义阵营。阵营内的各国实际上是一种不平等的结盟关系，历史经验证明，这种范式的国家关系是没有生命力的：

第一，它遵循的基本原则是所谓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承认一个中心，实际上不允许苏联之外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有自己完全的独立性。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者，各国的政策要与苏联协商和协调，国家之间关系的范式就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南斯拉夫由于不接受苏联的领导而被开除出了社会主义阵营。

第二，由于这些国家实行的都是党政合一的体制，原来在共产国际内部形成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被从党际关系的层面扩大到了国家关系的层面，而且党的关系实际上凌驾于国家关系之上。

第三，这种联盟关系是建立在不成立的假定基础上的。毛泽东曾概括说：“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为指导思想，以我们两国根本利益的完全一致为基础的伟大的中苏同盟是一种掌握了政权的无产阶级的完全新型的

---

<sup>①</sup> 《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47页。

同盟关系。”<sup>①</sup>实际上指导思想可以一致，但两国的根本利益很难一致，两国面临的问题不同，国际战略目标有异，对许多问题的看法自然也不同，两国关系只能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发展，力求完全一致是不可能的。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代替维护国家利益的原则，也是行不通的，国家利益是民族国家全体成员的利益，如果无产阶级政党作为执政党不能在国际社会很好地维护本国的国家利益，很难保证其政权的合法性。

在两国交往中，每个国家的决策者都应该追求自己的国家利益，但是，在社会主义阵营内，各国都不能很好地追求自己的国家利益，包括苏联在内。作为盟主，苏联相对而言可以得到更多的利益，但也必须考虑和协调与其他国家的利益，否则，很难保持住社会主义阵营领导者的地位。1956年波匈事件后，苏联不得不调整 and 改变在东欧的政策。就中苏关系而言，苏方存在着追求绝对的国家利益还是相对的国家利益的问题。当中国对苏联没有威胁时，苏联可以不在乎对方获得了多少利益；当苏联认识到中国积累力量可能会对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提出挑战时，苏联就会不只关心自己的利益，而更关心中国的获益。无论是在经济领域还是在安全领域都是如此。

在5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刚刚从战争中走出来，很弱，对苏联不是威胁，苏联尽其所能给了中国大量援助。但是，随着中国经济恢复工作的完成，“赶英超美”目标的确立，再指望苏联毫无保留地对中国进行援助也就不可能了。就安全利益而言，双方结成军事同盟是为了对付美国的威胁，为此双方可以在军事上进行合作，一旦美国的威胁下降，双方进行军事合作的基础就会下降，而作为两个大国又是邻国的中国与苏联之间的安全利益矛盾就会暴露出来。社会主义阵营这种国家关系范式，没有为调整国家间的利益关系提供条件，当50年代中苏利益关系发生变化后，联盟就很难再维持下去了。

### 中苏两党在许多重大理论问题上产生分歧

如果从是否有利于维护国家利益的角度衡量，中苏同盟的破裂对双方都是一种损失，对中国害处更大。双方并没有从维护国家利益出发处理两国的关系，而

---

<sup>①</sup>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9页。

更多是从意识形态利益出发的，苏共为了捍卫其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地位，中共则认为苏共已经背离了马列主义，要帮助它克服修正主义，结果双方互不相让，关系越来越僵，最后两党关系恶化，导致了中苏联盟的破裂和两国关系的交恶。

## 苏共的“变”与中共的“不变”之间产生了矛盾

1974年5月25日，毛泽东在回答英国首相希思的提问“中苏分歧主要是在思想方面呢，还是苏联的强权政治所致？主席如何判断苏联对中国的目的和动机？”时，说：“中苏分歧要从一九五四年开始算起。因为一九五五年阿登纳到莫斯科，赫鲁晓夫就对阿登纳说，中国不得了了。阿登纳回忆录上是这么写的。”<sup>①</sup>

众所周知，1954年国庆节，赫鲁晓夫率领苏共代表团访华，这是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首次见面，赫鲁晓夫把这次庆典看成是巩固与中国友谊的大好时机，为此，他给中国带来了一份厚礼：帮助中国新建15项工业企业和扩大原有协定规定的141项企业设备的供应范围；向中国提供5.2亿卢布的军事贷款；将中苏合营的新疆石油公司、新疆有色及稀有金属公司、大连造船公司和中苏民航公司中的苏联股份完全转让给中国；加强中苏科技合作；帮助中国修建兰州—乌鲁木齐—阿拉木图铁路及组织中蒙、中苏铁路联运；苏军主动提前从旅顺海军基地撤退。根据最新档案资料，这一丰厚的礼物是赫鲁晓夫努力争取来的。<sup>②</sup>应该说此后中苏之间的关系要比斯大林时期平等得多，但是，为什么毛泽东却认为，中苏分歧是从1954年开始的呢？我想，一个合理的解释是毛泽东对于赫鲁晓夫这个年龄、资历、理论水平都不高的世界社会主义的领袖，是不认同的。

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马林科夫、赫鲁晓夫等新一届苏共领导人对许多问题的认识都在发生变化。他们开始强调两种制度的共存、提出用和平手段解决争端、扩大与西方国家的经济联系等等，苏共改变了斯大林时期与西方僵硬对抗的方针，表示要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加强国际合作。这种变化突破了一些传统观

---

①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603页。

② 参见沈志华：《赫鲁晓夫与苏联归还旅顺海军基础》，《党史研究资料》2002年第9期。

念。他们的某些观点与主张中共是不认同的。在1954年赫鲁晓夫第一次访问中国时，他和毛泽东也谈到了其中的一些问题。赫鲁晓夫事后说：“我记得1954年我从中国回来以后曾告诉过我的同志：‘同中国人的冲突恐怕难以避免了。’我是根据毛泽东的各种言论得出这个结论的。”<sup>①</sup>在赫鲁晓夫与毛泽东的第一次会见中，赫鲁晓夫对毛泽东提出的“百花齐放”方针、“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以及毛泽东在对比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军事实力时，只比较双方人数的说法，都是不同意的。

在赫鲁晓夫上台时，中共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已同斯大林时期有了明显不同。1953年7月结束的朝鲜战争，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也提高了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1954年中国参加日内瓦会议，与苏联一道，对促进印度支那问题的解决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不再满足于做小兄弟，开始在阵营中明确表达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与主张。

195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毛泽东对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评价是不满意的。1956年4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这篇文章是毛泽东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多次讨论和修改写成的。该文以支持苏共二十大，反对个人崇拜的姿态，正面讲了一些道理。文章认为斯大林的一生，既有严重的错误，也有伟大的功绩。文章强调，实现共产主义是空前伟大又空前艰巨的事业，在这艰巨的斗争过程中，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问题在于共产党能够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改正自己的错误。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否认存在矛盾就是否认唯物辩证法，斯大林的错误就证明了这一点。斯大林犯错误的主要原因在于他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违背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但应该以历史的观点看待斯大林，对他的正确方面和错误方面作全面的分析，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列主义者，是一个犯了几个错误而不自觉为错误的马列主义者。

很显然，中苏对斯大林的错误及其产生原因的认识是有分歧的。苏方强调斯大林的主要错误是破坏法制、镇压无辜，产生错误的主要原因在于斯大林个人性格的多疑；中方反对把斯大林的错误只归结于斯大林个人，更强调客观原因。对苏共二十大提出的和平过渡、和平共处等问题，中国领导人也持保留态度。

---

<sup>①</sup> 张岱云等译：《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665页。

苏共二十大对国际共运造成了很大冲击，出现了波匈事件，中国共产党认为赫鲁晓夫犯了错误，并试图帮助苏共纠正这一错误。中共反对苏联干涉波兰，积极推动苏共干涉匈牙利。1956年波匈事件平息后，毛泽东认为帝国主义正利用苏共二十大掀起反苏反共高潮，而苏联领导人软弱无力，中国共产党应该做中流砥柱，力挽狂澜，不仅要顶住这股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逆流，而且要反击。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日报》于1956年12月29日发表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这篇文章也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写成的，并经毛泽东亲自修改而定稿的。全世界议论纷纷的斯大林问题仍是文章论述的主要问题。中共领导人认为，对斯大林的评价，也就是对苏联社会主义的评价，因此，对斯大林要作认真分析。毛泽东指示：第一，先讲他的正确方面，不能抹煞；第二，再讲他的错误，强调必须纠正；然后，第三讲实事求是，不能全盘否定，这叫做“三娘教子”，三段论法。要讲他犯错误的社会原因，如搞社会主义没有先例，国内外情况复杂等等，但不宜过分强调。因为列宁在世时的社会条件不比斯大林好，但他没有犯斯大林那样的错误。在同样的社会条件下，有人可能多犯错误，有人可能少犯错误。这里，个人因素，个人主观是否符合客观，起着重大作用。赫鲁晓夫一棍子把斯大林打死，结果他搬起石头打了自己的脚，帝国主义乘机打他一棍子，还有铁托和陶里亚蒂从中间打他一棍子。斯大林这把刀子，赫鲁晓夫丢了，别人就捡起来打他，闹得四面楚歌。我们现在写这篇文章，是为他解围，方法是把斯大林这把刀捡起来，给帝国主义一刀、给修正主义一刀，因为这把刀子虽然有缺口，但基本上还是锋利的。<sup>①</sup>

《一论》、《再论》有纠正赫鲁晓夫错误的意图，其观点主张明显不同于苏共二十大报告，实际上委婉而又明确地批评了苏共二十大的观点。但是，由于当时赫鲁晓夫在国内外处境都比较困难，不能不重视同中国的关系，因而没有对此提出异议，相反，还接受了其中的一些主张，对待斯大林的态度有所缓和，苏共专门作出了《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力图全面评价斯大林。但是，苏共与中共的分歧并没有因此消除。

---

<sup>①</sup> 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27页。

## 互相干涉内政，加剧了矛盾

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说：“现在中苏之间就有那么一些矛盾。他们想问题做事情的方法，他们的历史习惯，跟我们不同。因此，要对他们做工作。”<sup>①</sup>毛泽东明显针对赫鲁晓夫说：“当了第一书记，也是一种利，也容易使头脑发昏。昏得厉害的时候，就得用一种什么办法去臭骂他一顿。这回恩来同志在莫斯科就不客气了，跟他们抬杠子了，搞得他们也抬了……如果他们硬是这样走下去，总有一天要统统捅出来。”<sup>②</sup>

1957年中苏两国关系发展还是比较顺利的。1957年10月15日，中苏签订《国防新技术协定》，苏联承诺在发展原子能工业和核武器方面向中国提供援助。



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会议，1957年11月6日在莫斯科隆重举行。图为毛泽东在会议上讲话。新华社记者侯波摄（新华社稿）

①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82页。

②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83页。

中共对苏共做工作的成效主要体现在莫斯科会议所通过的《莫斯科宣言》上。1957年11月，即苏联十月革命40周年之际，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云集莫斯科，就国际形势，加强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之间的团结，以及国际共运一些重大问题交换意见。毛泽东亲率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赫鲁晓夫等苏联党政高级领导人隆重接待了毛泽东一行，并且安排中共代表团住在克里姆林宫，毛泽东住的则是过去沙皇的寝宫，而其他国家的代表团则大都住在莫斯科近郊的别墅里。这也说明苏共对中共还是另眼相看，十分重视的。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1957年11月20日在克里姆林宫的叶卡捷琳娜大厅邀集苏联各界著名人士和毛泽东主席会见。图为毛泽东和赫鲁晓夫在谈话。新华社记者侯波摄（新华社稿）

1957年11月14—16日和16—19日，先后举行了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和64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毛泽东在这两个会议上都作了即席发言，这是其他国家领导人没有享受的待遇，毛泽东的发言充满了乐观主义情绪，他表示不要害怕战争，不要怕死人，盛赞苏联人造卫星上天，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sup>①</sup>这一言论与苏共和其他共产党的看法是有区别的。毛泽东竭力主张“以苏为首”，但更强调红花需要绿叶扶。

对苏共事先草拟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莫斯科宣言》）草案只提和平过渡，未提非和平过渡，而且把和平过渡仅说成是“在议会中争取多数，并把议会从资本主义专政的工具变为真正的人民政权的工具”，中共代表团明确反对，并对宣言提出了修正草案。<sup>②</sup>为了进一步陈述自己的观点，中共代表团还向苏共中央提交了《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提纲》。中苏两党经过反复讨论、协商，并征得兄弟党代表团的同意，使《宣言》得以通过。该《宣言》实际上是中苏两党观点妥协与调和的产物。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同原草案相比，《宣言》做了两点重大修改：一是在指出和平过渡的可能性的同时，也指出了非和平过渡的道路；二是在谈到取得议会中稳定多数的同时，又强调开展议会外的广泛的群众斗争。此事说明，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已经高出了除苏共之外的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并且已经能影响苏共。

这次会议并没有真正解决中苏间的分歧，用毛泽东的话说，在这次会议上有两个问题没有讲，一个是和平共处问题，他认为不能把和平共处作为共产党的对外政策的总路线，“因为这里还有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相互支持、相互帮助的问题；还有执政的共产党，也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支持世界革命的问题，声援资本主义国家没有执政的共产党的问题；还有支持殖民地、半殖民地独立运动的问题；还有支持整个国际工人运动的问题。总之，还有一个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问题。”<sup>③</sup>另一个问题是对社会党的问题，“我们对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的报

---

①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95、296、291页。

② 详细情况可参阅崔奇著：《我所亲历的中苏大论战》，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47—54页。

③ 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52页。

告中对这个问题的说法很有意见。我们觉得他们对欧洲的社会党、社会民主党的分析，离开了阶级分析，是不合乎马克思主义的”。<sup>①</sup>

同时，苏共尽管接受了中共的某些建议，但是双方之间的分歧并未消除，毛泽东在会上所讲的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东风压倒西风，出现核武器的情况下仍然存在战争危险等观点与看法，赫鲁晓夫等人是有保留的。在国内政策和理论问题上，毛泽东越来越“左”，1957年反右，1958年搞“大跃进”，在苏联领导人看来，中国有取代苏联之意。同时，苏共对中国的“大跃进”也是持否定态度的，赫鲁晓夫在1959年苏共二十一大上不点名地批评了中国。

### 国家利益的冲突使矛盾爆发

中苏关系的破裂，国家战略利益的不同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这也是导致双方产生意识形态分歧的重要原因。

中苏关系的恶化是从赫鲁晓夫提出建立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开始的。<sup>②</sup> 1958年4月18日，苏联国防部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致函中国国防部部长彭德怀，提出由中苏合资在中国建立特种长波收发报无线电台，以便他们与在远东的太平洋舰队联系。6月12日，中国政府答复同意建台，但是必须由中方承担一切费用并拥有全部主权，苏联以贷款的方式帮助，并提供技术援助，建成后中苏两国可以共同使用。赫鲁晓夫对此不满，并不甘心。7月21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以赫鲁晓夫的名义向毛泽东提出苏联的另一项建议：苏联的沿海自然条件不利于充分发展核潜艇舰队，要求利用中国沿海的良好条件建立中苏共同舰队。毛泽东对苏联的建议十分反感，他严肃地问尤金：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这么搞？……首先要明确方针：是我们办，你们帮助？还是只能合办，不合办你们就不给帮助，就是你们强迫我们合办？”

尤金走后，毛泽东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第二天，也就是7月22日，毛泽东又把尤金找来，借题发挥，指责苏联，发泄他长期对苏联领导人的不满。毛泽

<sup>①</sup> 吴冷西：《十年论战》（上），第153页。

<sup>②</sup> 有关这一问题的详细情况，请参阅沈志华：《赫鲁晓夫、毛泽东与中苏未实现的军事合作》，《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5期。

东针对苏联不肯给中国海军核潜艇技术材料，而提出建立共同舰队的做法，十分生气地说：“海军核潜艇是一门尖端科学，有秘密。中国人是毛手毛脚的，给了我们，可能发生问题。”“你们就是不相信中国人，只相信俄国人。俄国人是上等人，中国人是下等人，毛手毛脚的，所以才产生了合营的问题。要合营，一切都合营，陆海空军、工业、农业、文化、教育都合营，可不可以？或者把1万多公里长的海岸线都交给你们，我们只搞游击队。你们只搞了一点原子弹，就要控制，就要租界权。此外，还有什么理由？”毛泽东越说越激动，由近及远，他说：“你们就是不相信中国人，斯大林很不相信。中国人被看做是第二个铁托，是个落后的民族。你们说欧洲人看不起俄国人，我看俄国人有的看不起中国人。”中苏两党只是口头上的兄弟党，“实际上是父子党，是猫鼠党”。“在我们的关系中，也有过问题，主要与斯大林有关。有三件事：第一，两次王明路线。王明是斯大林的后代。第二，不要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第三国际已经解散了，还下命令，说我们不与蒋介石讲和、打内战的话，中华民族有灭亡的危险，然而我们没有灭亡。第三，我第一次去莫斯科时，斯大林、莫洛托夫、贝利亚就向我进攻。”

毛泽东还说：“取消4个合营公司，撤销旅顺基地的是赫鲁晓夫同志，斯大林在世时，要在我们这搞罐头工厂。我回答他说，你们给我们设备，帮助我们建设，全部产品我们都给你们。赫鲁晓夫同志夸奖了我，说我回答得好。但现在又搞海军‘合作社’？你们搞海军‘合作社’，怎么向全世界讲话？怎么向中国人民讲话？”“这次提所有权的问题，使我想起斯大林的东西又来了。”赫鲁晓夫“批评了斯大林，现在又在搞斯大林的东西。”“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你可以告诉赫鲁晓夫同志，如果讲条件，我们双方都不必谈。如果他同意，他就来，不同意，就不要来，没有什么好谈的，有半个小指头的条件也不成。”

从这一谈话中我们看到，实际上毛泽东把长期积压的对斯大林的不满都发泄到了赫鲁晓夫头上，并借机对苏联的某些做法提出了批评。他说：“有些顾问，可以定个期限。如军事、公安两个部门的首席顾问，一直没有个期限，换来换去，也不通知我们，也不征求我们的意见。好比说派大使吧，你尤金走了，派另

外的人来，如果不和我们商量，能行吗？这种做法是不对的。”<sup>①</sup>

如果把这两件事放到当时中苏是军事同盟这一框架下来考察，此事并不奇怪。中国领导人的激烈反应是苏联领导人没有预料到的，用赫鲁晓夫的话说：“我们这个想法对我们自己和对中国都是同样有利的。我们和中国人毕竟有着保卫社会主义国家、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目标”，“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要侵犯中国的主权，干涉中国的内政，影响中国的经济，或者伤害它的民族尊严”。<sup>②</sup>他们认为在同一个阵营里，这种军事合作是正常的。苏联想通过这种方式在中国沿海为苏联海军舰队谋求一处停靠基地，主要意图是对付美国，并不是有意控制中国。赫鲁晓夫后来说：“我们当时提出要在中国建立潜艇基地这件事，也许做得急了点。”<sup>③</sup>但对作为从帝国主义压迫下获得独立的中国领导人来说，苏联的做法无异于帝国主义国家，是难以接受的。

1958年7月31日，赫鲁晓夫与毛泽东会谈。赫鲁晓夫为消除中国误解，明确表示苏联从来没有想共同指挥中国的舰队，长波电台的所有权属于中国。这并没有消除中国领导人的不满。1958年8月3日，长波电台的事按中方意图顺利解决，中苏签订了《关于建设、维护和共同使用大功率长波无线电发信台和专用远距离无线电收信中心的协定》。海军技术援助问题也得到了解决，1959年2月4日中苏签订了《关于苏联政府给予中国海军制造舰艇方面新技术援助的协定》，中国得到了期望中的援助。但是，中苏关系并未好转。

毛泽东从此事中所得出的结论是：“赫鲁晓夫看起来是个庞然大物，但是可以顶，银样镗枪头，一顶就把他顶回去了。所以在原则问题上，我们不能让步，一定要顶，而且是可以顶回去的。”<sup>④</sup>赫鲁晓夫认为他在被中国人牵着鼻子走，对中国很不满，“我们不希望他们获得这样的印象，好像我们是他们驯服的奴隶，他们要什么，我们就给什么，而不管他们如何侮辱我们”。<sup>⑤</sup>

此后两国都开始自行其是，195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事先没有通知苏方，苏方虚惊一场，怕被中国拉下水，跟美国开战。在中印冲突问题上中国

---

① 参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23—330页。

② 《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398、399页。

③ 《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第401页。

④ 吴冷西：《十年论战》（上），第168页。

⑤ 《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第413页。

对苏联偏袒印度的立场不满。1958年5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现代修正主义必须批判》一文,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批判现代修正主义,把南斯拉夫共产党纲领草案定性为“反马列主义的、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实际上许多观点是针对苏共的。1959年6月,苏方宣布废除1957年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赫鲁晓夫访美和到中国来推行他的和平计划,更加剧了中国领导人的不满,在1959年10月2日中苏两党领导人举行会谈时,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在回国途中,赫鲁晓夫在海参崴发表讲话,说中国“像好斗的公鸡那样热衷于战争,这是不明智的”。1959年12月,毛泽东所拟定的在杭州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提纲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大发展在中国,这是毫无疑义的”,“赫鲁晓夫们很幼稚。他不懂马列主义,易受帝国主义的骗”,“他有两大怕:一怕帝国主义,二怕中国的共产主义”,“他的宇宙观是实用主义的,这是一种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他缺乏章法,只要有利,随遇而变”,“共产主义竞赛,不平衡是客观规律,不依人的意思(志)而存在。对表论是反马列主义的。提出对表论,表明了他们的极大恐慌”。<sup>①</sup>毛泽东为赫鲁晓夫罗列的问题主要有,“(一)父子关系;(二)不愿学生超过先生;(三)留一手;(四)搞颠覆活动”,“(1)骄傲自大;(2)领导犯错误;(3)歪曲马列;(4)动摇国际主义原则;(5)对和平悲观”。<sup>②</sup>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要帮助赫鲁晓夫走上正确道路的意图是十分明显的。

1960年1月7—17日,毛泽东主持的政治局常委会议在上海召开,在谈到对苏共、赫鲁晓夫的看法时,大家提的意见有:要充分批判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可以帮助苏联党、帮助赫鲁晓夫认识他们的错误。要高举马列主义的旗帜,高举1957年《莫斯科宣言》的旗帜,大力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充分发挥我们理论上、哲学上和政治上的优势。<sup>③</sup>在同年2月召开的华沙条约组织首脑会议上,中苏对国际形势的观点尖锐对立,赫鲁晓夫表示不再理会中国的声音,他们要走自己的路。1960年4月中国接连发表《列宁主义万岁》、《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和《在列宁的旗帜下团结起来》等三篇文章,实际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01—602页。

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第604页。

③ 吴冷西:《十年论战》(上),第242页。

上“对苏共的修正主义观点进行了系统的批驳”，<sup>①</sup> 揭开了中苏论战的序幕。中国领导人认为，这三篇文章“公开发表以后会得到列宁的故乡以及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积极反应，会使他们认真思考当前的世界形势和根据形势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针、政策，以及怎样来维护列宁的革命学说，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sup>②</sup> 但是，事态并没有朝这个方向发展，1960年6月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苏共在给中共中央的《通知书》中，驳斥了《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的观点。从此，中苏两党开始公开相互攻击，双方在时代、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等问题上各说各的理，都认为自己才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只强调分歧，看不到共同点，关系越来越僵。1960年7月，苏联政府召回援华专家，中断对华援助项目，两国关系破裂。

### 马克思主义“正统”之争加速中苏关系彻底破裂

1960年6月，在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赫鲁晓夫在与中共代表团会谈时对中共的政策进行攻击，还在给中共代表团的信（事先已下发给兄弟党）中对《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的观点进行反驳，继续捍卫苏共二十大的观点，在关于时代、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向社会主义过渡等问题上阐述自己的主张，并批评中共的主张。在大会发言中，赫鲁晓夫严厉指责中共“要发动战争”，是把“帝国主义垄断资产阶级的旗帜拿起来”，“对苏共采取托洛茨基方式”等，并威胁中共，若不与苏共采取一致立场，苏共就把分歧公开。以彭真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与苏共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6月26日，中共向会议散发书面声明，点名批判了赫鲁晓夫，明确指出双方存在的根本分歧，指责赫鲁晓夫破坏了协商一致的原则，在国际共运中开了恶劣的先例。

由于中苏两党都是执政党，两党关系的破裂必然影响到两国之间的关系。7月16日，苏联突然宣布在一个月內撤走在中国的全部1390名专家，这与当初斯大林对南斯拉夫所采取的方式如出一辙。苏联政府片面撕毁了与中国签订的343个专家合同及其补充书，废除了257项科学技术合作项目。赫鲁晓夫此举给中国

① 吴冷西：《十年论战》（上），第352页。

② 吴冷西：《十年论战》（上），第265页。

国民经济制造了巨大困难，使中国的40多个重工业、国防工业部门，250个工厂的建设中途停顿。

1960年11月，中共派出了以刘少奇为首的党政代表团飞抵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3周年庆典和出席8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在苏斯洛夫送给中共代表团的长达6万字的文件中，充满了对中共的攻击。刘少奇在与赫鲁晓夫私下会晤中反复告诫他：你们不要在这次会议上谴责中共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这样不好。我们是带着团结友好的愿望来的，我党参加会议的精神就是以互谅的协商精神达成协议，使81国会议开好，并在这一基础上改善中苏关系。在刘少奇的严肃而真诚的表态后，赫鲁晓夫的态度有所缓和，最后经过协商和必要的妥协，会议通过了《莫斯科声明》和《告世界人民书》。但是，在1961年10月召开的苏共二十二大上及其会后，中苏间的争论又趋激烈。

赫鲁晓夫邀请毛泽东出席苏共二十二大，毛泽东不愿前往，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与会。到达莫斯科的第二天，周恩来便前往列宁、斯大林墓，敬献花圈，在献给斯大林的花圈上写着：“献给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同志”，实际上表明了中共对斯大林的态度和评价。在苏共二十二大上，为了国内斗争的需要，赫鲁晓夫偏离原来的主题，再次掀起了批判斯大林的高潮，同时攻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共站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一边，反对苏共的做法。中苏两党在会谈中也各持己见，周恩来遂率代表团提前回国。中苏两党关系全面恶化。

1961年正值中国困难时期，苏联逼迫中国连本带息偿还抗美援朝战争时期苏联支援中国军队的军用物资所欠下款项，本息共计14.06亿新卢布。<sup>①</sup>苏联人自己拒不偿还反法西斯战争时期欠美国的租借物资款，理由是他们已用鲜血偿还了。可是，朝鲜战争是中、苏、朝三国共同对付美国侵略的战争，苏联出武器，中国则付出了牺牲30万人的代价。赫鲁晓夫向中国逼债，实在没有道理。但中国人是有骨气的，中国于1964年全部偿清了这笔款项。

更为严重的是，1962年4—5月间，苏联通过其驻新疆的机构和人员，通过发放侨民证，策动中国边民叛逃苏联。从阿尔泰、塔城、博尔塔拉到伊犁，20几个县、300多公里的中苏边境上，滚滚的人流从几个口岸涌入苏联。白天，苏联当局派大客车、卡车接运，用广播指示方向，晚上，则用探照灯指路，共有

---

<sup>①</sup> 陈之骅主编：《苏联史纲（1953—1964）》，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4页。

67000 余人逃到苏联。此事震惊了世界，中国政府对要求去苏联者一律放行，新疆军区欢送了帮助策动边民外逃并申请去苏联的乌鲁木齐军区副参谋长、少将祖龙泰耶夫和伊犁军区司令员、少将马尔国夫，与他们一起走的还有 40 多名校、尉级军官。苏联借此攻击中国，吹嘘自己。

赫鲁晓夫等苏共领导、苏联报刊和受苏联影响的许多国家的共产党纷纷发表文章，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与中共观点相同的一些党，中苏两党的论战与分歧继续升级，开始了公开而全面的论战。中共组织专门的写作班子，从 1962 年 12 月至 1963 年 3 月陆续发表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在莫斯科宣言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分歧从何而来——答多列士同志》、《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和《评美国共产党的声明》等 7 篇文章（这些文章都经过了毛泽东的审定），<sup>①</sup> 系统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观点，答复和批评苏共及受其影响的党。论题包括了时代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和平共处问题、民族解放运动、世界革命与国际共运，等等。这场空前绝后的大论战导致了国际共运和许多国家共产党的分裂。

1963 年 2 月，赫鲁晓夫提出停止论战，寻找两党间克服分歧和相互谅解的途径，但是，双方难以找到共同语言。3 月 30 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要求制定现阶段国际共运的总路线，信中全面阐述了苏共中央对国际共产主义总路线的看法，宣布继续奉行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所确定的路线、致力于争取世界和平和和平共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等等，并建议举行中苏两党会谈。6 月 14 日，中共中央复信苏共中央，也提出了《关于国际共运总路线的建议》（即 25 条），提出了与苏共根本对立的总路线，集中批判了赫鲁晓夫的以“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全民国家”、“全民党”为主要内容的“修正主义路线”。

1963 年 7 月 5 日，中苏两党代表会谈在紧张的气氛中开始了。中共代表团团长是邓小平，副团长是彭真，团员有杨尚昆、伍修权、廖承志、刘宁一、康生、潘自力。苏共代表团由苏斯洛夫率领，成员有格里申、安德罗波夫、伊利切夫、波诺马廖夫、萨丘科夫、契尔沃年科。谈判桌成了双方唇枪舌剑的战场。

在会谈期间，苏方做了两件破坏谈判气氛的事。一是 7 月 14 日，苏共中央

---

<sup>①</sup> 详细情况可参阅崔奇著：《我所亲历的中苏大论战》，第 123—148 页。

就国际共运问题《给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公开信》发表，公开地逐条批驳中共6月14日信件提出的“25条”；二是与美国进行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谈判，赫鲁晓夫此举显然含有阻止中国发展核武器之意。邓小平在谈判桌上严厉批评了苏联的错误做法。苏中两党的会谈于7月20日结束，不但没有达成协议，双方的敌对情绪反而增强了。

此后，苏中两国的报纸杂志都发表了大量关于国际共运总路线的文章。从1963年9月6日到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先后发表了《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与发展》、《关于斯大林问题》、《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主义》、《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共9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毛泽东亲自审阅了这些文章），<sup>①</sup>判定中苏之间及国际共运分歧的实质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同坚持修正主义路线的分歧”，并认为，“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已经成为现代修正主义的主要代表，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大的分裂主义者”，赫鲁晓夫在苏联建立了“一个以他为首的修正主义集团的专政，也就是苏联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专政”。1964年4月，苏联《真理报》称中共是“叛徒”，9月，苏共在一份宣传提纲中称中国是“世界革命运动的主要敌人”。苏联方面还表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并不保证战时苏联协助中国。1964年10月14日赫鲁晓夫下台，毛泽东认为“这是他实行一套修正主义路线、方针、政策走入死胡同的结果，说明他的路线的破产”。<sup>②</sup>11月18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把赫鲁晓夫的下台说成是修正主义的大破产、大失败，实际上认为这场论战以中共的胜利而告终。这种论断显然不符合实际。

在中苏大论战中，双方都把意识形态的分歧置于国家利益之上，中共指责苏共是“修正主义”，“毛泽东所说的修正主义，其含义往往是含糊不清的。他将修正主义这个概念不断扩展，把许多不是修正主义的东西也叫作修正主义，也当

---

<sup>①</sup> 详细情况可参阅崔奇著：《我所亲历的中苏大论战》，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187—248页。

<sup>②</sup> 崔奇著：《我所亲历的中苏大论战》，第259页。

作修正主义来批判。这样，又进一步加速和加深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的‘左’的理论和政策的发展”。<sup>①</sup> 苏共则指责中共是“教条主义”，双方各不相让，甚至走到了战争的边缘，1969年在珍宝岛发生了武装冲突。中苏两国都把对方看成是自己安全的最大威胁，大力发展国防力量，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给两国的国民经济造成了严重损失。

中苏大论战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它恶化了中苏两大邻国的关系，也造成了许多国家共产党的分裂，影响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邓小平在总结这段历史的经验教训时说，“一个党评论外国兄弟党的是非，往往根据的是已有的公式或者某些定型的方案，事实证明是行不通的……各国党的国内方针、路线是对还是错，应该由本国党和本国人民去判断。最了解那个国家情况的，毕竟还是本国的同志”，<sup>②</sup> “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sup>③</sup> 这种笔墨官司，既没有用处，也没有好处。

中苏大论战对两国都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赫鲁晓夫曾尝试改革苏联僵化的经济体制，允许农民拥有自留地、自留畜，开了自由市场；中国的反修，使他不敢再走下去，政策也开始“左”倾，重新推行追求公有制规模的合并集体农庄运动，规定自留地上不得种经济作物，别墅不得盖两层，自留畜不得超过一头带小牛的奶牛，自由市场只能出售自产的多余农副产品。对中国的影响更是灾难性的，大论战为“文化大革命”作了理论上的准备。阿尔巴托夫说：“毛泽东在对苏联人进行的政治斗争中，把对我国内部事务施加影响放在优先考虑的地位。他的纲领是一个好战的斯大林主义纲领，为斯大林辩护，认为斯大林政策中最令人厌恶的方面具有历史合理性，把暴力，特别是军事力量当作主要政治工具而加以神圣化。这个政治纲领不能容忍不同意见，使马克思主义简单化和庸俗化。我们只要回想一下‘文化大革命’和‘伟大舵手’的语录就足够了。他还坚决为战争不可避免论辩护。最后是毛泽东的达到荒谬绝伦的个人迷信。”<sup>④</sup>

---

① 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304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8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1页。

④ （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第124页。

总之，中苏同盟关系的破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这种关系的特点决定的，追求国家利益与意识形态利益的完全一致，双方都不肯考虑对方的国内外处境，都想把自己的认识、理念、内外政策强加给对方；而因为这种理论和方针政策背后是本国或执政集团、甚至是主要执政者的利益而难以协调、妥协、退让，是中苏同盟破裂的深刻原因。实践教训着人们：要求不同社会主义国家制定和实行共同的对外总路线和统一的国内方针对策、体制是不可能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必须实行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各国的意识形态、执政理念、执政方略、社会模式、社会发展道路，只有由各国党和人民去选择，并在实践中判断、修正。“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间可以讨论、协调、甚至开展同志式的批评，但绝不能强加于人，更不能以大压小，以强凌弱，甚至动用武力，兵戎相见。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地重大项目《文明模式与俄罗斯外交》（项目批准号 08JJDGJW260）的阶段性成果。）

## 51. 赫鲁晓夫上台后缘何首先抓农业改革？

陆南泉

赫鲁晓夫上台后，为了要对经济体制进行重大改革，先要在国内为广大人民和干部创造一个正常的政治生活环境，摆脱斯大林时期的恐怖；其次要破除对斯大林个人的迷信，消除思想上的种种禁锢；再次赫鲁晓夫要通过错综复杂的斗争巩固自己的领导地位，掌握强有力的权力。赫鲁晓夫在围绕以上三个方面进行斗争的过程中，并不是撇开改革单打一地进行的。实际上，他一上台就着手经济政策的调整和某些初步的改革。这些对他权力的巩固也有重要的作用。而赫鲁晓夫上台后，在围绕巩固自己政治领导地位的斗争过程中，之所以很快地赢得人心，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是，他首先对农业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这样做绝不是出于他对农业的特殊爱好，而是出于当时苏联客观情况的要求。

### 苏联农业危机显现，亟待改革

赫鲁晓夫上台时面临的农业问题是十分尖锐的。由于二战后苏联没有把注意力放在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农业问题上，而是集中精力抓城市的重建与工业的恢复工作。战争期间大量从农村参加军队的农民，在战争结束复员退伍的年轻人，没有大量地回到农村的集体农庄，而是去了工厂做工。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是，苏联在战后没有对农业制度特别是集体农庄制度方面存在的严重弊端进行改革。这些因素，导致在斯大林逝世时，苏联农业处于严重落后状态。苏联平均单位面积产量从1913年至1953年就没有什么提高，仅是欧洲其他国家平均产

量的1/3。1953年的农业生产水平只达到1940年的104%。<sup>①</sup>

赫鲁晓夫在1953年苏共中央讨论农业问题的九月全会上所作的《关于进一步发展苏联农业的措施》的报告中，分析了当时农业中存在的种种严重问题。他指出：“我们还有不少落后的、甚至无人过问的集体农庄和整块的地区。在许多集体农庄和地区内，农作物的产量仍然很低。农业生产的产品率，特别是畜牧业的饲料作物、马铃薯和蔬菜的产品率提高得非常缓慢。”赫鲁晓夫在报告中，还特别指出，苏联畜牧业“发展得特别缓慢。公有畜牧业的产品率仍然低。个别州和共和国的牛奶产品率的情况特别不能容忍”。乳牛在1953年初比1941年初少350万头，比1928年少890万头。但与此同时，苏联城市人口大幅度增加，从1926年到1952年，城市人口增加了两倍以上。1940年到1952年工业产量增加了1.3倍，而农业总产量（按可比价格计算）只增加了10%。这样，就形成了农业与工业及居民对农产品需求之间极不协调的局面。1953年3月15日赫鲁晓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第四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随着劳动人民的物质福利的增进，居民的需要日益从面包转到肉类和奶类产品、蔬菜、水果等方面了。但是，正是在这些农业部门中，居民迅速增长的需要和生产的水平，在近几年来是明显地不相称的。许多重要的农业部门的落后，延缓了轻工业和食品工业的进一步发展，阻碍了集体农庄和集体农民的收入的增长。”

赫鲁晓夫还特别分析了苏联粮食问题。大家知道，马林科夫在1952年召开的苏共十九大报告中，宣布说苏联粮食问题已彻底解决。<sup>②</sup>作为苏共最高领导层的农业问题专家赫鲁晓夫，出于各种考虑，特别是在自己地位尚不十分巩固的情况下，并没有对马林科夫有关粮食问题这一不符合实际情况的结论进行批驳。但到他站稳脚跟之后，就对这一与苏联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用大量的材料揭示苏联粮食问题的真实情况。1954年1月22日，赫鲁晓夫在给苏共中央主席团的信（题为《解决粮食问题的途径》）中集中反映了他的看法。信中说：“进一步研究农业和粮食收购的状况表明，我们曾经宣布粮食问题已经解决，

---

<sup>①</sup> 参见（苏）罗伊·麦德维杰夫等著，邹子婴等译：《赫鲁晓夫的执政年代》，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2、35页。

<sup>②</sup> 马林科夫在苏共十九大上是这样讲的：“今年（1952年），谷物的总收获量达80亿普特，而最主要粮食作物——小麦的总收获量比1940年增加了48%。以前认为最尖锐、最严重的问题——谷物问题——就这样顺利地解决了，彻底而无可改变地解决了。”

这是不完全符合国内粮食供应的实际情况的。”“粮食生产现在还保证不了需求，满足不了国民经济全部需要，而国家的粮食储备量又不允许我们普遍进行数量充足的谷物产品、特别是优质谷物产品贸易和米粮贸易。由于粮食不宽余，我们只得限制粮食的出口量。”“许多州、边疆区和共和国的集体农庄在完成对国家的义务后剩下来的粮食，不能满足集体农庄在公共经济的一切需要。留给农庄的谷物饲料尤其少，而没有谷物饲料，畜牧业就不可能急剧发展。”“1940年共收购粮食二十二亿二千五百万普特，而1953年只收购十八亿五千万普特，即减少了三亿七千五百万普特。同时，由于国民经济的普遍发展，城市人口大大增加，实际工资的提高，国内的粮食消耗量正在逐年增加，国家掌握的粮食数量同粮食需求量的增长不相适应。”1953年粮食的收购量同1948年的收购量大致相等（分别为18.42亿普特与18.50亿普特），可是消费却增加了50%以上。这样，1953年的收购量满足不了国内粮食的必需消费量。这个差额不得不动用国家粮食储备粮1.6亿普特。赫鲁晓夫对此在信中说，这是绝对不允许的。由于1953年苏联粮食歉收，这就要求“农业产量需要大幅度提高，农产品的匮乏已经严重到即使农业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也难以解决城市的粮食供应，因为城镇人口的增长过于迅速”。<sup>①</sup>

应该说，斯大林逝世时苏联所面临的农业问题是极其严重的，一些苏联学者甚至指出：“再有二三年时间，就可能发生灾难性的粮食生产危机和全国性的饥荒。斯大林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在最接近他的人当中，只有一个人真正看到了这种危险，这个人就是赫鲁晓夫。”“斯大林自己对农业一窍不通，还对农民怀有一种特别的憎恶与不信任，他从来没有参观视察过任何一个集体农庄。”“其他政府官员，如日丹诺夫、马林科夫、米高扬等，比斯大林懂得更少，十月革命前，斯大林到底还在西伯利亚的一个村庄被流放了三年，而且自己种过一个小菜园。”“赫鲁晓夫出生于农民家庭，他是斯大林的政治局成员中唯一经常去农村视察的人，他常与农庄主席交谈，努力了解他们的困难。”<sup>②</sup>

苏联农业问题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已不能从十月革命前的历史原因中去寻觅了。1955年3月18日，赫鲁晓夫在萨拉托夫市举行的东南地区各州农业工

<sup>①</sup>（苏）罗伊·A·麦德维杰夫等著，邹子婴等译：《赫鲁晓夫的执政年代》，第59页。

<sup>②</sup>（苏）罗伊·A·麦德维杰夫等著，邹子婴等译：《赫鲁晓夫的执政年代》，第36页。

作会议的讲话中说：“沙皇俄国没有给我们留下多少东西。但是，同志们，自从苏维埃政权成立以来，已近三十八年了。时间不算短了。因此，再往尼古拉二世身上推诿，该觉得可耻了，他早已不在人世了。”农业严重落后是多种原因造成的，既有斯大林经济体制模式特别是农业制度严重弊端的因素对农业发展的制约作用；也有具体的农业政策因素对农业发展的破坏作用。这方面的问题甚多，如长期以来片面发展重工业而忽视农业；长期实行剥夺农民的政策；违反物质利益原则，对农产品实行高征购和低价的政策；对农村的个人副业缺乏稳定的政策；等等。赫鲁晓夫执政后，在农业方面的政策，既涉及农业制度方面的问题，也涉及农业政策。

### 以扩权为主要内容的农业计划体制改革

如果说，苏联在二战后，由于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建设规模的不断扩大，经济联系和社会生产分工的日益复杂化，以及科技的异常迅速发展，优先发展的重点不再像过去那样单一，经济情报与信息的大量增加要求作出迅速处理等，这些生产经营条件的变化，使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体制模式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之间所存在的矛盾，从原来的潜伏状态变得表面化了，变得比过去更加突出了、尖锐了，那么，这个矛盾在农业部门显得尤为复杂，对生产的阻碍作用比其他经济部门也更加严重。这是因为，农业生产总是与一个自然的再生产过程密切联系在一起，它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自然条件，因此，农业生产活动更要求因地制宜，而在斯大林时期，苏联对农业生产实行的是与工业部门相同的严格的指令性计划管理。随着30年代集体农庄制度的建立，苏联开始向各级地方机关和集体农庄下达扩大播种面积与实行农业技术改造的计划。

在斯大林逝世前，由于国家对农业生产计划安排得过死，极大地束缚了农庄、农场的主动性。对此，1953年9月3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九月全会上所作的《关于进一步发展苏联农业的措施》报告中指出：农业部门“工作中的缺点特别显著地反映在制定农业计划的工作上。计划中有许多不必要的项目，限制住地方机关、农业机器拖拉机站和集体农庄的主动性。只要指出这一点就够了，这就是分配给集体农庄的耕作业和畜牧业方面的任务总共有二百到二百五十个项目。中央计划了这样的措施：例如由杂交得来的猪的养肥工作应于什么时候结

束，播种高茎植物作物休闲地屏障的工作以及其他许多工作，等等。”“由于任务所包含的项目多，数量又太大，下面就必然要制作一大堆各式各样的报告。大批农业专家和集体农庄工作人员把精力花在制作各种各样的报告、呈文和报表上面去了。每一个集体农庄在一年中要向区农业机关交约有一万个项目报告材料。和战前相比，集体农庄报告中的项目几乎增加了七倍。”

另外，苏联对农庄实行与国营企业一样的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制度，这就忽视了农庄集体经济的特点，不尊重农庄的自主权与庄员个人的利益，在处理国家与农庄和庄员的关系时，不实行等价交换与自愿原则。

在斯大林逝世前的苏联，农业计划制度，既不考虑农业生产与自然条件密切相关的特点，也没有考虑农庄这一集体经济的特点，这样，必然形成对农业生产的瞎指挥，使农业生产违背自然规律，从而破坏农业生产。

赫鲁晓夫执政后，首先着手对农业体制进行改革，而在改革农业体制方面，首先改革农业计划制度。1955年的改革是最为重要的一次改革。这一年的3月9日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农业计划工作的办法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sup>①</sup>《决议》明确指出：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苏联农业部和农产品采购部在农业计划工作的实践中，犯有严重的缺点和错误。现行的农业计划制度过于集中，而且对集体农庄、机器拖拉机站和国营农场规定过多的指标，这种做法并非出于国家需要。为了保证国家得到各种农产品，绝不需要由中央给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布置各种作物的播种面积，计划规定出所有种类的牲畜和牲畜头数，因为这不能使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发挥主动精神来更正确、更合理地管理经济。在现行的农业计划制度下，往往导致不合理的经营管理。千篇一律地计划播种面积造成了农作物分布上的不合理现象，因为这不符各集体农庄的经济条件和土壤气候条件，不符各集体农庄积累的经营农业的经验和现有的耕作水平，并且无助于农作物总产量的提高。这种计划方式也不容许各集体农庄更符合实际地组织公有畜牧业的管理和争取提高肉、奶、蛋、羊毛及其他产品的产量。这一切限制了集体农庄和机器拖拉机站的主动精神，削弱了它们对发展农业生产的责任心和兴趣，不能刺激各集体农庄从它们使用的土地上增加产品的产量，减

---

<sup>①</sup> 《决议》详细内容可见《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经济问题决议汇编》第4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00—205页。

少了集体农庄获得高额收入的可能性。

这次农业计划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有：一是农业计划工作以商品产量为出发点，大大减少给农庄农场的计划指标，即只下达农产品采购量一项指标，其他生产计划均由农庄农场根据农产品采购任务与自己内部需要来确定，即有关播种面积和结构、牲畜种类与头数、作物单位面积产量与牲畜产品率，各种农艺措施等，由农业企业自行决定。但在执行农业计划新办法的相当一个时间里，苏联还规定：集体农庄全体庄员大会通过的作物播种计划和畜牧业发展计划应提交区执行委员会审核。如果集体农庄提出的计划不能保证集体农庄以相应的作物和畜产品完成义务交售额、机器拖拉机站工作的实物报酬额、预购合同和国家收购量，区执行委员会应建议集体农庄对计划做必要的修改；二是对农业计划制定的程序作了改变，即由过去农庄、农场从上级机关领取任务，改为直接由农庄、农场制订计划；三是对计划计算的方法也作了改变，即把过去按种植作物的公顷与饲养牲畜头数的计算方法改为按农产品、畜产品数量进行计算。

### 以提高物质利益为主要目的的农产品采购制度改革

斯大林时期，苏联实行的农产品采购制度是剥夺农民的一种重要手段，也是严重影响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它涉及一系列关系：如国家、农业企业与农业生产者三者利益的关系；工业与农业的关系；工人与农民的关系；城乡经济关系和工农联盟关系等。这些关系处理不好，不仅直接影响农业的发展，还会产生严重的社会政治影响。

斯大林逝世时，在农产品采购制度方面的问题已异常突出，已是发展农业的一个严重障碍。从农产品收购价格来说，20世纪50年代初，苏联每公斤谷物为4—8戈比，这一收购价格还是在1927—1931年间规定的，在以后的整个时期中实际上没有变动过。1952年，小麦每公斤按9.7戈比出售，马铃薯4.7戈比，蔬菜19.2戈比，牛肉20.3戈比，猪肉67.2戈比，牛奶25.2戈比，蛋每千个2卢布。集体农庄按照这种价格交售了谷物总收获量的20%左右以及几乎全部的畜产品。收获量的1/3付给机器拖拉机站。这样，致使农庄交售产品所得的收入还不够补偿生产费用。许多农庄生产1公担马铃薯的成本是40卢布，而它的收购价格仅为3卢布。1952—1953年，谷物、牛肉、猪肉和牛奶都是赔本的。

农产品收购价格不合理，还表现在价格不能反映出用于生产各种农产品的劳动消耗的实际比价。虽然1953年生产1公担籽棉的劳动消耗比生产1公担谷物只高出4.8倍，但1公担籽棉的价格却超过1公担谷物价格的37倍。用于生产1公担糖用甜菜的劳动要比生产1公担谷物少耗费38%，但糖用甜菜的收购价格却超过谷物价格的25%。还有，生产1公担肉的劳动耗费比1公担谷物大14—15倍，而1952年的肉的采购价价格仅高于谷物价格的5—7倍。

另外，农产品收购价格的不合理，还反映在与工业品、食品零售价格之间的不协调。如工业品与食品零售价格1950年与1940年相比，提高了86%，那么，正如前面提到的，而农产品收购价格在这一期间大致停留在原来水平上。<sup>①</sup>这自然使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日益扩大，严重损害农庄、农场的物质利益，从而束缚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赫鲁晓夫执政后，为了调动农庄、农场的生产积极性，贯彻物质利益原则，在农产品采购制度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第一，提高农畜产品价格。从1953年到1963年，农畜产品共提价6次。1964年与1952年相比，全部农畜产品的收购价格提高了2.54倍，其中粮食提高了7.4倍，畜产品15倍，牛奶3.55倍。

第二，实行统一的国家收购制度。随着1958年改组拖拉机站，要求对采购制度也作出改革。1958年6月，决定取消义务交售制和机器拖拉机站实物报酬制，实行按地区分别规定的统一收购价格。这种价格比义务交售价格提高了2倍。

第三，在取消义务交售制与机器拖拉机站实物报酬制前，逐步放宽农产品义务交售的定额和最后取消义务交售制。根据苏共中央九月全会（1953年）决议，苏联降低了集体农庄和庄员个人副业向国家义务交售畜产品、马铃薯、蔬菜的定额。1954年，免除了拥有个人副业的庄员、职工、渔业和手工业劳动组合成员的谷物义务交售任务。从1958年1月1日起，完全取消了庄员、职工个人副业的义务交售。

由于采取了上述措施，特别是农产品收购价格的提高，使农庄收入大大提

---

<sup>①</sup> 有关斯大林逝世时苏联农产品收购价格严重扭曲的材料，参见苏联科学经济研究所编，盛曾安等译：《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6卷，东方出版社1986年版，第521—522页。

高。如果说 1953 年农庄向国家和合作社出售种植业和畜牧业产品的收入为 41.4 亿卢布，那么 1960 年为 141.6 亿卢布，即在产品量增长 0.6 倍的情况下，收入增加 2 倍以上。这样，生产者从出售农产品中多增加了 75.4 亿卢布的现金收入。据有关材料，1952—1962 年期间，苏联全国集体农户的收入增长了 2.9 倍。

另外，由于实行了按地区分别规定的统一收购价格，缩小了苏联各共和国集体农户在收入方面的差距。1952—1961 年期间，集体农户高收入与低收入之间的差距缩小到 4 倍。<sup>①</sup>

赫鲁晓夫执政后，为了提高农业企业与农业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和加强物质刺激，除了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取消义务交售制等措施外，还勾销了农庄在义务交售和支付机器拖拉机站实物报酬方面的积欠，勾销了各农庄和庄员在畜产品方面未完成的交售量。此外，还在所得税方面实行优惠政策，并增加了对农庄的贷款，延长了贷款期限，从 1955 年起利率几乎降低了 1/2。从 1956 年起，改变了过去用于劳动日分配的大部分收入只能在经济年度年终发给农庄庄员的办法，而改为每月按庄员在公有经济中所做的全部劳动日发给预付款的办法。从 1957 年起，集体农庄开始逐步改行货币形式的报酬，到 1960 年，货币在苏联农庄庄员报酬中的比重已提高到 62%。<sup>②</sup>

### 个人副业管理制度的改革

苏联农村的个人副业，是在农业集体化过程中产生并得到不断发展的一种经济形式。个人副业主要是指农庄庄员、农场职工和农村其他居民耕种宅旁园地与自养牲畜、家禽等家庭副业。

长期以来，个人副业在苏联农业经济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据苏联官方公布的材料，在斯大林逝世的 1953 年，个人副业生产的农产品占全苏总产量的比重是：肉为 52%，奶为 67%，蛋为 85%，粮食为 3%，土豆为 72%，蔬菜为

---

① 参见（苏）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盛曾安等译：《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 6 卷，东方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524—525 页。

② （苏）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盛曾安等译：《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 6 卷，第 527 页。

48%。个人副业在农庄庄员家庭收入来源中占26%。<sup>①</sup>

赫鲁晓夫上台初期在个人副业的管理方面，实行积极鼓励的政策。当时他主要出于以下原因：一是为了尽快缓解苏联面临食品供应方面的严重困难，特别需要采取一些措施来扶植个人副业的发展；二是赫鲁晓夫在1953年的九月中央全会报告中明确提出，农业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违反了物质利益原则”，其中包括违反了农业劳动组合章程关于允许“每个集体农户都有权拥有小规模的经济作为个人财产”这个“最主要的原则”。而许多农庄违反了原则。他还指出：“如果公有经济中的工作不能使集体农民得到劳动日应得的收入，如果他的副业中的个人利益又受到损害，那么集体农民很容易给自己的劳动找到另外的用途——跑到城里去，到工厂做工。这就是集体农民个人经济缩减和落后的集体农庄的农业人口外流的原因。”他还要求：“在发展公有畜牧业的同时，党、苏维埃和农业的地方机关必须完全终止在个人所有牲畜方面侵犯集体农民利益的不正确的做法。”“必须消除这样一种偏见，即认为工人和职员个人有牲畜是件不体面的事。”这次全会以后，赫鲁晓夫对个人副业的管理采取一系列鼓励的措施，这主要有：免除庄员和农场职工的欠款；先是降低庄员职工向国家义务交售畜产品、土豆和蔬菜的定额，最后废除经营个人副业的义务交售制度，取消了1953年1月1日以前的向国家义务交售的私人牲畜的积欠；实行新的农业税法，税额按每1%公顷土地上的收入规定的固定税率计算。实行新税法，使个人副业的税率降低了80%；要求各级领导人都要协助居民购买牲畜和家禽，并保证他们私养牲畜所需的饲料与运输饲料的工具；等等。以上的措施，使个人副业得以迅速恢复与发展。1958年与1953年相比，个人副业有了较大幅度增长：土豆、蔬菜增长14.3%，牛的头数增加了25.3%，肉、奶产品量分别增加了33%和27%，水果增加了46%。<sup>②</sup>1953年，2000万农户中，有1/4的家庭不养奶牛。到了1959年，几乎每家农户都养了奶牛。<sup>③</sup>应该说，在1958年以前，赫鲁晓夫在个人副业方面所采取的改革措施，其积极影响是不可低估的，苏联当时有人称之为这是一种使

---

① 转引自陆南泉：《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在农村私人经济政策》（见苏联经济研究会编：《苏联经济体制问题》，时事出版社1981年版，第166页）。

② 转引自陆南泉：《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在农村私人政策》（见苏联经济研究会编：《苏联经济体制问题》，第167—168页）。

③ （苏）罗伊·A·麦德维杰夫等著，邹子婴等译：《赫鲁晓夫的执政年代》，第39页。

私人生产受益的“新经济政策”。“它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民主化，即国家不再直接干预一个地区的人民生活，允许他们自己决定怎样使用实际上多少是租借来的那1/4公顷土地。希望得到一小片菜地或果园的要求，很快超出了小镇和城郊工人的范围。大城市的机关被允许在乡村的路边、树林及铁路沿线寻找荒地，作为菜地或果园分给其工作人员，一般为1000平方米。这就是所谓工人集体园地的开端，工人们可以在业余时间和工休日来这里劳动。”<sup>①</sup>

但是，赫鲁晓夫从1956年开始，对个人副业看法发生变化。1956年3月6日通过的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关于农业劳动组合章程进一步发挥农庄庄员在组织集体农庄的生产和管理劳动组合事务中的主动精神的决议》中指出：“庄员的一切需要基本上靠公有经济来满足”，而个人副业“只起辅助作用”，“主要满足庄员个人对新鲜蔬菜、水果和浆果的需要，并且力求在宅旁园地建造果园、浆果园以美化庄员的生活环境。”<sup>②</sup>随着对个人副业认识的变化，赫鲁晓夫对个人副业开始采取限制的政策。1956年8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通过法令，规定对城市公民个人饲养牲畜征收货币税，如所养牲畜数额超过规定标准，税收加倍。由于1958年农业丰收，<sup>③</sup>在这一年召开的苏共中央十二月全会上赫鲁晓夫讲：“党解决了发展社会主义农业最重要的经济问题。”苏联“在短期内克服了农业生产的落后状态”。“在经济方面最强大的集体农庄目前就已经能够满足集体农庄庄员个人对马铃薯、蔬菜，甚至是牛奶的需要。”个人副业“将逐渐失去它的意义”。赫鲁晓夫在报告中还建议推广卡里诺夫卡村集体农庄把奶牛卖给农庄的经验，要求庄员放弃菜园，取消农场职工自留地、自养畜。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命令，从1959年10月1日起，禁止城市公民个人饲养牲畜。

由于赫鲁晓夫对个人副业在管理上采取限制的措施，使个人副业生产出现了明显下降。1959年与1958年相比，私养牛减少377万头，即减少12%，其中奶牛减少135万头，即减少7%；私养猪、绵羊和山羊各减少3%。1960年，私养牛比1958年减少了22%，其中奶牛减少12%。<sup>④</sup>个人副业的下降，导致市场供

① (苏)罗伊·A·麦德维杰夫等著，邹子婴等译：《赫鲁晓夫的执政年代》，第39页。

② 《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经济问题决议汇编》第4卷，第303—304页。

③ 1958年苏联谷物产量比1957年一下子增加了3200万吨，增长31.2%，农业产值增长10.7%。

④ 转引自金挥、陆南泉主编：《战后苏联经济》，时事出版社1985年版，第340页。

应紧张。这迫使赫鲁晓夫在 1961 年召开的苏共中央一月全会上又强调要重视个人副业，强调个人副业不仅“不违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发展”，而且“是对从集体经济中所得收入的补充”，要“严惩那些热衷于取消宅旁园地的人”。

由于赫鲁晓夫在个人副业管理上采取时松时紧的缺乏一贯的政策，特别是从 1958 年起采取的限制措施，致使个人副业呈现缩减趋势。1964 年与 1958 年相比，个人副业经济的播种面积、私养牲畜头数、产肉量和产奶量，一般都减少了 13%—15%。<sup>①</sup>

赫鲁晓夫执政后期，之所以对个人副业在管理上实行卡紧的政策，其主要原因有：

首先，最为重要的是对苏联农业状况缺乏一个正确的看法，把农业问题的解决看得过于简单，特别是 1958 年的丰收使赫鲁晓夫头脑发热，认为作为苏联最重要的经济问题——农业问题解决了，并且是在短期内克服了农业落后状况。不论是农畜产品的市场供应还是满足农庄庄员家庭需要方面，靠公有经济均可得到解决。而实际情况证明，个人副业在苏联长期占十分重要的地位，如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为农村居民提供 95% 的土豆，75% 的蔬菜，80% 的肉奶及其制品，100% 的鸡蛋。同时，通过市场也为全国居民提供 1/10 的食品。<sup>②</sup> 个人副业在农庄庄员家庭收入中一般要占 1/4 以上。

其次，从客观上讲，在赫鲁晓夫对个人副业管理上采取宽松政策后，出现了一些庄员把主要时间花在私人经济上，而不是花在集体经济上的情况，于是形成了这样的局面：“认真工作的庄员承担着集体经济后果的全部责任和集体农庄对国家必须完成的全部任务，而懒散的庄员不参加劳动组合的公有经济的劳动，却享受着庄员的全部待遇，并通过损害公有经济，即损害劳动组合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来扩大自己的私有经济。”<sup>③</sup> 实际上，庄员花在私人副业上的劳力多一些，而在公有经济上的出勤率低的情况，是一直存在的。这与长期来苏联农村公有经济发展缓慢、效率不高有关，这个问题的解决有个过程，只有公有经济迅速发

---

① 转引自陆南泉：《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在农村私人政策》（见苏联经济研究会编：《苏联经济体制问题》，第 168 页）。

② （苏）《农业经济》1980 年第 1 期。

③ 《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经济问题决议汇编》第 4 卷，第 303 页。

展、效益大大提高和庄员收入水平有大幅度增长的情况下，庄员才能集中精力从事公有经济。

再次，苏联从斯大林开始，其农业政策的一个最为重要的目标是控制粮食。而个人副业提供的粮食极其有限，<sup>①</sup> 主要是提供农副产品。赫鲁晓夫担心农庄庄员劳力过多投入农副产品的生产上，从而会影响粮食生产。

最后，由于过高地估计了公有农业经济发展水平，赫鲁晓夫在 1958 年提出苏联已经到了使“集体农庄庄员，特别是女庄员，从每天饲养自己的奶牛的生产率很低的劳动力中解放出来”的时候了。这显然不符合实际情况。实际上占全苏耕地不到 3% 的个人副业，就是在赫鲁晓夫 1958 年采取限制政策之后，仍然提供大量农产品，如 1961—1965 年期间（年平均），个人副业的产值占苏联农业产值的 33%，其中种植业占 22%，畜牧业占 44%。在赫鲁晓夫下台的 1964 年，个人副业生产的粮食占全苏粮食产量的 2%，向日葵占 2%，土豆占 60%，蔬菜占 39%，肉类占 42%，奶类占 42%，蛋类占 73%，羊毛占 21%。个人副业的商品产值占全苏农业商品产值的 14%。个人饲养的牲畜头数在全苏牲畜总头数的比重是：牛—28.8%，其中奶牛占 41.7%，猪占 27.4%，绵羊占 20.8%，山羊占 82.9%。国家从个人副业收购的主要畜产品在总收购量中的比重为：牲畜与禽类占 12%，奶类和奶制品占 4%，蛋类占 30%，羊毛占 13%。<sup>②</sup> 在上述情况下，提出可以使农庄庄员从个人副业中解放出来，这既不实际，也不可能。

### 机器拖拉机站的改组

大家知道，列宁之所以把农业合作化的时间估计得很长，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苏联缺乏改造农业的物质技术基础。因为农业只有具备了较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才能体现出大生产的优越性，才能吸引农民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列宁指出：“要获得拖拉机和机器，要实现一个大国家的电气化，无论如何要有几十年的时

---

① 1953 年个人副业生产的粮食占苏联全国粮食产量的 3%。

② 参见陆南泉等编：《苏联国民经济发展七十年》，机械工业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319—324 页。

间才行。”<sup>①</sup> 在斯大林通过强制的手段实行农业全盘集体化之后，当时的苏维埃国家无力向农庄提供它们所需的农业机器，即使有农业机器，这些农庄也没有经济能力去购买。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解决向农庄提供生产技术服务问题就显得十分迫切，没有物质技术基础，就难以巩固与发展农庄和提高生产水平。正在这个时候，1927年敖德萨州舍甫琴柯国营农场建立了有10台拖拉机的小队，帮助周围农村的农民进行生产。1928年，以这个小队为基础建立了全国第一个机器拖拉机站。这个做法给了斯大林启示：在国家不能保证给每个农庄都有自己的农业机械器的情况下，把有限的农业机器集中起来组建机器拖拉机站，让其为若干个农庄提供技术服务。接着联共（布）中央在总结了建设机器拖拉机站的初步经验后，于1930年通过了一项决议，肯定了这些措施的作用和意义。决议指出：“通过拖拉机站找出了、并由群众的经验检验了的苏维埃国家在高度技术基础上组织大型集体农业的形式，在这里农民群众建设集体农庄的主动精神同无产阶级国家的组织上和技术上的帮助及领导充分结合起来了。”<sup>②</sup> 此后，苏联展开了大规模的机器拖拉机站建设。1932年已达到2446个，1941年超过7000个，而在1957年达到8000个左右。<sup>③</sup>

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机器拖拉机站与农庄的关系，绝不限于前者为后者提供生产技术服务，后者为前者支付报酬。实际上，机器拖拉机站一直起着联共（布）党在农村的一个政治领导作用，也是对农庄加以控制的机构。1958年3月31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的《关于进一步发展集体农庄制度和改组机器拖拉机站》的法律中也明确指出：“机器拖拉机站曾经是掌握在苏维埃国家手中一支巨大的政治力量和组织力量”。<sup>④</sup> 因此，机器拖拉机站是苏联——斯大林农业制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人把苏联——斯大林农业制度称为机器拖拉机站——集体农庄制度，这不无道理。这也充分说明，改组机器拖拉机站在改革整顿农业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赫鲁晓夫在1958年3月27日第五届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一次会议的报告中指出：“工业管理的改组是一个重要的革命措施。而在农业

---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1卷，第53页。

② 转引自《赫鲁晓夫言论》第八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175页。

③ 关于机器拖拉机站建立与发展过程材料，转引自《赫鲁晓夫言论》第八集，第174—175页。

④ 《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经济问题决议汇编》第4卷，第416页。

方面应该采取的革命措施就是改组机器拖拉机站。”

到了1957年下半年，有关机器拖拉机站集体农庄制度问题，成为苏联理论界讨论的热点。在讨论中，普遍认为，将机器拖拉机站的农业机器出售给农庄是必要的，在这个时候已具备了可能性。1957年，在一个大农庄拥有几千公顷土地的斯塔克罗彼尔地区，对12个拖拉机站作了试验性合并，这些拖拉机站都是各自只为一个集体农庄服务的，合并后，农庄主席同时担任为该农庄服务的拖拉机站的站长。试验结果表明，这样做可以更有效地使用机器设备，农业劳动的质量有所提高，也简化了经营管理，因为不需要在地区一级为农庄和拖拉机站之间进行协调。<sup>①</sup>赫鲁晓夫日益感到，不改组机器拖拉机站，也就改变不了充满矛盾的苏联农业制度。1957年12月26日，他在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全会上就作了题为《技术装备和土地要归一个主人》的讲话，表明他改组机器拖拉机站的主导思想。他说：“……现在是不是可以把机器拖拉机站的技术装备卖给某些集体农庄了呢？我认为这是对的。只有土地和技术装备掌握在一个主人手里，所有的机器就一定会利用得更有效。这样我们就更能发挥集体农庄庄员的主动性。”不久后，于1958年1月22日，他在白俄罗斯共和国农业先进工作者会议上又进一步阐明上述思想，指出：“一块土地有两个主人：一个是集体农庄，另一个是机器拖拉机站。在有两个主人的地方，不可能有良好的秩序。在现代的农业中，一切都决定于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的工作。然而，集体农庄现在甚至连在什么地方放置拖拉机的问题，也得同机器拖拉机站商量和联系。所有这一切都使技术设备得不到合理使用，使国家和集体农庄的利益受到损失。”“我们也常常遇到这样的现象：一个机器拖拉机站只替一个或两个集体农庄服务，但也保持着庞大的管理机构。试问，把机器卖给集体农庄，让集体农庄根据农庄需要利用这些机械岂不更好吗？看来，这样会使机器工作得更有效，会发挥更大的能力。”

改组机器拖拉机站的主要内容是：改变为集体农庄进行生产技术服务的现行制度，逐步把机器拖拉机站改组为技术修理站由此逐渐过渡到把农业机器卖给集体农庄。苏共中央决议指出，采取这一措施，“势必可以大大改善利用现代化技术设备，加速农业的技术进步，势必可以大大改善利用现代化技术设备，加速农

---

<sup>①</sup> 参见（苏）罗伊·A·麦德维杰夫等著，邹子婴等译：《赫鲁晓夫的执政年代》，第86页。

业的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每百公顷农业用地的平均总产量和商品量，并降低其成本。”<sup>①</sup>

改组机器拖拉机站要解决的问题有四：

第一，最为重要的是要解决长期存在的、难以解决的“一块土地、两个主人”极不协调的农业管理制度。这是赫鲁晓夫在谈及改组机器拖拉机站时一再强调的一个重要理由。他在1958年2月提供的有关这一问题的报告提纲中指出：把农业机器卖给农庄，“这样一来就能取消两个社会主义企业——集体农庄和机器拖拉机站同时经营一块土地这种在目前条件下已经过时的制度，这种制度使得领导平行重叠，使生产组织无人负责，并且维持多余的管理机构，结果使得生产工具和劳动力不能得到充分利用”。

第二，使得土地的主要耕作者——集体农庄与生产工具能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改组前，在苏联“很多地区，首先是谷物区，机器拖拉机站替集体农庄进行绝大部分耕耘工作。因此，农业的主要生产力——集体农庄的劳动力就脱离了主要生产工具——拖拉机和其他机器，从而妨碍了劳动力和技术设备的最有效的利用”。

一块土地上有两个主人和农庄与主要生产工具相脱离，是农庄与机器拖拉机站经常发生矛盾的主要原因，并且往往出现扯皮，农庄主席一个意见，拖拉机站站长又是一个意见，最后往往按掌握农业机械的站长的意见办，而牺牲农庄的利益。由于机器拖拉机站控制的农业机器越多，其权力也越大，因此，往往产生拖拉机站盲目增加农业机器，而不管实际是否需要，从而造成机器的闲置，难以充分发挥作用，有时放在仓库里锈坏。

第三，从制度上促进和保证以扩权为主要目的农业计划制度改革。我们在前面谈到，对农业实行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制度，其消极作用异常突出，因此改革农业计划制度是赫鲁晓夫整个农业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但要通过改革农业计划制度来达到扩大农业企业的自主权，使其能因地制宜地进行生产经营活动，除了对农业计划制度自身进行改革外，改组机器拖拉机站具有重要意义。拖拉机站一直是直接管理农庄计划的领导者，是组织农庄执行指令性计划的直接监督者。因此，如果不改组机器拖拉机站，不废除集体农庄向它支付实物报酬的制度，农

---

<sup>①</sup> 《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经济问题决议汇编》第4卷，第412页。

业计划制度的改革就难以实现，农畜产品的采购制度的改革也同样难以进行。这里可以看到，改组机器拖拉机站是赫鲁晓夫整个农业制度改革中的重要一环，是破除机器拖拉机站集体农庄的苏联农业制度不可能少的一个步骤。

第四，在理论和实践中，推动农业与工业之间主要以商品交换形式的经济关系，从而扩大商品货币关系的范围。

### 集体农庄劳动报酬制度的改革

苏联集体农庄在 1956 年之前，一直实行自 1931 年起的按劳动日计酬的制度。根据这一制度，农庄在年终缴纳所得税、偿还银行贷款、提取公积金和扣除其他必要的支出之后，把收入的剩余部分作为劳动报酬基金，按每个庄员的劳动日数，并根据每个劳动日的日值以实物为主向庄员发给劳动报酬。当时苏联采取这种付酬办法的主要根据：一是认为这一制度比较能充分体现按劳分配原则；二是较适应当时农业生产的水平。但这一报酬制度有明显的缺点：首先，庄员的按劳动日得到的报酬，一般要等到在经济年度结束时才能给予，这就是说，在一年内庄员没有任何固定收入。另外劳动日的日值是随着年景好坏而波动的，因此，庄员也不清楚一个劳动日能拿到多少报酬，当然也更不知道经济年度结束时总共能获得收入是多少。这种付酬制度，减弱了农庄庄员对劳动结果的物质兴趣，也就不会从物质利益上去关心农业的发展。其次，由于各种农活繁多，十分复杂，很难使劳动日记分的标准定得合理与科学。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为了克服上述缺点，在总结了許多农庄已采取的更先进的付酬制度基础上，苏联于 1956 年决定改行按庄员在公有经济中所做的全部劳动日发给预付款制度。这一制度规定，年初以卢布对劳动日单价进行估算，然后按月预支报酬，到年终结算。预付款由货币与实物两部分组成。集体农庄要建立滚存的货币基金和粮食储备。货币预付基金的来源是 25% 的农产品销售收入和 50% 的采购预付定金。为了保证每月的预付款能兑现，苏联国家银行对货币预付基金的上述两项来源列入特别往来账户。这笔钱只能由农庄管理委员会用来给农庄庄员发放预付款和按劳动日进行分配。

应该说，这次改革虽然有利于克服按劳动日年终支付报酬的一些缺点，并对提高农庄庄员对劳动成果关心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改革之后的庄员付酬制

度的基础仍是劳动日，因此，并没有解决庄员报酬中所存在的不稳定和无保障的问题。

与农庄劳动报酬制度有关的另一个问题是，赫鲁晓夫为了贯彻物质利益与经济刺激的原则，曾试验和推广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中的机械化小组实行包工包产制度。机械化包工包产小组，在赫鲁晓夫推广过程中曾出现过三种形式：一是综合机械化生产队，一般规模不大；二是在综合机械化生产队中又分若干个机械化小组；三是农机手家庭承包。如梁赞州“沙茨基”国营农场哈尔拉莫夫一家承包了670公顷土地，农场固定给他两台拖拉机。1963年他们收获了720吨谷物、100吨豆子、500吨甜菜、600吨玉米青贮饲料。<sup>①</sup>以上三种形式的共同点是，都是建立在经济承包基础上的，它使最终劳动成果与收入挂钩，从而有利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但在赫鲁晓夫时期，这种承包制度，由于受各种因素特别是思想理论的束缚，并未成为苏联农业中的主要劳动组织形式。

## 垦荒、扩种玉米与畜产品产量赶超美国

赫鲁晓夫上台执政后，为了摆脱国家面临的农业严重落后状况，使农业有个较快的发展，可以说，他在多方面采取了措施，即除了对农业制度的各个领域进行改革外，还在发展农业政策方面采取了一些重大措施。垦荒、扩种玉米与畜产品产量赶超美国这三大政策，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可称为推进农业的熊熊燃烧的三把火。这三大政策本身，并不属体制改革的内容，但却与农业发展和农业制度的改革有着密切关系。

### （一）垦荒

赫鲁晓夫决心搞垦荒，其基本思想或主要出发点是：（1）在实行农业计划制度与农产品采购制度等一系列改革后，苏联农业虽取得了不少进展，但在赫鲁晓夫看来，要迅速提高粮食产量和畜产品产量，垦荒是个捷径。（2）垦荒投资效益高，回收期短。（3）赫鲁晓夫认为，在当时苏联的条件下，很难通过集约化耕作的途径来解决农业问题特别是增加粮食产量。当莫洛托夫等人说，苏联应当集中精力提高现有耕地的生产效率，极力主张农业的“集约耕作”而反对“粗放耕

<sup>①</sup>（苏）《农村生活报》，1963年4月12日。

作”时，赫鲁晓夫反驳说，他们这些人不懂得集约耕作意味着为将来而发展苏联农业，但苏联今天就需要面包，而不是明天。他接着指出：“原则上，我赞成农业的集约发展，但是这需要非常先进的农业劳动力和巨大的物质资源。我们这两者都没有。”

赫鲁晓夫以十分迫切的心情，力图通过垦荒迅速增加粮食产量。为此，于1954年召开了苏共二月全会。他在会上作了题为《关于进一步扩大苏联谷物生产和开垦生荒地和熟荒地》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提出了垦荒的宏伟计划，他要求1955—1956年两年内通过垦荒计划扩大谷物播种面积1300万公顷，并认为完全有可能超过计划的规定。赫鲁晓夫说：“开垦新地的计划是一种辉煌的事业。开垦生荒地和熟荒地按照这个当前工作的规模及其全国的意义来说，可与我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所完成的最巨大的事业相媲美。”

赫鲁晓夫排除各种阻力，全力以赴地贯彻他的垦荒计划。1954年春夏两季，在全苏范围内展开了这项工作。这一年开垦了1900万公顷，1955年又开垦了1400万公顷，大大超过了原来的计划。1954年获得好收成，全苏粮食产量增长1000万吨，但其中大部分是老农业区增产的，新开垦区只收获300万吨，这是因为垦荒工作刚刚开始。1955年遭遇干旱，新开垦区的春小麦全枯死了。到了冬天，粮食与其他食品供应十分困难，导致成千上万移来新垦区长期定居的人们纷纷离去。这时赫鲁晓夫处境十分困难，莫洛托夫等人借此指责他垦荒是“大飞跃”式的鲁莽冒险。但赫鲁晓夫并没有动摇，而且还进一步扩大垦荒面积。<sup>①</sup>1956年成了关键的一年，如果再次出现1955年的情况，赫鲁晓夫的执政地位将会出现动摇。但这一年农业因气候好和垦荒区头几年肥力充足而获得了空前的丰收，粮食总产量达到1.25亿吨，其中垦荒区的产量为6300万吨，占总产量的51%。国家收购的粮食为5410万吨，其中从垦荒区收购了3680万吨，占总收购量的68%。这样，不仅使对垦荒政策的批评者暂时失去了口实，而且于1957年4月苏共中央主席团决定授予赫鲁晓夫列宁勋章和第二枚“镰刀、锤头”金质奖章，对其在垦荒工作中的功绩给予表彰。

自大规模垦荒后，苏联农业收成与过去一样，有丰收年也有歉收年。从总体

---

<sup>①</sup> 参见（苏）罗伊·A·麦德维杰夫等著，邹子婴等译：《赫鲁晓夫的执政年代》，第62页。

上如何评价垦荒，主要争论的焦点是：是不是把物力财力用来提高原有耕地的肥力、提高农业劳动的技术装备水平比用于垦荒效果更好？笔者对这个问题的基本看法是：（1）正如前面谈到的，当时苏联没有条件搞集约化的农业生产，即不可能通过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来迅速增产粮食，从而解决对粮食的需求。（2）实际情况表明，垦荒是取得较好的经济效果的。1954—1960年，苏联垦荒面积达到4180万公顷，使播种面积扩大29%，谷物播种面积扩大67%。1954—1959年，苏联用于垦荒的投资总额为440亿卢布，而同期内垦荒区生产的商品产品，使国家预算进款760亿卢布，还不包括垦荒区新增加的生产基金（约350亿卢布）和建造的大量住房在内。1953—1958年，农产品产值增长50%以上，谷物产量年均超过1亿吨，比前6年增长39%以上。1958年，农庄庄员的平均劳动报酬比1953年增加82%。<sup>①</sup> 垦荒的主要问题是，在垦荒的后期，没有及时采取相应的保持生态平衡的措施，单一产品的连续耕作，使新垦的荒地长期积蓄的养分消耗得很快。赫鲁晓夫原来设想，从垦荒地所得的粮食，可以在四五年内消除长期的粮食赤字，这样就可以有时间来改善老粮食产区的情况，通过增加化肥、拖拉机及其他设备的供应，使其产量增加，减少对垦荒地区的粮食依赖，从而从单一的耕作小麦过渡到轮种制。但赫鲁晓夫被垦荒头几年的成绩冲昏头脑，忘记了原来的设想。当哈萨克各州领导人建议在垦荒地上留出18%的休闲地时，他回答说：“只有蠢货才会要休闲地！”当地一个研究所所长为留了25%的休闲地竟被撤了职、开除了党籍。<sup>②</sup> 这种违背科学、凭主观意志的态度，到后期，造成大量土地遭到风沙侵蚀。1962年干旱的夏季，风化侵蚀波及了几百万公顷，仅在巴夫洛达州一地，就有150万公顷土地被风“刮走了”。<sup>③</sup> 这样，使农业生产仍处于不稳定状态。

## （二）扩种玉米

1953年召开的苏联中央九月全会上，赫鲁晓夫就提倡扩大玉米在畜牧业饲料中的作用。他认为，苏联今后必须更多注意种植玉米，它是有价值的饲料作

---

① 转引自金辉、陆南泉主编：《战后苏联经济》，第289—290页。

② 《苏共中央三月全会速记记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66年版，第111页。

③ 参见（苏）罗伊·A·麦德维杰夫等著，邹子婴等译：《赫鲁晓夫的执政年代》，第116页。

物，许多畜牧业发达的国家都广泛地利用玉米来做饲料。

从赫鲁晓夫有关扩种玉米的思想发展过程看，他的基本思路是：（1）就当时的苏联来说，虽在农业方面采取了不少改革措施，但农业问题特别是谷物问题并未解决，远远不能满足国民经济日益增长的需要。而谷物问题不解决，也就无法解决在整个农业中更加落后的畜牧业。这样，增加谷物产量就是提高畜牧业的关键。因此他要求，苏联在1960年之前要保证每年谷物总产量至少达到100亿普特的规模（16500万吨）。这样就可满足全国对谷物的需要，同时还可拨出40亿普特的谷物供应畜牧业。（2）“增加谷物产量最快途径就是开垦生荒地和熟荒地。”“增加谷物产量的最大潜力是扩大玉米的播种面积。”“玉米之所以可贵，因为它同时可以解决两个任务：既可以补充谷物来源，又可以用它的秸秆得到很好的青贮饲料。”<sup>①</sup> 赫鲁晓夫于1955年5月在乌克兰的一次讲话中，对此说得更加明确。他说：“在目前条件下，最大限度地增产玉米是发展农业的根本问题之一。不增产玉米，要保证急剧增加肉类牛奶的产量，那是不可思议的。”（3）基于上述认识，加上1955年做青贮饲料的玉米获得了丰收，在当时种植玉米的运动已被发动起来，一时间种玉米成了时髦。赫鲁晓夫开始规划建立新的粮仓，制定用青饲料喂养牲畜的办法，设计制造了机械化种植玉米的专用设备，改进纯种玉米的培育。乌克兰成立了一个专门的玉米研究所；莫斯科的展览馆里开辟了一个玉米展厅；农业部发行一本新的刊名为《玉米》的科学杂志；食品生产部门增加了用玉米制作的食物种类，还在莫斯科开设了一家命名为“玉米”的专门食品商店。<sup>②</sup> 也在此时，赫鲁晓夫要求不断扩大玉米播种面积。1959年9月赫鲁晓夫访美时，在看到那里生长良好的玉米并用它来喂养的牛群长得膘肥体壮之后，更使他下决心进一步在苏联推动玉米的扩种工作。在1960年玉米播种面积达到2800公顷，1962年又扩大到3700公顷。

应该说，赫鲁晓夫力图通过扩种玉米的途径来解决谷物增产和加快畜牧业发展的思路并没有错。问题在于，由于他不顾具体条件，违背农业生产因地制宜这个最重要的原则，通过一种政治压力搞运动的办法，让那些根本不适合种玉米的

---

① 《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经济问题决议汇编》第4卷，第167—169页。

② 参见（苏）罗伊·A·麦德维杰夫等著，邹子婴等译：《赫鲁晓夫的执政年代》，第66页。

地区去种植这一作物。1961年10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上对种植玉米不积极的地方领导人提出批评时说：“在那些没有长出玉米的地方，存在着不能促使它生长的‘因素’，这一‘因素’应当在领导干部中寻找……应当撤换那些本身使玉米这种作物干旱枯萎、但却没有为它恢复生机提供机会的领导者。”<sup>①</sup> 强制推行扩种玉米运动的不良后果有：一是由于玉米产量不高，其经济效益比其他饲料作物要差。据1958年至1962年的统计，种植、收获100饲养单位的多年生饲料，如三叶草、梯牧草、牧场草等，成本为1—3卢布，而同样100饲养单位的玉米种植和收获的成本是5—6卢布。<sup>②</sup> 二是由于玉米播种面积的扩大，挤掉了冬小麦的播种面积，从而影响谷物的增产。赫鲁晓夫在1955年提出的在1960年之前每年谷物总产量至少要达到1.65亿吨的指标根本没有达到，到1960年仅为1.255亿吨。三是使一些地区特别是不适合种玉米的地区，其青饲料供应大大减少，如在立陶宛，1960年为每头奶牛购买的青饲料量为6吨，1961年降为4.5吨，1962年不到1吨。<sup>③</sup>

应该说，赫鲁晓夫后来，对不顾条件地扩大玉米播种面积所犯的一些错误有所认识，承认玉米并非在所有的地区适合种植。他在1963年召开的苏共中央十二月全会讲：“在乌克兰和某些其他共和国的干旱地区究竟种植哪一种谷物更为有利，是冬小麦还是玉米，这是必须谨慎考虑的问题。这里的方针应该是什么，哪一种作物应该得到优先考虑呢？当然是耗费劳动最少而产量更高的那一种……我们并没有特别对哪一种作物发誓要效忠到底，我们并没有打算要崇拜它。一定要对产量予以优先考虑。在某一区域的条件下能提供高产、能使投入的劳动获得最大报酬的作物，就应当成为这里农场的主要作物。我们不应害怕去改变作物布局，如有必要就在干旱区域减少玉米面积，使这些面积让位于各种高产的小麦、大麦、豌豆和高粱。”<sup>④</sup> 但在赫鲁晓夫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时，亦常常把责任推给

---

①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1961年10月17—31日，速记记录》第1卷，莫斯科1962年俄文版，第80页。

② 转引自（苏）罗伊·A·麦德维杰夫等著，邹子婴等译：《赫鲁晓夫的执政年代》，第120页。

③ 转引自（苏）罗伊·A·麦德维杰夫等著，邹子婴等译：《赫鲁晓夫的执政年代》，第120页。

④ 《真理报》，1963年12月10日。

别人，如他在回忆录中说：“当我开始为种植玉米开展宣传运动时，我真诚地相信——并且我仍然相信——这是做得对的。但有些干部想迎合我。说得粗一点，他们好像一群马屁精。他们不首先为农民做好适当的准备，就坚持大面积种植玉米。结果，农民根本不懂得如何正确地种植和收割玉米。最后，人们对玉米可以作为青贮饲料作物产生怀疑，而我作为第一个推广种植玉米的倡议人的声誉也受到了损害”。

### （三）畜产品产量赶超美国的政策

在1955年召开的苏共中央一月全会上，赫鲁晓夫提出，到1960年全国主要畜产品的产量比1954年要增加：肉类和各种油脂、奶品——100%，蛋类——120%，各种羊毛——80%。很明显，增长幅度是相当大的。但赫鲁晓夫在垦荒和扩种玉米方面一开始所取得的成绩影响下，已不满足上述规定的主要畜产品的增长幅度了。1957年5月赫鲁晓夫在列宁格勒召开的一次农业工作者会议上，提出了惊人的计划：要在三四年内（即到1960或1961年）在按人均计算的肉类、牛奶和黄油产量方面超过美国。1957年按人均计算的主要畜产品产量如下：肉类：苏联——32.3公斤，美国——102.3公斤；牛奶：苏联——245公斤，美国——343公斤；黄油：苏联——2.8公斤，美国——3.8公斤。根据苏联公布的材料，1955年至1957年，苏联肉类产量平均每年增长率不到10%，如按这个已经不算低的速度来计算，要使苏联人均肉类产量赶上美国1957年的水平，约需要15年。赶超计划执行结果是，1957年至1964年肉类产量，苏联从每人每年平均37公斤提高到40公斤，而美国1961年的肉产量每人每年平均为100公斤。可见，赫鲁晓夫1957年提出的3—4年赶超美国的计划多么不现实。

赫鲁晓夫这一赶超美国的政策，成为反对派在1957年要把他赶下第一书记位子的一个重要原因。他提出赶超口号并没有事先与党中央主要领导商量，是头脑发热、一时冲动提出的冒险计划。应该说这是赫鲁晓夫的一大失误。

## 52. 如何评价赫鲁晓夫时期的改革？

陆南泉

如何看待赫鲁晓夫时期改革的历史作用？为什么这一时期改革未取得成功？至今国内外学者有不同的认识。因此，有必要进行深入研究并讨论。总的来说，赫鲁晓夫时期的改革未取得成功，造成了国民经济的混乱和严重的社会经济后果。但它在苏联改革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仍有不少方面应加以肯定。

### 给苏联社会留下深刻影响的改革起始时期

作为苏联历史上第一个改革者的赫鲁晓夫，在他对斯大林过度集中体制弊端有所认识的基础上，在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开始解冻后，下决心在各个领域进行了改革，这对苏联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戈尔巴乔夫在其执政时期以及下台后，多次谈及这一历史时期改革的积极意义。<sup>①</sup>他在庆祝十月革命70周年大会上的报告中说：“在50年代中期，特别是在苏共二十大之后，变革之风吹到国家上空，人民振奋起来，活跃起来，变得更大胆，更有信心。批评个人崇拜及其后果，恢复社会主义法制要求党及其以尼·谢·赫鲁晓夫为首的领导拿出很大的勇气。开始摧毁以前对内对外政策中的刻板公式。开始试图摧毁30—40年代所确立的发号施令和官僚主义的管理方法，赋予社会主义以更大的活力，强调人道主义理想和

---

<sup>①</sup> 戈尔巴乔夫和苏联大多数官方人士、学者以及西方学者一样，对赫鲁晓夫时期的改革既有积极的评价，也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在这里分析赫鲁晓夫时期改革不成功原因时，将会引用戈尔巴乔夫等人的一些分析。

价值观，在理论和实践中恢复列宁主义的创造精神。苏共中央九月全会（1953年）和七月全会（1955年）决议的核心是力求改变经济发展的先后次序，使联系与劳动成果挂钩的个人利害关系的刺激因素起作用。于是着重注意了农业的发展、住房建设、轻工业、消费领域和满足人的需要有关的一切。”他在《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指出：“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是我们历史上的一个重大里程碑。它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作出了很大贡献。会上和会后都曾作出过大力度的尝试，想使国家走上正轨，想推动我国摆脱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所产生的各种消极因素。”<sup>①</sup> 戈尔巴乔夫在下台后发表的著作中说：“由于苏共二十大而对‘个人迷信’进行的批判……变革开始了，整个社会气氛改变了。这是摆脱极权主义的第一步。”“赫鲁晓夫是改革的先驱者。他第一个推动了改革进程。”“赫鲁晓夫留下的主要东西就是使斯大林主义失掉了声誉……这是改革得以开始的前提和条件之一。因此，我承认，改革<sup>②</sup>是同赫鲁晓夫所做的一定联系的。一般说，我对他的历史作用是有较高评价的。”<sup>③</sup> 西方学者斯蒂芬·科恩在为麦德维杰夫等所写的《赫鲁晓夫的执政年代》一书所作的序中说：“赫鲁晓夫执政的年代，是苏联进行了真正的政治和社会改革的时期。尽管这些改革充满矛盾，而且毕竟是有限的，但在实际上，苏联社会生活的每一领域无不受到1953年至1964年这段时期变革的影响：大恐怖的结束，千百万监押在集中营的囚犯获释，为限制一些最恶劣官僚习气和特权所采取的措施；公众的觉悟，知识界越来越多地参与政治。一系列经济和社会福利的改革；以及导致我们今天所谈的‘缓和’的外交政策的变化，等等。这个常常被称为‘非斯大林化’的改革过程，有许多值得注意的特点，其中远不只是它的发生没有引起长时间的暴力或动乱和往往出人意料这两点。”他还批评说，西方一些研究苏联问题的学者，由于“他们被斯大林二十五年的恐怖专制主义统治及其强加给社会和官场的畏惧、尊奉、僵化的形象所束缚，也被他们自己头脑中固定不变的‘极权主义’的苏维模式所禁锢，感到难以想象任何重大、持久的变化。他们否认或者看不到，

①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著，苏群译：《改革与新思维》，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47页。

② 系指戈尔巴乔夫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自己推行的改革——作者注。

③ （俄）戈尔巴乔夫著，徐葵等译：《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41、42、44页。

在赫鲁晓夫作为苏联领导人当权的整个时期内，这种变化已经发生，而且进行改革确是赫鲁晓夫的本意”。<sup>①</sup>

有关评论赫鲁晓夫的论著卷帙浩繁，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笔者认为，不论是赞誉还是诋毁，有一条是不能否认的：赫鲁晓夫顶住了巨大的压力勇敢地站出来破除斯大林个人崇拜，成为苏联第一个改革者，使苏联历史上翻开了新的一页，活跃了气氛，振奋了人心，给苏联历史上留下了谁也不能抹杀的深深的印痕。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下面一段话是有道理的。他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年代里，没有一位世界领袖人物的成败能像赫鲁晓夫的成败如此急剧地和决定性地改变历史的进程。”<sup>②</sup>这就是为什么笔者在论述赫鲁晓夫时期改革的意义时，首先是从他的改革对改变苏联历史进程的影响这个大视角来考察的。苏联不少学者也指出，当时赫鲁晓夫的改革，是符合社会发展已经成熟的需要的，改革对当时官僚化的苏联引起了一场“地震”，在国内和国际关系方面都产生了“良好的变化”。

### 推进了经济理论的发展

在斯大林时期，个人崇拜严重地束缚人们的思想，僵化的教条主义盛行，在理论上不可能与时俱进。应该说，在赫鲁晓夫围绕经济体制改革展开的经济理论讨论十分活跃，特别在商品货币关系等主要问题上，苏联学者提出不少新的看法。尽管经济理论的发展受历史条件的影响，仍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毕竟是对多少年来不容有半点怀疑的斯大林经济理论的一次巨大冲击，让人们有可能根据已变化了的实际情况去探索理论和发展理论，可称得上是苏联在经济理论的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赫鲁晓夫时期展开的经济理论大讨论的重要意义还在于：一是为苏联以后的经济改革作了一定的舆论和理论准备；二是赫鲁晓夫在苏联这么一个大国推行改革政策，又积极提倡改革理论的讨论，对东欧一些国家相继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实行经济体制改革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

<sup>①</sup>（苏）罗伊·A·麦德维杰夫等著，邹子婴等译：《赫鲁晓夫的执政年代》，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页。

<sup>②</sup>（美）尼克松著，刘湖译：《领袖们》，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230页。

## 提出社会主义各国可以有不同的体制模式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与理论的发展，赫鲁晓夫提出，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可以走不同的道路，可以有不同的体制模式，这有助于人们认识到斯大林苏联模式不是唯一正确的模式。而在开展体制改革过程中，赫鲁晓夫意识到，苏联长期以来把自己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及体制模式视为样板，不允许别国偏离一步，否则就动辄批判、开除，甚至加以镇压的做法是不可取的。赫鲁晓夫于1963年8月，正当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同声谴责南斯拉夫背离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之际，赫鲁晓夫赴南访问，他在访问期间公开发表演说指出：南斯拉夫是一个“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在那里，不是“空谈革命”，而是“具体建设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发展是“对总的国际革命工人运动的具体贡献”。<sup>①</sup>

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率先改革的国家，它第一个宣布摒弃斯大林模式。人们可以看到，尽管南斯拉夫所进行的改革有不少问题，有些问题还十分严重，并且也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体制模式，最后也没有逃脱垮台的命运，但在斯大林的寒冬时期走了自己的改革之路，确实是第一枝报春花。

## 经济体制改革本身也有一些应予肯定的方面

我们讲，在赫鲁晓夫下台时，从苏联出现的种种社会经济问题来看，他的改革的确是不成功的。苏联经济发展的“伟大十年”是在赫鲁晓夫下台前有人制造出来的一个根本不存在的神话。这些说法是符合客观情况的。但是，赫鲁晓夫在改革经济体制过程中，也确有一些值得肯定的东西。拿农业制度改革来说，在1958年前的一些改革思路与政策措施，肯定的方面应该是多一些。这主要反映在：（1）赫鲁晓夫一上台紧紧抓住了农业的改革，无疑是个正确而又果断的决策。这样做，使苏联躲过了很可能会出现粮食危机和全国性的饥荒。（2）通过对农业计划制度的改革来扩大农场、农庄的经营自主权，提高物质利益原则的作用和大规模垦荒等思路，是符合当时农业发展客观要求的，特别对解决苏联当时

---

<sup>①</sup> 参见赫鲁晓夫1963年3月30日在南斯拉夫维累涅市群众大会上的讲话。

最为关心的粮食增产问题，起了积极作用。1953年苏联粮食产量为8250万吨，1954年为8560万吨，1955年为10370万吨，1956年为1.25亿吨，<sup>①</sup>1957年为10260万吨，1958年为13470万吨。这期间，粮食产量除个别年份虽出现过下降的情况外，总的来说，呈现增长的趋势。也正是在此期间，“使赫鲁晓夫赢得了农业内行的声誉。”<sup>②</sup>还应该说，这对赫鲁晓夫在1957年苏共中央六月全会上战胜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反对派并一致同意继续留任第一书记，都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至于经济改革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即工业和建筑业的大改组问题，苏联自己的评价是，这不能算是一次改革，而“只是一次不成功的试验”。在赫鲁晓夫下台后不久，苏联《真理报》发表的社论中批评1957年的大改组是“没有经过周密思考、没有仔细权衡、没有经过实际试验的改组”。<sup>③</sup>

以上的评价，总的来说也是符合实际的。但1957年的大改组，它力图解决部门与地区管理之间的矛盾，虽然未取得成功，可赫鲁晓夫搞经济行政区建立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办法，毕竟是一种试验，为后人提供了经验教训。如何使部门管理与地区管理有机结合，如何发挥地方的权限来提高其管理经济的主动性，与此同时中央又不失控，这对所有当今处于经济转轨国家来说，仍是一个有待解决的最为复杂的问题之一，至今都尚在寻觅解决的途径，从苏联来说，勃列日涅夫执政后，又恢复了部门管理原则，但在他执政后期，又发现部门管理原则存在一系列问题，后来又成为阻碍工业和建筑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正是这个原因，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学术界对此又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对部门管理原则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意见，这也证明，在工业和建筑业中改变高度集中的部门管理原则有其必要性。

---

<sup>①</sup> 这是1956年以前苏联历史上最高产量，而在1.25亿吨粮食产量中，一半以上产自新的开垦区。苏联学者指出：“若不是多亏新开垦的处女地获得丰收，苏联在1956年几乎肯定要发生饥荒”[见（苏）罗伊·A·麦德维杰夫等著，邹子婴等译：《赫鲁晓夫的执政年代》，第63页]。

<sup>②</sup> （苏）罗伊·A·麦德维杰夫等著，邹子婴等译：《赫鲁晓夫的执政年代》，第38页。

<sup>③</sup> （苏）《真理报》，1964年11月8日。

## 赫鲁晓夫时期的改革为什么没有成功？

导致赫鲁晓夫时期的经济改革未获得成功，其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涉及的问题很多，这可以从多方面去分析。

### 第一，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限制性

现在人们对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反斯大林已有一个共识，即“赫鲁晓夫揭露的、批判的并力图战而胜之的是斯大林，而不是斯大林主义。也许，他真诚地相信，整个问题也就是这样，只要揭露斯大林，他就解决了使社会从过去的极权主义桎梏中解放出来的全部问题”。<sup>①</sup> 赫鲁晓夫并不理解，揭露斯大林仅是走上革新社会道路的第一步，而更重要的是对斯大林模式，必须在经济、政治、社会精神生活等方面进行根本性的重大改革。“赫鲁晓夫的主要错误认识就在于此，而他至死也没有摆脱这个错误认识。总的看来，他真的相信，揭露了斯大林个人，他就完成了任务，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虽然对消除我们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经济、文化、意识形态、整个社会上层建筑）出现的深刻的变形现象没有做任何一点事情。”“我在读他的回忆录时感到震惊的是，他或者对一些明显的事情完全视而不见，或者是顽固地相信那些老的谎言，即使是他后来的经验已揭穿了这些谎言的时候仍然如此。例如在他回忆录中，他似乎一本正经地说，在挑选领导人问题上，用哪一个人取代另一个人的问题可经常提到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去解决。没有这一点，‘我不知道党会变成什么样的党’。”<sup>②</sup> 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问题的局限性，还表现在对苏联历史发展过程中一些重大问题的错误认识，“赫鲁晓夫主张，绝不能为在‘公审’时被‘公开定罪’的斯大林的激烈反对者，如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和布哈林等人平反，就像不能为让人不得安宁的魔鬼列夫·托洛茨基恢复名誉一样。他认为，斯大林在这些案子中消除了对尚处于在幼年时期的共产党国家进行破坏的‘极左’和‘极右’分子是正确的。

---

<sup>①</sup>（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139页。

<sup>②</sup>（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第139—140页。

而且在他看来，对农民残酷地搞集体化，以及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对一部分知识分子的镇压，也都是必要和正当的。”<sup>①</sup> 西方学者认为，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指控在三个重大方面有明确的局限性。“首先，这种指控集中在斯大林‘对党的干部’以及其他政界精英‘实行大恐怖’问题上。它反映了赫鲁晓夫在50年代作为恢复活力的共产党领袖执政以及他的改革主张的局限性；它只字不提在斯大林统治下无辜屈死的数百万老百姓。其次，赫鲁晓夫把斯大林的罪恶暴行说成是从1934年开始的，这等于为斯大林于1929—1933年间推行的、给农民带来极大痛苦的集体化运动辩护，把它说成是令人钦佩的必要措施；同时，这也等于宣布不准讨论关于1929年以前党内反对派对斯大林主义的选择这一禁令继续生效。最后，赫鲁晓夫把滥用权力说成仅仅是斯大林以及‘一小撮’帮凶（这些帮凶已被揭露并受到惩办）的罪过，从而回避了广泛追究刑事责任并给予惩罚的问题。他硬说（至少是公开表示过），幸存下来的政治局委员都是无罪的。”<sup>②</sup>

上述的局限性，决定了赫鲁晓夫不能从斯大林体制模式的根本性弊端这个角度去思考问题和进行改革。

赫鲁晓夫对斯大林问题的认识之所以存在严重的局限性，与赫鲁晓夫是斯大林时代的产儿，是斯大林体制形成与发展时期的产儿有关。正如阿尔巴托夫说的，赫鲁晓夫的“主要问题在于他本人就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斯大林主义的产物”。因此，要靠他来在“清除斯大林主义遗产方面做更多的事，他多半是根本做不到的”。这样，“在政治上他变成了‘在原地跑步’”。<sup>③</sup> 对此，麦德维杰夫分析说：“赫鲁晓夫同时又是斯大林的门生，是斯大林时代的一个产物，那个时代训练了他在政治上的灵巧熟练，也为他留下一部具有残酷无情、审慎从事以及那种可以置某些明显真理不顾之机敏颖悟的遗产。”<sup>④</sup> 因此，就产生了赫鲁晓夫这

---

①（苏）罗伊·A·麦德维杰夫等著，邹子婴等译：《赫鲁晓夫的执政年代》，第22—23页。

②（美）斯蒂芬·F·科恩著，陈玮译：《苏联经验重探》，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116页。

③（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第141页。

④（苏）罗·亚·麦德维杰夫著，肖庆平等译：《赫鲁晓夫大传》，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4页。

位“非同寻常的、带有悲剧性的双重意识的矛盾人物。他在苏共二十大所作的关于揭露斯大林镇压的报告，这是在政治上走出的出色的一步，它在很多方面决定了斯大林去世后的过渡时期事态发展方向。他想要同斯大林主义分手，但不是同这种制度分手。他虽同这种制度的创造者决裂，可是他崇拜由这位创始者所创造的世界。这种矛盾无法解决，但他不懂得这个道理”。<sup>①</sup> 赫鲁晓夫一方面“给了社会一点儿自由，后来他自己拧紧了龙头”。正如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的：“苏联领导决定开始解冻时期，并自觉地走去的时候，大家，也包括我在内，同时对解冻感到担心：‘会不会因解冻而出现冲向我们的洪水，这就将很难处理。’”“在赫鲁晓夫的活动中有许多与他的生活道路的特点（从政治意识形态上说他是斯大林派的活动家，在他的良心中也有斯大林制度的罪恶的阴影）以及他的个性相联系的矛盾。他往往是进一步，退两步。这儿碰碰，那儿撞撞。”<sup>②</sup> 这些都说明，赫鲁晓夫执政期间，在体制改革和重大国内外政策方面出现的摇摆、前后不一贯、不彻底性和动摇性的原因，不能归结为纯属他个人的弱点（如虚荣心）和实用主义（争权）。

## 第二，赫鲁晓夫时期的改革，从来没有离开斯大林体制模式的大框架

他在改革过程中，往往是一只脚向民主迈进，另一只脚却陷入了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泥潭。<sup>③</sup> 由于赫鲁晓夫个人的经历，他在反斯大林过程中，也能感悟到战后新时代将会到来，但他又无力自觉地把握住战后时代转换的重要契机，深刻地转变斯大林留下的不能再继续推进社会经济进步的体制。很明显，他只能是个过渡性人物，而不是能担当推进苏联社会大步前进、改变旧体制的代表新生力量的人物。

从经济理论上讲，为了进行改革，虽然取得了一定进展，但赫鲁晓夫时期并没有摆脱斯大林“左”的教条主义。拿讨论得最多的商品货币理论来说，到1961年通过的《苏共纲领》，也只是说它具有新内容和加以充分利用而已，根本

---

<sup>①</sup>（俄）亚·尼·雅科夫列夫著，徐葵等译：《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202—203页。

<sup>②</sup>（俄）戈尔巴乔夫著，徐葵等译：《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43—44页。

<sup>③</sup>参见（苏）尤·阿克秀金编，李树柏等译：《赫鲁晓夫——同时代人的回忆》，东方出版社1990年版，第3页。

没有人提出经济体制改革要以市场经济为方向，强调的还是指令性计划。在所有制问题上，赫鲁晓夫同样是片面追求“一大二公三纯”。在他执政时期，急于消灭手工业合作社，向单一的全民所有制过渡；在赫鲁晓夫的倡导下，人们搞起扩大集体农庄规模的事来，有的地方甚至把30来个、甚至更多的农村合并成一个大集体，也就是说，成立了根本无法管理的集体农庄。“合并集体农庄，而且常常是胡来的令人不快的合并，这也是集体化的继续，确切地说是集体化的大功告成”；1958年砍掉农村个人副业，认为它影响了公有农业经济发展。这种错误思想，“是赫鲁晓夫对农民，也是对全体人民犯下了滔天大罪”；<sup>①</sup>在“左”的思想支配下，赫鲁晓夫超越社会发展阶段，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

政治体制改革的局限性，也使得赫鲁晓夫经济体制改革难以从传统体制中解脱出来。应该说，赫鲁晓夫在揭露斯大林问题过程中，力图推进苏联政治民主化进程，他针对斯大林政治体制存在的弊端，提出了反对个人集权、加强党的集体领导、加强法制、反对个人专横行为、反对干部终身制和提出实行干部任期制等。这些改革措施在赫鲁晓夫执政的头几年（1958年前）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到执政后期，有的改革措施并没有贯彻到底，有的被赫鲁晓夫自己破坏，譬如，他自己搞集权乃至个人崇拜，又如，他搞的干部制度改革，并没有建立起一套民主、科学的选拔干部制度，“他挑选干部越来越不按德才兼备的原则，而按忠实于人，叫干啥就干啥的原则”。<sup>②</sup>产生这种情况虽有多种原因，但主要的是赫鲁晓夫时期的政治体制改革没有从根本上触动其要害即权力过度集中。按照熟知苏联内情的阿尔巴托夫的说法，“赫鲁晓夫完全是有意识地不想放弃从斯大林时期继承下来的政治制度的，因为他作为党的头头知道这样做会直接威胁到他自己的利益，因为他想象不出用以取代这种制度的其他方法。如果你不想在政治和经济体制中实现深刻的变革（而赫鲁晓夫是不想的），掌握权力就会越来越变成目的本身。他不想放弃过去的政治制度。如果将从斯大林那里继承下来的，当年斯大林建立它们正是为了确保‘个人专政’（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在回忆录里用了库西宁的这个概念，看来，这个概念深深地印在他心上——显然他不了解这个概

---

<sup>①</sup>（俄）亚·尼·雅科夫列夫著，徐葵等译：《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第16页。

<sup>②</sup> 引自解密档案材料，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3号全宗，67号目录，223号案卷。

念的全部含义)的许多机制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那么领导党和国家就可能简单得多和方便得多了。他还欣赏对他本人的颂扬,当然不是斯大林时期的那种凶险的血腥的个人崇拜,但毕竟是十分有害的”。<sup>①</sup>著名苏联历史学家麦德维杰夫与阿尔巴托夫在这个问题上有共同的认识。他说:赫鲁晓夫“本人肯定没把扫除他前任所建立的那种政治体制当成自己的任务,相反,为了巩固他自己的权力以及实施某些政治和经济上的改革,他还充分利用了这种体制的独裁主义结构”。<sup>②</sup>

以上分析说明,赫鲁晓夫执政时期,不论是经济体制改革还是政治体制改革,都没有改变斯大林模式的大框架,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与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交织在一起,互为需要,从而成为阻碍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因素。

### 第三,赫鲁晓夫经济体制改革本身存在一系列问题

其一,从改革思路来讲,为了克服传统体制的弊病,在改革开始阶段,首先应把中心放在改革经济机制和调整经济关系上,即要调整好国家与企业的关系,扩权让利,重视商品货币关系与经济杠杆的作用,而1957年的工业和建筑业大改组把中心放在调整经济管理组织形式上,只是把经济管理的重心由中央转到地方,管理机构从条条搬到块块,即只是在条条与块块、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方面兜圈子。由于上述原因相联系,大改组的结果是,只是从一种行政手段转为另一种行政手段,即从中央的行政指令方法转向地方的行政指令方法。另外,由于改组的核心是取消部门管理原则,因此花大力气分析了部门管理存在的种种问题,但并没有注意部门管理的客观合理的内核,并努力在改组中解决地区管理与部门管理如何合理地结合的问题。

其二,从改革的步骤来看,1957年大改组确实是未经充分准备,仓促上阵,事先也未经过试验。正如一些苏联学者指出的:“这样全面的工业改革,不言而喻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应该经过几个州若干年试点后,再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报刊上对改革计划的种种分析,不能代替实际的尝试。”改组的结果使企业下放过了头,权力分散过了头,例如,大改组后,使中央管辖的工业产值在全苏工业产值中的比重大大下降,从而削弱了国家对国民经济必要的集中统一领导和

---

<sup>①</sup> (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第140页。

<sup>②</sup> (苏)罗·亚·麦德维杰夫等著,肖庆平等译:《赫鲁晓夫传》,第2页。

计划管理，致使地区的“分散主义”和“本位主义”泛滥，“差不多在每个管理局中都有分散力量的情况”。<sup>①</sup>赫鲁晓夫在打破原来的部门管理体制的同时，并没有建立起一套新的管理体制。

其三，从改革方法来看，赫鲁晓夫往往凭个人的主观愿望，依靠行政命令强制推行改革，特别是到后期，随着赫鲁晓夫领导地位的确立，他的头脑日益膨胀起来，个人专断、唯意志论日益增长。苏联学者布尔拉茨基发表的文章分析说，赫鲁晓夫的改革是不彻底的和低效益的。其原因是由于他用传统的行政方法、官僚主义方法搞改革，不重视人民群众的作用，没有发动劳动人民为改革而斗争。<sup>②</sup>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赫鲁晓夫对农业心血来潮的改革和对农业发展政策的瞎指挥尤为突出。他不顾条件地扩种玉米，取消农民的个人副业，停止采用草田轮作制，通过政治压力在短期内改组了机器拖拉机站……这些都对农业的发展带来了极其不利的影响。

第四，由于赫鲁晓夫的改革，涉及大量的人事变动，侵犯了很多人的利益，对此事先又没有充分考虑，也未作出应有的安排

在这方面赫鲁晓夫面临的挑战是十分严峻的，例如，他要取消领导干部终身制，对于党的选举产生的各级领导机关（从地方到中央委员会成员），采取按一定比例经常更换的制度。每次选举时，苏共中央委员会及其主席团成员至少更换1/4，1962年苏联最高苏维埃的代表在选举中更换了近70%；<sup>③</sup>他还取消了高级干部（如州委书记、中央委员、报纸主编等）的相当可观的月薪“津贴”，对局级干部不再配备司机，不再提供可以随意到任何地方去的专车；在工业和建筑业大改组时，引起大量领导干部的调动；在农业改革过程中，由于赫鲁晓夫的鲁莽和急躁，改组了从农业部、大中农业机构、农学院到试验站的整套政府结构。让农业部离开莫斯科，迁到农村，农业部工作人员失去了在莫斯科舒适的办公室，与此同时，各加盟共和国也采取了类似的做法。并且，从苏联农业部部长到各加盟共和国农业部部长，都由一个国营农场的场长来担任。一年之内，2200名工作人员中有1700名接到了调离的通知，其中大部分是职务较高的领导人。农业

---

①（苏）《消息报》，1963年11月3日。

② 参见（苏）《文学报》，1988年2月24日。

③（苏）《真理报》，1962年4月25日。

院校也迁到了农村。不论是农业部还是农业院校的工作人员，由于农村条件差，造成了大量农业工作人员包括农业专家的流失……赫鲁晓夫上述种种做法中，有关反特权的措施有其积极意义，但必然引起原来受益者反对。至于在农业改革中的一些做法，既导致了农业灾难，又引起了农业部门干部的反对。

以上情况说明，赫鲁晓夫在改革过程中，触犯了很多人，在客观上树立了一批“政敌”或“反对派”。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正确的改革方案，也难以贯彻和取得成功。

**第五，赫鲁晓夫个人的性格，尽管对改革的失败不起主要作用，但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苏联学者布尔拉茨基写道：“赫鲁晓夫不仅是环境的牺牲者，而且也是其性格的牺牲者。急性子、过于匆忙、容易激动，这是他无法克服的缺点。”他还引证1956年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访问英国期间，在苏联大使馆举行招待会上丘吉尔对赫鲁晓夫说的话：“赫鲁晓夫先生，您在着手大规模改革，这当然好！我只是想劝您不要操之过急。靠跳跃两步跨越鸿沟是相当难的，还可能会坠入沟中。”“我（布尔拉茨基——笔者注）冒昧地试着以个人名义补充一句：当你没有看清，准备跳到那个岸上时，是不能跨越鸿沟的。”<sup>①</sup>

#### **第六，不可忽视的国际压力**

赫鲁晓夫要推进体制改革，阻力不只来自国内保守势力和传统的意识形态，而还来自国际的压力。1956年苏共二十大揭开斯大林盖子后，西方国家利用斯大林问题大肆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陷入了严重困境；而在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混乱，发生了波兰和匈牙利事件；中苏两党因在斯大林问题上产生不同看法和其他因素，导致历时十年之久的有关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和国际共运的意识形态的大论战。这种压力，使赫鲁晓夫反斯大林个人崇拜和改革时而出现动摇。阿尔巴托夫谈到这一问题时指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困难使得赫鲁晓夫转而放慢而不是加速去克服斯大林主义，放慢而不是加速去进行改革，首先是实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在赫鲁晓夫和当时的整个领导对东欧一些国家，尤其是匈牙利和波兰政治危机作出的反应中，这一点表现得更为明

---

<sup>①</sup> 转引自（苏）尤里·阿法纳西耶夫编，王复士等译：《别无选择》，辽宁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06页。

显。”而中国因素对赫鲁晓夫在这一转变中，也起了不小的作用。中国先后发表一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和“九评”，在当时形势复杂和思想混乱的条件下，“中国的宣传就不难于在一些问题上把我们吓住，迫使我们处于守势，促使我们采取前后不一贯的，或完全错误的立场。”<sup>①</sup>

这里顺便就有关中苏大论战问题说几句。1989年5月邓小平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说：“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sup>②</sup>从邓小平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中苏大论战脱离了已经变化的历史实际，论战双方尽管都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自居，而实际上都没有与时俱进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1983年11月6日，邓小平曾对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谈到国运大论战时说：“我们的错误不是在个别的观点，我们的真正错误是根据中国自己的经验和实践来论断和评价国际共运的是非，因此有些东西不符合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原则。”<sup>③</sup>这样的背景下，对赫鲁晓夫进行浅层次的、不触及斯大林模式要害的改革横加批判，“九评”连赫鲁晓夫在改革经济体制过程中提出物质刺激、利润原则、改变官僚主义的农业计划制度等，都说成是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是修正主义。大论战，无疑对苏联当时正在进行的经济改革会产生影响。对中国的影响是，强化了斯大林模式，理论上更加教条化。更为不幸的是，大论战和农村开展社教运动实际上为“文化大革命”做了理论、舆论和政治准备，把中国最后带入“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全国上下到处抓大大小小的“赫鲁晓夫”。

如果说大论战的积极意义，也许可以说，使中国彻底摆脱了苏联的控制，打破了苏共在国际共运中的霸主地位。邓小平讲：“我们一直反对苏共搞老子党和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他们在对外关系上奉行的是霸权主义的路线和政策。”<sup>④</sup>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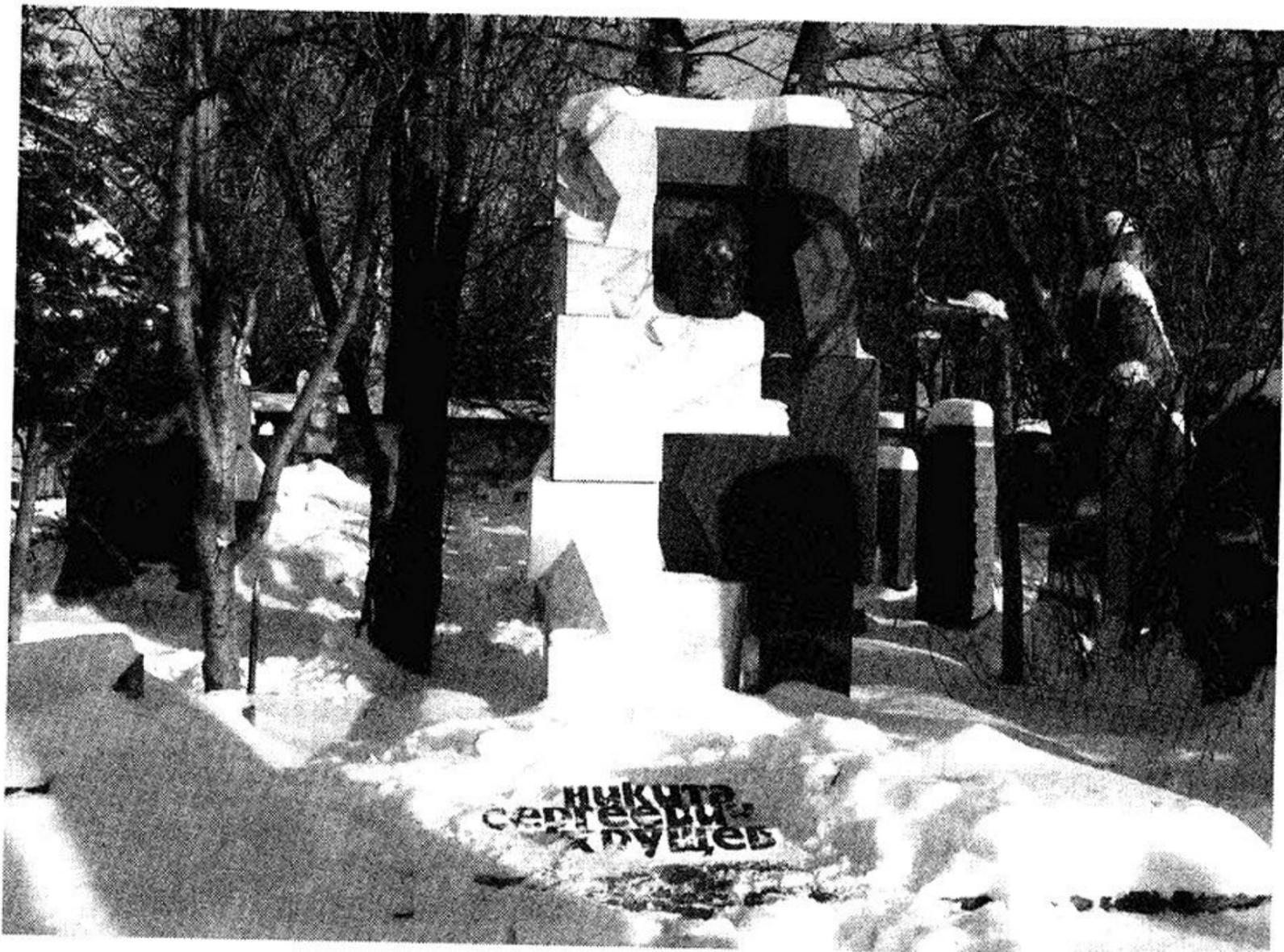
①（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第66、133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1页。

③《邓小平年谱》（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944页。

④《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9页。

“我们反对‘老子党’，这一点我们是反对得对了。”<sup>①</sup>



赫鲁晓夫的墓碑。

---

<sup>①</sup>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7页。

## 53. 赫鲁晓夫下台的真实原因是什么？

陆南泉

过去有人说，赫鲁晓夫下台是中国“九评”批倒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以下史实从一个侧面也可说明这一点。赫鲁晓夫下台后，中共中央对此立即进行研究，并作出决定，派周恩来率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庆典，了解一下情况，试探改善中苏关系的可能性。1964年11月9日，周恩来和苏共新领导会谈时，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米高扬说：过去苏共是集体领导的，在同中共中央分歧问题上，苏共中央内部甚至在细节上也是没有分歧的。后来，周恩来询问赫鲁晓夫下台的政治原因，苏共新领导没有立即答复，只是到了第三次，即最后一次会谈时，苏共新领导用了20分钟时间泛泛答复周恩来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路线和苏共纲领是正确的，不可动摇的。赫鲁晓夫主要是在国内工作的某些方面，以及在工作作风和领导方法方面犯了一些错误。<sup>①</sup>这说明，苏共方面认为，赫鲁晓夫在中苏关系方面并没有错，当然，大论战也不是影响赫鲁晓夫领导地位的原因。

赫鲁晓夫下台的真正原因，苏斯洛夫在1964年召开的苏共中央十月全会上所作的主题报告中作了说明。他列举了赫鲁晓夫一系列的严重错误。但在苏共中央全会召开前，苏共中央主席团曾委托主席团委员波利扬斯基起草苏共中央主席团向苏共中央全会的报告。之所以没有采用波利扬斯基起草的报告而最后采用苏斯洛夫的报告，其主要原因有：一是波利扬斯基起草的报告虽较全面、深刻和尖

---

<sup>①</sup> 参见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259—260页。

锐，但有些错误的责任很难说完全由赫鲁晓夫一人承担，中央主席团其他成员也难脱干系，出于策略考虑，未加采用。而苏斯洛夫的报告方案较温和，只是概括地、粗略地列了赫鲁晓夫的主要错误；二是苏斯洛夫的报告方案回避了对外政策方面，特别是在同与各国共产党关系方面的错误。而波利扬斯基起草的报告，涉及对外（包括对各国共产党国家）的关系，还在总体上肯定苏共反华政策的前提下，也承认对华政策中的某些错误。两份报告虽有差别，但基本内容和观点是一致的。并且，这两份报告的一开头，都强调苏共二十大的各项决议和党的纲领所确定的路线是正确的。这里，我们着重从体制、经济等苏联国内问题，分析赫鲁晓夫下台的真正原因。

### 背离列宁主义集体领导原则

赫鲁晓夫背离列宁主义集体领导原则，造成以下状况：对带有根本性的重大的内外政策问题，中央集体无法进行自由的、切实的讨论。赫鲁晓夫公然无视党与政府领导集体的意见，不再考虑其他领导人的主张，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力图建立他的个人专政；赫鲁晓夫自以为绝对正确，骄傲自满，毫无根据地企图充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理论与实践家；他把一切成就不是归功于党，而是全部归功于他个人；他到执政后期，尽量摆脱苏共中央及其主席团的监督；在工作中，不尊重别人，只要别人谈谈自己的看法，立即就被打断，经常怒气冲冲地吼叫，极端粗暴，为所欲为，任性，心胸狭窄和热衷于发号施令；赫鲁晓夫的个人崇拜虽未最后形成，但正处在形成过程中，处于复发阶段……一句话，在苏共中央“形成了一种令人不能容忍的局面，使得中央主席团不能正常地进行工作”。<sup>①</sup>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苏共中央主席团不得不下决心让赫鲁晓夫离开领导岗位。

写到这里不禁要问，赫鲁晓夫上台后就把很大精力花在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揭露其独断专行产生的严重弊端问题上，后来，他为什么在不少方面又走斯大林的老路呢？斯大林的一些不良品质怎么又在赫鲁晓夫身上得到反映呢？在波利扬斯基起草的报告中，对此作了一些分析。事情的发生亦是有一个过程的。斯大林去世后，苏共“一面揭露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一面遵循列宁的警告，并没有

---

<sup>①</sup> 引自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3号全宗，67号目录，223号案卷。

立即委托给赫鲁晓夫同志无限的权力。初期他仅仅领导苏共中央，担任中央第一书记。在这一时期，尽管他犯过一些错误和失误，总的说来还是相当谨慎地使用权力，尊重领导人集体的意见。因此，当1957年推举部长会议主席人选时，党中央委员会提名赫鲁晓夫，认为他在这方面也会正确地使用权力。他当时的行为没有引起人们的担心。此外，当时允许这种权力集中还出于一些国内和国外形势的考虑”。“我们党及其中央委员会，在推举赫鲁晓夫同志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之后，不断地对他表示关注，使他能够出色地履行这些崇高的职责，少犯错误，少出差错，使他的威望不断提高和巩固。的确，由于苏共中央委员会和全党的努力，为他树立了不小的威望。”“应当承认，赫鲁晓夫同志在初期似乎还能理解这些事实真相，对自己的威信所以不断提高似乎还有自知之明。”“大概正因为如此，我们的警惕在某种程度上放松了。”“当时的形势也助长了这个问题的发展。我指的是派别活动分子——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拥护者向党发动进攻的那个时期。当然，他们也向赫鲁晓夫同志发动了进攻。我们在反击的过程中，按照斗争的逻辑，不得不说许多赞扬赫鲁晓夫的话，而且那时又不能批评他。看来，他由此得出关于他本人的、完全不正确的结论。”这里可以看到，在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没有触动的情况下，在党内没有民主、对最高领导缺乏监督机制的条件下，起初沿着正确路线前进的赫鲁晓夫，之所以会背离这条路线，“这首先是权力过分集中在一个人手中的结果。”“权力集中在一个手中，势必潜伏着产生严重危险的可能性。”<sup>①</sup> 亚·尼·雅科夫列夫对此说道：“人是脆弱的：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腐败。”<sup>②</sup>

## 改革不成功，经济的恶化与混乱

下面根据波利扬斯基的报告材料作些分析。<sup>③</sup>

(1) 一些国民经济综合指标下降。根据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提供的材料，

---

① 引自解密档案材料，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3号全宗，67号目录，223号案卷。

② (俄)亚·尼·雅科夫列夫著，徐葵等译：《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18页。

③ 表1、表2和相关材料，引自解密档案材料，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3号全宗，67号目录，223号案卷。

社会总产值从1956年到1963年8年间，增长速度降低了一半（见表1）。

表1 社会总产值下降情况

| 年份        | 年均增长率（%） |
|-----------|----------|
| 1950—1953 | 10.6     |
| 1953—1956 | 11.1     |
| 1956—1959 | 8.9      |
| 1959—1962 | 6.9      |
| 1962      | 6.0      |
| 1963      | 5.0      |

国民收入指标也出现了下降，从1956年到1963年8年间，国民收入增长速度降低了2/3（见表2）。

表2 国民收入下降情况

| 年份        | 年均增长率（%） |
|-----------|----------|
| 1950—1953 | 11.0     |
| 1953—1956 | 12.0     |
| 1956—1959 | 8.9      |
| 1959—1962 | 6.9      |
| 1962      | 6.0      |
| 1963      | 4.0      |

(2) 一些重要的质量指标不断恶化。以固定资产的利用指标为例，在七年计划<sup>①</sup>的4年当中，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上述指标降低了9%，而在农业当中甚至降低了21%。劳动生产率也不断下降。1950—1955年，工业中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7.8%，而在七年计划的年份里，工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实际下降到5.6%，1962年为5.5%，1963年为5.2%。而按中央统计局的汇总材料来看，劳动生产

<sup>①</sup> 1959年召开的苏共二十一大通过的1959—1965年国民经济七年发展计划。

率增长计划已经超额完成了。

工业中的“第一部类”与“第二部类”之间的比例更加失调。到1963年，这种比例失调已经达到创纪录的水平。当年，“第一部类”的增长速度为10%，比“第二部类”的5%高出1倍。

(3) 农业生产形势严峻。按七年计划规定，1959—1963年农产品的年均增长速度应为8%，而实际上，前4年的年均增长速度为1.7%，1963年则为负增长，按价值计算的总产量低于1958年的水平。5年中，国营农场的农产品成本理应降低2.1%，实际上却提高了24%。严重缺粮和缺饲料，导致大量屠宰牲畜，结果是使肉、油、蛋及其他产品严重缺乏。到1964年，肉类产品在各地几乎普遍出现长时间脱销。在1963年，苏联国内甚至连面包供应部发生了严重的困难。为此，赫鲁晓夫甚至建议实行粮食凭卡供应制度。后来动用了860吨黄金，从加拿大和美国进口粮食，另外还动用了国家的国防储备粮，才未实行凭卡供应粮食制度。

通过农业改革提高农业工作人员对物质利益的关心问题，也未能得到很好的解决。1958年，集体农庄一个人日的劳动报酬所得的货币与实物报酬合计为1.56卢布，而到5年后的1963年，仅增加到1.89卢布，5年期间一共增加36戈比，即一个人日的劳动报酬每年才增加7戈比。

从赫鲁晓夫执政后期来看，苏联经济的发展状况表明，改革远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赫鲁晓夫迈着笨拙的步子急急忙忙地去追赶美国，结果以出丑告终。”

以上我们仅从经济角度分析了赫鲁晓夫下台的真实原因，应该说，这是主要原因。但赫鲁晓夫的政治体制改革（如干部更新制度）和对外政策的一些失误，对他垮台也不是没有影响。如赫鲁晓夫喜欢出国访问，在对外活动中竭力让外交部、外交官靠边站，力图通过他本人去解决很多国际问题。再如，他出国喜欢携带家眷及大量随行人员。1959年赴美访问，随行人员为150人，带上了夫人、儿子、女儿、女婿，并带去一大批礼物，当时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另外，在赫鲁晓夫执政的后7年当中，“苏维埃国家在无任何重大理由和根据的情况下，已经三次陷入战争的边缘。”<sup>①</sup>

---

<sup>①</sup> 这是指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1958年的“柏林问题”危机和1962年的加勒比海危机——作者注。

## 54. 如何看待苏联和东欧国家去斯大林模式的改革？

项佐涛

从1948年苏南冲突继而南斯拉夫逐渐走上了一条与斯大林模式有所不同的不结盟自治社会主义之后，苏联和东欧国家先后出现了一系列的去斯大林模式的改革，如苏联的赫鲁晓夫改革和戈尔巴乔夫改革、匈牙利的纳吉改革、波兰的哥穆尔卡改革，捷克斯洛伐克的杜不切克改革等。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苏联和东欧国家去斯大林模式的改革呢？这实际上涉及两个问题，一是苏联和东欧国家为什么会去斯大林模式的改革，二是如何评价这些改革。

### 与斯大林模式的时空适应性相关

所谓斯大林模式指的是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确立起来的一种包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教育等方面的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体制。斯大林模式的产生与俄国的政治文化传统和特殊环境有关。第一，俄国政治文化的特点是专制。沙皇是国家的核心和象征，在日常生活中起着重大作用。政治变革、经济变迁、宗教活动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都由沙皇操纵和决定。第二，俄国经济发展与西欧相比非常落后。在十月革命前，俄国资本主义虽然有了一定发展，但远远落后于英美等发达国家，自给自足的村社经济仍占很大比重。在俄国历史上，国家干预经济是常态。从1861年农奴制改革开始，俄国的现代化就是在沙皇政府的推动下开始的。第三，现代化的迫切需要。面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像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若是不实行工业化，就会沦为西方大国的附庸。然而，在外

国资本控制着丰富的资源和巨大的市场的背景下，尽管俄国的私人资本有一定的发展但力量十分薄弱，不足以完成工业化。因此，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客观上讲肩负的是实现现代化的历史使命。<sup>①</sup> 第四，20 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面临的国际形势非常险恶。虽然击败了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但是，苏联一直被战争的阴影所笼罩，一切社会生活都以战备为轴心的发展思路得到了广泛的认同。<sup>②</sup> 这四个产生条件决定了斯大林模式担负着维护国家独立和社会现代化的历史使命，以及实现这些任务的方式是高度集中的。

在实践中，斯大林模式的确成为落后国家通过高度集中的政治力量整合全社会的资源、快速现代化的一种方式。<sup>③</sup> 苏联和东欧国家都通过采用斯大林模式建成了一套基本完备的工业体系。为了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中生存，重工业被放到优先发展的地位，而利用农业全盘集体化剥夺农民则成为工业积累的主要方式之一。这种“以野蛮战胜野蛮”的工业化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苏联综合国力的提高，使苏联在不长的时间内就成为能与美国相抗衡的超级大国。

然而，任何国家的现代化能够持续进行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保持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二是将现代化的成果在社会各个阶级、阶层间合理分配，以产生支持现代化进行的阶级基础。斯大林模式却不能满足这两点。

第一，计划经济模式的优点在于它超强的动员能力，能够在短时期内集中人力和物力迅速建成工业项目，但也有严重的缺陷——它的经济管理方式是粗犷型的。企业一经建成，弊端随之暴露。对领导者来说，最重要的业绩不是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而是如何完成上级布置的计划任务。即便工厂有能力超额完成任务，他们也不愿意这样做，因为上级制定下一年的计划的根据是当年的产量。这样一来，计划制定者得到的信息严重失真，计划经济因而成了一种特殊的“无

---

<sup>①</sup> 参见张光明著：《布尔什维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分野》，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91—192 页。

<sup>②</sup> 沈宗武：《斯大林模式产生的深层社会原因》，《重庆社会科学》2000 年第 4 期，第 7—9 页。

<sup>③</sup> 参见（美）摩尔·巴林顿著，拓夫等译：《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华夏出版社 1987 年版；（美）W·W·罗斯托著，郭熙保、王松茂译：《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罗荣渠著：《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商务印书馆 2004 年版。

序”经济。<sup>①</sup>正如有的学者指出：以强制增长为核心的计划经济模式并非没有经济增长的极限，通过最初一代人“节衣缩食”换取的高速经济增长，无法长期维持，“经济增长率迟早会逐渐下降，而且越来越明显。每一代人为下一代人留下沉重的包袱（由于总是推迟，紧急和繁重的任务将不断累积）和极不协调的经济结构”<sup>②</sup>。

第二，从现代化成果分配的角度看，社会内部也会出现极大的不平等。掌握行政大权的领导者垄断了所有政治资源，广大民众基本处于无权状态。各级领导成为经济计划的制订者和执行者，垄断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分配和使用，按官职大小享受特殊住房、特殊服务、特殊供应和特殊工资等。他们虽然不拥有大量的私有财产，但有特权，因为特权不是直接与私有财产挂钩而是与权力直接挂钩。他们可以通过手中的权力占有集体的和国家的财产。领导者的官阶不同，享受的“权利”也不同，“一切都取决于官级高低”。<sup>③</sup>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广大民众却生活在日益加剧的“短缺经济”中。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尽管经济增长带来的大部分效益被特权阶层截取，但由于各国经济增长还是保持了较高的增长率，计划经济下的福利政策还能够维持，可普通劳动者的生活水平仍是很低。从7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经济停滞，各国的福利政策遇到很大困难，生产和生活资料的供给匮乏的现象更为突出，以至于根据国家计划凭票分配的分配方式逐渐难以维持。<sup>④</sup>当权者还垄断着意识形态的解释权，任何不同的观点都会被视作为“毒草”或“另类”。通过政治、经济、文化资源三位一体的垄断，这些领导者成为了一个脱离人民群众的特殊群体，有人称其为“特权阶层”，<sup>⑤</sup>有

---

①（捷）奥塔·锡克著，张秀山译：《经济体制——比较、理论、批评》，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85—94页。

②（匈）雅诺什·科尔奈著，张安译：《社会主义体制——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192页。

③（俄）鲍里斯·叶利钦著，朱启会、荣合译：《我的自述》，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59页。

④ Kizilyalli, Hüsnü,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A New Methodology for Transforming a Socialist Economy to a Market - led Economy and Sketches of a Workable Macroeconomic Theory*, London: Ashgate Publishing Ltd., 1998, pp. 165—167.

⑤（苏）列夫·托洛茨基，柴金如译：《被背叛了的革命》，三联书店资料室1963年版。

人称其为“新阶级”。<sup>①</sup>

总的看，斯大林模式时间上适应性的表现就是在任何一个国家里都是在初始阶段正面效应大，负面效应小。但从长远看，随着落后国家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程度的提高，它就会越来越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这也就是所有苏联和东欧国家或早或迟都要进行改革的原因。同时，由于采取斯大林模式的国家的初始条件不同，便产生了斯大林模式空间上的适应性差别。它的具体表现就是政治上专制传统越强、经济发展越落后的国家就越适用斯大林模式。反之，民主传统越强、经济越发达的国家就越不适用斯大林模式。正因为如此，苏联和东欧国家在同一时间内对它价值的评价不一样，与此相适应是进行改革的时间前后有差别。改革斯大林模式的呼声首先出现在东欧，其次是苏联。这种因时间和空间差别而产生的分歧也成为影响苏联和东欧国家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多数东欧国家试图摆脱斯大林模式，而苏联绝不容许东欧国家超越它允许的底线。

### 与斯大林模式的多层次性相关

斯大林模式是由多个方面构成的统一体，这一点相关文献都讲得很清楚了。<sup>②</sup>概括地说，政治方面，共产党是唯一的执政党，没有任何反对党派。共产党内实行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的原则，权力集中在党内少数人乃至最高领导人一人手中。党政合一、议行合一，党和国家的行为不受法律限制。经济方面，实行单一的公有制和排斥市场规律的指令性的计划经济，以高度集中的行政手段管理经济，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决策权、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支配权全部集中在中央，党和政府通过发布命令、作出决议的办法和采取行政组织手段与各企业和经济组织发生关系，组织社会经济生活，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产品供销、价格等统统由国家规定，企业没有自主权。意识形态方面，实行思想灌输和控制，

---

<sup>①</sup> Milovan Djilas, *The New Class: an Analysis of the communist system*,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Inc., 1957.

<sup>②</sup> 参见李宗禹主编：《国外学者论斯大林模式》，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李宗禹等著：《斯大林模式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姜长斌等著：《斯大林政治评传》，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陆南泉著：《苏联经济体制改革史论（从列宁到普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将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作为唯一正确的真理并通过党和国家的宣传机器向人民群众灌输。对外关系方面，强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国家的对抗性和前者战胜后者的必然性。

然而，斯大林模式的这些方面相互之间有着复杂的立体交叉的关系。哪些属于它的核心内容，哪些属于它的深层内容，哪些是它的浅层内容？哪些方面易变也可以变，哪些方面难变甚至也不能变？这种变实际上就是通常所谓的改革，但相关文献却鲜有从这种角度论及。悖乎常规、常态的斯大林模式是一种球状的社会发展结构，易变的或可变的都是从外层开始。比起经济、意识形态和对外关系等方面，政治被置于对斯大林模式起决定性作用的里圈，最先形成。不过，政治方面也分为政治制度和行政管理两个主要部分，前者基本上是不能触动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共产党一党执政是核心，决定着社会的性质。后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变换，也容易变化并且不会从根本上损害社会制度本身。经济反倒被置于政治的外层，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和运行机制两大部分构成。虽然生产资料的公有化程度和是否存在市场曾经在一段时间内成为判断姓资姓社的标准，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中，经济领域的改革要比政治领域的改革容易一些，改革程度更深，力度也更大，往往是经济运行机制先变，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后变，同时，二者也都会经历一个从浅到深渐进的过程。对外关系服务于政治和经济的需要，同时又会反作用于政治和经济。虽然预设的对外关系，例如两个平行市场原则、苏联与东欧国家的关系，会直接影响到各国国内政治和经济的发展（东欧国家更是如此），但是相对政治和经济领域的改革而言对外关系领域的改革更容易。赫鲁晓夫时期提出了“三和”并要求东欧国家与其保持一致，南斯拉夫的对外关系则一直具有很大的灵活性，而整个东欧国家与西方国家的关系自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自发地出现了实质性的回暖（早于东欧国家80年代的政治经济改革）。意识形态和文化则是斯大林模式的其他方面的保护层，它们打造着斯大林模式的神圣光环。斯大林模式的政治、经济和外交方面都有各自特定的理论和舆论支撑，要想改革某个方面，首先必须破除支撑它的意识形态和文化部分，否则改革难以进行。改革要想成功也必须使支持它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获得合法性。因此，社会主义国家改革过程中都出现过理论先行、解放思想的现象。

斯大林模式的多层次性决定了去斯大林模式的改革要想取得最终成功必须是全方位的改革，而不能只改它的某一个方面或几个方面，或者某一个方面或几个

方面的某一个部分或某些部分。特别是改革不能不触动以党权高于一切，权力不受制约的政治权力结构和权力运行机制。无论是南斯拉夫的改革、赫鲁晓夫的改革、纳吉的改革、哥穆尔卡的改革，还是布拉格之春，都只是对斯大林模式的小修小补，而不是全方位的改革。这导致了它们的最终失败。同时，斯大林模式的这一特征还决定了去斯大林模式的改革必须是分阶段、分层次、有步骤的改革，要分清楚改革的不同方面的先后次序，把握好改革的时机，而不能随意地改革；要有改革的决心和智慧，不能遇到挫折和困难，就灰心丧气或者盲目地转换改革的目标。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的原因便在于此。



# 第四编 勃列日涅夫时期





## 55. 如何在苏联历史上给勃列日涅夫 执政时期定位？

徐 葵

勃列日涅夫 1964 年 10 月 14 日取代赫鲁晓夫上台执政，在苏联执政达 18 年之久。他在苏联历史上执政时间之长位居第二，仅次于执政 30 年的斯大林。勃列日涅夫执政年代在苏联 70 多年历史上的地位及其对苏联历史发展的影响，很值得我们全面和深入地加以研究。

从表面上看，勃列日涅夫执政的这 18 年，苏联保持了前所未有的平稳局面（这 18 年中未发生过斯大林和赫鲁晓夫执政时期经常发生的路线斗争和党内斗争），60 年代下半期苏联经济取得了较快的发展，到 70 年代初苏联还在战略核武器上取得了同美国的平衡。苏联作为一个超级大国，在世界上一时似乎不可一世。但正是在这 18 年中，苏联积累了大量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逐步导致国家政治生活和经济发展的全面停滞。从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苏联和俄罗斯发表的许多材料来看，我们可以说，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是苏联由盛转衰的一个关键性转折时期。本文拟从勃列日涅夫其人，勃列日涅夫执政的几个阶段及其主要特征，对勃列日涅夫在苏联的执政时期进行一些分析。

### 勃列日涅夫生平和其人

在过去苏联最高领导人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下，党的最高领导人对其执政时期苏联历史的发展状况，无不产生深刻的影响，勃列日涅夫也不例外。要研究长达 18 年的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首先需要对勃列日涅夫其人和他的一些特点作

一番考察，以知其人而明其政。

勃列日涅夫活了76个春秋。他于1906年12月19日出生于乌克兰第聂伯河下游的卡缅斯科耶市。他的父亲伊里亚·勃列日涅夫是个小职员，母亲娜塔莎是个家庭妇女。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本人是这个家庭的长子，他下面还有弟、妹各一人。卡缅斯科耶在俄语里意为“岩石”，该市因沿河有石矿而得此名。在19世纪以前，这是一个不知名的小村落。1887年，法国和比利时合营的南俄公司选中了卡缅斯科耶，在此兴建了乌克兰第一座冶金厂，该厂于1889年建成了头两座鼓风炉。勃列日涅夫的祖父雅科夫·勃列日涅夫原是俄罗斯的库尔斯克的农民，那时他带了全家来到卡缅斯科耶，进了这家工厂做工。他的儿子伊里亚也跟他进了这家工厂。卡缅斯科耶后来逐渐兴旺起来。到1913年末，已成为一个有2.2万多人口的热闹市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几年里，勃列日涅夫家的家境逐渐好起来，已从该市的工人区迁居到条件较好的另一个区。到1913年，卡缅斯科耶冶金厂已拥有5座鼓风炉和10座马丁炉，铁产量达到了49.9万吨，成为战前乌克兰最大的冶金厂。

勃列日涅夫就在卡缅斯科耶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从1915年到1921年（勃列日涅夫9岁到15岁），他在卡缅斯科耶的一所学校（原名古典中学，革命后改名为工人学校）读了6年书。十月革命后，卡缅斯科耶冶金厂在内战中遭破坏，直到1925年才恢复生产。1921年，勃列日涅夫从工人学校毕业时，卡缅斯科耶工厂停工，职工生活十分困难，勃列日涅夫一家只好回到俄罗斯的库尔斯克老家去务农。约一年后，勃列日涅夫的父亲带着家小又返回卡缅斯科耶。但勃列日涅夫本人仍留在库尔斯克，从1923年到1927年，他上了库尔斯克土地管理和土地改良技术学校。其间，他结识了一个女护士，那就是他后来的妻子维克托莉亚·彼得罗芙娜。1926年，他曾到白俄罗斯南部奥尔沙附近的一个区里当过土地测量员。1927年从库尔斯克土地技术学校毕业后，勃列日涅夫东去乌拉尔州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在那里做了三年的土地管理工作；1927—1928年任该州一个区的副土地督察员；1929—1930年，任该州比谢尔德区的土地部主任；1930年任该州一个地区的农业管理局副局长。1930年，勃列日涅夫离开乌拉尔到莫斯科，进了加里宁农机学院，在该校学习到1931年。此时，苏联正掀起农业集体化的高潮。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此时却告别了在俄罗斯曾从事的农业工作，又回到乌克兰老家卡缅斯科耶市（1936年后改名为第聂伯罗捷尔仁斯克市）。勃

列日涅夫于1929年10月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的比谢尔特区被吸收为联共（布）预备党员，1931年在卡缅斯科耶工厂里转正为联共（布）正式党员。

回到乌克兰后，勃列日涅夫在1931年到1935年期间曾在卡缅斯科耶冶金厂做过工，同时还参加冶金学院函授班的学习，并先后担任过冶金学院的工会主席和党委书记（不脱产）。1935年，他从该校毕业，取得了工程师的文凭，成为一名党员技术知识分子；毕业后到捷尔仁斯克工厂当过几个月的车间主任。这之后，29岁的勃列日涅夫应招去服了约一年的兵役，到赤塔坦克学校当过学员，后又担任过第14机械团坦克连的政治委员。服兵役回来，勃列日涅夫在1936—1937年又当了第聂伯罗捷尔仁斯克冶金技术学院的院长。

30年代中，苏联实现了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斯大林已牢固地确立了自己的领袖地位。1934年1月，联共（布）召开了被称为“胜利者的大会”的第17次代表大会。这年12月，发生了基洛夫被暗杀事件，其后几年苏联就开始了连续几年的“大清洗”运动。当时的乌克兰，2/3的州一级领导人，1/3的市、区级领导人都遭撤换。这种历史条件为勃列日涅夫这一代在十月革命后成长起来的一批年轻干部提供了升迁的机遇。正是在这种情况下，1937年勃列日涅夫被提升为第聂伯罗捷尔仁斯克市的市苏维埃副主席，1938年被调任该市所属的第聂伯罗彼德洛夫斯克州的联共（布）州委商业部部长。1939年，33岁的勃列日涅夫升为州委主管宣传工作的书记，后来又主管州里的工业和国防工作，直至1941年卫国战争爆发。

1941年6月德国法西斯入侵苏联后，勃列日涅夫在该州为向后方拆迁工厂忙了约两个月，7月中当德军迫近第聂伯河湾的时候，勃列日涅夫应征入伍，从此他在军队中经历了整个战争年代。1941年他首先以中校军衔入伍，担任南方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1942年4月—1945年4月，担任第18集团军政治部主任，在这段时间中获得上校和少将军衔。1943年夏末，第18集团军在高加索会战中发动了进攻德军的塔曼战役，收复了诺沃罗西斯克。勃列日涅夫参加了这场战役中的“小地”之战。是年冬，第18集团军归属乌克兰第一方面军。该集团军在1944年一年中多次参加了解放乌克兰的战役，在1945年初进入捷克斯洛伐克，5月解放了布拉格。勃列日涅夫这几年作为集团军政治部主任参加了第18集团军的所有战斗。1945年6月24日，斯大林在莫斯科红场检阅苏联红军各部队的代表队，其中包括第四乌克兰方面军的一个混合团，勃列日涅夫是率领这个团通过

红场的四个将军之一。战后初期，勃列日涅夫仍在军队中担任乌克兰西部军区的政委。

从1946年8月到1950年初，当赫鲁晓夫担任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时，勃列日涅夫在乌克兰参与了战后的复兴工作，曾先后担任扎波罗热州委书记（1946年8月—1947年10月）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委书记（1947年11月—1950年初）。

1949年底，赫鲁晓夫调任莫斯科市委书记，同时担任苏共中央书记处五名书记之一。经赫鲁晓夫提名，勃列日涅夫于1950年7月被调往摩尔多瓦担任该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以取代因加速农业社会主义化和根除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不力而被撤职的原第一书记科瓦尔。当时苏共中央推荐勃列日涅夫担任摩尔多瓦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的文件中对他的评价是：“勃列日涅夫同志是一个有20多年党龄的、年富力强的同志。他当过土地规划员和冶金工作者，熟悉工业和农业。他多年来担任州委第一书记的工作就是证明。他是个经验丰富、有毅力和孜孜不倦的人，经历过战争的全过程，拥有将军军衔，处事果断……”勃列日涅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解释说，果断不是急于发号施令，或匆忙地作出决定，而是遵守制度，执行纪律和无条件地对党委托他完成的任务负责。<sup>①</sup>从这份鉴定和在近30年后勃列日涅夫自己对它所做的解释来看，苏共一贯把执行型干部当做好干部的标准。

1952年10月，勃列日涅夫作为摩尔多瓦的党代表到莫斯科参加苏共第19次代表大会，成为大会秘书处和资格审查委员会成员，并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第一次看到这位46岁的年轻的共和国党中央书记，大概对他印象不错。在代表大会后的苏共十九届一中全会上，斯大林提议设立有25名正式委员和11名候补委员组成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以取代原来的政治局，并把书记处书记由5人扩大为10人，他提出的书记名单中包括勃列日涅夫。这样，勃列日涅夫就被选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并进入了书记处。根据档案材料，勃列日涅夫在乌克兰和军队中工作时在干部登记表的民族栏中一直填自己是乌克兰族，但到莫斯科苏共高级机关工作后，就改填为俄罗斯族。这看来是

---

<sup>①</sup>（苏）列·伊·勃列日涅夫著：《勃列日涅夫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3—4页。

出于更便于上升的考虑。

当时，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中央只工作了几个月。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后，勃列日涅夫不再担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和书记处书记，而调任苏联海军部政治部主任，随即苏联海军部和陆军部两部合并，勃列日涅夫又改任国防部政治部副主任。1953年9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提出垦荒计划。当时哈萨克斯坦党中央领导人不同意在哈垦荒。1954年1月哈萨克斯坦党中央领导人被撤职，2月赫鲁晓夫派波诺马连科和勃列日涅夫到哈萨克斯坦担任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和第二书记，在那里实施垦荒计划。1955年中波诺马连科遭贬职，被派往国外当大使，勃列日涅夫接任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在哈萨克斯坦工作了两年时间。



晚年的勃列日涅夫。

1956年2月，勃列日涅夫到莫斯科出席了苏共二十大，在二十大上再次被选为苏共中央委员。大会后又被选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和书记处书记。从此他又回到苏共中央工作，当年他正好50岁。在1960年前在苏共中央工作的那段时间中，他主要主管国防工业和宇宙航天事业，曾参与了拜科努尔火箭发射场的建设和1957年苏联第一批火箭的发射工作。1956年苏共中央6月全会上，赫鲁晓夫把“反党集团”开除出党中央后，勃列日涅夫被晋升为主席团正式委员。1958年任苏共俄罗斯联邦局副局长。勃列日涅夫的个人笔记表明，在苏共二十大上听了赫鲁晓夫

作的秘密报告后，他对其反斯大林的做法是不以为然的。有档案材料说明，在1957年赫鲁晓夫反对“反党集团”的斗争中，勃列日涅夫则是支持赫鲁晓夫的。

1960年5月，赫鲁晓夫削减了苏共中央主席团和书记处的人员。此时，勃列

日涅夫再一次离开了苏共中央，转到苏联最高苏维埃担任主席团主席，直到1963年6月。在这三年中，他从事了许多比较轻松的礼仪性活动，并多次到东欧和第三世界国家访问。1963年6月，他重新进入苏共中央书记处，同时兼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64年7月，米高扬出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赫鲁晓夫让勃列日涅夫集中精力到苏共中央书记处工作。赫鲁晓夫对勃列日涅夫一贯顺从听话比较满意，此时似有意让他做第二把手，但嫌勃列日涅夫工作不够果断和对事常表现得犹豫不决。勃列日涅夫这次回到党中央后，权力比三年前在党中央工作时扩大了，此时整个国防工作归他领导。

勃列日涅夫回苏共中央书记处后不久，1964年10月苏联就发生了搞掉赫鲁晓夫的“宫廷政变”。根据苏联发表的许多材料，勃列日涅夫在这次“宫廷政变”中所起的远不是主要的作用。这次政变的主要策划者是谢列平和苏斯洛夫，尤其是谢列平。具体的重要组织者则是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伊格纳托夫和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内。勃列日涅夫事先仅听闻其事，并表示同意。10月5日，他率代表团去东德访问，参加民主德国建国15周年活动。12日才回到莫斯科，领导苏共中央全会的准备工作。13日早晨，由他打电话给在南方休假的赫鲁晓夫，要他回莫斯科参加中央全会。根据有些材料，关于赫鲁晓夫及其接替者的问题是在13日晚由苏共中央主席团和书记处成员，外加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四个加盟共和国的党中央书记共22人（有的材料说还有国防部部长）讨论决定的。14日召开中央全会时，在全会上发言批评赫鲁晓夫的主要是苏斯洛夫等几个人。勃列日涅夫主持了全会，但发言不多。米高扬建议解除赫鲁晓夫第一书记职务，而保留他的部长会议主席职务，但这个建议在会上遭到反对。勃列日涅夫在这次中央全会上当选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根据一些当事者的回忆，在策划推翻赫鲁晓夫的过程中，大家之所以推举勃列日涅夫担任第一书记，并不是因为大家承认他的领导才能，而是当时苏共领导集团中各种力量为求得暂时的平衡而产生的结果。当时恰恰是他这样一个显得比较平庸的人比较容易为各方面所接受。有的人，例如谢列平，完全把勃列日涅夫看成是一个暂时的过渡人物，准备等待时机取而代之。所以，正如布尔拉茨基所写的：“权力是作为命运的礼物落到勃列日涅夫身上的”。在担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三年任上，勃列日涅夫显得相当满足于那种平稳安逸的名为元首，但无实权的工作和生活。俄罗斯不少历史学家和评论家认为，他对走上第一书记的位子是没有充分

的思想准备的。

根据勃列日涅夫的学习和工作经历，以及俄罗斯一些传记作家和学者的著作中提供的材料、分析和评论，我们可以把勃列日涅夫在个人素质、学识、性格、作风等方面的一些特征描绘如下：

(1) 他的文化、理论素养不高，没有什么突出的才能和智慧，是一个习惯于执行上级指示的照章办事的执行型人才，而不是一个政治家，更不是思想家和战略家。

(2) 他在学习和工作上都不够刻苦勤奋，他不爱读书，极少动笔写作。据翻阅过勃列日涅夫档案的苏联军事历史学家沃尔科戈诺夫说，勃列日涅夫留下的个人档案主要是他生前在记事本或日历纸上写下的大量记事便条之类的东西，每张便条上写一二行至五六行字不等，一般都无标点符号，而且有些常见的人名往往拼写错误。在这批数量相当大的材料中，并未发现勃列日涅夫对什么问题提出过什么创见，或留下过什么思想火花。他不爱看文件和报告，而喜欢听汇报，习惯于让秘书或写稿人把文件念给他听。

勃列日涅夫在世时，苏联出版了九大本《勃列日涅夫文集》，收集了他的大量讲话和报告，这些文件都是他的写作班子为他写的。他晚年出版的、获得了《列宁文学奖》的《小地》、《复兴》和《垦荒地》等几本回忆录，也都是专门组织作家和记者为他写的。他的所有讲话、报告，甚至简单的致辞，都要别人准备讲稿。他极少脱离稿子讲话。在他晚年的时候，即使念稿，也常出错。

(3) 他为人谨慎，秉性保守，习惯于因循守旧，按陈规办事，最怕重大的变革和转折，从不采取急躁冒失的举动。在开会或讨论问题时，从不首先发表意见，总是先听大家的意见，然后尽量照顾各方面的立场和利益加以折中，采取中间路线。所以，有人称他为“妥协能手”。

(4) 他对人温和，不粗暴，对手下不提严格要求，注意外表礼貌，所以容易博得周围和下面人的好感。

(5) 他爱好虚荣和爱听别人阿谀奉承，这是他的一大特点。他对荣誉和奖赏有奇特的癖好。他拥有的勋章和奖章数，比斯大林和赫鲁晓夫两人所得的勋章和奖章的总和还要多，总共达200多枚，其中包括4枚列宁勋章和4枚苏联英雄勋章。有些勋章和军衔是在他的授意下授予的，例如他的元帅军衔就是这样获得的。他死后，送葬行列中为他捧勋章和奖章的军官达44人之多。他这种虚荣心

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当年有机会多次向勃列日涅夫单独汇报工作的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在他的回忆录《信赖》一书中写道，“有一次我去他家里看望他，他让我坐下喝杯茶，而他却走了出去。他再次出现时穿了一身华丽的制服（指元帅制服——作者注），上面挂着他的全部勋章。他问道：我看上去怎么样？‘漂亮极了！’——我还能说什么呢？”勃列日涅夫刚坐上第一书记宝座时，对自己能否胜任信心并不很足，所以每作一次报告，或每见一次外宾，都要问有什么反映，下面的人则投其所好，都把正面反映收集起来向他汇报。这成了制度，苏联的驻外使馆也照此办理。外国的一些政治家，如美国的基辛格和德国的勃兰特，也摸到了勃列日涅夫的这个特点，每次同他会谈后，回国后都要说一些对他的溢美之词。勃列日涅夫喜欢看这些汇报，并越来越感到满足。

(6) 他也是一个喜欢享受和过热闹生活的人。他喜欢抽烟，而且抽得很凶，也喜欢聚宴和喝酒。他的嗜好是狩猎和开高速轿车。直到晚年，他经常去莫斯科郊外的扎维多沃狩猎场，他收藏了100多把豪华的猎枪；他的车库中有苏联国产的和外国送的各种轿车30余辆之多。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他同地方党政领导人之间互相赠送礼品之风也很盛，而且礼品都很贵重。以出产黄金和宝石著名的雅库特自治共和国曾给勃列日涅夫送过一件用黄金和宝石特制的珍贵礼物。苏联剧变后，雅库特自治共和国向勃列日涅夫家属要回了这件礼品。

(7) 他在国内政策上一无治国的坚强意志，二无宽阔的经济视野，三无长远的工作目标；在国际政策上虽然他也说要维护和平和实现裁军，但他信守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关系的传统的教条主义观点，认为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将以社会主义为自己的发展方向。他擅长的是在政治圈里搞权术，他在安排和处理干部上有一套本领。他对被撤下台的干部也很会做安抚工作。如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叶戈雷切夫1967年被撤下时，他专门给叶打电话表示安抚之意，并问他还有什么困难和需要。叶戈雷切夫唯一的困难是他女儿结婚后还无住房，勃列日涅夫立刻下令给她分配了一套住房。

总之，从他的气质、文化教育程度和经历来看，勃列日涅夫是在斯大林体制下成长起来的一个比较典型的党的领导干部，他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执行者，但绝不是一个合适的领袖人物，更不用说是在当时那样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领导苏联这样一个大国和大党的领袖了。对这一点今天俄罗斯的学者、作家和前苏共一些领导干部看法是一致的。但对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时有没有可能选择别的更

有才能的人上台，看法就不太一致。有的人以为当时推举他是看错了人，没有选准选好。有的人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尽管勃列日涅夫没有真正的领袖之才，但当时所有能与他竞争的人也都不比他高明。相反，勃列日涅夫到过农村工厂，搞过农业工业，参加过战争，领导过军工和民族共和国，经验比较全面，在这一层干部素质和水平普遍不高的情况下，很难作出其他更好的选择。综上所述，在分析勃列日涅夫生平及其人之后，我们可以说，勃列日涅夫现象在苏联的出现不能说只是历史的偶然。

### 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的三个阶段

勃列日涅夫执政的18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在他执政期间，苏共召开过四次代表大会：第23次、24次、25次和26次代表大会。从1964年10月勃列日涅夫在“宫廷政变”中上台，经过苏共第二十三大，到1971年的苏共二十四大，是他执政的第一个阶段。在70年代上半期，从70年代初的苏共二十四大到1976年的苏共二十五大，是他执政的第二阶段。苏共二十五大后，经苏共二十六次大，到1982年11月他去世，也就是70年代后半期到80年代初，是他执政的第三阶段。这三个阶段都各有其特点。

#### 一、第一阶段

这是勃列日涅夫上台后逐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在苏共最高领导层中从平等伙伴中的第一把手上升到领袖地位的阶段，这是他逐步放弃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悄悄地为斯大林恢复名誉，并全面恢复苏联传统的政治经济体制和工作方法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勃列日涅夫采取的政策和措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在政治路线上，标榜同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路线的连续性，强调苏共将继续执行二十大、二十二大路线，引导苏联人民沿着共产主义的道路前进，为建设共产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而努力。只是不再提赫鲁晓夫提出的在20年内建成共产主义的口号，而在1967年举行的纪念十月革命50周年大会上作的报告中首次提出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的口号。

(2) 清除赫鲁晓夫的影响，改变赫鲁晓夫推行的一些不得人心的政策和措施，显示出不同于赫鲁晓夫的作风。在1964年10月政变后，勃列日涅夫打发赫

鲁晓夫到莫斯科郊区的一所别墅中以养老金领取者的身份孤独地度过余生。1964年11月，勃列日涅夫废除了赫鲁晓夫把地方上的党组织划分为工业党和农业党的做法，恢复了原来统一的党组织；1965年9月，取消了赫鲁晓夫在经济改革中撤部而建立的地区经济委员会，重建政府部门系统，恢复条条领导，同时废除了赫鲁晓夫强调的干部轮换制，提倡干部队伍的“稳定和团结”；1966年3月，在苏共二十三大上他改换了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名称，恢复为政治局，从此以后勃列日涅夫在党内的头衔就改为苏共中央总书记。他上台后一改赫鲁晓夫的那种急躁粗暴，到处发号施令的“唯意志论”和“随心所欲”的作风，显示出他的不急不忙、谨慎稳定的风格。这些做法博得了不少人心。

(3) 在经济方面，此时赫鲁晓夫时期进行的经济改革问题的讨论和实施的经济体制改革措施在社会上尚有影响，改革在经济领域中还有一定的惯性作用。再加上柯西金在领导经济管理上的声望远在勃列日涅夫之上，而柯西金是主张继续进行经济改革的，因此在勃列日涅夫执政的这个阶段中进行了柯西金的经济改革。同时，这时提出了加紧开发东部地区的任务，上了开发西伯利亚油气田的第一批大项目。在经济方面，此时勃列日涅夫个人比较喜欢抓的是他认为自己比较熟悉的农业。在1965年3月的苏共中央全会上，针对60年代初期苏联农业生产下降，和赫鲁晓夫采取的缩小集体农庄庄员自留地、自留畜的限额和合并农庄农场等错误做法，勃列日涅夫在他做的“关于进一步发展农业的刻不容缓的措施”的报告中提出了当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刺激和加强农业生产的措施，诸如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固定农产品收购量和实行超额奖售、扩大自留地和自留畜限额等。由于在工业经济体制上进行了柯西金的改革措施，在农业政策上采取了勃列日涅夫的上述政策，那几年苏联的经济形势有了好转。但是看一下勃列日涅夫对柯西金和经济改革的态度，就可看出，他对柯西金并不真正尊重，而是力图缩小和排挤柯西金的影响，他对经济改革从来是不热心的，他所信奉的是苏联计划经济的那套传统的管理模式。据说，苏共中央机关的许多干部当时都知道勃列日涅夫对柯西金所作的经济改革报告说过的一句话，“看他想出什么来了？改革、改革……谁需要这个改革？而且，谁懂得改革。现在需要的是更好地工作，这就是全部问题之所在。”<sup>①</sup>

<sup>①</sup> (俄) 费·米·布尔拉茨基著：《领袖和谋士》，东方出版社1992年版，第335页。

(4) 排除异己，安插亲信，营造和巩固自己的权力地位。在这一阶段中，勃列日涅夫在这方面花了很大的心计和力量。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的长处在于组织能力和心理素质上。”<sup>①</sup> 他确实善于培植、使用亲信，安排老相识、老部下。当年在地方上工作时，每次调动工作，他都要带他认为可靠的老部下去新的工作单位。到苏共中央工作后也是如此。在 60 年代后半期到 70 年代初那五六年中，一方面他施展各种权术，把领导层中原来跟随赫鲁晓夫的人、对他地位有威胁的人、对他的领导能力有怀疑的人或敢于提批评意见的人一个一个排挤掉，如伊利切夫、谢列平、谢米恰斯内、波利扬斯基、沃罗诺夫、谢列斯特、叶戈雷切夫、杰米切夫等人都陆续被排挤出最高领导圈子。与此同时，他把在第聂伯罗彼特罗夫斯克州、摩尔多瓦共和国、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工作时的一些老相识、老部下一个一个调到中央，安置在各个重要岗位上，如契尔年科、谢洛科夫、特拉佩茨德尼科夫、巴甫洛夫、格鲁谢沃伊、茨维贡、齐涅夫、吉洪诺夫、楚加诺夫等都是如此。

勃列日涅夫营造的权力基础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苏共中央机关和各地方党委机关领导人，这些人占到中央委员会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他当上党中央第一书记的头一段时间里，每天一上班都要给各州和各共和国的党的第一把手打电话，进行问候，联络感情，询问情况，表示关心下情和下级困难。各地党的书记当然是受宠若惊，不胜感激。为保持地方上干部队伍的稳定，他还宣布，各地干部主要靠本地干部来替补。他下去视察时，对各地干部的态度也同赫鲁晓夫大不一样。赫鲁晓夫爱挑毛病，动辄训人，甚至撤换干部，而勃列日涅夫对下面干部一般都不提严格要求，使下面干部觉得他和善可亲。他还为中央级的高级干部恢复或提高了不少福利待遇，如 1966 年规定，中央级高级干部每年可享受两个半月的休假。这些做法符合一大批干部的利益，自然受到他们的欢迎。在党的机关系统中这些人成了他的重要权力基础。

二是军队系统。勃列日涅夫参加过二战，在军队中待过，后来又主管过军工、宇航和尖端武器生产，同军方关系本来就比较密切，在军队中有不少熟人。1962 年苏联在加勒比海危机时的苏美对抗中蒙受耻辱后，苏联军方刻意要在核

---

<sup>①</sup> (苏) 罗伊·麦德维杰夫等著：《我所了解的勃列日涅夫》，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49 页。

军备上赶上美国，勃列日涅夫对此完全支持。他上台后，苏军方在苏联最高领导层中的影响大大增加了。国防工业问题，对一般政治局委员和财政部长来说，都成了“禁区”，只有勃列日涅夫一人有权过问，其他人谁也不敢问津。<sup>①</sup> 1967年马利诺夫斯基去世后，由格列奇科任国防部长；到1976年由乌斯季诺夫任国防部长。此时勃列日涅夫同军方的关系更加密切，军方成了他的权力的强大支柱。特别是1970年上半年，他在格列奇科陪同下去白俄罗斯检阅了苏军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在军方的支持下，从此以后勃列日涅夫的权力地位明显上升。

三是克格勃和内务部系统。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对克格勃掌握在谢列平派的谢米恰斯内的手里极不放心；1967年3月，他利用斯大林女儿出逃事件撤掉了谢米恰斯内的克格勃主席职务任命安德罗波夫为克格勃主席，同时调他的亲信茨维贡和齐涅夫等三人任克格勃副主席。1968年又恢复了被赫鲁晓夫撤销的内务部，并任命他的摩尔多瓦的老部下谢洛科夫为部长。谢洛科夫调到莫斯科后，他家就安排在勃列日涅夫家的楼上。这样，克格勃和内务部这两个实权部门都逐步为勃列日涅夫所直接掌握和控制，成为他的又一个权力基础。

(5) 从出版战争回忆录入手，逐渐为斯大林恢复名誉，同时加强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控制。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苏联陆续出版了一系列参加卫国战争的元帅和将军的回忆录。据一些俄罗斯学者提供的材料。这些回忆录绝大多数不是本人写的，而是别人帮助写的，其中有很多不实之处，而且都经出版社编辑按照上面要求的调子做过加工。如《朱可夫回忆录》，原稿中曾讲到1937年斯大林对一些红军将领的大清洗，但后来出版的书中，这一处就被删除；另外为了宣传勃列日涅夫，加了一段完全虚构的、说朱可夫1943年视察高加索战区时曾提出要见见勃列日涅夫而未能相见的情节。由格列奇科和乌斯季诺夫主持的庞大的编委会编写的《二战史》也有很多歪曲历史事实的地方。从军事史和战争史开始，从60年代下半期开始，苏联在学术文化领域中逐步把50年代下半期出现的学术思想上的活跃气氛压了下去，正统的教条主义的学术思想观点在各方面重又压倒一切。在经济学方面，此时提倡多搞政治经济学的抽象的理论研究，少搞现实的经济问题的探讨，而在侵捷事件以后则展开了对“市场社会主义”和“商品派”的大

---

<sup>①</sup>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著：《生活和改革》第1册，莫斯科“新闻”出版社1995年版，第198页。

批判。

(6) 在对外政策方面，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在对华政策上继续赫鲁晓夫开始的反华路线，在中苏边境增兵，加强对中国的军事威胁。在东欧，则于1968年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压制了捷的“布拉格之春”改革。从军事方面来说，苏联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侵捷，占领布拉格，劫走捷领导人，可以说是成功的，西方对此也无可奈何。同时，勃列日涅夫在60年代也加强了对西方的缓和攻势，迎合西德的东方政策，改善了同西德的关系，同美国则通过谈判达成了签订禁止核试验条约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协议。这些行动也有助于提高勃列日涅夫集团在苏联国内的威望。

1964年，勃列日涅夫初上台时，虽然当上了苏共中央主席团第一书记，但在领导层中并未被承认为领袖，苏共中央10月全会后，柯西金取代了赫鲁晓夫的部长会议主席职务。当时《真理报》发消息时，把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的照片并列，还没有突出勃列日涅夫个人。1965年底，波德戈尔内担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后，苏联被称为“三驾马车”当政，勃列日涅夫的地位仍未突出。但是在勃列日涅夫采取上述各方面的政策和措施后，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情况就变了。这时苏联已开始到处挂勃列日涅夫的大像，其权力地位已明显地高居于其他领导人之上了。

## 二、第二阶段

这是勃列日涅夫本人处于政治权力的顶峰，同时又为苏联的国力大增，国际地位空前提高而感到踌躇满志的阶段。但另一方面，勃列日涅夫和苏共领导集团的保守僵化，停止和放弃改革的严重后果也开始逐渐显露出来。这是勃列日涅夫在70年代上半期的第二个执政阶段的两大特征。

勃列日涅夫此时自信心大大增加，认为苏共推行的路线和内外政策完全正确，对形势感到十分乐观。这反映在勃列日涅夫和苏共领导集团推行的以下一些做法和对形势的估计上，以及他们所表现的自安自慰、盲目乐观的心态上。

(1) 开始对勃列日涅夫大搞个人崇拜，采取各种手段，甚至编造历史，大肆突出其在战争、战后恢复工作、垦荒和加强国防等方面的功劳。柯西金和波德戈尔内的地位逐渐下降。在外交上，勃列日涅夫取代柯西金，扮演了国家政府首脑的角色。1977年，他取代波德戈尔内，兼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职务。在这一阶段中，“三驾马车”的局面已经消失，勃列日涅夫的领袖地位得到了明显

确立。

(2) 极力宣传发达社会主义理论，在对社会主义认识上继续宣扬脱离实际的超阶段思想。用很大的力量去研究发达社会主义的特征和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等问题；提出苏联社会和民族已越来越接近，已形成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的概念；鼓吹勃列日涅夫提出的发达社会主义理论是对马列主义宝库的重大贡献，等等。在这方面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开了无数的会议，出版了大量的书籍和著作。在一批学者的建议下，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四大报告和其他不少讲话中，虽已提出科技进步和经济集约化的概念，但仅流于空谈，并未采取任何实质性的行动。相反，却在批判“市场社会主义”的同时，极力宣传计划经济加计算机就会大大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的空想。

(3) 对世界经济形势和美国国内形势作出错误的估计。70年代初发生了世界石油危机，西方国家遇到了经济危机。这时苏联领导人根据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进一步宣传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加深，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可避免，而社会主义国家则没有经济危机，因此不会受到西方经济危机的影响。此时，美国在国外正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之中，在国内则面临高涨的反战运动和“水门事件”的政治危机；中国则处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之中。苏共领导人形成了一种错觉，认为整个国际形势发展对苏联十分有利。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四大和二十五大上所作的报告中都反映了苏共领导人对国际形势的这种估计。

(4) 此时，由于苏联不惜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大力发展战略核武器，并取得了对美国的战略平衡，勃列日涅夫等苏共领导人认为苏联的安全已得到保证，苏联已成为可与美国平起平坐的超级大国。这时，苏联的缓和政策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同美国举行了几次最高级会晤，签订了几个裁军协议，在欧洲召开了欧安会等。这一切促使勃列日涅夫等苏联领导人的大国主义意识和扩张意识膨胀起来，1975年苏联就把手伸到了安哥拉。

(5) 也在此时，苏联开发西伯利亚油气田取得成功，苏联油气产量大增。这使苏联有可能向欧洲西方国家大量出口石油和天然气，并利用当时世界石油危机，油价上涨之机，获取大量石油外汇，用以向西方购买大批粮食和设备，从而缓和苏联国内的一些经济矛盾。勃列日涅夫等苏联领导人以为苏联丰富的石油资源取之不尽，石油外汇可源源不断而来，这也助长了他们的乐观情绪。

(6) 在这段时间中，苏联国内浮夸风和报喜不报忧的风气大为发展。勃列日

涅夫等苏联领导人无视现实，偏听偏信，这又增强了他们良好的自我感觉。所有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就造成了苏联这个阶段中所特有的那种保持稳定、安于现状、脱离实际、空谈盛行、自安自慰、盲目乐观的“勃列日涅夫风气”。

可是，在勃列日涅夫领导集团因循守旧，全面恢复苏联那套传统的旧观念、旧体制、旧管理方法和工作方法的时候，传统体制在当年形成时得以发挥作用的那些条件，诸如最高领导人的坚强意志和崇高威望、各级干部的苦干精神、广大群众的建设热情、经济上的粗放发展的潜力等，在70年代已不复存在。在已经变化了的条件下，旧体制和旧方法已难以发挥它们曾有过的积极作用，而只能越来越产生其负面作用。所以，正是在这个阶段中，苏联政治经济制度中具有许多消极因素不断得到发展，例如：

(1) 各级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文牍主义和形式主义大大发展。赫鲁晓夫当年废除部门的条条领导，建立地方经济委员会时，出现了地方主义。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中央为了克服地方主义，协调全国经济，在苏共中央增设了许多主管经济的部门。随着地方经济委员会的废除和条条领导的恢复，苏共党政机关和人员编制大大增加，苏共中央的办公大楼大行扩建，苏共中央的部级编制增加到200个之多。勃列日涅夫时期是苏联历史上党政机关膨胀最快的时期。机构一多，制造的文件就多，互相推诿，互相扯皮之风日盛。遇事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成为常事。据俄罗斯社会学研究所提供的材料，当时苏联党政机关作的决议能得到执行的充其量不到1/10。

(2) 经济形势不断恶化。勃列日涅夫执政的这一阶段中，苏联经济的增长速度不断下降，丧失了苏联过去一直引以为自豪的经济发展速度优势。其次，经济效益愈益下降。再次，经济结构更加畸形，军工和重工业的比重越来越大，而人民生活所需的轻工业和食品工业的比重却越来越小。最后，农业生产形势非常严峻，粮食和肉类越来越依靠进口。农业虽一直为勃列日涅夫所关注，他为农业投入了大量资金，但由于不解决体制和政策上的根本问题，成效很小。

(3) 据阿尔巴托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此时勃列日涅夫和各部门和地方上的领导干部之间在保持稳定的口号下和维护各自的权力和利益的基础上形成了某种“社会契约”关系。勃列日涅夫需要保持各部门和地方领导干部的稳定，允许他们享有主管所辖部门和地方的更大的权力，以取得他们的支持。后者则需要勃列日涅夫这样的领袖在台上，以维护自身的权力和利益。正是在这种条件下，部门

主义和地方主义日益发展起来，干部中互相纵容包庇、贪污腐化等不正之风也日益发展。在苏联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里，这种状况势必导致民族利益上越来越多的矛盾，苏联民族关系中的各种分歧和民族主义思潮也正是在这时候进一步发展起来。

(4) 群众的社会心理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广大群众对勃列日涅夫等苏共领导人作出的提高人民生活的许诺长期不能兑现越来越感到不满，对他们给人们描绘的发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前景愈益失去信心。领导干部中的腐化现象使人们对现实越来越失望。在群众的社会心理中对现实的怀疑，冷漠和玩世不恭的态度取代了过去对社会主义的信任和热情。

### 三、第三阶段

从1976年苏共二十五大后到1982年勃列日涅夫去世，这是他执政的第三阶段，也是最后阶段。在这段时间中，勃列日涅夫身体越来越衰颓。苏联整个国家则越来越走下坡路，苏联从稳定走向全面的停滞。这个阶段的主要特征是：

(1) 勃列日涅夫本人在70年代中患了两次中风，身体趋于衰颓，已难于正常视事。根据多勃雷宁的回忆录，勃列日涅夫的第一次中风发生在1974年在远东地区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同美国总统福特会晤的时候，他患了大脑粥样硬化症。由于随行医生的努力，病情得到了控制，会谈没有中断。但是他在乘火车经蒙古回莫斯科途中又患了第二次中风。此后，勃列日涅夫的工作能力大大下降，到党中央办公的时间越来越少，他主持的政治局每周开会的时间越来越短。而与此同步的是整个苏共中央政治局成员的老龄化，他们的平均年龄达到了70多岁。这样一个老态龙钟、思想僵化、行动不便的领导集团只能靠他们的助手班子来工作，一切都要助手班子提出建议和写好稿子，即使是最简单的讲话也都要写成讲稿。勃列日涅夫得病后变得口齿不清，他的撰稿人得专门避开他不便发音的词，而挑选他便于发音的词。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局的工作变得越来越不正常，越来越形式化。这方面情况可由几个当事人提供的一些见证来说明。

其一是沃尔科戈诺夫在《七个领袖》一书中提供的证据。沃尔科戈诺夫说，政治局讨论问题的程式，如由谁发言，如何发言等，事先都由党中央秘书班子做好仔细安排。沃尔科戈诺夫曾多次为国防部长格列奇科、乌斯季诺夫写过参加政治局会议的讲话稿。令人难以想象的是，政治局委员们事实上经常不是进行相互讨论，而是念助手们为他们写好的二三页的讲话稿。大家的表现总是“英雄所见

略同”，照例不会同事先起草的决议草案有多少出入。<sup>①</sup>

其二是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生活和改革》中提供的见证。他说，在那个时期中所谓总书记的意见和主张已很难认为是他自己的观点，而不过是当时能对他施加最大影响的这一派人或那一派人的观点。那时政治局有些会议为了照顾勃列日涅夫的身体，开会时间往往只有15—20分钟，用于集合就座的时间往往比用于讨论工作的时间还多。即使是很重大的问题也很难进行认真的讨论。主持者惯用的措辞是，“同志们已做过研究，事先交换过意见，也向专家做过咨询，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在这种情况下，还能提什么意见？<sup>②</sup>

其三是沃尔科戈诺夫提供的苏共中央政治局的档案材料。他写道，“苏共中央政治局每年年底都要回顾一下前一年的工作。1980年1月3日的那次政治局会议，勃列日涅夫主持开会后，就让契尔年科回顾总结政治局一年的工作。契尔年科报账似的报告说，过去一年中，政治局召开了47次会议，研究了450个问题，通过了4000个决议，其中有关组织和党务工作的14个，意识形态工作的46个，军事和防务工作的227个，工交基建的159个，外交和外贸的1845个，经济计划的11个，干部问题的330个，政府颁奖问题的927个；中央书记处共举行了51次会议，通过了1327个决议。契尔年科在报告中特别强调说，去年各次中央全会都是在完全一致的气氛中举行的”。接着，安德罗波夫发言说，“这个结论完全正确，各次全会确实是在完全一致的气氛中开的”。佩尔谢说，“决议也都是—致通过的”。当契尔年科讲到书记处工作时，苏斯洛夫和安德罗波夫插话说，不光是政治局会议，书记处会议也是在完全一致的情况下举行的……”从会议记录中完全看不出政治局对现实问题有什么不安感和紧迫感。<sup>③</sup>

(2) 在这阶段中，凡事议而不决，决而不行，互相扯皮，无人负责的官僚主义达到了惊人的地步。这方面有两个事例很能说明问题。

第一个是关于科技革命问题的一个文件的遭遇。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苏联就有人提出了新的世界科技革命问题。起初，上面不准提科技革命这个词，后来由于下面一再反映，苏联领导人也开始感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于是勃列日涅

① (俄) 德·阿·沃尔科戈诺夫著：《七个领袖》第2册，第27页。

② (俄) 米·谢·戈尔巴乔夫著：《生活和改革》第1册，第217页。

③ (俄) 德·阿·沃尔科戈诺夫著：《七个领袖》第2册，第35—36页。

夫就在苏共二十四大的报告中提到了科技进步问题。大会后，政治局决定专门召开一次讨论科技革命的中央全会。为此，成立了一个由三名苏共中央书记（基里连科、多尔基赫、索洛缅采夫）为首的专门委员会和起草小组。这个班子奋斗了几个月，最后写出了一份 130 页的报告。报告于 1973 年 5 月上交基里连科等书记。据说由于报告中有的地方涉及经济体制问题，政治局中有人表示反对，结果报告上交后便无下文。直到勃列日涅夫去世后，在清理他的文档时，才在他的保险柜里发现了上送的这份报告。<sup>①</sup> 苏共中央在 1973 年提出要召开一次讨论科技革命问题的中央全会后，只是过了 15 年，也就是到了 1985 年下半年，在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才召开了一次讨论科技进步的专门会议。

另一个例子是戈尔巴乔夫本人提出《食品纲要》的经历。戈尔巴乔夫于 1978 年调苏共中央主管农业后，感到农业问题极为严重：几十年中一千几百万公顷农田被毁或被占用；农村生活条件落后，非黑土地带（30 个州）农村凋敝，大量农业劳动者流往城市；农产品价格低，农用工业品价格高，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入不敷出，年年靠国家 150 多亿卢布的贷款过日子，庄员生产积极性很低；在党政干部和工商业干部中存在着农业是无底洞、无可救药的情绪，等等。戈尔巴乔夫搞了不少调查，召开了大量专家会议和干部会议，经过几年时间搞出了一个《到 1990 年前的食品纲要及其实施措施》的方案。一旦接触到资金问题，部长会议主席吉洪诺夫就摆困难，财政部长死活说没有钱，无法解决资金问题，要他参加会也不来。最后把问题提到勃列日涅夫那里，吉洪诺夫才勉强答应想办法解决。这样才在 1982 年 5 月得以召开讨论《食品纲要》的中央全会，勃列日涅夫在会上讲了话。但即使是在《食品纲要》通过之后，农业状况仍然没有改善，而且变得更糟。<sup>②</sup>

在勃列日涅夫晚年阶段，这种遇事拖拉，到处扯皮，互相推诿，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习气在苏联上上下下到处都有。

(3) 经济形势越来越糟。粮食、肉类大量依靠进口，消费品供应日益紧张，劳动生产率进一步下降。1979 年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虽作出了改善计划工

---

<sup>①</sup>（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著：《耽误了的痊愈：当代人的见证》，莫斯科国际关系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72 页。

<sup>②</sup>（俄）米·谢·戈尔巴乔夫著：《生活和改革》第 1 册，第 192、211 页。

作和管理工作的决议，企图提高生产效率和质量，改进管理，但都无济于事。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苏联经济几乎呈零增长，甚至负增长趋势。

(4) 在国家领导集团严重老龄化，国内政治社会形势死气沉沉和经济形势愈趋严重的情况下，勃列日涅夫等苏共领导人在军方、克格勃和苏共中央有关部门的推动下，对外却大肆推行扩张政策。此时，苏联同美国从宣扬缓和转向新的对抗和新的冷战，并展开了新的军备竞赛。在非洲和中东，继1975年和1976年伸手安哥拉之后，苏联又于1977年和1978年伸手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和南也门；在拉丁美洲则插手尼加拉瓜；在亚洲，在美国从越南撤军后，苏联乘机在金兰湾等地建立了海空军设施，并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而于1979年底，苏联还直接出兵入侵阿富汗。出兵阿富汗是由勃列日涅夫、乌斯季诺夫、安德罗波夫和葛罗米柯这个四人小圈子决定的，其他政治局委员都是在出兵之后听新闻报道才知道此事，都是事后在文件上画圈的。勃列日涅夫领导集团作出这个错误的冒险决策，使苏联陷入阿富汗战争的泥潭长达十年之久，使苏联人民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

(5) 此时苏联群众对社会现实的失望情绪大大增加，对苏共领导进一步失去了信心，有关勃列日涅夫的种种政治笑话在社会上大量流行，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已大大下降，原有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丧失。很大一部分干部、知识分子和群众已普遍感到，苏联已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了。

勃列日涅夫于1982年11月去世后，苏联又经历了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两任总书记的不到三年的执政时期，这不过是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短暂的延续。1982年1月苏斯洛夫去世后，在苏共政治局核心人物中，尤其是在契尔年科和葛罗米柯之间，曾有过一段争夺接替苏斯洛夫当苏共中央第二把手，以便成为勃列日涅夫之后的接班人的角逐。但最终年迈体衰的勃列日涅夫还是确定安德罗波夫为他的接班人。安德罗波夫在总体上坚持传统观念，坚守传统体制，但他因在苏共领导集团中为人清白，文化修养最高，也最有思想，所以在一批知识分子和干部中有好评。他受命于危难之机。他上台后抓整顿纪律和秩序。处理了勃列日涅夫的女婿切尔巴诺夫、内务部长谢洛科夫和原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区委书记梅杜诺夫等几名臭名昭著、为群众所憎恨的腐化干部，在社会主义理论上则提出了苏联还处在发达社会主义的起点的新提法。他上台后露的几手，虽不能解决多少问

题，但也使人心为之一振。可是他也已年老多病，实际上他只正常工作了半年时间，由于严重肾病缠身，剩下的仅一年时间都是带病工作，靠血液透析在专设的病房里度过的。1984年2月安德罗波夫病逝后，由老态龙钟且又十分平庸无能的契尔年科，在吉洪诺夫等人的支持下接任总书记。此时，苏联全国陷入全面的停滞状态。苏联人民内心为国家出现的这种老人政治的尴尬局面感到愤慨和羞辱，但又无可奈何。

总的来看，勃列日涅夫执政的18年，经历了营造和建立自己的权力基础，登上权力顶峰和进入晚年衰颓三个阶段。由于平庸无才、在思想理论上的保守僵化，性格上的软弱和爱好虚荣和阿谀奉承、作风上的贪图安逸和不勤奋刻苦，他在执政的18年中虽然把苏联搞成了一个在核武器上实现了与美国的战略平衡，能与美国对抗，对外推行霸权主义和扩张主义的超级大国，结果却耗尽了苏联的潜力，拖延了苏联社会经济的发展，败坏了苏共和社会主义在国际上的声誉，使苏联广大群众失去了对苏共领导集团和社会主义的信心，使苏联在国际上陷于空前的孤立。事实清楚地说明，勃列日涅夫执政的18年是苏联逐渐由兴盛走向衰亡的关键性转折时期，它为勃列日涅夫身后苏联社会中各种矛盾和冲突的爆发，尤其是各共和国内民族主义的发展，为不到十年后苏联的解体准备了土壤和条件。

## 56. 勃列日涅夫时期经济体制改革 缘何停滞不前？

陆南泉

勃列日涅夫执政 18 年，对经济体制改了 18 年。勃列日涅夫时期经济改革的头几年，不论在农业还是工业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总的来说，改革 18 年之后的体制，仍然是效率低、浪费大、过度集中的一种体制模式。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经济体制改革，总的来说，处于一种停滞状态。如果说，赫鲁晓夫时期的改革是在“条条”与“块块”之间兜圈子，那么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改革，则是在增加几个还是减少几个指令性指标之间扭来扭去，改革始终迈不开大步。由于改革的停滞不前，产生了一系列十分严重的社会经济后果。这个时期，一方面消耗苏联积存的种种潜力，另一方面又不断地产生种种社会经济疾病和积累大量的问题与矛盾，这是苏联走向衰亡的时期。勃列日涅夫时期大体经历了 4 个五年计划。这个时期如果排除当时国际市场上的高油价与大量出售对人体健康有害的酒精饮料等因素，那么国民收入的绝对额没有增加。从勃列日涅夫执政 18 年的改革过程与出现的种种问题来看，它确实在很多方面再次向人们展示了斯大林模式所存在的带有制度性的弊病。改革停滞不前，虽有多方面的原因，这里仅就两个主要因素进行分析。

### 理论上不能与时俱进，坚持“左”的教条主义

在理论方面，主要障碍来自根深蒂固的“左”的教条主义。列宁之后的苏联各届领导，往往以“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自居并对其持“左”的教条主义态度，

勃列日涅夫显得更加突出。在这种背景下，也就很难根据变化的情况发展理论，提出新看法。理论对体制的改革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体制模式实质上是由理论决定的，即有什么样的指导理论及体现这一理论的、运用在政治与经济体制上的原则，就有什么样的体制模式。理论问题关系到体制政策的总目标和总方向，决定着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因此，要想改革，首先要有理论勇气，打破旧思维的禁锢。在长达18年之久的勃列日涅夫时期，对赫鲁晓夫时期理论上开始出现的一点活跃气氛，像灭火队一样很快把它压下去了。纵观勃列日涅夫执政18年的思想理论，从大的方面即社会主义模式来看，是坚持斯大林的那一套，并且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已处于“成熟”状态，即更加“定型”和更加“僵化”。这也是“左”的教条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

社会主义社会本来是充满生机、丰富多彩、不断发展与变革的社会，它并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模式与“最终规律”可循。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反对无产阶级政党在建设社会主义方面“提出任何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恩格斯曾说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sup>①</sup>他还指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sup>②</sup>列宁对社会主义的看法也是经常变化的，特别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当他看到了一些新的情况后，对社会主义的看法发生了很大变化。1989年5月，邓小平会见戈尔巴乔夫时说：“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sup>③</sup>但遗憾的是，苏联在1936年宣布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之后，就把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固定化，把苏联二三十年代搞社会主义的一套做法，都视为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必须遵守的“共同规律”和识别真假社会主义的主要准则。在这种条件下，苏联要改革本来就非常需要改革的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就非常困难了。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628—62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443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1页。

勃列日涅夫时期，“左”的教条主义反映在许多方面，尤其是鼓吹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的理论十分卖力，批判“市场社会主义”最起劲，而且在批判时，常常挥舞政治大棒，这对体制改革影响最大和最为直接。与“市场社会主义”关系最为密切的是涉及商品关系理论问题。勃列日涅夫时期，在商品货币关系理论问题上有了一些进步，不再简单地把商品货币关系与资本主义画等号，而是强调要利用商品货币关系。但有关这一问题的理论未取得实质性进展，基本观点是：

第一，商品货币关系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属性，表明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是直接社会关系，商品关系是处于从属地位的。

第二，直接社会关系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内容，而商品关系是形式。

第三，在强调必须利用商品货币关系的同时，又强调它的“新内容”、“新特征”。就是说，市场机制的一切作用都要通过计划来实现。

第四，与第三点相联系，不恰当地强调商品货币关系的特殊性，忽视共性，从而导致否定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

可以说，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占主导地位的商品货币关系理论是“新内容论”，其主要含义是：

第一，承认商品是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统一，因而也是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矛盾统一。但上述矛盾不再反映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无论具体劳动还是抽象劳动都是直接社会劳动的表现形式。

第二，社会主义劳动具有直接社会性。这种直接社会性还处于比较低级阶段。它不能直接以劳动时间表现自己，还必须通过非本质形式——货币形式来实现。因此，商品货币关系存在的原因，不应当到直接社会劳动之外，而应当从直接社会劳动内部来寻觅。

第三，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货币关系，不是存在于计划之外，也不是与计划并存，而是社会主义阶段有计划发展的一种形式。与商品货币关系的“新内容论”相适应，价值规律以及与之相关的一些范畴也都具有计划性，市场也成了“有组织有计划的市场”。

“新内容论”的实质是，把商品货币关系与市场机制的作用纳入社会主义的计划体系之中，具有计划性的特点，从而从根本上否定了价值规律与市场机制在经济中的调节作用。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新内容论”也是官方接受的一种观点。当时的《苏共纲领》指出：“在共产主义建设中，必须根据商品货币关系在社会

主义时期所特有的新内容，对商品货币关系充分加以利用。”柯西金在苏共二十四大报告中也指出：“商品货币关系在我国具有新的社会主义固有的新内容。”

在商品货币关系理论有所发展的同时，一些学者提出应在一定程度利用市场机制调节作用的观点受到批判，被指责为“市场社会主义”。柯西金在苏共二十四大的报告中指出：“党中央委员会和苏联政府的出发点是：指令性计划是主要的和有决定意义的……我们要批驳主张用市场调节来取代国家集中计划领导作用的各种错误观点。”

当时苏联有些学者认为“市场社会主义”是资产阶级学者的一种“邪说”，是“右倾修正主义”作为计划工作“民主化”，向“官僚主义”作斗争的借口。1979年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院长麦德维杰夫发表文章强调说：要揭露借改善计划制度之名，而引向“市场社会主义”方向去的“伪善建议”，要积极地抵制这种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谰言。<sup>①</sup>

在对“市场社会主义”展开批判之后，少数学者如利西奇金、列昂捷夫主张市场调节的观点，也就销声匿迹了。在这种理论条件下，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有重大进展。只能在传统的集中计划体制的范围内进行修补。鲍文提到1965年改革以失败告终及原因时指出，是不坚决、措施不彻底和不能把事情进行到底的做法害了我们。我们用一只手给了权利，却又用另一只手收了回来。我们通过了新的法律，可是旧的指令还照样保留。<sup>②</sup>

还要指出的是，由于把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神圣化、僵化和国际化，不允许对改革理论自由讨论，对马克思主义采取“左”的教条主义态度，不只是在苏联难以实行改革，而且还严重阻碍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在东欧国家中最早着手改革的是南斯拉夫，始于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当时提出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是建立不同于苏联的斯大林模式，这是对斯大林模式的最早的一次冲击。其结果是人所共知的，在斯大林的指使下，各国共产党对所谓“铁托分子”与“民族主义分子”展开批判与清洗。1948年5月，斯大林在致铁托和南共中央的信中明确指出：“低估苏联经验，在政治上是极其危险的，而且对马克思主

---

①（苏）《经济报》1979年第26期。

②（苏）《新时代》1987年第5期。

义者来说这是不容许的”。<sup>①</sup>到了50年代中期，东欧一些国家在发现搬用斯大林模式出现问题后，就准备进行改革。1956年匈牙利提出改革要求，力图摆脱斯大林模式来振兴社会主义，遭到了苏联的镇压，造成了匈牙利悲剧，扼杀了改革和各种变革。后来到60年代，匈牙利又悄悄地进行改革，并取得一定的成效。但在当时的条件下，要进行整体的深入的改革是不可能的。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也是力图摆脱斯大林模式，勃列日涅夫加以镇压。当时在捷克斯洛伐克以经济学与社会学领域出现的新思想为制定体制改革方案的，即提出“制定捷克斯洛伐克改革模式的基本先决条件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非教条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们早在60年代初就已清醒地认识到：若不打破旧的理论教条，要改变苏联型的传统计划体制，是不可能的。因此，经济学家进行的这场公开讨论，其目的就是要有效地克服斯大林主义的正统思想。所以，这场讨论从一开始就不存在有利的先决条件。这就是说，苏联是决不允许的。这些，都使东欧各国贻误了改革的时机，不得不继续实行不能适应本国国情的斯大林模式。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上，勃列日涅夫在整个改革过程中，一直坚持全民所有制是最高形式和最先进形式的观点，并认为，经济改革不涉及改变所有制形式问题。

有关对企业地位问题认识是不一致的。在改革过程中企业的权限虽然有一定程度的扩大，但都是以不损害国家集中控制的计划体制为前提的。

关于领导经济的方法问题，也是争论的一个理论问题。在1965年实行经济体制改革时，为了克服过多地用行政方法领导经济的缺点，苏联提出要把领导经济的行政方法逐步转向经济方法，要充分利用各种经济杠杆，加强经济刺激和经济核算制。但是，改革过程中，由于坚持“非商品派”理论一直占主导地位，因此，对经济的行政领导方法一直未能发生根本性变化。

从苏联十多年的经济改革情况来看，围绕改革展开的理论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但到勃列日涅夫后期，探索的问题越来越狭窄，对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日益采取回避的态度。因此，讨论问题的气氛也远远没有改革一开始那样活跃。产生这种情况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一些代表官方观点的经济界“权威人士”，经常对

---

<sup>①</sup> 转引自陆南泉、姜长斌主编：《苏联剧变深层次原因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53页。

一些新提出的理论加以批判，并戴上各种政治帽子，把争论压下去。这种情况，很难使经济体制改革取得重大发展。

## 政治体制的倒退

经济体制的改革要求进行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勃列日涅夫时期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不仅没有触动政治体制，而且出现了不少倒退，政治体制朝着集权化方向发展。这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一）恢复并逐步加强党政集中领导体制

（1）党政不分、以党代政进一步发展。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特别在后期，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情况日益严重。表面上政治局各委员都对自己主管的领域负责，一切决策都由政治局作出，但实际上政治局作出决策，也往往是形式上的，主要还是由党的最高领导勃列日涅夫等少数几个人决定。特别随着勃列日涅夫的地位巩固与加强之后，更是大权独揽。1977年苏共中央五月全会决定，勃列日涅夫以总书记身份兼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同年10月7日，最高苏维埃非常代表会议上审议通过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宪法（根本法）》。按新宪法增加的一些条款，勃列日涅夫同时又兼任国防委员会主席，这样，他就总揽了党、政、军的大权。这种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体制，不只反映在勃列日涅夫这个最高领导人一个人身上，苏联党的很多领导人也兼任苏维埃与政府部门的重要职务。另外，这种体制在党政领导的组织机构上也得到充分体现。苏共中央机关设置的与政府部门相应的部门比过去更多了，如国防工业、重工业、机器制造、化学工业、食品工业和农业等部门，在加盟共和国党中央委员会和地方党委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这导致各级党组织往往对一些具体经济问题作决议与发指示，从而大大削弱苏维埃与政府部门的领导作用。

勃列日涅夫坚持党政不分的政策，其理论根据来自斯大林。他在1977年苏共中央五月全会上决定兼任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讲话就可以说明这一点。当时他解释说：“这绝非是一个徒具形式的行动”，“这首先是共产党领导作用不断提高的表现”，“苏共作为执政党……在我们的日常工作中，中央政治局许多成员直接处理国家的内政外交事务。”换言之，因为苏共是执政党，因此苏共领导人可以处理苏联国内外所有事务。十分明显，这种观点，直接承袭斯大林在苏共十八大

报告中的下列提法：“党的干部是党的指挥人员，而由于我们是执政党，所以他们也就是国家领导机关的指挥人员。”

苏联长期以来未能正确处理好党政关系，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党政不分、以党代政进一步发展，这虽有多方面的原因，如有关党政关系一直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导，因此也就没有确定党政关系的原则。在实际工作中，过多强调苏共执政党的地位等。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与斯大林高度集中的体制模式紧密联系在一起。高度集权，在客观上要求党总揽党政大权。对高度集权的体制模式不进行根本性改革，党政不分的体制也难以改革。

(2) 个人集权加强，独断专行现象严重。随着勃列日涅夫领袖地位和权力基础的巩固，个人集权日益发展。应该说，勃列日涅夫执政初期形成的“三驾马车”之间的关系，一开始也不是三者之间的力量与权力处于均等状态，作为总书记的勃列日涅夫利用一切机会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扩大权力。苏共中央1972年十二月全会上对由柯西金主管的“新经济体制”作了否定性评价之后，勃列日涅夫把在经济方面的决策权控制在自己手里，随后又控制了外交权，此后，使柯西金的地位大大下降。1977年解除了波德戈尔内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职务并宣布他退休。此后，勃列日涅夫的权力大大膨胀，决策权高度集中。据不少材料披露，像1979年底出兵入侵阿富汗这样的重大事情，只是由勃列日涅夫、乌斯季诺夫、葛罗米柯和安德罗波夫等几个人商量后作出决定的。<sup>①</sup>从这一件事就可看出勃列日涅夫时期个人专权的情况。

由于个人集权的加强，党内民主日益流于形式。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虽然中央全会、政治局会议、书记处会议和苏共代表大会按规定举行，但并不意味着党内有真正的民主生活。戈尔巴乔夫在1987年举行的苏共中央一月全会上说：“让我们坦率地说，多年来，党和人民关心的许多迫切问题没有被提到全会日程上来。同志们都记得，虽不止一次地举行时间很短和形式化的中央全会，许多中央委员在其整个任期内没有可能参加讨论甚至提出建议。中央全会的这种气氛也影响到地方党委和党组织的工作作风。”一切重大问题不是经过认真和充分讨论决定的，这种情况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显得更加突出。

---

<sup>①</sup> 详见（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第274—279页。



1978年勃列日涅夫生日这天，他再次被授予勋章。

## （二）个人崇拜盛行

个人集权，缺乏民主，必然产生个人崇拜。随着勃列日涅夫个人权力的膨胀，个人崇拜也泛滥起来。勃列日涅夫在这方面采取的方法很多，如用编造历史来夸大其在战争中的作用，通过各种宣传工具，大肆宣扬其工作中的政绩，给自己颁发各种勋章、奖章，军衔不断晋升，1975—1977年3年内，他由中将一跃而为苏联元帅。如果翻开70年代中期的苏联报纸杂志，对勃列日涅夫令人作呕的颂扬言论到处可见。1976年底在为勃列日涅夫庆祝70诞辰时，掀起了颂扬的高潮，为此，《真理报》开辟了7天的专栏。而率先颂扬勃列日涅夫的是基里延科，他称勃列日涅夫为“我们党的领袖”，当时阿塞拜疆第一书记阿利耶夫称勃列日涅夫为“我们时代的伟大人物”。<sup>①</sup> 那些阿谀奉承、恭维勃列日涅夫的言论更多：“党和人民热爱您，列昂尼德·伊里奇。他们爱您，是由于您的仁慈和热忱，是由于您的智慧和列宁主义的无限忠诚。您的一生，您的智慧和天才赋予您获得

<sup>①</sup> （苏）《巴库工人报》1976年11月25日。

并融化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宝贵品质的能力，这些品质是我们这个时代伟大人物，我们党和我国各族人民的领袖的特殊品质。”<sup>①</sup> 吹捧的调子越来越高，如有人称勃列日涅夫是“真正列宁式的领导人”，“党和国家的英明领袖”，“英明的理论家”。这里还要指出的是，以勃列日涅夫名义发表的几本小册子《小地》、《复兴》、《垦荒地》等，获列宁文学奖。其发行量之大也是惊人的，截至1981年底，平均每两个苏联人就有一册。<sup>②</sup> 1978年11月12日《真理报》宣传说：苏联人在“读、重读、废寝忘食地研究勃列日涅夫的著作”，因为这是“无穷无尽的思想智慧和泉源”。还有些报刊吹捧这些著作是“党的巨大瑰宝”、“政治才略的教科书”，是“令人爱不释手的诗篇”等。而这种做法所起的作用是极其恶劣的。阿尔巴托夫说，这像“全民演出了一出荒诞的戏”，人们“都并不信以为真。这大大加深了人们对政权的不信任感，加强了不关心政治和玩世不恭的消极风气，腐蚀了人们的思想和灵魂。从象征的意义上说，这个插曲犹如我国历史上我们为之付出了很大代价的这段可悲的时期树立了一块墓志铭。这是名副其实的停滞时期。其登峰造极之时我认为是1975—1982年”。<sup>③</sup>

这里可以看到，勃列日涅夫为制造对他的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是费尽了心机。个人崇拜是个人集权的必然产物，它反过来也为巩固与发展个人集权创造条件，相互促进。这样发展的结果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政治体制朝高度集权方向一步一步地迈进，一步一步地深化，使得斯大林时期形成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变得“成熟”，即更趋凝固化、僵化。这种“‘成熟’在掩盖着、钝化着矛盾的同时，就已孕育着、潜伏着危机！”<sup>④</sup>

### （三）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等体制的弊端日益严重

应该说，赫鲁晓夫执政时，他看到了传统体制下的干部制度存在严重弊端，因此他在这方面作了不少改革，目的是要废除像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等腐朽的制度，使社会的发展富有活力。但他在这一领域的改革，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发生过干部大换班，变动过于频繁等。勃列日涅夫上台后，注意力集中放在赫鲁晓

---

① 《国外社会主义研究资料》，求实出版社1983年版，第1期。

② 《苏联东欧问题》1983年第2期。

③ （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第346页。

④ 宫达非主编：《中国著名学者苏联剧变新探》，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294页。

夫时期干部制度改革所出现的问题上，并没有考虑到传统的干部制度存在的严重弊端。因此，勃列日涅夫执政后以稳定政局等为由，很快就恢复了传统的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和干部任免制。在这方面的倒退，其消极作用十分明显。

第一，干部领导职务的终身制，使新生力量难以成长，难以在年富力强时进入重要的领导岗位。在赫鲁晓夫执政年代，中央委员连选连任者占49.6%，到二十二大，中央委员连选连任者上升为79.4%，二十五大时上升为83.4%，二十六大为90%以上。勃列日涅夫时期，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的变动更小，18年中只换下12人。<sup>①</sup> 1981年召开的苏共二十六次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是二十五大的原班人马，这是苏共历史上没有过的。1976年至1981年两届加盟共和国党的代表大会期间，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除死亡和正常工作调动外，没有1人被撤换。<sup>②</sup> 由于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任命制，重要干部由“一号人物”来决策，一些重要岗位的领导干部不可能由年轻干部去担任。勃列日涅夫后来提拔和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的人员的情况就说明这一点。如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1976年去世时为73岁，而接替他的乌斯季诺夫当时已经69岁；苏联交通部长科热夫1975年去世时为70岁，接替他的索斯诺夫为67岁；造船工业部长托马1976年去世时为69岁，接替他的叶戈罗夫当年也是69岁。勃列日涅夫兼任国家元首之后，竟选择比他大5岁的库兹涅佐夫担任自己的副手。1976年吉洪诺夫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时已72岁。<sup>③</sup>

第二，终身制的一个必然结果是领导干部老化。1952年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平均年龄为55.4岁，书记处成员为52岁，到赫鲁晓夫下台前夕的1964年，政治局委员平均年龄为61岁，书记处成员为54岁。到1981年苏共二十六次时，政治局委员平均年龄为70岁，书记处成员为68岁，核心成员的平均年龄高达75岁。最高领导层的老化，同样反映在地方党政机关。戈尔巴乔夫在1981年一月中央全会的报告中说：“一系列党委的书记和成员，地方、共和国和全苏一级苏维埃和经济机关的工作人员，往往好几十年没有发生必要的干部变动，没有增添

---

① 参见刘克明、金辉主编：《苏联政治经济体制七十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49页。

② 参见《苏联东欧问题》1983年第2期。

③ 参见《苏联东欧问题》1983年第2期。

新人。”干部的普遍老化，是苏联社会死气沉沉、保守、僵化和各种消极现象出现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这个问题，从勃列日涅夫本人就可充分说明这一点。大家知道，勃列日涅夫于1974年12月在符拉迪沃斯托克附近的军用机场刚送走美国总统福特，他感到不适，患了大脑动脉粥样硬化症。第二天前往蒙古，从那里乘火车返回莫斯科时又发生了第二次中风，从此，他病得很重，病了很长时间。阿尔巴托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说：从这时起，勃列日涅夫还活了8年，并在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的体制下，他还“统治了”8年。在这8年中，他的病情不时有某些好转，但他一直没有能恢复到哪怕是自己正常的工作状态。他极易疲倦，无兴趣处理手头该解决的问题，说话越来越困难，记忆力越来越衰退。在他生命的晚期，就连起码的谈话内容和礼节性的应酬话也要别人替他写好，没有这种“小抄”，他简直无法应付。<sup>①</sup>对此，博尔金作了以下的描述：“很多人都非常清楚，勃列日涅夫不能继续领导党和国家，中央政治局会议越开越短。勃列日涅夫茫然坐在那儿，并不十分清楚自己身在何处，会议室里都有谁，应该做些什么。经常出现这种局面，他坐在那儿，读着助手们用特制大号字母打字机打出的简短讲稿，有时读错行，前言不搭后语。他大概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用忧伤的目光望着在场的人。为了尽快做出结论并提出提案，结束这种折磨人的场面，契尔年科出面结束会议，大家急忙通过各种议案，怀着不安的心情离开政治局会议室。”<sup>②</sup>在勃列日涅夫后期的8年中，他已失去了工作的能力，“已经无力正常执行领导者的起码职责”。<sup>③</sup>这在当时的苏联上层都很清楚，但在传统的集权体制下，在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的条件下，只有等到勃列日涅夫去世他才离开苏联最高领导的职位。这正如阿尔巴托夫说的：“现行的机制、传统和现实的政治环境实际上排除了‘正常’接班的可能性。”<sup>④</sup>

---

① 参见（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第267—268页。

② （俄）瓦·博尔金著，李永全等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30页。

③ （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第266—267页。

④ （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第267—268页。

第三，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任命制产生的另一个严重弊端是不正之风盛行。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高层领导人是否退休，并不取决于年龄与是否有才能，而是取决于与苏联主要领导人的关系。正如利加乔夫指出的：“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党的领导干部是否退休，主要取决于与某些政治局委员和列昂尼德·伊里奇本人的关系。这种程序（确切些说是无程序）必然要加重地方领导人对中央领导机关的依赖性。就问题的实质来说，一切都取决于个人的好恶程度，换句话说，是否退休问题在于主观方面。所以出现这种情况，那些忘我工作的书记，由于没有注意到在中央和中央委员会的个人关系，当到退休期限时便处于‘无人过问状态’。”<sup>①</sup>可以说，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在干部任用问题上，任人唯亲、搞裙带关系已发展到极其严重的程度。这样，使不少干部不是把精力用于如何做好工作，而是搞投机钻营，那些吹吹拍拍、讨好上级、唯上是从、在上层寻找保护伞的干部越来越多。还要特别指出的是，勃列日涅夫还对其家属与沾亲带故的人给予“照顾”，让这些人升官、捞取私利。他女儿的最后一个丈夫丘尔巴诺夫令人头晕目眩地青云直上，在屈指可数的几年内当上中将：从一名平平常常的民警政治工作者一跃成为内务部第一副部长；他被选入党的高层机关；获得了奖赏、汽车和别墅。勃列日涅夫的儿子被提拔为外贸部第一副部长。他的弟弟也当上了副部长。这两个人都有酗酒的恶习。<sup>②</sup>

#### （四）“特权阶层”扩大化、稳定化和思想僵化

勃列日涅夫时期，政治体制倒退，使得苏联社会早已存在的“特权阶层”进一步扩大与稳定，这一阶层的人思想更趋僵化，这也成为阻碍整个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因素。当然，“特权阶层”并不是勃列日涅夫时期才出现的，而在斯大林时期就已逐步形成，像政府别墅、特殊门诊、医院、休养所和疗养院、配备司机、专用汽车等，“早在30年代所有这些已经形成完整的制度。根据这个制度的等级——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中央委员、人民委员、总局的首长，等等——每一级都有自己的一套特权。战争之前享有这种特权的人范围

---

<sup>①</sup>（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第341—343页。

<sup>②</sup> 参见（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第341—343页。

相当小，但特殊待遇本身是非常优厚的，特别是同人民生活相比更是如此。”<sup>①</sup>战后，对苏联上层领导人的配给制达到了非常精细的程度。特别是各种商品的购货证与票券大大发展了，逐渐成了高中级负责干部家庭正常生活方式的一部分。高级将领在这方面越来越起带头作用。有些将军大胆妄为到这种地步，以致向来对这种腐化行为睁眼闭眼的斯大林不得不出来纠正，命令把某些人逮捕。但特权并没有消失，后来很快地扩大了，在斯大林时期达到登峰造极地步的是所谓钱袋，即领导人的工资附加款，这个附加款可以从几百卢布到几千卢布，取决于职位高低，装在信袋里秘密发给。一个部长可拿到相当于1960年改革后的2000卢布，如果考虑到通货膨胀和不纳税，这个数目相当于不久前苏联总统规定的工资的两倍。<sup>②</sup>

不少西方学者也认为，苏联的特权阶层早在斯大林时期已经形成。<sup>③</sup>他们把特权阶层的特权归结如下：名目繁多的津贴，免费疗养和特别医疗服务，宽敞的住宅和豪华的别墅，特殊的配给和供应，称号带来的特权，等等。对苏联上层领导来说，高薪并不是主要报酬，远为贵重得多的是上层所享有的特权。他们一切的获得主要靠特权。因此，不论苏联的任何时期，作为特权阶层的一个基本特征是一样的，即他们是掌握各级党、政、军领导机关的领导权。这个领导权是实现特权的基础。

至于形成这个特权阶层的原因，应该说，阿尔巴托夫提出的分析是很有道理的。他说：特权阶层的形成，“这是斯大林故意采用的政策，目的在于收买党和苏维埃机关上层，使其落入某种连环套之中。这是一种路线，旨在借助于直接收买，借助于灌输丢掉职位就丢掉特权，失掉自由甚至生命的恐惧思想，从而保证官员们绝对听话，并积极地为个人迷信服务。”<sup>④</sup>另外，他还指出：“社会的贫困

---

①（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第311页。

②（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第311—312页。

③ 参见陆南泉等编：《国外对苏联问题的评论简介》，求实出版社1981年版，第81—83页。

④（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第312页。

本身实际上使特权不可避免。”<sup>①</sup> 那种把由于斯大林时期因“国内物质条件还不富裕”作为形不成特权阶层的理由，是值得商榷的。

当然，斯大林时期与勃列日涅夫时期特权阶层是有区别的。首先，由于勃列日涅夫时期实际上没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干部领导职务搞任命制与终身制，干部队伍较为稳定，因此，“特权阶层”也比较稳定。而斯大林时期，虽然形成了“特权阶层”，但它是不稳定的。这是因为斯大林一方面给予上层人物大量的物质利益和特权，另一方面又不断地消灭这些人。首当其冲被消灭的便是这个“特权阶层”。其次，由于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僵化和官僚主义的发展，各级领导机关干部数量大大膨胀，与此同时，特权阶层的人数也随之增加。据俄国学者估计，当时这个阶层大约有50万—70万人，加上他们的家属，共有300万人之多，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5%。<sup>②</sup> 对特权阶层人数估计不一。“英国的默文·马修斯认为，连同家属共有一百万人左右。西德的鲍里斯·迈斯纳认为，苏联的上层人物约有四十万人，如果把官僚集团和军事部门的知识分子包括进去，约七十万人。苏联持不同政见者阿·利姆别尔格尔估计，今天苏联的特权阶层有四百万人，另一些人估计不少于五百万人。”<sup>③</sup> 最后，斯大林时期，“特权阶层”主要使命是维护、巩固斯大林的体制模式。而勃列日涅夫时期，特权阶层的主要使命是抵制各种实质性的改革，维持现状，使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更加“成熟”。这也是使这个时期体制改革停滞不前的一个重要因素。看来，不能以斯大林时期特权人物不稳定和人数可能没有像勃列日涅夫那么多为根据，得出只是到了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才形成“特权阶层”的结论。这个结论是不符合苏联历史发展情况的。因为特权人物不稳定，今天是这一批人，明天是另一批人，这个时期的人数多一些，那个时期的人数少一些，但总是存在这么一个阶层的人，这些人，用苏联人的话来说就是列入“花名册”的人，即那些被党的领导人选出来掌管最重要的职位的人的秘密名单。

在社会科学方面，烦琐的理论研究成风，僵化的教条主义盛行，有创造性的

---

① (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第310页。

② 转引自陈之骅主编：《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页。

③ 陆南泉等编：《国外对苏联问题的评论简介》，求实出版社1981年版，第82页。

思想被排除出社会科学领域，而肤浅的、唯意志论的推断却成为只能注释而不容反驳的真理。

我们之所以用较多的篇幅论述勃列日涅夫时期政治体制的种种倒退现象，主要是为了深刻地认识到，在苏联集权政治体制条件下，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企图单一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是不可能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其结果只能是政治体制不可避免地对经济体制改革起制约作用，例如，由于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官僚主义和官僚机构对改革的阻碍乃至破坏作用日益明显。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特征，这就是官僚主义、本位主义、机关专权和独断得到了史无前例的所谓双倍的泛滥。”“所有的决定都是由最上层作出的，与此同时，‘上边’却不能真正采取任何一个决定——其中每一项决定要经过几十次甚至几百次协商。此外，领导人任何一项决定作出后，在贯彻时又受到机关的专横的阻挠。”“几乎没有人对某件事真正承担责任。”“官僚主义的管理机关膨胀到令人难以置信的规模”。<sup>①</sup> 据俄罗斯一社会科学研究所提供的材料，这一时期苏联党政领导机构作出的决议得到执行的充其量不到 1/10。<sup>②</sup> 官僚主义的盛行，勃列日涅夫本人表现得尤为突出。阿尔巴托夫在其回忆录中，列举了不少事例，其中有关科技革命问题最为生动，如本书第 55 个问题所述。

纵观勃列日涅夫 18 年的体制改革，不难发现，改革一直是在因循守旧、求稳抑变的思想支配下进行的。

经济改革的停滞，政治体制的倒退，带来了一系列严重后果，其中特别要指出的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社会又开始了“悄悄的重新斯大林主义化”。这是笔者借用了阿尔巴托夫回忆录中的一个提法，因为这个提法很符合实情。“我之所以把这个重新斯大林主义化的过程称之为悄悄的过程，就是因为它不是用一个正式的法令、一项专门的决定去推行的，它是渐渐地、一步一步地把社会生活笼罩起来的，一个阵地一个阵地巩固起来的。那些想要回到斯大林主义的人，则是有意识地加以推动。”<sup>③</sup> 应该说，重新斯大林主义化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并不是

---

①（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第 301 页。

②《东欧中亚研究》1998 年第 1 期。

③（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第 191 页。

困难的事，因为：一是在赫鲁晓夫时期虽然“捅”了一下斯大林，特别是斯大林个人崇拜，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动斯大林主义或斯大林时期形成与发展起来的体制。就是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报告时，对斯大林时期的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存在的问题是想得很肤浅的，可以说还根本没有触及制度性问题。二是植入苏联社会的斯大林主义，它经历了一个很长历史时期，为了让它生根采取了各种手段，包括最极端的大规模的恐怖，从而使其在苏联根深蒂固。三是在斯大林时期，不只形成了以斯大林主义为基础的体制，并在这个体制下培养了适应和积极维护这个体制的领导干部。这些干部，同时又握有种种特权，他们离开了这个体制很难工作，又会失去特权与利益。因此，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领导层中很多很多人仍然持旧的、斯大林主义观点。他们要在任何一个别的社会政治体制下为自己寻找一个位子即使说不是完全不可能，那也是很难的。这些当权者除了往下面贯彻‘上头’的意旨外，不会做任何其他事情。”在上述条件下，在苏联社会“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局面。只要最高领导一停止施加压力，使社会实现非斯大林主义化的种种努力，整个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体制几乎无须下达新的补充指示就会自动恢复原状，就像被按倒的不倒翁一样，只要手一松开，它马上便直立起来，或者像自行车一样，如果你不再用脚蹬，它就向一侧倒下去。”<sup>①</sup> 所以，正如有人指出的：“断言我们似乎告别了斯大林主义，此话说早了，太早了。”<sup>②</sup>

勃列日涅夫为重新斯大林主义化，主要通过一些行政措施对站在反斯大林主义立场上的人施加压力，但又不采取或很少采取极端的手段，如逮捕判刑等。“一般的做法是革职，给予严厉的党纪处分，直至开除党籍，以及用越来越巧妙的手段搞臭和迫害持不同政见者，包括公开诋毁中伤他们，送入精神病医院，乃至驱逐出境，剥夺苏联国籍等等。”<sup>③</sup>

勃列日涅夫在重新斯大林主义化方面，首先的步骤是恢复斯大林作为“伟大

---

①（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第190页。

②（俄）亚·尼·雅科夫列夫等，徐葵等译：《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323页。

③（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第191页。

领袖”的名誉，最简单的办法是1965年利用纪念卫国战争胜利20周年庆典，提及以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斯大林为首的国防委员会。后来，利用撰写各种各样的有关二战的回忆录把斯大林重新抬出来。官方要求回忆录也好还是二战史也好，要符合当时的苏共路线、方针与政策的需要。这样，连十分重要的朱可夫回忆录中，也要把有损于斯大林形象的内容删去，如从书的原稿中砍掉有关1937年斯大林对红军高级指挥人员实行镇压的一章。<sup>①</sup>

与此同时，“思想限制的范围扩大了，成为迫害对象的人数增加了，社会的政治、精神和道德氛围明显地变坏了。”“‘合法性’的界限和可以在体制之内采取行动的范围变得越来越窄了，人们明确无误地知道不久前还准许说的话和曾在崇高讲坛上讲过的话也被置于禁止之列了。”<sup>②</sup>

这期间，加强了“秘密警察”机关的作用，鼓励大家告密，检查私人信件，偷听电话谈话多了起来。“苏共中央的高级负责人，甚至中央书记，在自己的办公室谈到尖锐的话题时，也常常看一看电话机，作出一种明显的手势——把手指按在嘴上，并转到另一个话题。”<sup>③</sup>

至于文化、社会科学领域的情况，并不比其他方面好些，拿经济科学来说，勃列日涅夫时期实际上在走回头路，精力集中在研究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不切实际地去拨弄从马列主义奠基人著作中摘出来的一连串抽象原理，而且主要是用他们最粗俗的、纯粹斯大林式的诠释来研究。<sup>④</sup>这种斯大林式的诠释，早已成为被推销得贬了值的理论，还在强迫人们接受，而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批判不断升

---

① 朱可夫元帅的回忆录完整的未经删改的版本现在已经问世。自1937年5月至1938年9月，遭到斯大林镇压的有近半数的团长，几乎所有的旅长和师长、所有的军长和军区司令员、军区军事委员会委员和政治部主任；大多数军、师旅的政工领导干部，近1/3的团政委，以及高等和中等军事学校的许多教员（参见格·阿·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第202—205页）。

② （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第191—192页。

③ （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第317页。

④ （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第220页。

级，并纳入了政治经济学教科书。<sup>①</sup> 对主张更多发挥市场调节作用的学者如阿甘别吉扬和扎斯拉夫斯卡娅等，成为围攻的对象。

当然，我们说勃列日涅夫时期重新斯大林主义化，最主要的内容还是表现在政治、经济体制的僵化和“成熟化”方面，即这一时期的体制的基本方面仍然是斯大林时期留下的传统体制模式。另外，我们说重新斯大林主义化，决不意味着勃列日涅夫时期与斯大林时期一模一样。而基本含义是指“要保持和重建斯大林时期的秩序和机制”。<sup>②</sup>



勃列日涅夫在1980年第22届奥运会开幕式上。

---

① 1975年苏联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专门列有批判《市场社会主义》的内容。

② (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第213页。

## 57. 为什么说苏斯洛夫是“灰衣主教”？

马龙闪

苏斯洛夫在苏联政坛上历经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三个时期，从1946年调入中央介入文化意识形态，1947年进入中央书记处，1948年正式接替日丹诺夫主管意识形态，到1982年去世，在苏共中央管理文化意识形态的时间长达36年。他是伴随苏共理论向僵化、教条方向演化，意识形态走向保守、凝固和衰落，一步步走过来的。他既是这一过程的见证者，又是这一过程的推动者和领导人。所以，不了解苏斯洛夫其人，不了解他的生平历程和政治品格，就不能深刻了解苏联意识形态的演化。

如果说其前任日丹诺夫是一位斯大林个人崇拜的主要理论家、协助斯大林确立文化意识形态管理体制的倡导者，是资产阶级文化“全面腐朽论”的鼓吹者，战后意识形态大批判运动的最高指挥官，那么，苏斯洛夫就是一位后来人、追随者、模仿家和守夜人。苏斯洛夫在日丹诺夫去世后，于1948年接手日丹诺夫的职务，此后34年（1948—1982年）一直稳居此高位，要了解其中的奥秘，不仅要了解他1948年之后的政治生涯，还要了解他的早期的政治记录。

### 靠寻章觅句、摘引语录踏上通天之路

苏斯洛夫1902年生于萨拉托夫省（现在的乌里扬诺夫省巴夫洛夫区）赫瓦伦斯克县沙霍夫村的一个农民家庭。1918—1920年，即在他16—18岁时，他以教堂附属小学毕业的文化程度，先是在本村贫农委员会做事，随后参加了县共青团的工作。1921年入党，并被保送进入速成中学。1924—1928年，他就读于莫

斯科普列汉诺夫国民经济学院，同时在首都纺织学院和化工技术学校代授课程。接着，进入红色教授学院，注册为经济学部学员；几乎同时（1929年）在莫斯科大学和工业学院开始教授政治经济学。或许是在红色教授学院经济学部学习期间与斯大林私人秘书 П·З·麦赫利斯相识，这时恰好后者也在这个经济学部进修。但另一种说法是，苏斯洛夫常向《真理报》投稿而被麦赫利斯发现，因为1929年麦赫利斯从斯大林秘书处调入了《真理报》。或者，他们两人相识，以上两种因素兼而有之。

麦赫利斯虽从20年代初就在斯大林秘书处工作，但其文化程度并不高，据说，他连月亮为什么不会发光都不知道。由于布哈林在反“右倾”斗争中倒台，布哈林及其弟子被从《真理报》撤职，这里需要补充斯大林的人，因此就调麦赫利斯进入了这个重要阵地。办报写文章必须引用列宁和斯大林语录，麦赫利斯发现苏斯洛夫有这个特长，他最善于寻章觅句、摘引语录，可以说是一位引经据典的好手，只要有需要，他准能为麦赫利斯找到恰到好处的语句。他不仅善于引用列宁、斯大林的语录，甚至连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的语录也能很快找到。这样，“麦赫利斯把他新发现的人才向斯大林汇报，引起斯大林对苏斯洛夫的注意，自此，苏斯洛夫走上通往权力顶峰之路。”<sup>①</sup>

有关苏斯洛夫政治发迹的这个说法，从各方面判断，看起来是可信的。首先，麦赫利斯经常出入斯大林办公室，有通天之路；他亲自向斯大林推荐苏斯洛夫，是顺便之事。第二，苏斯洛夫正是在麦赫利斯担任《真理报》工作之初走上升迁之途的。他1931年从红色教授学院毕业后，就由联共（布）中央“分配”到了中央监委机关和工农检察院，而这里正是麦赫利斯曾经任职，斯大林早在列宁时期就曾担任领导的地方。可见，苏斯洛夫被分配到这里，同麦赫利斯和斯大林大有干系。第三，苏斯洛夫确有寻章觅句，翻检语录的高超本领，这一点，在几十年后也为布尔拉茨基所见证。

那是在1964年苏共中央二月全会期间，赫鲁晓夫责成苏斯洛夫必须就谴责斯大林个人崇拜作个人发言。布尔拉茨基等人为苏斯洛夫准备了这个发言稿。在商量定稿时，苏斯洛夫觉得一个地方应找一段更恰当的列宁语录加以充实。布尔拉茨基本想自己动手，但苏斯洛夫抢先说：“这个我自己来，我现在就去找。”

<sup>①</sup> 蓝英年、朱正著：《从苏联到俄罗斯》，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285页。

“说着，他敏捷地跑到办公室的一角，”——布尔拉茨基这样描写道，——“抽出通常图书馆里才有的小抽屉，放到桌子上，然后用他那纤细的小手快速地翻阅其中的语录卡。抽出一张卡片，看了看，不是的，又开始默读另一张，又不是的，后来终于抽出一张，只见他得意地说：‘就是这张，这张合适。’读了读，还真是一段挺好的语录。”布尔拉茨基接着写道：“当我看到身为我国最著名的思想家，找一段语录，就像找一个小玻璃珠子，或者说，就像过去的君主选念珠一样，我不禁失笑起来。”<sup>①</sup>由此可见，苏斯洛夫确有这一本领。

苏斯洛夫被分配到中央监委机关和工农检察院任检查员后，1933年，苏斯洛夫又被外派，担任乌拉尔和契尔尼戈夫党组织的监委委员，在那里指导清洗工作。1933—1936年，他又被晋升为苏联政府检查委员会委员。在1937—1938年“大清洗”高潮期间，他被派往罗斯托夫省加强“清洗工作”；而正是在他的“加强”之下，该省党组织的整个领导都遭到了镇压。因为他“铲除人民敌人”有功，在罗斯托夫省他又先后被提升为省委第三书记和第二书记。从此，苏斯洛夫便走上了高级领导阶层。

其实，苏斯洛夫为麦赫利斯所赏识，绝不仅仅因为他是翻检语录的能匠好手，更重要的是对其政治品质的欣赏。麦赫利斯是何许人？——从这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折射出被他举荐者苏斯洛夫的影子。麦赫利斯作为秘书，对斯大林极善逢迎，他那股过分热心的劲头，连斯大林有时也觉得有些过头。比如，他做了《真理报》主编和权力很大的中央出版局长后，没有知会斯大林，就宣布要举办《列宁主义基础》发表十周年纪念活动。麦赫利斯为迎合斯大林，还表现出了极力要求镇压“人民敌人”的愿望，为此，他爱写各种各样的告密信。后来作为苏军政治部主任，这个麦赫利斯曾是在“大清洗”中对军内施行镇压的主要推手之一。麦赫利斯之冷酷无情，连斯大林在谈到他时也说，“哪能把建设性事务委托给麦赫利斯，他只能毁灭、破坏、消灭，这才适合他”。关于此人，赫鲁晓夫也曾这样说：“他诚实倒是挺诚实的，但一个心眼看到的，只是到处的‘人民敌人’，只是破坏者。”苏斯洛夫在这些地方，也蛮像举荐他的这个“伯乐”，首先就是冷酷，他在历次“清洗”、镇压中都有突出表现。

---

<sup>①</sup>（苏）费·布尔拉茨基著，徐锦栋等译：《领袖和谋士》，东方出版社1992年版，第202页。

苏斯洛夫的冷酷无情，不仅在他插手的各种“清洗工作”中表现了出来，也从他日后对待斯大林女儿阿利卢耶娃申请送重病丈夫回印度一事上表现了出来。对此，阿利卢耶娃在《仅仅一年》一书中作了详细的描写。下面就是她同苏斯洛夫会面的情形。

阿利卢耶娃来到老广场，请求苏斯洛夫批准她送丈夫回国。她解释说，这是她与丈夫“两人共同的请求”，希望能得到“满足”，这也是“一个垂死的人的最后愿望”，因她丈夫这时病已很重，只有回到他习惯的气候温暖的印度，病情才会好一些。听了这些，“苏斯洛夫坐在桌子后面，焦躁不安地扭动着身子。一双血管突起的苍白的手动来动去。他身体瘦高，长着一副宗教狂的脸。他眼镜的厚镜片也没能使他逼视的目光变得柔和一点。‘你知道你父亲最反对苏联人同外国人结婚。我们还制定了一条相关的法律！’他一个字一个字地对我说。‘那又怎样？’我尽可能保持礼貌。‘父亲在这个问题上是错误的。现在别人都能同外国人结婚，为什么我不能？’苏斯洛夫身子猛地向前一挺，气得几乎说不出话来，两手使劲转动着铅笔。‘我们就是不放你出国！’他气愤地说。‘辛格要走让他走好了。谁也不留他。’‘他会死的！’我大声说，觉得现在必须把话说清楚，‘他会死在这里，而且用不了多久。他这样死会使我们大家难堪，让我内疚！我决不允许！这将是我们的耻辱。’‘怎么会是耻辱呢？不是一直给他治疗吗？……他是病人，死就死了呗。但你不能出国。外国人会挑衅的。’‘怎么会挑衅呢？这与挑衅有什么关系？’‘你什么也不懂！’他喊起来……”<sup>①</sup>

最后，什么也没有说通，苏斯洛夫就是不允许阿利卢耶娃出国。阿利卢耶娃最后写道：“我走了，带走了这个现在领导全党的花岗岩脑袋的人留给我的可怕的印象……”<sup>②</sup>

后来，阿利卢耶娃的丈夫，印度共产党员辛格，到底病死在了莫斯科。1966年，阿利卢耶娃把辛格的骨灰送回印度，她自此没有回国。显然，这与苏斯洛夫的逼迫不无关系。赫鲁晓夫晚年在回忆录中反省了这件事的错误，还表现出了一些同情心，可是苏斯洛夫却始终抱着一副铁石心肠。

<sup>①</sup> 转引自蓝英年、朱正著：《从苏联到俄罗斯》，第282—283页。

<sup>②</sup> 转引自蓝英年、朱正著：《从苏联到俄罗斯》，第283页。

## 靠冷酷的铁腕、咏诗祭神的歌喉登上权力高层

在个人崇拜和专制统治时代，要打通仕途，步步高升，必须对下冷酷无情，敢挥铁拳，对上则要善唱颂诗，有祭拜神灵的高亢歌喉。苏斯洛夫深谙此道。所以，他一踏上仕途，就飞速升迁。冷酷的性格，刚好在“大清洗”时代派上了用场。因此，他在“大清洗”中建树的功勋，使他于1939年又晋升为联共（布）奥尔忠尼启泽（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第一书记，在这一职位上，他一直待到1944年。作为边疆区领导人，在战争年代（1941—1943年），他同时担任了外高加索战线北部集团军政治委员和边疆区游击运动司令。其间，他组织动员过农民修建涅文诺麦斯克灌溉渠，发布命令炸毁了斯塔夫罗波尔的喀山大教堂，还从组织上协助内务部机关，在1943年实施了对卡拉查耶夫人的强制迁徙。把共有12万人的这个少数民族从南俄故土流放到中亚，竟源于由逼供信得来的虚假供状，把德寇屠杀罪行张冠李戴地扣在卡拉查耶夫人头上，造成了针对一个民族的大流放、大冤案。

由于在斯塔夫罗波尔建树的政绩，从1944年底开始，苏斯洛夫进一步升迁，被任命为立陶宛共和国的联共（布）中央局主席，这事实上是一个特设的管理该共和国的特命全权职务。在这里，他凌驾于共和国第一书记之上，发号施令，颐指气使，又继续着以前对待少数民族的铁腕政策，拒不妥协，不同“林中兄弟”谈判，残酷镇压了立陶宛民族起义队伍。与此同时，在他的领导下，大力展开强迫农业集体化运动，镇压农民和当地知识分子，把大批人逮捕、流放，发配到俄罗斯远东荒无人烟地区。这时造成的后果和隐患，到80年代末引发了立陶宛人的独立运动。正是立陶宛带头独立，成了冲垮苏联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

苏斯洛夫对待卡拉查耶夫人和立陶宛的铁腕政策，赢得了斯大林的赏识，从1946年3月起，苏斯洛夫被调入联共（布）中央机关。依照斯大林的提议，在1947年联共（布）中央全会上被提升为中央组织局委员和党中央书记，负责大众传媒工作。这是苏斯洛夫登上权力高层的关键一步。如果说苏斯洛夫对待下面的镇压是凌厉果断的话，在权力高层的动作却谨小慎微，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战后苏斯洛夫进入中央的这个时期，正是以马林科夫为代表的机关派与以日丹诺夫为代表的列宁格勒派争夺接班人的剑拔弩张阶段。苏斯洛夫正夹在这两派之

间，不小心就有粉身碎骨的危险。他曾是中央宣传鼓动部副部长，在日丹诺夫麾下工作。担任这一职务，要想疏离两派，躲避危险，难度是极大的。1948年6月，他又恰同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一起，赴罗马尼亚参加共产党情报局代表会议，实施对南共“机会主义”的挾伐。在这样的两难处境中，以1948年8日日丹诺夫突然去世为转机，列宁格勒派遭到覆灭之灾。苏斯洛夫在此处境中能脱大险，顺利取代日丹诺夫而主管全党意识形态，可谓险中夺位。这里，与苏斯洛夫的另一官场秘诀——善唱颂歌，深得麦赫利斯和斯大林信任、赏识密切相关。在1949—1951年，他又刚好兼任《真理报》主编，一方面在全国组织大批判，进行反对“世界主义”的斗争，挥起铁拳，重击知识分子，同时又极隆重举行斯大林70寿诞盛大庆祝活动，把鼓吹个人崇拜推向了一个新阶段。此外，他还积极参与联共（布）第十九次代表大会的筹备，作为斯大林讲话起草班子的成员，为领袖准备了几个方案的稿子。其中一稿为领袖所欣赏，亲自动笔做了最后定稿。苏斯洛夫这一系列活动，非但逃脱了处于日丹诺夫麾下的险境危局，而且牢靠地巩固了斯大林对他的信任。正是这个缘故，他又赢得领袖提名，在1952年十九大上进入苏共中央扩大的主席团（政治局）。

### 钻营权力斗争的缝隙，谋得政治生存发展的契机

可以说在苏斯洛夫整个政治生涯中，冒险最大、最受压抑的，是在斯大林逝世后的11年，即从马林科夫当权到赫鲁晓夫执政末期。这个时期，一是，他被马林科夫撤去了党中央主席团（政治局）委员，有过短暂的挫折；二是他这个骨子里彻头彻尾的斯大林主义者，在赫鲁晓夫反个人崇拜、进行改革的浪潮里，却不得不强颜欢笑，举旗拥护，伪装紧跟，扮演了一个口是心非的伪君子 and 两面派角色。即使如此，他时不时仍受到赫鲁晓夫的申斥、痛骂，在重大压力下不得不大喊几声斥责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口号。这样做，对他这个意识形态高官来说，是很难受、很痛苦的。在这期间，他也经历过惊心动魄的权力斗争风险。他先是利用赫鲁晓夫同马林科夫争权的缝隙，得以自救：他原同马林科夫关系不睦，因此在赫、马的权争中，他并不是出于政治信仰，而是出于人事关系，选择了赫鲁晓夫。之后，在1957年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反扑中，若不是他侥幸出差在外，没参加7月18日中央主席团会议，置身于莫斯科之外，他甚至有被卷入“反党

集团”的危险。幸好图谋撤掉赫鲁晓夫第一书记的中央主席团会议开过之后，他才回到莫斯科，只是由于米高扬及时前来串联、劝导，他才没有倒向“反党集团”。

在这期间的几次政治抉择中，他都不是出于政治信仰，而是由于同马林科夫的关系而选择了赫鲁晓夫。看得出，这个时期苏斯洛夫是钻了最高权力斗争的缝隙，靠投机得救的。他虽在这个人际关系的缝隙中求得了政治生存，并保全了高层权位，但他政治生存得并不惬意。因为他骨子里是斯大林个人崇拜和思想体系的拥护者，在那个反对个人崇拜和观念更新变革的年代，他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处处步履蹒跚。因此，他屡屡受到赫鲁晓夫的斥责和鞭策。一次，连一般政治幕僚像布尔拉茨基等人都能参加的一个会议上，对着许多同僚和下级工作人员的面，“赫鲁晓夫毫不留情地严厉斥责苏斯洛夫，说道：‘现在国外经常这样报道，在我身边坐着一个斯大林分子、教条主义者苏斯洛夫，他只是在等待推翻我的时机。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苏斯洛夫的名字和父称——引者注），您认为报道属实吗？’”——布尔拉茨基这样描写道。“苏斯洛夫坐在那里低垂着他那张瘦削、蜡黄、苦行僧式的病态的脸，一动不动，一言不发，就连眼睛也没有朝上翻一翻。”<sup>①</sup>

可见，苏斯洛夫作为一个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拥护者而置身于赫鲁晓夫身边，在这个大反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时代，他始终是何等的压抑和不快！

还有一次，是在1964年二月中央全会上，赫鲁晓夫向苏斯洛夫施加压力，必须在会议上就谴责斯大林个人崇拜做公开表态发言。苏斯洛夫无奈，在强大压力下，只好让布尔拉茨基等人起草了一个高调批判个人崇拜的发言，当众公开表态。

一个利用人际关系缝隙，靠政治投机保住官位的人，赫鲁晓夫虽给了他政治局委员的权位，并令其总管意识形态，但他是不可能在思想上同赫鲁晓夫保持步调一致的。在赫鲁晓夫时期，苏斯洛夫始终站在保守主义一边，起着阻挠改革的作用。赫鲁晓夫时期一系列保守主义的大反弹，几乎无一不与苏斯洛夫相关联。在对外政策上，他曾不止一次反对“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南斯拉夫，还就这一问题发表揭露性演说，阻止改善苏南关系；1956年10月底至11月初，

---

<sup>①</sup>（苏）费·布尔拉茨基著，徐锦栋等译：《领袖和谋士》，第201页。

他曾同米高扬一起率苏联代表团到布达佩斯，同匈牙利领导人谈判并了解局势。“了解”的结果，是莫斯科决定出兵镇压匈牙利起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据赫鲁晓夫回忆，米高扬是反对调进和动用军队的，但苏斯洛夫却与此相反，坚持强硬的调军立场。在国内问题上，他所干预的著名事件，是鼓动赫鲁晓夫和舆论界对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帕斯捷尔纳克进行挾伐、迫害；推动撤掉涅斯梅亚诺夫的苏联科学院院长，讨好伪科学派头目李森科；恶意挑拨赫鲁晓夫同文艺界和科学界的关系，使第一书记同知识界发生了一系列争吵、矛盾，等等。<sup>①</sup>

苏斯洛夫顽固的斯大林“教条”情结，随着局势的发展，不能不引起赫鲁晓夫的警觉和不满。60年代初，赫鲁晓夫排除了苏斯洛夫对党和国家意识形态工作的直接领导，把这一工作委托给了苏共中央意识形态委员会主席伊利切夫。苏斯洛夫只是负责苏共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联络工作。

苏斯洛夫对自己权势的式微耿耿于怀，同时也对苏共二十二大后非斯大林化的进展，对意识形态进一步向民主化方向发展，更加心怀不满。于是，他与谢列平为首的保守势力沆瀣一气，共同策划了“马涅什赛马场画展事件”，挑拨赫鲁晓夫打压文艺界，大大恶化了苏共领导同知识分子的关系。

为策划这一事件，专门印制了有关这个画展的资料。但资料中很少谈及艺术问题本身，而却大量摘引了文学家、艺术家对赫鲁晓夫本人的评论。这些评论真真假假掺杂在一块，甚至讲赫鲁晓夫是“坐在宝座上的傻瓜伊万”、“玉米迷”、“饶舌者”等等。赫鲁晓夫见状，震怒异常，以参观画展为名，赶到马涅什把画家们训斥了一顿。在整个看画展过程中，苏斯洛夫自始至终同赫鲁晓夫如影随形，陪伴左右，一会儿指指东，一会儿指指西，一会儿俯首耳语，说些什么，继续往赫鲁晓夫火头上浇油。

赫鲁晓夫一直同苏斯洛夫若即若离，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向来是人们解不开的一个谜。这大概多赖于赫鲁晓夫对苏斯洛夫在文化意识形态方面的知识和嗅觉的器重，希望他能给自己嗅出路边的什么炸弹；然而，苏斯洛夫倒是神经质地闻出了右边的危险，但却有意向主公隐瞒了“左”边的炸弹，其实这是更加危险的。最终，赫鲁晓夫还是被苏斯洛夫知情不报的一场“宫廷政变”给废掉了。

---

<sup>①</sup>（苏）费·布尔拉茨基著，徐锦栋等译：《领袖和谋士》，第205页。

## 靠僵化思维、固守教条稳居权力高峰

如果说苏斯洛夫在赫鲁晓夫时期是经历有惊无险，有时靠违心掩饰、玩弄两面派手法，有时靠拉拢同僚、抵制改革挨过了这10年的话，那么，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的18年，却是大权在握、左右政局、得心应手、稳居权力巅峰，可以说这是他“灰衣主教”生涯的黄金时代。他虽不是发动倒赫政变的核心人物，但靠着在1964年苏共中央十月全会上宣读倒赫报告所起的关键作用，使他在“宫廷政变”后一登台，就是仅居“三驾马车”之后的第四号人物。待勃列日涅夫上下其手，纵横捭阖，清除异己，稳定政局之后，苏斯洛夫很快就上升为第二号人物，牢牢掌控了内政外交和意识形态大权。作为苏共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他主持党中央书记处会议，负责国内整个意识形态政策问题，领导大众舆论工具，监督书报检查制度、文化艺术、高等和中小学教育，以及国家和宗教团体之间关系。鉴于执掌的权责范围，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包括镇压《新世界》编辑部、将索尔仁尼琴驱逐出国、开除历史学家罗伊·麦德维杰夫党籍、处置作家格罗斯曼，流放氢弹之父A·Д·萨哈罗夫，准备并通过苏联“发达社会主义”宪法（1977年宪法），对社会科学——历史学、经济学家的处分，造成全国社会科学的停滞——这一切，都是同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除此之外，苏斯洛夫还积极参与了苏联对外方针政策的制定。作为苏共中央政治局核心圈子成员，他还是参与1979年作出出兵阿富汗决定的重要人物之一。<sup>①</sup>

如果说赫鲁晓夫离不开苏斯洛夫，原多是想利用他在文化意识形态上的政治嗅觉，结果反倒是被他帮了倒忙，推动了意识形态的逆转，阻碍了改革的话，那么，勃列日涅夫之更加离不开苏斯洛夫，则因为总书记是文化意识形态和理论问题的门外汉，亦步亦趋都需要这位“灰衣主教”的扶持和帮忙。更何况这位股肱大臣与主公还在复旧倒退、恢复斯大林主义的方针路线上有一致性，不像苏斯洛夫同赫鲁晓夫之间那样同床异梦、离心离德，第一书记对身边的这位“斯大林分子”还总有一种提防和戒备之心。

---

<sup>①</sup> 有的资料说，决定出兵阿富汗的是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乌斯季诺夫、葛罗米柯四人，未提苏斯洛夫。

由于苏斯洛夫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是实际的第二号人物，主管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所以，他实际上是这个时期推动复旧倒退的主要源头和推动力之一。

废黜赫鲁晓夫以后，经过短暂的过渡期，在1968年“布拉格之春”之后，开始了勃列日涅夫时期真正的复旧倒退。由于镇压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勃列日涅夫集团接着也彻底取消了国内的改革。于是，在文化意识形态上全面“拧紧了螺丝钉”，这就是苏联学者所说的，开始了“悄悄的重新斯大林化”的时期。<sup>①</sup>

就是在这个时期，对《新世界》杂志实施外科手术，不同主编打招呼，就改组了编辑部人员，最后逼迫特瓦尔多夫斯基辞去了主编职务。对《真理报》编辑部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先把总编辑鲁米扬采夫解了职，原因是报上登载了两篇关于知识分子的文章；文章提出了发展党内民主的要求，主张在党内加强更有教养、更有文化者对党的影响。原来的总编辑被撤职后，取而代之的是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齐米亚宁。这位新总编甫一上任，就对《真理报》编辑部动了手术。首当其冲的是对未经《真理报》总编允许而在《共青团真理报》发表文章的布尔拉茨基，他被解除了政治评论员（相当于副总编职务）职务；接着又解职了其他几个编辑。不仅如此，还株连了发表布尔拉茨基文章的《共青团真理报》的有关人员。

这期间，斯大林主义的复旧和反扑是全面的，其“目标不但针对人，而且还针对思想，针对历史事实，以及针对人们得出的关于社会主义、关于和平、关于政治的新观念”。<sup>②</sup>

这时候，意识形态领域的所有关键岗位实际上全都落到了保守派手里。赫鲁晓夫时期建立的以伊利切夫为主席的意识形态委员会，被一分为三：科学部、文化部和宣传部。科学部由勃列日涅夫的亲信С·П·特拉佩兹尼科夫掌握；文化部由原苏共白俄罗斯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央书记В·Ф·沙乌罗主管。这里一下都变成了斯大林主义的堡垒。唯独宣传部经历了一些曲折，经过了一段时间清理后才同上述部门“保持”了步调上的“一致”。苏斯洛夫掌控住这些阵地和堡垒之

---

①（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193页。

②（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第197页。

后，接着就在社会科学、思想和文化等整个精神领域，进行“扫除”。

在社会科学领域，史学，首先是现代史，是被“扫除”、清理的第一个学科。在这里，几乎抛弃了二十大精神，开始重新颂扬斯大林主义。就连苏共中央书记波诺马廖夫在二十大后主编的《苏联共产党历史》，在70年代再版时也只是保留了有关二十大和反对个人崇拜决议的几句话或简单段落。这样做，大概还是看在主编者身居高位的面子上。在整个史学领域，开始了一场迫害历史学家的运动。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沃洛布耶夫，因为提出十月革命前俄国几种经济结构的理论而被解除了职务；著名的二战史专家涅克里奇，因涉笔苏联在战争初期的失败而被迫流亡国外。此外，其他许多学者也大多因学术问题而遭到处分。

更严重的是，在科学、文学以至艺术方面，重新开始了带有普遍性的伪造历史的工作。令人发指的，是对朱可夫回忆录的篡改。不仅由编辑人员以作者的名义对作品任意删改，还“从书中砍掉了有关1937年对红军高级指挥人员实行镇压的一章”。<sup>①</sup>为了掩盖1937—1938年“大清洗”高潮中的血迹，连对在这几年被处死的将领、作家和文化人的死亡时间（1937年、1938年、1939年）也竭力加以回避甚至篡改。至于对二战初期的失败，更是大大缩小了规模；对于失败的原因，不是加以歪曲，就是语焉不详地加以回避。

在经济学领域也进行了批判和清理。具体表现是，新西伯利亚的“商品学派”遭到了保守势力的围攻和打击，但他们在重重困难中坚持并生存了下来。

所有这些开历史倒车的行为，虽与各个部门中保守派的领导直接相关，但都是在苏斯洛夫这个意识形态大管家的监督下发生的。在苏联中央高度集权的体制下，事无巨细都要由中央过问、都要由主管者决定的情况下，这位“灰衣主教”对意识形态复旧倒退所承担的责任，无疑是十分重大的。

众所周知，勃列日涅夫时期有几大十分有名的官方理论，这就是“发达社会主义论”、社会主义大家庭成员“主权有限论”等。虽没有资料证明苏斯洛夫是这些理论的首创者，但他作为那个时期的主要理论家和意识形态主管，对这些理论的提炼和完善，是有不容置疑之功的。最突出的是，他曾对“发达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社会政治条件和文化条件”作了权威的论述，把这一理论提高到

---

<sup>①</sup>（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第204—205页。

国家意识形态的高度，用它来安抚人心、掩盖社会矛盾，把国家与社会推向了规避现实的道路。<sup>①</sup>

苏斯洛夫的思维方式是十足教条主义的；小心谨慎、面面俱到、讲究平衡、四平八稳，是它的突出特点。可以说，他一贯保持着与斯大林主义的一致性，保持着解释斯大林概念的准确性。作为不断听取苏斯洛夫指示意见的苏共中央写作班子成员，布尔拉茨基曾对这位“灰衣主教”的思维和教义作过详细描绘。他说，苏斯洛夫对一些理论问题的意见“前后一致”，人们对此“有非常清晰的印象”：“譬如说，我们在文件中写到在其他国家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他就指出，他认为也应谈谈武装起义；我们写到关于世界大战不是不可避免的，他就提出，他认为应该说和平也不是注定不可动摇的；我们强调民主的意义，他建议要谈论纪律；我们指出个人迷信的错误，他建议强调这种时期是没有的，因为党始终站在列宁主义的立场上；我们指出，集体化时期并不是一切都尽善尽美，而他则建议，应该指出伟大变革的历史意义。总而言之，他维护面面俱到的观点。”<sup>②</sup>

苏斯洛夫讲究教条的准确性甚至到了可笑的地步。布尔拉茨基接着谈到了苏斯洛夫表述“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这一概念的做法：每次我们只要在这两个短语之间写成“和”，他都非常认真地划去“和”字，加上连接符号“—”，即写成“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他认为，不应该将两者对立起来，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就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sup>③</sup>那么，为什么在这两个短语之间加上“和”字，就是将它们二者对立起来了呢？真是令人匪夷所思！

仅此一例就可看出，这位“灰衣主教”从字面上释义教条、固守教条之一斑。他只管从字面上竭力维护“教条”，但它究竟距离现实生活到底有多远，这就不是他关心的事了。所以，他竭力从理论上宣扬“发达社会主义”的“三个条件”，而不管苏联现实社会主义的生活实际是不是达到了这个程度，反正苏联就是“发达的社会主义”。看看，苏斯洛夫就是这样一个闭眼不看实际，只顾讲

① 马龙闪：《苏联文化体制沿革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86页。

② （苏）费·布尔拉茨基，徐锦栋等译：《领袖和谋士》，第196—197页。

③ （苏）费·布尔拉茨基，徐锦栋等译：《领袖和谋士》，第197页。

经说道、维护斯大林“教条”的“灰衣主教”和“理论家”！

苏斯洛夫的个人生活倒一直保持着苦行僧式的洁身自好。他生活俭朴，也不为家人谋取好处。他不爱露面，不尚虚荣，不追求勋章，不出个人著作，不贪图财物。据说，每年他都把会计叫到办公室，把自己工资剩余的一部分作为党费上缴。这种品质和作风，在苏联当时腐败成风的环境中，也确实让人赞赏、钦敬。然而，这种洁身自好的品质若与勃勃向上、积极变革的思想体系相结合，就能有助于意识形态的净化和纯洁，但是这种品质却发生在体现僵化倒退的思想者身上，这就很难对其所生活的社会产生什么大的作用了。

苏联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在这样一位“主教”和“理论家”的严厉监管之下，一直走过了34年；而他所继承的前任又是向以提出“日丹诺夫主义”而著名的意识形态最高指挥官日丹诺夫，他们共同以斯大林主义为旗帜，监管着苏联意识形态几乎达半个世纪。这样的监管“业绩”究竟有什么效果，苏联七八十年代的社会意识和党内状况，可以说就是一个绝好的回答。这是一种什么状况呢？简言之，社会政治经济停滞；党内腐败成风；青年人大多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失去信仰；知识分子和干部中间则多有所谓“夜间人”现象，即白天上班只能说假话，骗骗领导，只有下班回到家中，在夜晚见到家人和亲朋好友时，才披露心迹，抒发对领导和社会政治的不满等。——这种状况，恰恰可以解释，何以在80年代后半期改革当中涌现出了汹涌澎湃的激进民主派思潮；而恰是这一思潮的泛滥及其代表人物的掌权，最后埋葬了苏联。

苏斯洛夫去世于1982年，当时由于勃列日涅夫时期改革停滞造成的政治后果已经显现，国家的难题日益增多，已积重难返，斯大林体制逆反效应产生的政治人物——戈尔巴乔夫，显然已经无力回天。

苏斯洛夫这个为其政治信念，为斯大林“教条”执著一生的人物，在理论上连一个连接符号“—”也不肯放弃的人，如果对苏联后来的悲哀结局地下有知，他会对自己的一生和孜孜努力有何感想呢？

## 58. 勃列日涅夫时期对第三世界扩张造成了什么严重后果？

李 兴 张英姣

勃列日涅夫时期，随着实力的增强，苏联俨然以世界大国自居，公开宣称要干预世界事务。勃列日涅夫声称，“地球上没有哪个角落的情况不以某种方式加以考虑”。苏联海军司令戈尔什科夫夸口说：“在世界海洋图上难以找到苏联舰只航行不到的地区”。苏联全球战略日益显示出“进攻性”色彩，突出表现就是加



1981年勃列日涅夫（前中）在最后一次出访的火车上。

强了对第三世界的争夺和渗透。在第三世界，苏联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是进行扩张、渗透和争夺，尽量扩大自己在这一地区的势力和影响，同时削弱对手的势力和影响，以实现对西欧和北美地区的迂回包抄，为苏联的全球和地区霸权战略服务。

## 苏联大肆向第三世界扩张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广泛向第三世界渗透，从亚洲、中东直至非洲，甚至还包括拉丁美洲。

### （一）在中东地区的扩张

由于中东地区地跨三大洲，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和丰富的石油矿藏，又与苏联南部相接，是苏联通向印度洋的必经之地，因此苏联对这个地区特别重视。该地区最大的问题，就是巴勒斯坦人与犹太人、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国的关系问题。苏联在政治上和道义上支持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国家，支持它们反对美国的盟国——以色列的犹太复国主义，这是为了扩大苏联在该地区阿拉伯国家和人民中的势力和影响，削弱和排挤美国的地位，同时也利用阿以的矛盾与冲突，企图充当仲裁人，维护其民族私利。

由于埃及在阿拉伯世界中的声望和地位，苏联开始很看重埃及。1967年，埃及在“六五战争”中严重失利，苏联乘机重新武装埃及。1955—1971年，苏联向埃及提供的军援总值超过25亿美元。在保卫埃及和防止以色列再度袭击埃及的借口下，苏联军队进驻埃及，在埃及部署导弹部队12000—15000人，派遣军事顾问4000—5000名，空军驾驶员约200名。苏联逐渐控制了埃及军队。苏联顾问被派到埃及军队营一级，甚至连连一级。苏联海军在埃及取得了使用亚历山大港、塞得港的权利，苏联空军在埃及建立了多处空军基地。与此同时，苏联向埃及提供优惠贷款，双方贸易额急剧上升。1965年和1970年分别是1952年双方贸易水平的5倍和8倍，成为埃及最大的外贸伙伴。<sup>①</sup>1971年，苏联以武器供应为诱饵，迫使埃及签订了为期15年的《苏埃友好合作条约》。这是苏联与阿拉伯

---

<sup>①</sup> Советская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в годы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1945—1985. Москва. 1995. С. 415.

国家签订的第一个友好条约，也是战后苏联与非社会主义国家签订的第一个友好条约。但是，由于该条约不是建立在真诚愿望的基础上，而是在相互利用，所以很快便暴露出了双方的矛盾。在萨达特取代逝世的纳赛尔继任总统后，埃及的政局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埃及内政（“经济自由化”）和外交（与美国接近）政策的变化，使苏联产生不满，特别是萨达特奉行的以战争迫使以色列求和，即“以战迫和”的战略，与苏联维持中东局势现状即“不战不和”的政策发生矛盾。苏联对阿拉伯国家的军事力量不信任，也不愿与美国发生直接军事对抗。不战不和有利于苏联在中东扩张势力。苏联由于不满萨达特的政策，便拖延武器供应，拒绝增加援助，这样，苏埃关系趋于恶化。1972年7月，埃及驱逐了苏联专家。接下来在1973年的第四次中东战争（斋月战争）中，苏联出于自身战略利益的考虑，没有支持阿拉伯人反对以色列的斗争，只在迫使以色列接受停火协定、保护埃及的第三军团免遭灭顶之灾方面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sup>①</sup> 1974年4月，埃及宣布“武器来源多样化”，这是对苏联的又一打击。此后，埃及积极向美、英、法购买武器。1976年3月，埃及议会宣布废除《苏埃友好合作条约》，两国关系破裂。苏联在埃及的军事力量全部被驱除。

苏埃交恶后，苏联从中东的整个战略利益考虑，不愿再失去叙利亚。在大批苏联军事专家和技术人员被埃及赶出后，苏联把其中一部分人转移到了叙利亚。在斋月战争期间，苏联与叙利亚之间架起了空中桥梁，及时运送了叙利亚急需的武器弹药，而且在战后还向叙利亚空运了大量武器装备，使叙利亚的军事力量超过了战前。1971—1978年，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先后7次访问苏联。1980年10月，苏联与叙利亚签订了为期20年的友好合作条约。条约明确规定了两国在军事方面的合作。但叙利亚于1974年与美国复交，并加强了与西方国家的经济联系。这说明苏叙之间的关系并不牢靠，更非铁板一块。

在苏埃关系开始冷淡之时，苏联与伊拉克的关系迅速发展。1972年，苏联与伊拉克签订了友好合作条约。伊拉克政府吸收两名共产党员进入内阁。苏联还积极鼓励伊拉克把西方的石油公司国有化。但执政的伊拉克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是一个具有强烈阿拉伯民族主义意识的政党，要求苏联尊重伊拉克的主权和民族尊

---

<sup>①</sup>（美）詹姆斯·姆·戈德格尔：《领袖风格与苏联政策》，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6页。

严。斋月战争之后，中东局势的格局发生变化，加上随后国际石油价格的上涨，大大增强了伊拉克作为石油国家而奉行独立路线的实力与信念。伊拉克开始缓和与西方国家的关系，谋求西方在经济建设和武器供应上的帮助，作出“武器来源多样化”的决定，以便减少对苏联的依赖。尤其是在阿拉伯问题上，苏伊双方发生了分歧，两国矛盾逐渐加深。

1978年底，伊朗发生了反对亲美的国王的浪潮，苏联予以支持，宣称：对苏联邻国伊朗事务的任何军事干涉，都将被视为对苏联安全利益的威胁。1979年，伊朗发生伊斯兰革命，苏联称赞这是“反帝的革命”，是“国际生活中的重大事件”。然而，新上台的霍梅尼政权却采取反苏立场。尽管如此，伊朗对于苏联来说其重要性却大于伊拉克，这是由其地理位置、国土面积和人口所决定的，而且伊朗是苏联的邻国。苏联宣称，伊拉克是苏联在中东的一个“盟友”，负有条约义务，因此，当1980年爆发两伊战争后，苏联不愿公开得罪其中的任何一方，表示严守中立，希望双方和谈。实际上，苏联并没有积极而有力地去进行调解，而是暗中向双方输送武器，来维持某种平衡，力图操纵局势，从中渔利。<sup>①</sup>

1982年6月，以色列军队入侵黎巴嫩，占领了黎巴嫩1/3的国土，全力围剿黎巴嫩境内的巴基斯坦游击队。苏联在这次黎巴嫩危机中虽然发表声明支持阿拉伯人，但未采取什么具体行动。9月，勃列日涅夫提出解决中东问题的六原则，中心内容是要求召开有苏、美和阿、以冲突各方（包括巴勒斯坦）参加的国际会议，在苏、美的支持下，讨论中东和平问题。苏联的目的，在于打破美国企图独揽中东和谈的局面。黎巴嫩局势的发展完全打乱了美国的计划，苏联在黎巴嫩内战后影响扩大了。

土耳其虽然是北约的成员，但由于其地与苏联南部边境接壤，苏联力图使其实行中立、采取对苏友好政策。1972年4月，苏联与土耳其签署了睦邻友好关系宣言，宣称要按照和平、友好与睦邻的原则来发展双边关系。1978年，双方又签订了关于睦邻与友好合作关系原则的政治文件。此外，还签署了关于划分黑海大陆架和扩大经济、科技合作计划的协议。苏联从技术上帮助土耳其建立工业企业和钢铁公司。两国贸易额不断上升。

---

<sup>①</sup> Советская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в годы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1945—1985. Москва. 1995. С. 426—427.

## （二）在亚洲地区的扩张

在亚洲，苏联扩张的重点是阿富汗、印度和越南等国。

阿富汗是苏联南部邻国，与苏联有 2000 多公里共同边界线。长期以来，阿富汗是苏联与伊斯兰世界之间的重要缓冲地带，也是通往中东石油产区和南下印度洋的一条走廊。苏联对阿富汗局势一直非常关心。1973 年，阿富汗国王的堂兄达乌德发动政变，推翻了国王的统治。1975 年 12 月，苏联与阿富汗签订了苏阿互不侵犯条约。由于达乌德奉行中立政策，阿苏关系经历了一个由好变坏的过程。1978 年，塔拉基和阿明等领导的人民民主党发动政变，推翻了达乌德的统治，塔拉基就任总统，阿明任总理。新政府要实行一系列激进的改革措施，在国内大失人心。在外交上，新政权实行亲苏政策。1978 年 11 月，阿富汗与苏联签订友好睦邻合作条约。不久，人民民主党内部发生分裂，先是塔拉基和阿明为首的“人民派”镇压以卡尔迈勒为首的“旗帜派”，卡尔迈勒本人被派到国外当大使，他的许多追随者或被逮捕，或被消灭。由于国内发生政治危机，反对派，主要是部落穆斯林武装力量逐渐控制了一半多的省份，政府军情绪波动，塔拉基要求苏联出兵援助。苏联领导层当时考虑到出兵的严重后果与代价，拒绝了他的要求。接着塔拉基与阿明之间发生了权力之争。在一次兵变后，塔拉基被投入监狱，后宣布重病暴亡。阿明夺取领导权后，疯狂镇压反对派和持不同政见者，引起苏联的抗议，阿明要求苏联大使回国。又有情报表明，阿明在外交上正在向美国靠拢。

1979 年夏天，苏共中央政治局内成立“阿富汗问题委员会”，讨论阿富汗局势和苏联对策。1979 年 12 月 4 日，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政治局委员苏斯洛夫，克格勃首脑安德罗波夫，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和外交部长葛罗米柯等五人，经讨论后决定向阿富汗出兵，<sup>①</sup> 捍卫苏联在该国的利益，保卫苏南部边界的安全，防止泛伊斯兰民族主义影响到苏联中亚广大地区的穆斯林，同时占领通往印度洋温暖港口的要道，逼近波斯湾的石油产区，威慑西方国家的经济命脉，并完成对中国的包围，形成对西方和中国不利的战略态势。从 12 月 25 日始，大批苏联军队开进阿富汗，实施“风暴行动”。12 月 27 日，苏联

---

<sup>①</sup> Документы Советского Руководства о положении в Афганистане 1979—1980 гг.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3. 1996.

空降兵和摩托化部队开进了喀布尔。当天夜里，苏军袭击了阿明的总统府、阿内务部、武装力量总参谋部、邮政总局、电讯总局等，并杀死阿明，控制了喀布尔。从苏联回国的卡尔迈勒，被宣布为人民民主党的总书记和阿富汗总统。接着，共约5万苏联军队，兵分两路，分别从土库曼和塔吉克侵入阿富汗。苏军很快控制了阿富汗各重要城市和战略要地。阿富汗实际处于苏军的军事占领之下。

苏军对阿富汗的入侵，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也激起了阿富汗人民的强烈抵抗。他们开展了游击战。其中，以穆斯林为主的阿富汗抵抗力量，到1982年已发展到近10万人。苏联陷入了阿富汗战争的泥潭，在国际社会中空前孤立。这场战争长达10年，苏联耗资数百亿美元，死伤官兵5万多人，仍无法使阿富汗臣服。

苏联与印度的关系，是一种相互需要的战略安全关系。苏联希望通过印度来牵制中国，并且在第三世界获得一个有影响力的朋友；而印度希望通过发展与苏联的关系来抵消中国与巴基斯坦之间的友好关系。苏联起先企图脚踏两只船，在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维持某种平衡。1966年，柯西金在塔什干成功地协调了印巴冲突，通过了以和平手段来解决两国关系的《塔什干宣言》。但1971年由于孟加拉危机的发生，苏联作出了支持印度的选择，以抗衡美国、中国对巴基斯坦的支持。于是，苏巴关系恶化。苏驻巴大使馆遭到巴群众的袭击，迫使苏联不得不把使馆的妇女、孩子和专家撤走。<sup>①</sup>从1965年以来，苏联就是印度最重要的武器供应者。1967—1977年，苏联向印度转让的武器价值占各国向印度转让武器的81.2%。在国际舞台上，苏联在涉及印度和第三世界的大部分问题上支持印度，如克什米尔问题、中印边界问题，等等；印度支持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但对苏军入侵阿富汗没有公开表示支持，并在很多涉及苏联利益的问题上弃权或反对苏联的立场，如核不扩散条约。

在越南战争中，苏联支持和援助越南共产党领导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反对美国侵略者及其支持的南越政权。美国撤军后，苏联企图通过与越南结成战略同盟来达到其控制该地区的目标。苏联支持越南吞并老挝和柬埔寨，还支持越南反华排华，企图形成对中国战略上的包围，从南面夹击中国。1978年11月，苏联与

<sup>①</sup> Родионова. А. Записки посла СССР в Пакистане в 1971—1974 гг.,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2. 1997.

越南签订友好合作条约。苏联给了越南大量的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还把越南拉入经互会，而苏联从越南得到了岘港、金兰湾等军事基地，不断加强在这一地区的军事力量。

### （三）在非洲的扩张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在非洲地区的战略目标是战略争夺，包括政治影响，经济利益，军事基地。但是，直至20世纪70年代初，苏联在该地区的地位还是很脆弱的、不稳固的。在70年代上半期，苏联在安哥拉找到了切入口。

安哥拉原为葡萄牙的殖民地，苏联首先打起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旗帜，支持安哥拉反对殖民主义统治的斗争。接着，安哥拉民族解放运动各派之间发生了内战，苏联支持其中信奉比较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一派，即“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简称“人运”），反对美国等国家支持的“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简称“解阵”），和“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简称“安盟”），指责他们是“分裂主义势力”。安哥拉一时成为美苏争夺的焦点。在1965—1974年的10年里，苏联向整个南部非洲输出武器的价值达300万美元，1975年上升到600万美元，1976年猛增到2.36亿美元。苏联还建议“人运”向古巴求援。在安哥拉内战中，苏联至少向“人运”提供了3亿美元的援助和200名顾问，并帮助古巴把17000名武装军人送到安哥拉，直接帮助“人运”推进“革命进程”。<sup>①</sup>1975年秋季，“人运”在军事上完全取得了主动权。在“人运”宣布安哥拉独立后，苏联继续向“人运”空运大批武器，以防止南非从南面对它构成威胁。苏联认为，南非的背后有美国的支持。同时，苏联还对扎伊尔、赞比亚保持高度的警惕，以防止它们干预安哥拉冲突。在苏联和古巴的帮助下，安哥拉内战以“人运”的胜利而告结束。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苏联立即予以承认。1976年10月，苏联与安哥拉签订了友好合作条约。这是苏联与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第一次签订这种性质的条约。此后，苏联给了安哥拉大量的经援，帮助安哥拉培养学生，开通莫斯科—罗安达航线，加强两国关系。不久，安哥拉领导人内图试图推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偏离了苏联的轨道。在苏联默许下，安哥拉内部亲苏派发动推翻内阁的政变，但遭到镇压。

---

<sup>①</sup>（美）罗伯特·唐纳森：《苏联在第三世界的得失》，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第117页。

苏联选择安哥拉，有助于把从刚果到莫桑比克等遵循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国家连成一线，有利于苏联在争夺南部非洲的斗争中获得有利的战略地位。1975年6月，当莫桑比克独立时，苏联立即承认它。1977年3月，苏联与莫桑比克签订了友好合作条约。

苏联还打起支持黑人多数统治的旗号。苏联向纳米比亚的“西南非洲人民联盟”，津巴布韦的“津巴布韦的人民联盟”，以及南非的“非洲人国民大会”等解放运动组织提供援助。1977年3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波德戈尔内访问莫桑比克、坦桑尼亚和赞比亚。非洲地区民族和宗教因素远远大于阶级和意识形态因素，苏联打着反对南非种族歧视和殖民主义的旗号，受到多数非洲国家的赞赏，因而苏联在非洲的争夺中取得了一定的成功。20世纪70年代，苏联与11个非洲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同3个非洲国家（安哥拉、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签订友好合作条约，苏共与4个非洲国家的执政党（安哥拉、贝宁、刚果、莫桑比克）建立了紧密的联系。至70年代末，苏联及其卫星国的军队共计6万余人分布在非洲17个国家，非洲7个沿海国家被苏联控制和使用的港口、机场、导弹基地、军事通讯站等设施多达20余处。苏联在非洲的影响大为增强。

#### （四）在拉丁美洲的扩张

较之中东、亚洲等地区来说，拉丁美洲是苏联相对不重视的地区。苏联在这一地区的行动比较谨慎，对拉美国家的军事援助很少，以避免与美国直接军事对峙。然而，这绝不是说苏联在该地区就甘心无所作为。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对拉美的战略目标是：对拉美进行扩张和渗透，以削弱美国的影响，牵制和扰乱美国，使其无暇他顾；同时为苏联的发展攫取拉美地区宝贵的矿物和原料资源。

苏联在拉美地区选择了几个基地。中美洲以古巴为中心；在南美洲则比较重视秘鲁和智利。

作为社会主义在西半球的前哨和橱窗，苏联在政治外交上需要古巴。而古巴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上均需要苏联的支持、帮助和保护。在政治上，古巴支持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和出兵阿富汗。古巴还企图使不结盟运动走上亲苏道路。在军事上，苏古在非洲进行了合作（如1975年在安哥拉，1978年在埃塞俄比亚及也门），苏联向古巴提供了军事设备、训练和人员。在经济上，苏联满足古巴在燃料、原料、设备、备件和粮食等方面的迫切需要，并帮助古巴建立和发展能源、镍、石油，以及冶金、金属制造业和农业等重要国民经济部门。古巴

1972年加入了经互会。经互会成为古巴的糖和镍的主要销售市场。其中，古巴同苏联的贸易占它同经互会贸易的80%，苏进口的糖约占古巴向经互会出口的85%。苏进口古巴镍产量的75%，其价格高于国际市场价格；苏联向古巴提供其所需石油的95%，其价格低于国际市场价格。苏联对古巴经济的援助1976年达12亿美元，1979年超过30亿美元。1972年以后的10年，苏古贸易额达340亿卢布。<sup>①</sup>

但并不是苏古之间没有矛盾。例如，苏联不赞成古巴在60年代向拉美“输出革命”的努力和方式（游击战）；在对待非洲问题的态度上，尤其是在对待厄立特里亚和对待安哥拉国内政治的政策方面，苏古也存在分歧。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拉丁美洲各国相继出现军人政权。苏联对拉美军人政权的态度的态度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其中，以对秘鲁的态度最为典型。苏联对1968年秘鲁发生的军人夺权，最初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对被推翻的秘鲁立宪政府表示同情，指责发动政变的将军们“在国内建立残暴的军事独裁统治”。但是，秘鲁军人政权将美国所有的石油公司收归国有，1969年撵走了美国军事代表团。秘鲁还改善了与苏联、东欧、古巴的关系，对美洲国家组织采取独立的姿态，它的代表经常猛烈批评美国。在内政方面，秘鲁扩大国有经济成分，限制外国投资和外国公司，工人参加管理工业，建立农业合作社，实行土地改革，征收私人土地（包括外国人的大农场）以及注重工业化等政策。这就使苏联转而全力支持秘鲁。此外，苏联对玻利维亚、巴西、巴拿马等国的“进步的”军人政权，也持支持态度。苏联认为，1970年智利阿连德的人民联盟政权上台执政，是一个重大的事件，它“作为对拉丁美洲帝国主义体系的一种革命打击来说，其重要意义仅次于古巴革命的胜利”。<sup>②</sup>阿连德政权把美国公司收归国有，并且与古巴恢复关系。苏联赞扬智利并增加对其经济援助。苏联与智利军事代表团反复互访，苏联还为智利购买军事装备提供贷款。1973年，皮诺切特将军发动军事政变推翻阿连德政府，阿连德总统本人也殉难。苏联采取多种形式支持反对新军人政权的斗争。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代表，在联合国大会上曾公开谴责智利军人政权。

---

①（美）罗伯特·唐纳森：《苏联在第三世界的得失》，第41、44—45、393页。

② V·G·斯皮林：《美帝国主义与拉丁美洲现实》，《美国：政治、经济、思想意识》1971年第8期，第33页。

## 苏联在第三世界扩张的严重后果

苏联肆无忌惮地向外扩张，与美国争夺第三世界，给苏联并没有带来多少实际利益，反而带来了严重损害。正是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对外扩张，埋下了苏联衰落的种子。

(一) 从苏联本身来看，对第三世界的长时期大肆扩张，既损伤了苏联的经济、军事等硬实力，也损毁了社会主义的形象，伤害了软实力，为苏联的衰落，直至解体埋下了伏笔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继续加强对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尤其侧重军事援助，其深度和广度都超过了以往。1955—1967年，苏联平均每年向第三世界国家交付3亿多美元的武器装备（经援约为2亿美元），1968—1971年，武器装备交付额上升到平均每年7亿美元。1972年以后，更有大幅度的提高。1977年总额达35亿多美元。1978年，总额达38亿美元。1972年以来，苏联军事援助的交付额，相当于经济援助交付额的5倍。1977年苏联通过军火交易，大约从第三世界获得15亿美元的硬通货。<sup>①</sup>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得到苏联军援的国家不断增多，从1966—1975年为29个，1980—1984年为36个。<sup>②</sup>

勃列日涅夫时期，对第三世界的经济援助总额共计127.62亿美元，军事援助总额共计447.85亿美元。<sup>③</sup> 而这一时期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出现了军人掌权的热潮，也为苏联进行军事扩张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按照西方的统计，从1966年至1975年，苏联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总额为92亿美元的武器装备，而从1978年至1982年，为354亿美元。<sup>④</sup>

可以说，为了支援第三世界国家，苏联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仅古巴消耗的石油几乎全部以比石油输出国组织平均价格低40%的价格从苏联进口，而1978—1979年苏联每年为越南的花费近300万美元。阿富汗战争长约10年，苏联耗资

① (美) 罗伯特·唐纳森：《苏联在第三世界的得失》，第282—286页。

② Советская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в годы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1945—1985. Москва. 1995. С. 408.

③ 顾关福：《战后美苏关系的演变》，时事出版社1990年版，第34页。

④ 牛军主编：《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4页。

200多亿美元，死伤官兵5万多人。还支持越南、阿拉伯国家等，使苏联负担沉重，力不从心。

对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援、军援及过度的扩张，不仅消耗了苏联的国力，而且还加剧了国民经济的军事化，导致经济结构更加畸形，损害了苏联的经济。到1978年，苏联的军费开支已占世界首位。苏联实际军费开支占其国民收入的比重，在1965—1980年高达19%—23%，在70年代苏联扩军备战的高峰期里，苏联把每年国民收入的20%—25%用于军事目的。出于争夺的需要，军事工业一直是苏联经济的重中之重，这一时期重点仍然发展钢铁、机械、金属等传统的重工业部门，而对微电子、新材料、生物工程技术等现代高科技，反应不敏感，没有抓住科技革命这个机遇。民用工业既不发达也不受重视，一些起码的日常用品都感缺乏。从60年代末到70年代末，工业总产值平均增长速度由8.5%降到5.9%，农业总产值从4.3%降到1.1%，社会劳动生产率平均增长从6.8%降到3.2%，1982年，苏联的工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进一步降到2.8%，经济发展陷入停滞状态。经济水平的下降，严重影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经济的停滞导致了商品的短缺和匮乏，苏联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造成内政问题成堆。勃列日涅夫自己也承认，如果不是不得不花费大量的开支在国防上、在巩固华沙条约体系上，苏联人民会生活得更好一些，仅为这些目的正式开支就占苏联年预算的23%，还不包括非正式拨款和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sup>①</sup>

与美国相比，经济本来是苏联的弱项。美国有针对性地采取系列行动，“向苏联经济的转动装置上撒沙子”，美还“卷入了许多高赌注的计划，旨在侵蚀苏联的外围地带，不仅要在第三世界，而且要在苏联帝国的心脏地带努力击退苏联式共产主义”。<sup>②</sup>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是削弱苏联实力和影响、推动苏联剧变的因素之一。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曾是很多第三世界国家向往的对象，甚至是楷模，苏联式社会主义也曾经影响很大。但苏联对第三世界的扩张，不仅

---

<sup>①</sup> От правды никуда не уйдёшь—нов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о событиях в Чехословакии в 1968. Кентавр. №4. 1993. С. 89.

<sup>②</sup> (美)彼得·施魏策尔著、殷雄译：《里根政府是怎样搞垮苏联的》，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影响自身的国家形象，也毁坏了社会主义的形象，恶化了国际环境。特别是1979年苏联直接入侵阿富汗，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打的是国际主义旗号，输出革命，行的是霸权主义，很不得人心，遭到西方和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反对。这使苏联在外交上陷入孤立，地缘政治处境严重恶化。阿富汗战争成为苏联的滑铁卢，是导致苏联解体的直接原因之一。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的超级大国地位是以恶性膨胀发展的军事力量作为支撑的，是建立在粗放耗费资源和低效率的经济、牺牲人民生活水平的基础上的，因而这种地位是表面的、虚弱的、不可能长久的。苏联的综合国力特别是经济实力，支撑不起它的霸权主义野心。在勃列日涅夫逝世以后不到10年，苏联这么一个令人生畏的超级大国就土崩瓦解了，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的全球扩张政策，尤其是在第三世界的大肆扩张，虽不是导致这一结果的全部原因，但的确使得苏联元气大伤，国内外环境对其日渐不利，最终走向衰落直至解体的命运。盛极而衰，过度扩张，必然导致败亡。

**（二）苏联对第三世界的疯狂扩张，使苏联好不容易取得的对美战略优势地位丧失，又破坏了70年代美苏缓和的局面，加深了美国对苏联的敌对。美国自80年代初发起了对苏联的新一轮遏制、新一轮军备竞赛，苏美攻守易位，苏联日渐处于不利的战略地位**

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初实行战略收缩政策，对外战略由攻势转为守势，并且积极谋求改善与苏联的关系，美苏关系开始缓和。国内外形势对苏联极为有利，苏联原本可以借此良机致力于国内的改革与建设，增强自身实力。但勃列日涅夫却将此视为向美国进攻和进行全球扩张的机会，实行进攻性的对外政策。苏联长期实行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准军事经济确实一度提高了苏联的实力，但毕竟后劲不足，再加上长期的扩张损耗了国力，7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的经济机制就已经运转不灵，经济发展开始走下坡路，在经济、军事上已失去了明显的速度优势。据美国估计，考虑到苏联“潜在的”通货膨胀因素，1960—1975年苏联和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增长速度分别为4.6%和3.4%；而1975—1985年，则分别为2.1%和2.9%。<sup>①</sup>而此时美国已经从越南脱身，20世纪70年代下半期出现了经济的回升和高涨。仅从1977年1月到1980年3月，工

<sup>①</sup> 陈之骅：《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46页。

业生产就增长了15.4%。但是苏联领导集团没有认识到这种形势的变化，依然宣传“资本主义的总危机”，“资本主义的不稳定性”，“民族解放运动以社会主义为发展方向的趋势在加强”。继续发动对第三世界的攻势，更于1979年12月派兵入侵阿富汗，将对外扩张推向顶点。这标志着苏美缓和的结束。而美国随着实力的增强和对苏优势的恢复，面对苏联咄咄逼人的攻势，也日渐抛弃“缓和”的姿态，对苏更加强硬起来。在安哥拉事件发生时，福特就公开宣布放弃使用“缓和”一词，而代之以“以实力求和平”的说法。<sup>①</sup> 华盛顿成立了“现实危险委员会”，进行反苏反缓和的宣传与活动。1976年2月，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谴责“安哥拉是一种美国无法接受的行为模式”，这种模式“将对和平与稳定产生最严重的后果”。卡特上台后，提出美苏关系是“合作与竞争”的关系，在限制战略核武器方面出现了许多障碍。在人权、犹太移民、持不同政见者等问题上对苏联施加压力。1979年1月，170名前高级军官在致卡特的一封公开信中，就“苏联对美国日益严重的挑战”提出警告，并呼吁总统恢复全球战略平衡。6月，白宫新闻发言人宣布，卡特正式决定研制MX大型陆基分导多弹头洲际弹道导弹。阿富汗事件后，苏美重开冷战，此时，苏联经济已经明显放慢，美国变被动为主动。里根上台后，大搞军备竞赛，重新遏制苏联。美国支持阿富汗穆斯林抵抗运动，给予军事援助和人员培训，美国中央情报局和特工参与其事，并在阿富汗穆斯林部落中进行反苏工作。美国在国内成立了“美国援助阿富汗难民联合会”、“阿富汗民族解放阵线”、“阿富汗解放组织团结委员会”，以配合阿境内的反苏反政府斗争。<sup>②</sup> 1980年，美国还对苏联宽口径石油管道和石油开采设备进行禁运。美苏贸易1980年比1979年少20亿美元，里根认为美苏之间的斗争“是正确与错误，正义与邪恶之间的较量”，称苏联为“邪恶的帝国”，号召要激起“美国人的爱国主义热情”，对共产主义进行“十字军东征”<sup>③</sup>，宣称要“把马列主义扔进历史的垃圾堆”。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实行以核武器为威慑武器、常规武器为实战武器的

---

① Советская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в годы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1945—1985. Москва. 1995. С. 341.

② 俄罗斯总统档案，全宗3，目录82，卷宗177，84—86页。

③ Garrison and Gleason, Shared Destiny: fifty years of Soviet - American relations, Beacon Press, Boston, 1985. pp. 102—103.

战略，核武器与常规武器并重。里根针锋相对，他既重视继续发展进攻性战略核武器，更强调要建立战略防御体系，攻防兼备；不仅要在核武器方面谋求优势，而且也要加速发展常规武器。他改变了尼克松政府奉行的“一个半战争的战略”，主张打任何形式的战争。他认为美国要保持足够的军事力量，以便能够灵活地对付来自苏联各方面的进攻。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美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为2.2%，走出了70年代以来一直苦恼的滞胀局面。里根下决心“重振国威”，“重整军备”。美国的军费开支急剧上升，1981年为1575.12亿美元，1982年为2137.5亿美元。里根的基本方针就是用一场新的军备竞赛来拖垮苏联。1980年，里根竞选总统时提出了“高边疆”战略，他上台后组织力量进行专门研究，1982年3月正式公布。“高边疆”战略的内容包括军事和经济两个部分，军事上即所谓“星球大战”计划，即战略防御计划，其基本设想就是要在200公里—1000公里高空建立起一个对苏联洲际弹道导弹的多层防御网，以保护美国及其盟国不受核弹头的攻击。里根此举的目的，就是要凭借美国的技术优势把军备竞赛引入对美有利的防御领域，从而削弱苏联同美国进行长期争夺的能力，进而把美国的经济和科技推向一个新的制高点。美国对苏联采取了进攻的态势，谋求对苏联的政治经济军事的全面优势，团结盟国，在第三世界展开争夺。苏联也不甘示弱，僵硬对抗。但此时的苏联愈益被动，在国际上空前孤立，陷入困境，高强度的军备竞赛已是苏联不可承受之重，苏联日益不支，走向衰亡。

### （三）对第三世界造成的恶劣影响，削弱了苏联社会主义的影响力

勃列日涅夫时期，适逢民族解放运动高涨之时，发展中国家纷纷独立，而独立后的发展中国家往往成为美苏争夺的目标，美苏均向它们施加影响，以图把它们拉入各自的阵营。70年代，苏联创造出一种理论，即所谓的新独立民族国家走以“社会主义为方向”的“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勃列日涅夫宣称“今天在亚洲和非洲，已经有不少国家走上了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即采取以社会主义社会为前景的建设方针”。被苏联确定为“以社会主义为方向”的国家包括叙利亚、伊拉克、阿尔及利亚、也门、刚果、埃塞俄比亚、几内亚—比绍、莫桑比克等。这些宣布“以社会主义为方向”的国家，均被纳入“社会主义大家庭”，社会经济发展几乎完全照搬苏联的模式。实际上这种理论和判断并不符合第三世界多数国家的实际情况，而是出于抢占美国势力和影响薄弱的地带，扩展自己的势力范围，粗暴干涉内政，力图纳入自己的战略轨道，采取实用主义政策。苏联

不顾发展中国家的国情，片面输出革命，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是弊大于利。

意识形态成为苏联对第三世界进行扩张的工具，其真正目的是以此为借口，排挤美国的势力，以扩大在第三世界的政治影响，获取经济利益，建立军事基地等。为达到这些目的，苏联采取多种扩张手段，干涉第三世界国家的事务，包括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尤其侧重军事援助；打代理人战争；支持地区霸权主义国家；甚至不惜采用武力、侵略第三世界国家。苏联的扩张行为不仅损及自身，毁坏社会主义的形象，更是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恶劣影响。

第三世界国家获得独立时间不长，国内动荡，百废待兴。苏联给予第三世界国家的援助虽然也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起到一定的帮助，不宜全部否定，但是，苏联援助的真正目的是为了获取经济利益，增加第三世界国家对它的依赖，将其牢牢捆绑在自己的阵营，根本不可能顾及发展中国家的长远发展。以苏联对中东的扩张为例，主要方法是向埃及、叙利亚、伊拉克等中东国家提供武器装备、军事设施，派遣军事顾问等，其目的一是扩大自己在这一地区的影响，二是使这些国家“从军事上依赖苏联，进而变成在国家—政治上长期牢固地依赖苏联。为达到这样的目的，必须要在这些地区继续进行战争或者临战状态……发动新的以色列—阿拉伯战争对苏联未必有利，而对这个地区的持久和平它也不感兴趣。消灭以色列国对它未必有利（因为那时苏联就没有理由在这里存在下去了）。以色列和阿拉伯之间‘不战不和’的局面更符合苏联政治战略的利益”。<sup>①</sup>从埃及总统萨达特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出，苏联曾经拒绝向埃及提供战场上急需的武器。萨达特说，苏联给他们的武器是二战时的陈旧货。另外，苏联提供武器的行动缓慢，还有意拖延武器的供应。萨达特谴责苏联是根据它作为超级大国的利益，制定和推行对第三世界的政策。<sup>②</sup>“苏联向第三世界国家的主要出口物——武器，与其说显示了苏联的实力，不如说暴露了苏联的弱点，它说明苏联在经济上无力与西方竞争”<sup>③</sup>。很多第三世界国家越来越不愿意卷入两个超级大国的对抗。

---

①（苏）阿·阿夫托尔哈诺夫著，杨春华、张道庆译：《勃列日涅夫的力量和弱点》，新华出版社1981年版，第143页。

② 牛军主编：《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第164页、165页。

③（英）理查德·克罗卡特著，王振西等译：《50年战争》，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372—373页。

打代理人战争也是苏联惯用的扩张手段，而古巴成为苏联在第三世界的代理人。苏联通过古巴向尼加拉瓜桑地诺政权、格林纳达新宝石运动以及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的游击队等提供援助。从1975年开始，古巴派遣大批部队参加安哥拉战争、卷入非洲之角的边界冲突。到70年代末，古巴在非洲的军队达到3.4万人，为苏联在第三世界的战略服务。此外，苏联还直接插手某些第三世界国家内部事务，1978年6月，苏联直接策划了南也门的军事政变，支持亲苏的伊斯梅尔上台。苏联的干涉无疑加重了这些国家混乱的国内局势。

苏联还支持一些地区霸权主义国家，从中获利。在南亚，苏联支持印度肢解巴基斯坦，1971年3月东巴独立，苏联和印度立即表示支持。同年8月，苏联与印度签订了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和平友好合作条约》，随后支持印度向巴基斯坦发动战争，并出动舰队到孟加拉湾为印度保驾护航。苏联还在联合国三次动用否决权，反对通过印巴立即停火和印度撤军的决议。在东南亚，苏联大力支持越南的地区扩张主义，1978年11月，两国签订了带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友好合作条约》。越南在苏联的支持下于1978年12月25日发动了侵略柬埔寨的战争，并且迅速承认了越南扶植的韩桑林政权，后又支持越南排华反华。苏联对这些地区霸权主义国家的支持，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

而对于地处中亚的阿富汗，苏联不仅长期介入其内部事务，更利用其国内发生政变陷入混乱之机，直接出兵进行侵略。阿富汗战争进行了10年之久，不仅给苏联带来了毁灭的厄运，更给阿富汗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阿富汗遭到了极大的破坏，100多万人死于战火，600万人被迫逃离家园，沦为难民。苏军撤离后，阿富汗长期陷入政局混乱、军阀混战的局面。多年的战乱严重破坏了阿富汗的经济。交通、通信系统、轻重工业、教育和农业基础设施，遭到的破坏最为严重，生产生活物资短缺，至今仍以落后的农牧业为主，沦为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同时，入侵阿富汗是苏联这一时期最引人注目的干涉行动，遭到了几乎全世界的反对，它使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与苏联拉开了距离，极大地削弱了社会主义的影响和苏联的国家形象。

不过客观地说，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对第三世界的政策，并非毫无正面作用。苏联给予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对其道义上的支持，对其实现独立、发展经济、巩固独立，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并且苏联在第三世界的存在也抵制和平衡了美国的霸权主义政策。但不可否认的是，苏联对第三世界国家

的渗透和扩张、苏美对第三世界的争夺，的确是造成某些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至今仍动荡不安的根源之一。中东、南亚、阿富汗等，至今仍处在全球不安定的动荡带上，而那些曾经沦为苏美争夺的对象和战场的第三世界国家，至今仍有很多处于不发达或欠发达的状态，甚至有一些已沦为“失败的国家”。此外，还恶化了某些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矛盾。美苏的扩张和争夺，给这些第三世界国家留下了永远的伤痛。

综上所述，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凭借增强了的实力，乘美国战略收缩之机，对第三世界进行了大肆的扩张、渗透和争夺，其势力和影响遍布从中东、亚洲、非洲到拉美的广大地区。但是，过度的扩张给苏联背上了沉重的经济和军事包袱，影响了苏联经济结构的调整，坐失了利用缓和之机进行改革的良机，恶化了苏联的国际环境，毁坏了社会主义的形象和声誉。长期的扩张，折损了苏联的实力，使得苏联在美苏战略对比中，渐处劣势，并且激化了美苏矛盾，面对美国发动的新一轮冷战，苏联招架不住，终被拖垮。扩张和争霸，也给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带来深重的灾难和消极影响。

## 59. 勃列日涅夫为什么大搞军备竞赛？

左凤荣

勃列日涅夫上台之时，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以中苏两党关系断绝为标志，社会主义阵营解体，中国逐步成为国际舞台上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向两极格局提出挑战；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取得重要成果，涌现出了一大批新独立国家，不结盟运动迅速发展；在资本主义阵营内，西欧和日本的离心倾向增强，1966年法国退出了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欧洲要求与苏东和解的声浪很高。美国的国力相对下降，莫斯科和华盛顿已经不能使世界上的国家都听命于自己，以两大阵营对立为特征的世界格局走向终结，出现了独立于美苏之外的力量中心。在这种情况下，美苏关系缓和，苏联的国际环境大大改善，如果按照事情本身的逻辑发展，苏联应该把更多的资源用于发展民用经济，改善人民的生活。但苏联却没有这么做，反而把更多的资源用于同美国的军备竞赛。这一时期苏联的军事实力快速发展，军备竞赛达到了疯狂的地步，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 苏联称霸世界目标的推动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对国际形势基本走势总的估计是：“世界社会主义的力量得到发展和巩固，从前被压迫人民的民族解放革命得到顺利发展，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继续削弱。”苏联把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看成是加强社会主义、各国人民争取自由和进步的阻碍，它们“希望维持自己正在失去的阵地或者甚至在可能的场合挽回已失去的东西，正在诉诸暴力和侵略、诉诸对别的国家和人民的事实的武装干涉。”为此，苏联要加强自己的国防力量，加强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军

事合作，加强对外政策的攻势。苏联自我夸耀“担负着同帝国主义斗争的主要重担”，“举不出一个没有受到苏联全力支持的革命运动”，因此，苏联已“成为世界革命运动的稳定的中心”。<sup>①</sup> 苏联军界也认为：“对于遭受帝国主义者侵略的人民，必要时，苏联将给予军事上的支援。”<sup>②</sup> 20世纪70年代，西方希望缓和能使苏联收敛其扩张的欲望。但是，苏联所接受的只是符合苏联愿望的缓和，它并没有放弃与西方竞争，特别是军事和意识形态方面的竞争。苏联会改变的只是实现目标的某些方式、方法，但没有改变大目标，苏联仍期望世界革命将在全世界取得胜利，苏联的影响会扩展到世界的每个角落。

勃列日涅夫上台伊始，便在1965年9月29日苏共中央全会上宣布：“我们对外政策的实质，如果简单地说，就在于全力加强世界社会主义大家庭，支持各国人民的解放斗争和维护世界和平。我们也正在这样做。我们尽力使我国的外交成为积极的和进攻性的外交，同时，我们也在表现出灵活性和审慎态度。”<sup>③</sup>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的国防实力空前增强，国家的安全系数达到了十月革命以来的最高点，苏共完全可以利用这一难得的机遇去实现社会主义的真正目的，但是，勃列日涅夫却把这一优势继续用来扩大社会主义的地盘。1971年2月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四大上宣布：“苏联共产党意识到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它在国际事务中今后仍将奉行有助于进一步促进全世界的反帝斗争和加强所有反帝斗争参加者的战斗团结的路线。社会主义事业必将在全世界取得彻底胜利。而我们将为取得这一胜利，为争取劳动人民的幸福而不遗余力地进行斗争！”<sup>④</sup>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苏联的对外战略发生了重要变化，从防守走向进攻，公开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扩大苏联的影响是苏联外交的主轴线。如果说赫鲁晓夫时期在与美国争霸时，把合作、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放在第一位，争夺、对抗放在从属地位的话；勃列日涅夫则以主动的争夺与对抗为主。

勃列日涅夫政策的基础仍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不切实际的估计上，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和资本主义的问题，过低估计资本主义的生命力和自己的困难。苏共

① 《社会主义国家的最高国际主义职责》，《真理报》1965年10月27日。

② （苏）瓦·达·索科洛夫斯基主编：《军事战略》，战士出版社1980年版，第398页。

③ 《真理报》1965年9月30日。

④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三联书店1976年版，第39页。

长期把斯大林提出的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作为确定苏联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基本依据，而这一理论已被实践证明是站不住脚的。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资本主义的发展进步表现得更为明显，但勃列日涅夫从其一上台，便开始强调“资本主义总危机继续加剧和深化”，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理论成为领导人的口头禅，1976年2月勃列日涅夫在苏共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中说：“我党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强调指出：‘适应新的条件，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作为一个体系的稳定。资本主义的总危机在继续加深。’最近几年的事态雄辩地证实了这一点。”“正是这几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经济危机，据资产阶级人士自己供认，这次危机的尖锐程度和深度只有三十年代初期的危机可以与之相比。它同时遍及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各个主要中心。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危机的威力甚至击溃了战后形成的高度发达的国家垄断经济。”<sup>①</sup>

苏联的积极进攻战略，主要表现在削弱和排斥美国在第三世界的影响。除了通过经济、军事援助扩大苏联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影响外，从1975年底开始，苏联发动了一系列攻势：1976—1978年指挥古巴军队介入安哥拉内战，1976—1978年支持古巴军队介入埃塞俄比亚内战，1977—1978年指挥古巴介入埃塞俄比亚同索马里的边界冲突、策动古巴训练的加丹加雇佣军进攻扎伊尔；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1979年直接出兵阿富汗。1976年2月，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五大总结报告中说：“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已经成为主要倾向”，西方“不稳定性日益明显”，“社会主义国家对世界事态的影响日益强大、深刻”，世界上没有哪个地区不在苏联的“考虑”之列。缓和不会妨碍苏联支持其他国家人民争取自由与进步的斗争，因为“缓和绝不是取消，而且也不可能取消或改变阶级斗争的规律。谁也不会指望，在缓和的条件下，共产党人会容忍资本主义的剥削或者垄断资本家会变成拥护革命的人……我们并不讳言，我们认为缓和是为和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创造更有利的条件的途径。”<sup>②</sup>

<sup>①</sup> 《勃列日涅夫言论》（十二），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48页。

<sup>②</sup>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三联书店1977年版，第49页。

## 实力政策和军方利益的驱动

勃列日涅夫相信实力政策，他认为，“只靠和平共处政策和争取和平的斗争是危险的。保障和平的政治手段只能是现实的有效的，只是在他们巩固了实力，首先是军事力量的时候”，<sup>①</sup>“在防止热核战争的斗争中，苏联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帝国主义的‘善良的愿望’上，而首先要依靠社会主义阵营的威力；依靠和平力量对反动和战争力量的日益增长的优势。”<sup>②</sup>苏联夸大资本主义国家对苏联的敌视，“帝国主义国家公开宣布通过新的世界大战来消灭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狂妄计划。为此，它们和以往一样正在疯狂地进行军备竞赛，增加军事预算，采取准备进攻苏联和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的实际步骤”。<sup>③</sup>

侵略成性的帝国主义国家“可能铤而走险，在一番简短的直接准备之后，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突然的核突击”，<sup>④</sup>“我们努力的方向是，不让事情发展到第一次打击，也不让它发展到第二次打击，而是根本上不让发生核战争。我们对这些问题的态度可以概括为：苏联的防御应当是以使任何人不敢冒险来破坏我们的和平生活”。<sup>⑤</sup>也就是说，苏联只有在其军事力量超过美国和北约的军事潜力后，苏联才会感到安全。于是，勃列日涅夫扩军备战达到了疯狂的程度。

苏联的体制也有利于扩张军备。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国防工业集团中的部有：航空工业部、国防工业部（负责常规部队装备）、造船工业部、电子工业部、无线电工业部、通讯器材部、中型机器制造部（生产核武器）、通用机器制造部（生产战略导弹）、机器制造部（生产弹药）。它们都有自己的研究机构、设计院和生产工厂。国防部门有优先权，得到最好的机器和工具，工资也高于民用部门，有权从民用工业征用它们所需要的东西。它们建立有自己的供应工业，自成体系，以免受制于其他部。此外还有若干与军事有关的部：电气设备工业部、装配与特殊建筑部、海运商船部、运输与重型机器制造部、炼油和石油化学工业

①（苏）《国际生活》1968年第2期，第12页。

②（苏）瓦·达·索科洛夫斯基主编：《军事战略》，第9页。

③（苏）瓦·达·索科洛夫斯基主编：《军事战略》，第10页。

④（苏）瓦·达·索科洛夫斯基主编：《军事战略》，第608页。

⑤《勃列日涅夫言论》（十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30页。

部、动力机器制造部、自动化设备和控制系统部、民航部等。许多军官到重要的非军事部门任职，他们作为国防部的代表，负责监督军品生产、检验产品的质量与可靠性、组织军队代表与企业就新装备进行研究等，检查是严格的，不合格产品被淘汰。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势力已很强大的军工企业集团和军人们对国家政策的影响明显加强，成为苏联攻势战略的积极推动者，国家的外交战略目标为他们服务的成分明显加重了。

## 苏联大力发展军备

苏联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大力扩张军备，追求对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优势，这一时期苏联坚持多投资、高速度、全面发展军备的方针，其战略核力量和常规力量都有很大增长。

苏联的军费开支迅速增加。1965—1977年苏联的军事开支以每年不低于4.5%的速度递增，其军事力量发展迅速。苏联的军费也从1965年的300亿卢布上升到1976年的800亿卢布，占本年度国家财政预算支出的30%。按国民生产总值计算，美国是苏联的1.8倍，北约国家是华约国家的2.7倍，如果加上日本，则是3.2倍。人力资源，北约是华约的1.4倍多；西方还在科学技术发展中占有优势，而在某些部门则高出很多。<sup>①</sup>苏联在军事上与比自己强一倍多的强大的西方世界相抗衡，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无论从物力，还是从人力计算，苏联都不应该走与美国等西方国家进行军备竞赛的道路。苏联保持着和平年代最庞大的军队。为了夺取军事优势，苏联大力扩充军队，被赫鲁晓夫裁减的军队又恢复起来了。苏联军事人员，不包括边防军和内务部军队，在这一时期从368万人增至419万人；而同时期美国的军队人数则从305万人减至206万人，苏联军队比美国多一倍。<sup>②</sup>1967年重建了陆军总司令部。北约和华约在欧洲的军事力量对比中，华约在坦克、装甲车、炮和迫击炮等方面都与北约相当。苏联无限制地发展军事力量，成了“武装到牙齿的和平爱好者”，加强了西方在苏联威胁面前的恐

---

<sup>①</sup> (苏)阿·科科申：《寻找出路——国际安全的军事政治方面》，莫斯科1989年版，第38页。

<sup>②</sup> Геллер М. Некрич А.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1917—1995. Т. 2. М., 1996. С. 222.

惧，促使它们进一步联合起来对付苏联。

60年代后期建立了地中海和印度洋分舰队，1970年起苏联海军开始进行全球性海洋演习。苏联在第三世界扩张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满足军队的需要，苏联海军已经发展成了一支强大的远洋海军，它有了新的需要：停泊场、加油站、补给基地等。苏联援助索马里就是为了在柏培拉建立海军基地，后来形势发生了变化，苏联不得不从索马里撤军。到70年代末，苏联在世界建有30多个军事基地。1970年8月，美国侦察到苏联正在古巴的西恩富戈斯港修建潜艇基地，有了这个基地，苏联的海军，包括核动力潜艇，就可以停留在这个可以向美国发射弹道导弹的区域内，其动机与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时相似。在美国的压力下，苏联才退了回去。

海军向大型化、导弹化和核动力化方向发展。据西方估计，60年代苏联花在建造舰艇上的经费平均每年为20亿美元。70年代又有所增加，1970年就已达30亿美元。总计苏联在1967—1977年10年间用于建造军舰的费用，比美国多50%左右，1978年仍高于美国1/3。据报道，在苏联的国防预算中，海军经费所占的比例早已从赫鲁晓夫时期的大约15%增长到70年代中期的大约30%。<sup>①</sup>1964年苏联海军的总吨位为160万吨，到1978年增加了一倍，达330万吨以上，仅次于美国（美国为346万吨）。<sup>②</sup>1976年第一艘攻击航空母舰“基辅”号开始服役，这一时期类似的航空母舰已装备了3艘。据美国方面估计，60年代中期，苏联人拥有260艘大型水面作战舰只和两栖舰只，80年代初，苏联已有362艘。<sup>③</sup>1980年庞大的动力核潜艇O级服役，它可在水下发射24枚远程反舰巡航导弹，同年，苏联的第一艘25000吨的“台风”级战略导弹潜艇建成。70年代中期，苏联海军司令戈尔什科夫自豪地宣布：“在这相对短暂的历史时期里，苏联的海军已经变成了一个重要的战略因素，变成了一支能够抵抗来自海上各个方向的侵略和在世界海洋上完成重大战役和战略任务的力量。”<sup>④</sup>

苏联生产了大量常规武器，可以从下面的几个表格看到70年代后半期苏联

---

① 《人民日报》1976年3月28日，转引自蒋建东：《苏联的海洋扩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8页。

② 蒋建东：《苏联的海洋扩张》，第29页。

③ 美国国防部：《苏联的军事力量》，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第50页。

④ （苏）谢·格·戈尔什科夫：《国家的海上威力》，三联书店1977年版，第310页。

武器装备的生产情况。

表1 苏联飞机的年产量<sup>①</sup>

| 机种        | 1976年 | 1977年 | 1978年 | 1979年 | 1980年 |
|-----------|-------|-------|-------|-------|-------|
| 轰炸机       | 25    | 30    | 30    | 30    | 30    |
| 歼击机和歼击轰炸机 | 1200  | 1200  | 1300  | 1300  | 1300  |
| 运输机       | 450   | 400   | 400   | 400   | 350   |
| 教练机       | 50    | 50    | 50    | 25    | 225   |
| 反潜飞机      | 5     | 10    | 10    | 10    | 10    |
| 直升机       | 1400  | 900   | 600   | 700   | 750   |
| 通用飞机      | 125   | 100   | 100   | 100   | 100   |
| 总计        | 3255  | 2690  | 2490  | 2565  | 2765  |

表2 苏联导弹的产量<sup>②</sup>

| 导弹种类   | 1976年 | 1977年 | 1978年 | 1979年 | 1980年 |
|--------|-------|-------|-------|-------|-------|
| 洲际弹道导弹 | 300   | 300   | 200   | 200   | 200   |
| 中程弹道导弹 | 50    | 100   | 100   | 100   | 100   |
| 近程弹道导弹 | 100   | 200   | 250   | 300   | 300   |
| 潜射巡航导弹 | 600   | 600   | 600   | 700   | 700   |
| 潜射弹道导弹 | 150   | 175   | 225   | 175   | 175   |
| 空对地导弹  | 1500  | 1500  | 1500  | 1500  | 1500  |
| 地对空导弹  | 40000 | 50000 | 50000 | 50000 | 50000 |

表3 苏联海军舰艇产量<sup>③</sup>

| 舰只类型   | 1976年 | 1977年 | 1978年 | 1979年 | 1980年 |
|--------|-------|-------|-------|-------|-------|
| 潜艇     | 10    | 13    | 12    | 12    | 11    |
| 大型战舰   | 12    | 12    | 12    | 11    | 11    |
| 小型作战舰艇 | 58    | 56    | 52    | 48    | 52    |
| 辅助船只   | 4     | 6     | 4     | 7     | 5     |

① 美国国防部：《苏联的军事力量》，第10页。

② 美国国防部：《苏联的军事力量》，第11页。

③ 美国国防部：《苏联的军事力量》，第11页。

苏联陆军坦克的产量在1976—1978年维持在每年2500辆的水平，1979年和1980年出现了飞跃，产量达到3000辆，T—80型坦克开始试产。

从以上数字可以看出，尽管70年代后半期其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慢，苏联并没有使放慢或减少其武器的生产步伐。

核武器仍是苏联发展的重点。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使苏联军人感到自己丢了面子，他们认为苏联屈服于美国是因为苏联在战略核武器上落后，在军人的压力下，苏联开始大力发展核武器，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于1971年提出的口号是：“用占优势的力量回答实力”，苏联确定战略核力量发展的方针是：维持数量，更新型号，提高命中精度和生存力，在质量上赶超美国。苏联重点发展第4代洲际导弹，如SS—16，SS—17，SS—18，SS—19型洲际导弹，SS—20型中程导弹，新式轰炸机图—160。勃列日涅夫改变了赫鲁晓夫只重视战略核武器而忽视战术核武器和常规武器的倾向，不仅发展战略核武器，也发展战术核武器和常规武器。在发展军备，增强苏联的国防实力方面，勃列日涅夫取得了空前的成功。

1962年美国有陆基洲际导弹294枚，苏联有75枚。美国有潜艇发射洲际导弹144枚，苏联还没有。1964年美国有834枚陆基洲际导弹、416枚潜艇发射洲际导弹；苏联相应的数字是200和120。到1967年，美国拥有陆基洲际导弹1054枚、潜艇发射洲际导弹656枚，苏联相应的数字是460和130。到1968年，美国仍拥有陆基洲际导弹1054枚，苏联则在一年内增加了340枚，达到800枚。到1969年，美国拥有陆基导弹1054枚，潜艇发射洲际导弹656枚，战略轰炸机560架；苏联有陆基洲际导弹1050枚，潜艇发射洲际导弹约160枚，战略轰炸机150架，苏联还有一处由64枚导弹组成的保卫莫斯科的反弹道导弹系统。双方的战略力量基本形成均势。

1970年在美国的陆基洲际导弹继续保持1054枚水平的情况下，苏联的陆基洲际导弹增至1300枚，在数量上取得了对美国的优势。<sup>①</sup>1966—1972年5月，苏联建造了1300多个新的洲际导弹发射器。他们部署了近1000枚SS—11和300枚巨型SS—9导弹，其中有许多都配备着爆炸当量很大的核弹头。到1972年年中，苏联部署的洲际导弹已达1527枚。与此相比，美国的陆基导弹自1967年以

<sup>①</sup> 以上数字来自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第471、472、473、647、598页。

来一直保持在 1054 枚的水平上。苏联的洲际弹道导弹都部署在“加固”的地下发射井中，不易被摧毁，生存能力提高了。苏联达到了初步目标：在战略核力量方面取得了同美国的大致均势，这样，美国就不会轻易对苏联在第三世界的行动使用武力或做出更强烈的反应。

苏联在陆基洲际导弹的类型和数量上多于美国，在投掷重量和总当量方面也占有优势，而弹头数量、命中精度和多弹头分导技术方面均低于美国，美国的战略轰炸机和潜艇也比苏联先进。美国虽然没有部署反弹道导弹系统，但它在这方面技术比苏联先进，美国及其盟国在前沿基地上的核力量对苏联形成了包围。可以说苏美核力量大体相当，各具优势，谁也没把握打赢。

美苏的战略核力量对比到底如何，双方的估计有很大出入。根据美国和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公布的数字，当时苏联拥有战略核武器运载工具 2498 件，比美国多 577 件。问题当然不仅在于运载工具，还涉及弹头数、投掷的重量与爆炸的当量，还涉及飞行速度、射程、命中精度等质量问题。美方认为，在全面衡量战略武器的 13 项主要指标中，苏联有 10 项居领先地位。<sup>①</sup> 下面是几组不同的统计数字。

表 4 苏联学者的资料：80 年代初苏联与美国的核力量对比<sup>②</sup>

| 武器的类型    | 苏联    |        | 美国    |         |
|----------|-------|--------|-------|---------|
|          | 运载工具数 | 核弹数量   | 运载工具数 | 核弹数量    |
| 洲际弹道导弹   | 1398  | 近 5000 | 1053  | 2153    |
| 潜艇发射弹道导弹 | 950   | 近 2000 | 648   | 近 5000  |
| 重型轰炸机    | 156   | 156    | 411 * | 近 3000  |
| 总计       | 2504  | 近 7000 | 2112  | 近 10000 |

\* 包括 65 枚中程导弹。

① 江流、陈之骅主编：《苏联剧变的历史思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47 页。

② 阿·阿·巴巴科夫：《战后苏联的武装力量》，莫斯科 1987 年版，第 233 页。

表5 美国和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关于美苏核力量对比<sup>①</sup>

| 美国方面   |      |      |      | 苏联方面     |      |      |      |
|--------|------|------|------|----------|------|------|------|
| 系统     | 部署数  | 携弹头数 | 弹头合计 | 系统       | 部署数  | 携弹头数 | 弹头合计 |
| 陆基洲际导弹 |      |      |      | 陆基洲际导弹   |      |      |      |
| 大力神 II | 49   | 1    | 49   | SS—11    | 570  | 1    | 570  |
| 民兵 II  | 450  | 1    | 450  | SS—13    | 60   | 1    | 60   |
| 民兵 III | 550  | 3    | 1650 | SS—17    | 150  | 4    | 600  |
| 小计     | 1049 |      | 2149 | SS—18    | 308  | 8    | 2464 |
|        |      |      |      | SS—19    | 310  | 6    | 1860 |
|        |      |      |      | 小计       | 1398 |      | 5554 |
| 潜射导弹   |      |      |      | 潜射导弹     |      |      |      |
| 海神     | 304  | 10   | 3040 | SS—N—5   | 18   | 1    | 18   |
| 三叉戟 I  | 240  | 8    | 1920 | SS—N—6   | 400  | 1    | 400  |
| 小计     | 544  |      | 4960 | SS—N—8   | 292  | 1    | 292  |
|        |      |      |      | SS—N—17  | 12   | 1    | 12   |
|        |      |      |      | SS—N—18  | 208  | 7    | 1456 |
|        |      |      |      | SS—NX—20 | 20   | 1    | 20   |
|        |      |      |      | 小计       | 950  |      | 2198 |
| 远程轰炸机  |      |      |      | 远程轰炸机    |      |      |      |
| B—52D  |      |      |      | 熊式       | 105  |      |      |
| B—52G  |      |      |      | 野牛式      | 45   |      |      |
| B—52H  |      |      |      | 小计       | 150  |      |      |
| FB—111 |      |      |      |          |      |      |      |
| 总计     | 1921 |      | 7109 | 总计       | 2498 |      | 7752 |

表6 《真理报》1988年2月8日的资料：苏美战略核力量对比

| 战略核武器                  | 苏联   | 美国   |
|------------------------|------|------|
| 洲际弹道导弹                 | 1390 | 1000 |
| 其中分导式多弹头导弹             | 812  | 550  |
| 潜射弹道导弹                 | 942  | 672  |
| 其中分导式多弹头潜射弹道导弹         | 388  | 640  |
| 洲际弹道导弹与潜射弹道导弹的总数       | 2332 | 1672 |
| 其中分导式潜射弹道导弹            | 1200 | 1190 |
| 重型轰炸机                  | 162  | 588  |
| 其中带有翼导弹的重型轰炸机          | 72   | 161  |
| 洲际弹道导弹、潜射弹道导弹和重型轰炸机的总数 | 2494 | 2260 |
| 其中装配有多弹头和有翼导弹的         | 1272 | 1351 |

<sup>①</sup> 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下册，第871页。

洲际弹道导弹美国有3种，苏联有7种；潜射弹道导弹，美国有3种，苏联有6种。

80年代中期，加入经互会的国家工业产量占世界工业产量的21.3%，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则占56.4%，但在军事力量上苏联集团并没有示弱，北约和华约在欧洲部署的武装力量人数相当，华约有357.31万人，北约有366.02万人；在战斗机的数量上，华约有7876架，北约有7130架；坦克的相应数字是59470对30690，比率是1.9:1；步兵战车和装甲运输车是1608对136，比率是11.8:1；炮和迫击炮的数量是71560对57060，比率是1.3:1；反坦克火箭的数量是11465对18070，比率是1:1.6；大型水面舰只的数量是102对499，比率是1:5；潜艇（除ПЛАРБ，包括核动力）数量是228对200，比率是1:1。<sup>①</sup>在兵力部署上，苏联在东、西、南三个方向上积极加强军事部署，形成了咄咄逼人的战略进攻态势，在西线控制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东线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在南线进军阿富汗。苏军以美国和北约为主要对手，欧洲地区部署了兵力的70%，具有向西欧发动一场大规模闪电战的能力。在世界各热点地区，也都有苏联的影子。

许多人认为，是美国迫使苏联卷入军备竞赛的，这种看法并不客观，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也有苏联主动的一面，苏联还促使军备竞赛升级。1977年苏联开始在欧洲部署新的先进的SS—20中程导弹，这种导弹可携带三个分导核弹头，射程5000公里，采用固体燃料，机动性强、精确度高。此举促进了国际军备竞赛升级和东西方关系紧张。当时，欧洲的军事力量对比是：战略核力量大体平衡，常规兵力，华约占上风，北约在战术核力量方面占优势，弥补了其常规力量的不足。但是，苏联部署新的导弹，打破了力量平衡，美国及其北约盟国并没有与之相对应的导弹，苏联在欧洲战区的核优势引起了美国及其盟国的担忧，使北约面临其“灵活反应”战略失灵的危险。于是，北约于1979年12月决定，如果到1983年底美苏谈判达不成协议，北约便在5年内在西欧五国部署572枚美国的新式中程导弹，其中包括108枚“潘兴—2”导弹，苏联在欧洲中程导弹方面的优势将被打破。

---

<sup>①</sup> Грибков А. И. Судьба варшавского договора .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документы, факты. М. , Русская книга. 1998. С. 171—173.

## 苏联大力发展军备的后果

苏联长期片面发展军事力量，其后果是严重的，可以说直接导致了苏联社会主义丧失信誉和最后垮台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一，苏联的经济结构畸形日益加重。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搞军备竞赛，导致了苏联经济的军事化，军事工业综合体的产值占到整个工业生产的80%，到80年代中期，许多生产民用品的工业部门，其技术和组织水平还停留在30年代中期，农业则相当于20年代中期的水平。<sup>①</sup>70年代，美国农业从业人员占2.5%—3%，而在苏联占25%。1970年一个苏联农民一年生产4.5吨谷物、320公斤肉和2.8吨牛奶，而一个美国农业工作者生产54.7吨谷物，4570公斤肉，11.8吨牛奶。70年代中期，美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比苏联高3—4倍。<sup>②</sup>最新、最好的科技成果都被用在了军事工业综合体上，军事体系与民用生产体系严格分离，使军事技术不能转化为民用技术，而社会财富一旦进入军事领域，便脱离了整个社会扩大再生产，除了少量军火交易能得到一些收入外，其余只能是财富的消耗，军费和军工综合体的膨胀，破坏着社会再生产。军工生产优先，严重影响了消费品工业的发展与进步。这一趋势长期发展的结果只能是一个越发展，另一个则越萎缩。

第二，与美国搞军备竞赛制约着苏联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如果实行改革，企业自主权扩大，会冲击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是与加强军备生产的这一最重要的战略任务相抵触的。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正是适应发展重工业，特别是军工生产的要求而形成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是苏联军工企业和军事体系赖以生存的最重要的条件，这种体系的存在和发展又成为维护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系的社会经济基础。苏联争霸世界、与美国搞军备竞赛，又要求进一步发展军事和军工体系。军工综合体集团，成为苏联社会最有权势、对国内外政策影响最大的集团。最新科技成果都集中在了军事工业上，也使苏联经济增长方式无法从粗放型转向集约型。

① Россий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и общество. XX век. М., Изд - во Моск. ун - та. 1999. С. 379.

② Тимошина Т. М.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М. 2000. С. 350.

第三，军备竞赛严重消耗了苏联的资源，使苏联的国力从极盛走向衰落。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六大上说，美国军费一年达到1500亿美元，并说这是庞大的天文数字。<sup>①</sup>实际上从1973年起苏联的军费就超过了美国。联合国前副秘书长、叛逃到美国的苏联人舍甫琴科说：“1972年莫斯科首脑会议之后，苏联不但没有放松武器储备，反而继续使其军火库——战略的和常规的——全面现代化，不断增加导弹、飞机、坦克、舰艇和大炮的数量。苏联不惜牺牲其他经济部门而且大大超过其实际防务需要，将军工生产增加了1/3。它的军工基地之大在全世界首屈一指。按美元估算，苏联军事投资大大超过了美国。”<sup>②</sup>1963—1973年苏联的军费总额为6740亿美元，平均年增长率为3%。此后，增长率又逐年提高，1971年军费支出为740亿美元，1973年增至860亿美元，1975年又增至1023亿美元。<sup>③</sup>苏联军费支出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也高于美国。为了支持武装力量的不断增长和现代化，苏联军事开支大幅增长，平均每年将国民生产总值的12%—14%用于军事。1979年，用美元估算的苏联军事投资比美国的同类开支多70%。<sup>④</sup>美国从1965—1969年越战期间军费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8.4%—9.5%，1969年以后下降，1977年占5.4%。<sup>⑤</sup>

表7 苏联官方公布的资料<sup>⑥</sup>

|              | 1940年 | 1960年 | 1970年 | 1980年 | 1985年 | 1986年 |
|--------------|-------|-------|-------|-------|-------|-------|
| 国防开支占国家预算的比重 | 5.7   | 9.3   | 17.9  | 17.1  | 19.1  | 19.1  |
| 国家预算总支出（亿卢布） | 174   | 731   | 1546  | 2946  | 3865  | 4171  |

据苏联的一些专家估计，80年代中期，苏联国防开支占国家预算的45%—50%（美国占25%—27%），苏联的军费开支每年达2500亿—3000亿美元，与美国相近。而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只是美国的50%—60%，苏联国民生产总值的

- ①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29页。  
 ② （苏）阿·舍甫琴柯：《与莫斯科决裂》，世界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345页。  
 ③ 江流、陈之骅主编：《苏联演变的历史思考》，第342页。  
 ④ 美国国防部编：《苏联的军事力量》，第6页。  
 ⑤ 江流、陈之骅主编：《苏联演变的历史思考》，第342—343页。  
 ⑥ 苏联国家统计局：《苏联国民经济70年》，莫斯科1987年版，第629页。

12%—13%被用在了军事工业综合体（国防）上，而美国为5%—6%。<sup>①</sup>

70年代前半期，苏联的综合国力在世界排名处于领先地位，但在70年代后半期，苏联除了军事外，其他领域的发展都陷于困境，国力衰落。一个国家在和平时期发生如此大的变化，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国防力量的发展已经成了国民经济发展的负担，把国民经济拖向了深渊。1975年，按当年的美元计算，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为15163亿美元，苏联为8653亿美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美国为7098.7美元，苏联为3400美元。<sup>②</sup> 1980年在世界生产总值中，美国占21.5%，苏联占9.7%；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美国为11360美元，苏联仅为4550美元。<sup>③</sup>

第四，妨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严重影响了人们的社会主义信念。根据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的说法，苏联在阿富汗花了600亿卢布，为与中国对抗，花费了2000亿卢布，为了取得与美国和西方的力量平衡，花费了至少7000亿卢布。<sup>④</sup> 根据西方统计资料，80年代中期苏联给发展中国家（包括越南和古巴）提供的这种援助（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的总额，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1.4%，而美国所提供的类似援助则不到国民生产总值的0.3%。<sup>⑤</sup> 援助获得民族解放国家发展经济，1980年，经互会国家拿出18.17亿美元，相当于其国内生产总值的0.12%。欧佩克国家，从出卖石油中获得了大量收入，帮助被剥夺了这种收入来源的发展中国家，总数达69.99亿美元。西方发达国家拿出267.08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37%）。华约国家在军事领域也给已解放的国家以很大帮助：1976—1980年，华约国家提供的武器价值334.9亿美元（按世界市场价格计算），北约提供的价值424.8亿美元。<sup>⑥</sup> 由于经济实力不及资本主义世界，社会主义大家庭国家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第三世界的较量中，要承受比西方发达国家

① Россий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и общество. XX век. М., Изд - во Моск. ун - та. 1999. С. 378.

② 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编：《苏联经济新剖视》（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79年版，第8页。

③ （美）保罗·肯尼迪著，王保存等译：《大国的兴衰》，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第533页。

④ Шеварднадзе Э. Мой выбор в защиту демократии и свободы. М., 1991. С. 110, 111.

⑤ （苏）谢瓦尔德纳泽等著，宋以敏选编：《苏联外交反思》，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255—256页。

⑥ Загладин Н. В. История успехов и неудач советской дипломатии. М., 1990. С. 209.

沉重得多的负担。苏联长期把物质消耗在发展军备和援助世界革命上，妨碍了人民生活水平与质量的提高。1973年苏联的平均工资是168.14美元，法国是361.64美元，美国是606.51美元。<sup>①</sup>赫鲁晓夫时期住房建设的规模与斯大林时期的几个五年计划相比增加了一倍。赫鲁晓夫下台后连续4个五年计划，也就是20年中，住房建设还停留在赫鲁晓夫时期的水平上。<sup>②</sup>1989年，也就是生产发生危机性下降前夕，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苏联是美国的30%，人均工业品，苏联是美国的42%，人均农产品，苏联是美国的38%。1990年苏联的人均消费仅是美国的20%。80年代中期，苏联饮食消费占工资的40%，而美国只占10%，日本占15%。1990年的人均住房面积，美国为51平方米，西德为41.5平方米，俄罗斯为16.3平方米。1985年，电话每千名居民中的拥有量，美国为759门，日本为533门，西德为598门，英国为523门，苏联为75门（1990年）。小轿车的拥有量则分别是552、230、428、291、55。苏联的人均寿命，1975—1980年，男人为65岁，女人为74岁；日本相应为75岁和81岁、美国为72岁和79岁、法国为71岁和79岁。<sup>③</sup>因为住房条件恶劣、食品不足、工资低、劳动定额高等原因，人们多次公开表示不满，如1969年基辅、斯维尔德洛夫斯克，1972年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1980年在高尔基城，1981年在陶里亚蒂市等地都发生过群众的抗议示威。

第五，苏联军事实力的增长，激起美国对苏联的敌对情绪，断送了缓和。从70年代中期开始，苏联为打破苏美力量平衡、追求军事优势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促使苏美军备竞赛步步升级。1977年1月12日，美国总统福特在致国会的国情咨文中说：“美国决不能容忍战略均势发生不利于我们的逆转，或者出现这样的情况，即美国人民或我们的盟国相信力量对比正在转向不利于我们。如果世界相信我们的对手拥有决定性的优势，美国将冒最严重政治后果的风险。”<sup>④</sup>1980年美国国防部前副部长保罗·尼采和耶鲁大学教授、前副国务卿尤金·罗斯托发表了一个题为《80年代的防务战略和拨款》的报告，其主要结论是：“俄国在过去

① Тимошина Г. М.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М., 2000. С. 351.

② (俄) 尼·雷日科夫著，李永全等译：《大动荡的十年》，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495页。

③ (俄)《自由思想》1993年第13期，第39页。

④ 转引自：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下册，第728页。

10年花费的开支比美国多2600亿美元，这是实行一项旨在取得军事和战略优势的毫不退让的政策的结果……卡特政府大吹大擂地增加国防开支的做法并未使世界力量对比发生危险变化的局面得以纠正。这种危险的变化是苏联通过大规模加强军事力量和由于加强军事力量得以在亚洲、中东、非洲和加勒比海部署新力量而取得的……十多年来，我国既没有在国防上做好充分准备，也未使经济得到高度的稳定。让这种没有远见的做法继续下去是绝对不能允许的。美国必须采取决定性的行动恢复自己的安全和使经济得到稳定。”<sup>①</sup>里根及其班子认为：“美国已经丧失了它的战略核优势。从衡量战略核力量的大多数标准——导弹数量、携带的弹头、百万吨级（100万吨TNT的当量）或投掷重量——来看，美国都落后于苏联……苏联拥有的三条洲际弹道导弹生产线一直在生产，而我们的最后一条生产线已于1977年关闭了……苏联保持着历史上武器装备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它可以在30天内动员200个师。……它们对第三世界的援助在以往的5年内平均每年为100亿美元。”<sup>②</sup>里根上台后，开始重新研究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实行对付苏联的“新的遏制战略”，开始了新的“冷战”。

总之，勃列日涅夫坚持对外扩张，实行进攻型的外交战略，为此大力发展军备，在实力远不如美国的情况下，追求与美国军备实力的均势，甚至优势，浪费了大量资源，消耗了国力，为苏联的剧变埋下了祸根。

---

① 陈忠经著：《国际战略问题》，时事出版社1987年版，第186页。

② 陈忠经著：《国际战略问题》，第198页。

## 60. 勃列日涅夫时期为什么会出现 “持不同政见者”？

叶书宗

勃列日涅夫当政时期，苏联社会出现了“持不同政见者”，发生“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甚至这样说也不为过：“持不同政见者”的存在，“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此起彼伏，是勃列日涅夫当政时期的苏联社会的一种标志性现象。

### “持不同政见者”和“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始末

“持不同政见者”（Диссидент）是俄语里的外来语，原意是“脱离国教的人”，中文通常译作“持不同政见者”，实际上译作“异议者”较为确切，因为有的并不涉及“政见”。本文沿用通常译法。勃列日涅夫当政以后，西方舆论界将苏联国内，尤其是知识分子阶层中那些不满斯大林模式的政治、经济体制，以及严厉的意识形态统制，向往自由、民主、个性解放的人，统称为“持不同政见者”。后来，这一称谓被苏联社会所接受，但是苏联官方始终不接受这一称谓，而是称为“反社会分子”、“反社会主义分子”。

苏联著名“持不同政见者”麦德维杰夫认为：“所谓持不同政见者是这样的一些人，他们对于任何社会（包括苏联在内）所赖以存在的意识形态、政治、经济或道德基础都多少持有不同的见解。不仅如此，他们还公开表明自己的观点，并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将这些观点表达出来。换句话说，他们不光是私下对自己

的妻子或挚友发发牢骚而已。”<sup>①</sup> 麦德维杰夫的这段话，是对“持不同政见者”的表象性概括。实际上，在当代世界，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人的法律地位主体化，是支撑现代文明社会的三要素。尤其是发轫于文艺复兴运动的人本主义，是现代法治社会意识形态的立足点。斯大林模式在意识形态上是以国家主义取代了人本主义，与西欧社会相比较，原来就先天不足的俄国人本主义意识，也成为苏联意识形态领域革命和专政的对象，具有人本主义思想的人肉体上也遭到残酷迫害，甚至被杀戮。但是，在苏联存在的整个历史时期里，人本主义意识始终存在，并不时顽强地表现出来。当然，具有人本主义意识的人，并不等于是“持不同政见者”；但是毫无疑问，“持不同政见者”都是坚持人是自然和社会的主人这一信念，追求真理和历史的真实性而不肯屈从的人。因此，“持不同政见者”从思想意识上说就是具有强烈的人本主义意识者，它是苏联发展到勃列日涅夫当政时期而喷发出来的特有社会现象。因此“持不同政见者”这一翻译，从严格的科学意义上说，是不甚确切的。因为“持不同政见者”群体相当复杂，彼此的思想观念、主张，各有差异。此外，“持不同政见者”所表达的意见、行为，也并不限于政治，而是涉及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思想、国际关系、民族关系、宗教信仰等方方面面。“持不同政见者”只是一种约定俗成，一个能够被普遍接受、理解的概念。

“持不同政见者”为了强烈地表现自己的思想、观念、意愿、主张，往往举行示威集会，成立各种组织机构，发表声明，印刷、传递各种出版物等活动，形成社会影响。因此，“持不同政见者”和“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实际上就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就具体的人来说，是“持不同政见者”；就社会层面来说，就是“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一般来说，国际史学界是将1965年12月5日（12月5日是苏联宪法日），为了抗议苏联当局逮捕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由诗人亚·叶赛宁·沃尔平牵头，在莫斯科的普希金广场举行示威集会，作为“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开始。因为这是自十月革命、苏联成立以来第一次以遵守宪法为口号，以维护宪法所赋予苏联公民权利为宗旨的示威集会，因而也被看成是“持不同政见者”的首次公开亮相。因此，也可以把1965年底看成是“持不同

---

<sup>①</sup>（苏）罗·麦德维杰夫著，刘明等译：《论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群众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

政见者”正式出现的时间。

供职于苏联科学院高尔基文学研究所的作家西尼亚夫斯基从1959年开始，就以阿勃拉姆·捷尔茨（Абрам Терц）的笔名，在西方发表自己的作品。另一位作家达尼埃尔，从1961年开始，以尼古拉·阿尔扎克（Николай Аржак）的笔名，在西方发表讽刺斯大林主义的文学作品。由于西尼亚夫斯基所用的“阿勃拉姆·捷尔茨”的笔名是个犹太名字，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情报人员误认为作者是犹太人。有位作家在《消息报》上抨击说：“西尼亚夫斯基使用‘阿勃拉姆·捷尔茨’这个名字在国外出版反苏作品，企图使人们产生一种印象，即我国存在着反犹太主义。而且一个用‘阿勃拉姆·捷尔茨’这样笔名的作家，要想‘坦率’地写一些关于苏联生活的文章，他就只能选择西方的出版商。”<sup>①</sup>

1965年9月，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被逮捕。12月初，莫斯科流传一张题为《告公民宣言书》的传单，抗议当局逮捕他们两人，并要求对他们两人进行“公开审判”。《告公民宣言书》说：“这种情况破坏了宪法上规定的公民有基本写作权利的条文……不可思议的是，作家因为写作而成了国家的罪犯。”《告公民宣言书》最后说：“我们公民有向专横的法律斗争的手段——公开集会，或者（打出）适当的公开标语和口号。集会时所有参加者的唯一口号是：‘要求公开审判’；要一字一顿地、清晰地高喊。”<sup>②</sup>《告公民宣言书》相约：12月5日晚6点，在普希金广场诗人纪念碑旁的街心花园公开集会。

12月5日傍晚，几百名抗议者在普希金广场公开集会。集会者打出的标语是：“请尊重苏联宪法”；“要求法院公开审判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便衣很快抢走传单、标语，抓走20多人。事后，40余名大学生因参加集会而被学校开除。要求当局遵守苏联宪法，切实保障宪法所赋予公民的民主权利，成为勃列日涅夫当政时期“持不同政见者”的共同基本要求。以后，每年的12月5日，普希金广场几乎都有人举行要求保障苏联宪法规定的公民民主权利的集会。

---

<sup>①</sup> 转引（英）克·安德鲁，（俄）瓦·米特罗欣著，王振西等译：《克格勃绝密档案》下册，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第491页。

<sup>②</sup> （苏）金兹伯格著：《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事件白皮书》，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播种”1967年版，第61页。引自郭永胜著：《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4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01页。译文对照原文，略作修正。

1966年2月，西尼亚夫斯基被判处7年强迫劳动；达尼埃尔被判处5年强迫劳动。他们一起被送往设在摩尔多瓦的劳改营服刑。1967年夏，萨哈罗夫曾向安德罗波夫反映达尼埃尔的艰难处境，请求给予关注。1970年9月，达尼埃尔获释，并准予在莫斯科居住。西尼亚夫斯基于1971年6月获释，不久即移居巴黎。

“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高涨，发生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这是与苏联的国内外局势有关的。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将确保欧洲边界现状，召开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作为同美国和西方世界争夺欧洲的重要内容。60年代末，苏联为了呼吁和筹备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并争取和联邦德国签订条约，使之承诺不以武力改变欧洲国家的领土现状，在对外政策上做出了更大的缓和姿态，对国内“持不同政见者”的打压有所松动。在这种氛围下，“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无论是广度或者深度都有所拓展。

“持不同政见者”的各种社团组织大多在这段时间里成立。比较有影响的社团组织有：60年代后期，列宁格勒的“全俄罗斯基督教人民解放联盟”；1968年12月，弗拉基米尔市的青年工人成立“独立青年联盟”，以“发展苏联的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进步”为宗旨；1969年5月，“保卫人权行动小组”成立，宗旨是“同侵犯人权的作斗争”，支持政治审讯的受害者，以及因政治原因而被送进精神病院的牺牲者；1970年11月，在萨哈罗夫、特维尔多赫列鲍夫、查利泽等三名著名物理学家的倡议下，成立了“人权委员会”，并宣布该组织为“国际人权联盟的集体成员”；1973年，在莫斯科成立的名为“七三小组”的组织，该组织的宗旨是“声援政治犯”；1974年秋，莫斯科成立的“国际大赦小组”，其宗旨是动员公众舆论，要求释放政治犯，并给予在押人犯以最人道的待遇。“持不同政见者”的群体也越出了知识分子的范围，扩及苏联的其他一些人群。

“持不同政见者”为了传递信息、交流思想、扩大影响，曾经印制过诸如《播种者》、《市民会议》、《社会问题》、《西格马》、《钟声》、《乌克兰通讯》、《离境》、《三七》等名目繁多的材料。这些材料被苏联当局严厉禁止和取缔，被通称为“私下出版物”。“私下出版物”也是在这段时间里比较盛行，其中影响较大的是《时事纪事》、《展望》和《政治日记》。

《时事纪事》由以亚基尔为首的莫斯科“民主运动小组”编辑。该刊的宗旨是：通过在人们中间培养民主与科学的信念，使国家民主化；反对斯大林主义，

保护自己不受镇压；与任何极端主义作斗争。该刊1966年创刊，1983年停刊，共出版过64期。1971年，“大赦国际”为其出版了此前的英文版合刊。

《展望》是列宁格勒大学历史系四年级的两名学生，于1978年春创办，刊登一些探讨苏联社会现实问题的文章。由于是在大学里的青年学生中流传，影响很大。两名创刊者还在市区租了一套房子，供志同道合者讨论问题和住宿，称为“公社”。1978年底，《展望》被查禁。

《政治日记》由麦德维杰夫于1964年10月开始编辑，1975年5月停刊，共出过70多期。1972年，在阿姆斯特丹赫尔岑基金会的资助下，结集出版了《政治日记》（1965—1970年）。1975年，第二册《政治日记》（1965—1970年）又在阿姆斯特丹出版。对于这些“私下出版物”，1970年12月21日，安德罗波夫在给苏共中央的报告中惊呼：“对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传播的所谓‘私下出版’的书籍的分析表明，‘私下出版物’近几年来发生了质的变化。如果说5年前传阅的主要是有些思想上有毛病的文艺作品，那么现在具有政治纲领性的文件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传播。”<sup>①</sup>

“持不同政见者”虽然以民主、法治、人权、思想自由为基本诉求，但是彼此的主张也不甚相同，麦德维杰夫、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等三人，可以看成是“持不同政见者”的三位代表人物。

罗伊·麦德维杰夫生于1925年，历史学家，曾任莫斯科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苏联教育学院职业教育研究所所长，苏共党员。麦德维杰夫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正确的，但是苏联的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完全歪曲了马克思主义，苏联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必须进行带根本性的民主改造。

1964年，麦德维杰夫撰成《让历史来审判》的初稿，一部尽可能根据真实的史料研究斯大林时期苏联政治史的史学专著。这本书稿虽然尚未正式出版，但是很快在苏联乃至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响。1968年8月4日，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向苏共中央建议：“有必要把麦德维杰夫找到苏共中央宣传部，就他的作品问题同他进行详尽而认真的谈话，根据谈话的结果再来决定制止这部书（指《让历

---

<sup>①</sup> 《安德罗波夫关于“私下出版物”问题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70年12月21日）》，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0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97页。

史来审判》——作者注)问世的进一步措施问题。”<sup>①</sup>

1969年4月,麦德维杰夫给《共产党人》杂志编辑部写了一封公开信,反对为斯大林恢复名誉,并把信的副本分送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及一些知识分子。不久,这封信便以小册子的形式,冠以《应当为斯大林恢复名誉吗?》的标题,在巴黎出版。为此,8月间,麦德维杰夫被开除出党,理由是:“以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为借口,对整个苏联人民、国家和社会制度都进行了恶毒的诽谤。”<sup>②</sup>

1971年10月,警察抄了麦德维杰夫的家,理由是“麦德维杰夫牵涉到列宁图书馆图书失窃案”。警察把麦德维杰夫的家翻了个底朝天,终于搜到一本价值为90戈比、盖有图书馆印章的书。但是警察却从麦德维杰夫家搜走了7大包文件和剪报资料。麦德维杰夫还因此而被开除公职。此后,麦德维杰夫的著作《让历史来审判》、《社会主义和民主》、《谁是疯子》(与孪生哥哥若·麦德维杰夫合作)在西方正式出版。1975年,麦德维杰夫的家再次被抄。此时,麦德维杰夫正从事《米哈伊尔·肖洛霍夫创作生涯之谜》一书的写作。这次,麦德维杰夫坚决不许警察把正在写作的书稿带走,说:“这些东西凭任何标准都不能认为是‘反苏’的。”此后,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对麦德维杰夫的迫害也加紧了,称他为“苏联国家和社会制度明确反对者”;“有必要制止麦德维杰夫的犯罪活动”;“要他承担刑事责任”,等等。麦德维杰夫的住所和日常行动,被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严密监控,实际上是丧失了自由。直到戈尔巴乔夫当政后的1985年5月,才撤销对麦德维杰夫的监控。富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戈尔巴乔夫时代,麦德维杰夫成了苏共中央委员,是社会主义的坚定支持者,他继续批判斯大林主义,坚持列宁的社会主义。1989年当选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议员)。“8·19事件”后苏共被查禁,他出来组织劳动人民社会党,是该党的两主席之一。

安德烈·德米特里耶维奇·萨哈罗夫生于1921年,苏联核物理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1953年通过)、苏联中型机器制造部实验物理科学研究所科研副所长、苏联国家原子能委员会首席顾问。由于其对苏联发展核武器所作的杰出贡

---

<sup>①</sup> 转引(俄)罗伊·麦德维杰夫著,徐葵等译:《人们所不知道的安德罗波夫》,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171页。

<sup>②</sup> 引自《论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第29页。

献，萨哈罗夫三次获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获苏联国家奖金和列宁奖金，被誉为“苏联氢弹之父”。1957—1960年苏联接连发生核事故后，萨哈罗夫要求赫鲁晓夫停止核试验。1961年、1962年，萨哈罗夫又接连上书赫鲁晓夫，要求停止核试验。这一连串要求不仅被苏共中央拒绝，还招致苏共中央的忌恨。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萨哈罗夫激烈反对种种或明或暗的为斯大林恢复名誉的做法，抗议各种形式对“人权”的侵犯。1968年5月，萨哈罗夫写成《关于进步、和平共处和思想自由的思考》一文，阐发了他的基本主张。文章最初打印成5份，分寄包括麦德维杰夫在内的友人。文章把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希特勒在德国建立的法西斯专政，都称为当代的“警察专制制度”。文章说：“法西斯主义在德国存在了12年，斯大林主义在苏联存在的时间比之要长一倍。它们有许多共同性，但也有一定的区别。这就是对伪善和蛊惑作了多得多的巧妙的掩饰，不是像希特勒那样依靠公开的吃人的纲领，而是依靠进步的、科学的、在劳动人民中受欢迎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是用来欺骗工人阶级和麻痹知识分子与争夺政权的竞争者的警惕性的最方便的幌子。”<sup>①</sup>此外，文章还表述了萨哈罗夫的另一重要思想，即反对“思想自由的威胁；呼唤精神生活民主化”。

1970年4月，萨哈罗夫写信给勃列日涅夫，提出15条建议，以期推进苏联社会的民主化。西方报刊很快转载了这封信，并称之为“俄国知识分子的改革宪章”。以后，这封信就被称为“萨哈罗夫宪章”。这封信在内容上虽然没有超出《关于进步、和平共处和思想自由的思考》的范围，由于它是以民主改革政纲的形式，向苏共中央总书记直接提出，因而在世界及苏联国内所产生的影响就更为强烈。苏共中央委员、苏联科学院院长凯尔迪什，苏共中央委员、苏共中央学校和科学部部长特拉佩兹尼科夫，为此找萨哈罗夫谈话，说：“苏联非常需要民主化，但是必须先提高广大居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先得让人民吃饱！”实际上，他们是代表勃列日涅夫对萨哈罗夫的回答。接着，萨哈罗夫又联合另几名物理学家，一起成立“人权委员会”。苏共中央曾经考虑剥夺萨哈罗夫的苏联科学院院士。不过，苏联科学院院长凯尔迪什向苏共中央表示：不能轻易地剥夺萨哈罗夫的苏联科学院院士，因为根据苏联科学院章程，授予或剥夺院士称号需经科学院院士以无记名投票方式，经2/3多数通过。凯尔迪什说：我不能保证能做到。苏

<sup>①</sup> 引自《人们所不知道的安德罗波夫》，第150页。

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给萨哈罗夫编了个“苦行僧”的代号，予以严密监视。1973年9月6日，苏共中央书记处通过了《关于萨哈罗夫院士反社会活动》的通报，向全党的政工干部传达，以期尽可能地消除萨哈罗夫的社会影响。

1975年，萨哈罗夫获诺贝尔和平奖。1976年，萨哈罗夫因为掴了一名后备役少校的耳光，被冠以“流氓罪”拘留。虽然不久即获释，但是被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列为“头号人民公敌”。1980年1月22日，萨哈罗夫在上班的路上被逮捕。法庭向萨哈罗夫宣读了将其从莫斯科驱逐到高尔基市、一个不能同外国记者接触的城市命令。萨哈罗夫受到高尔基市警察和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保安人员的日夜监视，实际上是被“行政流放”。直到戈尔巴乔夫当政后的1986年12月1日，才结束对萨哈罗夫的“准监禁”。

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生于1918年。1941年6月，卫国战争爆发时，刚刚大学毕业的索尔仁尼琴应征入伍，成为一名炮兵。由于作战有功，很快升为连长，授大尉军衔，并获得两枚奖章。1945年2月，他在与友人的通信中，议论到斯大林是否执行列宁的政策问题。信被内务部的特工拆看。1945年6月7日，本是卫国战争英雄的索尔仁尼琴由此而被判处8年徒刑。在往后的8年里，索尔仁尼琴蹲过各类劳改营，终于熬到1953年6月刑满。因为他曾在思想上产生过对斯大林的疑问，又被永远流放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州的科克—杰列克村。1955年，索尔仁尼琴患了恶性肿瘤，在塔什干的肿瘤防治所居然奇迹般地被治愈。苏共二十大以后，1957年初，索尔仁尼琴才得到苏联司法当局“无犯罪事实”的结论，恢复名誉。

在劳改营里，索尔仁尼琴就开始记录自己在劳改营里的生活和感受。恢复自由以后，索尔仁尼琴更加勤奋地写作。1959年，索尔仁尼琴完成描写劳改营生活的小说《第一圈》和《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接着，他又通过各种关系，收集资料，着手创作《古拉格群岛》、《癌病房》、《马特廖娜小院》等反映劳改营生活和劳改营里的人的内心世界的长篇小说。索尔仁尼琴写这些小说的初衷，可以说完全是出于人的理性的驱动。他只是想把自己在劳改营里的所见所闻真实地记录下来，既为千百万蒙冤受难的人铸一座纪念碑，也向社会昭示那不为所知的、真正的人间地狱里的人是怎样的人。他的创作思想是建立在对人性、劳改营、斯大林模式三者统一的理性思考的基础上的。他没有想使自己成为一名作家，甚至准备活着的时候根本看不到自己写的书。不过，苏联社会客观变化的大

潮，把他推上了现实生活的风口浪尖。

1962年第11期《新世界》杂志发表了《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诗人特瓦尔多夫斯基在代序中说：这部小说的发表，“意味着一个新的、独特的并且是完全成熟的巨匠进入了我们的文坛……它说明在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中，没有什么领域或现象不能给予真实的描写”。<sup>①</sup>小说的发表，在苏联社会引起了轰动。人们奔走相告，争相购买第11期《新世界》杂志。小说被世界上多家出版社购买翻译权，很快被译成英、法、德等多种文字。这样，索尔仁尼琴就从一名默默无闻的劳改营幸存者，一跃而成为全苏乃至全世界都知道的不寻常的作家。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对《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表现出不能容忍的愤怒。1966年11月10日，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关于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我们争论了多少次，谈了多少次，而他（指赫鲁晓夫——引者注）却支持所有这些劳改营文学。当然，肃清中央十月全会前10年间发生的所有错误需要时间，这也是对的。但是，我认为，说现在该是做些什么，该是对于具体工作部门追究责任的时候了。”<sup>②</sup>勃列日涅夫的讲话，成了全苏批判索尔仁尼琴的动员令。不消说，索尔仁尼琴的作品不能在苏联出版了。

1968年5月，苏黎世出版了《癌病房》的俄文版。接着，巴黎出版了《第一圈》的俄文版。这些小说的出版，在世界上引起更大的反响。1969年11月，索尔仁尼琴被开除出苏联作家协会。苏联文学界对索尔仁尼琴开展更猛烈的批判。

1970年10月8日，诺贝尔评奖委员会通过授予索尔仁尼琴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决定。颁奖词说：“索尔仁尼琴的作品具有全球性的艺术魅力，这种魅力来自他对于贯穿于许多伟大前驱作品中无可比拟的俄罗斯传统的继承。他和他的前辈作家各以不同的艺术形式象征性地表达自己对俄罗斯苦难的沉思和对俄罗斯母亲的挚爱。”颁奖词中的这段话，实际上正是索尔仁尼琴思想的核心。很多作家自发地认为诺贝尔评奖委员会的这一决定是公正的，并为索尔仁尼琴获得这一荣誉而高兴。但是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则千方百计阻挠和刁难索尔仁尼琴前往瑞

<sup>①</sup> 见拙作《俄国社会主义实践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25页。

<sup>②</sup> 《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国内意识形态问题讨论的记录摘抄（1966年11月10日）》，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1卷，第121页。

典出席授奖典礼。

1973年12月,《古拉格群岛》第1卷在巴黎出版。接着,第二、第三卷也连着出版。这部小说的出版及影响,更加震撼勃列日涅夫和苏共中央。

1974年1月7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就如何处置索尔仁尼琴进行了专门讨论,最后接受安德罗波夫的建议,“以行政方式将索尔仁尼琴驱逐出境”。<sup>①</sup>1974年2月13日,索尔仁尼琴被押上飞机,送往国外。2月14日,苏联各大报都刊登关于索尔仁尼琴“因一贯进行与苏联公民身份不符的、有害于苏联的行动”,而被驱逐出苏联的消息。1974年12月10日,瑞典皇家学院为索尔仁尼琴单独举行了隆重的颁奖仪式。后来,索尔仁尼琴移居美国,闭门创作。

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剧变以后,1994年5月27日,索尔仁尼琴回到俄罗斯,在莫斯科定居,直至2008年去世。

勃列日涅夫和苏共中央认为“持不同政见者”不是思想观念问题,而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进行颠覆活动”,是“帝国主义的帮凶”、“准间谍”。因此,“持不同政见者”被勃列日涅夫认定为“刑事罪犯”。勃列日涅夫说:“在我国并不禁止与众不同的观点,也不禁止对公共生活的各个领域进行批评。我们把一切从实际出发善意地提出批评的人看做是有诚意的批评者,我们感谢他们。我们把那些批评错了的人看做是犯了错误的人民的一员。但是对于一小撮背离了我们的社会,竭力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人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他们进行反苏活动,违背了法律,因而在国内得不到支持,于是转而寻求国外的支持,乞援于帝国主义的颠覆中心——煽动和情报中心。我国人民要求把这样的活动家——如果可以用这个字眼来称呼他们的话——当做反社会主义分子,当做反对自己祖国的敌人,当做帝国主义的帮凶,即使他们不是真正的特务。很自然,我们已经并且还要继续依法采取一切手段和他们作斗争。”<sup>②</sup>

为了加大对“持不同政见者”镇压的力度,1967年初,在原俄罗斯联邦刑法第70条的基础上,增补第9章关于反社会秩序罪,专门针对进行“思想颠覆”

---

<sup>①</sup> 《苏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处置索尔仁尼琴的会议记录摘抄(1974年1月7日)》,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1卷,第86页。

<sup>②</sup> 《勃列日涅夫在全苏工会第16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77年3月)》,《勃列日涅夫言论》第13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

的“国事罪罪犯”。这类“罪犯”，或被关进特种劳改营，或被送进“精神病院”，或被“褫夺苏联国籍”驱逐出境。

经过严厉镇压，到1982年前后，“持不同政见者”基本上已经没有声音了。

### “持不同政见者”出现的原因

“持不同政见者”出现在勃列日涅夫当政时期，是有深刻的社会原因的。

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出现，从根本上说是因为斯大林模式实行文化专制主义，对于任何偏离斯大林主义的思想或意见，对外实行严格封锁，对内实行无情剿灭。这种以行政高压手段来维持全苏联意识形态绝对一致的政策，是无法永远面对社会意识形态多元存在的苏联客观社会现实的，何况斯大林主义基本上是违背科学，偏离人的道德良知的。斯大林晚年已经难以维持这种局面了。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从文学领域开始涌起的“解冻”思潮，是苏联当局无法用简单的行政手段可以压制的思想潮流。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勃兴，不仅促使大众传媒手段越来越高科技化，连人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包括苏联在内，也发生变化。1956年，约有56万名苏联公民出国“参观”。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又有大约150万名工人、集体农庄庄员、科学和文化活动家出国，他们有机会“眼见为实”地观察到西方世界的生活水平，并与苏联当局的宣传和实际相比较。在这段时间里，大约有50万名国外的游客光顾苏联，这些观光客自然也把他们的生活状况和生活理念带进苏联。这种交流本身就是时代发展的力量。1962年12月，主管意识形态的苏共中央书记伊利切夫在全苏思想工作会议上说：“一种非核的、非弹道的，但却是洲际的武器，已经被发明出来，这就是美国人的旅游。”<sup>①</sup>

勃列日涅夫当政后，世界性的通讯技术器材的进步和大众传媒的发达，使得苏共领导和苏联政府要想和以往一样把苏联社会作为全封闭状态的铁桶，已经不可能了。勃列日涅夫当政前期，据西方有关专家估计，大约有1/4的成年人经常收听西方广播。这个估计可能有些夸大，但是如果把收听者的再传播也估计在

---

<sup>①</sup> 转引（俄）亚·佩日科夫著，刘明等译：《解冻的赫鲁晓夫》，新华出版社2006年版，第244页。

内，收听西方广播应是相当普遍的了。1968年11月5日，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就青年学生的情绪呈苏共中央的报告说：“大学生都定时收听广播，但是他们偏爱西方广播电台，因为西方电台对新闻的报道比我们及时，节目编排得比我们有趣，包含许多引人入胜的细节。此外，朋友之间总是津津有味地叙述刚刚收听到的最新消息。”<sup>①</sup>这份报告不无担忧地说：学生宿舍里都有收音机。大学生交谈时常会有这样的话，“现在《美国之音》在广播”，晶体管收音机的普及通过广播很容易收听到敌对势力的信息，因为大多数学生甚至在约会时都随身携带“斯皮多拉”或者“子午线收音机”。<sup>②</sup>苏联社会和西方世界在思想观念上交流的渠道越来越通达，是“持不同政见者”在勃列日涅夫当政时期凸显的时代大背景。对于这种时代大背景的变化，连安德罗波夫也无奈地说：“边界在军事意义上是不可侵犯的，而在所有其他方面由于接触的扩大和信息的流动，边界正在变成透明的。”<sup>③</sup>

1964年10月，勃列日涅夫等以宫廷密谋的方式，把赫鲁晓夫赶下台，并且批判赫鲁晓夫的种种“反列宁主义的严重错误”。这种政权更迭的方式以及勃列日涅夫上台后的做法，包括苏联官场黑幕和种种丑闻的透露，使苏联人民感到无所适从，加剧了已经出现的信仰危机。苏共和苏联政府竭力灌输并要求人民绝对服从的意识形态，越来越受到质疑。1968年11月5日，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向苏共中央报告说：“对大学生来说，尽管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但是与党格格不入却是共同的。党对他们已不是最光明、最先进的东西的化身。他们容忍这种党的存在，然而呈现在他们面前的现实却完全不同。”<sup>④</sup>大学生们把他们所能够接触到的党政官员称为“苏联资产阶级”。同是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这份报告说：“大学生处处都能接触到‘苏联资产阶级’——从挂着白色纱幔、从身旁疾驰而过去看足球赛的小汽车，到大学生为参加同学的婚礼而来到礼品商店，可以听到女售货员骄傲地宣布说，‘西尼查的女儿今天结婚，他把所有商店里的鲜花全买了。’‘州委’这个词在大学生头脑中跟能买到紧俏商品等联系在一起。所有这

---

① 《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就青年学生的情绪呈苏共中央的报告（1968年11月5日）》，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1卷，第148页。

② 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1卷，第148页。

③ 引自《人们所不知道的安德罗波夫》，第155页。

④ 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1卷，第149页。

些事实只会使大学生对党的看法更加固定。他们说保卫州委和第一书记的家是很荒唐的——‘谁需要他们啊？’他们总是以不友好的态度去听党的高级干部的工资和生活方式。所有这些事实逐渐使大学生有准备地理解西方关于‘党蜕化变质’的宣传提纲。”<sup>①</sup> 这种现实状况，进而加剧信仰危机。也是这份报告说：“学生们对列宁和马克思的著作不感兴趣。反对强制的心理效应导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书籍没有人去翻阅。大家都在读介绍原著的文章，都不读原著。有个大学生在《共青团真理报》上号召读《资本论》，引起我的许多朋友的讥笑：这是专家的事，而且我们也读不懂这个《塔木德》。”<sup>②</sup> 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对莫斯科和基辅一些高等学校共青团积极分子询问的资料显示：在调查过程中，被征询过意见的一些文科院校的大学生公然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已经过时，而材料的内容落后于思想斗争不断变化的形式和方法。”<sup>③</sup> 苏联社会出现的信仰危机，对苏共中央所强制推行的意识形态划一，实际上已不屑一顾，表明苏共用强制灌输的方式构建起来的意识形态堤坝开始倒塌了，这是勃列日涅夫当政时期“持不同政见者”出现的社会思想基础。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顺应苏共党内一股顽固、僵化势力的要求，力图为斯大林恢复名誉，重树斯大林的偶像，全面向斯大林时代回归。这种回潮、倒退的趋势，是促使“持不同政见者”凸现的催生因素。

50年代中期，赫鲁晓夫从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开始，掀开斯大林模式黑幕的一角。随着赫鲁晓夫的下台，苏共党内依靠斯大林模式而生存、发育的僵化势力，迫不及待地想把刚刚掀开的黑幕的一角重新捂紧，以维护斯大林模式一成不变地延续下去。勃列日涅夫上台后的这种做法，使刚刚呼吸到由于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而透露进来的一丝新鲜空气的人，格外担心因此而被重新窒息。这种政治意识形态局势的出现，激活了“持不同政见者”。

196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20周年，苏共党内一部分人想借庆祝反法

---

① 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1卷，第151页。西尼查为苏共中央委员、苏共敖德萨州委第一书记。

② 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1卷，第145页。《塔木德》是犹太教经典。

③ 《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给苏共中央的简要报告（1976年12月12日）》，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1卷，第204页。

西斯战争伟大胜利之机，为斯大林恢复名誉。这样，围绕斯大林问题，实际上是围绕苏联社会的走向问题，激起了一场风波。

1965年4月7日，苏共中央书记杰米契夫在编辑人员会议的讲话中，批评苏联的各种报刊和大众宣传媒体：“纠缠不休地谈论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二十大的决议是正确的，但是不能把一切过错都归咎于九泉之下的斯大林。”<sup>①</sup>杰米契夫的话，就一般意义上说并没有什么不对。但是，作为苏共中央书记的讲话是有针对性的。问题在于1965年的时候，斯大林的错误才露出冰山的一角，根本就不存在“纠缠不休地谈论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和“把一切错误都归咎于九泉之下的斯大林”的问题。十分明显，杰米契夫的讲话是一种重树斯大林权威，向斯大林时代回归的舆论准备。所以，杰米契夫的话音一落，听讲的人就高喊“对！对！”<sup>②</sup>杰米契夫和苏共中央委员、苏共中央科学和学校部部长特拉佩兹尼科夫，在随后的一系列指示性讲话中提到：“赫鲁晓夫错误地、片面地否定斯大林在我党历史上的作用。已经到了‘纠正’赫鲁晓夫在这方面的主观主义的时候了。”<sup>③</sup>

1965年4月13日，苏共中央候补委员、《共产党人》杂志主编斯捷潘诺夫在杂志社党员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斯大林时说：“我们时常表现出片面性，而忽略了他（指斯大林——作者注）的功勋。”斯捷潘诺夫接着说：《共产党人》杂志曾经确定过如何评价斯大林的正确方针。于是，他援引1959年发表的《约·维·斯大林——纪念斯大林诞生80周年》一文的开头部分念道：“约·维·斯大林从青年时代起就将自己的生命与争取工人阶级摆脱资本主义奴役、建立新的社会主义社会而斗争的伟大事业联系在一起。约·维·斯大林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组织家，是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坚定的战士。他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劳动人民的利益，执行了党的崇高托付担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达30多年。他对党、苏维埃祖国和人民，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斯捷潘诺夫念完这一大段话之后，有人问：“这篇文章的作者是谁？”斯捷潘诺夫

---

① 《彼·尼·杰米契夫和瓦·伊·斯纳斯金在编辑人员会议上的讲话》。《政治日记（1965—1970年）》第2册，阿姆斯特丹亚历山大·赫尔岑基金会1972年俄文版，第11页。

② 《彼·尼·杰米契夫和瓦·伊·斯纳斯金在编辑人员会议上的讲话》。《政治日记（1965—1970年）》第2册，阿姆斯特丹亚历山大·赫尔岑基金会1972年俄文版，第11页。

③ 《政治日记（1965—1970年）》第2册，第15页。

不无得意地回答：“是我”。<sup>①</sup>

应当指出的是，1959年第18期《共产党人》杂志发表的编辑部文章对斯大林的评价，是在当时苏联所处的环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以及苏共中央内部矛盾的复杂形势下，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中央对斯大林问题的过程性认识。况且，就是这篇文章，在作了文章开头的这段对斯大林的肯定之后，接着就是谈斯大林的错误。斯捷潘诺夫拣出6年前的这篇文章，只念肯定的开头一段，其用意是十分清楚的。这样，在随后的一系列会议上，要求重树斯大林绝对权威的呼声，也愈来愈强烈。

1965年4月底，波斯别洛夫领导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受苏共中央的委托，草拟了一份纪念战胜德国法西斯20周年的专门提纲。这份提纲部分地修正了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对斯大林的评价。苏共中央在审查这份提纲时，有些人觉得它在重树斯大林权威问题上过于露骨而表示反对。因此，苏共中央主席团最终不敢采纳。但是，对敢于写卫国战争真实历史的历史学家，则毫不手软地予以迫害。

不难理解，为什么勃列日涅夫刚上台的1965年，苏联会出现要求重树斯大林绝对权威的小高潮。这种倒退思潮，是“持不同政见者”出现的催生因素。

除了这些苏联国内因素，当然还有西方世界的利用时代的变化，加紧煽动、渗透、支持的作用。

凡此种种因素，使得在勃列日涅夫当政时期，出现了“持不同政见者”。

“持不同政见者”一出现，即遭苏联当局的严厉镇压，他们所组织的社团大多很快瓦解。“持不同政见者”编辑的“私下出版物”虽然名目繁多，但是每种印数都非常有限，流通渠道窄小，辐射的范围基本上限于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高尔基市、新西伯利亚、明斯克等苏联的大城市。“持不同政见者”的群体虽然也有工人、国营农场职工，但是基本上是知识分子。因此，在整个苏联社会中，“持不同政见者”的影响是很有限的。甚至可以这样说：“持不同政见者”在国外的影响大于在苏联国内的影响。

不过无论怎样，“持不同政见者”的出现总是传承了俄国的人本主义精神。

---

<sup>①</sup> 参见《政治日记1965—1970年》第2册，第17页。

## 61. 勃列日涅夫是如何扼杀“布拉格之春”的？

叶书宗

勃列日涅夫当政时期中止了苏联的改革，也不许东欧各国进行改革。对不听命令，坚持改革的东欧国家，在百般恐吓、威胁仍然无效之后，勃列日涅夫居然打出“华沙条约联合武装部队”的旗号，纠集另外几个卫星国，对之实行武装占领，将“兄弟党”的领导人绑架到莫斯科，迫其签订城下之盟，停止改革。勃列日涅夫的做法，确实是赤裸裸的社会帝国主义行径。典型事例就是镇压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简称捷克）的改革。

### 捷克的“布拉格之春”

从中世纪开始，捷克的手工业、采矿业和金属冶炼业就非常发达，首都布拉格是东欧的经济中心。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捷克，是欧洲经济先进、自由议会制度运行比较规范的国家之一。1948年，在“冷战”的国际大格局下，苏联策动“二月事件”，把捷克拖进《华沙条约》和经济互助委员会（以下简称经互会），实行斯大林模式的计划经济。自此，捷克的经济每况愈下，陷入困境。

20世纪60年代初，捷共中央开始谨慎地酝酿经济体制改革。1964年10月，捷共中央公布了《关于完善国民经济计划管理的原则草案》（以下简称《原则草案》），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原则草案》的基本内容是：国家除保留制订中央长期规划的机构外，逐步把国家机器的有关部分转变为企业和超企业组合的行政机构，同政治性的国家机构分开；免除党机关活动中指挥经济的工作，把党的职能集中于政治工作和国家大政方针的决策工作；让企业成为尊重市场规律和生产效

率的经济活动独立实体；提高专业干部在企业中的地位和作用；重新解决工会、工人、企业行政干部在工厂和企业中所应发挥的作用问题，让企业的全体员工通过奖金（利润提成）直接感觉到管理不善的恶果，为此，必须让他们对管理拥有某种形式的发言权（建立某种形式的自治机构）。从这些基本内容来看，《原则草案》并未从根本上触动计划经济体制，仅仅是想逐步使政、企分离，党、政各司其职，使企业从原来的完全面对国家计划，半转地或者说是“一只眼睛盯着国家计划，另一只眼睛瞄向市场”。捷共中央还宣布：《原则草案》是供讨论的，并不马上实行。捷共中央第一书记、共和国总统诺沃提尼墨守成规，迟迟不肯启动改革，继续全面加强计划经济。1967年，全国经济形势更加恶化。这种局面，不仅使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民族之间的矛盾更趋表面化，而且汇集成对诺沃提尼当政的不满。

1968年1月4日，诺沃提尼被撤销捷共中央第一书记职务，杜布切克当选捷共中央第一书记。3月22日，诺沃提尼又被迫辞去共和国总统职务，反法西斯战争的英雄斯沃博达当选为共和国总统。接下来的重大人事调整是：切尔尼克出任政府总理；备受迫害的斯姆尔科夫斯基被任命为国民议会主席。捷共高层领导经过这番调整，改革才正式启动。

1968年4月5日，捷共中央全会通过了题为《捷克斯洛伐克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的改革纲领，通称《行动纲领》。《行动纲领》的内容分为5个部分：捷克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党的领导作用；发扬社会民主，建设新的政治管理体制；国民经济的提高和人民生活水平；科学和文化教育事业。《行动纲领》的基本精神，正如该文件最后所说的，是：“坚持走捷克斯洛伐克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将进行试验，赋予社会主义发展以新的形式。捷克斯洛伐克有责任总结和利用自己比较先进的物质生产基础、非常高的教育水平和无可置疑的民族传统，走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承担起捷克斯洛伐克对国际命运负有的使命。”“我们要创造一种条件，使每一个关心社会主义事业和各族人民事业的真正的公民都能感觉到，他们是自己国家命运的主宰者，是必不可少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因此，行动纲领应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复兴的纲领。”<sup>①</sup>《行动纲领》还具体地规定了恢复新闻自由、企业独立进行经营活动、私营企业合法地位等一些措

<sup>①</sup> 《政治日记1964—1970》，阿姆斯特丹赫尔岑基金会1972年俄文版，第331页。

施。《行动纲领》的公布，标志着捷克社会跨进被称做“布拉格之春”的改革阶段。

1968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布拉格的群众举行节日游行，充分表明了人们对改革的态度。游行不再是按单位组织起来、高喊捷共中央提出的口号、排着队列齐步走的“导演游行”。人们自己汇集起来，举着能表达他们自己意见、思想的标语。标语的内容有表达对党和政府的支持，也有批评，就连颜色也不再是单一的红色。这样的节日游行，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是从未有过的。观看节日游行的杜布切克说：“人群自然流露的同情、支持之情，征服了我。”在游行的人群中，还显眼地出现了两个非官方组织：“非党人士俱乐部”和“231俱乐部”。“231俱乐部”的基本成员是大清洗中幸存下来的一些老干部和社会名流，主张尊重宪法，要求“按照捷克斯洛伐克刑法第231条，对那些专搞迫害的人处以‘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罪’，予以惩处”。它是1968年3月31日，经捷克内务部批准成立的。“非党人士俱乐部”在以后的日子里越来越主张自由化，被捷克政府取缔。

捷克上下都期待着改革能使国家繁荣起来，能给人民带来幸福。

### 苏联的横暴干预

苏联一直紧盯着以复兴社会主义为号召，以摆脱斯大林模式、建设捷克式社会主义为目标的“布拉格之春”改革的进程，对杜布切克当选捷共中央第一书记尤为关注。

亚历山大·斯捷潘诺维奇·杜布切克生于1921年。其父是斯洛伐克族，曾参加奥地利社会民主党，1912年移居美国，1921年返回斯洛伐克。1925年，杜布切克的父亲变卖了全部家产，随同捷克工人自发成立的“国际援助合作社”，来到苏联中亚地区的吉尔吉斯斯坦定居，援助苏联的经济恢复工作。杜布切克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就是在苏联度过的，在苏联接受共产主义的启蒙教育。杜布切克的父母加入了苏联国籍，参加高尔基汽车厂的建设，因不堪忍受大清洗的恐怖，于1938年11月回到捷克。1939年，杜布切克加入捷共，参加了1944年8月的斯洛伐克民族反法西斯占领大起义。

捷克重新建国后，杜布切克先后担任过工厂党委书记、地方县委书记、州委

第一书记等职务。1955年，他被选送进苏共中央高级党校学习，1958年毕业，并且拿到表示学习优秀的红色毕业证书。1958年9月，杜布切克被任命为捷共西斯洛伐克州委第一书记，当选捷共中央委员。1963年4月，杜布切克当选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68年1月，当选捷共中央第一书记。在勃列日涅夫看来，杜布切克是一位久经各种革命环境考验和工作锻炼、由苏联培养起来的干部。因此，杜布切克上台，是得到勃列日涅夫的支持的。杜布切克上台后，举行中央全会，没有征得苏共中央的同意就重组了捷共中央主席团、书记处，共和国国民议会、共和国政府等全套领导班子，撤换了军队、保安部队、司法、监察等国家要害部门的领导人，特别是4月5日通过了实施复兴社会主义改革的《行动纲领》。以此为分界，勃列日涅夫和苏共中央对杜布切克和捷共中央，由支持、观察、斥责，转为施加压力，直至必欲去之而后快。

杜布切克上台之后，苏联驻捷大使契尔沃年科和大使馆，随时将捷共中央和杜布切克的举动，以及捷克社会各方面的动态，详细报告苏共中央。勃列日涅夫多次主持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捷克的局势和苏联的对策、措施。1968年3月15日，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对杜布切克的期望不要太大，他可能飞走，因为他控制不了正在发生的事件。”苏共中央书记波诺马廖夫提出：应当由苏共中央政治局直接致函捷共中央主席团，“指出他们那里发生了报纸、广播、电视等的猖狂叫嚣，指出这一切的目的在于使捷克脱离社会主义阵营，脱离苏联”。波诺马廖夫特别强调：“形势的确很严重。现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势和1956年10月匈牙利的形势非常相似。当年的匈牙利就是这样一步步走过来的。”<sup>①</sup>这时，勃列日涅夫离开会议室，给杜布切克打电话，说明要给捷共中央写信，“希望”他们采取有效措施，以控制已经出现的严重局势。由于杜布切克坚决反对，这封信没有写。4月9、10日两天，苏共中央举行全会，勃列日涅夫在会上作了题为《国际形势中的迫切问题和苏联共产党为保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斗争》的报告。勃列日涅夫在报告中根据苏联所收集到的“实际材料”，评论了捷克的局势，表示：当苏联感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决不能漠然置之。会后，勃列日涅夫和苏共中央还动员东欧其他几

<sup>①</sup> 见拙作《回眸“布拉格之春”——1968年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揭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17页。

个国家，共同对捷克施加压力。

1968年5月3日晚上，杜布切克等捷共领导人被“邀请”到莫斯科去“谈一谈”，实际上是被召到莫斯科，听取苏共中央的训诫。5月4日，双方代表团举行“会谈”。勃列日涅夫气势汹汹地对捷共提出一大堆责难：允许公开成立反革命组织；宣传舆论阵地失控；党不能控制局势；允许资本主义经济自由发展；军队不听指挥，等等。勃列日涅夫还念了很多“材料”：一些县的报纸发表了什么样的文章；哪些地方开了哪些会；哪些人在会上讲了哪些话，等等。杜布切克解释：党不仅没有失去在社会中的领导作用，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赢得各社会团体和各民族更多的支持；至于说到大众媒体，政府已不对报纸的内容负责；报纸上大多支持党的政策，有些批评也是多样性和自由度的表现；经济改革是保障广泛的非集中化和经营者的主动性，激励对更好的效率给予更高的报酬；允许小企业合法化是为了改善市场状况和方便人们生活，不会导致在小企业中形成敌对的、反国家的基础。听到这里，勃列日涅夫顶着说：“小手工业者？这我们将会认得！你们的拔佳先生在未盖工厂之前，也是个小鞋匠！”<sup>①</sup>勃列日涅夫还责问捷共中央：“要复兴什么？究竟要把捷克引向何方？”捷克要求苏方提供4亿至5亿卢布贷款，被苏联拒绝。会谈持续了9个小时，不欢而散。发表的会谈公报只是冷冷地说：会谈在“同志般的气氛”中进行。

5月8日，苏共中央背着捷共，将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国务委员会主席日夫科夫，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国务委员会主席卡达尔，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国务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哥穆尔卡，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第一书记、民主德国国务委员会主席乌布利希召集到莫斯科，举行高级会谈，协商集体制裁捷共问题。哥穆尔卡、乌布利希力主对捷克采取“及时的警察行动，以便在杜布切克这个‘毒瘤’还没有扩散之前就予以切除”。日夫科夫也赞成这样做，说：保加利亚可以派出一支象征性的部队。可是，卡达尔不赞成由经互会出面对捷克实行经济制裁，更不赞成对捷克采取军事行动。卡达尔的态度，使勃列日涅夫只好声明：这次会晤仅仅是交换意见，目的是寻找帮助捷克渡过危机的更好途径。

---

<sup>①</sup> 转引（捷）亚·杜布切克著，黄英尚译：《杜布切克回忆录》，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174页。拔佳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驰名世界的捷克制鞋企业。

为了给军事行动做准备，华沙条约缔约国武装力量于6月18日在捷克举行军事演习。16000名装备精良的苏军开进捷克。演习结束以后，苏军又赖着不走。后经捷共中央一再交涉，苏军只是撤至捷、苏边境。这支部队在后来的军事入侵中也就驾轻就熟了。

虽然遭遇苏联的阻挠和责难，杜布切克和新的捷共中央顶住压力，仍然按照《行动纲领》的规定和部署，推进改革。勃列日涅夫在愈来愈倾向采取军事手段来解决问题的同时，仍然希望同杜布切克举行一次秘密会晤。几经磋商，双方约定于7月29日，在捷克紧邻苏联的边境小镇切尔纳举行会谈。

7月29日至8月1日，捷共中央代表团和苏共中央代表团在切尔纳举行会谈。捷共为这次会谈确定的方针是：捍卫党的《行动纲领》；防止同苏联决裂。具体要求是：坚持社会主义、同盟（华沙条约）、主权和自由。应当说，捷共确定的会谈方针是正确的，但是贯彻这一方针也是极为艰难的，因为苏共的目标就是胁迫捷共停止改革。会谈中，苏方始终盛气凌人，说话都是责难和命令式的，会谈几度陷入僵局，几近破裂。捷共在守住既定方针底线的前提下，实际上是做了一个主权国家无法再退的让步。最后，捷共承诺：不许克里格尔（坚定的爱国者和改革者——作者注）担任捷克民族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职务；不许齐萨日（清醒的思想家和改革者——作者注）担任捷共中央书记；不许社会民主党存在；取缔“非党人士俱乐部”和“231俱乐部”；恢复新闻检查制度。

会谈过后一星期，勃列日涅夫就不断地打电话，责问杜布切克“为什么不执行切尔纳的承诺”。杜布切克忍气吞声地解释：这样重大的人事变动，要经过预定于8月底举行的捷共中央全会，以及9月举行的捷共第14次代表大会。勃列日涅夫威胁说：这将迫使苏联采取“新的独立措施”。气得杜布切克在电话里要求勃列日涅夫解除他的捷共中央第一书记职务。<sup>①</sup>

## 武装占领捷克

勃列日涅夫和苏共中央之所以没有对捷克作出实行军事制裁的最后决定，主

---

<sup>①</sup> 通话内容详见《回眸“布拉格之春”——1968年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揭秘》，第199—206页。

要顾忌有二：一是美国将会作出怎样的反应；二是华沙条约内部的问题，因为卡达尔仍持反对意见。7月22日，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拜会美国国务卿腊斯克，探询如果苏联对捷克采取极端措施，美国将作何反应。腊斯克表示：美国不想干涉捷克的事务。“美国政府对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评论力求保持克制。我们不想干预或参与这些事件。因此我们特别惊讶，苏联想让我们也卷入这些事件……美国从一开始就不想介入。”<sup>①</sup> 匈牙利的卡达尔最终也被勃列日涅夫“说服”，同意对捷克采取联合的军事行动。

这样，勃列日涅夫就打消了所有顾虑，决心对捷克采取军事行动。

7月22日，苏共中央政治局紧急制定对捷克实行军事制裁的具体工作，包括：通过决议，认为有必要派遣华沙条约缔约国联合武装部队进驻捷克斯洛伐克，撤换捷克的党、政领导；以捷共中央主席团和捷克斯洛伐克“革命政府”名义，起草致捷克斯洛伐克公民、军队的呼吁书，等等。这些文件，统统在7月26、27日两天的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军事行动付诸实施的时间，待切尔纳会谈结束后，选择适当的时机。

苏共中央将军事行动的时间选定为8月20日，是在8月10日前后。

8月10日一过，待命的苏军进入出击阵地，处于临战状态。8月16日，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华沙条约缔约国联合武装部队总司令雅库鲍夫斯基元帅、苏军总政治部主任叶皮谢夫大将，抵达柏林，视察出击部队的临战状态。第二天，他们又赶到华沙，检查出击部队的战斗准备状况。同一天，即8月16日，苏共中央政治局还指示苏联驻捷大使契尔沃年科，对捷共内部的“健康力量”进行策反工作。8月17日，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决定8月20日，出兵占领捷克。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还最后批准了《苏共中央政治局致捷共中央主席团的信》、《致捷克斯洛伐克公民和军队的呼吁书》；指示做好比拉克、英德拉、科尔德、巴尔比雷克、什维斯特卡等“健康力量”的工作；草拟了《捷共中央主席团和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宣言》。这个“宣言”说：“爬上党和国家领导层的右翼修正主义分子，向人民作了种种许诺，实际上却是一些政治上身败名裂的人……捷共中央主席团和我国政府为了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倡议团结所有

---

<sup>①</sup> 引自（俄）皮霍扬：“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莫斯科的观点，根据苏共中央文件”，（俄）《近现代史》1994年第6、7期。

爱国力量。反动派挑起的残杀同胞的战争威胁，使我们必然要求助于苏联和其他兄弟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盟友答应我们的请求，在面临考验的困难时刻派兵支援我国。捷共中央主席团和革命政府号召全体公民，给协助我国的盟友部队以大力协助。”<sup>①</sup>此外，这个“宣言”还历数杜布切克奉行的政策的种种“错误”；允诺新的“革命政府”将给予人民的种种“优惠”；论证捷克必须与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外交政策上保持一致的正确性。苏共中央政治局指示苏联驻捷大使契尔沃年科将这份“宣言”的文本，转交给捷共中央的“健康力量”比拉克和英德拉。

8月18日，准备跟随苏联一起出兵的华沙条约各缔约国领导人飞抵莫斯科。勃列日涅夫向他们作了即将开始的军事行动的最后布置和说明。乌布利希、哥穆尔卡、卡达尔、日夫科夫等都表示，将毫无保留地执行苏共中央的决定。8月19日，勃列日涅夫召集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各州委和边疆区委第一书记、各自治共和国第一书记到莫斯科，向他们报告即将对捷克采取军事行动的决定，指示他们做好一切准备工作。苏共中央政治局指定苏联国防部副部长、苏联陆军总司令巴甫洛夫斯基大将担任入侵捷克的军队总指挥，出动的兵力是：苏军16个师，约17万人，其中10个师来自苏联本国，6个师是驻民主德国的苏军；波兰正规军3个师，约4万人；民主德国2个师，约15000人；匈牙利2个师，约15000人；保加利亚1个师，约5000人（不满员）。从军事上说，保加利亚军队是无足轻重的。勃列日涅夫是出于“华沙条约缔约国联合行动”的政治考虑，让保加利亚参加苏联的这一行动。这支保加利亚军队，先从保加利亚的黑海港口瓦尔纳空运到苏联的黑海港口敖德萨；再从敖德萨空运到民主德国与捷克相邻的厄尔士山脉一线出击阵地，然后行动。如此复杂的“远征”，是因为罗马尼亚坚决拒绝保加利亚军队过境，飞越其领空。

进入8月份，军事入侵已迫在眉睫，而捷共中央反认为和苏共之间的激烈矛盾已有所缓和，忙于准备定于9月召开的第14次党代表大会，根本没有想到会发生军事入侵。8月20日下午2时，捷共中央主席团按计划召开主席团会议，讨

---

<sup>①</sup> 见拙作《回眸“布拉格之春”——1968年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揭秘》，第209—210页。

论第14次党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

20日下午4时左右，布拉格鲁津机场指挥台接到两架苏联民用客机称“出现机械故障”，要求临时降落的信号。飞机安全着陆后，停靠在机场大楼前的停机坪上。飞机上走下来几十名穿统一服装、手提统一箱子的壮汉。机场警卫人员以为是运动员，并未在意。午夜11时，原本安静地坐在机场候机大厅里的这些苏联人，突然从各自的行李箱里取出手提机关枪，按各人选定的位置，闪电般地占领了机场的各要害部门。原来这批“乘客”是苏联特种部队的突击队员，那两架声称“出现机械故障”，降落在鲁津机场的飞机，是活动雷达站。3分钟后，苏联巨型运输机装载着坦克和士兵，在活动雷达站的指挥下降落。坦克冲出机舱，迅速占领了整个机场。接着，每隔一分钟就有一架苏联运输机降落，坦克、装甲车、大炮、全副武装的士兵和各种军用物资，倾泻而出。苏联大使馆派来的“向导”也进入机场，带领刚着陆的苏军，扑向布拉格的捷共和捷克政府的各要害部门，以及伏尔塔瓦河上的各座桥梁。

也是在午夜11时，已等待在出击阵地上的苏联、波兰、匈牙利、民主德国、保加利亚等华沙条约缔约国的武装部队，分为8路，潮水般地涌入捷克。入侵者没有遭遇抵抗，就像不久前来捷克举行军事演习一样。

捷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举行到午夜11时半左右，主席团委员、政府总理切尔尼克被喊到隔壁听电话。听完电话，切尔尼克回到主席团会议室，向大家报告说：“国防部长楚尔打来电话，报告华沙条约5国（除罗马尼亚外）的部队已经越过国境，进入捷克，到早晨6时全国将被占领。他在办公室里已被两名苏联军官扣押，只准许给总理一人打电话。”主席团会议室在短暂的骚动之后，很快平静下来。面对这一激剧的局势变化，主席团首先要决定：该怎么办？这时，总统斯沃博达也赶来了。主席团首先决定：谁都不能辞职，一切合法成立的机构及其领导人都必须坚守岗位；决不能在武装干涉下成立新机构，搞新的任免；武装抵抗无论从军事上或者从政治上考虑，都是不可取的，也不现实，决定号召全国人民“保持平静”，对从境外开进来的军队“不要进行抵抗”。

捷共中央主席团做出“不要进行抵抗”的决定，是现实的考虑。现实的情况是：捷克拥有4个坦克师、8个机械化步兵师、1个伞兵旅，约145000人；此外还有500架作战飞机、4万空军部队。这样的军事实力，更重要的是毫无战斗准备，加上指挥系统、通讯联络系统、情报系统，全被苏联控制。这样的军事状

况，仓促之间上阵想与有备而来的苏军对抗，确是难以想象的。如果发生战斗，反而正中苏共中央下怀：苏军就可以像1956年10月入侵匈牙利那样，名正言顺地前来“镇压反革命叛乱”。

对于苏军的入侵，主席团决定，以捷共中央主席团的名义，发布《告全国人民书》。《告全国人民书》说明：对苏联等5国军队的入侵，捷共中央和政府都蒙在鼓里；号召全国保持平静，不要进行抵抗，各级干部都要坚守岗位；严正表示5国军队的入侵违反了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基本原则，破坏了国际法的基本准则。

8月21日凌晨4时，苏军占领了捷共中央大厦。上午9时，苏军将杜布切克、斯姆尔科夫斯基、克里格尔、切尔尼克等4人，武装劫持到莫斯科，拘禁起来。

苏联率领波、匈、保、民德的军队占领捷克，按原计划是扶持比拉克、英德拉等“健康力量”，组成“革命政府”；苏军是应“革命政府”的请求，前来拯救捷克的社会主义事业，镇压国内外的反革命颠覆活动，并顺理成章地将杜布切克等人送上“革命法庭”。8月21日凌晨5时25分，苏联塔斯社通过捷克的伏尔塔瓦电台，向全世界发表声明：“捷克党和政府向苏联及其他盟国提出请求，希望给予兄弟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以紧急援助，包括武装部队的支援在内。苏联和其他盟国部队已于8月21日进入捷克领土。”但是，是哪些捷克党、政领导人向苏联和其他盟国提出请求？这些人的首脑又是谁？世人在等着回答，苏联也急着在拼凑。

8月21日凌晨，杜布切克等人刚被苏军绑架，比拉克、英德拉、科尔德等人，在苏联驻捷大使契尔沃年科的陪同下，要求总统斯沃博达“委托英德拉组织政府”，被总统严词拒绝。下午3时，他们再次要求总统批准“政府名单”。斯沃博达告诉他们：有关党的问题，只能同杜布切克交谈；切尔尼克是捷克合法政府总理，有关政府的事只能同切尔尼克商讨。斯沃博达还告诉苏联人：必须立即释放被捕的捷克党、政领导人，否则，任何谈判都是不可能的。在两天的时间里，苏联拼凑“革命政府”的种种努力完全失败了。而捷克全国从苏联及其他几国的军队入侵开始，几乎是全民自发地出动，涌上街头，把入侵的士兵和坦克围起来，向他们吐唾沫、扔脏东西。全国上空响彻“杜布切克”、“俄国佬滚回去”的吼声。市民还把布拉格街道的路名牌全部刷掉，写成“杜布切克大街”、“切

尔尼克大街”、“斯姆尔科夫斯基大街”，等等，入侵的苏军，连路都找不到。这样，捷克的武装部队虽然没有抵抗，但是全国老百姓却以这种方式一致对外，是世界上小国遭大国入侵的历史上所从未有过的。入侵的苏军几乎一筹莫展。捷克把这形象地比作“大象踩不断绣花针”。巴甫洛夫斯基为首的占领当局和契尔沃年科大使，连连向莫斯科请示：下一步怎么办？莫斯科的决策者们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下一步怎么办？

斯沃博达向苏联提出：必须释放被他们逮捕的捷克党、政领导人；苏、捷双方只能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经过考虑，勃列日涅夫和苏共中央只好接受这一建议。8月23日，杜布切克、切尔尼克、斯姆尔科夫斯基、克里格尔从苏军的“俘虏”、囚犯，又成为苏联的“客人”，苏、捷双方又开始举行“会谈”。

会谈开始后，勃列日涅夫说了一大通话，意思是：咱们不谈过去的事，也不争辩谁对、谁错，让咱们来讨论怎样解决已经出现的局势。勃列日涅夫的意思很清楚：不谈明目张胆地对一个主权国家实行军事占领，只要捷克帮苏联解决由于实行军事占领而造成的进退两难的处境。但是，杜布切克坚持说：“在捷共中央全会之前，在捷共第14次代表大会之前，也根本不通知捷共中央主席团、国民议会、总统、政府总理和我本人，就采取了五国军事措施，不仅使我党和贵党之间，也使国际共运面临国际共运历史上从未遇到过的、最复杂的问题。”<sup>①</sup>苏共中央仍然想立即去掉杜布切克等人，另组捷克的党、政领导班子。但是，无论是斯沃博达或者切尔尼克，都不能接受。而且，比拉克、英德拉等人在这几天中的表演，已使他们在捷克国内声名狼藉。苏共中央最后只好放弃立即搞掉杜布切克等人的打算，但是要杜布切克承认：“捷克国内存在着反革命复辟的现实活动；五国军事干预是正确的、合法的。”根本不提撤军问题。双方谈判一直延续到8月26日午夜。这是一次名副其实的刺刀下的谈判。其间，勃列日涅夫曾抛开“思想与理想”等词汇，实话实说：“捷克斯洛伐克自最后一次战争结束以来就是苏联安全区的一部分，苏联无意放弃它。出现了‘布拉格之春’，苏共中央担心它走向独立。杜布切克的那些讲话稿没有经过苏共中央批准，干部的调整也没

---

<sup>①</sup> 《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波德戈尔内、沃罗诺夫同杜布切克会谈速记记录摘录（1968年8月23日）》，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31卷，第306页。

有征得苏共中央的允许。对此，苏共中央是不能容忍的。”<sup>①</sup>这些话，确是显出了勃列日涅夫的“军人本色”。当捷克代表团中有人不赞同这一说法时，勃列日涅夫立即站起来，脸涨得通红，浓眉紧蹙，大声喊叫，转身走出会场。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其他人也站起来，像军人那样跟着勃列日涅夫走出会场。

苏共中央不仅以刺刀威胁捷克代表团，更以屠杀捷克国内和平居民相要挟。杜布切克等人纵然以死相抗争，但是为了保护国内无辜的和平居民，最后也只能妥协。8月26日午夜，捷、苏两国签署了《莫斯科会谈公报》。公报不再提捷克发生了“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势力进攻”；但是抹去了《行动纲领》，即抹去建设捷克型社会主义的改革；捷克不再提出将捷克局势提交联合国安理会讨论；捷克重申对华沙条约的承诺，毫不动摇地履行社会主义各国间多边的或双边的协议规定的义务。8月27日凌晨，捷克代表团的全体成员返回布拉格，杜布切克等人总算是劫后余生。

8月31日、9月1日，捷共中央在苏军的占领下召开全会，把克里格尔、里戈、卡佩克、什维斯特卡等坚定的改革派“开除出党中央主席团”，免除齐萨日党中央书记职务。10月中旬，捷克被迫与苏联签订《关于苏军暂时留驻捷克境内条约》。这项条约规定：捷克向苏联驻军提供一切设施，承担一切费用；苏联驻军及其家属享有治外法权。

苏军入侵捷克，全世界的共产党人和主持正义的社会主义国家，几乎齐声谴责苏联的侵略行径。“留驻”条约签订后，捷克人民也没有停止抗议活动。1969年1月8日，布拉格查理大学哲学系学生帕拉赫，为抗议苏军占领而当众自焚。帕拉赫的慷慨赴死，震动了全捷克，全国再次掀起抗议苏军占领的新高潮。

面对这样的局势，苏联也更加紧了控制。1969年1月16日，斯姆尔科夫斯基被解除了国民议会主席职务（一年以后又被“开除”出捷共中央委员会）。4月17日，胡萨克“当选”为捷共中央第一书记。杜布切克被赶出捷克，任捷克驻土耳其大使（一年后被召回国，“开除”出捷共，并被宣布为“人民和民族的敌人”）。1970年6月，切尔尼克被解除政府总理职务，并被“开除”出捷共。到1970年，胡萨克在苏共中央的指使下，先后将4名捷共中央书记、9名州委第一书记、59名县委第一书记“开除出党”。1970年12月，胡萨克召开捷共中央

---

<sup>①</sup> 引自《杜布切克回忆录》，第234页。

全会，全盘否定“布拉格之春”改革，全面接受“苏联帮助捷克保卫社会主义成果”的观点。“布拉格之春”在苏军坦克的碾压下凋零了！

捷克改革开始后，东欧各国党内的很多领导人急欲跟着起步，又不敢贸然行动，实际上是看着捷克。苏联武装占领捷克，绑架捷克党、政领导人，慑于人民和世界正义舆论的压力，才不敢予以杀害。勃列日涅夫和苏共中央对改革事业的仇恨、对付改革者的凶残手段，一时间确实镇住了东欧各国。此后的十几年里，东欧各国沉寂了。但这毕竟只能是暂时的。社会走向自由、民主、和谐的步伐，不是暴力所能镇压得住的。再者，施暴者也不是永远具备施暴的条件。比如，后来苏联在对付波兰的团结工会，就显得力不从心了。

## 62. 苏联入侵阿富汗造成的严重后果是什么？

叶书宗

1979年12月，苏联以“应卡尔迈勒为首的新的党和国家的领导集体请求”，“履行自己的国际主义职责”为名，大举入侵阿富汗。1989年2月，苏联被迫从阿富汗撤回10万余军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从阿富汗撤回国的苏军，正好赶上为苏联送葬。苏联制造的、前后跨十年的阿富汗战争，不仅使阿富汗全国近一半人口流离失所，约100万人丧生，财产损失难以计数，即使对苏联来说后果也极其严重。

### 苏联一手制造阿富汗频繁政变

地处亚洲中西部、伊朗高原东缘的阿富汗是个内陆国家。它西邻伊朗，北面与苏联有2400公里左右的边界线，东、南紧贴巴基斯坦，领土面积65万平方公里。20世纪70年代全国人口1600余万，信奉伊斯兰教，90%是农、牧民，国民收入的80%靠农业。1978年，全国人均国民收入折合155—160美元，<sup>①</sup>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几个国家之一。人口中第一大民族是普什图人（阿富汗族），其次为塔吉克、乌兹别克、土库曼和哈萨克人。19世纪30年代，英国侵入阿富汗，挤走沙皇俄国已经伸进来的触须。阿富汗人民经过三次抗英斗争，终于在1919年

---

<sup>①</sup> 统计数据见《苏联驻阿使馆关于阿富汗经济状况的报告（1980年9月15日）》，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32卷，下册，第469页。

恢复独立。1963年，国王查希尔通过修改宪法，规定王室成员不得参政，迫使国王的堂兄达乌德辞去首相的职务。对此，达乌德一直心怀不满，找到一直觊觎阿富汗的苏联为靠山，策划重新上台。1973年7月17日，达乌德乘查希尔国王在国外治病之机，发动政变，废黜国王，宣布成立阿富汗共和国。达乌德自任国家主席兼政府总理、国防部长、外交部长、最高经济委员会主席。1977年2月，达乌德就任阿富汗共和国第一任总统。

达乌德上台之初，积极奉行亲苏政策，深得苏联领导的赏识。苏联乘机积极向阿富汗渗透。1974年6月4—8日，达乌德正式访苏，双方会谈后确认：苏联和阿富汗之间充满信任和相互谅解精神的友好睦邻关系正在顺利发展。期间，苏联迅速向阿富汗派遣了2000多名经济技术专家，提供126500万美元贷款。特别是苏联大力扶持1965年1月1日成立的阿富汗人民民主党，作为苏共在阿富汗的分支机构。该党纲领规定：党的任务是“为取得反帝、反封建的民族和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为夺取政权，建立一个劳动人民的国家而奋斗。党的最终任务是在阿富汗社会的多民族条件下，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的普遍规律建立社会主义国家”。<sup>①</sup>可是，由于苏联做得太露骨，以致好景不长。达乌德因不满苏联的过分干预和控制，从1975年开始，就清洗了一些亲苏势力，并向苏联以外的世界寻求援助。达乌德在外交上拒绝苏联倡导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表示奉行不结盟政策。凡此种种，都招致苏联的忌恨。1977年4月中旬，达乌德访苏，勃列日涅夫亲自“规劝”他改变疏远苏联的政策，达乌德回答：“我是一个独立国家的总统。”勃列日涅夫又要求达乌德“驱逐在阿富汗的所有帝国主义专家”。达乌德回答：“一旦不再那样需要他们，将放走所有外国专家。”<sup>②</sup>在两国具体的经贸关系上，达乌德迫使苏联与之签订新的协定：自1977年始，阿富汗向苏联供应的天然气价格提高35%；1977年前已经提供的天然气，苏联按原价给予18%的补偿。<sup>③</sup>达乌德的离苏倾向，使勃列日涅夫准备换马。

达乌德也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苏联对自己的不满和威胁。出于自身统治地位

---

① 引自（俄）利亚霍夫斯基著：《阿富汗战争的悲剧》，刘宪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4页。

② 引自《阿富汗战争的悲剧》，第26页。

③ 《苏联驻阿使馆呈报的1978年4—5月阿富汗大事记（1978年6月10日）》，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2卷，上册，第9页。

安全的需要，达乌德于1978年4月26日逮捕了包括塔拉基、卡尔迈勒等在内的7名阿富汗人民民主党领导人，罪名是：“违反了阿富汗宪法第46、47条的规定。”第二天，4月27日，阿富汗人民民主党的另一位领导人阿明立即发动军事政变，指挥第4坦克旅攻入总统府，打死达乌德一家，以及身兼政府副总理、外交部长等要职的达乌德的弟弟等30余人。达乌德一家，几乎被满门抄斩！政变发动者经过10小时的战斗就大功告成，以后就称之为“阿富汗10小时的四月革命”。4月30日，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宣布成立，人民民主党总书记塔拉基任阿富汗革命委员会主席、政府总理，阿明任政府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当天，苏联就宣布承认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四月革命”是打着苏共印记的阿富汗人民民主党策动和实施的。据此，某些西方媒体和我国的史学著作认为“四月革命”是苏联策动的。<sup>①</sup>但是，这种判断至今还缺乏档案文献的证实。根据目前接触到的史料表明，苏联没有参与“四月革命”。尽管如此，这也并不影响苏联对政变成功所流露的兴奋和对塔拉基政权的支持，因为推翻达乌德政权，让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掌权，正是苏联梦寐以求的。

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掌权后，立即表示要以苏联为榜样，建设社会主义。7月11日，塔拉基对苏联驻阿富汗大使普扎诺夫说：“阿富汗的革命所以胜利和发展，是因为有苏联、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帮助和支持。作为苏联的邻邦，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希望能成为社会主义大家庭自然的参加者和成员。”<sup>②</sup>当天，阿明又向这位苏联大使表示：“阿富汗革命是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也是世界许多国家的榜样。我们总是从十月革命的思想中汲取精神力量，许多阿富汗革命者都接受过伟大的列宁的著作的教育。”阿明还说：“我们对苏联朋友没有秘密，因为我们总是想用四点基本品质教育党员，这就是爱国主义、马克思主义、苏维埃主义、国际主义。”<sup>③</sup>

人民民主党当政后，立即仿效苏联“军事共产主义”的一套做法。塔拉基表

---

<sup>①</sup> 见刘国温、郭辉著：《强弩之末——前苏联入侵阿富汗秘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36—39页。

<sup>②</sup> 《普扎诺夫同塔拉基会谈记录（1978年7月11日）》，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2卷，上册，第16页。

<sup>③</sup> 《普扎诺夫同阿明的会谈记录（1978年7月11日）》，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2卷，上册，第18—19页。

示：“准备用五年时间完成苏维埃政权在60年来所做的事。”于是，全国开始对工商企业、农村、宗教领域，实行“全线社会主义改造”。清洗运动更是大规模地开展。有不同意见的军官、国家干部、党务工作者、政治组织领导人、部落代表和宗教界人士，均遭镇压。阿明曾以“请部落代表到喀布尔谈判”为名，一次就诱杀了500名部落首领。清洗运动在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内也猛烈地开展，清洗的重点是以卡尔迈勒为首的“旗帜派”（与塔拉基有政见分歧的派别——作者注）。属于“旗帜派”的副总统、国防部长、内政部长、计划部长等9名人民民主党中央委员被开除出党，大多遭杀害。卡尔迈勒因为得到苏联的庇护，留居在捷克斯洛伐克。

1979年初秋，塔拉基和阿明之间的矛盾又白热化了，彼此形同水火，都想除掉对方。

1979年9月初，塔拉基出席在哈瓦那举行的第6次不结盟国家政府首脑会议后，回国时路过莫斯科，和苏共中央举行了密谈。9月10日，勃列日涅夫接见了塔拉基，并提醒他：“根据苏联情报侦察机关得来的材料，应当注意面临的危险。”<sup>①</sup>勃列日涅夫甚至劝塔拉基暂时留在莫斯科，待局势安定之后再返回喀布尔。塔拉基对勃列日涅夫的提醒表示感谢，并说将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但是坚持返回喀布尔。

这些情况都被阿明侦知，并决定抢先动手，除掉塔拉基。

1979年9月14日，阿明不顾塔拉基的反对，解除了3名塔拉基的亲信的部长职务，并改组了内阁。当天下午3时，塔拉基在与苏联驻阿富汗的3名代表密商之后，打电话请阿明到总统府办公室“商谈工作”。碍于苏联代表承诺保证其人身安全的情面，阿明带着8名贴身保镖及警卫队来到总统府。阿明刚进入总统府即遭预先埋伏的枪手的密集枪击。阿明因有保镖们筑成的“人体碉堡”的遮挡，只伤了手；8名保镖全被击毙。阿明在警卫队的掩护下逃回国防部后，立即命令喀布尔卫戍部队进攻总统府，逮捕了塔拉基。9月15日晚，阿明召开人民民主党中央政治局会议，宣布：解除塔拉基及其“一伙人”的一切职务，并开除出党。16日清晨，阿明又召开人民民主党中央全会，选举自己为人民民主党中

---

<sup>①</sup> 引自（俄）克留奇科夫著，何希泉等译：《个人档案（1941—1994）——克留奇科夫狱中自述》，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第176—177页。

央总书记。革命委员会跟着任命阿明为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总统。

经过9月14日政变、阿明当权之后，阿富汗政府强烈地、公开地表示对苏联的不满。10月8日，阿富汗外交部长瓦利在会见社会主义国家外交使节时，公开表示不满苏联参与暗杀阿明的计划。在场的苏联外交官萨弗龙丘克当即质问瓦利：“您是否明白，这样毫无根据的指责会给苏阿关系带来无法挽救的损失。”<sup>①</sup>瓦利根本不理苏联外交官的抗议。

政变发生后，苏共中央政治局曾指示苏联驻阿富汗代表，向阿明转达苏共中央的“意见”：“塔拉基下台后，不应对他采取任何迫害措施，或者进行什么审判。”<sup>②</sup>阿明对苏共中央的“意见”不屑一顾。10月9日凌晨，阿明下令将塔拉基活活闷死。10月10日，阿富汗各大报同时发表一条短讯：前革命委员会主席塔拉基“久病之后于昨日清晨病重去世。死者的遗体已于昨日埋葬在其家族墓地”<sup>③</sup>。

苏共中央一心想除掉阿明，结果因计划不慎，反被阿明抢先得手。勃列日涅夫为塔拉基的死而深深地难过，并为未能劝说他留在莫斯科而内疚。事后，勃列日涅夫多次对安德罗波夫伤心地说：“你带给我的材料（指克格勃收集的有关阿明密谋除掉塔拉基的材料——作者注），我都给他（塔拉基）看了，并对他讲，情报侦察部门保证消息是可靠的。”<sup>④</sup>因此，即使从感情上说，苏共中央也不能接受阿明。1979年9月15日，苏共中央选定对阿富汗的方针是：“考虑到现实情况，我们不应该拒绝同以阿明为首的政府打交道。”<sup>⑤</sup>苏共中央指示苏联新闻机构对喀布尔事件的报道，“只做一些态度平和的时事性报道，不做任何评述或评价”。

### 最初的决策：不直接出兵

苏联出兵阿富汗，苏共中央在决策上经历了一个180度转折的过程，而这一

---

① 引自《阿富汗战争的悲剧》，第90页。

② 引自《阿富汗战争的悲剧》，第86页。

③ 马行汉：《战火中驻使阿富汗》，《炎黄春秋》1988年第8期，第69页。

④ 引自《个人档案（1941—1994）——克留奇科夫狱中自述》，第183页。

⑤ 引自《阿富汗战争的悲剧》，第86页。

转折是与苏联的全球争霸战略，特别是实施南下战略相关联的。

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苏联支持的阿拉伯国家损失惨重。阿拉伯国家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的失败，使苏联在阿拉伯国家中的信任度跌至几近冰点，苏联经过十几年苦心经营，在中东地区建立起来的势力网也全被撕烂。为此，勃列日涅夫的中东政策，遭到苏共中央以谢列平为首的一些人的质疑。勃列日涅夫尽管借别的口实，削弱了谢列平的势力，可是苏联在阿拉伯地区的势力和影响，毕竟损失惨重。为了弥补这一损失，苏联就极力向阿富汗渗透，以期建立进出波斯湾的新的前进基地。苏联特别寄希望于1965年1月1日成立的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将阿富汗建成新的“社会主义国家”。

为此，苏共中央对阿富汗的局势极为关注。且不说阿富汗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就是苏联和美国争夺的重点地区之一，苏联更看重的是苏、阿之间有漫长的边境线，阿富汗居民中有700万左右的塔吉克人、乌兹别克人、土库曼人，占阿富汗全国人口的45%。他们和苏联中亚各加盟共和国的各族居民属同源民族，共同拥有边境河流的水资源，历来有着相当密切的经贸往来，相互之间的密切影响不是国境线所能隔得开的。苏联之所以在阿富汗下那么大的赌注，就是因为阿富汗局势的变化，密切关系到苏联的国家战略利益。

自1978年“四月革命”、人民民主党掌权后，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几乎没有一天是安宁的，没有一方土地是平静的，全国始终是剧烈地动乱，弥漫着血腥和恐怖。苏联好不容易帮助建立起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本想使之成为苏联在中近东地区的新据点，可是眼看它将变成一只“烫手山芋”。更令苏联担忧的是，反政府的“伊斯兰圣战”在全国迅速蔓延，局势越来越难以控制。

1978年6月，阿富汗东南部的库尔纳、帕克吉亚、南加尔哈尔等省的武装穆斯林组织，就展开了反政府的武装斗争。塔拉基政权出动由苏联提供武器装备的正规军，动用飞机、坦克、火箭炮等先进武器实施镇压。军队所到之处，乡村、灌溉系统、庄稼均遭毁灭性破坏，于是引发了“难民潮”。1978年底，逃离家园的难民约11万，到1979年底达到80万左右，1980年超过了100万。“难民潮”的出现，使反政府武装斗争更为猛烈起来。1979年3月，西部重要城市特拉赫爆发了什叶派武装暴动，在该城的100多名苏联顾问被杀。政府军占领该城后，报复性地枪杀了几千人，其中多数是无辜者。这样的屠杀，使反政府武装迅速从农村扩展到城市，遍及全国28个省中的23个省。他们破坏交通、袭击机场，毙俘

政府军 3000 余人，还使 300 多名苏联顾问丧生。塔拉基政权的所作所为、“难民潮”的汹涌、苏联的插手，以及阿富汗与巴基斯坦边境地区的特殊性，使阿富汗急速恶化了和巴基斯坦的关系。

居住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境两侧的普什图人，在巴基斯坦境内的约有 300 万，在阿富汗领土上的有 350 万—400 万。两国边境的众多普什图部落，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从来都没有受到该地区曾经存在过的国家中任何一个政府的有效控制。这些普什图部落任何时候也不曾向任何政府交纳过赋税或其他贡赋，由部落首领自行管理。这里的边界历来是开放的。这里的成年男性居民，几乎都装备有现代化的火器，他们 90% 以上是文盲。他们虽然没有服兵役的义务，但是以在军队、边防军、警察，以及各种地方军事组织中服役作为唯一的经济收入来源。他们基本上都是逊尼派穆斯林。阿富汗的普什图部落区还是该国的人口稠密地区之一。塔拉基政府搞“苏式社会主义”，阿明诱杀部落首领，使部落地区武装暴动蜂起。反政府武装乘机在巴基斯坦境内建立基地，并得到巴基斯坦和伊朗的多方支持。阿富汗政府的军事行动往往是疲于奔命，而没有实际效果。政府军也因不满苏联的干预，不断哗变。驻扎在赫拉特市的阿富汗政府军的一个师瓦解，其中的一个炮兵团、一个步兵团，倒向了反政府武装。塔拉基政府曾多次请求苏联出兵帮助镇压反政府武装，说：“如果现在苏联不帮忙，那我们就坚持不住了。”<sup>①</sup>

面对阿富汗的局势和塔拉基政府的再三请求，苏共中央政治局于 1979 年 3 月 17、18、19 日，连续三天召开紧急会议，研究阿富汗的局势和苏联所应采取的措施。17 日，勃列日涅夫没有出席会议。受勃列日涅夫委托主持政治局紧急会议的基里连科一开头就说：“事情刻不容缓。葛罗米柯（苏联外交部长——引者注，下同）、安德罗波夫（苏联克格勃主席）和乌斯季诺夫（苏联国防部长）同志今天拟订了一些方案。这些方案现已准备好，就在我们的手中。让我们来认真讨论这个问题并拟定我们应当采取的措施。首先让我们听一听葛罗米柯的发言。”<sup>②</sup> 于是，葛罗米柯作了长篇发言，安德罗波夫和乌斯季诺夫作了补充，多

<sup>①</sup> 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32 卷，上册，第 101 页。

<sup>②</sup> 《苏共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关于阿富汗局势的讨论记录（1979 年 3 月 17—19 日）》，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32 卷，上册，第 90 页。

数政治局委员只是发表了一些表示同意的插话。葛罗米柯等三人发言的主要意思是：阿富汗局势已急剧尖锐化，塔拉基政府已难以控制了；塔拉基请求苏联援助武器、弹药、粮食。“塔拉基似乎是随口说，大概是要求陆地和空中援助。这应该理解为要求我们派出我们的陆军和空军。我认为，在给予阿富汗援助时必须首先考虑到主要方面，这就是：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失去阿富汗。”<sup>①</sup>安德罗波夫补充时特别强调，“很可能（国际社会）给我们戴上‘侵略者’的帽子。但是尽管这样，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失去阿富汗。”<sup>②</sup>虽然没有正式亮出来，他们三人所拟订的方案的意思已经很明确了，即为确保苏联对阿富汗的控制，即使被国际社会戴侵略者的帽子，也在所不惜！

讨论到这里时，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在必须出兵时我们将同谁作战？谁将反对阿富汗的现领导？他们都是些伊斯兰教徒，相同信仰的人。他们的信仰如此强烈，教徒如此狂热，足以使他们在此基础上团结起来。”<sup>③</sup>柯西金补充说：“我认为我们（向阿富汗政府）运送武器是必要的，但是我们必须确信它不会落入叛乱分子的手中。如果他们的军队瓦解了，那么这些武器势必被叛乱分子掠走，然后就会产生我们将怎么向世界舆论交代的问题。所有这一切都应当有根据。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出兵，那就应当选择相应的论据，对一切都应当详尽地加以解释。”<sup>④</sup>柯西金总括自己的意见说：“现在我们难以形成政治文件。为此，同志们需要再工作。正如我说过的那样，给三天时间。”

这样，17日的苏共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没有形成对这个问题的明确意见，而是要求柯西金与阿富汗方面紧急联系，了解确切的情况，再作定夺。

3月18日，政治局紧急会议继续。会议开始后，柯西金首先汇报：昨天，我曾两次与塔拉基进行了电话交谈。“塔拉基同志说，如果现在苏联不帮忙，那我们就坚持不住了。”柯西金继续说：他们想要得到步兵坦克和装甲车的加强，但是他们那里没有坦克手。“所以他们请求我们从坦克部队中派塔吉克人坦克手和装甲车手，让他们换上阿富汗服装后派来。当时我再三说：塔拉基同志，我们

① 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2卷，上册，第92—93页。

② 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2卷，上册，第97页。

③ 《苏共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关于阿富汗局势的讨论记录（1979年3月17—19日）》，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2卷，上册，第96页。

④ 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2卷，上册，第98页。

军队参加作战的事实是根本掩盖不住的，是会很快被揭露的，记者们会向全世界传播说苏联坦克手在阿富汗作战。”<sup>①</sup>

政治局紧急会议两天的讨论，柯西金的意见使葛罗米柯等三人不得不谨慎地重新考虑他们原定的“方案”，修正他们的意见。为此，安德罗波夫接着发言：“同志们，我仔细地考虑了这个问题，并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我们必须非常严肃认真地思考，我们为了什么要出兵阿富汗的问题。对我们来说非常清楚的是，阿富汗对现在以社会主义方式解决一切问题尚未做好准备。那里宗教势力很强大，乡村居民几乎都是文盲，经济落后，等等。我们都知道列宁关于革命形势的学说。阿富汗尚不具备这样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形势。因此我认为，我们只有借助我们的刺刀才能挽救阿富汗革命，而这对我们来说是完全不容许的。我们不能去冒这样的险。”<sup>②</sup> 葛罗米柯跟着说：“我完全支持安德罗波夫同志关于排除采取我们出兵阿富汗措施的建议。那里的军队不可靠。这样一来，我们进入阿富汗的军队就将成为侵略者。它同谁作战？首先是同阿富汗人民，并且必须向人民开枪。安德罗波夫正确地指出，阿富汗的形势对革命来说就是不成熟，（如果出兵）我们近年来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削减武器等克服困难所做的一切都将付诸东流。当然，这还将会是献给中国的最好礼物。所有不结盟国家也将会反对我们。一句话，采取该行动所引起的严重后果在等待我们。”“另一方面，我们应该注意到，在法律上我们也没有出兵的理由。”<sup>③</sup> 契尔年科也说：“如果我们出兵阿富汗去打阿富汗人民，我们必定会被谴责是侵略，罪责难逃。”<sup>④</sup>

经过两天的讨论，苏共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对于阿富汗的局势和苏联的对策，终于形成这样的一致意见：阿富汗不存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形势；应当采取一切手段援助塔拉基政权，但是不能直接出兵。

19日，勃列日涅夫亲自主持，继续举行政治局紧急会议。勃列日涅夫讲了几句开场白之后，说：这几天会议“提出了关于我国军队直接介入阿富汗发生的

---

① 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2卷，上册，第101—102页。

② 《苏共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关于阿富汗局势的讨论记录（1979年3月17—19日）》，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2卷，上册，第103页。

③ 《苏共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关于阿富汗局势的讨论记录（1979年3月17—19日）》，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2卷，上册，第103—104页。

④ 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2卷，上册，第105页。

冲突的问题。我想，政治局委员们确定我们现在不该被拖入这场战争是正确的。应该向塔拉基同志及其他阿富汗同志讲清楚，我们能够援助他们在国内行动中所需要的一切。我们的军队介入阿富汗不但会给我们带来损害，而且首先会给阿富汗带来损害”。<sup>①</sup>

关于阿富汗的局势和苏联的对策，经勃列日涅夫最后敲定：苏联不直接出兵。并决定3月20日在莫斯科接待塔拉基，告知苏共中央的决定。

1979年3月20日，塔拉基应邀秘密来到莫斯科，与柯西金、乌斯季诺夫、波诺马廖夫等苏共领导人举行会谈。柯西金开门见山，说：“政治局委托我们同您讨论所有您认为必须交换的意见的问题。正像我已经对您说过的那样，勃列日涅夫定于18时至18时30分将同您会面。”柯西金接着说：“我们认真讨论过贵国的形势，寻求过给你们最符合我们之间友谊利益和你们同其他国家关系的援助的途径。解决你们产生诸种问题的途径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好的途径是既能保持贵国政府在人民中的威信，又不破坏阿富汗同邻国的关系，也不损害贵国的国际威望。绝不容许事态发展到这种地步，即让别人看到似乎你们自己不能解决自己的问题而邀请外国军队的援助。”<sup>②</sup>柯西金已经把苏联不直接出兵的意思表达得够明确了。不过为了使塔拉基不再有任何提出这方面关系要求的余地，柯西金又进一步说了这样一大段话：“我们把保卫你们免受任何可能出现国际麻烦影响，看成是现阶段自己的任务。我们将尽一切可能援助你们——提供武器、弹药，派遣对保障领导贵国军事和经济事务有用的人，以及训练你们的军事人员，帮助使用我们向你们提供的最现代化的武器和军事装备。我们出兵到阿富汗领土会立即刺激国际舆论，在多方面引起负面后果。实质上不仅是同帝国主义国家的冲突，而且也是同本国人民的冲突。我们共同的敌人正期待着在阿富汗领土上出现苏军的那一时刻。这将为他们向阿富汗领土派遣敌视你们的武装部队提供借口。我想再次强调指出，关于出兵的问题我们已从各方面进行了审议，仔细研究了该行动的各个方面，并得出结论：如果我们出兵，贵国的局势不仅不能改善，反而会复

---

<sup>①</sup> 《苏共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关于阿富汗局势的讨论记录（1979年3月17—19日）》，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2卷，上册，第107页。

<sup>②</sup> 《柯西金等人同塔拉基会谈记录（1979年3月20日）》，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2卷，上册，第119页。

杂化。不能不看到，如果到那时，我们的军队不仅是同在你们领土上的外国侵略者斗争，而且还要同你们的某一部分人民斗争。而人民对这样的事是不会饶恕的。此外，只要我国军队刚一跨越边界，中国和所有其他侵略者就会赢得失去的名声。我们的结论是：现阶段，从给予你们最有效的支援的观点出发，我们对邻国施加政治影响，以及提供大量和多方面援助是最好的方法。”<sup>①</sup> 柯西金已经把话说到这样的程度，塔拉基只能表示：“非常感谢您就我想讨论的问题详尽地阐述了苏联领导人的立场。”<sup>②</sup>

当天晚上6时，勃列日涅夫接见了秘密来访的塔拉基。勃列日涅夫寒暄了几句之后，马上转入正题。关于要求苏联出兵问题，勃列日涅夫告诉塔拉基：“我们对该问题进行了全面研究，仔细权衡了利弊，现在我直截了当地告诉您：不应该做这件事。如果做了，就等于帮了敌人（无论是你们的，还是我们的）的忙。”<sup>③</sup> 当然，勃列日涅夫也没有让塔拉基空手而回。勃列日涅夫答应向阿富汗再提供10万吨小麦；除已在阿富汗的500多名将军和军官之外，再派遣几名高级党务工作者和150—200名军官。

## 苏共中央决定直接出兵

直到1979年秋，苏共中央对阿富汗的基本方针都是不直接出兵。

苏共中央对阿富汗从坚持不出兵到决定直接出兵，这一转折的关键因素是阿明杀掉塔拉基，取而代之，上台后迅速改变了倒向苏联的“一边倒”政策。

阿明上台，置苏共中央的警告于不顾，杀了塔拉基，已使苏联极其难堪。在随后的3个月里，阿明又处决了600多名阿富汗人民党党员、军人，以及被怀疑为有“反阿明情绪”的人。<sup>④</sup> 阿富汗全国陷于更加阴森的恐怖之中。由此，反政府武装也越来越壮大起来。到1979年10月，反政府武装几乎控制了阿富汗全国

---

① 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2卷，上册，第120页。

② 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2卷，上册，第121页。

③ 《勃列日涅夫与塔拉基的会谈记录（1979年3月20日）》，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2卷，上册，第115页。

④ 《安德罗波夫等人关于阿富汗事件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79年12月31日）》，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2卷，上册，第297页。

80%的领土、1000万人口，阿明政权只能困守在大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小块地区。苏共中央认为，阿富汗的局势已影响到苏联国家的战略安全。

更令苏共中央紧张和不安的是，阿明政府越来越公开表现出摆脱苏联的倾向。阿明不仅指责苏联插手“九月事件”，要求苏联撤回驻阿富汗的3000余名军事顾问、教官和技术人员，并且拒绝苏联向其发出的访问邀请。<sup>①</sup>与此同时，阿明提出要实行“更为平衡的外交方针”，公开表示希望同美国改善关系。阿明亲自与美国驻阿富汗代办秘密接触，为美国文化中心在阿富汗开展工作创造良好条件，要求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恢复对阿富汗的援助。按照阿明的指示，阿富汗特工部门停止了针对美国驻阿富汗大使馆的种种监控。所有的迹象表明，阿明当权的阿富汗将倒向美国和西方，而这是苏联万万不能容许的。在3月17—19日的苏共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上，葛罗米柯等“三巨头”虽然修正了“不惜被戴侵略者帽子”的方案，同意不直接出兵，但是他们反复强调：“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失去阿富汗。”可见“不能失去阿富汗”既是苏共中央的原则，也是不直接出兵的底线。阿明当政后，苏共眼看守不住这条底线了。

在这样的局势下，苏共中央从苏联的整体战略需要考虑，把直接出兵问题和废除阿明政权、保住阿富汗结合起来：要想保住阿富汗，必须除掉阿明；要除掉阿明，只有苏联直接出兵，别无他途。正是出于这样的连环考虑，苏共中央不顾一切，决定直接出兵阿富汗。

1979年10月10日，安德罗波夫根据苏共中央的指示，将卡尔迈勒从捷克接到莫斯科，策划以卡尔迈勒取代阿明。

1979年12月8日，勃列日涅夫召开苏共中央政治局“小范围”会议，与会的有安德罗波夫、葛罗米柯、乌斯季诺夫，以及苏斯洛夫。政治局“小范围”会议作出了以卡尔迈勒取代阿明，派遣“一定数量的部队”前往阿富汗的倾向性决定，并指示相关职能部门予以落实。12月12日，勃列日涅夫主持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通过以卡尔迈勒取代阿明，出兵阿富汗的决议。决议说：同意安德罗波夫、乌斯季诺夫、葛罗米柯同志提出的看法和措施。“责成安德罗波夫、乌

---

<sup>①</sup> 见《强弩之末——前苏联入侵阿富汗秘闻》，第120页。

斯季诺夫、葛罗米柯同志向中央政治局通报所制定措施的执行情况。”<sup>①</sup>

1979年12月25日，苏联国防部长签署了苏军越过阿富汗民主共和国边界的命令。苏军总参谋部的某些领导人，包括总参谋长奥加尔科夫在内，曾提出：苏军直接出动会激化作战行动，使反政府的“圣战”升级；阿富汗的民族、部落、伊斯兰等等的关系极其复杂，所有这些情况会使苏军处于非常艰难的境地。但是这些意见不仅没有被采纳，除奥加尔科夫外，其余提意见者大多遭排斥。

1979年12月26日，安德罗波夫、葛罗米柯、乌斯季诺夫、契尔年科四人，在勃列日涅夫的别墅扎列契耶，向勃列日涅夫汇报了贯彻、执行“中央政治局通报所制定的措施”的执行情况。勃列日涅夫表示“同意同志们拟定的近期行动计划”<sup>②</sup>。当天，勃列日涅夫主持召开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出兵阿富汗问题。因为事关重大，这次政治局会议改变了以往口头表决的方式，而是以记名的方式表决：出席政治局会议的10名委员一致同意。其实，记名表决也不过是一种形式和程序而已，因为出兵阿富汗已经在政治局的“小范围”会议上决定了；军队行动命令也已经下达了。

12月27日，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了处理阿富汗问题的具体部署。会议批准“给阿富汗革命委员会主席、阿富汗人民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书记、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总理卡尔迈勒同志的致敬电”，热烈祝贺他“当选阿富汗人民民主党中央总书记，并担任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国家的最高职务”。<sup>③</sup>而此时，卡尔迈勒尚躲在苏联境内苏军第345独立空降兵团驻地，担任以上三个职务的还是阿明。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同时批准了给苏联各驻外使馆的指示：必须向驻在国说明，苏联“考虑到阿富汗新领导人关于要求援助反击外来侵略的请求，苏联遵循自己的国际主义职责，决定派遣有限数量的苏联军队进驻阿富汗”。<sup>④</sup>

---

① 《苏共中央关于阿富汗形势的决议（1979年12月12日）》，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2卷，上册，第273页。

② 《乌斯季诺夫等人关于阿富汗问题向勃列日涅夫的汇报（1979年12月26日）》，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2卷，上册，第274页。

③ 《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处理阿富汗问题的第177号记录摘要（1979年12月27日）附件5》，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2卷，上册，第284页。

④ 《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处理阿富汗问题的第177号记录摘要（1979年12月27日）附件1》，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2卷，上册，第279页。

苏共中央在部署直接出兵的同时，以卡尔迈勒取代阿明的计划也布置周全，并付诸实施了。

1979年12月27日晚，按事先的周密计划，苏军特种部队直接出手，一举攻占了阿明的行宫——塔日-别克宫。在激战中，阿明被当场打死；苏军特种部队指挥官博亚里诺夫上校也被打死。12月28日凌晨，喀布尔电台播放卡尔迈勒的讲话录音，宣布：“美国代理人”阿明政权已被推翻，阿明已被处决；卡尔迈勒任阿富汗人民民主党中央总书记、阿富汗革命委员会主席兼政府总理。1980年1月1日，勃列日涅夫致电卡尔迈勒，祝贺他当选为阿富汗党和国家的领导人。

苏军侵入阿富汗与除掉阿明的计划，契合得丝丝入扣。1979年12月25日15时（莫斯科时间），苏军部队以“应阿富汗政府邀请，根据苏阿友好条约，履行国际主义义务”为名，大举越过苏阿边界，空降部队也在喀布尔地区降落。12月27日，也即苏军特种部队向阿明的行宫发起攻击时，苏军已全面开进了阿富汗，并控制了喀布尔的阿富汗人民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国防部、内务部、外交部、电话局、广播电视中心、监狱等各要害部门。

## 入侵阿富汗给苏联带来的严重后果

入侵阿富汗使苏联在全世界陷于空前的孤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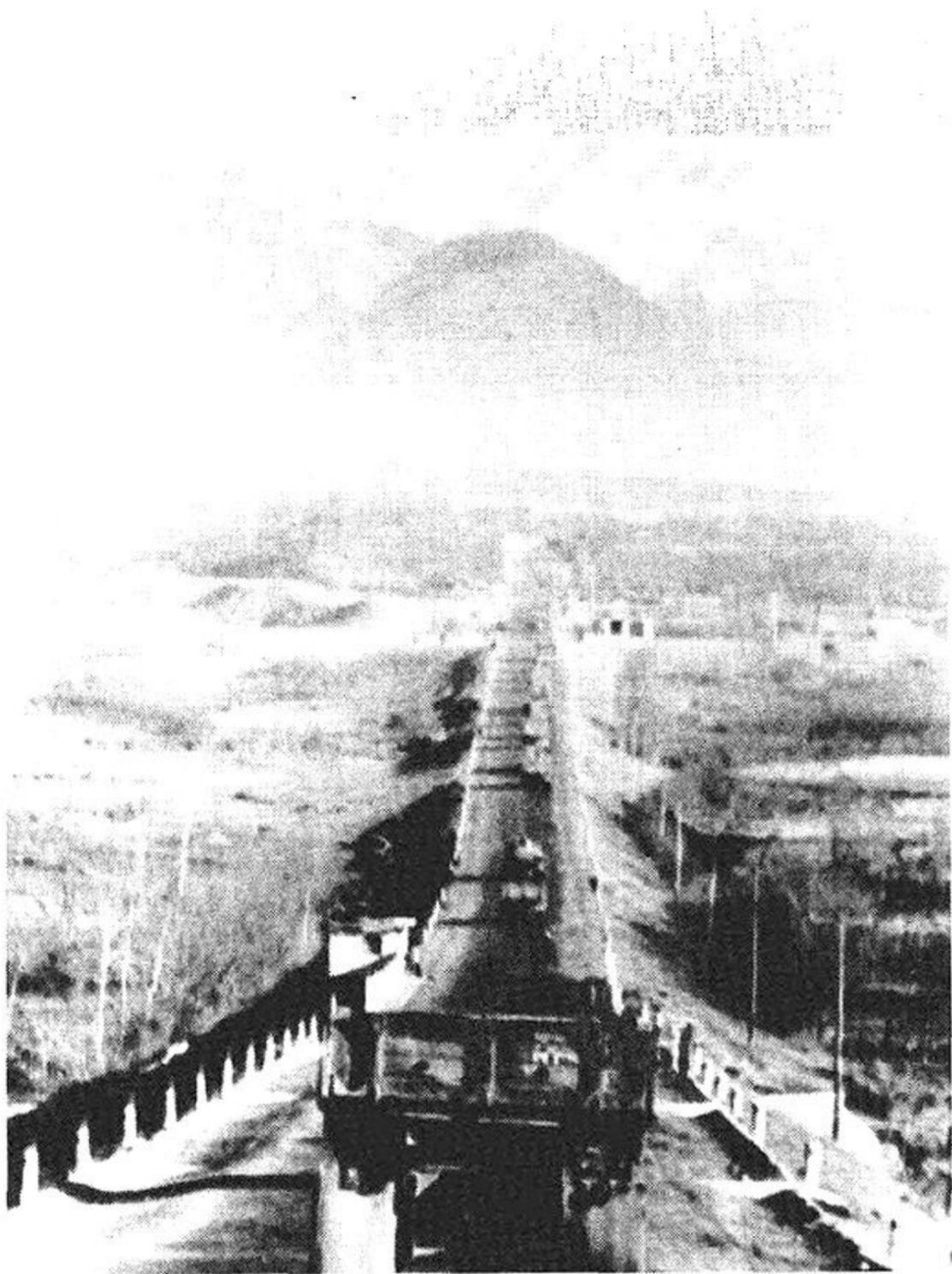
1917年十月革命、苏维埃俄国建立之初，虽然有被苏俄称为“十四国武装干涉”的孤立时期，但是世界各国人民纷纷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声援和支持新生的苏维埃政权。1979年苏军入侵阿富汗，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虽然有不同的出发点，但是几乎一致同声谴责，苏联成了名副其实的过街老鼠。美国、北约、伊斯兰国家认为：这是苏联为谋求私利和打破已有的战略力量平衡而做出的直接尝试。1979年12月28日，美国总统卡特发表声明：“苏联军队进入阿富汗是对和平明目张胆的威胁，它可能标志着我们双边关系中根本和长期的变更。”卡特要求苏联迅速撤军，并停止干涉阿富汗内部事务。<sup>①</sup> 中国政府于1979年12月30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苏联的霸权主义行径，坚决要求苏联停止对阿富汗内政的干涉，撤出一切武装部队。1980年1月6日晚，邓小平在宴请来访的埃及副总统穆

<sup>①</sup> 引自《阿富汗战争的悲剧》，第164页。

巴拉克时致辞说：“最近，苏联悍然派兵大规模入侵阿富汗，粗暴地干涉其内政，严重地威胁着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安全。苏联这一行动，是它为谋求世界霸权而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sup>①</sup> 1980年1月7日，孟加拉、牙买加、尼日尔、菲律宾、赞比亚等5个不结盟组织理事国，代表世界上50多个不结盟国家，向联合国安理会递交了不结盟国家通过的关于阿富汗局势的决议草案，要求尊重阿富汗的主权、领土完整、独立和不结盟地位，立即无条件从阿富汗撤走一切外国军队。苏联在全世界几乎是四面楚歌！

苏军入侵阿富汗，使苏联陷入了一场看不见尽头的战争泥潭，苏联等于在自己身上割了一个“日夜淌血的创口”。

苏军进入阿富汗后，凭借先进的武器装备和良好的军事素质，在战场上取得了明显的优势，很快就控制了全国的各大城市和交通线。勃列日涅夫踌躇满志，



1980年1月14日，入侵阿富汗的大批苏联军车载着补给品从喀布尔开出向北驶往萨兰山口。（新华社稿）

<sup>①</sup>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89页。

认为苏联出动5万兵力，在3至4周内即可结束战斗。<sup>①</sup> 葛罗米柯也说：“这只需一个月，我们很快就会完成一切并迅速离开。”<sup>②</sup>

严酷战争现实并非如苏共中央领导人所想象的那样简单。在苏军的凌厉打击下，阿富汗各地的游击队很快就改变了战术：苏军主力一出动，他们立即分散、隐蔽；苏军主力一撤走，他们立即聚集起来，伏击苏军车辆、袭击机场和哨所。苏军的报复就是焚毁庄稼、灭绝牲畜，甚至将一个个村庄夷为平地。这一切，更激起阿富汗全民对苏的“圣战”。阿富汗几乎遍地是穆斯林游击队。1988年11月，苏联估计“圣战”的阿富汗游击队有5016支、183000余人，其中的骨干武装部队约8万人。为了应付战局，苏联只好不断增兵。1980年底，入侵阿富汗的苏军已达85000人，其中70%—75%是作战部队。被苏联称为“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有理论造诣、能冷静和客观地评价局势，在党内和国家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卡尔迈勒，被阿富汗人民称为“苏联的狗”。为了维持卡尔迈勒的地位，苏联不得不在阿富汗常年保持3万—10万兵力，死伤惨重。至1980年底，死于战斗中的官兵已达11000余人。<sup>③</sup> 为了应付这场战争，苏联在财政上也不堪重负。1988年1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向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报告：阿富汗战争每昼夜平均消耗，1984年为430万卢布，1985年为720万卢布，1986年为1000万卢布，1987年为1470万卢布。<sup>④</sup> 新的苏共中央领导人哀叹：苏联将要被阿富汗战争拖垮！

入侵阿富汗的军事行动也转化成政治因素，腐蚀了苏联的心灵，使苏军士兵在现实面前醒悟。

旷日持久的战争，使被派往阿富汗的苏军士气日益低落。之所以要出兵阿富汗，苏共中央对下级官兵的解释是：“你们是去保卫阿富汗人民，因为阿富汗人

---

① 见（俄）多勃雷宁著，肖敏等译：《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503页。

② 引自（俄）姆列欣著，徐葵等译：《历届外交部长的命运》，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527页。

③ 《苏联驻日使馆呈送外交部的日本报刊关于阿富汗事件的报道（1981年9月8日）》，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2卷，下册，第616页。

④ 《雷日科夫关于苏联在阿富汗的开支给戈尔巴乔夫的报告（1988年1月8日）》，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2卷，下册，第822页。

民正在与来自中国、埃及和美国的侵略者进行斗争。”<sup>①</sup>可是，他们到了阿富汗之后，除了苏军自己之外，看不到任何“外国侵略者”。他们必须瞄准射击的只是手持武器、包括手无寸铁的阿富汗人民。严酷的现实很快击碎了他们原本就脆弱的“国际主义援助”理念。他们动摇了！有些士兵跑到游击队方面去，甚至有躲到美国大使馆寻求政治避难的。苏军士兵有拿机关枪去和阿富汗人换牛仔褲的，有的用坦克零件交换口香糖。有个苏军士兵走进喀布尔的一座清真寺，人群立即包围了他，并准备揍他。这名苏军士兵说：“我也是穆斯林。我离开家的时候，母亲要求我给她弄一部《可兰经》。我到这里来就是想实现她对我的要求，因为在苏联是弄不到可兰经的。”清真寺里的人听了这番话，感到很惊讶，不仅没有揍他，还热情地送给他一部可兰经。<sup>②</sup>苏共中央也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因而将苏军伤员都送到民主德国去医治，因为怕他们回国后讲出真实的情况。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后，开始寻求阿富汗问题的“政治解决”途径。1986年11月，苏共中央以纳吉布拉替换卡尔迈勒。11月13日，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我们在阿富汗已经打了6年了。如不改变态度，我们还得打20—30年。这给我们影响事态发展的能力罩上了阴影。”戈尔巴乔夫继续说：“一般来说，我们没有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我们为什么一方面承认我们的部队没能力控制形势，而另一方面又要无休止地打下去呢？在近期我们要结束这一过程。”<sup>③</sup>1988年4月14日，阿富汗纳吉布拉政府与巴基斯坦签订了由苏联、美国予以保证的，解决阿富汗问题的日内瓦协议。苏联国防部长亚佐夫签署命令：1988年5月15日至1989年2月15日，撤回驻扎在阿富汗领土上的100300名苏军。

当苏联终于结束了这场漫长的、沉重的、伤心的、对苏联人民保密的战争时，剧变就开始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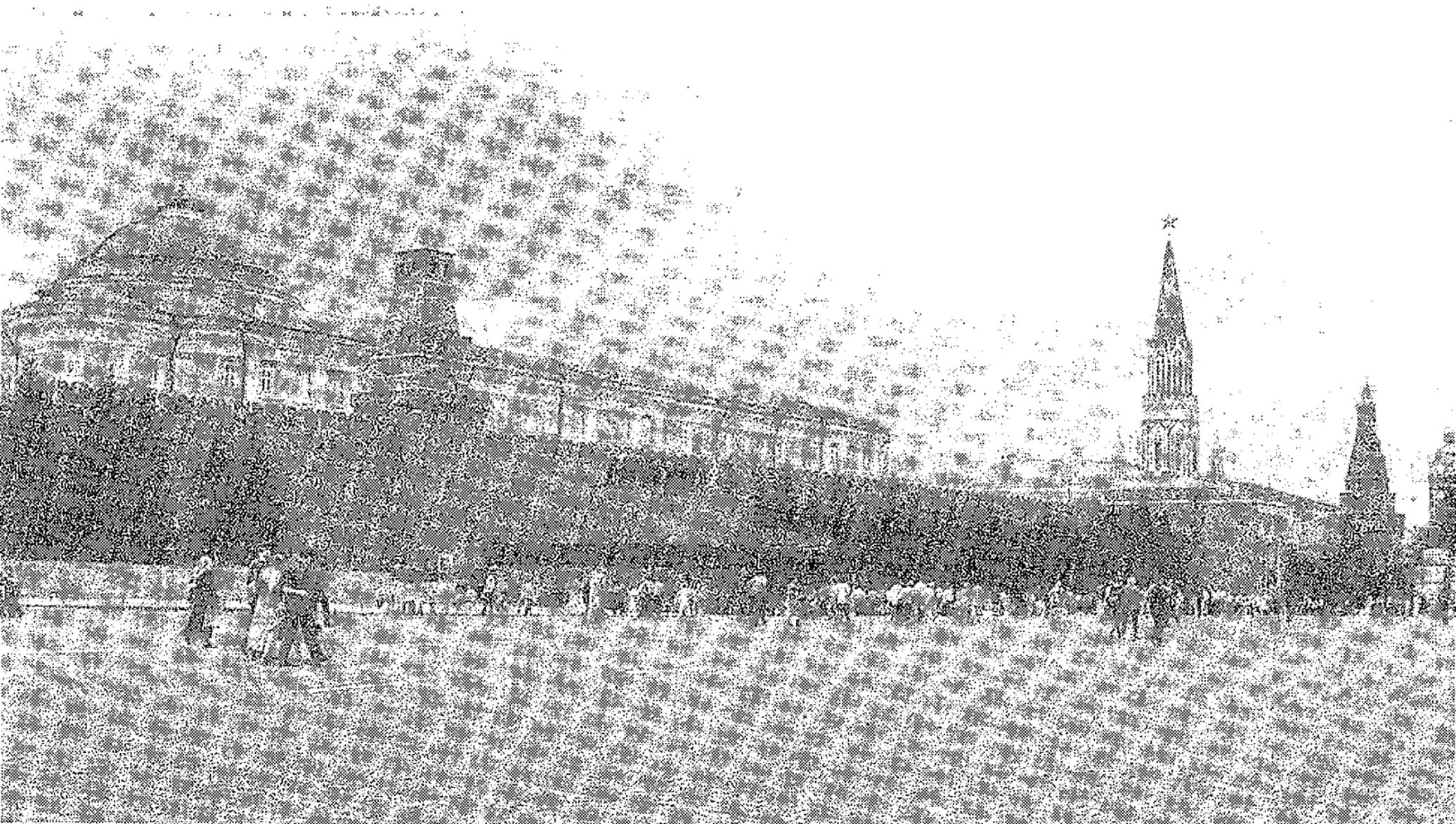
<sup>①</sup> 《苏联驻日使馆呈送外交部的日本报刊关于阿富汗事件的报道。1981年9月8日》，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2卷，下册，第615页。

<sup>②</sup> 《苏联驻日使馆呈送外交部的日本报刊关于阿富汗事件的报道（1981年9月8日）》，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2卷，下册，第616页。

<sup>③</sup> 《苏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阿富汗局势的会议记录（1986年11月13日）》，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2卷，下册，第812、813页。



# 第五编 戈尔巴乔夫时期





## 63. 戈尔巴乔夫缘何要对体制进行根本性改革？

陆南泉

勃列日涅夫时期由于改革的停滞导致整个社会经济的停滞。安德罗波夫与契尔年科作为勃列日涅夫之后的两位领导人，在对待改革和个人品行、素质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别，但他们有共同点：一是执政时间都很短（安德罗波夫执政 14 个月，任总书记时已 68 岁，而契尔年科执政仅 13 个月，任总书记时已 73 岁）；二是都年老体弱，身患疾病；三是都没有解决勃列日涅夫时期留下的大量社会经济问题。这样，使得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已积累的大量社会经济问题，显得更加严峻。

我们还应看到，在年老多病的契尔年科于 1985 年 3 月 10 日去世时，苏联历史上出现了何等严重的创伤：从 1982 年 11 月到 1985 年 2 月（仅短短的两年零 4 个月），先后 3 个年老多病的苏联最高领导病亡，这严重地伤害了苏联人民的感情，极大地损害了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形象。在 1985 年 3 月初，即在契尔年科逝世前几天，两次在苏联电视屏幕上播出气息奄奄、行将就木的契尔年科在别人搀扶下踉踉跄跄来到电视摄像机前面的情景，这不仅使苏联人感到厌恶，而且它还向全世界告示：苏联这个社会主义社会确实到了可称之为“极度萧条衰退时期”，也是“苏联处于衰退甚至濒死状态”的一个证明。<sup>①</sup>至于人们频繁地、接连不断地到红场向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告别，广大苏联人民一次又一次承受的屈辱和被折磨的沉痛情感，这对为了自身的权力可牺牲国家利益的最高领导层来

---

<sup>①</sup>（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新华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91 页。

说，对为了巩固斯大林苏联体制模式以达到维护最高领导层自身权力来说，又算得了什么！

但社会总是要向前发展的，人们要变革的思想与愿望是抵制不住的。广大苏联人民总是要设法摆脱斯大林体制模式的。



1989年的戈尔巴乔夫。(新华社稿)

戈尔巴乔夫 1985 年 3 月 11 日任苏共中央总书记，1991 年 12 月 25 日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宣布辞去苏联总统职务，前后执政近 7 年。

### 戈尔巴乔夫上台面临的严峻形势

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时的苏联，不论从哪个角度来讲，都面临着十分复杂的

局面，特别是国内经济形势已显得非常严峻。由于勃列日涅夫时期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使苏联逐步走向衰亡，后虽经安德罗波夫的努力，经济有所好转，但复杂的经济形势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在勃列日涅夫逝世后苏联从高层领导到普通群众的上上下下，都在耐心地等待变化，等待安德罗波夫有所作为。利加乔夫说：“因为我明白，国家已处在通往社会经济绝境的轨道上。应该真正地干一番事业，把国家拉到正道上去。”<sup>①</sup> 安德罗波夫逝世后，上来了一个年老多病的契尔年科，让人们大为失望。契尔年科逝世后，苏联人民有理由期待一个年富力强的上台执政，带领他们摆脱困境，振兴苏联。

到了戈尔巴乔夫上台的1985年，苏联正处于历史性的关键时期，形势已迫使新领导人作出抉择：要么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对国内外政策作出重大调整，以达到振兴苏联的目的；要么对失去生命力的斯大林——苏联体制模式，像前几任领导那样进行修修补补，继续维持现状，最后使社会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下了决不拖延改革的决心，并在后来提出根本改革经济体制的方针。戈尔巴乔夫作出了后一种选择，并且态度十分坚决。他上台后，一再反复强调改革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在任总书记后不久召开的苏共中央四月全会上所作的报告中，戈尔巴乔夫指出：“由于管理体制不完善，繁文缛节的规章制度和泛滥成灾的报表文件，工作条件变得极为复杂。摆脱这种状况的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必须采取刻不容缓的强有力措施解决一揽子的管理问题。”<sup>②</sup>

为了向苏联人民进一步更具体和实际说明改革的必要性，根据瓦·博尔金<sup>③</sup>的说法，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所组成的领导班子，“最初采取的行动之一就是组织力量对80年代中期国内的社会经济状况作出详细的分析。这无疑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它可以使人深刻理解国内形势，作出客观结论，提出摆脱社会近几年所陷入的绝境的途径。之所以必须研究经济、财政、科学、文化教育与情况，还因官方统计往往为‘迎合’过去的领导人，总是把形势说得一派大好”。“这种分析由苏共中央机关的一批专家、许多大学科研机构、苏联科学院、统计机关联合进行。参加材料总结工作的有阿·格·阿甘别吉扬院士、安·伊·安奇什金院士、

---

① 《政党与当代世界》1992年第8—9期。

② (苏)《真理报》1985年4月24日。

③ 系戈尔巴乔夫领导班子的成员。

斯·谢·沙塔林院士、B·П·莫任院士、斯·阿·西塔良院士以及国家计委及其他政府机关和党的机关负责人。提交给总书记的分析报告得出的结论证明，国家正处在生产危机和严重的社会紧张局势的边缘。形成这种局势的原因是，以前的国家领导人对社会经济问题和工艺问题没有足够的重视，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改变局势。”<sup>①</sup>

有关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国内社会经济状况的分析材料，是戈尔巴乔夫在1987年出版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的重要素材。他对此充分加以利用，是戈尔巴乔夫在该书中论述有关改革问题的根据。他在书中说：

“我认为，要想了解苏联进行改革的起源和实质，必须注意下面这一点：改革不是个别人或一批人心血来潮的结果。如果是这样的话，任何号召、任何全会、甚至党代表大会都不可能发动人们投入这项工作，而今天这项工作却在我国全面展开，并且投身这项工作的苏联人一天比一天多。

“改革是迫切的需要，是从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深刻进程中产生的。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迫切需要进行变革，可以说，为了变革，它历尽了艰辛，而拖延改革就会在最近时期造成国内局势的加剧，直截了当地说，这种局势包藏着发生严重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的威胁。

“不抱偏见的诚实态度使我们得出一个必然的结论：国家正处于危机前的状态。这一结论是在1985年4月举行的中央全会上作出的，这次全会标志着转向新的战略方针，转向改革，给改革的构想提供了依据。

“所积累的新问题既迫切又严重……这就要求采取革命性行动，宣布对社会进行革命性改革。”

改革不能迟缓，“我们不能，也没有权力耽误，哪怕是耽误一天”<sup>②</sup>。

下面较为具体地谈谈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时面临的问题，有助于我们理解戈尔巴乔夫强调改革紧迫性和提出根本改革体制必要性的缘由。应该说，勃列日涅夫时期由于改革停滞产生的严重社会经济问题，后来并没有改变，而是还在发

---

<sup>①</sup>（俄）瓦·博尔金著，李永金等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407页。

<sup>②</sup>（苏）米·谢·戈尔巴乔夫著，苏群译：《改革与新思维》，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11—12、20、54页。

展，苏联的制度处于“濒死状态”。戈尔巴乔夫面临的主要难题是：

### （一）面临的仍是斯大林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模式

这种模式早已失去动力机制，成了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阻力。对刚上台的戈尔巴乔夫来说，他要深思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斯大林体制模式在此后经过多次改革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现在应该是解决如何对待体制改革问题的时候了。1985年6月11日戈尔巴乔夫在一个讨论科技进步的特别会议上说，苏联在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上，“已绕了多年的圈子，反复衡量怎么办才更好，但实际前进很少。看来是由于害怕采取坚决措施而犯错误，有时是明显的保守主义作怪。今天我们遇到的实质上还是10年前产生的问题，但变得更加尖锐了。我们越来越明显地感到，再也不能容许在这次工作中有消极情绪和惰性了”。也是在1985年6月，戈尔巴乔夫在乌克兰工业中心、前勃列日涅夫派的堡垒——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基，对彼得罗夫斯基冶金厂的工人们说：“可以提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是进展得太快了吗？否，我们甚至一次都未能在苏共中央委员会中讨论过这个问题。一个不同的，也就是说一个更加折中的方案是我们所难以接受的。时代要求我们这样做，除此之外，别无选择。”<sup>①</sup>

### （二）经济增长率与经济效益日益下降的趋势得不到遏制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经济增长率递减趋势已十分明显，但之后这种趋势并没有得到遏制。例如，1976—1980年苏联社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4.2%，而1981—1985年下降为3.3%；同期由4.3%下降为3.2%，社会劳动生产率由3.3%下降为3.1%。<sup>②</sup>

另外，经济效益日益下降的问题可以说贯穿苏联经济发展的全过程。尽管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曾一再强调经济的发展方式要从粗放型向集约化转变，但都停留在口头上。这方面的材料很多，这里只引用一下戈尔巴乔夫1985年4月11日向苏共中央政治局提交的材料就可说明这一点。

“在食品工业中，手工劳动占60%，劳动生产率比资本主义国家要低60%—

---

<sup>①</sup> 转引自（联邦德国）克里斯蒂安·施密特·豪尔著，吴红杰等译：《戈尔巴乔夫——俄罗斯的旋风》，工人出版社1987年版，第126页。

<sup>②</sup> 引自陆南泉：《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分析苏联剧变苏共垮台的原因》，见《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70%。1300家干酪、奶类、黄油生产厂家，200家肉类生产工厂，103家罐头厂和60家淀粉—果酱生产厂没有净化装置。

“在1190万个农产品储藏仓库中只有1/3安装了冷藏设备。只有19%安装有通风设备。在制糖企业中只有20%的企业拥有仓库。140家肉类联合企业没有冷库。生产现代化机器的部门只能保证需求量的55%。

“由于这一切，农业原料的损失约为30%。在采购和运输牲畜的过程中，损失10万吨。在采购和转运过程中，土豆的损耗量为100万吨，甜菜损耗量为150万吨，已捕捞的鱼类损耗量为100万吨。由于缺乏必需的包装材料，造成了大量鲜果及蔬菜的腐烂。

“仅俄罗斯就有2亿平方米的住房面积急需大修或者拆除。大量简易住宅尚未拆除。自来水及排水设施的负荷已达到极限。还有300多座城市根本没有自来水和排水设施。俄罗斯联邦各城市的街道与马路几乎有一半没有铺设硬路面。”<sup>①</sup>

客观地讲，到了戈尔巴乔夫上台的1985年，当苏联领导正视现实的时候，国家确实已陷入了困境，已处于危机边缘。正如戈尔巴乔夫指出的：“粗放发展的惰性就把经济拉进了死胡同，使发展停滞下来。国民经济的财政状况更加紧张。大量石油及其他燃料动力和原料商品投放世界市场的做法，不仅无济于事，而且还使疾病内延了。卖这些东西得到的外汇主要用于解决日常任务，而不是用于经济现代化和克服经济的技术落后状况。”<sup>②</sup>

由于经济效益下降和严重浪费，“形成了荒谬的局面。苏联在钢、原料和燃料动力资源生产方面规模巨大，早已无可匹敌，同时却由于浪费、无效的利用而又缺少这些东西。苏联的粮食生产方面在世界上名列前茅，但却要每年购进几百万吨谷物做饲料。按每个人平均计算的医生、医院床位最多，但同时存在严重缺点，服务质量下降。我们的火箭以惊人的准确性找到哈雷彗星并飞上金星，而在取得这一科学和工程思想的重大胜利的同时，却在为了国民经济的需要而采用科学成就方面明显落后，我们的许多家用电器落后于现代水平”，“发展速度眼看着急剧下降，全套质量指标恶化，不愿接受新的科技成果，生活水平

---

<sup>①</sup> 转引自（俄）阿·切尔尼亚耶夫著，徐葵等译：《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40页。

<sup>②</sup>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著，苏群译：《改革与新思维》，第15—16页。

提高缓慢，食品、住房、消费品和生活服务方面遇到困难”。<sup>①</sup>

在分析经济效益时，戈尔巴乔夫一上台，在多次讲话中尖锐地批评在苏联长期存在的基本建设中投资效益低的问题并没有好转，例如，他在1985年召开的苏共中央四月全会上指出：“许多项目建设周期过长，使不少物资被冻结，使生产能力增长停滞，国家不能及时得到需要的产品。固定生产基金交付使用计划完成得不能令人满意。”<sup>②</sup>

### （三）农业继续衰退

在1979年到1982年出现了农业连续4年下降的局面，这种趋势在1983年到1985年并未得到控制。1983年苏联谷物产量为1.92亿吨，1984年为1.73亿吨，1985年为1.92亿吨，就是说，这3年没有一年达到苏联“十一五”（1981—1985年）计划规定年均谷物产量为2.4亿吨的指标。农业的继续衰退，对苏联社会经济的消极影响也在不断发展：迫使苏联大量进口食品和食品原料，这类产品的进口额在1983年、1984年和1985年分别占苏联进口总额的20.5%、22.5%和21.2%，其中1984年粮食进口占苏联进口总额的8.2%，<sup>③</sup>因此阻碍了国民经济的调整，使市场供应更加紧张，使苏联外汇资金更加短缺。

### （四）与美国经济实力的差距呈拉大趋势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由于苏联在经济增长速度方面相对于美国一直占有优势，因而，苏联与美国经济实力的差距是不断缩小的。但从70年代中期经济处于停滞之后，苏美两国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出现了扩大趋势。根据苏联官方的统计资料，如1980年苏联的工业产值、农业产值与工业劳动生产率分别为美国的80%、85%和55%，而到1985年这三项指标没有变化。国民收入指标1980年苏联为美国的67%，而到1985年降为66%，差距扩大了一个百分点。苏联农业劳动生产率从1966年到1984年，一直停留在美国的20%—25%水平上。<sup>④</sup>失去速度优势，这对苏联来说，不能不是严重问题。这说明苏联已很难赶超美

①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著，苏群译：《改革与新思维》，第16—17页。

② （苏）《真理报》1985年4月24日。

③ 引自陆南泉等编：《苏联国民经济发展七十年》，机械工业出版社1988年版，第662、666页。

④ （苏）《1985年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莫斯科财政与统计出版社1986年俄文版，第581页。

国。正如戈尔巴乔夫说的：由于经济的停滞，“一个以前大力追赶世界上最发达国家的国家，开始明显地失去一个又一个阵地”。<sup>①</sup> 苏联把失去速度优势视为涉及确保国家“战略生存”的问题。

1987年3月19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防部情报局，联合向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的国家安全经济小组委员会提交了一份现状分析报告。据这个材料分析，1976—1985年这10年，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除美国低于苏联之外，其他发达西方国家都高于苏联，这也进一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

#### （五）越来越难以对付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

“科技一直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而这一作用，对现阶段的苏联经济来说显得更为重要。因为，当前苏联经济的发展不能再依赖于传统的粗放经营方式，即靠大量投入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办法了，而必须依靠科学的发展。据计算，如果苏联今后继续靠粗放经营方式来发展经济，走拼消耗的道路，要达到计划规定的经济增长率，那么，每个五年计划的燃料和原材料的开采量需要增加10%—15%，基建投资总额需增加30%—40%，需为国民经济补充800万—1000万劳动力。很明显，苏联根本不存在这种可能性。”<sup>②</sup>

苏联科技力量的潜力很大，并有很多新技术发明。但长期以来，苏联新技术成果在国民经济中得到应用的很少，而且周期很长。对此，戈尔巴乔夫在1987年召开的苏共中央六月全会的报告中说：“最令人不安的还在于，我们在科技发展上开始落后”，科技停滞“不是由于缺乏科学成果，主要是国民经济接受新事物不积极”。在苏联，阻碍新技术成果及时应用的原因很多，但主要还是经济管理体制方面的因素。

由于管理体制严重阻碍着科技的进步，从而影响着经济的发展。苏联机械化水平提高得缓慢，生产中手工劳动比例一直很大：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从事手工劳动的还约有5000万人，工业中从事手工劳动的工人约为1/3，建筑业为一半以上，农业则为3/4。<sup>③</sup>

据有关材料估计，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科技

①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著，苏群译：《改革与新思维》，第14页。

② 《戈尔巴乔夫言论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9页。

③ 《戈尔巴乔夫言论选集》，第93页。

水平要相差 15—20 年。据苏联电子工业部部长科列斯尼科夫估计，苏联一直以重点加速发展的计算机技术，现在要落后西方 8—12 年。

面对上述情况，戈尔巴乔夫在上台不久的 1985 年 6 月 11 日，就召开了全苏科技进步问题会议。他在报告中明确指出：“应该使经济最大限度地适应于科技进步，保证所有国民经济环节从切身利益上关心科技进步。”“要切实保证在加速科技进步方面取得成绩的劳动集体处于优越地位，要使生产陈旧过时，缺乏效率的产品变得无利可图。”<sup>①</sup> 戈尔巴乔夫要求把加速科技进步问题放到党的工作的中心位置来考虑。

#### （六）社会危机因素在增加

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在他逝世后，虽经安德罗波夫短期执政时期的整顿，但并没有好转。经济中出现的种种障碍和停滞不可能不反映到社会领域中来。因此，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不仅不断地揭示经济领域的危机现象，还揭露社会领域中的各种严重问题。他在庆祝苏联十月革命 70 周年的报告中和《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都指出，当时苏联在社会与精神道德领域出现了许多异常现象：

苏联人民对讲坛上讲的东西，报纸上和教科书中说的东西，不那么相信了；  
社会道德开始堕落，酗酒、吸毒和犯罪等现象日益增加。莫斯科市去登记的吸毒者就有 3600 名；

下流无耻、低级趣味和精神空虚的文化、艺术流行；

政治上的奉承，大量授予奖赏、称号和滥发奖金，往往取代了对人及其生活和劳动条件的真正关心。苏联报刊说，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是一个“拍马屁和阿谀奉承”的时代；

贪污、盗窃、行贿现象日趋严重；

在社会科学领域几乎见不到创造性的思想。

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当时苏联社会与广大群众对党的信任程度大大下降，对苏联长期以来存在的官僚主义体制已经十分厌恶。我们前面提到的在短短的两年零 4 个月先后有三位年老多病的苏联最高领导人病亡，这远远不只是刺疼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心，而是让广大人民群众对苏联未来丧失信心。人们往往用嘲弄讥

---

<sup>①</sup> （苏）《真理报》1985 年 6 月 12 日。

笑、编政治笑话讽刺老人政治。例如，召开党代表大会时，会议主持人宣布说：“大会代表全体起立，现在把总书记抬进来。”意思是说，苏共总书记已老得不能动弹了。所以，大会主持人宣布议程时说：一、全体起立；二、把总书记抬进来；三、由播音员宣读总书记报告……而此时，苏联的宣传机器和领导层成员却到处“展示”苏共中央总书记充满力量的活动——在电视荧屏上，在选举活动中，在他每天“发出的”呼吁书、答记者问、声明里，“使我们大家显得像在傻瓜的国家里”。<sup>①</sup>

### （七）面临着复杂的国际环境

从世界全局范围来讲，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时，当时的世界是这样的：“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世界，因为人们以前从来没有为了文明的进一步发展而如此全面地装备起来。然而，这也是一个危机四伏与矛盾重重的世界，这些危机与矛盾促使人们说：这几乎是历史上最令人忧虑的一段时期。”“当代世界是复杂的、多种多样的、变化多端的，贯穿着各种对立倾向，充满着矛盾。”<sup>②</sup>

从苏联当时所处的外部环境来看，也是十分不利的。长期以来推行与美争霸世界的政策，竭力争夺势力范围，这样使得苏联与美国的军备竞赛不断升级。冷战的后果是使苏联不堪巨额军费的重负，经济被拖垮。“对苏联来说，冷战意味着苏维埃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全部缺点和弊病的无法遏制的、强有力的增长和加深。国家事实上变成了冷战的工具，冷战吞噬了国家几乎80%的智力、思想、政治和物质资源。”<sup>③</sup>对东欧各国，大国主义、老子党的政策从来没有改变，不准这些国家改革，干涉这些国家的内政。与此同时，东欧国家为了摆脱斯大林的模式，独立倾向在加强。与中国的关系，也刚刚开始改善。对第三世界的主权苏联不予尊重，往往加以干涉。1979年入侵阿富汗，加剧与西方国家的对抗。正如戈尔巴乔夫所说的，苏联“是在国际局势日益紧张的形势下开始改革的”。<sup>④</sup>很明显，上述国际环境，对戈尔巴乔夫在国内推行改革政策是极其不利的，因此必须调整对外政策，改变苏联在国际上的形象。对此，戈尔巴乔夫在以后的著作

<sup>①</sup> 参见（俄）阿·切尔尼亚耶夫著，徐葵等译：《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第26页。

<sup>②</sup> 米·谢·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苏共二十七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政治报告，见（苏）《真理报》1986年2月26日。

<sup>③</sup> （俄）阿·切尔尼亚耶夫著，徐葵等译：《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第13—14页。

<sup>④</sup>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著，苏群译：《改革与新思维》，第169页。

中指出：“我们在开始改革时懂得，如果在对外政策方面不作任何改变，我们设想的国内改革也不会成功。”<sup>①</sup>这也是戈尔巴乔夫在对外政策方面提出政治新思维的原因。

戈尔巴乔夫根据1985年上台执政时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从改革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角度来看，从他执政初期的几次重要讲话来看，戈尔巴乔夫得出的重要结论是：

第一，“总的来说，我们的经济基本上是一种浪费型经济”；

第二，“目前的主要任务是寻求和发掘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的一切潜力”；

第三，要“对计划和管理，以及整个经济机制进行深刻的改造”。<sup>②</sup>也就是说要有战略性的转变，转向改革。

### 对体制进行根本性改革的方针与进程

这里，先要澄清至今还存在的一些不准确看法，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从政治体制开始的。实际上，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改革是从经济领域开始的，当时的苏联主要领导人主要精力花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戈尔巴乔夫在谈到这一问题时指出：“最近几年我不止一次地受到批评，说我应该从经济开始，而把政治的缰绳拽住……像中国那样。我并非没有对经济问题的了解，更没有忽视。只要看一下改革事件的记事表就可知道。从一开始多数中央全会讨论的正是经济改革问题。它占了我作为总书记的工作中，我的同事的工作中和政府机关工作中3/4以上的时间和精力。”<sup>③</sup>2004年5月31日—6月1日，由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和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联合召开的“苏联解体原因”研讨会上，美国斯坦福大学政治系副教授迈克尔·麦克福尔为会议提供的论文中谈及此问题时指出：“回顾过去，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戈尔巴乔夫是一个民主革命者，他很少关心经济改革，相反

---

①（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著，徐葵等译：《对过去与未来的思考》，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83页。

② 戈尔巴乔夫1985年6月11日在全苏科技进步问题会议上的报告〔见（苏）《真理报》1985年6月12日〕。

③（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著，徐葵等译：《对过去与未来的思考》，第78页。

他从一开始就在设法毁掉苏共，并在苏联实行民主化。没有比这更离谱的了。从戈尔巴乔夫担任苏共总书记以来，他就一直致力于实施经济改革。民主化不是目标，而是取得经济改革的一种手段。他进行经济改革的速度很慢。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第一批步骤与其他苏联改革类似，都是将提高现有体制的工作效率作为目标。他的第一个针对不良经济的重大改革政策是加速发展经济。实施经济改革需要中央强有力的控制。政治体系自由化还提不到议程上。这些最初的改革政策的目标并不是要改革管理苏联经济基础的基本体制，而是使现有体制运转得更好。”

以上简要的论述，主要说明两个问题：一是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后，首先是从经济领域着手改革的；二是从他执政近7年的历史发展来看，戈尔巴乔夫本人与当时的领导班子在相当一个时期里，工作的着力点放在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来解决严重的经济问题。

1985年召开苏共中央四月全会，它是苏联新的历史转折点的标志。戈尔巴乔夫在这次全会上，作了《召开苏共例行第二十七次代表会议及有关筹备和举行代表大会的任务》的报告。谈及经济问题的要点有：

第一，分析当时苏联的经济形势，指出勃列日涅夫留下的经济困难远远没有克服；

第二，困难发生的原因，主要是没有及时地对生产发展的客观条件的变化、没有对加快生产集约化和经营管理方法的变革的必要性作出应有的评价；

第三，解决困难的途径是，广泛采用科技革命的成果，使社会主义经营管理方式符合现代条件的要求，应当大大加速社会经济进步；<sup>①</sup>

第四，解决社会经济问题最终要靠改革。

报告中明确指出：“我们不管研究什么问题，不管从哪个方面来对待经济，最终一切都靠认真改进管理和整个经济机制。”<sup>②</sup>

这次全会后不久的6月11日，召开了全苏科技进步问题会议。戈尔巴乔夫在会议所作的报告中，强调要提高苏联经济质量与效率，从而提出使经济体制适应科技进步的要求，并提出，国家计委应变成集中大科学家和主要专家的国家科

---

<sup>①</sup> 在四月全会前的3月21日，苏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了戈尔巴乔夫上任后的第一次例会，讨论并提出了动员全国力量实现经济集约化和加速经济发展的战略。

<sup>②</sup> （苏）《真理报》1985年4月24日。

学经济机关，应大大减少集中下达的计划任务。<sup>①</sup>

1986年2月苏共二十七次代表大会，首次正式提出“加速战略”和提出根本改革的方针。代表大会对过去一个时期（主要是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内外政策（主要是国内政策）进行了总结，揭露和批评了这一时期存在的缺点和失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苏联今后一个时期（2000年前）的战略任务，以及实现这一任务的大政方针，以适应新形势发展的要求，力图使苏联经济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转折阶段。

苏共二十七次代表大会提出了根本改革体制的方针，但并没有、当然也不可能那么快地提出一个改革方案出来。戈尔巴乔夫在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只是规定了今后改革的大致方向：

——提高集中领导经济的效力，加强中央在实现党的经济战略的基本目标方面，确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和比例、国民经济的平衡方面的作用。同时应当结束中央干预下级经济部门业务活动的做法；

——坚决扩大联合公司和企业的独立自主性的范围，提高联合公司和企业取得最大的最终成果所负的责任。为此，要使它们转向真正的经济核算、自负盈亏和自筹资金，使各集体的收入水平直接取决于工作效率；

——各级国民经济部门改用经济领导方法，为此要改变物质技术供应工作，完善价格形成、拨款与信贷制度，制定有效的反浪费办法；

——使管理工作具有现代化组织结构，并考虑到生产的集约化、专业化与协作化趋势。这指的是建立相关部门的综合体、跨部门科学技术中心、各种形式的经济联合公司、地区——生产联合公司；

——保证将部门的经济管理同地区的经济管理合理地结合起来，使各共和国和地区得到综合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安排合理的跨部门的联系；

——实现管理的全面民主化，提高劳动集体在管理中的作用，加强自下而上的监督，加强经济机关工作中的报告制度和公开制度。

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二十七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还指出：苏联处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进行最重大的改组时期。这种改组已经开始进行。工业企业主要向两级管理制度过渡。从1986年开始，经济试验的新的经营方法在企业 and 联合公司中采用，这些

---

<sup>①</sup> 参见（苏）《真理报》1985年6月12日。

企业和联合公司的产值占全部工业产值的一半。他还强调，对以前的改革试验虽一直在进行，但苏联的改革是刚刚起步。<sup>①</sup>

苏共二十七大的后，围绕扩大企业权限，调整国家与企业的关系，继续推行1984年安德罗波夫执政时已开始的改革试验，同时根据二十七大的改革方针，对试验的内容加以完善、充实和提高，并积极着手准备完整的改革方案。

苏共二十七大的还通过了关于《苏联1986年至1990年和至2000年经济和社会发展基本方针》的决定。在这一决定中，专门有一部分论述“完善国民经济的管理”的内容，并要求：“在第十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所有经济部门都要改行新的经营方法。”<sup>②</sup>

1987年苏共中央一月全会对改革进行大讨论和再动员。会议的主题是改革、民主和干部问题，要集中解决的问题是：苏联究竟要不要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并提出要实现根本改革就要依靠民主化和排除来自干部方面的阻力。这里人们会问：根本改革的方针已在1986年2月召开苏共二十七大的决议中通过，为什么时隔不到一年又重新讨论这个问题？主要原因是：二十七大的后，一方面改革逐步取得进展，改革的试验工作在进行；另一方面又出现了不少改革阻力，在推进改革过程中，党内外各阶层特别是干部对改革的认识出现了不同的看法，不少人对改革持“等待”态度，有人“公开阻挠”改革。所以，戈尔巴乔夫在报告中指出：“向好的方面的转变进展缓慢，改革工作比预想的更困难，社会中积存的问题的根源比原来预想的更深。”不少人对改革的复杂性“认识不足”，常常问：“转变是否太急了？”<sup>③</sup>针对这种情况，对根本改革的方针，必须再次进行大讨论，重新分析苏共中央四月全会（1985年）之前党和苏联社会所遇到的问题，以及搞清产生消极趋势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统一认识，以便使已经开始的改革变得不可逆转，并且还需要指出改革的具体方向。

在这次全会上，戈尔巴乔夫一再强调民主的重要性。指出“民主不单纯是个口号，而是改革的实质”。<sup>④</sup>强调民主的主要目的有两个：一是通过民主化来排

---

① 参见《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5—46页。

② 参见《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第311页。

③ 《戈尔巴乔夫关于改革的讲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24页。

④ 《戈尔巴乔夫关于改革的讲话》，第145—146页。

除改革的各种阻力，发展改革形势；二是通过民主化，充分发挥人的作用，以此来推动和实现改革。戈尔巴乔夫在提出民主这一重要性的同时，还强调发展人民自治问题。

在这次全会上，还首次正式提出了两个重要的理论观点：一是苏联社会正在积聚危机因素；二是由于过去政策的失误，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形成了“阻碍机制”。<sup>①</sup>

如果说一月全会主要讨论究竟要不要进行根本改革问题的话，那么六月全会主要解决如何进行根本改革的问题，要提出改革具体原则和方案。戈尔巴乔夫在这次全会上作了题为《关于党的根本改革经济管理的任务》的报告。在报告中明确指出：“今天我们将讨论改革的一个根本问题。这指的是根本改革经济管理，即经营机制的体制的质变。”<sup>②</sup>

在六月全会上，通过了《根本改革经济管理的基本原则》和《苏联国营企业（联合公司）法》（以下简称《基本原则》和《企业法》）两个重要文件。接着，1987年7月17日，苏联又通过了有关计划、价格、财政、银行、物资技术供应体制改革等11个决议。这样就与实施《企业法》相配套，形成了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经济体制改革完整的综合方案。

在1987年经济体制改革的整体方案形成之后，逐渐进入经济体制改革具体实施阶段。

后来改革的实践证明，从1987年下半年到1990年具体实施改革方案过程中，苏联出现了极其复杂的局面，发生了不少重要事件，使得经济改革困难重重。

1987年11月，苏联政治书籍出版社和美国哈泼罗公司分别用俄文和英文出版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一时轰动国际社会，对苏联的改革与对外政策产生重要影响。按戈尔巴乔夫的说法，此书不是学术著作，也不是宣传性论著，但“是以一定的价值观念和理论前提为依据的。这多半是对改革，对我们面临的问题，对变革的规模，对我们时代的复杂性、责任和独特性的评述和思

---

<sup>①</sup> 有关“阻碍机制”问题，在本书《如何认识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的原因与对苏联剧变的关系》一文中，有较详细的论述。

<sup>②</sup> 《戈尔巴乔夫关于改革的讲话》，第332页。

索”。从改革角度讲，戈尔巴乔夫说，要回答的问题有：“何谓改革？为何需要改革？改革的实质和目的何在？改革摒弃什么和创造什么？改革进行得如何？它会给苏联和国际社会带来哪些后果？”<sup>①</sup> 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有个形成过程，它是把此书出版前，戈尔巴乔夫对苏联社会主义、改革和当今世界的各种想法、思考和观点加以系统归纳，并提出了总的看法。如果对新思维的最主要内容作一个非常简要的归纳，大体上说，包括以下含义：从国内来讲，提出对原有的体制必须进行刻不容缓的根本性改革，改革是“第二次革命”，改革“将发生第二次飞跃”，通过改革使社会主义有个新的面貌；从对外关系来讲，“新思维的核心是承认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更确切地说，是承认人类的生存高于一切。”<sup>②</sup>

特别要指出的是，如果在1986年至1987年党内斗争主要表现为叶利钦与利加乔夫之间的话，那么，后来，叶利钦把戈尔巴乔夫视为斗争的目标，斗争的主要内容在各个时期有所不同，但最后发展到如何对待苏共和苏联问题上。

1988年6月28日—7月1日，苏共举行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在会上戈尔巴乔夫作了《关于苏共二十七次代表大会的执行情况和深化改革的任务》的报告。从报告内容来看，提出了不少重要问题和有关社会主义与改革的理论。一直有这样一种看法，认为由于戈尔巴乔夫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根本改革政治体制的任务，这样苏联从这次会议之后，只搞政治体制改革而不搞经济体制改革了。实际上并非如此。

第一，我们可从这次会议的目的来分析。戈尔巴乔夫在会上的报告，首先是总结了从1987年2月召开苏共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以来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情况，一方面指出，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取得的进展，“已成功地阻止了国家滑向经济、社会和精神领域的危机”。另一方指出，这并不意味着，到处都在全速地出现好转和革命性改造已经不可逆转，“还未消除造成障碍的深刻原因”。戈尔巴乔夫明确地指出：“今天我们面临着许多复杂的问题。但它们之中哪个是关键问题呢？苏共中央认为，改革我们政治体制就是这样的问题。”他还讲：“今天，改革的根本问题——经济改革、发展社会主义领域、教育人以主人翁的态度关心对待我国发生的一切——所遇到的障碍正是僵化的权力体制，这个体制的行政强制结构。”

---

①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著，苏群译：《改革与新思维》，第2页。

②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著，苏群译：《改革与新思维》，第184页。

“如果我们不改革政治体制，我们所有的创举，所有业已开创的大规模的事业将会停滞。”“我们在精神领域做了许多工作，并且无论有多大困难都将进行根本的经济改革。但是，如果我们不改革政治体制，那么所有这一切都会付之东流。”仅从上述所引用的论述，可以十分清楚地说明，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之所以提出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其目的就是要保证经济体制改革的不可逆转。

第二，从政治体制改革要实现的基本任务和最终目的来看，它与经济体制改革要达到的目标也是相辅相成的。通过政治体制改革要达到塑造社会新形象的目的，使最终达到的目标与社会主义理想相接近。

戈尔巴乔夫把社会主义新形象最后归为是一种民主的和人道的社会主义。这是第一次提出了“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概念。<sup>①</sup>

第三，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并不只是从保证经济体制改革出发讨论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而且还专门讨论了经济体制改革下一步如何推行问题。戈尔巴乔夫在报告中谈及此问题时，用的标题是：“始终如一地实行根本的经济改革”。他认为，应特别突出讨论“怎样实现根本的经济改革”，并提出：“考虑到已经积累的经验，我们应当精心准备从1989年初开始完成物质生产领域各企业向新的经营条件的过渡。”<sup>②</sup>

我们上面的分析，主要是说，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的目的，不是让经济体制改革停下来，而是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扫除障碍。但后来由于政治斗争的激烈，政治过热，经济体制改革受到很大冲击，这也是客观事实。

1990年7月2—13日，苏共召开了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是在苏联政治、经济形势十分尖锐、复杂，党内产生严重分歧的情况下召开的。会议总结了苏共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以来苏联进行的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的经验、教训及存在的问题，确定了在社会主义选择范围内进行体制改革与更新整个社会的政治方针，这指的是改革指导思想转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1990年7月，在苏共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上，经过激烈争论，在经济改革方面，又肯定了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经济改革总方向。二十八次代表大会还通过了《关于党进行经济改革和向市场关系过渡的政策决议》。决议指出：“向市场关系过渡应该是进行彻底

---

① 参见（苏）《真理报》1988年6月29日。

② 参见（苏）《真理报》1988年6月29日。

的经济改革和改善国民经济状况的主要内容。可调节的市场经济有助于实现‘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能鼓励人们进行生产效率高的、创造性的劳动，建立起一种保持生产者和消费者互利关系的有效机制，消除长期存在的商品匮乏和排队现象，杜绝投机倒把和影响经济的其他表现。”决议还强调：“在遵守各共和国经济平等和主权的情况下发展统一的全苏市场。”<sup>①</sup>

1990年7月，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上谈到苏联改革进程时认为：这个时期，苏联“已经进入改革的最重要阶段，下一步将是大规模的改革。”<sup>②</sup>

戈尔巴乔夫经济体制改革第二阶段特别是到1990年，一个最为突出的特点是，围绕制定与讨论向市场经济过渡方案进行了激烈的政治斗争，成了争权夺利的工具。可以说，经济改革成了政治斗争的“人质”。在这个斗争过程中，随着叶利钦权力与影响的扩大，戈尔巴乔夫时常出现退让与妥协。

在1990年下半年后，并没有出现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二十八次代表大会所期望的大规模改革，经济改革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最后改革以失败告终，成了加速苏联发生剧变的一个重要因素。1991年经济改革之所以难以进行下去，其原因甚多，但从客观情况来讲，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阻碍机制的作用越来越大。另外，直接原因是，这一年政治过热，争权夺利的斗争白热化，政治、经济和民族危机交织在一起，在此情况下，没有人也没有精力顾及经济改革。这一年发生的大事有：波罗的海三国要求独立；罢工、集会和游行示威不断；6月叶利钦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总统；8月19日，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宣布戈尔巴乔夫“由于健康原因无法履行其苏联总统的职责”，由他代理总统职务，并宣布苏联实行为期6个月的紧急状态法。这使苏联国内局势发生剧变。同日中午，叶利钦宣布紧急状态是“反动政变”，并号召举行“无限期大罢工”。8月22日凌晨，戈尔巴乔夫回到莫斯科，称赞叶利钦在粉碎夺权阴谋中起了显著作用；8月23日，叶利钦宣布封闭苏共中央总部，禁止在俄罗斯境内的苏军党组织活动，中止俄共活动，禁止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内务部党组织的活动；8月24日，叶利钦签署法令，承认波罗的海三共和国独立；同日，乌克兰宣布独立。之后，一系列共和国先后宣布独

---

<sup>①</sup>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资料汇编》，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7页。

<sup>②</sup>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资料汇编》，第68页。

立。就在24日这天，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并提出苏共中央“自行解散”，“各共和国共产党和地方组织的前途自行决定”……12月8日，俄罗斯、乌克兰与白俄罗斯的领导人共同签署了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协议，到12月21日，由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中的11个共和国的领导人共同签署了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的文件，正式宣布“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停止存在”，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正式宣布他辞去苏联总统职务。

## 64. 戈尔巴乔夫是怎样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

左凤荣

戈尔巴乔夫认为苏联传统的政治体制最大的问题是人民与政权的分离，为了克服这一弊端，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上任之初他就提出了改革政治体制的问题。戈尔巴乔夫领导的政治体制改革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倡导公开性和民主化，扩大公民的知情权和参与权；第二阶段是实现权力从党向苏维埃的转移，举行人代会代表的选举和召开人代会；第三阶段则改行总统制，放弃苏共对权力的垄断，实行多元化与多党制。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也相应从完善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变成了根本改革这种社会主义。

### 公开性与民主化——完善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

在执政初期，戈尔巴乔夫强调完善发达的社会主义，活跃人的因素，主要是改进工作作风，增强责任感与纪律性。他在1985苏共中央四月全会上说：“主要问题在于怎么样和依靠什么国家才能取得经济的高速发展。政治局研究这个问题时，我们得出了一致的结论，那就是实现这个高速发展的现实可能性是存在的。如果我们把全部工作的中心放在经济的集约化和加速科学技术进步上，改革管理和计划，改革机构和投资政策，普遍加强组织性和纪律性，从根本上改善工作作风，那么加速增长，而且是实质性地增长的任务是完全可以实现的……首先调动人的积极因素，使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极其认真地、高效地工作，那

么我们就可以取得比较好的成效。”<sup>①</sup> 戈尔巴乔夫强调要考虑人的利益和满足民众的需要，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戈尔巴乔夫制定了加速战略，试图通过这一战略改变苏联经济下滑的局面，满足民众的物质需求。

随着“加速战略”推行受阻，体制问题逐渐暴露出来。在苏联原有的体制下，不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把人视为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中的螺丝钉，人民处于无权地位，对于国家的政治生活没有什么影响，因此，戈尔巴乔夫开始强调要把解决人的问题作为改革的出发点，把人民的权利落到实处，认为：“不活跃人的因素，即不考虑人、劳动集体、社会团体、不同社会集团的各种不同的利益，不依靠他们，不把他们吸引到积极的创造活动中来，就不可能完成任何一项任务，就不可能改变国内环境。”<sup>②</sup> 戈尔巴乔夫强调“活跃人的因素”，意在发挥人的主动性作用，把他们吸引到改革进程中来，让他们参与改革事业，这就需要解放思想，破除旧的思维与观念，为此公开性和民主化成为戈尔巴乔夫活跃人的因素的主要手段。

戈尔巴乔夫认为，斯大林时期形成了行政命令制度，官僚主义更加严重，背离了列宁的社会主义思想，“改革的目的是在理论和实践上完全恢复列宁的社会主义概念，而在其中居不容争议的优先地位的，是人及其劳动、理想和利益，是经济中、社会与政治关系和文化中的人道主义价值”。也就是说，让社会主义成为为了人的社会，“为了使人的劳动富有创造性，为了他的幸福、健康、身心发育”。<sup>③</sup> 戈尔巴乔夫认为，苏联的困难和问题不是社会主义这一社会政治制度的危机，而是由于没有充分贯彻社会主义的原则，由于背离甚至歪曲了社会主义是为人服务这一原则造成的，社会主义是能够通过改革自我完善的。为此，必须实行公开性和民主化。

在1986年初召开的苏共二十七大会上，戈尔巴乔夫在列举党的“加速战略”的目标和内容时说：“争取加速，就是说要加强民主，坚定不移地发展人民的社

---

<sup>①</sup> 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全会关于继承二十六大方针的讲话，沈志华总主编：《苏共历史档案选编》第30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00页。

<sup>②</sup>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岑鼎山等译：《改革与新思维》，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第18页。

<sup>③</sup> 米·戈尔巴乔夫：《十月与改革：革命在继续》，莫斯科新闻社出版社1987年版，第28、29页。

会主义自治，扩大党和社会生活中的公开性，为发挥每个劳动者和每个集体的主动性与首创精神开辟广阔的天地。”<sup>①</sup> 他认为：“不讲公开原则，没有也不可能有民主、群众的政治创造性，群众也不能参加管理……那些习惯于马马虎虎工作、欺下蒙上的人在工作公开化的光照下，当国家和社会上的一切受到人民监督、人民看到一切的时候，确实很不自在。因此，我们必须使公开性成为绝对有效的制度。”<sup>②</sup> 戈尔巴乔夫想通过民主与公开性，动员社会力量支持改革，通过公开性，让民众监督政府的工作，从而改变一些人不负责任的现象。1986年4月26日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事故，民众要求知道真相，国际社会也要求苏联提供真实的消息，促进了公开性的发展。

戈尔巴乔夫所说的公开性，其最初的含义是让民众知道真实的信息，对国家管理机关进行监督，戈尔巴乔夫提出，“应该对人民说真话，不要害怕自己的人民，公开性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sup>③</sup> “我们力求在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有更大的公开性。人们应该既知道好的，也知道坏的，为的是好上加好，而同坏的要进行斗争。”<sup>④</sup> 在此基础上，戈尔巴乔夫进一步把公开性与社会主义民主联系起来，认为公开性是民主化的表现，同时也促进民主化的发展，所以戈尔巴乔夫强调：“公开性、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不是例行的运动。这些既然宣布了，就应该成为苏联生活方式的准则。不这样做，任何彻底的改造都是不可能的。没有公开性，就没有也不可能有民主。而没有民主，就没有也不可能有现代社会主义。”<sup>⑤</sup> 理论上这样讲并没有错，关键在于如何行动。

1987年以后，面对经济改革效果不佳的局面，戈尔巴乔夫没有认识到“加速战略”本身是不切实际的。在1987年苏共中央一月全会上，他认为80年代中期以前形成的“障碍机制”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妨碍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要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发展人民自治，“民主的实质就在于劳动者掌权，是

---

① 辛华编译：《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30页。

② 米·戈尔巴乔夫：《苏共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政治报告》，莫斯科新闻出版社1986年版，第63页。

③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岑鼎山等译：《改革与新思维》，第43页。

④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岑鼎山等译：《改革与新思维》，第61页。

⑤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岑鼎山等译：《改革与新思维》，第65页。



1986年戈尔巴乔夫（前中）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

实现劳动者的广泛的政治与劳动权利的形式，是他们关心改革并实际参与改革的形式”。他提出：“苏联社会的进一步民主化成了党的紧迫任务。”<sup>①</sup>为此，戈尔巴乔夫首先在社会生活领域推进民主化，试图通过公开性打破“障碍机制”，促进经济体制的改革。苏共中央选派倾向于激进改革的新闻工作者领导有影响的报刊（《消息报》、《莫斯科新闻》、《星火》、《共产党人》、《真理报》等），目的是唤醒社会意识、监督干部的行为、动员改革力量。到1987年年中，“持不同政见者”陆续被释放，他们的作品也开始合法地在苏联出版，成为人们争相传阅的畅销书。

1988年苏联结束了书报检查制，苏联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言论自由和社会舆论多元化。公开性迅速被社会各阶层所接受，并变成了一股强大的潮流，长期受到压制的苏联知识分子成了公开性的热烈拥护者。“公开性解放了千百万人们

<sup>①</sup> 《苏联东欧问题译丛》1987年第2期，第12页。

的思想，促使大多数人民群众去独立地进行思考，不再唯‘上面’的意志是从。”<sup>①</sup>但是，公开性也是一把双刃剑，在打破旧有思想禁锢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公开性开始之时，人们主要关注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体制完善的因素和如何进行卓有成效的改革，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都出现了一些团体，其多数参加者的倾向都支持改革，要建立“带有人的面孔的社会主义”。在1988—1989年，公开性开始进入历史—文学领域，全苏联人都在读雷巴科夫反映苏联30年代大清洗的小说：《阿尔巴特街的孩子们》。随后许多作家发表了类似的作品，人们争相传阅索尔仁尼琴的长篇小说：《古拉格群岛》。一些反映社会阴暗面的影片上映了，斯大林时期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被揭露。1988年3月13日列宁格勒的女教师安德列耶娃在《苏维埃俄罗斯报》上发表《我不能放弃原则》一文，反对否定斯大林和原来的体制。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组织对她进行批判，辩论变成了一场谴责，保守势力受到了很大打击。此时，苏联的经济改革让人看不到生活好转的希望，旧的政治体制和官僚特权阶层自然成了人们攻击的对象，公开性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重算苏共、特别是斯大林时期的历史错误。主张进行激烈变革的舆论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抛弃斯大林模式，建立新的社会主义模式，成了苏联社会的普遍要求。在经济承诺无法兑现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只能用政治上的让步来换取民众的支持。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公开性促使戈尔巴乔夫走上了根本改革苏联政治体制之路。在1988年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上讨论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时，苏共就达成了共识，即不是改革现有的体制，而是使这个体制有崭新的结构和成分，赋予它新的内容和活力，也就是进行根本性变革。

### 权力从党向苏维埃转移

1988年6月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认为政治体制改革是改革不可逆转的极其重要的保证，是要解决的关键问题。“目前的政治体制不能使我们预先防止最近几十年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停滞现象的增多并且注定使当时进行的改革归于失败。经济管理职能越来越集中在党政领导人手中，这已成为突出的现象。”“现行的政

---

<sup>①</sup>（俄）尼·雷日科夫著，李永全等译：《大动荡的十年》，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312页。

治体制几十年来不是在法律范围内组织社会生活，而主要是执行强制命令和指示。口头上宣扬民主原则，实际上却是独断专行，在讲台上宣扬人民政权，实际上是唯意志论和主观主义，大谈民主制度，实际上是践踏社会主义生活方式准则，缺乏批评和公开性。”经济、社会文化改革“所遇到的障碍正是僵化的权力体制，这个体制的行政强制结构”。这种分析是符合苏联实际情况的，改革政治体制也是必需的。戈尔巴乔夫认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最终目的和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改革的主要标准是，全面充实人权，提高苏联人的社会积极性”。“改革的核心是让人作为主角回到政治进程中去，回到经济中去，回到社会精神领域的发展中去。把业已开始的为克服使人失去生产资料、失去权力、失去文化的变革工作继续下去并进行到底。”<sup>①</sup> 苏共提出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恢复列宁“一切权力归苏维埃”，把立法、管理和监督的职能集中于苏维埃，提高这个经选举产生的机关和代表的作用，实际上就是把权力从党转到苏维埃手中。为了体现党的领导，戈尔巴乔夫又强调：“用党的威信来加强作为人民代表机关的苏维埃的作用……把同级党委会的第一书记推荐到苏维埃主席的岗位上。”他认为：“如果党委第一书记将被选为苏维埃主席，那么这将会提高苏维埃的威信，加强对执行委员会及其主席的活动的监督，在管理工作的重心转移到苏维埃的情况下，将能更准确地区分党和苏维埃机关的职能。”<sup>②</sup>

于是，苏联开始了“还权于苏维埃”的改革。戈尔巴乔夫提出，党要把不属于它的那些权力和职能统统归还给国家政权机关，即实行权力中心从党的机关向苏维埃国家机关的转移。苏共重提十月革命时期“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著名口号，并采取了改革国家机关的重大步骤，增强苏维埃的权威，增强政府的决策和执行能力。但是，戈尔巴乔夫要“用党的威信来加强作为人民代表机关的苏维埃的作用”，其办法是把同级党委会的第一书记推荐到苏维埃主席的岗位上。1988年10月1日，戈尔巴乔夫兼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在自己的手中集中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

①（俄）米·谢·戈尔巴乔夫著，述弢等译：《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77页。

② 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的报告，《苏联东欧问题译丛》1988年第5期，第22、23页。

与此同时，戈尔巴乔夫仍强调公开性的重要性。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专门就公开性问题作出决议，决议“把公开性视为实现人民的社会主义自治和实现公民的宪法权力、自由和职责的必要条件。所有领域里的公开性是继续深化改革及其不可逆转过程的最重要条件之一”。规定：“必须取消使用关于社会经济和社会政治发展、生态环境等统计信息的不合理限制，建立以现代化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搜集、处理和传布体系，保证各类图书馆开放，用立法方式整顿档案资料的利用。”“制止报刊发表批评文章，以及刊登有损公民名誉和人格的非客观报道文章都是不允许的。公开性要求大众信息媒体担负起社会、法律和道德责任。”“不容许利用公开性损害苏维埃国家、社会的利益，损害个人权利；不容许宣传战争和暴力，反动的种族主义、民族和宗教偏执性，以及宣传残暴行为，传布淫秽作品，不容许利用公开性行骗。”<sup>①</sup>应该说戈尔巴乔夫关于公开性的初衷和实行都是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作为一个人民国家，民众有知情权和参与权，但是，苏联没有在相应的法律建设上下工夫，苏联人也缺乏法律意识，公开性并没有真正起到促进改革、提高全民共识的作用，正如沃尔科戈诺夫所说：“戈尔巴乔夫开始了这一进程，但这一进程后来的发展并不是由他的决议所决定的。事实上公开性从内部破坏了建立在阶级谎言基础上的体制。”<sup>②</sup>公开性带来了社会的多元化，此时戈尔巴乔夫认为：“在公开性和具备社会组织的情况下，可以在一党制下搞政治多元化。”<sup>③</sup>

1989年从上到下进行了新的国家权力机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与以前不同，这次实行差额选举，社会组织正式派代表参加选举。2250名代表按下列程序产生：750名代表从选民人数相等的地区选区选举；750名代表从民族地区选区选举（每个加盟共和国32名，每个自治共和国11名，每个自治州选举5名，每个自治区选举1名）；全国性社会团体（包括苏联共产党、青年团、工会等）共选举750人。1989年4月4日，选举结果公布，在2250名代表名额

---

① 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关于公开性》的决议，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0卷，第512—513页。

② Волкогонов Д. А. Семь вождей: В2 кн. кн. 2. М., Фирм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СТ. 1999. С. 315.

③（俄）斯拉文、戈尔巴乔夫著，孙凌齐等译：《尚未结束的历史——戈尔巴乔夫访谈录》（修订版），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22页。

中共党员占87.6%。但是，许多党的干部落马，有20%的党员在竞选中被淘汰，莫斯科市市长塞金、市委书记普罗科菲耶夫落选，列宁格勒州委第一、第二书记，市委第一书记、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和市计委主席全部落马，许多反对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叶利钦、索布恰克、波波夫、萨哈罗夫都成了人民代表。共产党的100名代表是通过等额选举产生的，因为很多人担心差额会把自己差掉。戈尔巴乔夫在政治局会议上仍然很乐观，认为苏共党员占87%的比例显示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他认为，“这次选举在实施政治改革中迈出了极其重要的一步。搞政治改革是我们自己作出的决议。通过选举，社会将步上一个新的层次，会消除宪法规范和政治实践之间的脱节。政权将获得充分的合法性，这本身便是巨大的成就”。<sup>①</sup>但是，雷日科夫对此进行了反驳，他认为党在选举中失败了，按民族地域选区推举的地方组织的30名候选人，很不光彩地落马了，输给了资历不深、名气不大但却更加“令人信服”的竞争对手。<sup>②</sup>利加乔夫、索洛维约夫、卢基扬诺夫等也忧心忡忡，也不完全同意戈尔巴乔夫的看法。戈尔巴乔夫后来承认，“选举表明，只要人们不再害怕党，并且相信党的统治再也无法用暴力来维持，党的威信就马上一落千丈。从这时起，人们对共产党人表示信任，但那已经不是把他们当成强大的政权机构的代表，而是当成个人”。<sup>③</sup>

1989年5—6月第一届人代会召开，代表大会上集合了各种各样的人，提出了各式各样的观点。在这次会议上，人民代表首次有权组织政治反对派，成立了跨地区议员团，起初有150人，1989年夏天发展到388人，其中286人来自俄罗斯联邦。事实证明，这种人数众多，代表观点各异的苏维埃是“清谈馆”，它没有权威，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它只是个立法机关，无法承担起管理国家的职责。但是这个民选的人代会排斥了党对立法和高层决策、高层领导人事权的控制，成了民主派强有力的阵地。叶利钦等反对派在大会期间的活动和发言成为这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事件，这是自20世纪20年代党内斗争结束后，苏联出现的第一个合法的政治反对派。其代表萨哈罗夫在发言中明确提出：废除苏联宪法第六条；只有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才能通过法律，这些法律在加盟共和国需经其最

①（俄）米·谢·戈尔巴乔夫著，述弢等译：《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上册，第510页。

②（俄）尼·雷日科夫著，李永全等译：《大动荡的十年》，第519页。

③（俄）米·谢·戈尔巴乔夫著，述弢等译：《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上册，第516页。

高法律机关批准才能生效；苏联人代会选举和罢免国家高级公职人员（包括最高苏维埃主席、副主席，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宪法监督委员会主席、最高法院院长、苏联总检察长、中央银行行长、克格勃主席、广播电视委员会主席、《消息报》主编等）。<sup>①</sup> 他的发言成为反对派的纲领，站在这一反对派阵营的代表人物还有阿法纳西耶夫、波波夫、索布恰克等。他们要求改变共产党在社会中的地位，要求实行广泛的民主化和公开性，党的机构不能干涉舆论；国家领导人实行由人代会选举产生的制度，选举应该是差额选举；加大改革力度，给共和国以更多的独立性和主权，打破行政命令体制，解决社会公正问题，消除少数人的特权；甚至还有人直接攻击戈尔巴乔夫，说他受周围溜须拍马者和夫人的影响。

1989年6月，苏联新的最高国家权力机构建立，戈尔巴乔夫当选为最高苏维埃主席。与以前不同的是，最高苏维埃变成了常设制，由人民代表大会从人民代表中选举产生，成员有542人。一年召开两次例会。以前党事实上掌握的立法权和政府干部任命权转归了最高苏维埃。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是其常设机构，也不再由最高苏维埃选举产生，而是由最高苏维埃主席、第一副主席、15名副主席（各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联盟院和民族院主席、苏联人民监督委员会主席、常设委员会主席和最高苏维埃委员会主席组成。新设立的最高苏维埃主席成了国家的最高元首。由于其成员并非完全专职，无法有效地工作。特别是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戈尔巴乔夫陷于繁杂的议会事务中，无法把主要精力放在处理国家事务上。新设置了宪法监督委员会，委员会由代表大会从政治和法律专家中选举组成，其成员有主席1人，副主席1人，委员21人，委员会在履行自己职责时完全独立，只服从于苏联宪法，但这个委员会并没有发挥什么作用。

改革的重心转入政治体制改革后，苏联社会政治气氛空前活跃，斯大林体制成了明确的被批判对象，造成了戈尔巴乔夫始料不及的后果：国内的民族情绪发展，民族矛盾公开化，中央政权难以应付危机；舆论多元化发展成政治多元化，各种非正式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如拉脱维亚有“人民阵线”，乌克兰有“乌克兰拥护改造人民运动”，各加盟共和国都建立了“人民阵线”，其代表于1988年8月13日在雅尔塔进行工作会晤；官僚体制对改革进行抵抗，经济形式更加

---

<sup>①</sup> Киселева А. Ф., Шагина Э. М. (под ред.) Хрестоматия по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истории (1946—1995), М., Гуманит. изд. центр ВЛАДОС. 1996. С. 323.

恶化。1989年7月29—30日，400多名苏联人民代表自行串联，在莫斯科电影工作者之家举行了人民代表跨地区代表小组第一次会议，成立了变相的反对派议会集团，选举叶利钦、萨哈罗夫、阿法纳西耶夫、波波夫和帕尔姆为小组主席。1989年12月，一些人民代表发表关于政治改革的声明指出，“大多数居民正是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丧失或已经丧失了对改革的信任，认为改革多半是口头的和表面的。许多人甚至不相信米·谢·戈尔巴乔夫。这种潜在的可怕的信仰危机，公开的不满和气愤与日俱增，并影响着从春夏开始一直持续到现在的改革的第四阶段”，“改革的进程已到了原则的边缘，各机构反动头目的对抗在增长，戈尔巴乔夫领导的犹豫更一目了然。但是，错了。东欧发生的大好事就是例子，对于那些打算在不确定的时期内保持强行的‘苏联共产党的先锋队 and 领导作用’，对于那些打算保留经济部门、指令性计划、国营集体农庄系统的垄断权的人是足够清晰的警告。必须在一定时候开始拆除这一切”。<sup>①</sup> 苏共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苏共一党执政被看成是与民主不相容的现象。

实践证明，戈尔巴乔夫照搬十月革命时期“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做法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是不成功的，现代社会本来就是一个分工明确的社会，苏联政治体制的主要问题是最高领导人的集权和党垄断一切，戈尔巴乔夫把立法、监督、执行权力都归苏维埃的做法实质与以往并无区别，区别在于党的领导更有效率，而苏维埃这个更加庞大的机构没有任何效率。这迫使戈尔巴乔夫不得不继续进行改革。

## 实行总统制，根本改革国家的政治体制

苏联实行人民代表苏维埃制度，特别是戈尔巴乔夫兼任了最高苏维埃主席后，总书记的权限开始向最高苏维埃分权和转移。但是，最高苏维埃本质上的功能是议政、立法和监督，不能有效地作出决策，它也缺乏有效贯彻其决策的系统，因此，出现了权力真空和失控的现象。为了弥补最高苏维埃议而不决的缺陷、摆脱党对戈尔巴乔夫的阻碍作用，权力归苏维埃没多久，戈尔巴乔夫又进一

---

<sup>①</sup> 《苏联人民代表关于政治改革的声明（摘录）》，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0卷，第528页。

步提出要在苏联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和社会管理体制的思想，同时还陆续派出一些代表公开或秘密地前往美国、法国等地考察西方的议会制和总统制。1990年2月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戈尔巴乔夫首次公开提出在苏联设立总统制的建议，要求给总统一切必要的权力以便将改革的政策付诸实施。从这时开始，苏联才开始按西方的三权分立原则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

改行总统制也是多党制发展的要求。1989年以后，各民族共和国的人民阵线、民主组织发展迅速，萨哈罗夫、叶利钦的跨地区议员团活动频繁。1990年春，非正式组织发展到了几万个，实际上是三股力量在较力：暂时还掌握权力的共产党，确切说是党的最高机关；反对派在朝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是民主的运动和组织，另一个是民族主义性质的政党。到1990年春各共和国和地方选举人民代表前夕，俄罗斯联邦的民主反对派结成联盟，其基础是“民主俄罗斯”运动。“民主俄罗斯”运动内有俄罗斯民主党、宪法民主党（人民自由党）、俄罗斯东正教民主运动、俄罗斯农民党。<sup>①</sup> 苏联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多党并存，在1990年1月22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在讨论国内政治气氛时，雷日科夫就认为：“我们在实践上已经转向了多党制。看不到另外的路。人民阵线发展成了政治组织。或者我们不承认这一现实，或者与其他政党一道走上广泛的民主制。需要明确做出回答：跟谁斗争和跟谁联合。”<sup>②</sup> 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等基本同意雷日科夫的看法。但是，利加乔夫还坚持“应该保持一党体制。建立广泛民族公民阵线，把一切健康力量团结到这一阵线中。而共产党员要占据关键职位”。<sup>③</sup> 梅德韦杰夫、卢基扬诺夫等人也认为苏共的路线不是多党制。

在1990年2月苏共中央全会召开的前一天，莫斯科举行了由“莫斯科选民协会”、“莫斯科人民阵线”等激进派组织召集的规模空前的集会，集会的讲坛就在中央委员们所住的莫斯科饭店外的一辆卡车上，集会打出的标语口号有：“把多党制写进苏联宪法”、“取消宪法第六条”、“权力不能垄断”、“不要专制独裁者”、“政治局辞职”、“中央委员会辞职”等等，叶利钦等激进派首领在会上

<sup>①</sup> Власть и оппозиция. Российский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процесс XX столетия. М., РОССПЭН. 1995. С. 313.

<sup>②</sup> АГФ (戈尔巴乔夫基金会档案), Фонд 10, опись 2, Союз можно было сохранить. Белая книжка. М., АСТ. 2007. С. 126.

<sup>③</sup> АГФ, Фонд 10, опись 2, Союз можно было сохранить. Белая книжка. С. 127.

发表演说，称苏共已经没有能力对本身进行根本改革，必须彻底改革党的机构，取消宪法第六条。这次集会的目的，显然是向中央全会施加压力，戈尔巴乔夫没有对集会进行干涉，他也想借此向苏共党内的传统派施压。2月5—7日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决定放弃一党制原则，承认了多党制的合理性和修改宪法第六条的必要性。党的高层领导几乎一致同意放弃党对权力的垄断，同意修改宪法第六条。在戈尔巴乔夫看来，“党的革新需要对党与国家机关、经济机构的关系进行重大变更，要放弃实际上向它们发号施令和取代它们职能的做法。党只有作为一种民主承认的力量，才能在革新着的社会中生存和起到自己的先锋队作用。这就是说，它的地位不应当通过宪法来强行合法化。不言而喻，苏共准备为争取执政党的地位而斗争，但这将严格在民主进程范围内进行，放弃任何法律上的和政治上的优先权”。<sup>①</sup> 雷日科夫也说，“我们感受到一个真理，即任何一个党都不能永远垄断权力，先锋队的地位不是宪法赐予的。因此，十分重要的是，在全会上我们应当老老实实、认真、十分负责地正视真实情况，不管它是多么痛苦”，“讨论是否需要多党制的问题已经过晚。实际上多党制已经存在。不管各种社会政治运动的动机如何，这一主张正在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反响……我们必须掌握同其他社会政治实体共同工作和生活的重要学问。”<sup>②</sup> 苏共中央全会决定向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提出修改宪法第六条的动议，取消关于苏共是政治核心，是社会领导力量的提法。虽然戈尔巴乔夫开始想在一党制下进行改革，但现代民主政治以权力制衡和政党竞争为前提，不可能建立在一党制的基础上，苏联党内的民主纲领派和激进改革派实行多党制的要求是无法拒绝的，这是苏共顺应形势发展不得不作出的选择，正如雅科夫列夫所说：“任何激进的改革一开始就应该考虑自己改革的预先设想和时间表将会被推翻。生活这个主人会提出自己的速度、自己的逻辑、自己的事件先后顺序，会暴露自己的任性和失误，会显示出是悲剧演员还是喜剧演员，是英雄还是掘墓人来。”<sup>③</sup>

---

①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资料编辑中心编：《苏共中央二月全会文件选编》，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第4页。

②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资料编辑中心编：《苏共中央二月全会文件选编》，第124、125页。

③ （俄）亚·尼·雅科夫列夫著，徐葵等译：《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209页。

1990年3月，苏联第三次非常人代会开幕，会上就要不要设立总统职务和怎样选举总统进行了辩论。实行总统制本是激进派的主张，戈尔巴乔夫曾反对，现在他同意实行总统制，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感到自己在党内的地位不稳，威信在下降，当了总统，便可以摆脱党的制约，不会因为党内形势的变化影响到他的权威。设立总统制，使党和国家分开，国家便不再属于任何一个政党。另外，苏联的混乱局面、日益恶化的形势，也需要有一个拥有强有力权力的国家元首。同时，戈尔巴乔夫接过激进派的这一主张，也使激进派措手不及。在人代会上，绝对多数票通过了实行总统制的决议；跨地区议员团提出要由民众直接选举总统，反对派成员阿法纳西耶夫则提出反对总书记兼总统，他担心戈尔巴乔夫会因此成为独裁者。这个提议正中党内传统派的下怀，戈尔巴乔夫当总统，正好给他们提供了一个选举新的总书记的机会，也许可以重新加强党的权力，与戈尔巴乔夫抗衡。反对派很快认识到了这个问题，重新收回了这一提议。第三次人代会通过了“关于设立苏联总统职位和对苏联宪法（根本法）的修改和补充”。规定实行总统制，总统由全民选举产生（第一任苏联总统由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任期5年，连任不得超过两届。总统是国家的元首，享有广泛的权力，包括总理、内阁成员、最高法院院长等重要公职人员的提名权，签署苏联法律、宣布实行紧急状态、解决苏联最高苏维埃两院争端等；苏联最高苏维埃只享有立法和监督职能，卢基扬诺夫被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戈尔巴乔夫以1329:495票当选苏联第一任总统，有不少人弃权。

第三次苏联非常人民代表大会还通过了《苏联宪法修改补充法》，修改了宪法第六条、第七条，规定“苏联共产党、其他政党以及工会、共青团、其他社会团体和群众运动通过自己选进人民代表苏维埃的代表并以其他形式参加制订苏维埃国家的政策，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一切政党、社会团体和群众运动在履行其纲领和章程所规定的职能时，应在宪法和苏联法律范围内进行”，“苏联公民有权结成政党、社会团体，参加有助于发挥政治积极性和主动性、满足他们多种利益的群众运动”。苏共成了与其他政党和社会团体地位一样的政党，苏共开始从一个执政党向一个在议会中活动的群众性政党过渡。“我们应当毫不含糊地声称，苏共将毫无保留、斩钉截铁、毫不妥协地摒弃践踏社会主义精神和道德理想的斯大林的思想与实践。党坚决支持苏维埃拥有全权，人民当家做主；党不再赋有政权职能和经济职能，不再奢望垄断地位，不再谋求意识形态上的强行一致。党将

通过说服工作，通过在群众中开展政治工作，参与议会辩论，在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的活动，去争取社会对于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的支持”，<sup>①</sup>意味着苏共不再是苏联政治体制的核心，苏共在法律上变成了一个与其他政党一样的社会组织，苏联开始实行多党制。

国家的最高权力转移到总统系统，各共和国也效仿联盟中央实行总统制，民选产生了自己的总统和苏维埃主席，他们不是对联盟中央，而是对本共和国的选民负责，许多戈尔巴乔夫的反党派“和平”夺取了政权。但是，苏联的总统制并不是西方式的三权分立，法治建设明显滞后，实际上仍是另一种集权。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关系国家命运的新联盟条约的问题不是在最高苏维埃决定的，而是由戈尔巴乔夫这个苏联总统与各加盟共和国的首脑决定的，实际上是大总统与小总统支配着国家，最高苏维埃被抛在一边。戈尔巴乔夫当上总统后，成立了总统委员会和联邦委员会，行政实权落到了总统委员会的手中，总理及其领导下的部长会议只是执行总统委员会所制定的政策。在改革政策上，雷日科夫与总统的分歧也越来越大，在雷日科夫看来，苏联不仅需要强有力的总统，也需要强有力的政府。雷日科夫认为在联盟条约签订前对政权体制进行改变只会引起混乱，而戈尔巴乔夫却对政治体制进行无休止的改革，于1990年11月撤销了总统委员会，把联邦委员会从议事机构变为协调联盟中央和各加盟共和国行动的决策机关，取代总统委员会成为最高决策机构。

作为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权力，但他并没有真正利用自己的权力去维护联盟的统一，也没有利用这一权力整顿国家秩序，挽救国家的经济。改革后期，特别是1991年以后，戈尔巴乔夫已起不了多大作用了，“改革”进程并未按照戈尔巴乔夫的设想发展，苏共反对派开始左右苏联社会的发展方向，这时苏联政权的政治资源已经大部分落入到戈尔巴乔夫亲自培植的政敌——叶利钦之手。

经过1990年后的政治体制改革，苏联基本上转向了多元化、多党制、总统制，这与从前的体制有了实质性的差别，但这一体制是不完善的，中央行政权力大为削弱、法律体系不健全，难以挽救局势和摆脱危机。

从戈尔巴乔夫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过程看，其进展有一定的内在逻辑性，正

---

<sup>①</sup>（俄）米·谢·戈尔巴乔夫著，述弢等译：《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上册，第642页。

是公开性的发展使苏联社会出现了多元化，民意要求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增大，民主选举和“全部政权归苏维埃”打破了苏共对权力的垄断，在国家权力失控的情况下，苏联又改行以总统集权为特征的总统制。从实践的效果看，戈尔巴乔夫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不成功的，它没有促进经济的发展，也没有建立起有效管理国家的、民主的政体模式。从1989年起，各地罢工风潮迭起，社会脱离了法制轨道，“街头政治”泛滥成风，国家处于无政府的混乱状态，民族矛盾激化，民族冲突不断，最后导致了国家的分崩离析。但是，我们也不能从中得出他不应该搞政治体制改革的结论，政治体制是社会主义改革的重要内容，戈尔巴乔夫的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成功，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首先是历史包袱过于沉重的因素，阻碍改革的“障碍机制”过于强大；第二，戈尔巴乔夫的政策存在严重失误，在经济改革没有成效，人民群众没有得到实惠的情况下，政治体制改革匆忙上马，政策措施又不配套，难以起到提高政权威信的作用，更无法促进经济的发展；第三，受俄罗斯民族缺乏耐心、好走极端的影响，政治体制改革的许多措施是在民众急躁情绪的推动下实行的，政策刚刚执行，还没有见到效果，群众又不满意了，又不得不再出台新政策，缺乏稳定性和连贯性的政策，又让人无所适从；第四，也有来自外部世界压力的影响，西方的品评与干涉、东欧的剧变都对苏联的改革产生了重要影响，苏联显然没有处理好内部改革与外部世界影响的关系，没有利用好有利条件，化解不利因素。苏联的教训说明，政治体制改革是十分复杂的工程，既不能急于求成，也不能被群众的自发性所左右。

## 65. 戈尔巴乔夫时期对外经济体制进行了哪些改革？

陆南泉

苏联建国 70 多年来，在发展对外经济关系方面虽有了不少发展，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有其很大的局限性。例如，从对外经济关系形式来看，主要是商品贸易，对外的生产技术合作、投资等很不发达，从地区结构来看，主要限于经互会国家范围内。苏联为了实现从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的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为了缩短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技术差距，为了在充分发展经济的基础上，提高生产技术水平与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已成为发展苏联经济的一项战略性任务，亦是一种客观的必然趋势。

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对外经济体制的改革，一方面是实现根本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实现加大开放力度，使苏联经济日益国际化与达到融入世界经济的目的。戈尔巴乔夫在 1987 年苏共中央六月全会上讲：“在当今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认为自己在经济方面能够与其他国家隔绝。我国在这方面也不例外。苏联经济是世界经济的一部分。各个国家的国际贸易和外汇财政相互关系，以及最新科学技术改造，都不可避免地以某种形式影响我国的经济状况。”<sup>①</sup> 雷日科夫在苏共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上也强调指出：“在当今世界上，积极发展经济和科学技术联系，参加国际分工，都是极其必要的。”<sup>②</sup> 这次会议通过的关于《苏联 1986 年至 1990 年和至 2000 年经

---

① 《戈尔巴乔夫关于改革的讲话》，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381 页。

②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21 页。

济和社会发展基本方针草案》规定，要大大扩大对外经济联系。苏联还强调，对外经济体制的彻底改革，可成为科技与经济发 展的强大加速器。到了 1990 年 7 月的苏共二十八大，由于经济形势的恶化，戈尔巴乔夫在谈到改善经济状况时指出：“苏联经济的健康化，在不小程度上取决于它纳入国际分工体系的状况。”<sup>①</sup>

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为了使苏联经济能更快地融入世界经济，使其经济适应开放与国际化这一总趋势的要求，在对外经济体制领域采取一系列改革政策与措施。

### 对外关系经济化与国际关系非意识形态化

戈尔巴乔夫对外政策新思维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尽管当今世界矛盾重重，存在着多种多样的社会经济制度，各国人民在不同时期做出的选择也各不相同，但世界是一个。它是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和相互需要的统一整体；而且各国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越来越紧密。当今世界的统一性和完整性，从社会经济角度来讲，主要由以下因素决定：第一，由于科技革命的迅速发展大大加速了各国经济国际化的发展。现代科技的发展，一方面促进了生产力的大发展从而要求世界开放，加强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和合作；另一方面又为经济国际化创造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和技术条件，如提供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和电信，从而使地球大大缩小了。第二，世界各国面临着涉及全人类命运的一系列全球性问题，如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护生态平衡，消除各种可怕的新老疾病及世界广大地区的饥饿和贫困，开发宇宙和海洋以造福于全人类。而当今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有能力单独解决这些问题。因此，必须加强国际合作，建立起有效的国际秩序和协调机制。这些都有力地推动着各国经济国际化的进程。

戈尔巴乔夫执政期间，在全力推行国内改革政策的同时，一直积极地调整对外政策。从发展对外经济关系角度看，苏联调整对外政策的主要目的在于：

一是要改变苏联在世界上的形象。为此，戈尔巴乔夫强调：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可以保留自己的哲学、政治、意识形态观点和自己的生活方式。在外交活

---

<sup>①</sup>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资料汇编》，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5 页。

动中，要实行灵活的政策，要进行理智的妥协。苏联认识到，只有其形象改变之后，才能为其国内改革和经济发展创造宽松的国际环境，才能顺利地发展对外经济关系。

二是在处理国际关系时，强调求同存异，不把意识形态的分歧搬到国际关系中来；承认各国人民有权选择自己的社会发展道路，更多地着眼于同其他国家发展经济关系。

三是要使对外政策直接为苏联经济国际化服务，拓宽苏联与世界各国经济联系和合作领域，使苏联经济成为世界经济的一部分，冲破过去传统的自我封闭的思想。<sup>①</sup> 正如时任苏联外长的谢瓦尔德纳泽指出的，目前苏联外交正处于一个非常重要的和不平常的时期，今天使苏联对外政策“更经济化”的时候到了。<sup>②</sup>

十分明显，戈尔巴乔夫时期在发展对关系方面的指导思想是“国际关系经济化、国际关系非意识形态化”。这种“更经济化”的外交政策，无疑是促进当时苏联经济国际化的催化剂。

戈尔巴乔夫执政期间，在对外经济关系问题上提出的新思维，还与以下几个因素密切相关：一是不再像过去那样用简单化的方法去看待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认为，随着科技革命的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还有很大的余地。1987年10月10日戈尔巴乔夫在访美期间向美国实业界人士表示：苏美经济协作在某种程度上将有助于解决苏联的问题。<sup>③</sup> 二是戈尔巴乔夫当时认识到，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已进入科技革命阶段，加强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与技术合作，是实现苏联科技进步任务的一项战略性任务。对此苏联科学院院士普里马科夫在分析苏共二十七次与世界经济及国际关系问题时指出：“必须以现实主义的态度注意到资本主义的经济已进入科技革命的新阶段。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加速科技革命的过程已经出现。这种加速过程的主要领域是微电子学、信息学、新科技的生产、生物工程等。”因此，“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科技革命的研究非常重要。”<sup>④</sup> 这就要求，在资本主义经济进入科技革命阶段之际，苏联必须通过经济体制改

---

① 参见（苏）米·谢·戈尔巴乔夫著，苏群译：《改革与新思维》第三章有关部分，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

② 转引自《苏联东欧问题》1989年第4期。

③ 转引自陆南泉主编：《苏联改革大思路》，沈阳出版社1989年版，第213页。

④ （苏）《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1986年第5期。

革，加快新技术的引进与开发，促进科技的发展，使本国科技的进步能跟上世界新科技革命的浪潮。三是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时，中国与东欧一些国家，改革与开放出现了新的浪潮，这些国家特别是中国，对外开放已取得了不少进展。应该说，这对当时苏联推行开放政策是个促进因素。

### 赋予各部门、企业直接进入国外市场的权利

对外贸易的发展水平，是反映一个国家经济国际化程度的综合性标志，也是推行经济国际化政策普遍的、基本的形式。

苏联建国以来，已同世界 140 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贸易关系。1988 年苏联外贸总额为 1320 亿卢布，这比 1950 年增长了 44 倍。但总体来说，由于长期实行外贸垄断制，产品缺乏竞争力，出口结构单一等因素的制约，外贸水平远不能与世界经济国际化发展进程相适应。1988 年，苏联出口总额为 670 亿卢布，占国民生产总值 8660 亿卢布的 7.7%。

戈尔巴乔夫执政后，一直不断地在改革外贸体制，其改革的一个重要趋势是：通过外贸渠道，使各部门、地区和企业有可能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并为此注入各种刺激机制，以此来加速苏联经济国际化的进展。所采取的措施有：

#### 首先，从理论上重新认识外贸垄断制原则

过去苏联在谈到外贸垄断时，常常引 1918 年 4 月列宁签署的人民委员会《关于对外贸易全部国有化》法令中的一段话：“全部对外贸易实行国有化，同国外和外国人个别贸易企业买卖各类产品（采掘业，制造业，农业及其他）的交易，只能由以俄罗斯共和国的名义专营此事的全权机关进行，除这些机关外，同外国的任何进出口交易一律禁止。”列宁并没有把外贸垄断说成是只能由一个部或一个主管机关来垄断。当时有权进入国际市场的，不仅有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及全国消费合作社，而且还有其他一些组织，例如，20 年代初就有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全苏联消费合作社同私人企业家共同建立的“皮革原料内外销股份公司”。这些都说明，在当时来说，对外贸易垄断也不应该理解为由一个主管部门来垄断，更不能理解为独家经营。

#### 其次，实行对外贸易管理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原则

1986 年 8 月 19 日，苏联通过的《关于完善对外经济管理措施的决议》中规

定：在保持和发展对外经济活动国家垄断的同时，迫切需要扩大各部、主管部门、联合公司、企业和组织在这个领域的权力和加强它们的责任性，保证它们走向国外市场，加强对发展国际合作和加速采用最新科技成果的兴趣，从而提高对外经济联系的效率。外贸管理权仍然是实行垄断原则，目的是使国家有效地控制对外经济关系，使国家利益不受损害。为此，新成立的对外经济委员会（它取代了原来的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其主要职能是：负责全面领导，制定远景计划，监督与协调外经外贸工作，实现外经外贸归口管理，统一对外，防止政出多门。与此同时，下放外贸经营权，逐步改变外贸部门垄断外贸的局面。

1987年，苏联授权22个部门，77家生产联合公司、企业和组织可以面向世界市场，直接经营进出口业务。这些部门和企业获得外贸经营权后，进出口额大大增加，1987年就已占全苏外贸总额的19.5%，出口的机器设备、运输工具占该类商品出口额的4.6%。1988年底，苏联又通过《关于进一步发展国营、合作社营和其他社会性企业、联合和单位的对外经济活动》的决议，规定从1989年4月1日起，凡产品（工程和服务）在国外市场具有竞争能力的所有企业、联合公司、生产合作社和其他单位，都有权直接从事进出口业务。苏联企业对这种直接联系形式的外贸活动，怀有极大的兴趣，促使企业关心其他产品的竞争能力，研究世界行情，尽快以最新技术更新其生产设备，生产现代化的产品，以扩大产品出口量。1998年，由企业直接从事的进出口贸易，已占苏联外贸总额的42%。可见，企业与国外直接贸易形式的作用，已大大提高。

后来，苏联还赋予各加盟共和国和地区的外贸经营权，授权它们开展地方贸易和边境贸易。波罗的海沿岸的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共和国，以及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等共和国相继成立了地方贸易公司，边境地区也在积极发展边境贸易。授予各级地方从事外贸的权力，对于开拓对外贸易经营渠道，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将起很大的积极作用。就以与中国接壤的远东地区来说，两国边境贸易在高速增长，以黑龙江为例，1988年，中苏边境贸易额为1.96亿法郎，这比上年增长4.7倍，相当于从1957年到1966年和从1983年到1987共15年的边贸的总和。

### 第三，注入刺激机制，从多方面来增强企业冲向国际市场的内在动力

从戈尔巴乔夫时期这方面采取的一些措施来看，着力解决的问题有：一是使有外贸经营权的企业具有真正的自主权。就是说，使这些企业的对外经济活动也

建立在自主经营、自筹资金和自负盈亏的基础上。自主经营指外贸企业成为决定对外经济活动的主体，外贸计划由其自身制订，自筹资金和自负盈亏的原则，主要是指要从根本上改变外贸企业与国家财政的关系。今后，这些企业的用汇和创汇应紧密结合，企业进口设备等所需外汇应靠自己产品出口所获的外汇来支付。同时，企业对其对外经济活动的效益和外汇的使用承担全部责任。企业为了扩大出口商的生产，如外汇不足，可向银行获得外汇贷款，并用出口商品获得外汇贷款。一旦发生因完不成出口任务而引起外汇短缺的情况，不能靠国家财政拨款来解决。二是实行外汇留成制度，刺激企业出口积极性。苏联根据出口产品的不同种类，规定不同的外汇留成制度，刺激企业出口的积极性。苏联根据出口产品的不同种类，规定不同的外汇留成比例（0.5%—50%）。例如，对出口原料商品留成比例为0.5%—2%；机电产品为15%（如创现汇则为20%）；零配件为30%（如创现汇则为50%）。对超计划的出口创汇全部留归企业支配。十分明显，这些不同的外汇留成比例，目的是鼓励出口。这里应指出，外汇留成制度是外资企业实现自筹资金原则的一个重要条件。三是对一些地区制定特殊的优惠政策，为其走向世界市场创造更方便的条件。1988年9月，戈尔巴乔夫视察远东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时提出，应为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更快地发展对外经济联系，规定一些优惠待遇：这些地区的企业可以利用外汇留成在国外直接买消费品；可以利用它们所节约下来的全部材料加工出口，职工工资由经理和工会酌情决定，而不受一般企业工资制度的限制。

### 摆脱传统理论束缚，开拓非传统的对外经济合作形式

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前的一个较长时期，与西方国家经济联系和合作的形式还是多种多样的，其中合营企业得到了相当发展。在1925年初，在苏联境内共有64家合营公司，它们在出口中所占的比重达到10%，在进口中占5%。在这些合营企业股份中，苏联占有50%以上的股权。特别要指出的是，苏联在各个重要部门都建立了合营企业，如俄美压缩天然气公司、俄奥搪瓷器皿公司、俄美木材公司、俄德建筑工程公司等。这些合营公司和租让企业一样，对当时恢复和发展苏联经济起过无可置疑的作用。但自30年代中期开始，苏联对西方国家的经济联系形式，基本上是通过对外贸易轨道实现的，即主要集中在流通

领域。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这与当时的苏联领导错误地对待新经济政策，把它看成是暂时的，是向资本主义不得已的退却有关。新经济政策不存在了，从这一政策中产生出来的租让制和合营公司自然也就不存在了。

从这以后的很长历史时期里，特别在苏联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从理论到实践，不再允许在苏联国土上出现任何形式的生产资料私有制，更不允许外国资本在苏联国土上出现。对此，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二十八大的报告中说，“要走向世界市场，要使苏联参与世界经济，我们干部的思维以及态度都得作根本改变”。“改变他们的思维，需要善于按新的方式办事。”<sup>①</sup>

戈尔巴乔夫执政后，在分析国内经济停滞原因时，也分析了长期来苏联对外经济关系方面存在的保守主义、教条主义对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并认识到，要使苏联经济走向世界，只靠单一的传统的贸易形式是远远不能适应世界经济形势发展需要的，这只会导致苏联经济的继续落后。要改变这一局面，就必须采用一些非传统的对外经济关系合作形式，如建立合资企业、自由经济区和免税区等。

随着改革的发展，苏联在发展对外经济关系方面，特别注意了如何从单一的贸易方式转向生产合作方式。其做法是：第一，在同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合作中，苏联已明确规定，要“从以贸易为主的联系方式向深层次的生产专业化合作过渡”。<sup>②</sup> 在各部门、联合公司和企业一级进行直接的国际生产联系和科技联系，共同解决科研、生产、供货、销售、售后服务等问题。苏联把这种方式作为重点加以推广。当时，苏联已有 1700 多家企业与经互会成员国的企业建立了直接联系。第二，1987 年 1 月，苏联通过决议，决定在苏联境内同外国建立合资企业，以便利用这种方式来发展国际生产合作和开拓新的经济联系形式，并通过这种形式来吸收和利用外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工艺和管理方法，发展出口基地，提高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减少不合理的进口，最后达到加速经济发展和使经济转向集约化经营的目的。1988 年，苏联为了加快合资企业的建立，改善国内投资条件，提高合资参加者的兴趣，修改了合资法。主要内容有：取消了合资企业中外国参加者的比例不得超过 49% 的规定，而规定这个比例由合作者之间的合同确定；取消了合资企业管理委员会主席和经理必须由苏方人员担任的规

<sup>①</sup>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资料汇编》，第 15 页。

<sup>②</sup> （苏）《经济报》1987 年第 4 期。

定，而规定可以由外国公民担任，合资企业的管委会有权独立决定雇工、解雇、劳动报酬的形式和数量，以及对工作人员采取的奖励制度；对合资企业为发展生产而运进苏联的商品将征收最低的进口税或完全免除关税；外国伙伴的利润可以汇回本国；大大简化建立合资企业的手续等。采取上述措施以后，在苏联境内创办的合资企业数量有明显增长：1987年5月12日苏联建立了第一家合资企业，1987年底仅有7家，1988年底为164家，1989年初为191家，而到1989年4月已达到485家。

关于自由经济区的问题，在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的初期，苏联还是持怀疑态度，在思维观念上是有阻力的，更多地认为它只具有为资本主义复辟的本质属性。经过一段时间研究，特别对中国特区的多次考察和多方了解之后，在认识上发生了变化。后来苏联开始讨论自由经济区的问题，把它看成是推动本国经济发展和扩大与密切同西方经济联系的一种重要形式。从1988年开始，苏联对建立自由经济区的问题已从讨论转入落实并决定首先建立两个自由经济区，一是苏芬边境的赛马运河区；另一个是远东的海参崴。据报道，滨海边疆区、索契、敖德萨、爱沙尼亚等15个地区当时亦考虑筹建自由经济区的问题。为了鼓励外国投资者，苏联还考虑，给予自由经济区种种特殊优惠的条件，如不受苏联海关的限制，为外国投资规定附加保证，实行商业风险保险制度等。

在推动苏联经济国际化进程中，另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是，必须重新认识当今世界上存在的一些重要国际经济组织，特别是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长期以来，苏联对这些组织持批判、否定的态度，其原因是：首先，苏联一直把东西方关系的经济内容看成是两种制度对立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从而忽视了东西方互利和合作的可能性和重要性。其次，苏联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相继出现的国际经济组织，都是在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倡议和支持下成立的，是由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等国所控制和操纵的。推行经济体制改革以来，苏联在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指导下，逐步改变了上述看法，认识到在世界经济国际化迅速发展的今天，任何一个国家如不参加国际经济组织，不仅给本国参加国际经济活动带来诸多不便，并且还难以使自己在国际经济活动中发挥作用。另外，苏联还认识到，有关重大的国际货币金融和贸易问题，一般都是通过这些国际经济组织成员国进行讨论、协商和决策的。因此，不参加这些组织，在经济上难以受益，不能在国际贸易中取得最优惠国的待遇和获得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的低利率贷款等。后来，苏联主动要求以观察员身份出席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协商会议，并关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活动，设法与其接触。

## 积极调整对外经济关系的地区战略

总的来说，苏联建国以来，特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其理论及实践中，一直把发展与东欧国家间的经贸关系视为战略重点。直到1988年，苏联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外贸额占苏联外贸总额的65%以上。苏联上述地区战略思想，日益与戈尔巴乔夫推进其经济国际化方针不相适应。从经互会成员国民用技术水平来看，各国虽在某些领域各有其特点，但总的来说，处在同一水平线上，如果长期主要集中在这些国家范围内进行贸易和经济合作，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低水平的重复，这对提高各国的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有着明显的消极作用。从经互会成员国的经贸体制来看，长期实行的是一种“统包统揽”的做法，进出口基本上都由政府统一包下来，这样，竞争机制不起作用。在这种体制下，经互会成员国家采取把高质量产品出口西方换自由外汇，而把质次产品进行互相交换，这种做法必然影响各国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提高。为了改变上述情况，戈尔巴乔夫执政后，在调整对外政策的同时，对对外经济关系的地区战略也作了相应调整。调整的总趋势是，把战略重点逐步由东欧移向西方。采取的措施有：

### （一）调整与东欧国家的经济关系

从1986年起，苏联不再增加向东欧国家供应燃料和其他原材料，明确表示，今后不能再成为东欧各国廉价能源和原材料的供应国。另外，在对外贸易体制上，苏联主张在经济核算制的基础上同东欧各国建立部门间、企业间的直接经济联系，自行协商和解决经济合作中的有关问题。这样做的目的是十分清楚的，即为了使苏联政府尽可能地摆脱对东欧国家“统包统揽”的局面，而让各部门、企业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利益来发展与东欧各国的经济关系。

### （二）积极发展与西欧的经济关系

在对外经济关系调整过程中，苏联把西欧作为发展经济关系的战略重点，其出发点是，西方世界的美、日、西欧三足鼎立中，苏与美长期形成的对抗、紧张局面不可能一下子完全消除，同日本的领土麻烦也难以解决，而同西欧各国传统的经济联系，在地理上又是近邻，可作为苏联同整个西方国家发展经济关系的

前沿阵地。应该说，戈尔巴乔夫执政以来，对西欧的上述战略思想取得了很大进展，如当时的西德对苏的贷款，与苏创办的合资企业数量都名列前茅。

### （三）在缓和与美、日政治关系的同时，积极发展经济关系

苏美之间由于受政治关系的影响，经济关系一直处于低水平状态。1987年两国贸易额只有12亿卢布，占苏联与西方国家贸易额的4.2%。后来，出现了上升的势头。当时据美方估计，经过3—7年的发展，苏美贸易额可由1987年的20亿美元增加到100亿—150亿美元。美国赴苏的实业家人数越来越多，对发展两国经济关系的兴趣越来越大。

苏联积极靠拢日本，希望在“政经分离”的原则基础上，加快经济关系的发展步伐。后来，苏日贸易发展较快。1988年，苏联向日本的出口额为27.7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7.8%，从日本的进口额达31.1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2.1%。

### （四）以加速开发与开放远东地区为契机，来推动苏联与亚太地区国家的经济合作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在对外关系方面特别重视亚太地区，这也是苏联调整对外经济地区结构的一个重要内容，又是作为推动整个苏联经济国际化的重要一环。苏联加速开发与开放远东地区，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第一，苏联清楚地看到，20世纪末，苏联的西伯利亚和远东、日本、中国以及整个东南亚将成为世界经济贸易的中心，国际贸易的重点将向这些地区转移。苏联要做好准备，使西伯利亚和远东适应这一发展趋势。戈尔巴乔夫本人也十分重视苏联与亚太地区的合作。他指出：“东方、亚洲与太平洋地区文明的发展越来越充满着活力。我国的经济也在转向西伯利亚和远东。因此，我们在客观上对加强亚洲太平洋合作表示关注。”<sup>①</sup>

第二，与苏联远东地区相毗邻的国家，是一些市场容量大的亚太地区国家。它们对远东地区的资源感兴趣，而苏联对这一地区近邻国家的机器设备、先进技术、资金、食品和生活用品感兴趣。因而，发展经济合作的潜力很大。

第三，苏联要开发远东地区，存在缺乏技术、资金、劳力和食品供应紧张等困难，这在客观上要求通过邻国发展经贸关系来解决。这里顺便提一下，苏联加速远东地区的开发与开放，对中国来说，是发展对苏联经济关系的一种良好机

---

<sup>①</sup>（苏）米·谢·戈尔巴乔夫著，苏群译：《改革与新思维》，第230—231页。

遇，我们应该密切注意这一地区的发展，认真加以研究，制定措施。

从以上的简单分析可以看到，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苏联调整对经济关系地区战略的意图是：第一，总的来说，向西方倾斜，目的在于更多地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提高经济效益和竞争能力，为苏联今后进入世界市场创造条件；第二，目前重点面向西欧，是为了促进苏联西部地区的发展，以西部来带动东部；第三，面向亚太地区，是为了开发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逐步使东部地区成为今后整个苏联经济的坚实基础，也为今后深化与亚太地区各国经济关系打下基础。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决心把自己的经济与世界经济紧密联系起来，沿着国际化的道路前进，这是正确的。但在这条道路上，并不是铺满着玫瑰花，呈现出一幅田园般的图画，而将是在披荆斩棘中前进，当时遇到的困难是很多的。

首先，人们的旧思想仍然是一大障碍。不少人仍把合资企业、自由经济区等新的对外经济合作形式看成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用当时苏联一些学者的话来说，“停滞的卫士们”怕外国资本把苏联淹死，怕苏联工人遭受剥削。还有一些人，仍在过分强调社会主义国家技术经济独立性，充满着保守主义，这样就很难适应当今世界各国互相经济依赖性日益加强的客观要求。

其次，长期形成的官僚主义、行政命令作风，严重影响着对外经济关系的重大革新。这一时期苏联报刊已开始披露这方面的问题：由于官僚主义者的“努力”，在创建合资企业中专门制造不少麻烦，有时竟达到滑稽可笑的地步。例如，在决定一家合资企业制作图章问题上，苏联官员竟用了一整年的时间，另一家企业的方案经过了15个各种单位的审查，而其中的多数单位“一点都不懂行”。一些领导人总是表现出强烈的行政愿望，显示其指示的威力，以弥补自己的知识不足。一家生产女鞋的列宁格勒合资企业，因为行政领导一个指示，把价格一下子提高了50%，结果，女鞋失去了在消费市场上的竞争能力。

第三，缺少从事外经外贸的专业干部，成了当时苏联经济走向国际化道路上的一个突出障碍。苏联对外经济委员会的一些领导人认为，第一个问题是确保有一批懂得对外经济活动的干部，因为，不论是搞合资企业还是建立自由经济区，如果弄不清楚西方的经营方法是不行的。当务之急，要加强这类干部的培训 and 进修。

第四，随着苏联非传统的对外经济关系的发展，卢布的不可兑换性问题日益尖锐起来，在各个方面影响着苏联对外经济关系的发展。正如阿甘别吉扬院士说

的：“没有自由兑换的卢布，苏联就不能平等地参与世界经济活动”。<sup>①</sup>这个问题的解决，取决于很多因素，如国内有丰富的消费品市场，生产资料实行批发贸易，提高产品的质量和竞争能力，保证有价证券的自由流通，建立自由外汇市场，国内价格与世界市场价格的接近等。阿甘别吉扬预测，要过7—10年后，自由兑换卢布将可成为现实。

最后，苏联经济国际化的速度和深度，取决于国内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的进展。苏联国内市场机制因素作用的局限性，就是苏联经济向国际化方向发展的一个重要阻碍因素。具体说，由于苏联批发贸易不发达，加上合资企业的物资技术供应又不列入国家计划，因此，物资技术供应往往得不到保证。不少苏联学者指出，这已是挫伤外商在苏联投资积极性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尽管戈尔巴乔夫在对外经济体制改革方面遇到不少阻力，但还是取得了不少进展，这为今后在这一领域的改革开了个头。历史发展表明，俄罗斯独立后在对外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思路与戈尔巴乔夫时期大体上是一致的。

---

<sup>①</sup>（苏）《经济报》1987年第4期。

## 66. 戈尔巴乔夫是怎样当上最高领导人的？

左凤荣

1985年3月10日19时20分，契尔年科逝世。在22时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成立了治丧委员会，由戈尔巴乔夫任主席，实际上向世人表明，戈尔巴乔夫将成为总书记。11日，也就是契尔年科去世的第二天，苏共召开中央全会，戈尔巴乔夫被选为总书记。

### 戈尔巴乔夫的升迁之路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于1931年3月2日生于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克拉斯诺格瓦尔杰伊斯克区普里沃利诺耶村的一个农民家庭，两年后苏联发生了可怕的大饥荒，戈尔巴乔夫爷爷的5个孩子死了3个，“饥荒来势凶猛。普里沃利诺耶的村民饿死了三分之一甚至一半。有的人家成了绝户，直到战争前夕，那些破烂不堪，没有主人的农舍仍然孤苦伶仃地留在村子里。”<sup>①</sup> 戈尔巴乔夫出生的年代正是斯大林体制建立时期，新体制的建立是以极高的代价进行的，许多人受到冲击。戈尔巴乔夫的外祖父满怀热情地投入到十月革命后的新生活中，入党，积极参与集体化，担任其创建的集体农庄的主席；他的祖父则是顽固的小农，不愿加入集体农庄。但这两位老人却都在1937年的大清洗中被镇压，其外祖父的罪名是“右派托洛茨基反革命组织的积极成员”，祖父则是“怠工

---

<sup>①</sup>（俄）米·谢·戈尔巴乔夫著，述弢等译：《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6页。

者”，幸运的是他们都没被处死。

卫国战争使苏联遭受了严重的人力物力损失。战后苏联十分缺乏劳动力，戈尔巴乔夫从15岁起便参加劳动，17岁时因与父亲在联合收割机上并肩劳动而荣获劳动红旗勋章。1950年，19岁的戈尔巴乔夫成为苏共预备党员，当时他还是10年级的学生。戈尔巴乔夫能够走出农村，得益于他强烈的求知欲。他喜欢读书，兴趣广泛，成绩也不错，中学毕业时获得银质奖章，他是普里沃利诺耶村第一个考入莫斯科大学的人。

1950年9月戈尔巴乔夫进入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学习，这是苏联最好的大学。在5年学习生活中，戈尔巴乔夫这个来自边疆地区的大学生不仅了解了首都的情况，更使他形成了自己的思想和观念。当时正值斯大林去世后相对宽松的时期，在大学期间他们不仅学习苏联法律和马列理论，还学习了西方政治学说史，西方主要国家的宪法，学生中间也常常举行辩论会。戈尔巴乔夫在大学期间就表现出了良好的领导素质，成了法律系共青团组织的领导人，他功课好，善于与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在同年级同学中有很高的威信。戈尔巴乔夫赶上了斯大林去世后苏联的“解冻”，欣然接受赫鲁晓夫给苏联带来的变化，他属于“60年代人”。<sup>①</sup>

戈尔巴乔夫的政治升迁是与苏联的体制紧密联系在一起，他走的是典型的苏共干部成长之路。1955年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他并没有从事与其专业相关的工作，而是从事共青团的工作，很快担任了共青团边疆区委宣传部副部长。他工作热心，组织才能和演讲才能强，使他很快脱颖而出，引起了领导人注意。他沿着官阶快步向前，到1958年已经成为共青团边疆区委第二书记，到1961年又成为这一组织的第一书记，他成了边疆区的“上层”干部，还参加了于1961年10月召开的苏共二十二大，投票赞成把斯大林遗体从列宁墓中迁出。他得到了单独居住的房子，不用再跟别人合住了。

戈尔巴乔夫的升迁得益于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第一书记库拉科夫的赏识，他在快速地提拔戈尔巴乔夫。担任共青团边疆区委第一书记一年后，戈尔巴乔夫就成了边疆区党委的党组书记，一年后又担任了组织部长，1966年9月当选为斯塔夫罗波尔市委第一书记。在他担任第一书记期间，该市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

---

<sup>①</sup> 指世界观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即赫鲁晓夫“解冻”时期的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主张尊重人权、个人自由和公开性。

1968年8月起他任苏共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委第二书记。戈尔巴乔夫被重用，提拔并不完全是因为他会拉关系，会逢迎领导，主要还是他有工作能力。“不能说戈尔巴乔夫在这个迅速飞黄腾达的阶段一帆风顺，也不能说他的青云直上仅仅归功于个人的有力庇护。无论边疆区党委将戈尔巴乔夫派到哪里，他都不遗余力，辛勤耕耘。他脚踏泥泞跑遍各区，宣传开展突击运动，时而对养羊业、时而又对‘田野之王’玉米的种植进行辅导，为党的队伍的纯洁性进行斗争，训斥犯错误者。总之，始终勤勤恳恳、忠心耿耿地履行机关的职责。而且，如他自己所说，当时并未打过个人的小算盘。”<sup>①</sup>

苏共党内的许多高层领导与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有关系，曾任该区第一书记的库拉科夫于1965年升任中央书记，负责农业，他曾跟契尔年科一道工作过。党的第一号理论家苏斯洛夫在1939—1944年曾任过该区的书记。高加索矿泉区所有的著名疗养院都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内。戈尔巴乔夫作为疗养地的书记，有机会见到党的高层领导人，这种便利条件也有利于其个人的升迁。1968年戈尔巴乔夫与来此地疗养的安德罗波夫相识，两人很投机，并保持了友谊。安德罗波夫对戈尔巴乔夫的高升起了很大作用。20世纪70年代初，苏共领导也意识到存在干部老化的问题，提出必须把老干部和年轻干部结合起来。库拉科夫被调到莫斯科，1970年4月，39岁的戈尔巴乔夫成了斯塔夫罗波尔这个对国家经济具有战略意义的边疆区的第一书记，第二年，成为中央委员。戈尔巴乔夫进行土壤改良，修建斯塔夫罗波尔大运河，安装煤气设施，实行畜牧业的集约化经营，推广收割任务的承包制，发展边疆区的葡萄种植业和酿酒业等，取得了一定成效。从这些经历看，戈尔巴乔夫是沿着官位的阶梯一步步走上高位的，算得上是一位有行政经验和行政能力的干部。在担任边疆区第一书记时，作为当地的一把手，他不坐专车，步行上班，在街头与百姓交谈，听他们的意见，不去内部供应商店购物，孩子也不上特别学校，而上普通学校。因此，戈尔巴乔夫又是勃列日涅夫的亲信们眼中的非典型书记，是异己分子，他在担任边疆区委书记的8年间，从未被允许在中央全会上发言。

1978年7月最年轻的政治局委员库拉科夫突然去世，他既是政治局委员也是

---

<sup>①</sup>（俄）安德烈·格拉乔夫著，述弢译：《戈尔巴乔夫之谜》，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25页。

苏共中央负责农业问题的书记，安德罗波夫推荐戈尔巴乔夫任负责农业的中央书记，因为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也是农业区，由该区的第一把手接替库拉科夫也顺理成章。值得强调的是，安德罗波夫推荐戈尔巴乔夫并不只是因为他们是老乡、关系好，主要还是因为安德罗波夫看重戈尔巴乔夫的才能，把他看成是未来的希望。他曾对阿尔巴托夫抱怨：“你看那些无用之辈不让把戈尔巴乔夫调到莫斯科来。”<sup>①</sup> 在安德罗波夫的努力下，1978年9月19日勃列日涅夫乘火车从莫斯科前往巴库，在矿泉水车站与戈尔巴乔夫见面，亲自考察戈尔巴乔夫。1978年11月，戈尔巴乔夫当选为中央书记，负责农业工作，戈尔巴乔夫回到了阔别23年的首都。有人认为：“戈尔巴乔夫作为苏共中央书记在莫斯科的出现无疑是具有历史意义的非凡大事。如果说安德罗波夫如同人们可以猜测的那样，在这里起了某种作用的话，那么可以说这是他最重大的功绩之一。”<sup>②</sup> 西方学者认为“戈尔巴乔夫非常理智，充满自信，风度翩翩，而且懂得如何取悦于上级又不至于显得谄媚，但他很少有真心朋友”。<sup>③</sup>

尽管戈尔巴乔夫主管的农业并未好转，苏联的粮食收购量从1978年的23700万吨下降到1984年的17300万吨，1982年通过的粮食纲要只停留在纸面上。但这并没有影响到戈尔巴乔夫的升迁，1979年戈尔巴乔夫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1980年底成了政治局委员。戈尔巴乔夫能够迅速升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高层领导的老化。由于年轻、工作热情高，戈尔巴乔夫很快引起了注意，他的工作作风也与那些老人们不同。当时任苏共中央国际部副部长的切尔尼亚耶夫回忆说：“在苏斯洛夫和基里连科辞职之后，当戈尔巴乔夫开始主持书记处会议时，我们这些副部长中有人有时列席会议后兴奋地回来说：最后终于出现了一个聪明和正直的、关心国家状况和决心做些事情的人。”<sup>④</sup>

---

①（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第354页。

②（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第354页。

③（美）沃尔特·G·莫斯著，张冰译：《俄国史（1855—1996）》，海南出版社2008年版，第411页。

④（俄）阿·切尔尼亚耶夫著，徐葵等译：《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

## 安德罗波夫欣赏的得力助手

勃列日涅夫去世后，安德罗波夫于1982年11月10日继任了苏共中央总书记。他是个头脑清醒的人，对国内外的情况比较了解，但在思想观念上，他完全认同苏联的体制模式。他是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积极拥护者之一，把索尔仁尼琴驱逐出境，赞成出兵阿富汗。但他也感觉到苏联的体制模式是不完美的，需要改革。安德罗波夫认为，“党已确定这个阶段是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在这里已完全建立起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经济基础、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在这里，社会主义如通常所说那样，是在自身的、集体主义的基础上发展的。然而，所有这些当然并不意味着，我们建立起的这个社会已经尽善尽美。这个社会还有许多由客观条件产生的困难，这些从当前发展水平来说是很自然的。也有不少由于主观原因，由于人们有时不能妥善地、有组织地进行工作所造成的缺点。在当前条件下的党纲应当首先是一个有计划地全面地完善发达社会主义的纲领，也就是进一步向共产主义前进的纲领”。<sup>①</sup>在执政一年多的时间里，安德罗波夫采取了一系列使人耳目一新的政策，一度为苏联的振兴带来希望。



1967年安德罗波夫在扎维多沃。

<sup>①</sup>（苏）尤·弗·安德罗波夫著：《安德罗波夫言论选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340页。

安德罗波夫尽可能让戈尔巴乔夫承担更多的工作，不只让他负责农业，还让他关注更多的问题，特别是经济问题。他把戈尔巴乔夫当成自己的继承人，有意识地让戈尔巴乔夫经受锻炼。1983年4月安德罗波夫委托戈尔巴乔夫在列宁诞辰纪念日上作报告，戈尔巴乔夫认为：“当年安德罗波夫作完报告后就被选为第二书记，现在他让我来作报告，安德罗波夫想扶持我并千方百计地给我创造机会。这一次他利用了勃列日涅夫对他的方法：提供讲话的机会。这一方面意味着支持，另一方面意味着我应该提出新东西，展示自己的思想，对问题的理解。”<sup>①</sup>许多人也确实把戈尔巴乔夫看成是安德罗波夫的继承者，“在安德罗波夫领导下的1983年，正是戈尔巴乔夫被看做是尤里·安德罗波夫可能的接班人”。<sup>②</sup>安德罗波夫尽量疏远契尔年科，努力把戈尔巴乔夫提拔到头等重要的位置上来，在1983年12月中央全会召开前夕，安德罗波夫在他的发言提纲中加进了一段话：“苏共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现在已不能参加政治局和书记处的领导工作。我认为必须对你们说实话，这一阶段会拖得很长。有鉴于此，我请求中央全会讨论这一问题，并委托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同志来主持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我相信，戈尔巴乔夫能被委以主持政治局和书记处会议的重任。”<sup>③</sup>这等于指定了戈尔巴乔夫做他的接班人。但是，病榻上的安德罗波夫已经不能完全控制住局势，在正式开会时，安德罗波夫的这段话被删掉了。契尔年科集团开始悄悄地走向权力的宝座。当时政治局里又出现了“三驾马车”——吉洪诺夫（部长会议主席）、契尔年科（党内第二把手）、乌斯季诺夫（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本是安德罗波夫的盟友，他本来支持安德罗波夫把戈尔巴乔夫当成他的继承人，他曾说：“我们需要一个年轻有为的并为全党所了解的领导人，安德罗波夫提拔戈尔巴乔夫进入政治局已经有5年之久了，因此他会继续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的事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务必尽最大的

---

①（俄）戈尔巴乔夫、斯拉文著，孙凌齐等译：《尚未结束的历史：戈尔巴乔夫访谈录》，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②（俄）叶·库·利加乔夫著，钱乃成等译：《警示》，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版，第25页。

③（苏）阿·沃尔斯基著：《开诚布公地看问题》，载（苏）《星期》1990年第36期，第6—7页。

努力。”<sup>①</sup> 但是，乌斯季诺夫很快便站到了契尔年科的阵营里，大概他也担心年轻的戈尔巴乔夫上台会把他们这些老年人赶出政治舞台。

就政治局内的力量对比而言，安德罗波夫的人不占多数。1984年2月9日安德罗波夫去世，在2月10日举行的决定总书记人选的政治局会议上，起主要作用的是乌斯季诺夫，正是他和吉洪诺夫、葛罗米柯支持契尔年科当总书记。库纳耶夫在回忆此事时说：“在讨论他的候选资格时，政治局委员谁都不发言。在政治局委员死一般的沉寂中契尔年科成了总书记……我们所有的人都明白，凭他的文化和知识水平、管理国家的智慧，他完全不符合作为国家第一把手必须具备的那些要求。但是，我们虽然保持了沉默，还是投票表示‘同意’。我想，不仅是我一个人受到了良心的谴责。”<sup>②</sup> 这是极不理智的行为，反映了那些老人们对权力的迷恋和对国家的不负责任。在1984年2月13日苏共中央全会上，在吉洪诺夫的提议下，契尔年科被“一致”选为总书记，但是会场上没有多少掌声，失望的情绪弥漫整个会场。切尔尼亚耶夫在日记中写道：“奇迹没有发生，选举的是契尔年科。中央全会不知为什么又是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厅举行的……接近10点半时大厅里挤满了人……过了20分钟大厅里沉寂下来了，开始等待，每一分钟紧张的气氛都在增加，空气像充了电。差5分11点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中央书记从侧门进入会场，按惯例波诺马廖夫走在最前面……紧张程度达到高峰。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通向中央全会主席台的左侧的门。‘谁排第一个？’11点整在进门处出现了契尔年科的头，其后是吉洪诺夫、葛罗米柯、乌斯季诺夫、戈尔巴乔夫等等。大厅里失望地沉默着，谁也没有站起来，其情景与当初勃列日涅夫逝世时安德罗波夫步入中央全会会场时相似。主席团成员坐下了，戈尔巴乔夫与契尔年科并排坐着，一切还不十分清晰。”<sup>③</sup> 契尔年科主持会议，让吉洪诺夫发言，吉洪诺夫先谈形势和党的任务，最后才谈到选举总书记的问题，建议中央全会把契尔年科列为候选人，并对之进行了评价。“吉洪诺夫没有得到掌声……我观察

---

① (俄)叶·伊·恰佐夫著：《健康与权力——“克里姆林宫医生”回忆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4页。

② 库纳耶夫：《关于我的时代》，转引自(哈)奥莉加·维多娃著，韩霞译：《中亚铁腕：纳扎尔巴耶夫》，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73页。

③ Черняев А. С. На старой площади. Из дневниковых записей.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5. 2005. С. 115.

了一下中央全会的成员，我感觉到他们脸上失望的表情，好像他们因为辜负了全会成员、党员和人民的期望而感到不好意思。因为这些日子里大家谈的都是戈尔巴乔夫，没有想到上台的却是契尔年科。”<sup>①</sup> 全会虽然一致同意契尔年科任总书记，但人们心里都很清楚他执政的时间不会长，只具有过渡性质，人们又在等待另一个“勃列日涅夫”的死亡。



1984年5月1日，契尔年科在观看劳动者节日游行。

由于契尔年科身体欠佳，围绕其地位继承问题，党内仍在明争暗斗。契尔年科有意让党内二号人物的位置空着，很长一段时间不让戈尔巴乔夫这个事实上的第二书记进驻苏斯洛夫的办公室。契尔年科拒绝把主持政治局会议的权力正式让给别人，“甚至到了这样的地步：人们将他抬进会议室，扶他在摊开公文的桌子旁坐好，然后再让其余的政治局委员入场。有时则直到最后一刻才由助手给戈尔巴乔夫打电话，以总书记的名义请他‘越俎代庖’。”<sup>②</sup> 安德罗波夫时期就决定召开的中央意识形态工作会议

在戈尔巴乔夫的努力下终于在1984年秋天召开了，“这次会议对戈尔巴乔夫的前途产生了重要影响。党内和经济战线的精英发现了她，同时发现他不仅仅是一位农业工作者。一位年富力强、精力充沛、风度翩翩的人登上讲台，作了一个

<sup>①</sup> Черняев А. С. На старой площади. Из дневниковых записей.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5. 2005. С. 116.

<sup>②</sup> (俄) 安德烈·格拉乔夫著，述弢译：《戈尔巴乔夫之谜》，第69页。

非常内行的报告，提出了不少新思想，指出了光明的前途”。<sup>①</sup>

此后，契尔年科认可戈尔巴乔夫搬进了苏斯洛夫的办公室，也就等于承认了戈尔巴乔夫在党内位居第二的地位。但争夺总书记职位的工作并没有停止，在1985年春天进行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代表的选举时，莫斯科市委书记格里申硬拉着契尔年科参加选举，当时契尔年科已经病得站不起来了，只好在医院拍摄契尔年科发表电视讲话和接受代表委托书的场面，旁边站着格里申和莫斯科党和苏维埃的其他官员，借此显示格里申与总书记的亲密关系。有人把这看成是权力交接，是新领袖格里申的亮相，让戈尔巴乔夫感到不安。

### 戈尔巴乔夫——苏共别无其他的选择

契尔年科去世后，推选新总书记的问题现实地提了出来。由于当时苏联接连安葬了三位高龄总书记，人们迫切希望上来的是一位年轻人，而戈尔巴乔夫恰恰是政治局中最年轻的。在中央委员会内，戈尔巴乔夫显然得到了绝大多数委员的支持，但这一问题必须首先在政治局内解决。苏共的总书记名义上由中央委员会选出，事实上却是先在政治局内确定，然后提交中央委员会批准。在政治局里，除戈尔巴乔夫外，还有人觊觎最高权力的宝座，其中之一是莫斯科市委书记格里申，尽管格里申积极进行种种活动，但他在莫斯科威信不高，而且也年过七旬，担任苏联的最高领导是不现实的；另一个人是列宁格勒市委书记罗曼诺夫，人们传说他像沙皇那样嫁女儿，把冬宫的一些桌子、酒杯等借来在女儿的婚礼上使用，列宁格勒市民甚至喊出了“打倒罗曼诺夫！”的口号。当时政治局中还有葛罗米柯<sup>②</sup>可以竞争总书记的职位。据戈尔巴乔夫回忆，他也确实希望得到这个职务，但是，他也难以得到大家的认同，其主要因素也是年龄超过了70岁，再选一个年迈者肯定得不到中央委员和民众的支持。戈尔巴乔夫是政治局里的“白乌鸦”，即出类拔萃的人，他接受了人文和经济两种教育：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法

---

<sup>①</sup>（俄）瓦·博尔金著，李永全等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65页。

<sup>②</sup> 葛罗米柯当时是政治局中资格最老的政治局委员。他从30年代后期开始外交生涯，曾同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一道参加过雅尔塔会议，对苏联外交政策的制定一直起着重大作用。

律系和斯塔夫罗波尔大学农业经济系。无论从受教育程度，还是年龄看，政治局中都没有比戈尔巴乔夫更合适的人选了。

但是，在契尔年科去世当天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关于戈尔巴乔夫出任总书记的问题没有解决。据戈尔巴乔夫回忆，格里申当时提议：“让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担任治丧委员会主席吧。”实际上意味着推荐戈尔巴乔夫担任总书记。<sup>①</sup>戈尔巴乔夫表示，不急于解决这个问题，第二天再来解决。

从1985年3月10日至11日上午，苏联的高层就选举国家最高领导人问题进行了紧张的活动，起决定作用的是葛罗米柯，戈尔巴乔夫以让他担任最高苏维埃主席为条件，获得了他的支持。“戈尔巴乔夫的一位密使带着这个建议去见葛罗米柯，很快便得到答复：葛罗米柯有兴趣在新的水平上搞国际问题。事情有了新的转机，出现了戈尔巴乔夫当选总书记的现实希望，于是，除利加乔夫和雷日科夫以外，葛罗米柯也开始为戈尔巴乔夫积极活动。”<sup>②</sup>戈尔巴乔夫承认与葛罗米柯交换过意见，达成了联合行动的协议，但没有作出许诺。<sup>③</sup>在3月11日15时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葛罗米柯提议戈尔巴乔夫为总书记候选人，没有人提出异议。葛罗米柯认为戈尔巴乔夫是苏共中央总书记的合适人选，“第一，他才华横溢，渴望多做工作，做好工作。第二，待人的态度……我从未听说过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刚愎自用。没有，他总是把党的利益、社会利益和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第三，米·谢·戈尔巴乔夫有丰富的党务工作经验……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如果选举他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我们不会错。我想再次强调，他知识渊博，经验丰富，不过，这些经验应当再加上我们的经验。”<sup>④</sup>葛罗米柯是元老，他的讲话一锤定音。继葛罗米柯之后，吉洪诺夫站了起来，也表示赞同戈尔巴乔夫担任总书记。随后，其他政治局委员也都纷纷发言，说了戈尔巴乔夫许多优点和功绩，纷纷表示赞同戈尔巴乔夫当选总书记。

---

①（俄）鲍·斯拉文著，孙凌齐等译：《尚未结束的历史：戈尔巴乔夫访谈录》（修订版），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10页。

②（俄）瓦·博尔金著，李永全等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第79页。

③（俄）鲍·斯拉文著，孙凌齐等译：《尚未结束的历史：戈尔巴乔夫访谈录》（修订版），第11页。

④（俄）鲁·格·皮霍亚著，徐锦栋等译：《苏联政权史（1945—1991）》，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503页。

在3月11日17时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戈尔巴乔夫主持会议，他先宣布对契尔年科的去逝表示哀悼，接着宣布这次全会的日程只有一个：选举苏共中央总书记，由葛罗米柯代表中央政治局讲话。葛罗米柯表示政治局一致同意推荐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为中央总书记，受到中央委员们的热烈欢迎。“会场上爆发了热烈的掌声，比安德罗波夫当选时还要热烈。掌声一浪高过一浪，经久不息。”<sup>①</sup>

在关于戈尔巴乔夫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的问题上，当时的领导层成员有很多描述，其中的出入还很大。根据利加乔夫的回忆，在戈尔巴乔夫走上总书记岗位的路上，他起了不小的作用。利加乔夫调到中央后主要负责干部工作，当时有大约20%的干部被撤换，因此，利加乔夫在这些来参加中央全会的中央委员中很有影响，他们纷纷到利加乔夫这里来探听消息，其中也包括担任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委第一书记的叶利钦，许多地方上的领导也都倾向于戈尔巴乔夫，利加乔夫扮演了统一大家立场的角色。根据利加乔夫的回忆，葛罗米柯是力推戈尔巴乔夫继任总书记的最主要的人物之一。在由谁主持契尔年科治丧委员会问题上，当时政治局内部是有分歧的；按照惯例，治丧委员会主席理应由总书记一职的继任者担当，可是，有些委员却“长时间沉寂”不语。随后，戈尔巴乔夫主持治丧委员会也是很勉强的。葛罗米柯在3月11日9—10点，主动与利加乔夫协调一致，商定在接下来的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全会上由葛罗米柯提名戈尔巴乔夫，由利加乔夫事前为葛罗米柯准备发言提纲和戈尔巴乔夫生平的“详细材料”。利加乔夫随即与其助手开始了紧张的准备工作的准备工作。这时，离中央全会开会推选总书记之前仅剩7个多小时，而离政治局开会仅有5个小时了，利加乔夫描述说，他作为政治局主管干部工作的负责人，与州委书记们一一进行了“谈话”。下午3时政治局开会，葛罗米柯第一个发言，用“清楚的、训练有素的所谓‘外交’声音”说道：“请允许我讲几句话。我已经详细考虑过了，我提议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为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的候选人。”<sup>②</sup>接着，葛氏扼要地介绍了戈尔巴乔夫，描绘出了戈尔巴乔夫的政治肖像，说戈尔巴乔夫“是一个很有发展前途的人”。葛氏之后，吉洪诺夫立即站起来表示赞同。这一切对其他政治局委员的

<sup>①</sup>（俄）阿·切尔尼亚耶夫著，徐葵等译：《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第27页。

<sup>②</sup>（俄）叶·库·利加乔夫著，钱乃成等译：《警示》，第75页。

表态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据利加乔夫说，葛罗米柯、他本人和其他委员当时认为，只有戈尔巴乔夫能够带领国家摆脱“80年代初的濒于危机状态”。此后，政治局、中央全会均“一致赞同并选举戈尔巴乔夫为苏共中央总书记”。利加乔夫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当时我直接目睹并参与了那场事件，那时我是这样想，事过多年我仍然这样认为，我还绝对有把握地说，政治局委员中有人明显地不赞成戈尔巴乔夫为总书记候选人。”“当时私下还流传着契尔年科留下的保举格里申的‘遗言’。尽管这种‘遗言’未必会对新总书记的选举产生决定性影响，可它无疑将给推荐戈尔巴乔夫为总书记候选人造成困难，票数会分散。”利加乔夫不无遗憾地说：“当然，我当时没能料到，过了3年之后在‘内部’、在最高权力集团内部开始出现困难，恰恰是这些困难成为不可克服的，最终使所有最初提出的设想遭受打击，导致国家走向衰落。”<sup>①</sup>

叶利钦在回忆此事时，也认为戈尔巴乔夫的当选是经过斗争的，但他认为这一次不是由政治局决定的：“这一次是中央全会决定了总书记的命运。实际上那次全会的全体与会者，包括富有经验、政治上成熟的第一书记们，都认为格里申的方案行不通，因为若他当选，那就意味着党和国家的末日将很快来临。不用多长时间想必他就会窒息全国的各级党组织，就像他窒息莫斯科市的党组织一样。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允许的。而且还不能忘记他本人的品质：自满、自命不凡、强烈的权力欲等。”“州委第一书记当中大部分人都有一个想法，即只能从政治局成员中推选戈尔巴乔夫担任总书记职务，因为他精力充沛，学识渊博，而且年龄最合适。因此大家决定将赌注下到戈尔巴乔夫的身上。我们拜访了几个政治局委员，其中包括利加乔夫。我们的观点同他的想法不谋而合，因为他也像我们一样惧怕格里申。当看到这是大多数的愿望之后，我们决定，如果推选别的候选人，譬如格里申、罗曼诺夫或其他什么人，我们就一致反对、否决他。”<sup>②</sup>

也有人不同意这种说法，当时任政治局候补委员的雷日科夫则认为，在当时没有出现任何斗争，不可能有其他决议，也不存在任何现实的危险。<sup>③</sup> 格里申、

---

①（俄）叶·库·利加乔夫著，钱乃成等译：《警示》，第78页。

②（俄）鲍利斯·叶利钦著，朱启会等译：《叶利钦自传》，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124—125页。

③ 尼古拉·雷日科夫著，高洪山等译：《背叛的历史——苏联改革秘录》，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6页。

罗曼诺夫、吉洪诺夫、库纳耶夫等没有表示异议，他们不得不考虑现实，自1983年以来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地方领导人支持年轻的总书记，苏联不可能再选举一位老人来执政了。鉴于戈尔巴乔夫在安德罗波夫执政以来发挥的作用，以及政治局中的实际情况，他是唯一的选择。正如切尔尼亚耶夫所说：“‘期待戈尔巴乔夫到来’的气氛早在1985年4月之前就形成了，也就是从知道安德罗波夫身体已不行之时开始。在勃列日涅夫时人们就已为国家有羞辱感。在契尔年科时整个社会生活变成了一出令人感到羞耻的滑稽戏。”<sup>①</sup> 阿尔巴托夫也说：在契尔年科时期沉闷的气氛下，人们意识到“国家不能再有一个契尔年科，不能容忍一个有他同样思想和同样低下智力和政治水平的人。虽然讨论哪位政治活动家可以担任下届领袖并不是我国的传统，但是我们国家已对领导人的缺乏鲜明形象、平庸而低微的人品感到如此厌倦，所以总书记继任人的问题已经在每个人的头脑中开始考虑。契尔年科寿终之际，占上风的意见是，唯一有资格候选领袖职务的是戈尔巴乔夫。”<sup>②</sup> 尽管当事人的说法不一，客观现实是当时根本没有别的候选人，戈尔巴乔夫是唯一的选择。

让人始料不及的是戈尔巴乔夫也是苏共最后一任总书记。后来的事实证明：“就其气质和性格，戈尔巴乔夫不能成为真正的国家首脑。他不具备充当国家首脑的素质，完全不愿作出权威的决断，总是无休止地争论，吸取各种不同的意见，没完没了地争论，并借机不作最终的决定，花言巧语，不置可否，不明确表示赞成或反对。他从不对任何错误决定承担责任，总是以所谓集体研究通过决定为掩护推卸责任。”<sup>③</sup> 但这既不能怪罪戈尔巴乔夫，也不能怪当时选举戈尔巴乔夫的人，因为戈尔巴乔夫是苏联体制的产物，是老人政治的产物，是当时唯一的选择。苏联的干部体制使国家长期处于软弱无能的如勃列日涅夫、契尔年科之流的领导之下，切断了最能干、最有才华的人的发展道路，使平庸之辈和无原则的钻营者得以升迁。“早在个人迷信时期建立的机制不仅把权力集中在领袖个人手里，而且一贯有目的地把领导人的大多数有竞争潜力的对手在距争当领导人还很

---

①（俄）阿·切尔尼亚耶夫著，徐葵等译：《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第4页。

②（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第394页。

③（俄）尼·雷日科夫著，王攀等译：《大动荡的十年》，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367页。

远的时候就‘打掉了’。”<sup>①</sup>“在这种制度下，掌握权力的往往不是最聪明能干的人，而是最狡猾、最会阿谀奉承的人，从上到下都是如此。”<sup>②</sup>

1985年3月11日，戈尔巴乔夫这个新任总书记在中央全会上发表了讲话。他虽然说遵循过去的方针：“在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上，在随后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经尤·弗·安德罗波夫和康·乌·契尔年科的积极参与下制定的战略方针，永远都不改变。”但他对这一方针的解释明显带有他自己的特点，他强调：“这一方针的目的是加速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改善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这里指的是改革生产的物质技术基础；指的是改善社会关系的体系，首先是经济体系；指的是人类自身的发展，从根本上改善人民的生活和劳动的物质条件及精神面貌。”他表示，“当前，我们面临着使国民经济向快速发展道路的决定性转变。我们应该，也必须在短时期内进入最先进的科学技术领域，拥有世界上最高水平的社会劳动生产率”，“为了更加顺利和更快地完成这一任务，必须继续始终不渝地完善经济机制和整个管理系统。沿着这条道路前进，在选择最适宜的解决方法的同时，创造性地运用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是十分重要的。这就意味着要始终不渝地实行计划经济的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的所有制，扩大权力，提高企业的自主性和责任感，增强它们对工作最终结果的关心。这就意味着使所有经济的发展，最终都要服从于苏联人民的利益”，“党将始终贯彻其制定的社会政策。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福利——这个纲领性的原则应该赋予更深刻、更具体的内容。我们都明白，改善人的生活条件，应该根据他对共同事业所作出的贡献。什么地方偏离了这个原则，那里就必然出现破坏作为社会主义社会最重要的团结和安定因素的社会公道”。<sup>③</sup> 戈尔巴乔夫创新之处是提出了加快社会经济进步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而没有提发达社会主义。

在众望所归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就这样成了苏共历史上第7任党的首脑。他当时是政治局中最能干、最有魄力的人，也是最年轻的人，总书记的职位非他莫属。“年轻、精力充沛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1985年走马上任，在前任们不佳形象的衬托之下，他显得非常有魅力。大众百姓一下便喜欢上他的公开性，他

① 格·阿·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第267页。

② （俄）瓦·博尔金著，李永全等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第213页。

③ 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0卷，第498页。

和蔼可亲的外表，他愿意对话，曾宣誓般表态在社会改革过程中吸收一切知识能力和人民自觉性的力量。给人一种感觉，国家终于从多年的沉睡之中苏醒振奋起来。都感到很快会出现所承诺的美好变化：苏联人生活中将实现美好理想，他们家中将会富裕美满。”<sup>①</sup> 阿卡耶夫说：“推举戈尔巴乔夫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我认为带来了新的希望和气息。他个人的宽广视野是令人鼓舞的。他受过良好的大学教育，掌握广泛深奥的知识，有非凡的组织能力、民主的观点和思想。”<sup>②</sup> 戈尔巴乔夫当时只有 54 岁，精力充沛，言谈举止明显不同于其前任，其上台之初拥有极高的支持率，“其他任何一位苏联领导人的上台，都没有像戈尔巴乔夫那样，受到国内外的欢迎”。<sup>③</sup> 戈尔巴乔夫面对的是一个盛极而衰的社会，人民对他期望很高，戈尔巴乔夫也想迅速改变国家的面貌。

## 戈尔巴乔夫——重任在肩

苏联体制的危机早就出现了，赫鲁晓夫、柯西金、安德罗波夫的改革都想解决这些问题，但都没有成功。苏联面临的问题很多，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压制创新、农村的贫困、民族问题、对官僚阶层的专横没有任何制约、沉重的军备负担等等。戈尔巴乔夫及与之观点相同的一些人意识到，再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了。戈尔巴乔夫上台之时，尽管苏联仍是一个超级大国，看似强大，坚如磐石，实际上却已是泥足巨人，外强中干。苏联有能力造高精尖的原子武器、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科学力量，人民的生活却远远落在了西方国家的后头。医院里没有足够的棉签和注射器，百姓家里连质量低劣的黑白电视机都不普及，在同一个城市里通电话竟然听不清对方在说什么，更可笑的是具有世界上最丰富森林资源的苏联，连妇女用的卫生纸都供应不足。当国门打开，苏联的老百姓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并不像苏联媒体宣传的那样痛苦不堪时，他们感到羞愧，他们希望年轻的领导人能够

---

① （哈）努·纳扎尔巴耶夫著，陆兵、王沛译：《时代、命运、个人》，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39—40 页。

② （吉）阿斯卡尔·阿卡耶夫著，武柳等译：《难忘的十年》，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56 页。

③ （美）小杰克·F. 马特洛克著，吴乃华等译：《苏联解体亲历记》（上），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53 页。

通过改革，振兴苏联。

苏联新领导人面临的是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和道德领域的全面危机，正如基辛格所说：“他继承了一套真正棘手，甚至可能无法克服的困难。戈尔巴乔夫继承权位时，苏联灾厄之规模才开始显露出来。四十年的冷战，几乎使全体工业国家都集合起来，组成一个松散的反苏同盟。苏联早先的盟友中国，基于实际理由也加入反苏阵营……从安哥拉到尼加拉瓜，美国重振旗鼓，使得苏联的扩张主义所费不貲却仍停滞不前，甚至含愧认输；同时，美国的加强兵力（尤其是推动战略防御计划）在技术上做出重大挑战，可是停滞且负荷过重的苏联经济开始无法应付。西方国家发动超级电脑、微晶片大革命之际，苏联这位新领袖却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国家沦为技术后进国家。”<sup>①</sup> 美国情报官员认为，“戈尔巴乔夫继承了一个危机四伏的帝国，在阿富汗和波兰面临着地缘政治的挑战。对苏联摇摇欲坠的经济体制起着支撑的硬通货收入体系，因美国发起的经济战而受到了严重的扭曲并且处于混乱之中。戈尔巴乔夫所面临的经济状况经受不了美国高科技国防建设的冲击，这将迫使他将更多的资源用于军事领域。当他开始为苏联这只航船掌舵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们正在努力扩大美国的优势”。<sup>②</sup>

戈尔巴乔夫是苏联体制的产物，但他登上高位后却发动了一场针对体制的革命，其中原因正如格拉乔夫所言：“将一个具有高度公民责任感和清醒理智的人（戈尔巴乔夫显然就是这样的人）变成了对荒唐体制构成威胁的怀疑论者甚至论敌的，肯定是他从克里姆林宫山冈上一览无余的本国的悲剧性现实，而不是国外的海市蜃楼。”<sup>③</sup> 戈尔巴乔夫是在苏联和苏共的体制下步步升迁的，他看到和体会到了苏联体制的问题，作为一个有知识的干部，一个有责任、想有所作为的人，他早就成了体制内的持不同政见者。俄国史学家德米特连科认为：“到80年代中期在俄国逐步、无痛苦地向新的社会关系体制过渡的可能性已经被无望地错过了，体制的悄然蜕变改变了苏联社会整个生活方式的变化：不再重新分配领导职位和企业的权力，本位主义加强，社会不平等。企业内部生产关系的性质发生

---

①（美）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等译：《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728页。

②（美）彼得·施魏策尔著，殷雄译：《里根政府是怎样搞垮苏联的》，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255页。

③（俄）安德烈·格拉乔夫，述弢译：《戈尔巴乔夫之谜》，第64页。

变化，劳动纪律性下降，冷漠、漠不关心、偷窃、不尊重多劳多得的诚实劳动。那时国家存在着经济之外的对劳动的需要。苏联人与劳动成果相分离，发展成不是按照良心，而是根据需要完成任务。革命以后年代制定的意识形态的动机与相信在近期内实现共产主义一起削弱了，与此同时，石油美元减少、内外债增加。”“到80年代初苏联社会几乎所有阶层都无一例外地因无自由而痛苦，经受着心理的折磨。知识分子想得到完全的民主和个人自由。大多数工人和职员需要更好的组织和劳动报酬，特别是公平地分配社会财富。一部分农民指望成为自己的土地和劳动成果的真正主人。但是，最终完全是另外的力量决定苏联体制的方向和性质。这一力量是苏联的在册权贵，他们也受制于共产主义的条件，其个人的幸福取决于其供职的状况。”“这样，到80年代初，苏联的集权体制事实上在社会上失去了支持，不再有合法性。它的崩溃只是时间问题。”<sup>①</sup>

苏联已经面临着种种危机，积累了许多问题，在苏联只有一个党执政和党垄断一切的情况下，改革不可能“从下边”开始，人们期待着“从上面”发生变化，并准备予以支持。许多人认为苏联社会无法变革是因为领导人因循守旧。戈尔巴乔夫的上台，给了人们以新的希望，戈尔巴乔夫激发了人们实现变革的愿望。对此，戈尔巴乔夫的夫人赖莎描述道：“改革思想及其步骤，从一开始就对人们充满着吸引力，并且得到了热烈的拥护。这种拥护与支持，一开始还只是情感上的、言语上的，最后才体现在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环游国内外的过程中，流露在成千上万夹道欢迎的人群的目光里，从而成为改革的感情背景。这种支持与同情也表现在一发不可收拾的来信中。1985年，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个人平均每月可以收到4万封来信，1985年全年竟高达40.25万封！而且，我再说一遍，这都是他个人收到的！还不包括那些寄给全体中央委员会成员的。1986年，只是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的私人信函，平均每月多达6万封。”<sup>②</sup>戈尔巴乔夫担负着使苏联摆脱长期停滞不前局面，使社会主义焕发生机与活力的重任。

---

①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XX век. Отв. Редактор В. П. Дмитренко. М., 1998. С. 584—585.

② (俄) 赖莎·戈尔巴乔娃著，王攀、黄鹂译：《我的希望——赖莎·戈尔巴乔娃回忆录》，中国工人出版社2000年版，第156—157页。

## 67. 戈尔巴乔夫缘何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左凤荣

“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是戈尔巴乔夫在改革的过程中提出的，曾经是苏联改革的目标，实际并未实现。因此，有人把苏联改革的失败归结为戈尔巴乔夫背叛了科学社会主义，走上了民主社会主义之路，并不符合实际。在改革之初，戈尔巴乔夫的目标是纠正苏联社会主义的偏差，建设尊重人、为人谋福利的社会主义，1989年底以后才明确要建设“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戈尔巴乔夫思想的变化是由多种因素推动的结果。

### 活跃人的因素，建设为人服务的社会主义

戈尔巴乔夫作为苏共二十大后成长起来的领导人，对苏联体制存在的问题早有察觉。在执政初期，戈尔巴乔夫虽然强调要继承苏共二十六大及其后召开的中央全会所制定的方针政策，完善发达的社会主义，他同时也强调活跃人的因素，改进工作作风，增强责任感与纪律性。他在1985年苏共中央四月全会上说：“主要问题在于怎么样和依靠什么国家才能取得经济的高速发展。政治局研究这个问题时，我们得出了一致的结论，那就是实现这个高速发展的现实可能性是存在的。如果我们把全部工作的中心放在经济的集约化和加速科学技术进步上，改革管理和计划，改革机构和投资政策，普遍加强组织性和纪律性，从根本上改善工作作风，那么加速增长，而且是实质性地增长的任务是完全可以实现的……首先调动人的积极因素，使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极其认真地、高效地工

作，那么我们就可以取得比较好的成效。”<sup>①</sup> 戈尔巴乔夫强调要考虑人的利益和满足民众的需要，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戈尔巴乔夫制定了加速战略，试图通过这一战略改变苏联经济下滑的局面，满足民众的物质需求。

在苏联原有的体制下，不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把人视为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中的螺丝钉，人民处于无权地位，对于国家的政治生活没有什么影响，因此，戈尔巴乔夫开始强调要把人民的权利落到实处，认为：“不活跃人的因素，即不考虑人、劳动集体、社会团体、不同社会集团的各种不同的利益，不依靠他们，不把他们吸引到积极的创造活动中来，就不可能完成任何一项任务，就不可能改变国内环境。”<sup>②</sup> 戈尔巴乔夫强调“活跃人的因素”，意在发挥人的主动性作用，把他们吸引到改革进程中来，让他们参与改革事业，这就需要解放思想，破除旧的思维与观念，为此公开性和民主化成为戈尔巴乔夫活跃人的因素的主要手段。

1986年3月6日，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强调：“争取加速，就是说要加强民主，坚定不移地发展人民的社会主义自治，扩大党和社会生活中的公开性，为发挥每个劳动者和每个集体的主动性与首创精神开辟广阔的天地。”<sup>③</sup> 戈尔巴乔夫认为，斯大林时期形成了行政命令制度，官僚主义更加严重，背离了列宁的社会主义思想，“改革的目的是在理论和实践上完全恢复列宁的社会主义概念，而在其中居不容争议的优先地位的，是人及其劳动、理想和利益，是经济、社会与政治关系和文化中的人道主义价值”。也就是说，让社会主义成为“为了使人的劳动富有创造性，为了他的幸福、健康、心身发育”而存在的社会。<sup>④</sup> 戈尔巴乔夫认为，苏联的困难和问题不是社会主义这一社会政治制度的危机，而是由于没有充分贯彻社会主义的原则，由于背离甚至歪曲了社会主义是为人服务这一原则造成的，社会主义是能够通过改革自我完善的。

---

① 沈志华总主编：《苏共历史档案选编》第30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00页。

②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岑鼎山等译：《改革与新思维》，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第18页。

③ 辛华编译：《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30页。

④ 米·谢·戈尔巴乔夫：《十月与改革：革命在继续》，莫斯科新闻社出版社1987年版，第28、29页。

戈尔巴乔夫主观上希望通过扩大民主促进经济体制改革。在1987年苏共中央一月全会上，戈尔巴乔夫提出，80年代中期以前形成的“障碍机制”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妨碍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他认为，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发展人民自治，是克服障碍机制的主要手段。戈尔巴乔夫对改革的含义作了系统的阐述，并指出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要深入地革新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使社会主义具有最现代化的社会组织形式，最充分揭示我们的制度的各个决定性方面——经济、社会政治和道德方面的人道主义性质”。<sup>①</sup> 戈尔巴乔夫把改革看成是需要全民参加和推动的事业，希望全民都参加进来，让每个人都感到自己是主人，他强调：“民主的实质就在于劳动者掌权，是实现劳动者的广泛的政治与劳动权利的形式，是他们关心改革并实际参与改革的形式”，并提出“苏联社会的进一步民主化成了党的紧迫任务……我们应当最大限度地利用政治制度的所有潜力，用深刻的民主内容来充实党、苏维埃、国家机关以及社会组织和劳动集体的工作，使社会机体的所有细胞充满新的生命力”。<sup>②</sup> 戈尔巴乔夫强调改革的目的是消除对社会主义的歪曲，建设更美好的社会主义，使劳动人民主人翁的地位得到真正的落实，社会主义要具有“人的面貌”。

至此，戈尔巴乔夫从不同角度提出了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性质和民主性，不再讳言人权，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最终目的和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改革的主要标准是，全面充实人权，提高苏联人的社会积极性”，“改革的核心是让人作为主角回到政治进程中去，回到经济中去，回到社会精神领域的发展中去。把业已开始的为克服使人失去生产资料、失去权利、失去文化的变革工作继续下去并进行到底”。<sup>③</sup> 也就是让民众参与到国家发展的进程中来，“只有通过始终如一地发展社会主义固有的民主形式，扩大自治，我们才可能在生产、科学技术、文化艺术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不断前进。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自觉的纪律。只有通过民主和依靠民主，改革本身才有可能”。<sup>④</sup>

---

① 苏群译：《戈尔巴乔夫关于改革的讲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32页。

② 苏群译：《戈尔巴乔夫关于改革的讲话》，第142、143页。

③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述弢等译：《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77页。

④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岑鼎山等译：《改革与新思维》，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第21页。

让民众回到社会政治生活中来，措施之一是改变以党代政的做法，充分发挥苏维埃的作用，提出“在改革的进程中，我们面临一项极其巨大的任务：充分恢复苏维埃作为政权机关、作为社会主义民主的体现者和强大因素的作用。现在我们正在全面恢复苏维埃的威信和权力，为苏维埃在改革的条件下卓有成效地、积极地和创造性地工作创造条件”。<sup>①</sup> 要改变党的机关取代苏维埃的做法，“充分恢复苏维埃作为政权机关、作为社会主义民主的体现者和强大因素的作用”。<sup>②</sup> 党的机关不再承担经济和行政主管部门的职能，“党的任务在别的方面——首先是从理论上认识各种过程的意义，及时地把握住矛盾发展中的临界点，校正战略和策略，制定政策和规定实施政策的方式方法，挑选和分配干部，从组织上和思想上保证改革的进行”。<sup>③</sup> 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1988年夏，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决定进行以恢复苏维埃全权为核心的政治体制改革，随之苏联举行了建立以来首次全民差额选举人民代表。这次选举使许多苏共的反对派人物当选了人民代表，他们攻击以往的社会制度及苏联政府的许多做法，戈尔巴乔夫已经很难再用原来社会主义的目标号召人们，他不得不重新提出新的目标，于是在新思维的基础上，提出了建设“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问题。

### 建设“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1989年秋天以前，戈尔巴乔夫强调的是完善社会主义，更新社会主义，恢复列宁主义的原则。1989年11月26日，戈尔巴乔夫在《真理报》上发表《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变革》一文，不再提完善和更新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而是要建立新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他正面称赞社会民主党人“长期以来对发展社会主义价值观念，对进行有助于提高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劳动人民的福利和社会保障的社会改革所作的贡献，并给予应有的评价。我们感兴趣地研究社会民主派所积累的丰富的、多方面的经验，尽管情况有所不同，也努力利用其中适合

①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岑鼎山等译：《改革与新思维》，第95页。

②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岑鼎山等译：《改革与新思维》，第95页。

③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岑鼎山等译：《改革与新思维》，第104页。

我国社会条件的经验”。<sup>①</sup> 他认为斯大林所建立的体制是官僚主义的行政命令体制，苏共二十大后苏联的改革只是消除了这一体制的极端方面，这一体制仍然保留下来了，这种官僚主义制度“导致丧失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概念中的主要东西：把人看作目的，而不是手段。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大家自由发展的条件的思想被取代了”。<sup>②</sup> 他认为，社会主义思想首先是自由的思想，其实质特点是确立真正的人民政权。他所描述的“社会主义新面貌就是社会主义的人的面貌”，“我们正在建设的不仅是人道的社会主义，而且是民主的社会主义”。<sup>③</sup> 人是社会的目标，而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是为之服务的手段，要加大对人的投资，满足人民的需求，必须发展多种形式的所有制。戈尔巴乔夫强调与斯大林模式决裂，吸取社会民主党人的一些成功做法，实行多党制、多元化，建立真正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

1990年6月19日在俄罗斯共产党会议上，戈尔巴乔夫表示：“我们应当毫不含糊地声称，苏共将毫无保留、斩钉截铁、毫不妥协地摒弃践踏社会主义精神和道德理想的斯大林的思想与实践。党坚决支持苏维埃拥有全权，人民当家做主；党不再赋有政权职能和经济职能，不再奢望垄断地位，不再谋求意识形态上的强行一致。党将通过说服工作，通过在群众中开展政治工作，参与议会辩论，在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的活动，去争取社会对于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的支持。”<sup>④</sup> 戈尔巴乔夫要求共产党按议会党的方式行事，苏共不再履行执政党的职责。

1990年7月苏共二十八大通过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纲领性声明和苏共新党章，标志着“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被全党所接受。

在《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纲领性声明中，对过去的社会主义模式进行了批判，认为发生危机的原因不在社会主义思想本身，而是社会主义思想被扭

---

①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社会主义思想和革命性改革》，《苏联东欧问题译丛》1990年第1期，第5页。

②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社会主义思想和革命性改革》，《苏联东欧问题译丛》1990年第1期，第7页。

③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社会主义思想和革命性改革》，《苏联东欧问题译丛》1990年第1期，第11、12页。

④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著，述弢等译：《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上册，第642页。

曲所致。苏共所描绘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具体内容是：“人是发展的目标，为人创造无愧于现代文明的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克服人与政权以及他们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分离，确保人能积极参加社会进程；在多种所有制形式和经营形式的基础上，确保劳动者变成生产的主人，激励他们有从事高效率劳动的强烈愿望，为生产力进步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创造最佳条件，保证社会公正和劳动者的社会保护；人民的自主意志是权力的唯一来源，受社会监督的国家应保证维护人的权利和自由、尊严与人格，而不问其政治地位、性别、年龄、民族和宗教信仰，保证在法律范围内行动的所有社会政治力量自由竞争。”<sup>①</sup> 从这一纲领中明显看出，苏共基本接受了社会民主党的民主社会主义纲领和基本价值观，强调人权、平等、多种所有制等原则。

苏共新党章为全党描绘了在多党制下党的建设的新机制。这个新机制标志着对传统的党建模式的彻底放弃。其主要内容包括：第一，在党对国家的领导上，强调党放弃政治垄断，放弃在宪法中的特权地位，党的作用是成为通过共产党员发挥作用的、民主承认的领袖。第二，在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上，强调尊重各党的独立性，并为此在中央增设了由各共和国党选送的代表的名额。第三，在干部问题上，强调决定干部的权力由上级机关转交给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强调实行选举制，实行差额选举并有可更换性。第四，在党员个人权利上，强调允许不同意见的自由，党内要确保意见表达自由，不同观点和纲领的对比、公开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党内不允许存在派别，但允许存在各种按志趣和问题成立的横向联系组织。第五，在党内监督问题上，强调监察委员会由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可以监督同级党委。苏共二十八大形成的这个机制不可能在加强党的整体力量上创造奇迹。这时的苏共虽然事实上仍处于执政地位，但在社会上的反对派和党内反对派的夹攻下，苏共推行自己的改革政策日益艰难。到了1991年上半年，苏共的执政地位已岌岌可危。以1991年“8·19”事变为导火索，人们把所有不满都倾泻到苏共头上，造成了苏共被停止活动的悲剧性结局，戈尔巴乔夫“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在苏联并未变成现实。

---

<sup>①</sup> 苏群编译：《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资料汇编》，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7页。

## 为什么要提“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戈尔巴乔夫为什么把改革的目标从完善原来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变成建设“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原因是复杂的，归结起来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个人主观因素的作用，戈尔巴乔夫的良心与道德观要求他这么做。

从个人升迁之路看，戈尔巴乔夫走得比较顺利，但他并不完全认同苏联的体制。据戈尔巴乔夫的妻子赖莎提供的资料，他在大学实习时就已经对机关作风很厌恶，他当时在莫洛托夫区检察院实习，在1953年6月20日写给赖莎的信中，戈尔巴乔夫抱怨说：“……这里的环境太让我压抑了。每当接到你的来信，这种感觉就会显得尤为强烈。你的信给我带来的越是美好、珍贵、亲切、明白，我对四周的丑恶就感觉越深……尤其是对该区的上层生活。虚伪狭隘、奴颜婢膝、一切结局都预先设定，官员公然为所欲为、厚颜无耻、目中无人……瞅瞅这儿的头头脑脑，除了便便大腹之外，毫无突出之处，可那副得意洋洋、自高自大、高高在上的腔调啊！还藐视科学呢。由此还有对青年专家的冷嘲热讽。”<sup>①</sup>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停滞更凸显了苏联体制的问题，让许多领导人认识到必须改变，正如阿尔巴托夫所说：“发动改革的戈尔巴乔夫及其同事们来自体制内部，而不是外部，这也不是偶然的。”<sup>②</sup>戈尔巴乔夫要改变苏联的体制，政治家的良心、责任与道德无疑起了很大作用。他认为，“在我国人民中，在党内早已积聚了革命变革的能量。我们得出改革的思想，不仅是受实用的利益和考虑的影响，而且是听从了不平静的良心的呼唤，依靠了革命传下来的不可摧毁的思想性，也是理论探索的结果，这种探索加深了我们对社会的了解，坚定了我们采取行动的志向”。<sup>③</sup>戈尔巴乔夫想让苏联的社会主义对人们更有吸引力。

二是原来的社会主义失去信誉，特别是对斯大林时期错误的揭露，让人们原来的社会主义失望，戈尔巴乔夫要继续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就必须确立新的目

---

①（俄）赖莎·戈尔巴乔娃著，王攀等译：《我的希望—赖莎·戈尔巴乔娃回忆录》，中国工人出版社2000年版，第75—76页。

②（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328页。

③（俄）米·谢·戈尔巴乔夫著，岑鼎山等译：《改革与新思维》，第14页。

标，与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划清界限。

随着公开性的推行，揭露过去被苏共掩盖的苏联历史上所犯错误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人们对历史的兴趣空前增加，“根据阿法纳西耶夫的建议，莫斯科历史档案馆在1987年开始举办‘在新的亮光下’的苏联历史讲座。首先曝光的就是斯大林，在课程开始前一小时，十月革命二十五周年大街（现在的尼科林大街）上，那里是档案馆所在地，已经聚集了許多人，以至于演讲人鲍里索夫本人要费很大劲穿过人群进入大楼”。<sup>①</sup> 苏联要改革，离不开对以往道路的评价，“改革和历史科学是相互必需的”。<sup>②</sup> 参与这次重评历史者涉及了苏联各个阶层。苏联社会“进入了重评时代，重新评价形成于30年代，直至80年代中期实际上仍是不可动摇的一切价值”。<sup>③</sup> 重评历史首先发轫于艺术界、文学界，后来扩展到史学界。从社会主流舆论看，对列宁的社会主义思想基本持肯定的态度，主要是批判斯大林体制对社会主义的歪曲，反思社会主义的实质、目标和原则，探讨人民需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

许多人认为，斯大林体制模式并不是对列宁的继承，“20年代末30年代初就已开始、并在斯大林个人迷信时期越来越严重背离了列宁所制定的社会主义理论模式，背离了列宁所指出的通过全面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人民自治、通过提高作为社会主义社会价值本身的劳动的人的作用、通过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的日益人道主义化这样一些建设社会主义的途径和方法”。<sup>④</sup> 有人提出，斯大林在短时间内使苏联摆脱了落后，奠定了现代工业的基础，打败了法西斯，需要作出牺牲，但是，他消灭一大批忠于列宁事业的光辉的革命者，并非客观条件所迫，也不是必需的。“是否可以认为斯大林是历史上的大活动家？我认为，是的，可以。但他是否社会主义大活动家，我是深有怀疑的。”<sup>⑤</sup> 改革就是要纠正斯大林对社

---

① Кацвал. А.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Советский период. (1917—1991). <http://it-n.ru>.

② (苏)阿法纳西耶夫：《改革和历史知识》，见(苏)尤·阿法纳西耶夫编：《别无选择——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和未来》，第699页。

③ (苏)M·卡普斯京：《我们拒绝什么遗产？》，(苏)《十月》1988年第4期。

④ (苏)С·奥杜耶夫：《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民主》，转引自《在改革浪潮中重评斯大林》，第94页。

⑤ (苏)A·鲍文：《改革：社会主义的真情实况和社会主义的命运》，转引自(苏)尤·阿法纳西耶夫编：《别无选择——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和未来》，第727页。

会主义的歪曲，“改革的实质就是保证社会主义向崭新状态过渡。而改革不仅仅是消除停滞，根除保守主义和因循守旧，纠正所犯错误。摒弃过去的领导和管理形式和方法。就其实质来说，就人道主义和民主方面来说，改革的方针就是有规律地继续和发展列宁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和原则，改革的基本环节乃是恢复列宁的社会主义概念。其内容可用三句话表述：人道主义、人、民主”。<sup>①</sup>“今天改革的最终目的，就是要给人民重建真正民主的、真正人民的生活方式；在这里，土地不再像过去一样只属于区的委员会，而是按照列宁的指示，土地属于农民和农民的土地协会；而权力也按照列宁的指示，属于苏维埃……”<sup>②</sup>这些思想基本上被戈尔巴乔夫所接受了。

三是苏联局势发展变化的要求，戈尔巴乔夫为了争取主动，不得不迎合当时的社会思潮。从1988年开始，在经济改革的同时，政治体制发生了根本变化，国家权力重心从党向苏维埃转移。苏维埃是选举产生的机关，这就有可能使非共产党人当选代表，“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事实上意味着在政治上取消了宪法第六条，即取消了宪法所规定的苏共在苏联政治中的领导与核心地位。

1989年从上到下进行了新的国家权力机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与以前不同，这次实行差额选举，社会组织正式派代表参加选举。2250名代表按下列程序产生：750名代表从选民人数相等的地区选区选举；750名代表从民族地区选区选举（每个加盟共和国32名，每个自治共和国11名，每个自治州5名，每个自治区1名）；全国性社会团体（包括苏联共产党、青年团、工会等）共选举750人。1989年4月4日，选举结果公布，在2250名代表名额中共产党员占87.6%。但是，许多党的干部落马，有20%的党员在竞选中被淘汰，莫斯科市长塞金、市委书记普罗科菲耶夫落选，列宁格勒州委第一、第二书记，市委第一书记、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和市计委主席全部落马，许多反对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叶利钦、索布恰克、波波夫、萨哈罗夫等都成了人民代表。共产党的100名代表是通过等额选举产生的，因为很多人担心差额会把自己差掉。选举结

---

<sup>①</sup>（苏）C. 奥杜耶夫：《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民主》，转引自《在改革浪潮中重评斯大林》，第104页。

<sup>②</sup>（苏）叶夫根尼·诺索夫：《我们究竟改革什么》，转引自：《在历史浪潮中重评斯大林》，第175页。

果表明苏共在选举中失败了，虽然在人民代表中共产党员的比例高达87.6%，但许多人并不是因为坚持党的原则而被选上的，按民族地域选区推举的地方组织的30名候选人，很不光彩地落马了，输给了资历不深、名气不大、但却更加“令人信服”的竞争对手。<sup>①</sup>

1989年5—6月第一届人代会召开，代表大会上集合了各种各样的人，提出了各式各样的观点。在这次会议上，人民代表首次有权组织政治反对派，成立了跨地区议员团，起初有150人，1989年夏天发展到388人，其中286人来自俄罗斯联邦。这个民选的人代会排斥了党对立法和高层决策、高层领导人人事权的控制，成了民主派强有力的阵地。叶利钦等反对派在大会期间的活动和发言成为这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事件，这是自20年代党内斗争结束后，苏联出现的第一个合法的政治反对派。其代表萨哈罗夫在发言中明确提出：废除苏联宪法第六条；只有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才能通过法律，这些法律在加盟共和国需经其最高法律机关批准才能生效；苏联人代会选举和罢免国家高级公职人员（包括最高苏维埃主席、副主席、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宪法监督委员会主席、最高法院院长、苏联总检察长、中央银行行长、克格勃主席、广播电视委员会主席、《消息报》主编等）。<sup>②</sup> 他的发言成为反对派的纲领，站在这一反对派阵营的代表人物还有阿法纳西耶夫、波波夫、索布恰克等。他们要求改变共产党在社会中的地位，要求实行广泛的民主化和公开性，党的机构不能干涉舆论；国家领导人实行由人代会选举产生的制度，选举应该是差额选举；加大改革力度，给共和国以更多的独立性和主权，打破行政命令体制，解决社会公正问题，消除少数人的特权。

与此同时，苏联社会政治气氛空前活跃，斯大林体制成了明确的被批判对象，造成了戈尔巴乔夫始料不及的后果：国内的民族情绪发展，民族矛盾公开化，中央政权难以应付危机；舆论多元化发展成政治多元化，各种非正式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如拉脱维亚有“人民阵线”，乌克兰有“乌克兰拥护改造人民运动”，各加盟共和国都建立了“人民阵线”，其代表于1988年8月13日在雅尔

---

<sup>①</sup>（俄）尼·雷日科夫著，李永全等译：《大动荡的十年》，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519页。

<sup>②</sup> Киселева А. Ф., Шагина Э. М. (под ред.) Хрестоматия по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истории (1946—1995), М., Гуманит. изд. центр ВЛАДОС, 1996. С. 323.

塔进行工作会晤；官僚体制对改革进行抵抗，经济形势更加恶化。1989年7月29—30日，400多名苏联人民代表自行串联，在莫斯科电影工作者之家举行了人民代表跨地区代表小组第一次会议，成立了变相的反对派议会集团，选举叶利钦、萨哈罗夫、阿法纳西耶夫、波波夫和帕尔姆为小组主席。1989年12月，一些人民代表发表关于政治改革的声明指出，“大多数居民正是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丧失或已经丧失了对改革的信任，认为改革多半是口头的和表面的。许多人甚至不相信米·谢·戈尔巴乔夫。这种潜在的可怕的信仰危机，公开的不满和气愤与日俱增，并影响着从春夏开始一直持续到现在的改革的第四阶段”，“改革的进程已到了原则的边缘，各机构反动头目的对抗在增长，戈尔巴乔夫领导的犹豫更一目了然。但是，错了。东欧发生的大好事就是例子，对于那些打算在不确定的时期内保持强行的‘苏联共产党的先锋队 and 领导作用’，对于那些打算保留经济部门、指令性计划、国营集体农庄系统的垄断权的人是足够清晰的警告。必须在一定时候开始拆除这一切”。<sup>①</sup> 苏共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必须拿出吸引民众的新东西来。

面对这种新的危急形势，戈尔巴乔夫和苏共主流派只能退让，以求取得主动。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戈尔巴乔夫在1989年11月26日《真理报》发表题为《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革》的长篇文章。如果说改革初期戈尔巴乔夫主要着眼于纠正社会的扭曲现象，完善过去几十年间形成的制度，那么此时戈尔巴乔夫则强调：“必须根本改造我们的整个社会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不仅是说，而且要在改革所有制关系、经济机制和政治体制，改变社会上的精神和道德气候等方面实际实行步骤。”戈尔巴乔夫强调苏联的改革既不是保存行政命令体制，也不是推翻十月革命的选择而走资本主义，而是恢复马克思主义思想权威和马克思主义对待现实的态度，“要依靠建设一个人道的、自由的、理智的社会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巨大智慧和道德潜力”。<sup>②</sup> 从此，改革发生根本性转折，不仅改革的目标改变了，政治体制也开始按照西方国家的模式发展：实行总统制、取消

---

<sup>①</sup> 《苏联人民代表关于政治改革的声明（摘录）》，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0卷，第528页。

<sup>②</sup>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社会主义思想和革命性改革》，《苏联东欧问题译丛》1990年第1期，第2、3页。

宪法第六条、制定新党纲，提出发展市场经济等。

总之，戈尔巴乔夫“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思想是逐渐形成的，很大程度上也是对苏联社会主流思潮的妥协，但是，戈尔巴乔夫未能实现“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目标，因此，不能把苏联改革的失败说成是“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失败。至于如何评价“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问题，俄罗斯历史学博士、教授亚历山大·加尔金的结论也许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他认为“戈尔巴乔夫改革其实就是将民主的社会主义（它要求建立以团结和社会公正以及得到民主架构和程序保障的坚实自由为基础的社会制度）思想付诸实践的第一次大规模尝试，这一尝试的意义大大超过著名的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后者在尚未采取最初的实际步骤以前即被扼杀。很明显，戈尔巴乔夫改革作为各种实践活动的综合过程尽管已遭到失败，但改革同时也为人类开辟了新的发展机会，从而成为人类历史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sup>①</sup>

---

<sup>①</sup> 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编，李京洲译：《奔向自由——戈尔巴乔夫改革二十年后的评说》，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74页。

## 68. 所谓戈尔巴乔夫在土耳其美国大学讲话的真相如何？

徐 葵

在中近东国家中有三个地方有美国大学，第一个是埃及开罗美国大学，第二个是黎巴嫩贝鲁特美国大学，第三个是阿联酋迪拜美国大学。在土耳其安卡拉没有美国大学，可是 1999 年俄罗斯的《苏维埃俄罗斯报》、捷克《对话》杂志（据说该刊为捷克摩拉维亚地区共产党组织的党刊）却相继刊登了戈尔巴乔夫 1999 年在土耳其美国大学发表一篇讲演的材料，在这个材料中耸人听闻地报道说，戈尔巴乔夫在这篇讲话中说了“我生活的目的就是消灭共产主义”，“现在消灭苏联共产主义的目的已经达到，下一个目的就是消灭中国共产主义”等话。在俄罗斯的戈尔巴乔夫基金会得知上述报刊发表的这个材料后，当即由它的新闻处发表了一个辟谣声明，指出这个材料是伪造的，戈尔巴乔夫在 1999 年根本没有去过土耳其。

我国学者是到 2000 年 5 月才知道捷克《对话》杂志上刊登的上述戈尔巴乔夫 1999 年在土耳其美国大学的所谓讲话的。这年 5 月，一位应邀来我国参加一个国际问题讨论会的保加利亚代表在会上发言时举着捷克《对话》杂志上刊登的这篇所谓的讲话的一份复印件作为证据，来说明戈尔巴乔夫的叛变导致了苏联的解体。这位保加利亚代表提供的《对话》杂志上刊登的这篇所谓讲话是捷克文的，会后有人请懂捷克文的同志把这篇所谓的讲话从捷克文翻译成了中文。

这篇于 1999 年在俄罗斯炮制并在俄罗斯已由戈尔巴乔夫基金会揭露为伪造的材料，由上述保加利亚代表传到在我国举行的上述国际问题讨论会上后，我国有的学者对它显示出了极大的兴趣。他们不经调查核实戈尔巴乔夫于 1999 年去

过土耳其没有，土耳其有没有美国大学，就把这篇伪造的戈尔巴乔夫的讲话当做证明戈尔巴乔夫是叛徒的绝好证据，并利用这个材料大做文章。我国有三家杂志在2000年下半年连续刊登了这篇所谓的讲话。首先是《真理的追求》，2000年10月该刊在这一年的第10期上以《极为难得的反面教材——戈尔巴乔夫自白：我生活的目的就是消灭共产主义》为题发表了捷克《对话》杂志刊登的这篇假材料；接着是《中流》杂志也在《叛徒的自白》的醒目标题下发表了这篇假材料；最后是《科学社会主义》杂志也发表了这篇假材料。在这几家杂志大做文章的影响下，一时间我国有不少人受到了误导，如有的学者在自己的著作中就引用了这个假材料中的戈尔巴乔夫的话，中央组织部有的负责同志在他发表的文章中也引用了这个假材料中伪造的戈尔巴乔夫的话，用来对我国党员进行教育并提出警示。

我看到《真理的追求》发表的这篇戈尔巴乔夫的“自白”后，与一些研究苏联、俄罗斯和国际问题的同志进行了交谈，此时虽然我们也和其他人一样，并不知道戈尔巴乔夫基金会已对此材料发表过辟谣声明，并进行了驳斥，但我们对这个材料进行研究后对它的真实性还是感到有些怀疑。我们当时的主要疑点有四：（1）捷克《对话》杂志发表这篇戈尔巴乔夫的讲话，只说是1999年在土耳其的美国大学讲的，却没有说明讲话的具体日期。（2）这个材料没有说明这篇讲话的具体来源，既未说明是讲话人本人提供的，也未说明是哪个记者提供的。这两条都不符合严肃新闻报道的常规。（3）我们觉得，这个所谓的“自白”中一些讲话内容和语气，尤其是有关对中国的内容和语气，同我们这几年从戈尔巴乔夫的著作和讲话中所知道的内容和语气，以及他对中国的态度联系不起来。我们知道新中国成立后30年中，中苏关系经历了结盟、对抗和在1989年5月15日至18日戈尔巴乔夫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后中苏两国两党恢复正常关系三个时期。在促使恢复两国正常关系这个对两国都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大事中，戈尔巴乔夫是起了积极作用的。正如钱其琛同志在他著的《外交十记》中说的，“作为历史人物，戈尔巴乔夫的功过，自有后人去评说，但他的北京之行所完成的重大历史使命，在中苏关系上，应当被浓墨重彩地记上一笔”。<sup>①</sup> 我们根据戈尔巴乔夫以往

---

<sup>①</sup> 钱其琛著：《外交十记》，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10月第1版，2009年6月第10次印刷，第37页。

对中国的态度，对他在土耳其美国大学的所谓讲演中出现的那些包括具有恶意地针对中国的内容的这篇所谓“自白”的真实性不能不感到怀疑。(4) 戈尔巴乔夫作为一个还在俄罗斯国内和国际上活动的政治人物，为什么要在1999年选择土耳其的美国大学这样一个地点去做这样一番“自白”，这也是很难按常理来解释的。

此时，我们也得知我们有领导同志已要求核实这篇讲话是否属实。我感到自己作为一个长期从事苏联和俄罗斯问题研究的研究人员有责任帮助进行核实。于是，我在2000年底开始后的半年多时间中一方面向俄罗斯的戈尔巴乔夫基金会进行询问，另一方面也向土耳其等方面进行查询核实。首先，我向我认识的俄罗斯社会经济和政治学研究国际社会基金会（简称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的顾问切尔尼亚耶夫写信询问。我在信中问他，戈尔巴乔夫是否曾于1999年在土耳其美国大学作过讲演，如果是的话，则请他给我寄一份讲话稿的全文来。切尔尼亚耶夫于2001年1月11日给我回信说，戈尔巴乔夫在1999年没有去过土耳其，他曾在1997年到过土耳其，他根本未在土耳其美国大学做过讲演。所传的戈尔巴乔夫1999年在土耳其美国大学的讲演是伪造的。戈尔巴乔夫基金会新闻处曾就此事正式发表过驳斥声明。我收到他的回信后就将他告知的情况向有关领导作了报告，同时还设法继续就这个问题向其他方面进行查询和核实。

我从因特网上搜索了世界各主流媒体是否曾对戈尔巴乔夫的土耳其美国大学的讲演有过反映，但搜索不到这方面的反映，只找到一家不太知名的加拿大多伦多《北极星指南针报》发表过捷克《对话》杂志那个假材料的英文本。

接着，我又从因特网上搜索土耳其的美国大学（此时我还不知道土耳其没有美国大学），想查看该校外事活动资料中是否有戈尔巴乔夫访问该校之事，但反复搜索，在因特网上始终搜索不到在土耳其有这个学校的名字。我进而向土耳其有名的安卡拉大学查询，请他们告诉我安卡拉美国大学的地址，或提供他们所知道的有关戈尔巴乔夫访问土耳其的情况。安卡拉大学的负责人在给我的电子复函中说，戈尔巴乔夫于1997年4月27日访问了土耳其，曾在中东技术大学讲过话。安卡拉有中东技术大学，但无美国大学。

另外，我还向我国《光明日报》原驻土耳其的记者进行查询，该记者给我的回答是，他确知戈尔巴乔夫1997年访问过中东技术大学，因为他认识中东技术大学安排这次活动的一个土耳其朋友，但他不知道安卡拉有美国大学。

最后，我还给我国驻土耳其大使馆发函并随函附去了从因特网上下载的加拿大《北极星指南针报》发表的捷克《对话》杂志刊登的那个假材料的英文本，请使馆帮助核实。使馆给我回复说：“经我馆向土耳其外交部、中东技术大学、比尔肯特大学及信贷银行基金会核实，戈尔巴乔夫 1999 年未去过土耳其。上述机构告，戈曾应土信贷银行基金会邀请，于 1997 年来土，先后访问中东技术大学和伊斯坦布尔海峡大学并与土实业界有过接触。戈在此次访土期间，曾在上述大学与实业家接触过程中，发表了一些言论，但没有您请我馆核实的言论。中东技术大学甚至表示，可以提供戈访问该校的简短录像。另，土耳其没有美国大学这样一个教育机构。”

不论是来自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的顾问切尔尼亚耶夫的答复，还是来自安卡拉大学、我国《光明日报》原驻土耳其的记者的答复，以及我国驻土耳其大使馆的答复，其内容都是相符的，结论也是一致的。那就是：戈尔巴乔夫 1999 年没有去过土耳其，土耳其也没有美国大学。（以上几个方面给我的答复的原件请见附件二至四）

2001 年 1 月中我收到戈尔巴乔夫基金会顾问切尔尼亚耶夫的回信后觉得，既然基金会新闻处已就戈尔巴乔夫 1999 年在土耳其美国大学的所谓的讲话问题做出过正式的辟谣声明，那么切尔尼亚耶夫提供的信息应该是可信的。所以我于 2001 年 1 月 19 日给《真理的追求》杂志编辑部写了一封信，向编辑部提供了切尔尼亚耶夫在信中就此问题所讲的全部信息，并请编辑部考虑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对读者负责的态度是否需要采取适当的方式向读者说明此事，以免读者误把伪造的材料信以为真，并据此作出结论。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真理的追求》杂志编辑部对我写给他们的信一直不予置理，却在 2001 年 6 月在该刊 2001 年第 6 期上发表了一篇以《戈尔巴乔夫的叛徒面目是用自己的言行刻画的》为题的署名文章，针对我给《真理的追求》编辑部写的那封信，在未征得我同意的情况下，摘取了该刊未予发表的我给该刊编辑部写的信（此信全文见本文附件一）中的话，借题发挥，并在文章末尾给我加了一个“为社会主义叛徒开脱和辩解”的罪名。《真理的追求》刊登的这篇署名文章中完全避开戈尔巴乔夫是否在 1999 年到过土耳其并在土耳其的美国大学发表过讲演这个问题本身，提不出任何能证明这不是伪造的材料，而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证据，只是在《戈尔巴乔夫的叛徒面目是用自己的言行刻画的》这个标题

的大帽子下，用一些与这个问题无关的遁词进行诡辩，实际上是继续为那个假材料辩护。应该指出，不论问题涉及的是戈尔巴乔夫也好，还是别的什么人也好，不对事实本身做调查研究，而根据假材料一不罢二不休地大做文章，这完全是违背实事求是的原则的，这种作风在学术研究和讨论中是不能允许的。这篇署名文章还给指明这个问题真相的人横加罪名，扣帽子说他是“为社会主义叛徒开脱和辩护”，这更是学术研究上不能允许的霸道作风。

经过半年多的调查和核实，我终于澄清了伪造的戈尔巴乔夫 1999 年在土耳其美国大学发表讲演这个问题的真相。从这件事情中我们需要认真吸取的教训是，我们在学术研究和讨论中应进一步树立我们党所提倡的实事求是和求真务实的学风，记住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至理名言，否则就会犯主观主义的毛病，抱先人之见，偏听偏信，闹出大笑话来。现把有关资料附后，供参考。

附件：

#### 一、我给《真理的追求》编辑部的信

《真理的追求》编辑部负责同志：

贵刊 2000 年第 10 期刊登了捷克《对话》杂志 1999 年第 146 期发表的戈尔巴乔夫在土耳其美国大学的讲话。我读后对这篇讲话的真实性感到有些怀疑。去年年底我在同俄罗斯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的顾问阿纳托里·切尔尼亚耶夫一次通信中向他询问此事。并向他提出如果戈尔巴乔夫在土耳其美国大学做过讲演的话，请他把讲演稿寄来。本月 12 日我收到了他的回信，他在信中指出《对话》杂志发表的这个材料是伪造的，戈尔巴乔夫根本没有到土耳其美国大学做过讲演，现把来信有关这个问题的部分，全文翻译如下：

“至于戈尔巴乔夫在土耳其的‘讲演’，那完全是在莫斯科炮制的假材料，根据我们的材料，是在《苏维埃俄罗斯报》的编辑部里炮制的。

“戈尔巴乔夫不是在 1999 年，而是在 1997 年初到过土耳其。他根本没有在美国大学做过讲演。《对话》杂志上发表的东西（《苏维埃俄罗斯报》曾同样予以发表）完全是胡说八道。戈尔巴乔夫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从未讲过这类话。

“戈尔巴乔夫基金会新闻处曾向因特网和国际文传发过以下驳斥声明：

“《苏维埃俄罗斯报》最近通过因特网散布一篇题为‘戈尔巴乔夫说：我生活的目的就是消灭共产主义’的材料，说这是戈尔巴乔夫在土耳其美国大学的讲

演稿。有鉴于此，戈尔巴乔夫基金会新闻处通告，所发表的这个材料是伪造的。《苏维埃俄罗斯报》近10年来从事着这类事情。‘国外讲稿’的捉笔者们很可能就坐在这家报纸的编辑部里。《苏维埃俄罗斯报》反映的是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和那些在1991年支持过政变与现在想使国家回到旧秩序中去的人的立场。

“至于戈尔巴乔夫的立场，则不论在俄罗斯，还是在全世界都是众所周知的。”

我觉得，现在可以认为，此事的真实情况已经清楚。请考虑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对读者负责的态度是否需要采取适当的方式向贵刊读者说明此事，以免读者误把伪造的材料信以为真，并据此作出结论。

专此 顺祝

编安

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

研究员 徐 葵

2001年1月19日

二、安卡拉大学雷扎·爱汉先生2001年6月22日对徐葵的电子询问信的答复：

主 题：回复有关安卡拉美国大学的询问

时 间：2001年6月22日，星期五，9时10分

发件人：雷扎·爱汉（Risa Ayhan@ankala.edu.tr）

亲爱的徐：

戈尔巴乔夫于1997年4月27日访问了土耳其，在中东技术大学讲了话。安卡拉有中东技术大学，但无美国大学。你如要进一步研究，可访问中东技术大学网页 <http://www.melu.edu.tr> 搜索“戈尔巴乔夫”

三、2001年7月24日《光明日报》原驻安卡拉记者李育同志电话告诉我：

他确实知道戈尔巴乔夫1997年访问过土耳其中东技术大学，他认识该大学安排这次活动的一个人，但未听说安卡拉有美国大学。

四、我国驻土耳其大使馆7月25日给徐葵同志的复信：

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徐葵同志：

你7月24日致姚大使的信件收到。经我馆向土耳其外交部、中东技术大学、比尔肯特大学及信贷银行基金会核实，戈尔巴乔夫1999年未去过土耳其。上述

机构告，戈曾应土信贷银行基金会邀请，于1997年来土，先后访问中东技术大学和伊斯坦布尔海峡大学，并与土实业界有过接触。戈在此次访土期间，曾在上述大学与实业家接触过程中，发表了一些言论，但没有您请我馆核实的言论。中东技术大学甚至表示，可以提供戈访问该校的简短录像。另，土耳其没有美国大学这样的一个教育机构。

此致

敬礼

驻土耳其大使馆

2001年7月25日

五、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董漫远（原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馆研究室主任）调查戈尔巴乔夫1999年在土耳其美国大学讲演真伪亲历记

2001年7月24日，中国驻土耳其使馆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徐葵研究员的信件，希望我馆协助了解戈尔巴乔夫1999年在土耳其安卡拉美国大学发表的关于“我的生活目的就是消灭共产主义”这一演讲的真伪。

我当时任使馆研究室主任，根据大使的指示，负责处理此事。根据我馆掌握的情况，土耳其根本就没有什么美国大学。中东地区只有三个国家有“美国大学”，即开罗美国大学、贝鲁特美国大学和迪拜美国大学。出于严肃对待此事的考虑，我请研究室的其他同志分别向土耳其外交部、中东技术大学、安卡拉大学、比尔肯特大学以及信贷银行基金会核实戈尔巴乔夫是否于1999年访问过土耳其。土外交部告，戈尔巴乔夫曾于1997年4月访问过中东技术大学和伊斯坦布尔海峡大学。因为徐葵研究员的信件中已经指明戈尔巴乔夫演讲地点是“安卡拉美国大学”，故我馆已无必要向伊斯坦布尔海峡大学核实戈尔巴乔夫访问情况。鉴此，我于7月25日上午携带助手亲赴中东技术大学外联处了解戈尔巴乔夫访问该校的相关细节。

到校后，我在校长助理的陪同下，见到了外联处正、副处长。处长告，戈尔巴乔夫在1997年4月27日访问了中东技术大学，参观了校园和图书馆，会见了正、副校长，出席了一个简短的欢迎仪式，校长致了欢迎词，戈尔巴乔夫致了答词，校方录了像。我问：“戈尔巴乔夫是否在讲话中提及他的生活目的是消灭共产主义，是否在讲话中提到中国？”对方断然否认，并表示可立即调出录像带查

看。我回答：“不必了。我相信你的回答是正式回答。”回到使馆后，我立即向大使报告了所了解的情况，并起草了致徐葵研究员的复信，经大使签发后通过传真发送给徐葵研究员。全文如下：

（复信内容同附件四，在此从略。）

如上是我亲历此事的全部过程。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董漫远

2009年1月19日

## 69. 如何评价戈尔巴乔夫对外政策的新思维？

左凤荣

戈尔巴乔夫上台之时，苏联国内问题成堆，军备竞赛让苏联经济不堪重负，里根又要加紧实施他于1983年3月提出的星球大战计划，如果苏联应战，就意味着开始新一轮军备竞赛，这是苏联经济绝对无法承受的。面对美国的挑战，苏联需要改变传统的外交政策，为此，必须改变苏共传统的对外政策理论。在这一背景下，戈尔巴乔夫提出了新思维外交的思想，并逐步加以完善，逐渐成了指导苏联外交的理论基础。

### 对外政策新思维的提出

在1986年2月苏共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上，戈尔巴乔夫一如既往地强调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进步性和资本主义的局限性、矛盾的尖锐性，强调两个体系、两种社会形态国家之间的矛盾是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重要的矛盾，“帝国主义的内在动机、它的社会经济实质本身也迫使帝国主义将两个体系的竞赛变成了军事对抗。帝国主义由于其社会本质而不断推行侵略性冒险政策”。<sup>①</sup> 戈尔巴乔夫批评了美国的军事对抗政策，强调苏联社会主义主张不同国家的和平共处，主张用和平手段解决问题。与此同时，戈尔巴乔夫也强调出现了涉及文明社会存在基础本身的全球范围内的矛盾和问题，如环境、大气层和海洋的污染以及自然资源的枯竭，

---

<sup>①</sup> 辛华编译：《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6页。

强调“解决全人类和全球的问题光靠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的力量是不行的。这需要世界范围的合作，需要大多数国家密切的、建设性的协作”。<sup>①</sup>总的看来，戈尔巴乔夫对当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估计并未超出苏联的传统认识，但戈尔巴乔夫并不想与美国对抗，而是进行长期的和平竞赛，同时，为了解决全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而进行协作，“需要这种协作来防止核浩劫，使文明社会能够生存下去。需要进行这种协作，以便共同地和为了每个人的利益来解决全人类的其他日益尖锐的问题”。<sup>②</sup>戈尔巴乔夫的主要意图在于摆脱军备竞赛，为苏联的经济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创造有利条件。

1986年7月28日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讲话中，戈尔巴乔夫提出了苏联对外关系新的行为准则，“不是谋求某些特权和特殊地位，不是出于自私目的，企图以牺牲他人来加强自身安全，以损害别人来寻求好处。我们认为自己的利益在于共同努力，在于在充分尊重每一国人民按照自己的选择而生活并在和平条件下独立自主地解决自身问题的情况下进行合作”。<sup>③</sup>他提出建立新的、公正的国际关系，“时代要求对文明、国际关系和世界发展的现阶段作出新的理解。这是一个充满矛盾、复杂而又被相互联系的纽带客观上联成一体的世界。这是由于利益上的种种差别与冲突而不能按数千年形成的‘强权’传统来生存的国际关系”。<sup>④</sup>在谈到亚太地区的国际关系时，戈尔巴乔夫指出：“今后这一地区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将如何发展，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中什么样的进程占优势，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全世界的命运。”<sup>⑤</sup>“历史的经验、不断增长的相互依存的规律和经济一体化的需求，都要求寻找途径来协调和安排好这一地区内外的国家之间的关系。”<sup>⑥</sup>戈尔巴乔夫这一讲话与其在苏共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相比，显然又向前迈了一步，他更加强调世界的相互依存性和进行国际合作，强调苏联对外政策的改变。

在1987年11月出版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是戈尔巴乔夫对外政策新思

---

① 辛华编译：《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第26页。

② 辛华编译：《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第29页。

③ 《真理报》1986年7月29日，引自苏群译：《戈尔巴乔夫言论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28页。

④ 《真理报》1986年7月29日，引自苏群译：《戈尔巴乔夫言论选集》第425页。

⑤ 《真理报》1986年7月29日，引自苏群译：《戈尔巴乔夫言论选集》第426页。

⑥ 《真理报》1986年7月29日，引自苏群译：《戈尔巴乔夫言论选集》第428页。

维形成的重要阶段。在该书中他对国际形势和苏联的外交政策进行了分析与解释，强调对话与合作。戈尔巴乔夫对外政策的新思维意在改变苏联“邪恶帝国”的形象，与世界和谐相处，为苏联的改革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1988年戈尔巴乔夫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经过精心准备的讲话，提出了一系列改善国际局势的具体建议，如排除在对外政策中使用武力，奉行自由选择的原则，实现国家关系的非意识形态化，苏联要在两年内裁军至少50万人，削减常规武器，从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撤出部分军队等等，标志着新思维概念和新思维政策的正式形成。

### 对外政策新思维的主要内容

戈尔巴乔夫对外政策的新思维是戈尔巴乔夫调整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这一思想无论对苏联，还是对世界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其内容包括以下几方面：

第一，戈尔巴乔夫改变了对世界战争与和平的看法。他强调，人类已经进入了核时代，核战争不可能是达到任何政治的、经济的、意识形态的目的的手段，在核战争中不会有胜利者，只能导致人类文明的毁灭。戈尔巴乔夫认为，“人类进入原子能被用于军事目的的核时代之后，就可能不再是永生的了……一旦爆发核战争，一切生命都将从地球上消失”。<sup>①</sup>“不仅核战争本身，而且对这样的战争的准备，亦即军备竞赛和争取军事优势，客观上不会给任何人带来政治上的胜利……为了建立一个无所不包的国际安全系统，必须走合作之路”。<sup>②</sup>同时，“要在经济领域和政治体制中实行彻底的改革，就必须在对外政策方面进行相应的改革，创造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作为开头，至少也得把‘冷战’的积雪扫除干净，把由于我们被卷入世界各地的冲突、参加靡费精力的军备竞赛而带来的种种问题所造成的压力缓解下来”。<sup>③</sup>戈尔巴乔夫放弃了认为世界安全取决于两大体系力量均衡的观念。

<sup>①</sup>（苏）米·谢·戈尔巴乔夫著，岑鼎山等译：《改革与新思维》，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第118页。

<sup>②</sup>（俄）米·谢·戈尔巴乔夫著，述弢等译：《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上册，第341页。

<sup>③</sup>（俄）米·谢·戈尔巴乔夫著，述弢等译：《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下册，第719页。

戈尔巴乔夫认为：“在军备竞赛中取胜，以至在核战争中取胜，是不可能的。在地球上继续这种竞赛，尤其是继续把这种竞赛扩展到太空，势必加快核武器积存和改进的速度，而这种速度本来就已达到疯狂的程度了。世界的局势会变得不以政治家们为转移。局势将为偶然性所左右。我们大家都必须学会在这个世界上和平相处，树立新的政治思维。”<sup>①</sup> 戈尔巴乔夫认为，由于核武器的出现，要求用新的眼光看待战争与革命问题，过去，革命往往与战争相联系，但核战争的结局只能是普遍毁灭，因此，苏共二十七大的新党纲删掉了“一旦帝国主义侵略者仍然敢于发动新的世界大战，各国人民就将不再容忍使他们陷入毁灭性战争的制度。他们将消灭和埋葬帝国主义”。与此相联系，戈尔巴乔夫把新思维外交的核心定为：“承认全人类价值观的优先地位，说得更确切些——承认人类的生存。”<sup>②</sup>

由于对现代战争看法的根本改变，戈尔巴乔夫提出了新的安全观，以“普遍安全”（或“相互安全”）取代以往的“单方面安全”来确保苏联的国家安全，不再把自己的安全建立在损害别国主权与利益的基础上，不再牺牲别国的安全，承认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自决权。他提出：“安全的唯一牢固基础，就是承认各个民族和国家的利益，承认它们在国际生活中一律平等。必须把自己的安全同国际社会各成员同样的安全结合起来……决不能靠牺牲别人的安全来求得自己的安全。”戈尔巴乔夫反对军备竞赛，宣布把军事战略建立在防御的基础上，并提出了合理、足够的原则。他强调：“新的政治思维同样不容违背地决定了军事思想的性质。军事思想应该是严格的防御性的……我们时代普遍安全的基础，就是承认每个民族都有权选择自己的社会发展道路，不干涉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尊重别人并对自己的社会持客观的、自我批评的观点。人民可以选择资本主义，也可以选择社会主义。这是他们的主权。各国人民既不能也不应该受制于美国，既不能也不应该受制于苏联。”<sup>③</sup> 戈尔巴乔夫认为苏联不能通过武力战胜资本主义，核时代以战争作为解决政治问题的手段无异于自杀，保障苏联安全只能通过和平

---

①（苏）米·谢·戈尔巴乔夫著，岑鼎山等译：《改革与新思维》，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第118页。

②（苏）米·谢·戈尔巴乔夫著，岑鼎山等译：《改革与新思维》，第126页。

③（苏）米·谢·戈尔巴乔夫著，岑鼎山等译：《改革与新思维》，第123页。

手段，因此，苏联不再追求军事优势，而是争取“低水平的战略平衡”，“足够的防御”，“在我们的时代，真正的、对等的安全是以水平越来越低战略均势来保证的，从中必须完全排除核武器及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sup>①</sup> 戈尔巴乔夫认为利益的平衡才是安全的可靠保障。

戈尔巴乔夫的安全理论放弃了苏联长期奉行的霸权主义，有积极的意义，其实际内容是苏联放弃了东欧这一势力范围，以换取结束与西方的冷战和对峙。但是，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霸权主义继续存在的条件下，苏联单方面退却，是不是能真正解决问题？当苏联从传统控制区撤出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去填补真空时，苏联将怎么办？这是不是对苏联安全的威胁？戈尔巴乔夫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而这一问题在苏联解体后成为俄罗斯面对的主要问题，至今仍困扰着俄罗斯。这一理论的缺陷还在于，他只侧重于国家的军事安全，而没有提出国家的经济安全问题，正因为他没有这方面的意识，日后他竟天真地请美国学者帮助他制定经济改革计划。

第二，在关于时代和苏联社会主义历史地位的问题上，戈尔巴乔夫放弃了苏共长期坚持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观，提出和平共处不再是“阶级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而是核时代“全人类生存的条件”。他提出重新认识现代资本主义，放弃了“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和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的理论，指出“现在的情况不同了。资本主义不仅由于上次战争的教训，而且由于害怕自己在已成为世界体系的社会主义面前被削弱，不愿意使内部矛盾发展到极限。内部矛盾已经转化为相互间的技术竞赛，利用新殖民主义来‘缓和一下’。世界发生了某种新的‘和平’的重新划分——是根据列宁揭示的那种规划，即按‘资本’来划分，谁更富有，谁在此时更强大，谁就拥有更多的份额。在一些国家，借口‘苏联的威胁’，把资金转给军界工业界集团，以此来‘消除’经济中的紧张状况。资本主义经济技术基础和组织基础也有助于调解矛盾、平衡利益”。资本主义可以在不进行军事化的情况下发展，许多国家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时期是在军费最低的条件发生的。<sup>②</sup>

---

①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著，岑鼎山等译：《改革与新思维》，第121页。

②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著：《十月与改革：革命在继续》，莫斯科新闻社出版社1987年版，第43页。

戈尔巴乔夫承认现实的社会主义并不能取代资本主义，而只是“这个世界的组成部分”。1986年3月苏共二十七大提出苏联战略的主要目标是“保证使苏联人民在持久和平和自由的条件下劳动”，把和平共处作为苏联“绝对遵循的政治方针”。“党在世界舞台上的活动的主要方向，依然是为反对核危险和军备竞赛、为争取维护和加强普遍和平而斗争”，“如果说到美国与苏联的关系，安全只能是相互的，而如果以整个国际关系而论，安全只能是普遍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对抗仅仅并且完全通过和平竞赛与和平竞争的方式进行。”苏共二十七大改变了苏联外交政策的方向，“它把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国家以阶级斗争为基础的思想转变成东西方在较低和较少危险的军备状况下共享安全的观念”，提出了“加强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国家战略，将苏联的战略目标变为谋求与西方国家的和平共处，创造有利于国内进行经济建设的和平环境。<sup>①</sup>

第三，戈尔巴乔夫认为世界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一个整体，世界经济联系正日益国际化，苏联要发展，必须加入世界经济体系中去。苏联长期受斯大林“两个平行市场”理论的影响，脱离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大潮，造成了国家的封闭与落后，戈尔巴乔夫冲破了这一理论束缚，开始强调苏联与世界经济联系的重要性，提出苏联不能置身于一一体化的世界经济之外。苏共二十七大提出新的对外政策构想的出发点是：尽管组成现实世界的各国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别，然而世界是相互联系的，是相互依附的，它是一个固定的整体。戈尔巴乔夫从世界是由多种类型的国家构成的这一角度出发，承认世界是多侧面、多色彩、多变化和充满矛盾的，戈尔巴乔夫强调尊重各个国家不同的利益，强调利益均衡。戈尔巴乔夫指出：“谁也不能抹杀社会主义世界、发展中的世界和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但“我们还看到一个主要的趋势——国际社会各国日益增长的互相依存的趋势”。他还说：“我们时代的另一个同样明显的现实，是出现了所谓的全球性问题，而且越来越尖锐，这些问题对于文明社会的命运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里说的是对自然界的保护，是环境、空间和海洋的危急状态，是我们星球并非无限的传统资源。这里说的是原有的和新发现的可怕的疾病，是人类共同焦虑的问题，即如何消灭地球上广大地区的饥饿和贫困……现在看得越来越清楚，必须建立有效

---

<sup>①</sup>（苏）阿纳托利·多勃雷宁著，肖敏等译：《信赖》，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679页。

的、以平等为原则的国际程序和机制，以保证合理利用地球资源这些全人类的财富。”<sup>①</sup>

戈尔巴乔夫否定了两种社会制度完全对立的观点，提出在核武器出现使人类社会安全受到威胁的条件下，在世界经济联系扩大、相互依赖加深、全球问题突出的条件下，世界各国好比山坡上结队登山的运动员，谁也离不开谁。戈尔巴乔夫认识到世界是统一的，但他没有认识到资本主义国家不会轻易地接受苏联加入与它们竞争的行列，他对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对美国抱有过分的幻想。

第四，在国家关系问题上，戈尔巴乔夫强调国家关系的非意识形态化。他认为，由于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当前的世界已经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多样性的统一体，人类面临着生存和发展的共同问题，因此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决不能把意识形态分歧搬进国际关系的领域，让对外政策服从这些分歧，因为意识形态可能是完全对立的，而生存、防止战争的利益才是共同的和最高的”。<sup>②</sup> 国家关系的非意识形态化是国际关系正常化的条件，国家关系不同于阶级与政党之间的关系，不能以意识形态定亲疏，这也是几十年来社会主义国家确定对外政策的主要教训。

与20世纪40年代相比，意识形态在20世纪80年代的作用与影响下降了，特别是苏联模式的吸引力下降了。二战结束后，许多国家走上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人们相信苏联式社会主义能够避免资本主义的种种社会与政治弊病，让人民过上好日子，但苏联东欧几十年的实践并没有证实这一点，西方的体制与生活方式越来越得到东欧国家人民的认同，苏联已经失去了意识形态对抗的优势。在这一背景下，为了提高苏联的国际威信，戈尔巴乔夫只能另辟蹊径。1988年戈尔巴乔夫在联合国大会提出“实现国家关系的非意识形态化”，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很大反响。

但是，国家关系的非意识形态化并不意味着意识形态在国家交往中不起作用，意识形态利益也是国家利益的一个方面，戈尔巴乔夫完全否定意识形态利益，对资本主义毫不设防，也是片面的，并不能真正维护苏联的国家利益。

第五，在价值观方面，放弃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承认全人类价

①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著，岑鼎山等译：《改革与新思维》，第116、117页。

②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著，岑鼎山等译：《改革与新思维》，第123页。

值优先于民族、阶级等价值。苏联不再以阶级斗争的态度对待一切国际现象，不再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斗争看成是国际社会演进的动力，不再把和平共处看成是阶级斗争的特殊形式。和平共处原则不仅用于处理制度不同国家间的关系，也用于处理与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等于承认了曾被苏联控制的社会主义国家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解释说：“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在和平共处时期不存在什么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所谓的共处是建立在不侵犯他国领土、尊重他国主权及国家独立、不干涉内政等这样一些原则之上的。它不能等同于阶级斗争。两种对抗制度的斗争已不再决定当今时代的走向。现今，起决定作用的，是我们依靠先进科学、现代化设备和尖端技术来加快物质财富生产与合理分配的能力，以及我们开发和保护那些人类生存所必不可少的资源的能力。”<sup>①</sup> 戈尔巴乔夫等人在提出这一正确的新观点的同时，却在实际上低估了西方阵营意识形态、价值观的“攻击力”。正是苏联放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同时，美国开始大谈“推广民主自由价值观”和它的“国际主义”的。

1990年7月，在苏共二十八大上，戈尔巴乔夫在总结苏联国际活动时说，苏联对外政策有三个关键性的前提：“第一，不能靠牺牲别人的安全来保证自己的安全，不能靠损害别人的利益来捍卫自己的利益，不能自以为你更了解别的人民和国家应如何安排他们自己的事务。承认每个国家人民的选择自由是建设新世界秩序的基本前提。第二，不能单独地、在把自己社会发展的道路同别人的道路对立起来的情况下走向繁荣、自由和民主的社会。时代的要求就是共同发展、共同创造和合作。第三，之所以要把我们的国民经济纳入世界经济，不仅是为了使自己的经济现代化，而且是为了同其他人民一道为历史上的一个永久和平时期创造物质基础，是为了解决人类全球性的问题。”<sup>②</sup> 这些理论从总的方面看是适应历史发展趋势的，表明苏联放弃了与美国争霸世界的目标，促使战后持续了40年的“冷战”结束了，这无论对苏联自身，还是对世界都是有利的。

新思维外交的核心是“承认全人类价值观的优先地位，说得更确切些——承

---

① 《真理报》1988年7月26日。

②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资料汇编》，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页。

认人类的生存。”<sup>①</sup> 在核战争的威胁面前，提出“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并没有什么错，关键是不能用全人类的利益代替本国的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因为当今的世界并未实现大同，国际关系的主体仍然是民族国家。

### 对外政策新思维的影响

在新思维思想的指导下，苏联对外战略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苏联外交的目标开始转为致力于为苏联的改革创造有利的外部条件。苏联放弃了冷战政策，改善了与美国的关系，实现了中苏关系的正常化，不再干涉东欧事务，为东欧剧变和德国统一提供了方便的外部条件，加强与世界各国、各地区的经济联系。应该承认，戈尔巴乔夫的外交为苏联国内的改革创造了比较有利的外部环境，在消除国际紧张局势方面也起了积极作用。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上台之时，苏联处于内外交困的境地。由于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的外交过分重军事和政治，轻经济，使苏联的负担超过了国力的许可，恶化了苏联与各大国的关系，损害了苏联的国际形象。苏联四面树敌的政策，也使它恶化了与大国的关系，戈尔巴乔夫面临着巨大的国际压力，中国提出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条件是苏方消除“三大障碍”，美国利用自己的经济实力企图在军备竞赛中拖垮苏联，日本提出与苏联加强经济合作的前提是解决领土问题等等，戈尔巴乔夫别无选择，他要改善本国的国际环境，只能改变苏联外交的进攻战略，进行战略收缩：结束与美国的军备竞赛，退出阿富汗战争，与最大的邻国——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解决越南侵柬的问题等等。在重新对自身实力和国际环境进行重新认识的基础上，苏联的对外战略目标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苏联不再谋求充当世界的发号施令者，放弃与外部世界的对抗，放弃实力政策和争霸政策，使苏联成为国际社会一个正常成员。苏联的对外战略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戈尔巴乔夫明确要求外交要为国内经济建设服务。众所周知，苏联的内政常常是为实现对外战略的宏伟目标服务的，外交不计成本与代价，到处插手支持世界革命，而很少考虑国内经济的承受能力。戈尔巴乔夫开始改变这种做

---

<sup>①</sup>（苏）米·谢·戈尔巴乔夫著，岑鼎山等译：《改革与新思维》，第126页。

法，1986年5月23日，戈尔巴乔夫对苏联外交部工作人员发表讲话，阐述了外交的改革。他强调，外交应同国家利益密切配合，“外交应当有助于国家的内部发展。苏联外交的任务是保障和平，没有和平，一切就没有意义了。但是，苏联外交还要尽可能为加速苏联社会的社会经济发展创造最有利的外部条件”，<sup>①</sup>“在制定对外政策时，应当更清醒、更广泛地估价具体事实，不要光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观察一切。……不要把坚持某一立场的坚定性变成毫无意义的顽固，不要让人家把苏联代表叫做‘不先生’”。<sup>②</sup>

第二，放弃与美国争霸的目标，退出与美国的军备竞赛，改善苏美关系，结束了冷战。1985年7月戈尔巴乔夫用自己的志同道合者谢瓦尔德纳泽<sup>③</sup>代替了已担任28年外交部长、号称“不先生”的葛罗米柯。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当时思考的核心问题是：军备竞赛已经成了苏联经济沉重的负担，苏联经济是不是能够长期承受军备竞赛的负担？1983年美国总统里根提出“星球大战”计划，有人认为里根“对结束冷战最有贡献的两个战略决定是：北约组织在欧洲部署美国中程导弹，以及美国承诺投入战略防御计划（“星球大战”计划）”。<sup>④</sup>这种说法言过其实，改善与美国的关系，结束冷战是戈尔巴乔夫自己的政策选择。正如美国学者梅尔文·莱夫勒教授所说，“在冷战走向结束的历史进程中，如同冷战发生发展时的情形一样，领导人所起的作用依然是相当重要的。其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所起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如果没有戈尔巴乔夫，也许便不会有冷战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结束的历史大事变”，<sup>⑤</sup>“根据最新的档案资料，我可以肯定地说，美国的军事压力政策并不是导致冷战终结的关键性因素。20世纪70—80年代，美国的军事压力政策并没有对苏联造成真正的威胁。相形之下，更重要的是，当时整个核军备竞赛所形成的条

---

①（苏）谢瓦尔德纳泽等著，宋以敏选编：《苏联外交反思》，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2页。

②（苏）谢瓦尔德纳泽等著，宋以敏选编：《苏联外交反思》，第6页。

③ 1985年7月2日—1991年1月16日任苏联外长，此前是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72年起），曾从事过共青团和公安工作，从来没有过在外交部门工作的经验，也不懂外语。

④（美）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等译：《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718页。

⑤（美）梅尔文·莱夫勒：《冷战如何走向终结》，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冷战国际史研究》II，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110页。

件，改变了人们对于核武器的看法。换言之，当戈尔巴乔夫对苏联以核威慑力量为中心的大战略做出重大调整时，他并不是对美国的压力做出反应，而是顺应人们对核武器看法的变化而采取的行动。根据传统的看法，握有核武器，便能增加国家在国际外交中的实力地位。但是戈尔巴乔夫和他的顾问们则认为，在一个核武器已经过剩的世界里，核武器不再能起到压服对手的目的了”。<sup>①</sup>

在改善与美国的关系方面，苏联表现得更主动。据谢瓦尔德纳泽回忆，戈尔巴乔夫担任总书记后，曾两次召集苏联著名的核物理学家开会，戈尔巴乔夫提出的问题是：里根的计划是现实的还是幻想？第一次科学家们认为是不现实的，是愚蠢的计划，只是空话，目的是为了吓唬我们苏联。两个月后，在第二次会议上，这些科学家们说：我们不止一次地研究，起初得出的结论是：这是幻想，不能实现。但是，如果经济允许，虽然不是立即，但还是可能的。虽不能防御整个美国，但可以在一些地区，一些重要城市实现。苏联不能打穿美国的盾牌，美国可以打到克里姆林宫。后来再次召集包括经济学家在内的学者讨论这一问题，学者们指出：过一段时间，美国人能够建立起这样的防御体系，防御生死攸关的重要目标——大的工业中心、具有战略意义的城市等等。<sup>②</sup> 在这一背景下，“我和戈尔巴乔夫决定：应该不管用什么代价也要找到与美国人的共同语言。与他们达成协议！他们也曾说这种竞赛对他们也不利。我和我的外交部、中央委员会的同事们在几周内制定了与美国人接近的政策”。<sup>③</sup>

由于美苏长期尖锐的对抗，苏联新领导人开始与美国人打交道很艰难，里根在与谢瓦尔德纳泽会面时，看着谢瓦尔德纳泽，然后说：“我知道，你是邪恶帝国的代表，但是我不得不跟您谈话，讨论全球问题。”他想我会立即站起来走，但我微笑着对他说：总统先生，这是您的成见，过一段时间，您会相信，我们不是什么邪恶帝国。您会与戈尔巴乔夫会面，然后会去苏联，但是，他回答，这只是神话，任何时候都不会发生。<sup>④</sup> 戈尔巴乔夫意识到了军备竞赛对苏联经济畸形发展的影响，把结束军备竞赛作为上任后的第一要务。“当戈尔巴乔夫控制了权

---

① (美) 梅尔文·莱夫勒：《冷战如何走向终结》，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冷战国际史研究》Ⅱ，第111页。

②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12. 2006. С. 143—144.

③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12. 2006. С. 144.

④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12. 2006. С. 144.

柄和克里姆林宫的所有按钮时，苏联以其不堪重负的经济，已经既无法保持自己第二军事超级大国的地位，也无法保持最后一个世界帝国的头衔了。照彼得拉科夫院士的看法，‘我们之所以输掉第三次世界大战，恰恰是因为我们开始认真地进行备战，将国民经济总产值的75%—80%都用于军工企业和供养自己在东欧和第三世界的国外客户。’正因如此，要求苏联摆脱军事竞赛的重负、要求摆脱与美国战略瓜分世界这一不可避免之事的新政治思维，决不是身居‘苏联号’原子破冰船操纵台的那个天真外省人、业余政治家浪漫主义幻想的成果，而是完全清醒的、可惜并不令人宽慰的计算的结果”。<sup>①</sup> 1985年11月与美国总统里根在日内瓦举行会晤，成为美苏关系改善的“破冰之旅”。

1985年11月19日，戈尔巴乔夫与里根首次会晤在日内瓦举行，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中提到与里根的争吵，但尽量把这次会晤描写得缓和些。据谢瓦尔德纳泽说：戈尔巴乔夫与里根单独谈了2个小时，当他们从房间走出来时，看到他们的脸都是红红的，看来他们不仅相互争论，还相互抨击。戈尔巴乔夫要求立即回别墅，并要订飞机立即飞回莫斯科，当谢瓦尔德纳泽提醒他6时还有第二次会晤时，他说：“没有，飞回莫斯科！跟这样的人，与他这样的领导人没办法打交道。”<sup>②</sup> 在妻子和同事们的劝说下，戈尔巴乔夫才没有中途退场。里根要解决保护人权的问题，在处理地区性冲突方面的相互信任，而后才谈到裁减军备；戈尔巴乔夫的目的是不停地推动裁减军备。双方虽然没有达成协议，但苏美两国首脑会晤本身对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有积极意义，日内瓦举行会晤，开始了新一轮缓和进程。

此后，苏美关系取得了很大进展，1987年12月8日苏美领导人在华盛顿签署了《苏美关于消除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简称《中导条约》，英文缩写INF），1988年6月1日，苏美两国互换条约批准书，该条约正式生效。这是战后美苏裁军谈判历史上达成的第一个真正减少核武器数量的条约，并彻底销毁了一个类别的核武器。该条约减轻了欧洲面临的核压力，有利于欧洲与世界的和平，实际上也有利于苏联的和平。1989年12月苏美首脑在马耳他会晤，确认两

---

<sup>①</sup>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著，述弢译：《戈尔巴乔夫之谜》，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246页。

<sup>②</sup>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12. 2006. С. 146.

国关系中的对抗时期结束，不再视对方为敌人；苏方重申新的政治思维是尊重每个国家人民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作出自由选择，实际上表明苏联不再干涉东欧国家的内政。为响应苏联的裁军建议，美国宣布削减在亚太地区驻军的15%，撤销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销毁在欧洲的战术核武器等。此次会晤被一些人认为标志着冷战的结束。1991年7月31日，苏美首脑终于在莫斯科签署了《美苏关于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简称《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英文缩写STARTI），为长达9年的苏美削减战略核武器谈判画上了句号。根据这一条约，苏美两国射程在4800公里以上的远程核导弹及弹头：苏联从现有的11000枚减少到7000多枚；美国从12000多枚削减到10500枚。这一条约的签署，标志着苏美两国开始实际削减战略核武器。苏美这两个有资格发动世界大战的国家能够坐下来削减他们的核武器库，自然有利于人类避免核灾难。

第三，放弃把东欧作为势力范围的做法，给东欧人民以选择的自由。东欧一直是苏联与西方进行冷战的前沿阵地，维护东欧这个势力范围一直是战后苏联外交的重点。在努力改善与美国紧张关系的同时，戈尔巴乔夫的东欧战略也在悄然发生变化。1985年11月，在戈尔巴乔夫与华约组织和经互会国家领导人会晤时，戈尔巴乔夫传达的信息是他要放弃“勃列日涅夫主义”和把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强加于人的做法，每个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要对本国所发生的事情负责。1986年5月23日，戈尔巴乔夫对苏联外交部工作人员发表讲话，虽然仍说“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应居于优先地位”。但他又强调：“为了保证同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新质量，重要的是要克服我们某些外交人员头脑中存在的偏见、骄傲自满和因循守旧的作风。不要认为我们可以教导所有的人。谁也没有给我们这种权利。相反，作为社会主义大家庭内最强大的国家，我们应当谦虚。”<sup>①</sup> 戈尔巴乔夫放弃了勃列日涅夫主义，从东欧撤出了军队，不再干涉东欧国家的内政，东欧人民获得了选择的自由。在东欧发生剧变，原共产党工人党失去政权之际，戈尔巴乔夫没有进行干涉。戈尔巴乔夫的政策促成了德国统一和冷战在欧洲的结束。

第四，重新调整对第三世界的政策。苏联长期以支持第三世界的革命为名干涉这些国家的内政，对此，曾担任苏联总理的雷日科夫说：“我还记得激动的安德罗波夫曾气愤地说：‘我们将大家紧紧抓在周围干什么？只要人家高喊一声：

---

<sup>①</sup>（苏）谢瓦尔德纳泽等著，宋以敏选编：《苏联外交反思》，第3页。

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就会飞也似的跑过去。这样毫无选择地乱跑为什么？也许应该等一等、想一想、看一看：是我们比别人更需要？还是我们比别人更富有？”<sup>①</sup> 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提出“现在已经到了该全面研究我们对‘第三世界’承担的经济义务的时候了”。<sup>②</sup> 在处理与第三世界的关系问题上，苏联也改变以往与美国对抗的政策而采取合作和共同参与的态度。

1986年7月28日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讲话中，在谈到阿富汗战争时，戈尔巴乔夫说：苏联愿意把在阿富汗的军队撤回国，“到1986年年底，将有六个团——一个坦克团、两个摩托化步兵团和三个高射炮团——连同它们编制内的技术装备和武器从阿富汗回国”。但他又警告说：“那些鼓励和资助对阿富汗进行不宣而战的战争，而且还从自己境内进行这种战争的人应当明白：如果继续对阿富汗民主共和国进行干涉，苏联是不会置邻国于灾难而不顾的。我们对阿富汗人民的国际主义声援以及苏联的安全利益，都将把这种情况绝对排除掉。”<sup>③</sup> 戈尔巴乔夫承认派军队到阿富汗是个错误，“1985年我们为阿富汗付出了70.6亿卢布，或者说每昼夜花720万卢布。1987年为50.4亿，每昼夜1470万”。<sup>④</sup> 1986年11月，苏共中央以纳吉布拉替换卡尔迈勒。11月13日，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我们在阿富汗已经打了6年了。如不改变态度，我们还得打20—30年。这给我们影响事态发展的能力罩上了阴影。”戈尔巴乔夫继续说：“一般来说，我们没有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我们为什么一方面承认我们的部队没能力控制形势，而另一方面又要无休止地打下去呢？在近期我们要结束这一过程。”<sup>⑤</sup> 1985年在阿富汗进行的战争耗资26亿卢布，即平均每昼夜720万卢布；1987年为54亿卢布，平均每昼夜消耗为1470万卢布。<sup>⑥</sup> 1988年4月14日，阿富汗纳吉布拉政府与巴基斯坦签订了由苏联、美国予以保证的，解决阿富汗问题

---

①（俄）尼古拉·雷日科夫著，高洪山、韩生民等译：《背叛的历史——苏联改革秘录》，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5页。

②（苏）谢瓦尔德纳泽等著，宋以敏选编：《苏联外交反思》，第5页。

③《真理报》1986年7月29日，《戈尔巴乔夫言论选集》第437页。

④（俄）尼古拉·雷日科夫著，高洪山、韩生民等译：《背叛的历史——苏联改革秘录》，第206页。

⑤“苏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阿富汗局势的会议记录。1986年11月13日”，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2卷，下册，第812、813页。

⑥（俄）尼·雷日科夫著，李永全等译：《大动荡的十年》，第245、246页。

日内瓦协议。苏联国防部长亚佐夫签署命令：1988年5月15日至1989年2月15日，撤回驻扎在阿富汗领土上的100300苏军。以1989年2月苏军全部撤出阿富汗为标志，苏联减少了对第三世界的干涉和卷入。

总之，戈尔巴乔夫提出的对外政策新思维，改变了苏联对世界的看法和与世界各国相处的方式，使苏联外交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其历史影响是深远的。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地重大项目《文明模式与俄罗斯外交》（项目批准号08JJDGJW260）的阶段性成果。]

## 70. 戈尔巴乔夫在中苏关系正常化中起了什么作用？

左凤荣

从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起，中苏两党两国关系从恶化发展到破裂，苏联成了中国安全的最大威胁，直接影响着中国国内的发展和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的进程，但是，中苏关系的紧张仍然是中国现代化建设面临的严峻挑战。苏联入侵阿富汗、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严重影响着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中苏从1982年10月开始两国关系正常化的磋商，但苏联在消除三大障碍问题上拒绝回应中方，双方谈判进展缓慢，直到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苏联开始调整对外战略与对外政策，才为中苏关系的改善带来了转机，中苏两党两国关系不仅实现了正常化，而且基本上解决了两国东段边界问题。在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中，戈尔巴乔夫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 戈尔巴乔夫对外战略的调整，推动了中苏关系的改善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成为苏联的最高领导人，他长期在党内担任重要职务，也曾多次访问过西方，深知苏联的社会主义面临着种种问题，必须进行改革。与西方世界对抗，支援民族解放运动，使苏联把大量财富浪费在国防上，苏联工业的75%以上都是直接或间接为军事和国防建设服务的，军备竞赛成为苏联经济的沉重负担。因此，调整对外战略与对外政策，就成了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先声。

苏联对外政策的调整始于1986年3月召开的苏共二十七大，这次代表大会不再把世界看成是两种制度进行不可调和斗争的舞台，而强调共同协作，解决全人类的任务，使文明社会能够生存和延续下去。1987年戈尔巴乔夫在西方出版《改革与新思维》一书，进一步发挥这一思想，全面阐述了“新的政治思维”。俄学者评论说：“这一转折的基础是努力看到世界发展的进程，而苏联国家在这一进程中的位置与作用应该是它事实上的样子，而不是在乌托邦的思想指导下想使它变成的样子。”<sup>①</sup> 戈尔巴乔夫对外战略思想的变化为中苏关系的改善创造了有利条件。

戈尔巴乔夫放弃了苏共长期坚持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观，放弃了“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认识到资本主义已经从上一次战争中吸取了教训，调整了相互间的矛盾，可以在非军事化的情况下发展。提出苏联战略的主要目标是“确保苏联人民能够在持久和平与自由的条件下劳动”，党在国际舞台上活动的主要方针是“反对核危险、反对军备竞赛、维护和巩固普遍和平”，“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对抗只能完全以和平竞赛与和平竞争的形式进行”。<sup>②</sup> 承认世界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整体。从世界是由多种类型的国家构成的这一角度出发，戈尔巴乔夫承认世界是多侧面、多色彩、多变化和充满矛盾的，强调尊重各个国家不同的利益，强调利益均衡。戈尔巴乔夫提出了新的安全观念，确立了合理、够用的防御原则。苏共不再把自己的安全建立在损害别国主权与利益的基础上，承认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自决权。戈尔巴乔夫否定了斯大林、勃列日涅夫等苏共领导人为了苏联的安全，强行把其他国家纳入自己势力范围的理论，认为“安全的唯一牢固基础，就是承认各个民族和国家的利益，承认它们在国际生活中一律平等。必须把自己的安全同国际社会各成员同样的安全结合起来……决不能靠牺牲别人的安全来求得自己的安全”。与这种新的安全观相联系，戈尔巴乔夫反对军备竞赛，宣布把军事战略建立在防御的基础上，并提出了合理、够用的原则。戈尔巴乔夫还强调国家关系的非意识形态化。与苏联长

---

<sup>①</sup> (俄)涅任斯基：《冷战年代苏联的对外政策理论基础》，(俄)《祖国历史》1995年第1期，第25页。

<sup>②</sup> 辛华编译：《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47页。

期强调在意识形态上不能与西方和平共处、坚持社会主义只有一种模式不同，戈尔巴乔夫提出，“苏联对外政策的方针是：寻求相互谅解，对话，把和平共处作为各国关系中的普遍准则确立下来”，<sup>①</sup>“决不能把意识形态分歧搬进国际关系的领域，让对外政策服从这些分歧，因为意识形态可能是完全对立的，而生存、防止战争的利益才是共同的和最高的”。<sup>②</sup>

戈尔巴乔夫改变了苏联（也包括俄国）对外政策的扩张主义传统，不再把扩大势力范围作为目标。他主动放弃了帝国政策，开始把对外扩张、盛气凌人的外交变成了把其他国家当成平等伙伴的外交，为苏联走向世界、与其他国家友好相处开辟了一条新路。戈尔巴乔夫开始纠正苏联以往在外交上的大党主义和扩张主义，为中苏关系的正常化和中苏关系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中苏关系从结盟走向敌对，其重要原因是苏联推行大党主义、大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唯我独尊。戈尔巴乔夫上任后，强调国家关系的非意识形态化，强调社会主义的多样性，有利于中苏关系的改善和发展。

### 戈尔巴乔夫为改善中苏关系采取了切实的行动

中苏两大邻国长期处于对立状态，是不正常的，对双方不利。在1969年珍宝岛冲突后苏联明显加强了对华军事力量，成立了新的军区，加强了太平洋舰队的力量，改善了边防部队的装备，开始修建贝加尔—阿穆尔铁路干线。与此同时，苏联还向蒙古增派了军队。中国方面为了对付苏联的威胁，也把许多精力放在发展国防力量上，影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中苏两国关系的正常化经历了复杂曲折的过程，早在1982年勃列日涅夫塔什干讲话后，邓小平就提出了改善中苏关系的三个条件：要求苏联主动解决“三大障碍”，即从中苏边境地区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撤军；从阿富汗撤军；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中苏双方就此问题从1982年10月5日开始副外长级磋商，但进展不大。1985年10月9日，邓小平同志在会见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时请他给戈尔巴乔夫带个口信：如果苏联同我们达成谅解，越南从柬埔寨撤军，我愿意

<sup>①</sup> 辛华编译：《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第433页。

<sup>②</sup>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著，岑鼎山等译：《改革与新思维》，第123页。

跟戈尔巴乔夫会见。我出访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了，但是如果同苏联能够达成这样一个谅解，我可以破一次例。<sup>①</sup> 实际上告诉苏联人，解决中苏关系正常化问题、消除“三大障碍”，首先应从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这件事做起。只要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都好解决。但直到1986年4月在莫斯科结束中苏第八轮政治磋商，双方仍没在“三大障碍”问题上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苏方反复重申改善两国关系的愿望，但对中方所提出的“三大障碍”，则尽力回避，拼命反驳。苏方的论点主要有三个：一是指责中方为磋商设置“先决条件”；二是提出中苏关系正常化，应当“不损害第三国利益”；三是宣称苏方“从不威胁中国”。苏方建议共同制定苏中关系基础文件，先就促进经贸、科技、文化等各个领域关系的改善和发展达成协议。<sup>②</sup>

中苏早日实现关系正常化是大势所趋，是两国的共同要求。在中苏长期对峙中苏联方面占有优势，因此，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主动权在苏联方面。戈尔巴乔夫作为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推动中苏关系的正常化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1986年7月28日，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远东城市海参崴发表长篇讲话，表示苏联愿在任何时间、任何级别上同中国领导人十分认真地讨论建立睦邻关系的“进一步措施”。他宣布，当年年底前从阿富汗撤出苏军六个团，苏联全部撤军则取决于外部干涉是否继续下去，并透露苏联正同蒙古研究撤出“相当数量”的苏军问题，还表示愿同中国讨论削减中苏边境地区的陆军。同时，他也谈到了柬埔寨问题，声称越柬问题的解决取决于中越关系正常化，是中越双方的事，苏联只能希望中越恢复对话，言归于好。值得注意的是，戈尔巴乔夫接受了中国在中苏边界谈判中所持的立场，同意按主航道中心线划分阿穆尔河（黑龙江）边界线走向，希望不久的将来，边界成为和平友好的边界。在“三大障碍”问题上，这次没有重弹“不设先决条件”、“不损害第三国利益”、“从不威胁中国”等，不再回避从阿富汗、蒙古和中苏边境地区撤军问题。他也谈到了柬埔寨问题，语气也比较平和，说现在是解决问题的有利时机。“1986年7月我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讲话中阐述了我们对于亚太地区国家关系的看法。这些观点的实质如下。远东、整个亚洲及其附近的海洋空间——我们是这里的常住居民和航海者——是我们的民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40页。

② 钱其琛著：《外交十记》，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1页。

族和国家的利益所在。这里将来如何发展，在各国关系中居于主导地位的进程如何——这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整个世界的命运。我说，我们主张在这个地区共同创建一种新的公正的关系。在这一讲话中关于中苏关系的话题占有重要地位，‘苏联准备在任何时候，任何层面上，以最认真严肃的态度，同中国方面讨论睦邻关系应该采取进一步措施的问题。我们希望，在不远的将来，把我们分开（而我则想说——把我们连结起来）的边界将变成和平和友谊的疆界。’”<sup>①</sup> 时任驻华大使的特罗扬诺夫斯基说：“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 1986 年 7 月 28 日在海参崴的讲话，成了同中国关系正常化道路上的重要时刻。”<sup>②</sup>

1986 年 8 月 13 日，吴学谦外长约见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费多托夫，作了如下表态：戈尔巴乔夫总书记 7 月 28 日海参崴讲话中对中国和就中苏关系所表述的意见，我们予以认真的评价和重视。中方注意到其中有些过去没有说过的话，对此我们表示欢迎。苏联方面清楚地知道中国方面关于消除“三大障碍”以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原则立场和具体主张，而戈尔巴乔夫这篇讲话与消除“三大障碍”距离尚远，特别是没有提到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问题，我们是不满意的。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公正合理地解决柬埔寨问题是中国方面最感关切的问题，也是去年邓小平同志通过齐奥塞斯库传话的核心。中方真诚地希望早日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希望苏方认真考虑中方的意见。对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宣布中苏东段边界以界江主航道中心线为界，中方表示欢迎。据此，中方认为，在适当时候恢复中苏边界谈判是适宜的。<sup>③</sup> 1986 年 9 月 2 日，邓小平同志在接受美国记者华莱士电视采访时，又一次谈到了中苏关系，强调指出让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问题是改善中苏关系的关键，“如果戈尔巴乔夫在消除中苏间三大障碍，特别是在促使越南停止侵略柬埔寨和从柬埔寨撤军问题上走出扎扎实实的一步，我本人愿意跟他见面”。<sup>④</sup>

戈尔巴乔夫在消除“三大障碍”方面作出了切实的努力，只是速度不够快。1988 年 2 月 8 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从当年 5 月 15 日起从阿富汗撤军，10 个月

---

① Горбачев М. С. Жизнь и реформы.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в 2 - х тт. Кн. 2. М., 1995. С. 433.

② (俄) 奥·特罗扬诺夫斯基：《跨越时空——苏联驻华大使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25 页。

③ 钱其琛著：《外交十记》，第 25 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167—168 页。

完成，结束阿富汗战争成为改善中苏关系的重要因素。根据同蒙古领导人达成的协议，苏联从1989年5月开始从这个国家撤回自己的军队。在最大的障碍——柬埔寨冲突问题上，双方进行了艰苦的谈判工作，直至中苏高层会晤，双方在这个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

改变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的政策，是中方的要求，也是苏联本身的需要。1987年4月，苏联副外长罗高寿遍访东南亚各国，表明苏联推动和谈的设想。在苏联立场改变的情况下，1987年5月26日，越南宣布开始从柬埔寨撤军，当年撤出5万人，越南同意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1988年6月，在莫斯科举行的中苏特使第12轮磋商中，着重讨论了柬埔寨问题。同年8月27日至9月1日，田曾佩与罗高寿两位副外长在北京就柬埔寨问题举行会晤，双方虽然有分歧，但也达成了许多共识。9月28日，中苏两国外长在第43届联大期间在纽约会晤时，苏方表示愿促进柬埔寨问题尽快解决。影响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都基本解决了。

1988年11月5日，戈尔巴乔夫在接见各国使节时，对中国临时代办李凤林先生格外亲热，谈话时间超过了3分钟，他意味深长地表示：看来两国关系已经到了上一个更高台阶的时候了。<sup>①</sup> 1988年12月1日至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钱其琛，应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的邀请，对苏联进行正式访问。这是自1957年之后，30多年来中国外长第一次正式访问苏联，主要任务是为中苏首脑会晤作准备。12月2日，戈尔巴乔夫接见了钱其琛外长，请他转告中国领导人，就说我们主张两国关系正常化，正常化的条件现在已经具备。我们坦率地向钱其琛部长介绍了我们国内的情况和我们在对外政策方面的新的态度。<sup>②</sup> “戈尔巴乔夫主动表示，对过去发生的事情苏联也有过错。在谈及中苏高级会晤时，他主动提出，考虑到各种情况，他准备到北京去。我向他转达了中国领导人欢迎他于1989年访华的邀请，并表示，对于两国关系，中方主张着眼于未来，不纠缠历史的旧账，向前看，探讨建立新的关系。”<sup>③</sup> 这次访问被钱其琛称为“破冰之

---

① 外交部《当代中国使节外交生涯》编委会：《当代中国使节外交生涯》第四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311页。

② Горбачев М. С. Жизнь и реформы.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в 2 - х тт. Кн. 2 . М. , 1995. С. 433.

③ 钱其琛：《外交十记》，第24页。

旅”。在访问期间，中苏两国外长指派的工作小组经过反复磋商，双方就柬埔寨问题以《共同记录》方式达成内部谅解。其核心内容是：中苏双方主张尽早公正合理地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双方希望越南军队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例如在1989年下半年，最迟在1989年底之前，从柬埔寨全部撤出；中苏双方表示愿意作出自己的贡献，以促使上述目标的实现。<sup>①</sup>

1989年2月谢瓦尔德纳泽外长访华，此时已经明确，戈尔巴乔夫将于1989年5月中旬访华，谢瓦尔德纳泽同李鹏总理、钱其琛外长举行了会谈，又去上海会见邓小平。会谈气氛很好，邓小平强调，现在已经到了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时候了，应该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但在最后出现了一些不愉快。据钱其琛回忆，苏方本来同意发表关于柬埔寨问题的联合声明，但在2月3日深夜又变卦了，中方表示鉴于双方分歧较大，同意暂不发表关于柬埔寨问题的联合声明，也先不公布已经商定的5月中旬举行高级会晤的日期。<sup>②</sup>苏联驻华大使则认为“中国对手是故意在柬埔寨问题上以极端强硬的立场进行谈判，企图从我们身上榨取出只有在最高级会晤前的终点冲刺时才能弄到的全部信息”。<sup>③</sup>2月4日在记者招待会上，谢瓦尔德纳泽宣布苏联领导人将在5月中旬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田曾佩副外长在记者招待会上则说：“杨尚昆主席向戈尔巴乔夫主席发出了邀请。苏方接受了邀请。访问的具体时间有待商定，中国方面准备研究苏方的建议，并同苏方进行协商，找到一个对双方都适合的时间。”<sup>④</sup>经过双方工作组的继续谈判，很快达成了协议。

1989年2月6日，中苏双方同时发表了关于柬埔寨问题的联合声明和戈尔巴乔夫的访华日期。在《关于柬埔寨问题的联合声明》中，双方达成了九点共识，中苏双方致力于柬埔寨问题的政治解决，希望越南能够在1989年9月底前完成撤军，在外国军队从柬埔寨撤出后，在这个国家不出现危险局势和发生内战，中苏双方认为，建立有效的国际监督机制，对越南撤军、外国停止军事援助、维持柬埔寨和平以及进行自由选举实行严格的国际监督是必要的和重要的。但双方的

① 钱其琛：《外交十记》，第25页。

② 钱其琛：《外交十记》，第34页。

③ （俄）奥·特罗扬诺夫斯基：《跨越时空——苏联驻华大使回忆录》，第332页。

④ 《人民日报》1989年2月5日。

分歧仍然存在，“中国方面主张建立以西哈努克亲王为首的有四方代表参加的柬埔寨临时联合政府”，“苏联方面将支持柬埔寨四方就建立西哈努克主持下的有四方代表参加的临时机构达成一致，该机构不从属于柬埔寨任何一方，其任务是实施柬埔寨各方达成的各项协议和举行自由选举”，“双方同意就解决柬埔寨问题的某些方面尚存的分歧继续进行讨论”。<sup>①</sup> 柬埔寨问题确实比较复杂，后来事态的发展证明，这一问题不是由中苏双方所能完全决定的。

## 戈尔巴乔夫访华，实现两国两党关系正常化

戈尔巴乔夫在推动中苏关系正常化这一问题上，功不可没。1989年5月14日戈尔巴乔夫起程飞往北京。在会见邓小平前，戈尔巴乔夫对身边的陪同人员说：“我们的举止应该像年轻的活动家去拜访老一辈活动家那样。这在东方会产生好印象。”<sup>②</sup> 中苏最高领导人的会晤，标志着中苏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完成。

1989年5月16日上午10时整，戈尔巴乔夫来到等候在人民大会堂的邓小平跟前，中苏两位最高领导人的手握在了一起。在与戈尔巴乔夫的会谈开始后，邓小平一开始就表示，中国人民真诚地希望中苏关系能够得到改善，他建议利用这个机会宣布两国关系从此实现正常化。戈尔巴乔夫在回忆与邓小平会见时记述到：邓小平一开始就问我记不记得3年前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转交的他的一封信。当时他建议说，如果能够消除“三个障碍”，为了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他愿意和我见面。邓小平对戈尔巴乔夫说：我从您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讲话中看出在苏美关系方面有可能出现转机，从对抗走向对话有了明显的可能。世界紧张局势出现了“降温”的可能。这是符合全体人类的愿望的。中国人民面对的问题是：中苏关系能不能改善？出于这种考虑，我才转给您那封信。3年后我们终于见面了。戈尔巴乔夫回应说：您提出了‘三个障碍’，所以需要3年时间，即一年消除一个障碍。邓小平表示：现在我们可以正式宣布中苏关系已经正常化了（这时我们互相握了握手）。今天您将和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会谈。这意味着我们两党的关系也正常化了。戈尔巴乔夫说：我想，我们可以互相祝贺我们两国关

---

① 《人民日报》1989年2月6日。

② （俄）奥·特罗扬诺夫斯基：《跨越时空——苏联驻华大使回忆录》，第330页。



1989年5月16日，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与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晤。新华社记者王新庆摄（新华社稿）

系正常化了。我赞同您对世界形势的看法。苏美关系，苏中关系，大国与大国之间的关系，加上整个国际形势都走上了新的轨道。在研究当代的关键问题和世界社会主义问题的时候，我和您发现我们有许多相吻合的地方，所以我们才能够开始相互接近。<sup>①</sup>

在谈及中苏关系破裂和20世纪60年代的中苏论战时，邓小平说自己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经过20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sup>②</sup>“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sup>③</sup>对于这场大论战的是非，中国政府从未作出过正式表态，在会见中，邓小平代表中方首次作出了这样的评价。对于邓小平的这些看法，戈尔巴乔夫表示：“我不想说什么。同意您的评价，也赞成您的想法，但是30年并没有白

---

<sup>①</sup> Горбачёв М. С. Реформы и жизнь.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в 2 - х тт. Кн. 2 . М., 1995. С. 435—436.

<sup>②</sup>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1页。

<sup>③</sup>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4页。

过——我们弄明白了许多问题。而且没有因此降低我们对社会主义理想的信心，相反，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上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sup>①</sup> 在会见中，邓小平专门谈发展马克思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两大问题。他指出：“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sup>②</sup> 他强调必须用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墨守成规的观点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sup>③</sup> 表明邓小平期盼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能不断发展，“十月革命”这面旗帜能在十月革命故乡的上空继续飘扬下去。邓小平特别强调：“我们这次会见的目的是八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结束一下过去，就可以不谈过去了，重点放在开辟未来的事情上。但是，过去的事情完全不讲恐怕也不好，总得有个交代。”<sup>④</sup> 对于中方的看法，“不要求回答，也不要辩论，可以各讲各的。”邓小平“列举了给中国带来最大损害的列强的名字，首先是英国和葡萄牙，因为他们最早霸占中国的领土，强租澳门。他讲了许多日本、沙俄给中国带来的损害，他们从中国得利最大，还讲到了苏联。同时他指出，直到十月革命前俄国在中国东北都有势力范围，哈尔滨是它的中心。我的交谈者认为，俄国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占中国的领土超过150万平方公里。而且延续到十月革命后，1929年，苏联从中国占去了哈巴罗夫斯克附近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交汇处的岛屿（即黑瞎子岛——译者注）”，<sup>⑤</sup> 邓小平认为中苏关系“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sup>⑥</sup> 邓小平强调，“历史账讲了，这些问题就一风吹”，重点在于未来，中苏关系正常化以后，要“多做实事，少说空话”。<sup>⑦</sup>

这次持续了两个半小时的中苏最高领导人的会谈，标志着中苏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完成。5月16日晚，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与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会见，标志着两党关系实现正常化。中苏结束了对抗，双边关系步入正常化

① Горбачёв М. С. Реформы и жизнь.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в 2 - х тт. Кн. 2 . М. , 1995. С. 436.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1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2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2页。

⑤ Горбачёв М. С. Реформы и жизнь.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в 2 - х тт. Кн. 2 . М. , 1995. С. 438.

⑥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5页。

⑦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5页。

轨道，使得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事业，有了稳定和平的北方边界，也使苏联有了稳定的南部边界。

在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苏联因素是主要的，正如钱其琛所写的：“作为历史人物，戈尔巴乔夫的功过，自有后人去评说，但他的北京之行所完成的重大历史使命，在中苏关系史上，应当被浓墨重彩地记上一笔。”<sup>①</sup> 但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中国对外政策的调整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正如时任驻华大使的特罗扬诺夫斯基所说：“从1986年到1989年这段时间里，主动权一直在莫斯科一边。但是可以相信，到80年代中期，特别是由于苏美紧张关系得到缓和，中国领导人开始认识到，中国的国际地位已不太有利。随着‘冷战’走向结束，所谓‘中国牌’已不再是国际舞台上的重要因素。”<sup>②</sup>

中苏关系正常化能够实现，还与两国的改革密不可分。随着改革的深入，社会主义观念发生了变化，中苏两党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少，在许多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如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看法、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对国家利益的定位等等。正如戈尔巴乔夫所说：“在我当上苏共中央总书记之后，我饶有兴趣地阅读了中共十三大的文件，文件确立了现代化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方针，通过了把中国建成现代化的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长期纲领。这些决定在很多方面和我们二十七大的思想是相呼应的。当我们还在寻找如何走出两国关系死胡同的途径时，我们的距离仿佛重新又拉近了。”<sup>③</sup> 1986年7月28日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讲话中，第一次公开肯定了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方针。

中苏关系正常化，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从50年代起就倡导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也应该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但在实践中，社会主义国家在处理相互关系时，并没有遵循这一原则，直到1989年中苏关系的正常化，如何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问题才最终解决。

第一，确立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应该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战后几十年国际关系的实践证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国与国之间行之有效的准则，既适用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也适用于社会制度相同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双

---

① 钱其琛：《外交十记》，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7页。

② （俄）奥·特罗扬诺夫斯基著：《跨越时空——苏联驻华大使回忆录》，第327页。

③ Горбачёв М. С. Реформы и жизнь.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в 2 - х тт. Кн. 2 . М. , 1995. С. 432.

方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将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普遍原则基础上发展相互关系。”<sup>①</sup> 戈尔巴乔夫说：过去的教训使我们“懂得了必须对彼此在政治和行动上的不一致表现谅解。很自然，苏联和中国对各种问题和现象都有自己的立场和态度。不应把这点看成是合作的绊脚石。努力寻找互相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同时相互尊重对方的观点和立场，这是唯一合理的态度”。<sup>②</sup> 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中苏关系经受住了历史风云的考验，意识形态的不同看法、改革的不同道路选择没有影响中苏关系的顺利发展，苏联解体后，中苏关系平稳地过渡到了中俄关系。

第二，确立了和平解决争端的原则。“中苏双方愿意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两国之间的一切争端，相互不以任何形式，包括不利用同对方接壤的第三国的领土、领水和领空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sup>③</sup>

第三，确立了加强边界信任，协商解决边界问题的原则。“双方同意采取措施将中苏两国边境地区的军事力量裁减到与两国正常睦邻关系相适应的最低水平，并为在边境地区加强信任、保持安宁作出努力。”“双方主张以有关目前中苏边界的条约为基础，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准则，本着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精神，公正合理地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中苏边界问题。”<sup>④</sup> 戈尔巴乔夫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根据苏美协议将在苏联东部要销毁436枚中短程导弹。1989年到1990年部署在这地区的苏军集群将要裁减20万人，其中在远东区的12万人。我可以通告，陆军要裁减12个师，空军要解散11个团，太平洋舰队要削减16只军舰。”<sup>⑤</sup> 中苏边界非军事化，把它变成一个和平友好的边界成为两国政治家和人民共同努力的目标。

第四，确立了促进国际关系的根本健康化的原则。双方宣布奉行和平政策，不谋求霸权，主张提高联合国的威望，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裁军、解决全球性问题以及地区冲突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提倡世界所有国家，不论大小和强

---

① 《人民日报》1989年5月19日。

② 《人民日报》1989年5月18日。

③ 《人民日报》1989年5月19日。

④ 《人民日报》1989年5月19日。

⑤ 《人民日报》1989年5月18日。

弱，都有权平等参与国际生活。双方认为迫切的是，在考虑各国人民利益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

## 边界问题谈判取得突破性进展

中苏边界问题是沙俄侵略中国遗留的问题。从1964年2月起，中苏两国就解决边界问题开始谈判。从1964年2月至7月和1969年10月至1978年6月中苏先后举行过边界谈判。然而，由于苏联一直站在当年沙俄蛮横的立场上，坚持中国的边界应当划在界江界河的我方沿岸一线，如果这样，江中的岛屿自然就划归了苏联，而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成了苏联的内河，中国自然不会同意。中方主张，按国际法准则及国际实践，应当以界江界河的主航道中心线为两国国界。双方在这一问题上矛盾异常尖锐，甚至于1969年在珍宝岛发生流血冲突。中苏边界谈判取得进展是从戈尔巴乔夫海参崴讲话以后开始的，戈尔巴乔夫接受了国际通行的规则，同意了以界江界河主航道中心线划界的做法，促使中苏边界谈判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1987年2月两国边界谈判在莫斯科重新开启，钱其琛出任中方代表团团长，苏方代表团团长是副外长罗高寿。这次谈判因为有了戈尔巴乔夫讲话做基础，谈判进行得比较顺利，在中苏举行高级会晤前，双方就东段边界走向大部分达成了原则协议。1991年5月，两国正式签署了《关于中苏国界东段协定》。1992年2月，中俄两国最高立法机构分别批准了两国东段边界协定。与此同时，中俄西段边界问题的谈判和勘界工作进展也比较顺利。

中苏（俄）是世界上两个边界线最长、最大的邻国，在新中国成立后，无论是两国的结盟，还是敌对，对于两个大国的关系来说，都不是正常的国家关系。直到1989年5月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把两国关系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确立了两国关系中应遵循的普遍性原则，才使两国关系建立在扎实的基础上，为中苏（俄）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中苏关系正常化的问题上，戈尔巴乔夫对苏联外交传统的改变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此，我们应该予以肯定。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地重大项目《文明模式与俄罗斯外交》（项目批准号08JJJGJW260）的阶段性成果。）〕

## 71. 戈尔巴乔夫在德国统一问题上的立场 是如何变化的？

左凤荣

德国问题不是孤立的，它属于东西方关系的一部分。冷战年代，先后出现的几次柏林危机，险些把世界拖入第三次世界大战。德国统一问题，既涉及苏联对东欧的政策，也涉及与联邦德国的关系，而德国是一个西欧大国，苏联在资金和技术上对它有很大需求。戈尔巴乔夫自己说，他把搞好与德国的关系看成是缓和与美国关系的突破口。戈尔巴乔夫缓和与联邦德国关系的结果，是认可了德国走向统一。对苏联民众来说，德国分裂和苏联在德国驻军是苏联打赢苏德战争的最好证明，也是苏联免遭德国威胁的主要保证，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德发生了很大变化，它彻底检讨了错误，已经不再走军国主义道路，苏联却一直过分宣传德国的侵略性。戈尔巴乔夫没有阻挠德国的统一，遭受国内很多人的攻击，人们指责他允许德国统一是苏联失去了 1945 年的胜利，是为了不存在的“欧洲大厦”而出卖了苏联的利益。戈尔巴乔夫对德国统一的政策成为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 从反对到认可德国统一

德国统一进程之快是出乎人们意料的，开始时各方都没有什么计划。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之初并没有考虑到德国会统一，在《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他反对说“德国问题”悬而未决，“东部领土”尚未确定，他认为，关于恢复“德国统

一”的声明根本不是什么“现实政治”。<sup>①</sup>当戈尔巴乔夫敦促昂纳克进行改革时，他想到的也还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能长期存在下去。“苏联在1988年就已经准备允许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享有完全的独立自主的国家主权，除去民主德国……与别人不同的是，在戈尔巴乔夫的眼里，民主德国更是苏联军队的一个组成部分，是苏联人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国家。”<sup>②</sup>1987年德国统一社会党和德国社民党准备搞一个关于共同安全和意识形态斗争的战略合作计划，受到苏共中央的批评。

关于戈尔巴乔夫何时明确同意德国统一，没有明确日期。在苏联改革初期，苏联的外交重点是美国，与德国的关系发展比较缓慢，直到1988年10月24日戈尔巴乔夫才与来莫斯科访问的联邦德国总理科尔举行首次会晤，他们达成了要把双边关系提高到新阶段的共识。1989年6月，戈尔巴乔夫访问西德，看到德国人已经从希特勒的失败中吸取了教训，他表示要在建立共同的欧洲大厦过程中解决许多问题，柏林墙的出现有特定的历史环境，当其存在的前提不再起作用时，柏林墙也会消失<sup>③</sup>。

1989年6月底，民主德国领导人收到苏联的通知，事先并没有与民主德国领导人商量，“苏联军队驻扎在德国的部队改名为苏联武装力量西部集团军。这个集团军的地位与1955年9月20日签订的苏联和民主德国友好条约，以及其他双边条约中所规定的一样，具有相同的权利与责任。这些权利与责任是战争和战后时期的状态相一致的，是由苏联、美国、英国和法国等国家共同制定的，是不可更改的”。<sup>④</sup>

1989年10月7日，在民主德国成立40周年之际，戈尔巴乔夫参加了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会议，戈尔巴乔夫从匈牙利和波兰的变化中得出结论，“如果党不能指导现实生活的话，那它就丧失了领导力。我们和你们要共同努力，支持国内的健康力量。虽然这不是一件很简单的工作”。他还介绍了苏联国内正在

---

①（苏）米·谢·戈尔巴乔夫著，岑鼎山等译：《改革与新思维》，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第177页。

②（德）埃贡·克伦茨著，孙劲松译：《89年的秋天》，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5年版，第23—24页。

③ Горбачев М. С. Как это было. М., 1999. С. 79.

④（德）埃贡·克伦茨著，孙劲松译：《89年的秋天》，第28页。

进行的改革，向德国同志发出呼吁提高生活水平，对子孙后代负责，他希望德国统一社会党1990年召开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能与“国家发展的变化”联系起来。他还表示苏联严守1975年10月7日签订的苏德合作与互助友好条约。<sup>①</sup> 戈尔巴乔夫回忆说：“在柏林我切身感受到了形势的紧张和对现存制度的不满，特别是我站在庆祝活动的主席台上，成千上万的柏林人和从其他城市赶来的人们从台前通过的时候。群众对改革显示的高涨热情和拥护以及对站在我身边的昂纳克所表现出的明显蔑视，都令我大为震惊……执政党德国统一社会党眼看着在土崩瓦解。大量的政治要求日益尖锐——从出境自由、言论自由、惩治当权派、解散其机关，到立即恢复德国统一。”<sup>②</sup>

对于昂纳克拒绝改革，民主德国有识之士也表示反对，“我当时清楚地意识到，没有彻底的民主化，没有精神方面的开放，不克服与西方世界老死不相往来的状况，不从根本上大大地推动和发展生产率，那么社会主义不久就要达到极限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领导集团却极端狂妄自大地置时代的这些特征于不顾，甚至还加以诽谤！当然人们可以并且必须就这种政策的做法进行争论，但是这丝毫不能改变这样一点：新思维的基本要求是改革与公开化，对这种基本要求，是别无选择的”。<sup>③</sup> 可以说，民主德国矛盾的积聚是昂纳克拒绝改革的结果。

1989年10月18日，昂纳克被解职，11月9日，柏林墙倒塌，在此之前一周，戈尔巴乔夫对来访的德国新领导人克伦茨说：“民主德国在它于联邦德国的关系中必须注意，不要被国家之间的关系改善所迷惑。没有必要去鼓励解决所谓的德国问题。德国的统一问题还没有被列入现实政策的日程表上。对此，苏联与它早期在反希特勒联盟时的同盟者们的看法是一致的。克伦茨同志，关于这一点，请你转告给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政治局同志们。”<sup>④</sup> 但是，民众情绪激烈，越来越多的人跑到西德，群众性的示威游行不断，向当局施加压力，德国统一成了不可避免之事。

美国担心戈尔巴乔夫会阻挠德国统一，“我们意识到合并东德会加剧苏联的

① (德) 埃贡·克伦茨著，孙劲松译：《89年的秋天》，第64—66页。

② Горбачев М. С. Как это было. М., 1999. С. 83—84.

③ (德) 克里斯塔·卢夫特著，朱章才译：《最后的华尔兹——德国统一的回顾与反思》，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页。

④ (德) 埃贡·克伦茨著，孙劲松译：《89年的秋天》，第174页。

政治问题，并诱发保守主义的反攻和危及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甚至波及他所掌握的权力。到目前为止，戈尔巴乔夫已经认可了东欧的变革，并压制了党内和军队中对东欧变革的抵触情绪。我们关心的是，他是否愿意或能否忍受失去他们最为重要的盟友——东德。我们估计，他直接的对立反应，会是竭尽全力地反对德国重新统一，以此来保卫苏联在东欧所剩无几的安全堡垒”。<sup>①</sup> 1989年12月在中央全会上，戈尔巴乔夫强硬地说：“我们毅然决然地强调，我们不能让民主德国受到欺负，它是我们的战略盟国和华沙条约成员。必须从战后形成的现实出发——存在两个主权的德意志国家、两个联合国会员国，背离这一点将会导致欧洲的不稳定。”但在戈尔巴乔夫的内心深处，他已经意识到德国统一不可避免。

1990年1月26日，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主持召开了一个小范围的会议，专门讨论德国问题，参加者有雷日科夫、谢瓦尔德纳泽、雅科夫列夫、阿赫罗梅耶夫、克留奇科夫、法林，他的重要顾问、苏共中央国际部的成员、德国问题专家费奥多罗夫，争论了4个小时。参加会议的人并未讨论同意或者反对德国统一，这已不是问题，“首先关心的是：将进程维持在和平的轨道上，保障自己的和所有将被其触及者的利益。为此首先需要让各战胜国参与，按照战争结局它们都对德国的命运担负着一定责任”。戈尔巴乔夫吩咐阿赫罗梅耶夫元帅，准备把军队从东德撤出。<sup>②</sup>

1990年1月30日，民主德国领导人莫德罗夫访问莫斯科，他向戈尔巴乔夫介绍了民主德国的危机情况，人民要求提高生活水平，而政府却力所不及，国内出现骚动，1月份有将近5万人出走，如果这一速度保持下去，到年底会有50万人出走，德国统一社会党已难以控制局面，他说：“从这一切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越来越多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公民已经不支持存在两个德国的思想。看来，这种想法已经无法坚持下去了。”<sup>③</sup> 莫德罗夫要求苏联减缓德国统一进程。

1990年2月9日，戈尔巴乔夫与来访的美国国务卿贝克进行会谈。贝克对戈尔巴乔夫声明，“绝对不会发生北约的管辖范围和军事存在向东扩展……我们认

---

<sup>①</sup> (美) 乔治·布什、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著，胡发贵等译：《重组的世界——1989—1991年世界重大事件的回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77页。

<sup>②</sup> Горбачев М. С. Как это было. М., 1999. С. 95.

<sup>③</sup> Горбачев М. С. Как это было. М., 1999. С. 96.

为，在2+4机制的框架内协商和讨论应该保证，德国的统一不会导致北约军事组织东扩”。<sup>①</sup> 同一天，联邦德国总理科尔访问莫斯科，2月10日，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与来访的联邦德国总理科尔举行会谈，讨论了统一后的德国是成为北约成员、还是中立，统一后的德国边界，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的关系等问题，戈尔巴乔夫明确表示：“在苏联、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之间就关于两个德国统一的问题没有分歧，这一问题应该由德国人民自己来解决，简单地说，主要出发点就是德国人自己应该做出自己的选择，他们应该知道这是我们的立场。”<sup>②</sup> 第二天的《真理报》宣布，戈尔巴乔夫与联邦德国总理已达成一致，只要德国人愿意，便可在民族自决的基础上实现国家统一。

对统一后德国的地位，苏联开始说根据联邦德国基本法第23条实现统一是危险之路，统一后的德国成为北约成员不符合苏联的利益。1990年3月18日，在民主德国大选中上台的德国同盟的竞选口号就是根据宪法第23条实现统一。1990年5月，苏共政治局授权参加在波恩召开的“2+4”会议的谢瓦尔德纳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同意统一后的德国成为北约的成员。但是，谢瓦尔德纳泽没有成功。戈尔巴乔夫后来承认：“1990年春天在所有公开讲话和与外国活动家们会谈时，我都坚持一个观点：统一后的德国留在北约是令人不能接受的。我曾指望其他欧洲国家能支持我的立场。然而除了莫德罗夫政府同意我的意见之外，我未能得到任何人的支持，甚至包括波兰在内的华沙条约成员国也是如此。”<sup>③</sup> 既然德国是一个完全的主权国家，它有权决定参加还是不参加某一集团。

促使戈尔巴乔夫立场变化的一个重要事件是1990年5月18日美国国务卿贝克对莫斯科的访问。双方商定，统一后的德国将大规模削减武装力量，在3—5年的过渡期内苏联军队将留驻原民主德国地区，而西方军队不会进入原民主德国地区和东柏林。德国永远拒绝拥有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北约开始从以军事为主向政治性组织发展。北约建议缔结北约与华约间互不侵犯条约。<sup>④</sup> 这一会谈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戈尔巴乔夫的疑虑。同年5月31日，戈尔巴乔夫在

① Горбачев М. С. Как это было. М., 1999. С. 101.

② Горбачев М. С. Как это было. М., 1999. С. 107.

③ Горбачев М. С. Как это было. М., 1999. С. 119.

④ 转引自（俄）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2. 2000. С. 114.

华盛顿与布什会谈时，要求德国既加入北约，也加入华约，美国不同意，经过长时间的争论，最后戈尔巴乔夫建议：“就是说，我们就这样来表述吧：美国和苏联主张统一的德国在考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并做出最终的安排，自己决定，成为哪一个组织的成员。”布什建议用另一种说法：“美国始终主张统一的德国成为北约成员，但是，如果它做出另一种选择，我们将不提出异议，尊重这种选择。”戈尔巴乔夫表示接受布什的表达方式。<sup>①</sup> 1990年7月戈尔巴乔夫与来访的科尔举行会谈，同意了统一后的德国成为北约的成员。至此，戈尔巴乔夫完全认同了德国按照自己的方式实现统一。

### 戈尔巴乔夫认同德国统一的原因

毫无疑问，苏联是促进德国统一的重要因素，没有苏联的许可，德国统一之路将是艰难的，德国也不可能顺利成为北约的成员国，正如前美国驻苏大使在评论这一事件时所说，当时苏联对德国并不是无力反对的：“虽然冷战结束后苏联不再能够在海外运用武力或武力相威胁，但戈尔巴乔夫在德国统一的谈判中仍可扮演捣乱者的角色，从而提高他在国内的政治地位。虽然他不能但他也无须为统一唱赞歌。他在东德有37万军队，德国和北约其他国家都不能使用武力驱逐他们。统一后的德国要想保持稳定，至关重要的是苏联同意这种统一的安排，同意从东德撤出苏联军队。在德国和北约盟国看来，至关重要的是苏联取消其德国领土的所有特权要求，并承认德国有权自由选择其盟友。戈尔巴乔夫本来完全可以拒绝参与这种统一的安排。如果是这样的话，德国人会面临这样一种困境：他们或是成为北约成员国，或是统一，但不会同时得到二者——至少当时不会。总有一天，要求接受中立的舆论压力将会增长。”<sup>②</sup> 苏联并没有这么做。

苏联领导人之所以迅速改变立场，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苏联国内的困难使苏联急于取得德国的好感，从而获得经济援助。第二，苏联把与美国、欧洲的关系理想化，以为已与美国成了伙伴、欧洲已经开始向新的民主与集体安全的结

<sup>①</sup> Горбачев М. С. Как это было. М., 1999. С. 139.

<sup>②</sup> (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著，吴乃华等译：《苏联解体亲历记》(上)，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451页。

构过渡，并很快会变成现实，各国间的关系不是相互对抗，而是相互合作。华约解散、北约犹存，并向东扩展，是戈尔巴乔夫不曾料到的。更深层的原因在于戈尔巴乔夫想在欧洲创造一种政治上合作的气氛，以结束冷战和消除军备竞赛，他确信分裂的德国走向统一，是不可抗拒的。德国统一10周年之际，戈尔巴乔夫在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回答他为什么没有预见到民主德国制度崩溃并采取相应的措施，为什么不反对德国统一时，戈尔巴乔夫说：“对于我而言，挽救注定失败的昂纳克的制度意味着反对强大的人民的意志，这是第一；第二，与我自己作为一个国家首脑的活动的政治哲学的原则相矛盾；第三，干涉与我的道德不相容，因为这不得不允许向人民开枪，武力的干涉将导致大规模的流血。要知道1989年秋就有上百万德国人要求从分裂走向统一……第四，干涉将损害我的整个政策。干涉会破坏已开始出现在与西方、与美国关系中的信任，中断消除‘冷战’的进程，从而使对外经济和对外政策方针的决定性改革成为不可能。”<sup>①</sup>当时苏联的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说他最早产生德国统一不可避免的想法是在1986年，谢瓦尔德纳泽认为德国的剧变并不出乎意料，苏联没有促进统一，是德国人民自己选择的结果。<sup>②</sup>戈尔巴乔夫认为，“东欧各国摆脱苏联的监护，使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居民得以发泄民族情感并在西德得到了相应的回应。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面临的国内及其周边地区的尖锐危机，我们不能用老办法解决。强硬路线的拥护者有用武力维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现在制度的想法。这种力量确实有：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驻扎着差不多50万的苏联军队。然而采取这样的行动无异于犯罪，既违反德国人和我们本国人的意愿，也违背整个国际社会的愿望。两边的德国人对恢复统一的激情是坚定不移的。这事实上是一场有基础的人民民主运动，而不是什么人的政治阴谋。历史加快了自身的进程，应当使之通过和平的方式来实现”。<sup>③</sup>

戈尔巴乔夫认同德国统一，还因为德国的统一并没有改变战后形成的边界，没有威胁到苏联的领土完整。1990年9月12日，在莫斯科召开的4+2外长会谈（苏、美、英、法和联邦德国、民主德国）达成协议，最终签署《彻底调整对德

① 转引自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2. 2000. С. 112.

② Шеварднадзе Э. Мой выбор в защиту демократии и свободы. М., 1991. С. 244 - 245.

③ Горбачев М. С. Как это было. М., 1999. С. 171.

关系条约》，10月3日两德统一的条约生效，民主德国被并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分离了近半个世纪的德意志民族实现了统一，统一后的德国成为完全主权的国家。9月13日德国与苏联草签两国《关于睦邻、伙伴关系和合作条约》，11月9日在戈尔巴乔夫访问德国时正式签署。

《彻底调整对德关系条约》<sup>①</sup> 确定尊重战后边界，统一后的德国没有任何领土要求，今后也不会提出这样的要求；统一后的德国将奉行和平政策，“拒绝生产、拥有和使用核子、生物和化学武器”；统一后的德国保证在3—4年内将武装力量减至37万人，陆军和空军不超过34.5万人，苏军在1994年底前撤出，外国军队和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不能部署在原苏军驻扎地区。

由于自身面临着许多复杂的问题，苏联也无力阻止德国统一。当然，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苏联长期把控制东德看成是其胜利的一部分，在东德驻有50万军队，因此苏联有条件有能力为德国统一设置障碍，如果苏联这样做，无疑会影响它与西德、美国的关系。苏联开始坚持统一后的德国不能留在北约内，但美国和西德并不让步。在戈尔巴乔夫与布什马耳他会晤时，戈尔巴乔夫还想通过保留华约组织，阻止德国统一。柏林墙倒塌后，德国统一的步伐加快，必须尽快确定统一后的德国在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的未来。戈尔巴乔夫已看到，他不能阻止德国统一，出乎其对手的预料，同意德国作为统一的国家成为北约的成员，此举令苏联其他领导人和德国、美国的政界要员们吃惊。苏联此举主要是从经济利益出发的，他想借此换取德国的经济援助，因为当时苏联的经济在恶化，城市供应相当紧张。

苏联不是无条件地为两德统一提供方便，戈尔巴乔夫从联邦德国也得到了一些他想要的东西：为了解除苏联对其安全的担忧，统一后的德国虽然留在北约内，但其军队要裁掉一半（剩37万人），拒绝制造和拥有核武器、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并不扩散这些武器，在过渡期内苏军留驻民主德国，北约军队不向民德地区扩展，奥得—尼斯河为德波永久边界，承认了战后的边界变动。苏联从中还得到了不少经济实惠，西德在1990年2月向苏联无偿提供2.2亿马克的食品援助，同年6月向苏联提供50亿马克的优惠贷款，另外还提供10亿马克的农产

---

<sup>①</sup> 参见（苏）米·谢·戈尔巴乔夫著，王尊贤等译：《我与东西德统一》，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147—152页。

品。《关于某些过渡性措施的协定》规定，德国应为苏军驻留和撤出拨款 150 亿马克：120 亿无偿支付，30 亿为 5 年后偿还的无息贷款。同时也应看到，强大的德国不仅是苏联的对手，也是对美国霸权的一种制约，苏联放弃在世界范围内与美国争霸和支持德国统一有利于推动国际局势朝多极化发展。苏联解体后，俄德关系发展顺利，德国是对俄投资和援助最多的国家，这说明，德国对苏联没有妨碍其民族统一是感激的，并愿意给予回报。

可以说，没有阻碍德国统一是戈尔巴乔夫明智的选择，是顺势而为，因为决定德国统一进程的还是德意志民族。

第一，德国统一源起于东德的经济困难和柏林墙倒塌后的混乱局面。东德人民的生活水平低，而西德经济实力雄厚，人民的生活水平高于东德人许多倍，东德人向往西德也就不难理解了。在东欧其他国家发生剧变后，民主德国许多地区的居民走上街头，举行示威，反对德国统一社会党，要求改革。1989 年 10 月，戈尔巴乔夫为出席民主德国建国 40 周年庆典来到东柏林，人们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戈尔巴乔夫在讲话中说：如果行动迟缓，必将受到生活的惩罚。东德人看到苏联不会干预，便加大了对当局的压力，参加游行的人数在增加。10 月 18 日昂纳克下台，克伦茨取而代之，但他仍不能阻止大批民众逃往西德，也不能解决日益恶化的经济问题，已难以控制局势。1989 年 11 月 9 日，德国统一社会党迫于群众的压力，下令开放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民主德国和西柏林间的边境，柏林墙倒塌，大批人涌向西柏林，人们像过节一样庆祝这一天。当时的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人克伦茨描写自己当时的感受时说：“我几乎掩饰不住紧张不安的心情，在我们国家经历了所有这些不流血的革命的日日夜夜之后，现在决不能再出现对立！何况是在这一敏感的两个世界的分界线上。”<sup>①</sup> 1990 年 1 月，有 75000 名东德人移居西德。这种不可阻挡的移民潮冲垮了两德间的隔阂，苏共国际部负责人和苏联德国问题专家瓦伦丁·法林说：“我们一直希望德国统一是未来的一个问题，但现在很清楚，事已临头。”<sup>②</sup> 1990 年 3 月 18 日，民主德国大选，德国同盟

---

<sup>①</sup>（民德）埃贡·克伦茨著，沈隆光等译：《大墙倾倒之际——克伦茨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62 页。

<sup>②</sup> 转引自（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著，吴乃华等译：《苏联解体亲历记》（上），第 303 页。

获胜，原民德地区的共产党失去了执政地位，反映了民主德国民众要求与联邦德国合并的情绪，德国统一更是不可逆转，统一的步伐加快，5月18日两德在波恩签署《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关于建立货币、经济、社会联盟的条约》（统一条约），用法律与条约框架保障了德国统一的内部整合。

曾任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人的克伦茨说：“我们失败的起源要早得多，它在于我们不能赋予社会主义以民主的内容和民主的结构，这种存在的社会主义不能表明是令人信服的、真正有价值的取代资本主义社会逻辑的选择。”<sup>①</sup>德国的统一是冷战结束的重要标志性事件之一，“德国的统一，对于世界格局来讲，比东欧其他国家的急剧变化远为重要。仅有匈牙利、波兰等国的转向，恐怕还不足以导致全局性的变动。只有德国的变化，才从根本上促成了改变欧洲乃至世界的政治地图”。<sup>②</sup>

第二，东欧国家对德国问题的态度发生变化，促进了德国的统一。东欧剧变后，一些国家与联邦德国交好，拆了昂纳克的台。科尔在谈到德国统一时说：“1989年5月2日，匈牙利和奥地利两国开始在边境地区拆除障碍设施；同年的7月28日，匈牙利外交部长格乌拉·霍恩和他的奥地利同僚阿罗依斯·穆克在世人的注视下象征性地剪断了铁丝网。这两件事大大地推动了匈牙利的改革进程，正是这个改革进程的最终结果导致德国的统一。”<sup>③</sup>匈牙利不顾民主德国的抗议开放边界，引发了成千上万的东德居民越过匈牙利边境逃往西德，与此同时，还有大批民主德国居民聚集在德国驻捷克大使馆，要求出境；这对德国统一社会党是个沉重打击，促使德国迅速走向统一。

苏联在德国统一和欧洲安全方面的重大让步，是不是损害了苏联的安全利益，这个问题值得探讨。战后，苏联安全的基础是欧洲的分裂，是苏联对东欧的控制。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在欧洲安全中追求的目标是：在全球范围内的联合国、在欧洲应该是在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框架下的地区安全体系。戈尔巴乔夫把欧洲想象成一个“共同的欧洲之家”，大家都和平地住在一幢大楼里，但美国

---

①（民德）埃贡·克伦茨著，沈隆光等译：《大墙倾倒之际——克伦茨回忆录》第176页。

② 连玉如著：《新世界政治与德国外交政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50页。

③（德）迪阿曼、骆约特著，葛放译：《我要的是德国统一——科尔自述》，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6页。

没有对此做出直接的反映，而是坚持自己的政策目标。过去 40 年的安全与稳定是靠相互对立的两大军事集团组织的力量均势来保障的；应该建立欧洲安全的新体制，改变欧洲的政治气候，把两大军事集团的大方向从军事逐渐转向政治，并最终解散这两个组织。开始苏联坚持把德国统一问题与欧洲安全问题联系在一起，事实证明这是不现实的。戈尔巴乔夫认为德国的价值观已经发生了变化，一个民主的德国不是苏联安全的威胁，欧洲的机制能够保障德国不会再次成为欧洲安全的威胁。

新思维指导下的苏联对外政策，确实为德国问题的最终解决敞开了大门。德国统一是消除“冷战”政策的结果，德国统一，未必完全不符合苏联的利益，包括安全利益，能与地处欧洲腹地、经济发达的强国建立长期的伙伴关系，消除两国历史上造成的不信任，对两国都是重要的。

德国的统一为消除战后欧洲的分界线创造了有利条件，但真正从人们的思想意识中把这条分界线消除是不容易的，其过程也将是漫长的。

## 72. “8·19”事变的前因后果如何？

左凤荣

1991年发生的“8·19”事变对苏联解体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尽管当事人、史学家对“8·19”事变有不同的解释与看法，至今还有许多谜团没有解开，但在谈到这一事件的后果时，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这一事件加剧了苏联的解体。“8·19”事变是苏共党内危机的反映，事变的发动者企图恢复中央集权以挽救苏联，但仅仅三天就宣告失败。“8·19”事变的悲剧性在于，它以维护苏联为目的，却成了苏联加速瓦解的催化剂。

### 苏共党内分裂加剧，强硬派对戈尔巴乔夫不满

苏联共产党是苏联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的核心，苏共靠自上而下的各级党组织管理着国家。戈尔巴乔夫开始政治体制改革后，党内出现了不同的思想派别，“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危机不是米·戈尔巴乔夫引起来的，而是他揭露的，并试图解决它；在这场危机爆发以后，在上层建筑领域里开始了一场斗争。不是进化，而是‘社会主义的’党国旧机构和‘民主主义’新力量之间的斗争。”<sup>①</sup>从1988年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开始，苏共分成了大量独立的、代表不同集团利益的政治派别，从内部破坏了苏共的统一和完整，苏联社会精英阶层发生的分裂，破坏了政权的稳定。

---

<sup>①</sup>（俄）瓦·巴卡京著，非琴译：《摆脱克格勃——克格勃最后一任主席回忆录》，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218页。

苏共二十八大以后，苏联领导层发生了很大变化，利加乔夫、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离开了苏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一些强硬派新人出现在国家高级领导岗位上。来自乌克兰的弗拉基米尔·伊瓦什科被选为苏共中央副书记，来自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奥列格·舍宁成了政治局委员，苏共中央书记奥列格·巴克拉诺夫升为政治局委员，苏共中央新书记亚历山大·扎索霍夫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瓦季姆·巴卡京的内务部部长职务由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鲍里斯·普戈取代。以亚佐夫为代表的许多军人实际上反对戈尔巴乔夫的内外政策，据阿尔巴托夫的观察，“相当大一部分军方领导人反对最近几年的整个政策，他们知道，说出有关那个时候的政治领导人和有关斯大林的真相，将是对我们的极权主义制度的堡垒的又一次打击。二次大战常被用来为斯大林犯的罪行作辩护的主要借口。这种辩护是这样的：是啊，是有过镇压，有过对农民的剥夺，但是后来我们胜利了，并且拯救了欧洲。但是没有人给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可是我们付出了什么代价？那种灾难是不是不可避免的？我们难道有任何理由不应取得胜利吗？’”<sup>①</sup>

在局势混乱的情况下，苏联和苏共需要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人，而戈尔巴乔夫不是这样的人，用其对手叶利钦的话说：“自身的天性使戈尔巴乔夫富有外交手腕，善于妥协折中，精于玩弄从容不迫而又纷繁复杂的人事把戏，更能掌握奥妙的‘东方’式的统治法术，但戈尔巴乔夫被那些我们苏维埃国家机器的‘典型代表人物’包围起来，从而为他自己掘好了陷阱。戈尔巴乔夫赋予他们以巨大的权力，推动自己的班子急剧地改变方针。同时，自身的政治命运又让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与左派势力对话，与民主派进行政治妥协。”<sup>②</sup> 戈尔巴乔夫的顾问们建议他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专心当好总统，当时苏共中央已经不是政权机构，在莫斯科党的机构发挥不了任何作用，但州区等地方党委仍在起管理国家的作用，戈尔巴乔夫希望通过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来保持苏共的统一，防止苏共的联邦化和国家的解体，实际上他未能达到此目的。苏共党内很多人对戈

<sup>①</sup>（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212页。

<sup>②</sup>（俄）鲍里斯·叶利钦著，李垂发等译：《总统笔记》，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第20—21页。

尔巴乔夫不满，有意撤换他，但找不出能跟叶利钦对抗的有魅力的其他领导人，长期养尊处优的地位使苏共党内充斥着官僚，而缺少贴近民众的领袖。在1991年4月中央全会上，代表们激烈批评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用手敲着桌子，说要辞职，但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经过讨论发现，除了忍耐戈尔巴乔夫，别无他法，“中央委员中就找不出一个，哪怕只是临时担任中央委员会领导的人物，而且没有一个中央委员愿意担任这个领导……政治局恳请总书记收回辞职申请，继续履行先前的职责，戈尔巴乔夫答应了这个要求，原因也是‘为了党的最高利益’。”<sup>①</sup>

在这种情况下，党内不少有影响的人物要求戈尔巴乔夫履行其作为总书记和总统的职责，苏联最高苏维埃500名代表组成的“联盟”议员团发表声明：“如果在召开第四次苏联人代会前的30天内国内形势仍没有根本好转，那么人代会就应该解决关于总统本人的问题，对总统的信任将结束。”在1991年6月17日召开的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内阁总理帕夫洛夫宣称内阁不是总统的，表明总统和内阁间存在分歧，而且这一分歧还不仅限于一些小事，而是体现在摆脱危机的方式、方法中，他们必须就很多问题与总统协调立场，但总统却常常找不出时间来解决内阁经常遇到的问题。<sup>②</sup>国防部长亚佐夫在发言中说，苏联的强国地位开始动摇，军队状况堪忧；内务部长普戈称犯罪率在上升；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说，国内外都有人在策略反对苏联政治经济体制的阴谋，他提到必须在交通、能源、冶金、金融，以及国内的某些区域实行紧急状态，以保持社会稳定。<sup>③</sup>而戈尔巴乔夫在6月21日的会议上发言却宣称总统与政府间没有分歧，不必实行紧急状态，要保证经济的非军事化和向市场经济过渡。

1991年6月俄罗斯总统选举和市长的选举结果，表明苏共在人民中已经没有什么威信，加剧了苏共的危机。时任中央委员的麦德维杰夫说：“苏共好像不再是执政党，而苏共中央工作人员似乎觉得这样更好。无论大事还是小事，都能感觉到苏共新地位的征兆……不仅是著名的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而且几百万普通

---

<sup>①</sup>（俄）鲍里斯·叶利钦著，李垂发等译：《总统笔记》，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第20—21页。

<sup>②</sup>（俄）罗伊·麦德维杰夫著，王晓玉等译：《苏联的最后一年》，第54页。

<sup>③</sup>（俄）罗伊·麦德维杰夫著，王晓玉等译：《苏联的最后一年》，第55页。

党员也公开宣布退出苏共。仅从1990年1月到1991年6月，苏共党员人数就减少了400万，从1900万下降到1500万。”<sup>①</sup>军队对军工企业转产，军事战略思想的改变，裁减军备，从东欧撤军不满。

共产党已经分裂成多个派别，有以列宁格勒和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为中心的保守派，有极端程度不同的几个派别，也有民主派。雅科夫列夫、波波夫、谢瓦尔德纳泽、沙塔林、沃尔斯基、西拉耶夫等签署声明，主张成立民主改革运动，1991年7月2日，雅科夫列夫在《消息报》上发表《需要新步骤》一文，表示：“我向来主张多党制，而更准确地讲是主张理性的民主的两党制……这就是为什么我同意并支持以民主为导向的运动和政党的主张。”

1991年7月25—26日，在克里姆林宫召开苏共中央全会，这是最后一次苏共中央全会。主要议题是讨论新党纲草案和关于联盟条约草案。在这次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明确强调了社会主义与市场不仅相容，而且实质上是不可分开的，要建立混合的、多种成分的经济。对于苏共，他承认苏共内部已经形成了不同的派别，认为苏共要想取得胜利，只能要求自己成为一个有政治作为的党。戈尔巴乔夫在中央全会上受到攻击，许多人指责他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改革派还是占了上风，全会最终通过了《关于苏共纲领草案和各级党组织对草案进行讨论的任务的决定》，决定1991年11—12月召开苏共第二十九次代表大会，会上将通过新党纲。此后，戈尔巴乔夫从依靠党和国家的官僚们以及军事—肃反工作者集团，转而采取与各共和国领袖、苏共中的改良派、由谢瓦尔德纳泽、雅科夫列夫、波波夫领导的民主改革运动中的“新民主主义者”合作的态度。<sup>②</sup>

1991年7月末，雅科夫列夫提出辞呈，与戈尔巴乔夫分手。1991年8月15日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常委会作出了决定，认为雅科夫列夫有“违背苏共章程和分裂党的行动，认为他不宜继续留在苏共队伍里”。8月16日，雅科夫列夫给苏共中央机关党委的声明，认为这是对他的侮辱和迫害，“我想提醒社会，在党的领导核心里已形成了颇有势力的斯大林式的集团，它反对1985年的政治方针，阻碍我国的社会进步。实际上这是党的领导违背自己的宣言，正在摆脱党

<sup>①</sup>（俄）罗伊·麦德维杰夫著，王晓玉等译：《苏联的最后一年》，第61页。

<sup>②</sup>（俄）瓦·巴卡京著，非琴译：《摆脱克格勃——克格勃最后一任主席回忆录》，第41页。

内的民主派，为进行社会复仇、进行党内政变和国家政变做准备。在这种条件下，我认为再在苏共内部为民主改造事业服务已经是不可能的和不道德的了，因此我声明退出苏联共产党。我的良心要求我这么做”。<sup>①</sup> 同一天，雅科夫列夫还写了一封致苏联共产党员的公开信《论复仇主义的危险》，他认为党的领导采取了把民主派清除出党的方针，“现在的领导应该对摧毁党和使党从政治舞台上消失承担全部责任，我个人认为他们在政治上是目光短浅的”。他认为：“业已形成的最高权势机关不仅抗拒要求革新、自由和民主的任何运动，而且由于武断、非理性思维以及不能遵循正常道德和人权的通行标准，它本身已成了对社会的威胁，成了进步的障碍。不仅如此，这个机关企图唆使人民群众反对改革，反对提倡改革的人。”“最终，党没有实现民主重建，也没有与专制的过去决裂，更没有变成有作为的政治组织。”“6年的改革表明，苏共的组织结构和苏共领导的行动使苏共急剧滑向同社会、特别是同社会中的最爱国最积极最有作为的那部分人对抗的地步。”“需要有一个由建设性反对派组成的运动，这个运动不是集中力量去搞什么意识形态争吵，不是耍什么政客手腕来自我肯定，也不是为什么人的野心而斗个没完没了，而是捍卫健全的理性和合理的实用主义，争取通过能在今天和未来使人民和全国生活得到一些改善的决议和法律。”<sup>②</sup>

民主派采取了离开的办法与戈尔巴乔夫分手，强硬派则想把戈尔巴乔夫赶下台，“卢基扬诺夫本人后来证实，党内的‘健康力量’根本不打算按照戈尔巴乔夫的日历乖乖地在11月充当牺牲品，而是打算‘在9月举行的非常中央全会上提出罢免戈尔巴乔夫的总书记的职务问题。戈尔巴乔夫看来知道此事’。”<sup>③</sup> 为了解除戈尔巴乔夫苏共总书记和苏联总统的职务，苏共反对派和党的机关筹备在1991年9月召开非常的苏共代表大会和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戈尔巴乔夫向加盟共和国领袖寻求支持，许诺彻底地扩大他们的权限并加紧准备于1991年8月签订新的联盟条约。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等人达成了签署新联盟条约的协议，便于8

---

①（俄）亚·尼·雅科夫列夫著：《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与改革运动》第235—236页。

②（俄）亚·尼·雅科夫列夫著：《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与改革运动》第236—242页。

③（俄）安德烈·格拉乔夫著，述弢译：《戈尔巴乔夫之谜》，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310页。

月4日去克里米亚休假，准备8月19日返回，于8月20日签署新联盟条约，在休假前，就有许多人警告他可能发生政变，但他置之不理。抢在戈尔巴乔夫采取行动之前，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发动了著名的“8·19”事变。可以说，“8·19”事变并不是偶然的，它是苏共党内危机的反映，苏共党内潜在的冲突变成了公开的决战。

### “8·19”事变的策划

如何评价“8·19”事变？有人认为是一场政变，有人认为是挽救濒于解体的苏联的最后尝试。俄罗斯官方的说法则是“叛乱”。为什么要发动这一行动？至今仍说法不一。

“8·19”事变一年后俄罗斯总检察长B·斯捷潘科夫宣布的原因如下：1991年7月底，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纳扎尔巴耶夫在克里姆林宫秘密会晤，在这次会晤中达成协议，矛头指向苏联政治领导层的保守派核心。其中包括在8月20日签署联盟条约后，要解除苏联总理帕夫洛夫、国防部长亚佐夫、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的职务。克留奇科夫知道了会晤的内容，抢先发动了政变。<sup>①</sup>

当年的民主派认为，叛乱分子的目的是挽救行将崩溃的共产主义制度；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声明此举是为了拯救国家；戈尔巴乔夫则认为，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是想挽救自己岌岌可危的地位，“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声明说，促使他们采取行动的完全是一种爱国主义感情——这纯系骗人的鬼话。我不愿说他们对于国家的命运完全无动于衷。但是他们把国家和旧体制相提并论了，而他们行事的动机，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功名利禄，甚至一己私利，希望保住自己的职位”。<sup>②</sup>原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现国家杜马议员卢基扬诺夫在“8·19”事件10周年之际指出：“10年来，我的观点始终没有改变，即这是一场组织得糟糕的挽救苏联的尝试。”他否认这是一场阴谋政变，因为政变的目的是改变现存制度，而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尝试保存现存制度。卢基扬诺夫透露，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并不是“8·19”事件前夕成立的，它成立于1991年春天，成员是戈尔巴乔夫

① Известия. 13 августа. 1992.

②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著，述弢等译：《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下册，第1339页。

“钦定”的，当时已经备好了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公文纸和公章。换句话说，戈尔巴乔夫了解事件的原委，他被困之说与事实不符。卢基扬诺夫认为，戈尔巴乔夫的主要对手是叶利钦，他的策略是，如果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获得胜利，他将骑红色的马回到莫斯科，如果叶利钦获胜，他将骑白色的马回到莫斯科。戈尔巴乔夫的如意算盘是在任何结局下都能保留自己的总统地位。<sup>①</sup> 被认为是“8·19”事变主谋的克留奇科夫说，由于苏联不少地区民族冲突事件时有发生，他们曾不断提出在全国或部分地区实行紧急状态或实行总统治理的问题，“1990年间，由于南奥塞梯、波罗的海沿岸，尤其是立陶宛和拉脱维亚所发生的事件，在这方面曾一再作出指示。1991年，鉴于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摩尔达维亚发生的事件，苏联总统下达了许多类似的命令。在许多地区，因为动乱和罢工，形势白热化到极限。因此，这样的委托具有十分具体的性质：拟定有关决定、呼吁书的草案，提出有组织的紧急措施的提纲。”<sup>②</sup> 他认为，“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没有想出什么新办法，因为一切决定、行动和呼吁都是在1990—1991年间按照戈尔巴乔夫本人提出的任务研究拟定的”。<sup>③</sup> 在国家陷入混乱的情况下，确实需要秩序，戈尔巴乔夫也许有过这方面的考虑，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搞的解除戈尔巴乔夫职务而实行的紧急状态很难说是戈尔巴乔夫的方案。在当时国家局势严重的情况下，身体并没有多大问题的戈尔巴乔夫不应该放下工作去休假。“很多人都认为，当时的事情很多，国家局势非常严重，戈尔巴乔夫在这非常关键的一个星期去休假，是有意让身边这些战友放手大干一场。”<sup>④</sup> 戈尔巴乔夫不合时宜的休假为政变者提供了机会。

8月16日《莫斯科新闻》周报公布了《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条约》，引起了许多人的不满和担忧，克留奇科夫认为主要任务是整顿秩序而不是设计新的联盟条约，“新条约的设计只会搞垮苏联，是提不出任何积极的取代方案的。这一

---

① 李永全：《莫斯科咏叹调》，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33页。

② （俄）弗·亚·克留奇科夫著，何希泉等译：《个人档案（1941—1994）——苏联克格勃主席弗·亚·克留奇科夫狱中自述》，第424—425页。

③ （俄）弗·亚·克留奇科夫著，何希泉等译：《个人档案（1941—1994）——苏联克格勃主席弗·亚·克留奇科夫狱中自述》，第426页。

④ （俄）罗伊·麦德维杰夫著，王晓玉等译：《苏联的最后一年》，第82页。

条约一旦签署，苏联的灭亡即不可逆转。要拯救局势，需要新的途径”。<sup>①</sup> 4天后就要签署这个条约，不满者认为应该采取行动阻止。

8月17日下午，政变成员在位于列宁大街尽头的克格勃中心秘密开会，亚佐夫、巴克拉诺夫、舍宁、博尔金等人参加，亚纳耶夫没有参加，不知道，卢基扬诺夫、普戈也不知道。国防部副部长弗拉季斯拉夫·阿恰洛夫上将、瓦连京·瓦连尼科夫大将参加了会议。没有人作出马上采取行动的决断，但也不想无动于衷。聚集在一起的这些人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不同意戈尔巴乔夫的内政方针，据克留奇科夫回忆：“1991年夏天，一次在克里姆林宫开会，会议的休息时间，大家谈起了国家局势和改革。我问一些同志，他们一共是8人，如果我们早知道改革会带来这样的结果，我们还会开始改革吗？在场的德米特里·季莫费耶维奇·亚佐夫说：我们为什么需要改革？”<sup>②</sup> 最后决定向戈尔巴乔夫派特别代表团以说服其采取措施拯救国家，推迟新联盟条约的签署。

8月18日中午，戈尔巴乔夫同副总统亚纳耶夫通话，并告诉亚纳耶夫他抵达莫斯科的具体时间，亚纳耶夫答应要去机场迎接戈尔巴乔夫。午餐后，戈尔巴乔夫继续起草预定在新联盟条约签字仪式上发表的演说稿。下午4时30分，巴克拉诺夫、舍宁、博尔金和瓦连尼科夫飞到福罗斯与戈尔巴乔夫会面，同行的还有克格勃第九局局长普列汉诺夫和副局长格涅拉罗夫。此时，戈尔巴乔夫的对外联系被切断。

戈尔巴乔夫这样描写当时的场景：差10分5点卫士长通知他来了一群人要求见他，戈尔巴乔夫很吃惊，想确定这些人是谁派来的，但电话不通，他让家人做最坏的准备，然后与这些人见了面。这些人要求戈尔巴乔夫要么签署实行紧急状态的法令，要么把职权交给副总统，但戈尔巴乔夫没有答应他们的要求。戈尔巴乔夫说：“只有想自杀的人才会现在在我国实施紧急状态。我同此事毫无关系。”他警告他们说人民不会支持，建议召开最高苏维埃和人民代表大会，在那里解决一切问题。但这些人并不听他的，戈尔巴乔夫最后说：“那么就这样吧。

---

<sup>①</sup>（俄）弗·亚·克留奇科夫著，何希泉等译：《个人档案（1941—1994）——苏联克格勃主席弗·亚·克留奇科夫狱中自述》，第442—443页。

<sup>②</sup>（俄）弗·亚·克留奇科夫著，何希泉等译：《个人档案（1941—1994）——苏联克格勃主席弗·亚·克留奇科夫狱中自述》，第234—235页。

没有什么可以再谈的了。回去报告，我绝对反对你们的计划，你们将被击败。但是我为我们的人民和我们近年来所取得的東西而担忧。”<sup>①</sup>

博尔金的描写他见到的戈尔巴乔夫：“他一副病态，步履蹒跚，脸呈赤红色，这与其说是阳光晒的，不如说是血压高的缘故，他给人一种痛苦和不满的感觉。他迅速同大家握手问候，不看任何人，怒气冲冲地问：‘出什么事了？为什么不事先通报一下？电话怎么都不通了？’‘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有很多问题需要讨论。’‘什么问题？’”“‘我们来的目的是讨论国内局势问题。’舍宁说。‘你们代表什么人？以谁的名义讲话？’戈尔巴乔夫打断他的话。”他们以为能够得到戈尔巴乔夫准备在国内实行紧急状态的指示，但戈尔巴乔夫不配合，他们向他汇报国内的局势，说政府和最高苏维埃反对他们没参加讨论的新联盟条约，向他汇报了准备实行紧急状态以稳定经济，“他突然问道，紧急状态措施是否也适用于俄罗斯领导人的行为。当听到肯定的答复后，他感到完全放心了”。戈尔巴乔夫强调这些方案最好通过民主的方式实施，并要求向同志们转达他的意见，握手告别时，他又补充说：“好吧，就这样，你们干吧。”<sup>②</sup>他们认为，“戈尔巴乔夫只要确信实行紧急措施会取得初步的良好效果，他就将公开地，且以最积极的方式给予支持”。<sup>③</sup>在这里，博尔金说戈尔巴乔夫身体欠佳显然是谎言，几天后当戈尔巴乔夫从福罗斯回来时并没有丝毫的病容，“8·19”事件的组织者靠制造戈尔巴乔夫生病的谎言来接管权力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格拉乔夫描写道：“8月18日下午5时许，舍宁、巴克拉诺夫、瓦连尼科夫、博尔金和普列汉诺夫（戈尔巴乔夫当即将他拒之门外）组成的代表团来到福罗斯时，戈尔巴乔夫向他们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谁派你们来的？’从他的卫队长向他报告有客人从莫斯科来拜访他，到那些人出现在他的办公室这40分钟之内，他已经搞清：包括最高统帅战略通讯在内的所有电话，均悉数关掉。他把家人集合起来，并向他们发出警告：要准备应付事态的任何发展——从‘赫鲁晓夫

---

<sup>①</sup>（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著，岱奋译：《八月政变》，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12—17页。

<sup>②</sup>（俄）瓦·博尔金著，李永全等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9—11页。

<sup>③</sup>（俄）弗·亚·克留奇科夫著，何希泉等译：《个人档案（1941—1994）——苏联克格勃主席弗·亚·克留奇科夫狱中自述》，第535页。

模式’到更加悲剧性的结局。”<sup>①</sup>这些人要求戈尔巴乔夫要么签署关于在波罗的海三国、摩尔达维亚、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及乌克兰和俄罗斯联邦的‘个别州’实行‘总统治理’，换言之就是紧急状态的文件，要么他将自己的权力交给副总统亚纳耶夫并靠边站，让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替他把脏活干完。戈尔巴乔夫听了火冒三丈：“你们和派你们来的人都是冒险主义分子。你们要毁掉自己，那是你们自己的事。可你们要毁掉国家，毁掉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把这个话给派你们来的委员会捎去吧。”<sup>②</sup>“预谋的这次行动，目的言简意赅：阻止新的联盟条约的签署。”<sup>③</sup>他认为，克留奇科夫从春天开始就在筹划此事。

“8·19”事变的实际意图是阻止新联盟条约的签署，而签署新联盟条约是戈尔巴乔夫经过苦苦努力好不容易才达成的协议，此时他跟叶利钦站在同一战线上，因此，说戈尔巴乔夫默认之说并不成立，皮霍亚的结论应该更符合实际：“分析现有的资料使人确信，这一阴谋是违背戈尔巴乔夫的意愿的，尽管戈尔巴乔夫经常谈到可以实行紧急状态，他的这种说法对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图谋的最终成熟起到了‘营养高汤’的作用。戈尔巴乔夫拒绝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合作，但是并没有与他们发生直接冲突。让我们再来回忆一下当时的重要细节：戈尔巴乔夫的卫队始终忠实于他。8月21日，正是他的卫队威胁说要采用武力，拘留了飞到福罗斯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代表团成员，并且强迫他们必须接通与外界的通信联络。而戈尔巴乔夫却出尔反尔，力求逃避责任，把责任推到了直接执行者身上，所有这一切构成了八月政变的特有因素。”<sup>④</sup>从戈尔巴乔夫自己所描述的对政变者的谈话看，他的反对态度不够坚决。在紧急状态委员会开始行动后，戈尔巴乔夫于8月19日下午提交一份要求：立即恢复通讯联系，派一架飞机把他送回莫斯科。他让助手切尔尼亚耶夫帮助起草了一份声明：亚纳耶夫等人的行动是非法的，没有法律效力，要求紧急召开苏联最高苏维埃和人民代表大会，决定政府应该采取的措施，立即中止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活动。<sup>⑤</sup>

①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著，述弢译：《戈尔巴乔夫之谜》，第314页。

②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著，述弢译：《戈尔巴乔夫之谜》，第317页。

③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著，述弢译：《戈尔巴乔夫之谜》，第315页。

④ (俄)鲁·格·皮霍亚著，徐锦栋等译：《苏联政权史》，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729页。

⑤ (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著，岱奋译：《八月政变》，第19—20页。

8月18日晚7时巴克拉诺夫、舍宁、博尔金和瓦连尼科夫等人返回莫斯科，戈尔巴乔夫及其周围的人都被严格看管起来，实际上把戈尔巴乔夫软禁起来了。晚9时，政变者聚集到克里姆林宫帕夫洛夫总理的办公室开会，至8月19日凌晨3时左右才结束。参加会议的有：帕夫洛夫、克留奇科夫、亚纳耶夫、亚佐夫、卢基扬诺夫、舍宁、普戈、博尔金等。“多数人倾向于这种观点，既然戈尔巴乔夫不置可否，就应该按照既定方针办，对外宣布戈尔巴乔夫生病，由副总统亚纳耶夫签署实行紧急状态的法令。所有文件都已准备好，大家一致提议亚纳耶夫领导‘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sup>①</sup>大家推举亚纳耶夫担任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主席，成员有国防会议第一副主席巴克拉诺夫、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国防部长亚佐夫、总理帕夫洛夫、内务部长普戈、苏联农民联盟主席斯塔罗杜布采夫，苏联国营企业和工业、建筑、运输、邮电设施联合会会长季贾科夫等，一共8人，都是苏联掌握军政大权的领导人。

作为紧急状态委员会的第一把手，代行总统职权的副总统亚纳耶夫说：18日夜9—10点，他被叫到克里姆林宫，在政府大厦三层一间办公室里，坐着帕夫洛夫、亚佐夫、普戈、巴科拉诺夫、克留奇科夫等人，他们在此坐了快一天了。谈国家严峻的局势，应该采取措施，但通过什么道路克服危机，大家在争论。共同的想法是在基础部门和一些地区宣布紧急状态。亚纳耶夫表示：“没有戈尔巴乔夫的同意我不宣布在特定地区实行紧急状态。”他不知道戈尔巴乔夫已被软禁，被大家要求履行总统职责。他们说戈尔巴乔夫身体不好。他是被迫签署命令、声明和呼吁书。<sup>②</sup>苏联末任克格勃主席、当时任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的巴卡京在回忆录中证实了亚纳耶夫的说法：8月19日早晨他看到的亚纳耶夫神经极端紧张，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不停地吸烟，他对巴卡京说：“半夜四点钟把我从床上叫了起来，把我送到了这里，花了两个钟头说服我，我同意了，所有文件我都签了字。戈尔巴乔夫完全意志消沉了，什么也不明白，他已经不能控制自己。头天晚上他们在他那里。所以需要我来担负起管理国家的责任。这是正确的。”<sup>③</sup>

---

①（俄）罗伊·麦德维杰夫著，王晓玉等译：《苏联的最后一年》，第95页。

②《星火》杂志披露的亚纳耶夫1991年8月22日入狱后的笔录，《当代世界》2003年第3期，第36—37页。

③（俄）瓦·巴卡京著，非琴译：《摆脱克格勃——克格勃最后一任主席回忆录》，第2页。

8月19日上午11点左右，苏共中央书记处在舍宁的主持下召开非常全体会议，对成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及其有关决议表示追认，给各加盟共和国和地区党的领导机关发了密码电报，要求尽一切可能支持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活动，但具体应该做什么，事变的发动者并不清楚。

据当时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普里马科夫回忆，8月20日早晨8点，他去克里姆林宫上班，没有遭到任何阻拦。半小时后，他去找亚纳耶夫，“你怎么了，神志清醒吗？”亚纳耶夫不知所措，说：“如果我像4月份那样拒绝的话，那……”他用食指颇富感情地拍前额，“现在怎么办？”

“去电视台发表讲话，拒绝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

“热尼亚，请你相信，一切都安排好了。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一回来，我们就一起工作。”

“有点儿不可信。必须立即撤走莫斯科大街上的坦克。”

给人的印象是（实际上也是如此）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宣布为代总统，也就是国家第一号人物的亚纳耶夫，远非阴谋的“首席小提琴手”，他真诚地希望所发生的一切原来是一场噩梦。也许他当时喝酒正是为了让自己变得轻松些。<sup>①</sup>

政变的实际筹划者是克格勃（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克格勃在戈尔巴乔夫改革以后并未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它由30个总管理局、管理局和独立科组成，第一总管理局是情报局，主要向苏共中央国际部提供情报；第二总管理局实际上是反间谍局；第三总管理局负责军队中的反间谍工作；第四总管理局负责安全问题，并提供反间谍工作所需的交通工具；第六总管理局负责经济安全问题。还有保卫宪法制度管理局。第七管理总局负责户外监视，‘阿尔法’特别分队也属于这个局。第九局是保卫局，执行保卫国家最高官员的任务，还保卫苏共和国家机关的重要设施。边防军管理总局负责保卫苏联的陆海疆界，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政府通讯管理局负责国家领导进行专门的密码通讯的工作。业务管理局集中了苏联一流的专家。克格勃有大约48万名工作人员。克格勃实际上长期在没有法律根据的条件下行使其职权。8月事件后成立的调查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小组得出的结论是：“在实际上没有能于某种程度上控制其活动的法律基础的情况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长期工作导致它实质上成为一个高度集中的机构，可

<sup>①</sup> Евгений Примаков. Годы в большой политике. М., 1999. С. 98.

以对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进行检查，而且以最有效地保证国家安全为借口，在自己手中集中了庞大的政治和军事力量。既然苏联最高苏维埃没有制定出规范性的法令，没能保证对苏联克格勃进行监督，所以它也就没有履行宪法赋予它的责任。苏联检察机关也没能对安全机构的工作进行有效的检察。结果安全委员会成为一种有其自己特殊利益的独立政治力量，客观上变成凌驾于苏联及各加盟共和国最高机关之上、不受其管辖的、超国家的设置。”<sup>①</sup>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扬诺夫没有参加紧急状态委员会，但被认为是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思想家。卢基扬诺夫是戈尔巴乔夫的同学和多年好友，不仅与紧急状态委员会联系密切，而且对戈尔巴乔夫有很大影响，是他让戈尔巴乔夫疏远改革派而转向保守派。8月19日早6时，卢基扬诺夫在电台和电视上发表声明，他批评条约草案，强调不能签署这样的文件。<sup>②</sup>

## “8·19” 事变的发动与失败

8月19日凌晨4时，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开始工作。6时，苏联中央电视台和广播电台正式宣布了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的命令：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因健康原因已不能履行总统职责，根据苏联宪法127条，由副总统亚纳耶夫代行总统职务。事件发动者的行为显然是违反苏联宪法的。苏联宪法规定，苏联总统“为了确保苏联公民的安全，提出关于在个别地区宣布实行紧急状态的警告，而在必要情况下，根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或者相应的加盟共和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请求或者同意，宣布实行紧急状态。在缺少这种同意的情况下，宣布实行紧急状态并立即将所作出的决定提交苏联最高苏维埃批准。苏联最高苏维埃关于这个问题的决定要由不少于其成员总数2/3的多数通过”。代总统亚纳耶夫关于实行紧急状态的命令显然与此项条款不符。

大约6时30分，亚纳耶夫和总理帕夫洛夫、国防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巴克拉

---

<sup>①</sup> (俄)瓦·巴卡京著，非琴译：《摆脱克格勃——克格勃最后一任主席回忆录》，第37页。

<sup>②</sup> Лидия Андрусенко Двадцать ведущих политиков в августе 1991 года [www.ng.ru/ideas/2001-08-18](http://www.ng.ru/ideas/2001-08-18)

诺夫发表了《苏联领导声明》，宣布从莫斯科时间1991年8月19日4时起，在苏联某些地方实行为期6个月的紧急状态，同时宣布成立“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在此期间，国家全部权力移交给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行使。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由苏联代总统亚纳耶夫、苏联总理帕夫洛夫、苏联国防会议第一副主席巴克拉诺夫、苏联国防部长亚佐夫、苏联内务部长普戈、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苏联农民联盟主席斯塔罗杜布采夫、苏联国营企业和工业、建筑、运输、邮电设施联合会主席季贾科夫8人组成。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扬诺夫的名字虽然没有出现在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名单中，但他实际上站在他们一边。苏联陆军总司令瓦连尼科夫积极负责实施紧急状态，负责戈尔巴乔夫保卫工作的普列汉诺夫执行了软禁戈尔巴乔夫的命令，使他同外界的联系完全中断。几乎所有和戈尔巴乔夫一道并肩工作的高官都参加了政变。

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发表《告苏联人民书》，作为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立宣言和对此次事变的正式解释。《告苏联人民书》，指出：

同胞们！

在我们祖国和我国各族人民命运面临的严峻危急时刻，我们向你们发出呼吁，我们伟大的祖国面临致命的危险，由戈尔巴乔夫发起并开始的改革政策，原想作为保障国家迅速发展和使社会生活民主化的手段，却因种种原因进入了死胡同……

出现了极端主义势力，它们奉行消灭苏联、瓦解国家和不惜一切代价夺权的方针，它们利用赋予的自由，蹂躏刚刚出土的民主萌芽。赞成祖国统一的全民投票结果遭到了践踏。利用民族感情进行无耻的投机，只是为了掩盖他们的野心。无论是本国人民今天的灾难，还是明天的前途，都不能使那些政治冒险家动心……

应该由人民选择社会制度，但有人企图剥夺他们的这一权利。有些人手中握有权力，却不把权力用于关心每位公民和全社会的安全和幸福，而把它用来谋求与人民格格不入的利益。用作无原则的自我肯定的手段，滔滔不绝的话语、堆积如山的声明和许诺只能突出地证明所做的具体工作微乎其微。权力的膨胀比任何其他膨胀都更为可怕地破坏着我们国家和社会。每位公民都对明天越来越失去了信心，对自己的孩子的

未来感到深切担忧……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意识到破坏我们国家的危机的深度，它担负起了对祖国命运的责任，并决心采取最重大的措施使国家和社会尽快走出危机。<sup>①</sup>

中午 11 时，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发表第 1 号命令。这项包括 16 点内容的命令说，为了维护苏联各族人民的切身利益、国家的领土完整、恢复法制和克服危机，各级政权机关和管理机关必须无条件实施紧急状态，无力确保实施紧急状态的机关将被停止活动，而由紧急状态委员会任命的专门全权代表负责；立即解散违反苏联宪法和苏联法律的权力与管理机构，以及军事化组织；权力机关和管理机关颁布的违反苏联宪法和法令的决定一律无效；停止阻碍局势正常化的政党、社会团体的活动；公民和团体非法拥有的武器必须立即交出；禁止集会、游行、示威和罢工等，必要时可实行宵禁；坚决与影子经济作斗争，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不善经营和经济领域内的其他违法行为，坚定地采取刑事措施和行政手段。命令还要求苏联内阁采取措施保障居民食品和消费品的供应等。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宣布他们的目的是：为了民主化进程，为了政治改革，把国家建立在新的基础上，促进经济和社会的繁荣，在世界上占有重要地位。宣布要在一周内公布经济纲领，降低物价，提高工资、退休金、助学金、补助金等。发展多种成分的经济，支持私人企业，发展生产和服务业。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并没有号召保卫社会主义，没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这样的形容词，而主要是唤起人们的爱国主义情感，团结所有苏联公民，而不管他们的政治偏好。但是，民众从中看到的是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复活，是已经获得的政治自由的丧失。

本来按计划，应该先逮捕叶利钦，但是由于他们忙于去同戈尔巴乔夫谈判、举行会议和喝酒，使计划拖了下来，政变者还寄希望于议会批准亚纳耶夫代行总统职权，使政变合法化。在政变开始的第一个上午，莫斯科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人们照常在大街上行走。政变者对自己的行动没有信心，帕夫洛夫因喝酒过多，犯了心脏病，被送进了医院。只有亚佐夫和克留奇科夫在支撑着局面，上午

<sup>①</sup> Хрестоматия по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истории (1946—1995). М., 1996. С. 355 – 356.

11时，克留奇科夫从克格勃总部给亚佐夫打来电话焦急地说：“我谁也找不到，帕夫洛夫、亚纳耶夫、巴克拉诺夫，他们都到哪去了？后来我的副官告诉我说，他们全都到亚纳耶夫那里喝酒去了。”亚佐夫告诉克留奇科夫，帕夫洛夫住进了克里姆林宫医院。亚佐夫这时明显地意识到，他们的行动成功的希望渺茫，叶利钦并没有被逮捕。

8月19日早晨，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别墅睡梦中的叶利钦被女儿叫起，被告知发生了政变。但别墅的电视可以照常收看，电话可以接听，紧急状态委员会并没有对叶利钦采取行动。俄罗斯联邦的领导人：哈斯布拉托夫、沙赫赖、波尔托拉宁、布尔布利斯、西拉耶夫等半小时后都来到了这里。总统叶利钦立即组织大家对政变进行反击，大家一起起草了《俄罗斯领导人告俄罗斯公民书》，并用传真机发出去。叶利钦没料到事情做得如此容易，他在谈到此事时说：“克留奇科夫没有预料到这一点。由于近两三年商业的迅速发展，在我们国家里新的通信手段大量涌现。在我女儿刚印完告俄罗斯公民书后一个小时，莫斯科和其他城市的人们就读到了这个文件。外国通讯社、专业和业余计算机网、几家类似《莫斯科回声》的独立无线电台、交易所及许多主要刊物的通信网也都转发了这一文件，还出现了数以万计的复印件。”<sup>①</sup>

本来克留奇科夫派出“阿尔法”小组到阿尔汉格尔斯克别墅去逮捕叶利钦，但“逮捕叶利钦的命令之所以没有执行，是由于分队的领导意见不一致。‘阿尔法’的一个副队长卡尔普欣将军坚持要逮捕叶利钦。另外两个队长反对。20日，通过多种通讯渠道又把‘阿尔法’全体人员召集起来，但是他们弄清情况以后，拒绝参加任何行动”。<sup>②</sup>克留奇科夫说没有过逮捕叶利钦的计划，派“阿尔法”小组去阿尔汉格尔斯克别墅区是为了保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代表同俄罗斯总统会晤的安全。<sup>③</sup>叶利钦于上午9时半离开了别墅，当挂着俄罗斯国旗的叶利钦的车队离开别墅开往白宫时，隐藏在路旁的特种部队“阿尔法”小组“按兵不

<sup>①</sup>（俄）鲍里斯·叶利钦著，李垂发等译：《总统笔记》，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第66页。

<sup>②</sup>（俄）瓦·巴卡京著，非琴译：《摆脱克格勃——克格勃最后一任主席回忆录》，第11页。

<sup>③</sup>（俄）弗·亚·克留奇科夫著，何希泉等译：《个人档案（1941—1994）——苏联克格勃主席弗·亚·克留奇科夫狱中自述》，第554页。

动，战士们默默地注视着疾驶而过的车队。他们事后说，当时只有特种部队小队长卡尔普欣通过无线电声嘶力竭地命令拦截车队。”<sup>①</sup>

在国防部，格拉乔夫、沙波什尼科夫等国防部的要员明显支持叶利钦。叶利钦从容地从别墅回到了俄罗斯议会所在地——“白宫”。11时46分，叶利钦在“白宫”举行记者招待会，宣读了俄罗斯领导人《告俄罗斯公民书》，声明政变不合法，这是一场右派的、反动的、反宪法的政变。他呼吁俄罗斯公民对叛乱分子给予应有的回击，要求国家走上正常的合法的发展道路，必须保证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有机会对全国人民讲话，要求紧急召开苏联非常人民代表大会。他还呼吁军人们表现出高度的公民责任感，不参与反动政变，并呼吁在俄罗斯全境内进行无限期的总罢工。

在叶利钦的感召下，群众走上街头。中午12时许，莫斯科跑马场上，有人举行集会，开始只有上千人，人越聚越多，集会者宣读了叶利钦的《告俄罗斯公民书》。直到此时，在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命令下，军队开到莫斯科，一队装甲车从大剧院方向开往跑马场广场。12时30分，示威者在民族饭店前用两辆无轨电车封锁了特维尔大街。市中心的所有桥梁上都停着坦克，军队开始在莫斯科市内大规模调动。

尽管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主要矛头是针对叶利钦的，但亚纳耶夫等人试图借助宪法的权威，使紧急状态委员会行动合法，迟迟没有对叶利钦和俄罗斯联邦其他领导人采取措施。“白宫”的通信照常，叶利钦与西方领导人保持着联系，争取军方的支持，并做好了组织流亡政府的准备，成立了以鲁茨科伊为首的防卫司令部，组织保卫白宫。

俄罗斯领导人发起宣传战，被禁止的激进派的报纸改用号外、传单的形式在莫斯科广为散发，其中心内容是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身体健康，让大家注意戈尔巴乔夫被解职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让人们认识到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不合法性。

民众站在路上阻挡坦克前进，表现出不惜以生命为代价保护俄罗斯的政权。“成千上万的莫斯科人响应俄罗斯领导的号召，往俄罗斯议会大厦走去，以捍卫

---

<sup>①</sup>（俄）科尔扎柯夫著，杨藻镜等译：《我所知道的叶利钦：俄总统安全局前局长回忆录》，外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68页。

民主，保卫自由。‘白宫’周围筑起了街垒。”<sup>①</sup> 如果发生武力对抗，会造成流血，这是紧急状态委员会也不愿看到的。被派来包围“白宫”的塔曼师坦克连和图拉空降师倒戈，转到了叶利钦一边，其余部分保持中立，加里宁大街桥头和“白宫”周围的坦克炮口不是对着“白宫”，而是枪口朝外。叶利钦得到了空降部队司令员格拉乔夫的支持，增强了叶利钦的信心。格拉乔夫派列别德将军率领图拉的空降兵来保卫白宫，叶利钦允许他把一连空降兵派驻大楼周围。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如果坚持用强力手段解决问题，会导致流血，甚至发生灾难性的内战。

8月19日中午1时，叶利钦走出俄罗斯议会大厦，在人们的欢呼声中登上封锁俄罗斯议会大厦的塔曼师110号坦克，他的几名助手也随其登上坦克。叶利钦发表了演讲，呼吁莫斯科人和俄罗斯全体公民进行反击。叶利钦向人们发表讲话，宣读《告俄罗斯公民书》，他还签署了一系列命令，宣布“凡以所谓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名义颁布的命令都是非法的，它们在俄罗斯联邦境内一律无效”。苏联在俄罗斯联邦内的所有权力机关，其中包括克格勃、内务部、国防部都转归他领导，他宣布自己对俄罗斯联邦境内的苏联军队有全权指挥权。叶利钦等俄罗斯联邦的领导向卢基扬诺夫递交备忘录，要求他公布戈尔巴乔夫健康状况及其所在地的真相，立即召开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对紧急状态做出法律评价，取缔非法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命令。

8月19日下午5时许，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扬诺夫宣布定于8月26日在莫斯科召开苏联最高苏维埃非常会议，会议将批准在苏联个别地区实行紧急状态的决定。紧接着，亚纳耶夫颁布命令，宣布从8月19日起在莫斯科实行紧急状态，任命莫斯科军区司令加里宁上将为莫斯科市卫戍司令，授权他颁布严格规定维持紧急状态必须执行的命令。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发布第2号决定，决定暂时限制中央、莫斯科市和州的社会出版物，只允许下列报纸出版：《劳动报》、《工人论坛报》、《消息报》、《真理报》、《红星报》、《苏维埃俄罗斯报》、《莫斯科真理报》、《列宁旗帜报》、《农村生活报》。

在下午5时46分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政变者表现得并不坚定，亚纳耶夫

---

<sup>①</sup>（俄）瓦·巴卡京著，非琴译：《摆脱克格勃——克格勃最后一任主席回忆录》，第3页。

的手在发抖，他在谈到戈尔巴乔夫时说，戈尔巴乔夫“处于十分安全的状态中，没有受到任何威胁”，“现在正在克里米亚休息和治疗”，希望“戈尔巴乔夫康复后履行自己的职责”。“我的朋友戈尔巴乔夫总统将会归队，我们还将在一起工作。”他们没有拿到证明戈尔巴乔夫病重的医生证明，而只是说戈尔巴乔夫健康状况不佳。在记者招待会上，记者们的问题使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陷入死胡同，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合法性不足。帕夫洛夫病倒了，克留奇科夫没有参加记者招待会。紧急状态委员会确实没有可信服的领袖。“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任何一个领导人从来没有赢得大众的信任，他们中的某些人，我们以前根本就不认识。”<sup>①</sup>

20日，紧急状态委员会除了继续宣传其声明等文件外，没有什么切实的行动，这天允许出版的报刊除了刊登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声明和命令外，还刊登了卢基扬诺夫对新联盟条约草案的声明，但落款日期是8月16日<sup>②</sup>。卢基扬诺夫的声明称：“条约的许多条款是违反苏联宪法的，需要做很大的更动；它会引起劳动公民的疑问。还说匆忙签订条约会使他深感不安。”<sup>③</sup>这一声明在政治和法律上支持了紧急状态委员会，但卢基扬诺夫与紧急状态委员会保持着距离。

叶利钦在莫斯科进行了有效的抵抗。8月20日早白宫周围聚集了不下5万人，有些人构筑了堡垒，要誓死保卫之。用武力攻占俄罗斯领导人的办公地点无疑会造成大量伤亡，没有人想那么做。格拉乔夫一直与叶利钦保持联系，空军司令沙波什尼科夫公开声明不用武力反对人民。巴卡京在俄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尼古拉·斯托利亚罗夫的要求下，与国防部长亚佐夫进行联系，劝说军队不要冲击议会大厦，并得到了亚佐夫的保证。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副总统鲁茨科伊、议会代主席哈斯布拉托夫、政府总理西拉耶夫联名致信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扬诺夫，并要求：在收到信的24小时内会见戈尔巴乔夫；在三天内对戈尔巴乔夫进行有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参加的医疗检查，并将检查结果公布于众；取消对俄罗斯所有舆论工具活动的限制；在俄罗斯联邦8月21日召开最高苏维埃非例行会

①（俄）罗伊·麦德维杰夫著，王晓玉等译：《苏联的最后一年》，第112页。

② 格拉乔夫认为是卢基扬诺夫改动了日期，以便让人觉得与政变无关。见（俄）安德烈·格拉乔夫著：《戈尔巴乔夫之谜》，第322—323页。

③（俄）鲍里斯·叶利钦著，李垂发等译：《总统笔记》，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第74页。

议期间停止在俄联邦境内实行紧急状态；将军队撤回原驻地；确保俄罗斯总统不受阻碍地行使职权；停止对俄罗斯领导的威胁，确保他们不受侵犯和自由出入；解散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撤销其所有命令和决定。卢基扬诺夫与哈斯布拉托夫、鲁茨科伊、西拉耶夫会见，当得知俄罗斯领导人不会放弃抵抗后表示，争取说服政变者将部署在白宫附近的军队撤走。<sup>①</sup>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扬诺夫承认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为合法，苏共中央积极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向共和国和区委、州委发布指示：采取措施让党员参加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动。

政变者还过高估计了中央对共和国的权力，只有中亚的共和国和阿塞拜疆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尽管他们没有正式承认。格鲁吉亚总统加姆萨胡尔季阿事实上承认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波罗的海国家、哈萨克斯坦和摩尔多瓦则坚决反对。8月20日，各加盟共和国的形势也发生了不利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变化。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发表正式声明：“宣布紧急状态只能以宪法和法律为基础”，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在没有苏联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的参加下制定出公开违法的文件”。他希望听到戈尔巴乔夫本人的意见，建议立即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讨论政治形势，在10天内召开苏联非常人民代表大会。乌兹别克宣布没有必要在其境内实行紧急状态。摩尔多瓦总统斯涅古尔发布命令宣布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决定和命令在该共和国境内不具有法律效力。摩尔多瓦总理穆拉夫斯基发布命令，禁止在该共和国发行《劳动报》、《工人论坛报》、《真理报》、《消息报》、《红星报》、《苏维埃俄罗斯报》、《农村生活报》、《莫斯科真理报》。格鲁吉亚总统加姆萨胡尔季阿发表呼吁书，要求西方国家支持苏联的民主、多党制以及人民选出的议会和总统。立陶宛最高苏维埃主席兰茨贝基斯则抨击紧急状态委员会实行军事独裁，号召立陶宛人“为保卫共和国而战”。

西方国家对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动坚决抑制。美国总统布什发表声明，反对通过政变手段搞掉戈尔巴乔夫的苏联领导人并要求他们恢复戈尔巴乔夫的权力，宣布暂停美国对苏联的援助；加拿大宣布冻结西方三国财长会议上达成的2亿美元的对苏援助；日本宣布冻结对苏联的援助计划；世界银行宣布取消向苏联提供技术援助而设立的3000万美元基金的建议；欧共体12国宣布中止对苏

---

<sup>①</sup>（俄）罗伊·麦德维杰夫著，王晓玉等译：《苏联的最后一年》，第116页。

联的经济技术援助。

20日中午，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作出攻占白宫，拘捕监禁叶利钦的决定，但没有人执行这个决定，他们也不知道如何执行这个决定，接到命令的格拉乔夫没有向部队下达命令，而是告诉了俄罗斯领导人，并表示即使接到了进攻白宫的命令，他也不会动手；负责攻占白宫准备工作的是卡尔普欣领导的阿尔法小组，他们很清楚，可以攻占白宫，但以后怎么办？于是他们决定不执行这个命令。实际上，当时无论是克留奇科夫，还是亚佐夫都没有向军队下达无条件进攻白宫的命令，当时只是命令做准备。亚纳耶夫也反对使用武力，担心造成人员伤亡。据当时在莫斯科的中国记者记述8月20日的情景：“大街上的路人依然行色匆匆，与平时并没有什么两样。莫斯科河边有不少人在悠闲地垂钓。‘白宫’前面则是另一番情景。广场上聚集着近万人，人们身份不同，观点各异，正自发地围成一个个小堆，互相争论着，交换着看法。”<sup>①</sup>

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很紧张，叶利钦的卫士们害怕紧急状态委员会发起对白宫的进攻，在20日深夜听到枪声后，想把叶利钦带到离白宫只有200米的美国大使馆，但被叶利钦拒绝了。<sup>②</sup>21日凌晨2时发生了不愉快的事，一队装甲车冲进加里宁大街立交桥下的通道时，3名阻止装甲车前进的年轻人死亡。这对政治局势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平民的死亡使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支持者动摇。如果再不停止，就可能发生流血冲突，政变者也不想走到这一步，克留奇科夫说：“早在8月18日晚上我们就商定，无论如何要避免流血，一旦发生这样的危险，那我们就停止行动，现在，这一时刻终于来临了。”<sup>③</sup>

8月21日上午8时，在国防部部务会议上，空军司令沙波什尼拉夫提出撤出莫斯科的军队，得到亚佐夫和其他与会者的赞成。最后，会议通过决议：军队撤回驻地，取消晚上的宵禁，请求议会审查紧急状态委员会是否合法。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开始分崩离析，在21日早8时多在克里姆林宫召开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会议上，不少成员不到场，巴克拉诺夫宣布退出，亚佐夫也没参加。他们决

<sup>①</sup> 唐修哲、孙润玉著：《岁月有痕——从苏联到俄罗斯亲历》，第183—184页。

<sup>②</sup> （俄）科尔扎柯夫著，杨藻镜等译：《我所知道的叶利钦：俄总统安全局前局长回忆录》，第77—78页。

<sup>③</sup> （俄）弗·亚·克留奇科夫著，何希泉等译：《个人档案（1941—1994）——苏联克格勃主席弗·亚·克留奇科夫狱中自述》，第570页。

定去见亚佐夫，决定不再冒险，停止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活动，派人到福罗斯，再次向戈尔巴乔夫汇报国内局势，并尽力说服他采取行动。11时，叶利钦在俄罗斯最高苏维埃紧急会议上告诉大家，他已和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通了电话，说服对方取消了对“白宫”的包围，并同意一起去克里米亚接戈尔巴乔夫返回。

下午4时，苏联国防部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国防部部务会议决定把部署在紧急状态地区的军队撤回原驻地。莫斯科卫戍司令加里宁发布通告，说在首都莫斯科“实行宵禁是不合适的”。决定从8月21日起解除首都的宵禁。塔斯社还发表通告：前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8月19日关于限制中央、莫斯科市和州社会政治出版物出版的规定予以撤销。克留奇科夫、亚佐夫、巴克拉诺夫和季贾科夫去福罗斯见戈尔巴乔夫，卢基扬诺夫和伊瓦什科乘坐另一架飞机前往。戈尔巴乔夫拒绝与克留奇科夫、亚佐夫、巴克拉诺夫和季贾科夫见面，只同卢基扬诺夫和伊瓦什科见了面。

与此同时，叶利钦也立即派人去福罗斯，派去的人有总理西拉耶夫、内务部长杜纳耶夫、巴卡京和普里马科夫也随同前往，还有俄罗斯副总统鲁茨科伊及几名带武器的军官，几名俄罗斯人民代表、法国大使馆一等秘书佩斯西克、记者等。戈尔巴乔夫地接见了他们，当晚8点，戈尔巴乔夫发表声明，强调他已完全控制了局势，并恢复了曾一度中断的与全国的联系，并称将于近日内重新完全行使他的总统职权。22日凌晨，戈尔巴乔夫从黑海休养地克里米亚乘飞机返回首都莫斯科。

22日，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发布命令：取消紧急状态委员会及其成员的决定；解除紧急状态委员会所有成员的职务；要求苏联总检察机关追究政变参加者的刑事责任，俄罗斯联邦与联盟建立共同的专门委员会进行侦讯。<sup>①</sup>叶利钦显然在扮演苏联总统的角色。

事变的发动者受到了惩处。在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8名成员中，内务部长普戈于22日开枪自杀（同时自杀的还有他的妻子），其余7名成员被捕。此外被捕者还有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扬诺夫、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书记舍宁、陆军总司令瓦连尼科夫、总统办公厅主任博尔金、普列汉诺夫等7人。8月

---

<sup>①</sup> Хрестоматия по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истории (1946—1995). М., 1996. С. 358.

24日，苏联元帅阿赫罗梅耶夫元帅在办公室上吊自杀，他在给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的遗书中写道：政变发生时他正在索契休假，没有人让他回来，但他认为自己应该回来，他知道这种做法不可能成功，“问题在于从1990年开始，我就确信，今天仍然确信，我们的国家正在走向消亡。她很快就要解体了。我在寻找大声说出这一切的办法。我要盘算，我参加‘委员会’的保障工作及最后与此相联系的被审查，会给我机会大声说出这一切。也许这种解释不令人信服和天真，但事实就是如此。在我的行为里没有自私的动机”。<sup>①</sup>他在遗书中还说：“当我看到我的祖国正在消亡，我生命的所有寄托遭受破坏的时候，我不能再活下去了，我的年龄和我的整个生命都赋予离去的权利，我一直斗争到最后时刻。”<sup>②</sup>8月26日，苏共中央委员、苏共中央事务管理局局长尼古拉·克鲁奇纳自杀。但是，俄罗斯人还是很有理智的，处理“8·19”事变并没有变成大规模的迫害，虽然政变者被捕了，曾以“叛国罪”受到审判，但没有判刑。苏联解体，俄罗斯陷入混乱，最高苏维埃与总统之间的争斗、民众对休克疗法的不满、叶利钦炮轰白宫等等，影响着人们对“8·19”事变发动者的态度。1994年2月23日俄罗斯联邦国家杜马通过大赦法，因“8·19”事变而被审判者被大赦，<sup>③</sup>他们又在新的制度下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 “8·19”事变失败的原因

关于“8·19”事变失败的原因，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政变者组织不好自然是原因之一，实际上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匆忙上阵，他们也没把此事当成推翻苏联合法总统和俄罗斯民选总统的政变，“这些人没有篡夺国家所有政权、在苏联建立独裁统治的思想准备。这种独裁势必会引发大规模的迫害，甚至会导致恐怖事件的发生。克留奇科夫、亚佐夫、亚纳耶夫、帕夫洛夫等人，在开始冒险行动的时候，还是寄希望最后能和戈尔巴乔夫、叶利钦达成协议……国家紧急状态委

---

<sup>①</sup> Степанков В., Лисов Е. Кремлевский заговор. Версия следствия.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Огонек”, Москва, 1992. [www.gorby.ru/07.08.2007](http://www.gorby.ru/07.08.2007)

<sup>②</sup> (俄) 罗伊·麦德维杰夫著，王晓玉等译：《苏联的最后一年》，第131页。

<sup>③</sup> 瓦连尼科夫拒绝接受，他被无罪释放。

员会的领袖们计划在8月19日与叶利钦举行一次会晤，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找到某种双方都能接受的妥协方案。政治冲突中的任何一方都不知道，对方将如何行动。所有人因此都尽量避免可能造成难以收拾后果的不可逆的武力行为”。<sup>①</sup>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没有采取果断的行动，它的工作仅仅限于分发文件和通过电话下达命令，没有采取什么切实的行动，正如叶利钦说：“叛乱分子们对国内所发生的变化估计不足。戈尔巴乔夫执政期间，除了官方政权以外，出现了社会舆论的一些领袖、政党、文化界的独立权威人士、民主报刊……要想堵住人们的嘴，只有通过残酷的血腥镇压、大肆的逮捕和死刑，或者用各种诡计在紧急状态的条件下以独特的新闻花招愚弄社会舆论，然而所有这一切叛乱分子们都没有用。这样，他们全盘皆输了。”“克格勃——作为政变的主要发动机，不想用鲜血玷污自己的手，希望用坦克履带的轰隆声或偶尔的几声警告性炮轰赢得胜利。”<sup>②</sup> 此外，事变的发动者威望不高，没有真正的领袖人物。“在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中没有领袖，没有一个使自己的见解成为行动口号和号令的权威人物”<sup>③</sup> 沙赫纳扎罗夫认为，“假如这个班子为首的是个遇事果断、不考虑后果的人，能够像叶利钦那样下令向人群开枪，他们没准就得手了……”<sup>④</sup> 从一般事件发展的本来逻辑分析，以上这些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事变的失败还有更重要的原因。

首先，经过几年的改革，苏联社会已经发生了变化，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被许多当事人认为是注定要失败的阴谋，没有人想用武力解决问题（事变的发动者也是如此），没有人愿意看到流血，孩子们爬到坦克上玩耍，市民与官兵聊天。这说明现代社会的问题不能靠强硬手段解决，人们不愿为信仰而战，意识形态的交锋已不能转为社会对抗。正如普里马科夫认为，“之所以能成功地挫败这场阴谋，是因为国家已经变成了另一种样子。功勋首先属于莫斯科、列宁格勒和俄罗斯的居民，叶利钦个人的勇敢也起了很大作用，幸运的是，叛乱的领导者是极其平庸的”。<sup>⑤</sup> 巴卡京认为：“叛乱的组织者们在主要的一点上打错了算盘。他们没

① （俄）罗伊·麦德维杰夫著，王晓玉等译：《苏联的最后一年》，第105页。

② （俄）鲍里斯·叶利钦著，李垂发等译：《总统笔记》，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第90、80页。

③ （俄）鲍里斯·叶利钦著，李垂发等译：《总统笔记》，第80页。

④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著：《戈尔巴乔夫之谜》，第324页。

⑤ Евгений Примаков. Годы в большой политике. М., 1999. С. 98.

有考虑到，近几年来国内各族人民尝到了自由的甜头，把甘于受人支配的奴性从自己身上一点一滴地挤了出去。他们没有考虑到，最高层的政变已经不会像1964年那样遇到死一般的沉默。叛乱分子成了他们自己目光短浅、缺乏远见、对国内发生的变化不能作出正确评价的牺牲品。聚集在‘白宫’周围、阻止新专政到来的普通老百姓制止了他们。拒绝执行非法‘新政权’命令的军人制止了他们。民主主义的领袖们制止了他们，在危急关头，这些领袖表现出了自己的勇敢、决心和善于捍卫人民按照宪法赋予他们的权力，并且能够坚持这种权力。”<sup>①</sup>

其次，当时的国际环境已不同于战后初期或者20世纪60年代，世界已经紧密联系在一起，苏联不可能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应而自行其是，苏联面临的经济困难离不开与国际社会的合作，苏联的改革与发展需要良好的国际环境，因此，国际社会对苏联有着无形的压力。美国等西方大国对亚纳耶夫等人的行动完全持否定态度，纷纷表示支持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同时宣布中止对苏联的经济援助，向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施加压力。由于政变不具有合法性，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而得不到国际社会的承认，他们很难成功。政变的发动者也明白这一点，他们事前派代表争取合法总统戈尔巴乔夫的支持，遭到了戈尔巴乔夫的拒绝，但他们仍希望在取得成功后得到戈尔巴乔夫的认可，没有贸然采用武力手段解决问题。

再次，政变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反抗。政变的发动者以为要拯救国家、要克服危机，会得到民众的拥护，结果表明叶利钦的号召力比他们更强。人们显然认为他们合法选出的总统叶利钦更能代表他们的利益，并不想屈服于强硬派的武力威胁。叶利钦在反对政变者的问题上也表现了果断与坚决，正如戈尔巴乔夫所说：“叶利钦组织的反对阴谋者的战斗起了巨大的作用。他采取了勇敢的立场，行动果断，挑起了全副重担。在那种非常的条件下，这是正确的。当我回到莫斯科时，我认可了他在反叛期间发布的法令。”<sup>②</sup> 民众把紧急状态委员会看成是过去制度的象征，莫斯科、列宁格勒的民众大多追随叶利钦。另外，军队发生了分化，亚佐夫、克留奇科夫、巴克拉诺夫并不能让军队和克格勃完全听命于紧急状

---

<sup>①</sup>（俄）瓦·巴卡京著，非琴译：《摆脱克格勃——克格勃最后一任主席回忆录》，第44页。

<sup>②</sup>（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著，岱奋译：《八月政变》，第26页。

态委员会。沙波什尼科夫拒绝参与政变，列宁格勒军区司令萨姆索诺夫保证军队不进入列宁格勒市。

最后，政变的准备工作不够，仓促行事。政变发动者既没有与各共和国协调立场，争取支持，也没有明确的纲领目标，让人们不知道他们到底要做什么。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里缺少有威信的领袖人物，亚纳耶夫当副总统时就受到了许多苏维埃代表的反对；帕夫洛夫接替雷日科夫当总理后，也没有表现得更好，他的反危机纲领遭到许多共和国的反对，其经济政策也没有让民众受惠；亚佐夫、克留奇科夫在其所领导的军队和克格勃中也没有很强的威信，许多下属并不听命于他们，而是倾向叶利钦，巴克拉诺夫、普戈、舍宁等从地方调入中央不久，也缺少威信。

### “8·19”事变失败的后果

“8·19”事变是一场计划不周的闹剧，反映了苏共内部由潜在的意见分歧走向公开的意见分歧。发动事变的强硬派并不认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措施，对于苏联的衰落和失去东欧不满，但他们想用强力手段达到目的，显然难以成功。事变的发动者本意是想挽救摇摇欲坠的联盟，其结果却适得其反。“8·19”事变是苏联历史的又一个转折点，事变中断了改革和加速了苏联的解体。“8·19”事变把苏联解体的进程从潜在的变成了公开的，它使党、克格勃、军队威信扫地，联盟机构瓦解，克格勃、总检察院、最高法院和其他权力机关陷于瘫痪，部长会议全体人员辞职，戈尔巴乔夫失去了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所拥有的政权的力量。以维护苏联原有的联盟体制为目标的“8·19”事变失败后，苏联解体的形势已无法逆转。这一事变的消极后果是严重的。

一是使戈尔巴乔夫离开了权力，大大加强了叶利钦的权力，很多人站到了叶利钦一边。在反对“8·19”事变的过程中，叶利钦实际上取代了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成了“光杆司令”，他已经没有实权。叶利钦是“8·19”事变的最大得益者，他被拥戴为英雄。叶利钦所领导的激进民主派利用这个机会发动了反政变，篡夺了联盟总统和其他中央机构的权力，正如加特霍夫所说：“叶利钦拆卸了整个现有宪法结构。叶利钦的许多行动就宪法方面而言，比起那些政变发动者的行动来，更加不合法。而正是叶利钦发动的反政变，比那场笨拙的政变本身

走得更远，它断送了戈尔巴乔夫所作的种种努力，那就是想使处于改革之下受控制而发生变化的现状重新稳定，并使一个更新后的联盟合法化。”<sup>①</sup>

在8月22日凌晨2时，戈尔巴乔夫回到了莫斯科，他的感觉像是回到了另一个国家。当天在电视讲话中戈尔巴乔夫表示此事是个沉痛的教训，“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并沿着激进改革之路快速前进，昨天我与9个共和国的领导进行了会晤，我们讨论了并决定在最近采取刻不容缓的措施……我已经跟各共和国的领导人谈了下一步行动的计划，最近将确定签署联盟条约的新日期，然后讨论新的联盟宪法，新的选举法，选举议员和总统。应该确定完成这一工作的期限，不要拖延，因为延长过渡期，大家已经看到了，对于民主改革是危险的”。<sup>②</sup>但戈尔巴乔夫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叶利钦并不想继续与戈尔巴乔夫分享政权，也不想和他一道建立所谓的“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戈尔巴乔夫以为他还是苏联的全权总统，当天未与叶利钦协商就任命了第一批干部：原总参谋长莫伊谢耶夫大将为国防部长，原克格勃第一总局局长舍巴尔申为克格勃主席，别斯梅尔特内赫留任外交部长，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西拉耶夫为代总理。得知这一消息的叶利钦于8月23日上午气冲冲地来找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强硬地要求戈尔巴乔夫收回成命，并对戈尔巴乔夫说：“我们已有过惨痛的教训，8月事件教会我们许多东西，因此提醒您注意，任何干部任免，都要征得我的同意。”<sup>③</sup>经过与叶利钦协商，任命沙波什尼科夫为国防部长，巴卡京为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潘金为外交部长，他们都是与叶利钦一道积极与紧急状态委员会进行斗争的人。叶利钦还不顾戈尔巴乔夫已经返回莫斯科重新掌握权力的现实，继续抢夺联盟的权力。8月21日他发布命令把全盟电视中心（奥斯坦基诺）转给俄罗斯联邦，把全联盟第二大电视频道转给俄罗斯国家电视和广播公司以组建全俄罗斯电视网。8月22日他再次发布命令把所有在俄罗斯疆域内的联盟的所有企业和机构，除依据俄罗斯法律转给联盟机关外，全部转给俄罗斯联邦。他还命令俄联邦政府肢解塔斯社，把《消息报》社和位于俄联邦境内的出版机构、印刷厂以及苏共所有的为之

---

①（俄）瓦列里·季什科夫著，姜德顺译：《苏联及其解体后的族性、民族主义及冲突——炽热的头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0页。

② Союз можно было сохранить. Белая кника. С. 305.

③（俄）鲍里斯·叶利钦著，李垂发等译：《总统笔记》，第124页。

服务的企业等都转归俄联邦的新闻与出版部。<sup>①</sup>此后，叶利钦还不断发布命令把他认为应该拿到的联盟资源转到自己的手中。

叶利钦还搬到了克里姆林宫办公，他和戈尔巴乔夫达成了划分克里姆林宫的协议：苏联总统连同其机构使用1号楼，叶利钦及其机构使用14号楼。叶利钦的安全局长感叹到：“当时苏联尚未解体，把俄罗斯的政权机构从全苏联相应的机构划分出来是一件麻烦事，而且极不自然。两个总统同时坐镇克里姆林宫也显得很不正常。我当时就很清楚，叶利钦绝对不会容忍两个政权并存。后来，这种局面很快就以戈尔巴乔夫的垮台而告终。”<sup>②</sup>8月23日上午，戈尔巴乔夫在与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代表会晤，这一会晤被现场直播，这实际上是叶利钦等人向他示威。当戈尔巴乔夫抵达白宫入口时，听到的不是欢迎声，而是要他辞职的喊声。叶利钦强硬地要求戈尔巴乔夫批准他在“8·19”事件期间签署的所有法令，他还打断戈尔巴乔夫的讲话，要求审议他签署的停止俄共活动的法令，戈尔巴乔夫感觉叶利钦就像猫戏老鼠一样在戏弄他，他毫无办法。

二是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使各种政治力量，特别是激进力量得到发展，而共产党的力量不再起作用。党、克格勃和军队一直被认为是苏联政权的三大支柱，“8·19”事件严重损害了这些机构的威信，也使这些机构走向了解体，随着它们的解体，联盟国家也失去了维系的纽带。

“8·19”事件动摇了克格勃的地位。虽然克格勃广大官兵对这次事件的态度基本是消极的，并没有积极配合紧急状态委员会，但是，由于克格勃最高领导人克留奇科夫积极参加和筹划了“8·19”事变，8月22日，群众在红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傍晚这些人又来到苏共中央的所在地老广场和克格勃的所在地卢比扬卡广场，推倒了捷尔任斯基的雕像。激进派借机要求对克格勃进行大改组、大清洗，宣布成立“调查国家安全机构活动委员会”，调查克格勃的活动并对其未来提出建议，1991年10月22日，各共和国首脑和苏联总统在国务会议上研究改组国家安全机构的问题。根据讨论的结果，国务会议作出第八号决议：撤销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并在其基础上成立3个独立的中央一级的机构：

---

① Союз можно было сохранить. Белая кника. С. 304、307.

②（俄）科尔扎柯夫著，杨藻镜等译：《我所知道的叶利钦：俄总统安全局前局长回忆录》，第84页。

苏联中央情报局、共和国间安全机构、保卫苏联国家边界委员会和边防军联合指挥部。<sup>①</sup>不久，戈尔巴乔夫任命普里马科夫、巴卡京和卡利尼琴科为这三个新机构的领导人。新机构无论从其职能、作用和在国家生活中的地位来说，都与原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不可同日而语。

苏共不存在了，苏共的精英被俄罗斯的民主派精英所取代，社会上掀起了一股反共潮流。8月22日所有党报刊被停刊，虽然后来这些报刊很快就改变了面目，继续在新社会中生存。苏联共产党的主要理论刊物《共产党员》改名为《自由思想》，《党的生活》更名为《实业生活》；有些报刊虽然没有改名，如《共青团真理报》，但内容已变成了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

8月23日，叶利钦签署“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的共产党停止活动”<sup>②</sup>的命令。由于俄共支持紧急状态委员会，在一些地区建立紧急状态委员会，叶利钦命令俄内务部和检察院调查俄共违反宪法的活动，向审判机关提交相关材料；在审判机关作出相应的结论前俄共机关和组织停止活动。当天，苏共中央和俄共中央委员会的大部分工作人员照常上班，苏共中央大楼前聚集了大批示威群众，正在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开会的戈尔巴乔夫收到了布尔布利斯的一张纸条，写着：“苏共中央正在加紧销毁文件，总书记应立即下令暂停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活动。卢日科夫已经切断电力供应。将有人奉命执行苏联总统、苏共中央总书记以及卢日科夫的指令。布尔布利斯。”戈尔巴乔夫在纸条上批示：“同意。戈尔巴乔夫。1991年8月23日”<sup>③</sup>。正是根据戈尔巴乔夫的这个命令，苏共中央大楼和克格勃大楼被占领。

由于当时的苏共中央书记和政治局委员大都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戈尔巴乔夫难于再依靠共产党来保持他的权力。8月24日早晨，戈尔巴乔夫召集普里马科夫、巴卡京、梅德韦杰夫、列文科、切尔尼亚耶夫、沙赫纳扎罗夫、叶戈尔·雅科夫列夫、波波夫和卢日科夫等人开会，议题之一是政党问题，最后决定

---

①（俄）瓦·巴卡京著，非琴译：《摆脱克格勃——克格勃最后一任主席回忆录》，第78—79页。

② Мунчаев Ш. М., Устинов В. М.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 2 - е изд. Доп и перераб. М., Норма, 2008. С. 636—637.

③（俄）罗伊·麦德维杰夫著，王晓玉等译：《苏联的最后一年》，第154页。

必须通过三个文件：总书记的声明、关于党的财产、关于国家机关的非党化。<sup>①</sup>此后，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苏共党章规定总书记应该向选举其产生的中央委员会辞职，由代表大会最终决定，但戈尔巴乔夫却宣布辞去总书记职务，并建议苏共中央自行解散，各共和国共产党和地方党组织的命运由它们自己决定。<sup>②</sup>

戈尔巴乔夫明白，没有苏共的支持他很难保住权力，但此时苏共上层已经不支持他了。《苏维埃俄罗斯报》总编辑奇金认为：“在这样的形势下他放弃了总书记的职务是不道德的。我参加过苏共中央全会、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得出的印象是：戈尔巴乔夫很重视自己在党内的地位，他知道同党在一起才会有巨大的力量和后盾。后来他之所以不愿丢掉总书记职务，是由于他害怕自己一旦离开党的岗位，共产党就会同他对着干。有关改革作出的一些不得人心的决议都是以党的名义发表的，结果苏共在为戈尔巴乔夫受过，吞下他所制造的苦果。共产党的最上层不管党，可以说背叛了党，首先是总书记，他的行动破坏了党的整个管理系统。苏共实际上早已丧失了政权。戈尔巴乔夫现在已经不敢再召开中央全会来决定是否解散苏共，因为如果召开全会，他就会受到无情的批判。”<sup>③</sup> 戈尔巴乔夫在回忆他为什么发表建议苏共自行解散的声明时说：“沙赫纳扎罗夫从福罗斯回来后，曾打电话给扎索霍夫说：‘请您赶快去医院找伊瓦什科，要求立即解救被囚禁在福罗斯的总书记，谴责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扎索霍夫去了，政治局也召集了会议，要求同总书记见面，但是并没有谴责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这就是当时的全部真相。在这种情况下，我怎么能够同这些人一起在政治局见面，同他们坐在一张桌子旁呢？书记处成员和中央委员基本上都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当这一切情况都明朗化后，我宣布辞去总书记的职务，因为我不可能同搞反宪法武装政变、公开欺骗党和人民的人继续一起合作。同时，我号召共产党员们，在当地组织起来，集体讨论自己活动的组织形式，作出自己的选择。”<sup>④</sup> 8月27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停止苏共在全联盟活动的决议。在白俄罗斯、格

① Союз можно было сохранить. Белая книжка. С. 310.

② Хрестоматия по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истории (1946—1995). М., 1996. С. 369.

③ 转引自唐修哲、孙润玉：《岁月有痕——从苏联到俄罗斯亲历》，第212页。

④ (俄) 戈尔巴乔夫、斯拉文合著，孙凌齐 李京洲译：《尚未结束的历史》，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39页。

鲁吉亚、吉尔吉斯、爱沙尼亚，共产党停止活动，在乌克兰、摩尔达维亚、立陶宛，共产党被禁止。各共和国的非党化到1991年9月中旬基本结束。叶利钦的顾问沙赫赖论证说：无论用什么标准衡量，苏共都不是一个政治性政党，而是国中之国，因此，消除它完全符合民主的精神和形式。<sup>①</sup>

8月25日叶利钦签署“关于苏联共产党和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共产党财产”<sup>②</sup>的命令：鉴于苏共中央已经解散，俄共活动也已被停止，因此属于苏共和俄共的一切动产和不动产、所有的卢布和外汇资金，包括存在俄罗斯联邦境内外的银行、保险公司、股份公司、合资企业，以及其他企业和机构中的所有资金，都将成为俄罗斯国家的财产。关于苏共中央在境外的其他资产，将按照各加盟共和国签订的同盟条约进行分配。苏联共产党生命的终止实际上宣告了苏联解体已无法逆转。苏共是苏维埃政权机关和经济管理部门的承重结构，苏共没有了，苏联的主要支柱机构也开始崩溃了，联盟国家很难再存在下去了。美国的冷战斗士乔治·凯南在1947年曾说过：假如作为政治工具的共产党被削弱、党内的团结和效率遭到破坏的话，那么苏俄会在一夜之间从最强大的国家之一成为一个不足挂齿的弱国，一个最令人同情的民族实体。1991年苏联的解体恰是如此。

苏共的解散和国家机关的非党化，并没有遇到苏共党员或人民的任何抗议活动，“苏共已经威信扫地，就连几乎人人都是苏共党员的克格勃的工作人员也不肯出来保卫它了”。<sup>③</sup>

第三，加剧了苏联解体的进程，正如美国俄罗斯问题专家史蒂文·科恩所说：“政变的后果使新奥加廖沃进程遭到沉重的打击，这些后果大大削弱了戈尔巴乔夫和他的中央政府的力量，使叶利钦和克拉夫丘克的政治野心进一步膨胀，

---

① Согриш В. В.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1985—2001: от Горбачёва до Путина). М., 2001. С. 91

② Мунчаев Ш. М., Устинов В. М.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 2 - е изд. Доп и перераб. М., Норма, 2008. С. 637—639.

③ (俄)瓦·巴卡京著，非琴译：《摆脱克格勃——克格勃最后一任主席回忆录》，第49页。

也使其他共和国领导人对莫斯科人的不可预料的行为产生了担忧。”<sup>①</sup>“8·19”事件后，所有国家机构瘫痪，实际上开始了消除苏联国家政治机构的进程。领袖们在作出决策时不再遵循苏联的宪法和法律，实际上都在按自己的政治意图行事。共和国的权力机关实际上不再看联盟中央行事，从1991年8月底开始尽可能快速地拆除联盟政治的和国家的机构。各加盟共和国的离心倾向明显增强，苏联国内掀起了一场独立的浪潮，各国纷纷发表独立声明，确定总统选举日期，起草宣言。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于8月20—21日宣布独立，恢复1940年以前的宪法。8月24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宣布承认波罗的海三国独立。8月24日，乌克兰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宣布乌克兰是独立的民主的国家，从这一时刻起，在乌克兰领土内只有共和国法律机关通过的宪法、法律、法令有效。决定于1991年12月1日就批准乌克兰独立的文件在共和国举行全民公决。乌克兰在苏联是仅次于俄罗斯联邦的第二大加盟共和国，乌克兰的立场无疑对联盟具有破坏性。

8月27日，白俄罗斯和摩尔达维亚宣布独立，30日阿塞拜疆宣布独立，31日吉尔吉斯和乌兹别克斯坦宣布独立。9月9日塔吉克斯坦宣布独立，9月23日亚美尼亚宣布独立，格鲁吉亚领导人阿姆萨胡尔季阿要求在事实和法律上承认格鲁吉亚独立。截至9月底，宣布独立的加盟共和国已达到12个。10月27日土库曼斯坦也宣布独立，在别洛韦日协定签订前只有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没有宣布独立，但它们同样在自行其是。8月29日，纳扎尔巴耶夫宣布关闭在哈萨克斯坦的核试验场，他在命令中说：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塞米巴拉金斯克州从1949年就开始进行核武器试验。在此期间这里共进行了大约500次核爆炸，使上千人的生命健康受到了损害。鉴于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为确保当时苏联对美国的战略军事均势，在建立核潜能力方面已尽了自己的义务，同时考虑到共和国内社会各界的要求，关闭塞米巴拉金斯克核试验场地；把塞米巴拉金斯克试验场地改建成为加盟共和国的科研中心……需协同联盟机构一同确定给受害的哈萨克公民发放损失赔偿金的范围与程序；努力改善该地区人民的生活条件与医疗

---

<sup>①</sup> 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编，李京洲译：《奔向自由——戈尔巴乔夫改革二十年后的评说》，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35页。

条件。<sup>①</sup>

“8·19”事变在苏联历史上是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它使苏联的改革无法再继续下去了，倡导改革的苏共已不复存在，改革的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失去了权力，“1991年8月19—21日的事件改变了国家。在永远选择社会主义方向的保持旧体制的框架内作为‘从上层开始的革命’的改革成了过去。”<sup>②</sup>实际上，8月事件后联盟已经死亡，只是在形式上存在到1991年年底。

---

① 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3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82—683页。

② Ответственный редактор В. П. Дмитренко.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X X век. М., 1998. С. 592.

## 73. 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在联盟解体中起了什么作用？

左凤荣

苏联解体后，俄共把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都当成苏联解体的罪魁祸首，甚至要审判他们。他们二人对苏联解体的态度却有不同，戈尔巴乔夫强调自己一直是联盟的捍卫者，为苏联的解体感到惋惜；叶利钦则强调苏联解体是人民的选择，俄罗斯联邦放弃帝国的道路，不让苏联这个帝国继续存在，给各族人民以选择的自由，是一件好事。苏联解体是多种因素造成的，根本原因是苏联的体制模式没有促进生产力的提高，未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失去了凝聚力和吸引力，但作为领袖的个人自然也起了作用。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他们的作用显然是不一样的。

### 戈尔巴乔夫行动迟缓，错过改革联盟的良机

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之初并没有注意到苏联的民族问题，在改革的过程中更多强调的是给公民以民主权利，而没有想到要改革不合理的联盟体制，错过了改革联盟的良机。

宪法规定苏联是联邦制国家，但随着斯大林—苏联模式的形成，苏联实际上变成了单一制国家。苏联成立时，全联盟和联盟兼共和国的部级机关只有 10 个，到 1947 年，部长会议下设的部已达到 58 个，到 1982 年，苏联有 33 个全联盟的部和 31 个联盟兼共和国的部，6 个全苏国家委员会和 14 个联盟兼共和国的国家委员会，总计 84 个。再加上其他中央直属机关 26 个，总数已达 110 个。在苏联

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下，中央集中了大量的权力，地方权限很少，各加盟共和国根本就没有自主权，它们支配的工业产品还不到全苏工业总产值的10%。苏联长期排斥市场经济，用行政手段管理国家，人为地在全国搞劳动分工，常常违反经济发展规律，如乌兹别克生产棉花，棉布却不能自己生产；土库曼斯坦产天然气，这里90%的居民用不上天然气；哈萨克斯坦是畜牧业基地，肉的供应却很紧张。中央迫使中亚国家向单一经济发展，把哈萨克斯坦适宜种棉花的土地划给乌兹别克，又把乌兹别克适宜种粮食的土地划给哈萨克斯坦，把乌兹别克适宜放牧的土地划给塔吉克斯坦。这些共和国感觉没有平等地位，他们只是中央命令的执行者，根本就谈不上有自己的经济自主权。这种单一性体制的权力不平衡潜藏着严重的中央与地方的矛盾。

80年代中期在改革开始时，并没有涉及任何民族问题方面，在1987年11月出版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戈尔巴乔夫还盛赞苏联民族问题的解决，他认为，“在连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也没有消除族际怨仇这个背景的衬托下，苏联是人类文明史上真正独一无二的典范”。“如果我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民族问题，那就不会有今天的苏联，它在社会、文化、经济和国防方面就不会像今天所看到的这个样子。如果没有使各共和国在事实上日益平等，如果没有在兄弟情谊和合作、互相尊重和互相帮助的基础上结成共同体，我们的国家就不能存在下去。”<sup>①</sup>殊不知，苏联这个联盟国家主要是靠中央集权来维持的。

戈尔巴乔夫的盲目乐观并不能消除民族问题。1988年2月纳—卡问题尖锐化，在2月28日政治局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才真正认识到民族问题的严重性，他说：“应该给这些问题排排队。现在应该首先结束亚美尼亚混乱的局势，我们已授权（中央）书记处：着手研究导致这一事件的原因。心平气和地研究，也不要弄明白多少就公布多少。在此要让他们的人也参加，我们的知识分子也参加。应该成立一个代表委员会：由学者、知识分子组成，而不要只让党务和政工工作者参加。政工人员总是过多地束缚于分析事实的工作上：肯定的还是否定的。现

---

<sup>①</sup>（苏）米·谢·戈尔巴乔夫，岑鼎山等译：《改革与新思维》，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第101页。

在应该组建一个更加民主的委员会，指定领导人，让他们去考察、访问、讨论。”<sup>①</sup>

民族问题日益尖锐，各共和国要求权力的呼声日益高涨，戈尔巴乔夫的反应明显滞后，苏共中央终于决定于1989年9月召开专门讨论民族问题的中央全会，各地代表不同要求的信件寄到了苏共中央，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要求。这次中央全会通过了《党在目前条件下的民族政策（苏共纲领）》，提出的基本任务是：对苏维埃体制加以改造，用现实的政治和经济内容加以充实；扩大各种不同形式的民族自治的权利和机会；保证每个民族的平等权利；为自由发展民族文化和语言创造条件；加强各种保障，以杜绝根据民族特征限制公民权利。<sup>②</sup>但这个决议并没有真正实施，也未能遏制分离主义，9月23日阿塞拜疆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共和国主权宣言，25日立陶宛宣布1940年并入苏联不合法。

改革联盟体制，从实际上的单一制向联邦制过渡，扩大共和国和自治体的权力，扩大地方的管理职能，应该是当务之急。但是，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之初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一问题，没有对联盟体制及时做出修正，没有想到改组联盟。1989年5月11日在讨论波罗的海问题的政治局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曾提出，“如何实实在在地改造我国的联邦制要思考、再思考。否则真的要全部完蛋”。<sup>③</sup>在1989年5月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戈尔巴乔夫在报告中提出，要划分联盟、共和国、自治区的权限。九月全会首次提出了制定并签订联盟条约的问题，但直到1990年苏共中央二月全会后才把这一问题提上日程，戈尔巴乔夫本人则直到1991年春天才积极加入制定新联盟条约的进程中来。纳扎尔巴耶夫认为，“戈尔巴乔夫的基本错误在于，他没有倾听加盟共和国要求赋予他们经济独立的呼声。除波罗的海诸国外，大多数加盟共和国含哈萨克斯坦在内，并没有追求分离、完全和盲目的独立。我们想到一点——可能会自我掌握本身的命运。戈尔巴乔夫及其同伙应及时向各共和国提供在联盟框架中最大的独立。我相信，国家可以避开以后很多动荡。”他认为，“如果哈萨克斯坦90%的工业置于莫斯科各部的监控

---

<sup>①</sup> 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0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00页。

<sup>②</sup>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著，徐葵等译：《对过去与未来的思考》，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122—123页。

<sup>③</sup>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著，徐葵等译：《对过去与未来的思考》，第121页。

之下，怎么可能独立地整顿经济局势呢？遗憾的是，我多次有关提供更多的经济独立的要求成了旷野呼声”。<sup>①</sup> 纳扎尔巴耶夫的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

## 地方势力坐大，戈尔巴乔夫应对无策

苏联解体的进程最早是从波罗的海三国开始的。在政治民主化的背景下，波罗的海出现了人民阵线组织，其纲领也逐渐从争取扩大共和国的权力发展到要求独立。立陶宛在其中起了急先锋作用。

在1989年3月举行的人代会选举中，立陶宛的人民阵线组织“萨尤季斯”获得了立陶宛41个名额中的34个。在1989年5月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波罗的海沿岸各共和国代表团坚决主张实行共和国经济核算制，拟定了共和国经济独立草案，他们还坚决要求调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情况，并对该条约的后果进行评估。1989年年中“萨尤季斯”事实上获得了共和国的政权后，逐渐变成了主张国家脱离苏联的力量。

1989年8月23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50周年，“萨尤季斯”组织了名为“波罗的海之路”的政治活动，三国居民组成几百公里的“波罗的海人链”把三国的首都连接起来，三国有1/5的居民走上街头，“几乎所有的普通劳动者都不接受斯大林于1939年强加的这个强制性的联盟，渴望独立。结果，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已从戈尔巴乔夫保证国家统一的同盟者变成了敌人。改革首倡者面临一个两难的抉择：要么是可保证群众自由发表意见的民主的深入，要么是保住联盟”。<sup>②</sup> 戈尔巴乔夫选择了民主。戈尔巴乔夫开始否认存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秘密议定书，但又在苏联第一届人代会上设立了以雅科夫列夫为主席的调查委员会。1989年12月雅科夫列夫作为苏共中央国际政策问题委员会主席在第二届苏联人代会上作了“关于对1939年缔结苏德互不侵犯（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时的情况和法律后果的总结报告”，这是苏联第一次承认苏德条约还有瓜分

---

<sup>①</sup>（哈）努·纳扎尔巴耶夫著，陆兵、王沛译：《时代、命运、个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0页。

<sup>②</sup>（俄）安德烈·格拉乔夫著，述弢译：《戈尔巴乔夫之谜》，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233页。

东欧和波罗的海三国的秘密附加协定，人代会就此作出决议：“苏联人民代表大会谴责1939年8月23日签订《秘密补充议定书》的事实以及与德国签订的其他秘密协议。大会认定秘密协议自签订之时起在法律上无效，不具有约束力。这些议定书并不能为苏联同第三国的相互关系构建新的法律基础，但却被斯大林和他周围的人用来向其他国家提出最后通牒或施加压力，以破坏对它们的法律义务。”<sup>①</sup> 这样一个决议，证明了苏联对波罗的海三国的占领不合法，无异于鼓励波罗的海三国从苏联分离出去。1989年12月20日立陶宛共产党二十大宣布该党脱离苏共而独立。

1990年1月立陶宛共产党决定脱离苏共而召开非常中央全会，1月11日，戈尔巴乔夫偕夫人到立陶宛，同各方人士进行接触，劝说他们留在联盟内，“分离会损害各族人民的利益。独立自主、重新划分权限、非集中化都是对的。但是要保留合作和相互配合。批评联邦制没有意义，这一制度在我国从来没有过，我们至今一直生活在单一制的国家中。让我们先在现在的联邦制中生活吧，以后再确定去向。我们可借鉴世界联邦制国家的正面经验”。<sup>②</sup> 但这是无法完成的使命。“无论结局如何，失败实际上是不可避免的。1990年1月，亚佐夫以军人的方式一语道破其中的实质：‘要是有一个共和国分离出去，戈尔巴乔夫就会完蛋，可他要是使用武力加以制止呢，那同样也会完蛋。’”<sup>③</sup> 戈尔巴乔夫的劝说没起作用，他离开立陶宛时明白，立陶宛人决心独立了。

1990年3月，在立陶宛举行的最高苏维埃选举中，维尔纽斯国立音乐学院兰茨贝基斯教授领导的民族主义运动“萨尤季斯”获胜，兰茨贝基斯被选为立陶宛最高苏维埃主席，在他的提议下，立陶宛议会于1990年3月11日通过了《关于恢复立陶宛独立地位的宣言》，据此，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更名为立陶宛共和国，苏联宪法在共和国国内失效，立陶宛还把在立陶宛的所有企业收归共和国所有。

1990年3月15日，苏联第三届人代会否决了立陶宛最高苏维埃的决议，决

---

①（俄）尼·伊·雷日科夫著，徐昌翰译：《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新华出版社2008年版，第122页。

②（俄）米·谢·戈尔巴乔夫著，徐葵等译：《对过去与未来的思考》，第123页。

③（俄）安德烈·格拉乔夫著，述弢译：《戈尔巴乔夫之谜》，第230页。

定委托苏联总统、苏联最高苏维埃和苏联部长会议保障立陶宛境内每一个居民的合法权利。3月21日戈尔巴乔夫颁布了一项关于在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境内保障苏联公民权利和维护苏联主权的命令，但立陶宛根本不予理睬，仍然自行其是。在3月22日讨论形势时，瓦连尼科夫将军建议对立陶宛实行紧急状态、总统治理、派遣军队等措施，戈尔巴乔夫不予以考虑，他要用法律的手段解决问题。1990年4月3日匆忙通过了退出苏联法，实质上是一个限制加盟共和国退出的法律。戈尔巴乔夫试图通过经济封锁迫使立陶宛屈服，1990年4月15日，对立陶宛实行严厉的经济制裁，提高石油天然气的价格，对许多重要商品禁运。结果却适得其反，损害了中央的形象，加剧了立陶宛反抗联盟的情绪，他们召回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中的立陶宛籍人民代表，并宣布建立自己的军队。立陶宛共产党发生了分裂，大部分归顺到独立力量一边，小部分转入地下。戈尔巴乔夫对此没有作出任何决定，他不知道该如何维护苏联的宪法和维护统一。“戈尔巴乔夫的犹豫不决，促使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三国领袖越走越远。”<sup>①</sup>4月末立陶宛方面表示要与中央对话，“立陶宛不反对将独立宣言解释为一个视共和国地位为‘革新后苏联的参与成员’的文件。这一方案的具体实现应当与联盟商定，分阶段进行。这是寻求实际解决问题的基础”。<sup>②</sup>在立陶宛代表团与中央代表团的谈判中，双方的立场都很强硬。

在立陶宛独立的同时，爱沙尼亚最高苏维埃也于1990年3月30日通过向独立过渡的决定，5月8日改国名为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最高苏维埃也于1990年5月4日通过独立宣言，宣布改国名为拉脱维亚共和国，恢复1922年共和国宪法。尽管戈尔巴乔夫一再宣布他们的独立是非法的，但无法阻止他们走上独立之路。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效应在苏联起了示范性作用。

1990年10月4日，立陶宛通过《叛国法》，规定立陶宛共和国公民如果主动参加“其他国家”或者“外国组织”，旨在破坏立陶宛主权的活动，将被剥夺自由15年，或被判死刑并没收个人财产。1990年11月20日立陶宛议会通过了组建国土保卫局的决议，实际上承担国防部的职责，开始组建军队。由于商品极

---

<sup>①</sup>（俄）罗伊·麦德维杰夫著，王晓玉等译：《苏联的最后一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5页。

<sup>②</sup>（俄）米·谢·戈尔巴乔夫著，徐葵等译：《对过去与未来的思考》，第125页。

度短缺，立陶宛政府被迫于1991年1月6日傍晚大幅度调整商品价格，第二天街头出现了抗议活动，一些大企业宣布罢工。1月8日，维尔纽斯市街头被不满的群众挤满，形成了以“统一运动”、拥护苏共的立陶宛共产党人和工会为一方，以拥护分离的“萨尤季斯”、“立陶宛自由联盟”为另一方的对抗。为了平息事态，议会通过了撤销政府调整价格的决议，普伦斯克涅—布拉藻斯卡斯政府辞职。

对于波罗的海三国不断发展的独立倾向，从1990年底开始，戈尔巴乔夫也曾倾向于用强力手段解决。1991年1月10日，戈尔巴乔夫向立陶宛最高苏维埃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在立陶宛恢复苏联宪法的效力，立陶宛没有答复。立陶宛内部要求立陶宛留在苏联的人们积极行动起来，成立了救国委员会。国防部长亚佐夫、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内务部长普戈认为局势可能失控，“萨尤季斯”与救国委员会可能发生冲突，要求实行总统治理。1991年1月11日立陶宛“民族自救委员会”成立，他们向常驻立陶宛的维尔纽斯卫戍区和波罗的海军区求援。军队于1月12日控制了维尔纽斯电视台，当夜，坦克开进了维尔纽斯，13日凌晨1时30分，坦克包围了立陶宛电视台大楼，克格勃特种部队强行占领了这座大楼，有14名立陶宛人和1名特种兵战士死亡；军队在进攻议会大楼时，遭到群众阻挡而停了下来。立陶宛最高苏维埃主席兰茨贝基斯号召市民抵抗，保卫立陶宛共和国，苏联其他共和国也声援，国际社会反响强烈，美国、欧洲许多国家、日本等都发表声明，指责苏联在立陶宛用兵。在内外压力下，维尔纽斯卫戍区部队撤回了兵营。这次事件挽救了正在丧失威信 of 兰茨贝基斯等民族分离势力，转移了人们对他们提价政策的不满，却损害了苏联的形象，给国际社会造成了民主受到暴力镇压的印象，立陶宛共产党以及一切被公众认为同这次事件有关联的力量实际上被消灭了。

叶利钦等民主反对派借立陶宛事件对戈尔巴乔夫等人进行了强大的政治攻势，叶利钦飞到爱沙尼亚，与波罗的海三国的最高苏维埃主席一起商讨对策，表示相互支持，并呼吁联合国秘书长召集紧急会议。1月20日“民主俄罗斯”运动在莫斯科组织20多万人参加的游行，声援立陶宛，要求苏联总统、国防部长辞职，要求俄罗斯有自己的总统和军队。

在这一背景下，戈尔巴乔夫开始逃避责任，他声称自己对使用军队一无所知，国防部长亚佐夫、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内务部长普戈也声称没

有下令动用军队。雷日科夫认为，没有戈尔巴乔夫的同意，军队不可能参与。<sup>①</sup>“为了控制当地局势，苏联国防部副部长瓦连尼科夫被紧急派往维尔纽斯。瓦连尼科夫将军和驻地军官进行交流之后，马上建议在立陶宛实施苏联总统直接管制，但戈尔巴乔夫否定了他的建议。”<sup>②</sup> 戈尔巴乔夫在1月22日的讲话中说：“发生在维尔纽斯和里加的事绝对不是总统的路线，正是为了实现这一路线才实行总统制。因此，我坚决驳斥围绕这一问题的所有投机、所有怀疑和诽谤。”他要求政治组织通过法律的途径获取政权，不要使用武力。<sup>③</sup>

关于立陶宛事件，经过多年的调查，立陶宛法庭于1999年8月宣布对立陶宛共产党6个前共产党人士进行长期监禁，其中包括立陶宛共产党中央书记布罗基亚维丘斯和中央部长叶尔莫拉维丘斯，其罪名是参与“民族自救委员会”和领导苏联特种部队。但圣彼得堡出版的《记者调查》证实，是“萨尤季斯”的战斗队员制造了1月12日晚的流血事件，他们是从电视塔附近建筑物的顶部向人群开枪。<sup>④</sup> 立陶宛事件，为民族主义分子制造了反对联盟的口实。

法律手段不起作用，军事手段行不通。维尔纽斯事件的后果是严重和长远的，这一事件被叶利钦充分利用，“正是维尔纽斯事件促使叶利钦及其控制的最高苏维埃发表声明：必须建立自己的、俄罗斯的军队，这激起了‘联盟中央’拥护者的营垒大发雷霆。同时应当指出的是，维尔纽斯事件还产生了另一种结果：它促使叶利钦及其他共和国的领导人签订共和国间的双边协定——顾及每个伙伴的利益、以每个共和国在其境内最大限度主权完整为前提的协定”。<sup>⑤</sup> 1991年2月9日，立陶宛举行全民公决，90%的公民投票支持国家独立。此后，波罗的海三国脱离苏联已成定局。波罗的海三国脱离苏联本来也不会损害苏联，它们三国人口只占苏联总数的2.8%，也不拥有重要资源。

---

① (俄)尼·伊·雷日科夫著，徐昌翰译：《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新华出版社2008年版，第148页。

② (俄)罗伊·麦德维杰夫著，王晓玉等译：《苏联的最后一年》，第17页。

③ Союз можно было сохранить. Белая кника. М., АСТ. 2007. С. 2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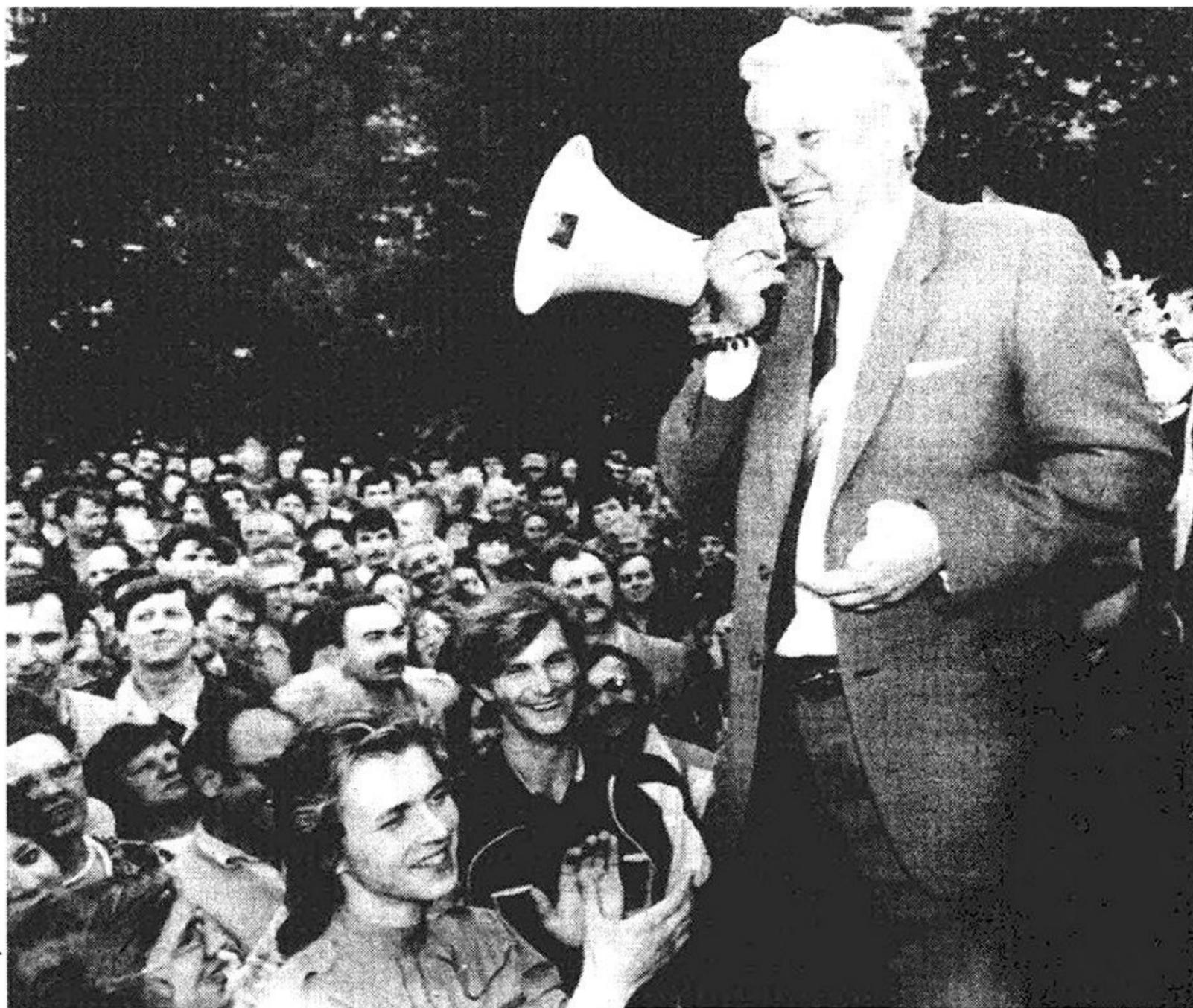
④ 《圣彼得堡消息报》2000年6月3日，转引自罗伊·麦德维杰夫著：《苏联的最后一年》，第21页。

⑤ (俄)鲁·格·皮霍亚著，徐锦栋等译：《苏联政权史(1945—1991)》，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674页。

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进程起了示范性作用，大大鼓舞了其他共和国民族主义的发展，1989年9月乌克兰“鲁赫”成立，摩尔多瓦、亚美尼亚、塔吉克、吉尔吉斯等都出现了民族冲突。1990年以后苏联经济状况恶化，苏共和联盟中央机关的瘫痪，助长了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一些人开始认为，只要脱离苏联，就会过上好日子。

### 叶利钦与联盟争主权，引发主权大检阅

波罗的海三国等的独立实际上无法动摇苏联的根本，最后埋葬苏联的是俄罗斯的民族分离主义，因为俄罗斯是苏联的支柱，苏联虽然是由15个加盟共和国组成的，力量并不平衡。苏联的面积是2240.22万平方公里，俄罗斯的面积



1989年的叶利钦。(新华社稿)

1707.54 万平方公里；1981 年苏联的人口是 2.666 亿，俄罗斯的人口为 1.39165 亿。<sup>①</sup> 在自然资源、经济实力等各方面，俄罗斯相对于其他共和国都占有绝对优势，苏联可以没有波罗的海三国，可以没有外高加索三国，但不能没有俄罗斯。

在苏联各地民族主义思潮奔涌、民族分离主义日益发展之时，作为苏联最大加盟共和国的俄罗斯并没有站在联盟一边，叶利钦为了与戈尔巴乔夫争权，对民族分离主义浪潮推波助澜，是波罗的海三国与联盟争权和独立运动的积极支持者，到 1990 年 6 月，俄罗斯这一全新因素加入了民族分离主义的大合唱。6 月 12 日，在叶利钦等人的鼓动下，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以压倒多数（903 票赞成，13 票反对和 9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国家主权的声明》，宣布俄罗斯联邦是一个主权国家，俄罗斯宪法和法律在俄罗斯全境内至高无上，俄罗斯联邦保留退出苏联的权利。这表明：“俄罗斯内部倾向获得主权的情绪开始迅速发展。这种情绪是渴望与努力在本国疆域内团结起来，永远摆脱这样的状况：在俄罗斯发号施令的同时，又在许多方面与苏联融为一体。在俄罗斯的许多地区——非黑土地带、外乌拉尔、远东走向经济上荒芜和衰退的同时，俄罗斯仍是输血者，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不满。”<sup>②</sup>

戈尔巴乔夫认为，“1990 年 6 月 12 日俄罗斯最高苏维埃通过了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主权宣言。紧随这一文件之后，其他共和国也相继通过类似宣言，不仅是加盟共和国，也还有自治共和国。开始‘主权国家大检阅’，结果，寻求与立陶宛调解之路告吹”。<sup>③</sup> 长期在俄罗斯的意大利记者朱利叶托·基耶萨也认为，1990 年 6 月 12 日是苏联开始终结的准确日期，“1990 年 6 月 12 日是一个转折的日期，它对后来许多事件有影响，它注定了濒死期及其速度、方式，并迅速地使挑选不同抉择的可能性丧失殆尽。正是在这一天，俄联邦最高苏维埃以绝大多数的选票赞同了其主席鲍里斯·叶利钦宣布俄罗斯为主权国家的提议。这就是所有接踵而至的分立主义倾向的起点和开端，这些分立主义分子先是断送了

---

① 《苏联百科手册》，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671 页。

② Примаков Е. Годы в большой политике. М., СОВЕРШЕННО СЕКРЕТНО. 1999. С. 76.

③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著，徐葵等译：《对过去与未来的思考》，第 126 页。

苏联，而后是俄罗斯”。<sup>①</sup> 在俄罗斯的示范作用下，到1990年12月又有9个共和国：乌兹别克、摩尔多瓦、乌克兰、白俄罗斯、亚美尼亚、土库曼、塔吉克、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发表了主权宣言。1990年10月24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法令，重申联盟法律优先于共和国法律，但同一天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通过决议，规定在俄罗斯境内共和国法律高于联盟法律。

在这种背景下，戈尔巴乔夫把改革联盟体制、建立新的主权共和国联盟提上了日程。1990年9月25日，成立了包括苏联总统、最高苏维埃主席、部长会议主席、民族院主席、各共和国负责人在内的筹备委员会，起草新联盟条约。1990年11月23日，新联盟条约草案公布，供全民讨论，波罗的海三国和格鲁吉亚明确表示不签署联盟条约，俄罗斯提出了许多保留条件，叶利钦更热衷于与其他共和国进行双边谈判和签订双边条约。

1990年12月24日，苏联第四次人代会通过了《关于新联盟条约的总构想及其签署程序》的决议，决定把现行联盟改组为“自愿平等的主权共和国联盟—民主的联邦制国家”。决定由专门的委员会负责条约的起草工作和决定签署的程序。为了取得民意的支持，苏联最高苏维埃于1991年1月16日通过决定，在3月17日就是否保存革新后的联邦举行全民公决。1991年初建立了起草新联盟条约草案的专家小组，领导人是苏联科学院副院长弗·尼·库德里亚夫采夫和总统的两个代表：列文科和沙赫纳扎罗夫，参加这一小组工作的有经济学家、法学家、政治学家，各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和自治共和国的领导人参加讨论和作出决定。戈尔巴乔夫这一行动采取得过早，这是在中央与各共和国关系紧张的情况下开始的。加盟共和国的对抗使中央名存实亡，为摆脱危机，戈尔巴乔夫不得不通过签署新联盟条约来寻求出路。

与此同时，俄罗斯与中央之间的矛盾加剧。1991年初，莫斯科街头游行不断，矿工举行罢工，不断提出让苏联总统和内阁辞职。1991年2月19日，叶利钦在苏联电视台发表讲话：“事情已经非常清楚，戈尔巴乔夫保留‘改革’这个词的同时，不愿意进行实质上的改革，他要保存现有体制，保存强硬的中央集权，不给予各加盟共和国特别是俄罗斯以独立自主……我完全不同意总统的立场

---

<sup>①</sup>（意）朱利叶托·基耶萨，徐葵等译：《别了，俄罗斯！》，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118页。

和政策，我要求他立即辞职。”<sup>①</sup> 3月9日，《真理报》刊登了主权国家联盟条约的第一个方案，叶利钦声明：“我们不需要现存的任何形式的联盟，我们不需要这样的中心——庞大的、官僚化的……我们应该摆脱它。改革已经进行了6年，一切让我们相信，我们正在破坏这个体制，我们事实上已经走上了民主的革新，原来这是一个谎言。”<sup>②</sup> 叶利钦摆出了一副要与联盟中央对着干的架势。

叶利钦想阻挠和破坏全民公决，他认为：“全民公决的目的，其一是为了赋予全国范围内的紧急状态以合法性质，其二是为了取得同俄罗斯的独立进行斗争的‘合法权利’。”<sup>③</sup> 1991年1月26—27日在哈尔科夫召开“主权共和国民主力量大会”，有来自11个加盟共和国的40多个政党和运动参加，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俄罗斯自由民主党、“民主俄罗斯运动”都参加了会议，会议号召对3月27日举行的是否保留联盟的全民公决说“不”。<sup>④</sup> 2月7日，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通过决议，决定在全民公决票上加上第二个问题：“您是否同意设立全民投票选出的俄罗斯联邦总统职位？”目的是巩固自己在与联盟中央关系中的地位。

1991年3月17日，80%的苏联公民参加了全民公决（有6个共和国官方拒绝参加全民公决，它们是：格鲁吉亚、立陶宛、摩尔多瓦、拉脱维亚、亚美尼亚、爱沙尼亚），其中76.4%的人赞成保留联盟，21.7%的人反对，还有1.9%的票无效。在俄罗斯联邦，有76%的公民参加了全民公决，表决的结果很奇怪：一方面有71.3%的参加者赞成保留联盟，另一方面有70.8%的人赞成在俄罗斯设立总统职位，而这实际上是反对联盟的。俄联邦参加投票的人和赞成保留联盟的人在共和国中占倒数第一和第二，在俄联邦的中心地区，赞成保留联盟的人很少。

在乌克兰举行全民公决时，根据乌克兰最高苏维埃的决议也加上了一个问题：您是否同意在组成苏维埃主权国家联盟的宣言的序言中写明乌克兰的国家主权？有80.17%的人回答是肯定的，高于赞成保留联盟者（70.2%）。这确定了乌克兰法律高于联盟法律的思想基础，在事实上排除了建立新的联邦制国家时乌

---

①（俄）鲍里斯·叶利钦著，李垂发等译：《总统笔记》，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第27页。

② Союз можно было сохранить. Белая кника. М., АСТ. 2007. С. 212.

③（俄）鲍里斯·叶利钦著，李垂发等译：《总统笔记》，第26页。

④ Союз можно было сохранить. Белая кника. М., АСТ. 2007. С. 203.

克兰完全合乎要求加入的可能性。<sup>①</sup> 在仅次于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哈萨克斯坦，89%的公民参加了投票，其中94.1%的人赞成保留联盟。白俄罗斯、阿塞拜疆、吉尔吉斯、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土库曼斯坦赞成保留联盟者的比例分别为：82.7%、93.7%、94.6%、93.7%、96.2%和97.9%。<sup>②</sup>

全民公决后戈尔巴乔夫忙于制定新联盟条约，叶利钦则忙于与其他共和国加强双边联系，以增强与戈尔巴乔夫讨价还价的资本。积极推动苏联解体的布尔布利斯回忆说：“还在1991年4月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的代表团多次举行会晤，在此之前就与这些共和国签订了双边协议。这些协议能够成为新联盟条约（没有当局竭力保留的具有极权主义内容的联盟中心）的基础，但是，卢基扬诺夫和戈尔巴乔夫注意到这么做对他们的危险后果，依靠新奥加廖沃进程轻易阻止了我们。”<sup>③</sup> 1991年5月5日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决定建立自己的国家安全委员会。6月12日，俄罗斯举行了历史上第一次总统选举，叶利钦以57.3%的得票率当选为俄罗斯联邦的总统，巩固了自己作为俄罗斯主人的地位。叶利钦当选总统是对中央政权、苏共、俄共的打击，“设立俄罗斯总统，并且赋予他很大的权力，这本身就意味着，在苏联国家大厦下埋下了一个巨大的地雷。在俄罗斯即将出现一个新的，与苏共中央没有任何联系，并且基本不依赖于苏联政府和苏联总统的权力中心，出现一个与苏联竞争的国家”。<sup>④</sup> 戈尔巴乔夫是在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由苏联人民代表选出的，叶利钦则是被民意推上了俄罗斯总统的宝座，使他这个“小总统”比戈尔巴乔夫这个“大总统”更加强有力，同时，波波夫当选为莫斯科市长，索布恰克当选为列宁格勒市长，实际上苏共在俄罗斯联邦已失去了执政地位。

叶利钦当上总统后便开始自行其是。他访问美国，表示要独立自主地与美国发展关系，声明俄罗斯不执行苏联政府制定的下一年的经济计划，禁止各政党和群众性的社会运动和组织在俄罗斯联邦的国家机关、团体、军队和企业中设立基层组织 and 进行活动。对叶利钦针对联盟中央和苏共的这些命令与决定，戈尔巴乔

---

① Барсенков А. С. , Вдовин А. И.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1938—2002. С. 374.

② Союз можно было сохранить. Белая книжка. М. , АСТ. 2007. С. 215—216.

③ Союз можно было сохранить. Белая книжка. М. , АСТ. 2007. С. 220.

④ (俄) 罗伊·麦德维杰夫著，王晓玉等译：《苏联的最后一年》，第46页。

夫无力进行改变。为了争取叶利钦能够签署新联盟条约，戈尔巴乔夫做出了最大限度的让步，联盟中央只保留了制定安全、外交、社会政策以及协调经济活动等权力。1991年7月1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关于主权国家联盟条约草案》的决议，7月23日，各共和国领导人再次在新奥加廖沃举行会晤，苏联最高苏维埃领导人、总理、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均到会。卢基扬诺夫说，最后一次讨论关于主权国家联盟条约最后文本的会议上仍是非建设性的。有人建议从条约中删除提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是主权联邦国家的内容，他们拒绝它有财产权，坚持只有一套税收系统。乌克兰代表在会谈中宣布，乌克兰将不会在9月中旬前决定自己与联盟条约的关系问题。15个加盟共和国中只有8个准备签署条约。<sup>①</sup> 1991年8月16日苏联各大媒体也争先公布了新联盟条约文本。按照新公布的条约文本，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将改名为“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简称仍为苏联。<sup>②</sup> 新条约规定，“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为平等共和国联合组成的联邦制主权民主国家”，“缔约的每个共和国均为主权国家”，结成联盟的各共和国保留独立决定涉及本国发展的一切问题的权利，在国际关系中苏联为一个主权国家，但结成联盟的各共和国有权同外国建立直接的外交、领事和贸易关系。联盟成员国的相互关系原则是：平等、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合作互助、诚实履行根据联盟条约和共和国间协议而承担的义务。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作为主权的联邦制的民主国家，但主权共和国是第一位的，条约规定，在联盟职权范围内，联盟法律至高无上；在共和国职权范围内，共和国法律在本共和国境内至高无上。土地、矿藏、水源和其他自然资源均为各共和国所有。联盟没有税收权，联盟的财政预算要取决于共和国提供多少，条约中没有新的宪法通过的期限，也没有确定参加者的义务。条约自签字之日起生效后，1922年的联盟条约即同时失效。

1991年7月29—30日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纳扎尔巴耶夫在新奥加廖沃举行秘密会晤，戈尔巴乔夫建议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总统不是在9—10月，而是在8月20日开始签署条约。共和国的领导人同意了这一建议，因为他们明白苏联

<sup>①</sup> 转引自 Барсенков А. С. , Вдовин А. И.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1938—2002. С. 375.

<sup>②</sup> 在俄文中“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与“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的缩写一样，都是“СССР”。

最高苏维埃和人代会不会通过这样的条约，而8月份人民代表们正在休假，是签订条约的好时机。在交换意见中戈尔巴乔夫接受了共和国领导人关于在财政预算中实行单一的税收体系的建议。戈尔巴乔夫还同意解除总理帕夫洛夫、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国防部长亚佐夫、内务部长普戈、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主席克拉夫琴科、副总统亚纳耶夫的职务，他们三人商定由纳扎尔巴耶夫任总理。叶利钦在谈到新奥加廖沃条约时说：“我同戈尔巴乔夫突然都清清楚楚地感觉到，我们二者的利益终于相互一致了，这些角色让我俩完全满意。戈尔巴乔夫保住他最高的职位，我则保住自己的独立。这对于我们二人而言乃是理想的决策。”<sup>①</sup>

以为万事大吉的戈尔巴乔夫于1991年8月5日去克里米亚休假，计划8月19日回来，莫斯科准备好在20日的签约仪式。8月19日，以副总统亚纳耶夫为首的强硬派发动了政变，他们本意是挽救联盟，但政变不得人心，只坚持了三天，此事件加速了苏联的解体，正如雷日科夫所说：“我认为政变成了标志我国改革寿终正寝的界石。改革陷于濒死状态了吗？是的，它曾进行垂死挣扎。而现在，改革不可避免地死亡了。不论是侥幸还是倒霉，这迟早会受到历史的审判。”<sup>②</sup> 历史学家麦德维杰夫认为，“苏联的历史已经结束，1991年8月21日这一天，撕下了苏联历史的最后一页。尽管苏联在这之后又垂死挣扎了几个月，但从这一天起，俄罗斯联邦作为一个新的独立国家已经开始了它的历史计时，尽管这个新国家此前只有一个总统——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戈尔巴乔夫说的话，做的事，还有他想干的一切都已经没有任何意义”。<sup>③</sup> “8·19”事变产生了两个直接的后果，一个是使戈尔巴乔夫离开了权力，大大加强了叶利钦的权力，很多人站到了叶利钦一边；另一个是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使各种政治力量，特别是激进力量得到发展，而共产党的力量不再起作用。俄罗斯实际上已经顶替联盟中央，这让许多共和国不满，也促进了独立浪潮的发展。

“8·19”事变后，苏联国内掀起了一场独立的浪潮，各国纷纷发表独立声明，确定总统选举日期，起草宣言。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于8月20—21

---

①（俄）鲍里斯·叶利钦，《总统笔记》，第45页。

②（俄）尼古拉·雷日科夫，高洪山、韩生民等译：《背叛的历史——苏联改革秘录》，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页。

③（俄）罗伊·麦德维杰夫著，王晓玉等译：《苏联的最后一年》，第124页。

日宣布独立，恢复1940年以前的宪法。8月24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宣布承认波罗的海三国独立。

8月24日，乌克兰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宣布乌克兰是独立的民主的国家，从这一时刻起，在乌克兰领土内只有共和国法律机关通过的宪法、法律、法令有效。将于1991年12月1日就批准乌克兰独立的文件在共和国举行全民公决。

8月27日，白俄罗斯和摩尔达维亚宣布独立，30日阿塞拜疆宣布独立，31日吉尔吉斯和乌兹别克斯坦宣布独立，9月9日塔吉克斯坦宣布独立，9月23日亚美尼亚宣布独立，10月27日土库曼斯坦宣布独立。在别洛韦日协定签订前只有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没有宣布独立。

### 叶利钦决定抛弃联盟，苏联解体

尽管“8·19”事变后许多国家宣布独立，但只要俄罗斯联邦不独立，中亚国家也不会独立，就算不能保持原来的大苏联，保持小苏联还是有可能的，关键是叶利钦的态度。戈尔巴乔夫仍在为保持联盟进行着最后的努力，为了争取俄罗斯的支持，戈尔巴乔夫不断向叶利钦让步。1991年8月事件后，叶利钦等人认为应该先签署经济联盟条约，这比签署政治协议简便易行。因此在1991年9月至10月初做的主要是这一工作。该工作由亚夫林斯基具体负责，亚夫林斯基认为主要任务是加强主权国家的团结，以建立共同的市场经济，以利于克服经济危机，他强调加入经济联盟并不一定以签署主权国家政治联盟条约为条件。

经济共同体协定草拟的工作进展顺利，到10月初已经基本完成草案，10月12日在阿拉木图敲定所有条款，10月18日在克里姆林宫有8国签署“主权国家经济共同体协定”，阿塞拜疆、格鲁吉亚、摩尔达维亚缺席，乌克兰派来的是没有被授权的代表。《协定》由十二章59条组成，从苏联已经被破坏这一事实出发，建议分割国家的财产，取消统一的中央银行，允许各共和国有自己的货币，为了使这一协议得以实施，还需再签署20项具体经济领域的补充协议，而这需要至少4个月的时间。戈尔巴乔夫并不想止步于经济共同体协定，他也在加紧拟定新政治联盟条约的工作。但这一进程不断遭到叶利钦等人独立行事的阻挠。10月28日，叶利钦在俄罗斯第五届人代会上表示要独立行事，11月2日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进行了一次谈话，戈尔巴乔夫对叶利钦说：“让我们按男人的方式谈

谈。你改变了政策，从所有谈妥的协议后退了。既然这样，国务委员会、经济协议都失去了意义。既然你想把缰绳抓在自己一个人手里，我提出辞职。我将不参加。我要告诉所有人：看看，朋友们，15个共和国的领导人，我把你们引向独立，现在你们好像不再需要联盟了，那么你们好自为之吧，用不着我了。”叶利钦竭力争辩说自己并没有打算改变政策。<sup>①</sup> 11月4日又召开了国务委员会会议，8个共和国的总统和乌克兰与亚美尼亚的总理参加，戈尔巴乔夫说准备联盟条约进展困难，他希望各国领导人理智和负责任地行事，尽快签署联盟条约，挽救联盟的命运，并没有得到积极响应。戈尔巴乔夫的话讲到一半时叶利钦才到会，也没有表态。纳扎尔巴耶夫说：“我们已经原则上表示了支持，现在需要讨论具体细节……应该一起走向市场经济，如果我们是在经济协议的框架下行事，我没有问题。如果不是，则是另一码事。”<sup>②</sup> 戈尔巴乔夫努力促使新的联盟条约早日签署，11月5日向苏联国务委员会成员分发了主权国家联盟条约草案，未来的联盟定名为主权国家的联盟（ССГ）——具有全权、自愿参加的民主国家的联盟。

11月14日，在新奥加廖沃召开了国务委员会会议，讨论新联盟条约草案，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领导人参加，戈尔巴乔夫表示不能允许联盟解体，但叶利钦马上说舒什克维奇反对统一国家的形式。于是，这些领导人首先讨论联盟的形式。纳扎尔巴耶夫认为：“应该确定，今天集中到这里的人，至少也应该建立一个有统一的军队、领土和边界的政治联盟的愿望。”戈尔巴乔夫坚持应该有统一的国家，舒什克维奇说“这个邦联国家应该有统一的军队”。叶利钦补充说还应该有统一的交通、空间和生态。戈尔巴乔夫则说：“如果没有有效的国家机构，为什么需要总统和议会？如果你们这么决定，我就离开。”叶利钦说他太情绪化。最后叶利钦

---

① АГФ. Фонд №10. опись №2. Союз можно было сохранить. Белая книга. М., АСТ. 2007. С. 366.

② В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КПСС... По записям Анатолия Черняева, Вадима Медведева, Георгия Шахназарова (1985—1991), 2 - е изд., исправ. и доп. М., Горбачев - Фонд. 2008. С. 742.

向记者表示达成了协议，建立的联盟将是民主的邦联国家。<sup>①</sup> 所有领导人都说会有联盟，会议确定1991年11月25日草签。

11月25日在新奥加廖沃举行的国务委员会会议上，提交签署的主权国家联盟条约<sup>②</sup>实际上满足了叶利钦的要求。条约规定：联盟的每个参加者都是主权国家，主权国家联盟为邦联制民主国家，在协议参加国自愿赋予它的权限内行使权力。参加联盟的各有独立决定自身发展一切问题的权利，独立决定自己的民族—国家和行政结构、国家体制、权力机构和管理体制。在国际关系中，主权国家联盟是“主权国家、国际法的主体—苏联的继承国”。联盟拥有一支集中统一的武装力量，条约参加国有权建立自己的军队。<sup>③</sup> 戈尔巴乔夫要求与会者草签条约，没料到叶利钦又变卦了，“戈尔巴乔夫关于草签的声明迫使各共和国领导人对条约内容进行根本修改，主要是使剩余的权力从中央向各共和国转移。苏联总统起初跟与会者好言相商，后来就变得越来越急躁，越来越激动。不管他说什么，就是没有人听。各共和国领袖执拗地要求中央授予更大的独立权，已尝到自由甜头的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真是软硬不吃，使戈尔巴乔夫无能为力。每当戈尔巴乔夫试图坚持自己的某个提法时，我们就异口同声地否定他的提法”。<sup>④</sup> 叶利钦的精彩描述反映了当时戈尔巴乔夫的困境，也说明起决定作用的是叶利钦。叶利钦把戈尔巴乔夫保留联盟国家的努力看成是“拯救戈尔巴乔夫的联盟”。

俄罗斯代表团建议再次回到新联盟条约，取消“邦联制的民主国家”，而用“独立国家的邦联”，声称俄罗斯最高苏维埃还没准备好批准先前达成的方案。此外，叶利钦宣布，签署“没有乌克兰的条约，是无益的事”，他建议要“等乌克兰”，而在12月1日前乌克兰不会举行全民公决。<sup>⑤</sup> 这次会议达成折中的协议，条约将送交各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审议，征得它们赞同后，再由各共和国首脑和苏联总统正式签署。但是，叶利钦实际上并不想签署任何有戈尔巴乔夫政治地位的

---

① В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КПСС... По записям Анатолия Черняева, Вадима Медведева, Георгия Шахназарова (1985—1991), 2 - е изд., исправ. и доп. М., Горбачев - Фонд. 2008. С. 746 - 747.

② 1991年11月27日《真理报》登载了这个《主权国家联盟条约草案》。

③ Союз можно было сохранить. Белая книга. М., АСТ. 2007. С. 395 - 405.

④ (俄) 鲍里斯·叶利钦著，李垂发等译：《总统笔记》，第129页。

⑤ 转引自 Барсенков А. С., Вдовина А. И.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1938—2002. М., 2003. С. 391.

条约，11月28日，叶利钦签署《关于改组俄罗斯联邦中央国家管理机关》的命令，使存在了超过70年的联盟的部和局都转归俄罗斯联邦管辖。实际上叶利钦早就决意埋葬苏联，在戈尔巴乔夫努力保留联盟时，叶利钦却在努力把联盟的机构变成俄罗斯联邦的机构。

1991年12月1日乌克兰全民公决的结果是赞成乌克兰独立，克拉夫丘克当选为乌克兰首任总统，12月3日叶利钦率先承认了乌克兰的独立。12月7日叶利钦率领一班人马，撇开戈尔巴乔夫来到白俄罗斯，与克拉夫丘克、舒什克维奇会晤，决定了苏联和戈尔巴乔夫命运，为苏联的解体进程画上了句号。

叶利钦回忆道：“别洛韦日会谈是秘密进行的，为此甚至动用了特种部队来保卫整个官邸……会议的紧张程度随着分针的移动不断增强。我方参与文件起草工作的有布尔布利斯、沙赫赖、盖达尔、科济列夫和伊柳辛。我们在新的别洛韦日条约的构想和提法上下了很大工夫。显然我们必须当场签署所有这些协议，不能再耽搁了。”<sup>①</sup> 曾参与起草别洛韦日协定的沙赫赖认为，1991年12月1日乌克兰的全民公决为这一解体进程画上了句号，“起先鲍里斯·叶利钦和斯塔尼斯拉夫·舒什克维奇还希望说服列奥尼德·克拉夫丘克以某种形式保留联盟……然而乌克兰总统甚至不愿听到‘联盟’这个词，最后找到了‘联合体’这一形式作为各国在同一个经济、政治和军事空间共存的方式”。<sup>②</sup>

这种说法并不能推卸叶利钦的责任。如果俄罗斯不选择独立之路，苏联不会彻底解体，没有任何一个加盟共和国苏联都可能存在，但是没有了俄罗斯，苏联便不可能存在了。正如美国俄罗斯问题专家所说：“恰恰俄罗斯的利益和民族主义在苏联解体中扮演了主要角色。”<sup>③</sup> 雷日科夫在谈到叶利钦的作用时也说：“为了攫取国家最高权力，他可以无所不用其极。他用自己的行动千方百计鼓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乌克兰的以及其他共和国的民族主义行动，以此作为同国家中央政权斗争的政治杠杆。一旦作出最重要决定的关头来临，他就毫不犹豫地跑到

---

①（俄）鲍里斯·叶利钦著，李垂发等译：《总统笔记》，第131页。

② 沙赫赖：《苏联解体的谎言与事实》，载杨新宇、谢尔盖·沙赫赖、阿利克·哈比布林：《变动中的法与宪法》，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318页。

③（美）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马克·斯坦伯格著，杨烨等译：《俄罗斯史》（第7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93页。

别洛韦日森林去有意识地展开了搞垮国家的行动。”<sup>①</sup>

1991年12月8日，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三个斯拉夫国家的领导人发表声明，并签署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协议，宣布苏联作为国际法主体和地缘政治实体停止存在，苏联作为一个国家的历史结束了。12月21日，原苏联11个加盟共和国（没有波罗的海三国和格鲁吉亚）在阿拉木图签署协定，宣布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并通知戈尔巴乔夫苏联总统的设置被取消。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联总统的职务，克里姆林宫上空飘扬的苏联国旗被俄罗斯联邦的三色旗所取代，苏联从世界地图上消失了。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戈尔巴乔夫作为苏联的最高领导人，在改革之初没有注意到民族问题，没有及时革新联盟，使苏联长期积累的问题没有及时得到解决。他过早推行以民主化、公开性为主要内容的民主化，为地方分离势力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尽管他后来竭力保住联盟，不惜作出巨大让步，但因为地方势力坐大，不与之配合，戈尔巴乔夫难达目标。在苏联解体的最后时刻，起决定性作用的当然是叶利钦。在改革方向上叶利钦早已放弃了社会主义目标，政策难与戈尔巴乔夫一致，他凭借民众的支持和平息“8·19”事变有功，夺取了联盟的许多权力，可他仍不满足，最后决意抛开联盟。苏联正是被叶利钦等人不顾民意埋葬的，其形式类似于一场政变。

---

<sup>①</sup>（俄）尼·伊·雷日科夫著，徐昌翰译：《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第386—387页。

## 74. 苏联人为何“不珍惜”苏联？

黄立第

1991年底，苏联在历史的瞬间剧变：俄罗斯终结社会主义，折回世纪初抛弃的资本主义。苏联剧变的原因何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俄罗斯科学院一位著名的院士曾充满愧疚和负罪感地说：“将苏联送进停尸间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苏联人自己。”岂非咄咄怪事？

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是一个经济和文化落后的农业国：1913年，农民占社会人口66.7%，80%的人口是不识字的文盲，工人阶级比地主、资产阶级、商人和富农还少<sup>①</sup>。苏联在70年间使这个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87年，农民降到占人口12%；苏联不仅摘掉文盲国家的帽子，而且70%<sup>②</sup>以上的居民达到高等和中等教育水平，居民每万人中拥有大学生数量已跻身于世界四强。苏联因拥有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成为与美国争霸的世界第二超级大国。连苏联的对手丘吉尔，都不得不承认斯大林时期苏维埃国家取得的巨大成就：当他接过俄国时，俄国只是手扶木犁的国家，而当他撒手人寰时，俄国已经拥有了核武器<sup>③</sup>。总之，在苏维埃的年代里，国家给了人民知识，还有国家的强大与荣耀……但

---

①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комитет СССР по статистике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 - издательский центр, Народное хозяйство СССР за 70 лет Юбилейный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ежегодник. М., Финансы и статистика. С. 11.

②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комитет СССР по статистике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 - издательский центр, Народное хозяйство СССР за 70 лет Юбилейный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ежегодник. М., Финансы и статистика. С. 523.

③ (俄) 卡尔波夫：《大元帅斯大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792页。

是，1991年，在需要人们起来捍卫苏联的最后关头，虽然多数人在全民公决时表态保留苏联，却没有付诸任何实际行动。这是为什么？莫非是苏联人“忘恩负义”吗？

马克思说：“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让我们循着革命导师的这个论断，走进苏联利益分配的视野，尝试着寻找苏联人“不珍惜”苏联的答案。

## 实现共产主义“无阶级社会”的努力

苏联共产党高举马克思共产主义的旗帜。马克思主义诞生于资本主义自由发展、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尖锐、工人运动风起云涌的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站在被剥削和被压迫阶级的立场上，提出了共产主义的“公平”理念——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阶级、剥削和压迫；消除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还提出了体现这种理念的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没有阶级、阶级对立和阶级差别，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sup>①</sup>

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需要以生产力高度发达为基础。列宁以后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却在苏联与发达国家生产力有很大差距的情况下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按照“俄国化”的共产主义理论建设“无阶级社会”。

十月革命以后，苏维埃政权实施了4次经济战略飞跃，社会结构也随之发生巨大变化。第一次，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改造。1917年—1920年代末，通过大企业国有化、土地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生产资料公有制占绝对统治地位，彻底消灭了剥削阶级和私有农民阶级。第二次，建立社会主义工业体系。在20年代至40年代初进行大规模工业建设，实现了工业化，使占俄国35%以上的农民和城市居民进入国有企业，成为工人与职员。第三次，“赶超美国”。在50年代至60年代，由于苏联人造卫星上天，赫鲁晓夫头脑发热，提出了“全面建设共产主义”的目标，大幅度增加对工业投资，工人继续增加；同时为了在农业中增加国有制比例，将大批集体农庄转为国营农场，大批集体农民实现了向国有农场、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93—294页。

城市工人、职员和学生队伍的社会转移。<sup>①</sup>第四次，经济向集约化转型。勃列日涅夫时期在科技革命的影响下，苏联经济从粗放型向提高质量的集约化转型。为此，在60年代中至80年代中大量培养知识分子，使知识分子取代工人群体，成为苏联社会中增长最迅速的阶层，拉动了社会结构的变动：80年代中期，在国有单位就业的工人和知识分子、职员上升至占人口88.5%，<sup>②</sup>在集体所有制工作的集体农庄农民只占人口11.5%。苏联社会结构趋向单一化，苏联仿佛离无阶级的社会越来越近。

为了实现共产主义无阶级社会的蓝图，苏联还不懈地进行消灭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差别的努力：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五次提高最低工资，提高国营农场职工和集体农庄庄员的工资，使工农之间、脑力劳动之间、高低收入之间收入的差距缩小。

1940年，苏联工业工程技术人员平均工资是工人的2.15倍，1985年降为1.10倍。<sup>③</sup>1970年，国营农场职工相当于工业职工月平均工资近83%，1985年提高到91%。<sup>④</sup>集体农庄农民按家庭成员实际收入与工人、职员逐步接近，1960年是70%，1986年提高到92%。<sup>⑤</sup>职工月平均10%最高工资与10%最低工资差距逐步缩小：1956年是8倍，而1979年降低到4倍。<sup>⑥</sup>

总之，苏联经过70年建设无阶级社会的努力，社会结构日趋同质化；经过消灭三大差别的努力，三大差别逐步缩小。1977年苏联宪法骄傲地宣布：“苏联已经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在“通往共产主义道路上……”<sup>⑦</sup>

---

① Арутюнян Ю. В. Социальная структура сельского населения СССР. М., Мысль. 1974. С. 79.

② Социальное развитие СССР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сборник. С. 46.

③ Народное хозяйство СССР за 70 лет. С. 431.

④ Народное хозяйство СССР за 70 лет. С. 434 – 435.

⑤ Народное хозяйство СССР за 70 лет. С. 441.

⑥ Сухаревский Б. М. Система управлений трудом в развитом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м обществе. М., 1980. С. 205.

⑦ 姜世林、陈纬主编：《世界宪法大全》，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9年版，第1024页。

## 升迁路上的“不公平”与积怨

苏联追求和实现的“公平”出现了悖论。它在追求劳动者内部各阶层收入数量“公平”的同时，制造了另一种“不公平”。

这种不公平是怎样产生的？让我们看看国家怎样调控社会流动，分配社会资源。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期，为了由国家集中调动劳动资源支持工业化，建立了中央集中的劳动资源分配体制——由国家劳动机关一统天下，而没有非国有单位或社会机构调控社会的流动。

在这种体制下，无论招工、招生、大学和中等专业技术学校毕业生分配，还是提级、提职、提职称等各种方式的社会流动，均由国家机关规定指令性计划、指标与程序，并且实施全程由国家机关进行监督——苏联只开辟了一条行政命令式的社会流动和上升渠道。

单一行政命令式社会流动渠道，保持了劳动力的稳定供给和分配，为苏联工业化和经济战略实施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社会流动的单一和统一，引发了诸多矛盾：社会流动的启动和出发点是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人们的愿望、兴趣只能纳入国家战略的框架和指标内才能实现，产生了社会流动单一驱动力与人们多样化的愿望、兴趣和抱负的矛盾；国家统一规定晋升指标，产生了有限的晋升数量与迅速增长的晋升需求的矛盾；由国家统一规定工资标准，加之趋向均等的工资政策，产生了平均的工资数额与才能出众者期望得到更多社会资源的矛盾，以及平均的工资数额与具有远大抱负和超常能力的社会精英向往超常支配社会资源的矛盾……二三十年代，苏维埃政权处于资本主义包围的孤岛中，人们能够理解和支持压抑个人愿望，行政命令式集中调配社会资源建设和巩固国家。但是二战以后，苏维埃政权已经巩固强大，国家已经有条件给予个人职业发展的空间，但是苏联未适时改革，国家仍然以行政分配规制人们多样化的愿望、能力和抱负，这对于千差万别的人而言是不公平的；何况，苏联国家实际上是由少数执掌权力的领导干部来代表的，后来的事实证明，六七十年代以后部分领导干部形成利益集团和特权阶层，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由他们集中分配社会资源，对于人民而言，更是一种不公平。

苏联社会流动渠道的单一，使社会流动渠道狭窄；此外，由于国家严格控制晋升指标，使社会上升迁道路特别拥挤、漫长。人们需要长久地排队，等待晋升，发展的愿望受到压抑，滋生了不满情绪。由于国家将高级技工控制在全体工人1%—4%，青年工人进工厂后提级要等5—10年；<sup>①</sup> 80年代，工人对自己生活不满意占1/2以上。<sup>②</sup> 1960—1980年，知识分子增加2.87倍以上，而拥有博士学位的比例一直停滞在千分之一；拥有副博士学位的比例基本上保持在1.1%—1.4%。<sup>③</sup> 在苏联，拥有博士学位才有资格当教授，拥有副博士学位才有资格当副教授。高级职称指标奇缺，获得高级学位和高级职务的长久等待，使青年科学工作者对工作丧失兴趣，感觉是“囚禁”在工作岗位上。<sup>④</sup> 如果科学工作者的工资在社会上处于高水平，或许由于物质上的相对满足和在社会上有比较优越感，而缓解对学位学衔制度的不满。但是从1960年代末期开始，科学部门和国民教育与文化部门的平均工资在各个经济部门的排序陡降：从斯大林和赫鲁晓夫时期到1982年，科学和科学服务部门的工资从在12个经济部门排序中列第一位，降到第11位，列倒数第二位；国民教育与文化部门的工资从排第6位降到第9位。<sup>⑤</sup> 由于知识分子晋升慢，加之工资额不高，80年代，知识分子对自己生活很不满意、不完全满意、不满意占2/3以上。<sup>⑥</sup>

苏联建立了苏共组织部门集中选拔领导干部的体制——苏联管理资源的流动渠道也是单一化。由于苏共组织部门严格控制干部指标，升至领导干部的数量更少：1980—1985年，领导干部在苏联全体就业者的比例保持在千分之七；高级干部在万分之八以下；<sup>⑦</sup> 由于勃列日涅夫时期以后形成实际上的领导干部职务终身

① Верова А. П. Рабочий класс и научно - технический прогресс в условиях развитого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Горький, Волго - Вятское книж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1981. С. 135—136.

② Институт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рабочего движения АН СССР, Рабочий класс СССР на рубеже 80 \_ х годов Социальные проблемы развития рабочего класса в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м обществе. Часть 2. М., 1981. С. 191.

③ Кугель С. А. Научные кадры СССР: динамика и структура. С. 243.

④ Дмитренко В. П.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XX век. С. 563.

⑤ Кугель С. А. Научные кадры СССР: динамика и структура. С. 192.

⑥ Яновский Р. Г. Социальное развитие советской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С. 147.

⑦ Народное хозяйство СССР за 70 лет. С. 411, 421.

制，使青年干部升迁更加困难：1957—1970年，在党、共青团、工会等机关每1000名领导干部中，大于55岁者增加了46%，小于29岁减少了37%；30—40岁减少了近30%。<sup>①</sup>

在苏联，由于社会上升渠道只有一条，而且上升比率低，导致升到社会上层的人年龄老化：知识分子在50岁以后才可能得到博士学位，领导干部大多在60—70岁以后才有机会升至高位。换言之，占社会多数的精力充沛的中青年工人、知识分子、干部，处于该领域的低级或中级岗位上，享受低的或一般的工资和生活待遇。相当数量的劳动者生活待遇不能适时提高，对劳动报酬制度逐渐不满。在一些地方，部分工人的不满引发了罢工。据苏联著名持不同政见者罗伊·麦德维杰夫披露，从60年代后半期以后，苏联每年都有罢工事件发生。时任克格勃主席的安德罗波夫“几乎每年都要向苏共中央上报这类报告，但是这些自发性的罢工没有引起政治局的严重不安”。“地方上也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以消除引发这些事件的原因”。<sup>②</sup>因此，“70年代下半期，工业工人对劳动报酬数量的不满在增长。”结果引发了新的“罢工”。<sup>③</sup>知识分子，特别是部分年轻知识分子则因对工资低、晋升难不满，演化为对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不认同：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给苏共中央的报告中估计，多数大学生在许多方面把自己看成和党是对立的；1/3以上的大学生从思想观念上不赞成共产主义和苏联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俄罗斯学者认为，戈尔巴乔夫改革以后“知识分子在自己基本的群众中作了放弃社会主义原则的准备。这里，知识分子对社会地位降低不满无疑是如此行动的客观的原因”。<sup>④</sup>

苏联70年间生产力不断提高，但是与西方国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以人均国民收入为例，1987年俄罗斯相当于英国该项指标47.4%，日本46.7%，法国

---

① Итоги Всесоюзной переписи населения 1959 г. Сводный том . М. , 1962. С. 138—139 ; Итоги Всесоюзной переписи населения 1970 г. Т. VI. М. , 1973. С. 454 - 455 , 457 - 458 .

② (俄) 罗伊·麦德维杰夫著，徐葵等译：《人们所不知道的安德罗波夫》，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199—201页。

③ Пихоя Р. Г.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 история власти 1945 - 1991 . С. 371 - 372

④ Барсенков А. С. Реформы Горбачева и судьба союзн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1985—1991 .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осков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 2001. С. 123.

44.8%，奥地利44.5%，德国41.5%，美国39.8%。<sup>①</sup>苏联为了与美国争霸，推行“世界革命”战略，竭力争取军费绝对数额与美国相当。从1967年至1984年，在美国和多数西方国家军费开支占国民收入比重总体呈下降的趋势下，俄罗斯却不断加大该项指标——从12.1%增加到12.6%，结果，俄罗斯军费开支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远远高于西方和美国：达到美国1.4—1.9倍，英国2.3倍，法国2.5倍以上，德国3倍左右，奥地利10倍左右，日本12倍以上。1967—1984年，美国人均军费开支从1049美元下降到968美元；同期，俄罗斯人均军费开支从616美元增加到914美元。尤其不可思议的是，在人均国民收入不抵美国一半的情况下，俄罗斯人均军费开支1975年比美国多90美元，1980年多出128美元。<sup>②</sup>

总之，在高度集中社会资源分配体制下，老百姓难以迅速升迁，影响了生活待遇及时改善；而国家却超常地增加军费开支，使老百姓承受的军费负担越来越沉重。

中国学者指出，“在苏共执政70多年间，苏联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苏共……逐渐失去民心”。<sup>③</sup>

### 苏联人为何“不珍惜”苏联

1991年底，苏联剧变。所谓苏联剧变，如果不考虑意识形态因素，在社会层面，是从国家一个主体对社会资源进行分配的体制，变为允许国家、集体以及社会成员个人等多个主体参与社会资源分配的体制。这种体制变化的实质，是从过去只有国家一把刀叉来分社会资源的蛋糕，由国家决定人们得多少，变为多个政治、经济、社会主体都有权拿起分蛋糕的刀叉，自己参与意见，决定在社会资源分配中得到多少份额。

这种体制变化，是否是苏联老百姓的选择？

<sup>①</sup> 俄罗斯是苏联主体加盟共和国，大体代表了苏联水平。因无苏联相关方面资料，故以俄罗斯数据代之。

<sup>②</sup> Миронов Б. Н. Социальн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периода империи (XVIII—начало XX в.). С. 397.

<sup>③</sup> 江流等主编：《苏联剧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49页。

让我们看看戈尔巴乔夫改革之前，在国家统一分配社会资源主流之下的潜流。苏联专家的研究表明，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国家统一招工、劳动安置的渠道之外，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无法控制的工人流动越来越大；80年代中期，在国家统一分配毕业生的体制下，不服从分配，自谋职业的大学毕业生达到每年毕业生的一半；<sup>①</sup> 部分人由于对自己在社会资源分配中得到的份额不满，自发从事倒买倒卖等影子经济——80年代中期，已有1800万人从事各种形式的影子经济。研究影子经济的俄罗斯专家认为，影子经济除了具有经济职能以外，还有社会职能，“为那些在官方机构中无法施展才能的人提供了一定的社会空间”。<sup>②</sup> 这些社会潜流，不仅表达了对高度集权社会分配体制的不满，表达了人们希望自己参与分蛋糕和多得蛋糕的愿望，而且实际上在官方分配渠道之外，开辟出非正式、自发分配社会资源的渠道。一言以蔽之，苏联社会资源分配权力从集中转向分散，是老百姓的希望和选择。

苏联解体以后有一个民意调查，也颇能说明老百姓在社会资源分配方面的愿望。2003年，俄罗斯科学院综合社会研究所在全俄进行了有代表性的问卷调查，让受询者对俄罗斯5个时代进行评价，这5个时代是：1917年以前的俄罗斯；斯大林时代；勃列日涅夫时代；叶利钦时代；普京时代。问卷提出19项指标，分别对国家的发展和个人的发展进行评价。19项指标包括正面的指标，用来对国家经济、教育、社会保障、社会秩序等各个领域发展的成就进行评价；同时对国家给予个人政治自由度、致富可能以及职业发展和升迁的可能性进行评价。19项指标中还有一部分是负面指标，对每一时代国家发展中是否存在消极现象和问题（如官僚主义、贪污贿赂、族际冲突等）进行评价。

调查结果，对叶利钦时代评价最低：在所有正面指标中几乎得分最少，负面指标中得分最多；对1917年以前的俄罗斯评价一般，在正面和负面指标中均得分平平。对苏联两个时期均高度评价：斯大林时期关于国家发展的正面指标中有4项得分最高：有纪律和秩序；经济发展迅速；在世界上威望高；人民热爱祖国；勃列日涅夫时期有4项正面指标得分最高：教育有成就；有社会保障；科学与技术有成就；工业强大。对普京时期评价，有3项与个人有关的正面指标得分

① 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4. 1985. С. 11.

② Косалс Л. Я., Рывкина Р. В. Социология перехода к рынку в России. С. 87.

最高：个人可能致富；有职业发展和升迁可能；有公民和政治自由。

在负面指标评价中，斯大林时代得到一项最高：恐怖；同时有两项关乎个人的正面指标得分最低：1%的人认为斯大林时代有致富的可能；2.4%的人认为斯大林时代有公民和政治自由；有职业发展和升迁可能性接近最低——3.8%（最低为2.2%，是1917年以前的时代）；普京时代有3项负面指标得分最高：55.7%认为国家有贪污贿赂，55.8%认为有犯罪和团匪活动；49.5%认为不相信自己的未来。

最后一个问题，如果可以选择，你愿意生活在哪个时代。结果是：选择愿意生活在普京时代的人最多，为44.8%；其次是勃列日涅夫时代，为35.8%；第三是斯大林时代，为3.6%；由于对叶利钦时代评价最差，愿意生活在叶利钦时代的人最少，只有1%。

这个民意调查说明，今日俄罗斯人高度评价苏联国家取得的巨大成就和社会主义道路。这不仅因为受询者对斯大林时代和勃列日涅夫时代国家发展的高度认同，对1917年前国家的发展评价一般，而且因为，受询者普遍认为1917年以前的政府已经将个人发展带入死胡同——只有最少（2.2%）的受询者认为，这个时代能给予个人职业发展和升迁的可能。

耐人寻味的是，在这个调查中，俄罗斯人在对苏联国家发展高度评价的同时，对国家给予个人发展空间的3项指标评价不高，甚至在相当程度上是否定的。也许正因如此，多数受询者选择愿意生活的时代，不是国家有秩序、在世界上威望高、经济发展快，而个人发展空间受限制（3项指标平均2.4%）的斯大林时代；也不是尽管国家成就斐然，而个人发展空间平平（3项指标平均18.2%）的勃列日涅夫时代。出人意料，受询者普遍认为国家发展存在着严重消极现象，但是个人发展空间得到认可（3项指标平均52.8%以上）的普京时代。其实，对个人致富、职业发展和升迁可能以及对公民和政治自由的评价，正是对社会资源分配体制和个人在分配中得到份额的评价。多数受询者对苏联时期这3项指标的不认可，反映了对苏联时期中央高度集中社会资源分配体制以及个人分得均等份额的不认可。正是对此的不认可，影响到对苏联整体的态度——多一半的受询者尽管高度评价苏联国家取得的成就，却未选择愿意生活在苏联时代。这或许就是许多苏联人“抛弃”苏联的原因吧。

这个调查还说明，人民由于对普京时期个人发展空间的认可，爱屋及乌，认

可了国家发展存在严重问题的普京时代。这反映出，人民其实用个人福祉做砝码，来衡量国家——从国家是否给予人民广阔发展空间的角度，对国家进行整体评价，并决定对国家的态度。换言之，人民不仅要“国强”，还要“民主”、“民富”。在和平与政权巩固时期，人们尤其认为这三者同等重要。苏联的问题正在于，国家一直用中央高度集权的一把刀，依赖于行政命令在劳动者内部均等地分蛋糕，致使人民与它产生了隔膜、疏离甚至对立。

普京，这位深深地了解俄罗斯人民，因而深受俄罗斯人民拥戴的“民族领袖”，在2008年12月12日接受美国《时代》周刊记者问时，精辟地说明了这一点，他说：苏联“经济领域的行政计划体制和政治领域的共产党一统天下导致国家陷入了如此境地：大多数人已经不再珍惜国家，这样的国家已经不再为人民所需要”。<sup>①</sup>这种体制，是“俄罗斯人民已经不能承受的制度……”<sup>②</sup>

普京的这段话表明，苏联剧变并非苏联人忘恩负义“抛弃”苏联，而是中央高度集中体制的国家已经不再为人民所珍视。

苏联人不珍惜自己曾用鲜血与汗水创建和捍卫的国家的教训，再一次证明“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真理。它向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敲起警钟——执政党没有一劳永逸的合法性。只有立党为公，时时刻刻珍视人民的愿望，给人民谋利益，给人民自主和发展的空间，国家才能得到人民的珍视和需要，执政党才能赢得人民的拥护，并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

① 《普京文集（2002—200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57页。

② 《普京文集（2002—2008）》，第654页。

## 75. 如何认识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的原因与苏联剧变的关系？

陆南泉

1985年戈尔巴乔夫开始执政后，召开的苏共中央四月全会，标志着广大苏联人民对改革抱有希望的开端。虽然改革在某些领域和某个阶段取得了一些进展，一些改革政策及措施得到了实现，但从整个改革过程看，进行得并不顺利，在不少情况下改革处于“空转”状态。改革最后以失败告终，并成为苏联社会经济状况严重恶化和加速苏联剧变的重要原因之一。

本文主要分析戈尔巴乔夫时期改革失败的客观因素、主观原因与对苏联剧变的关系。

### 客观因素——阻碍机制与阻力对改革的影响日益增大

长期以来，笔者在分析戈尔巴乔夫经济体制改革失败原因时，一直特别重视阻碍机制（有人用障碍机制，这是翻译的问题。原文都是 *припятствие механизма*）对其改革所产生的影响，这绝不是一个空洞的理论问题，而是在斯大林体制模式下长期成长起来的、在各个领域让人感觉到的、实实在在存在的种种阻力，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十分顽固的、一时难以克服的机制。笔者认为，这一阻碍机制，由于在斯大林逝世后的历次改革并没有对斯大林体制模式发生根本性的触动，因此，这一机制虽然对社会经济发展和改革产生影响，但并不突出。但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进行根本性体制改革时，情况就不同了，阻碍机制对改革所体现的阻力就开始强化并最后发展到政治冲突的地步。改革刚开始

时，“党领导层的大多数持正统观点的人，总的来说承认有必要进行局部改革”。这是因为，这些人在改革刚开始认为，“这些变革的主要目的是进一步加强单一的权力、单一的所有制和单一的意识形态。”而当改革深化时，特别是从准备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起，这些人看到了改革的观念发生了大的改革，与此同时，对改革的“抵制也加强了，这种抵制马上显露了自己的布尔什维主义本性，即不能容忍异己思维。”<sup>①</sup>

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对经济体制改革作了估价，认为：改革虽有进展，但并没有达到不可逆转的地步，在会上戈尔巴乔夫指出，“改革的进展，是否意味着到处都在全速出现好转和革命性改造已经不可逆转了呢？不，并不意味着是这样。如果我们想分析一下现实的基础的话，那么我们应当承认：……我们还远未消除造成障碍的深刻原因。”<sup>②</sup> 这次会议的根本任务是要深入改革，使改革不可逆转。对此，《苏共中央二十七大决议执行情况 and 深化改革的任务的决议》中明确指出：“改革进程是矛盾的、复杂的和艰难的，是在新与旧的对抗中进行的，虽然出现了积极倾向，取得了初步成果，但在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方面还未发生根本的转折。阻碍机制还未彻底拆除，也未被加速机制所取代。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仍是沿着粗放道路向前发展的。”

应该说，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一开始，就意识到改革的阻力问题，随着改革实际进程的发展，认识在逐步加深。他在苏共中央一月全会（1987年）首次提出了“阻碍机制”之后，在1987年出版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又指出：“改革就意味着坚决果断地破除已形成的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东西，破除经济管理中的陈旧制度和思维上的教条主义的清规戒律。改革会触及许多人的利益，触及整个社会。自然，要破就不可能没有冲突，有时甚至不能没有新旧事物之间的尖锐斗争。只不过是没有什么炸弹的轰鸣和枪弹的呼啸声而已。”<sup>③</sup> 他还在各种场合谈到，围绕改革展开的斗争虽然不表现为阶级斗争的形式，但斗争却是很尖锐的。

---

①（俄）亚·尼·雅科夫列夫著，徐葵等译：《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184—185页。

②（苏）《真理报》1988年6月29日。

③（苏）米·谢·戈尔巴乔夫著，苏群译：《改革与新思维》，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58页。

### （一）阻碍机制的含义与产生的原因

关于这个问题，从苏联领导人到学者，都没有给予一个统一而明确的解释，但基本含义还是比较清楚的。

从戈尔巴乔夫在一月全会（1987年）的报告来看，阻碍机制是指过去长时期内在理论、意识形态、政治、经济、组织等各个方面形成的一种阻碍社会前进的机制。后来，他对此又作了进一步的论述。他指出，30至40年代形成的管理体制，越来越不起作用，相反，阻碍作用不断增长，从而形成了阻碍机制。这一机制在政治方面，表现出这样一个奇怪现象：有教养的、有才干的、忠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人民不能充分利用社会主义所提供的可能性，不能利用其实际参加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经济中的阻碍机制及其社会意识形态的一切后果，导致了社会结构的官僚主义化和各级官僚阶层的“不断繁衍”，这些官僚阶层在整个国家、行政乃至社会生活中都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

苏联驻华大使罗扬诺夫斯基在一次谈话中解释说，阻碍机制是过去的一套机制，不能刺激企业采用新技术和新东西。

莫斯科大学A·布坚科教授撰写了若干篇专门分析阻碍机制问题的文章，他对产生阻碍机制的原因作了深刻分析。在他看来，阻碍机制这个术语虽在苏联是不久前才出现的，但这种现象本身却早已存在。阻碍机制是由那些不能使社会主义可能性得到充分发挥并束缚其优越性被顺利利用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方式和现象，以及管理杠杆和体制组成的。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并不是一定会产生产阻碍机制。苏联出现这个机制，是有其原因的。它实际上是社会历史上形成的、行政和官僚对阶级统治的曲解的副产品。苏联不存在有人有意识地企图阻止苏联社会的发展，也没有人专门设计这种机制。在苏联，阻碍机制的基础是：

从政治关系看，由于苏联政权具有经过周密安排的职务上的等级制度，加上有一个保证国家对经济活动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实行直接集中领导的系统，从而产生党和国家的职能实际上的相互重叠，难以分开，所有大权都集中在由上面任命的、不向人民汇报的行政领导阶层手中。在这种政治制度下，本位主义和官僚主义生长繁殖，使得无论是工人阶级还是全体人民都无法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无法实现自己的国家主人的地位。

从经济关系看，称之为全面所有制形式的国家所有制是苏联政治制度的经济

基础，但这种所有制只把劳动者看做是活劳动的体现者，而未能成为它的主人。在这种高度集中管理国家财产的条件下，这种所有制形式的空洞性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在财产的分配、有效的使用和增加方面与生产者没有现实的利害关系。从社会关系看，由于整个政治经济体制是以庸俗的社会各阶层根本利益一致的思想为依据的，因而对各个社会集团和阶层的利益不相同的观点持轻视和隐讳的态度。

对阻碍机制的基础作了以上的分析之后，布坚科教授得出的结论是：“阻碍机制是僵化的经济形式、陈腐的政治组织体制、无效的领导方法和管理杠杆的总和，它阻碍着已成熟的矛盾的解决，使社会主义优越性得不到体现，束缚着社会主义的顺利发展并使其进步的速度放慢。”他的另一个重要结论是，“官僚主义是阻碍机制的主要社会力量”，为了解答这个结论，再引用另一位苏联学者莫佳绍夫有关分析官僚主义本质问题文章的观点（题为《从利益的不和谐到和谐》）<sup>①</sup>：官僚主义者生活在一切都颠倒过来的“办公室”世界里，他们首先是为个人“谋前程”，在职务的阶梯上提升，当官以及每升一级就随之而来的物质福利和显示自己权力的机会。“当官威风”是官僚主义者相当流行的人生哲学。他们盲目相信硬性规定的形式主义化的行动及现成的世界观和公式，就其本质来说他们是教条式的，对变革特别反感，并疯狂地加以反对。他们压制各种不听“上面”意见和富有创造精神的人，不相信劳动群众的经验和对国家大事的思考。

苏联的官僚主义是在斯大林时期的政治经济体制条件下形成和滋长起来的。当然不能说，所有的各级领导人，都变成了以墨守成规为主要特征的官僚主义者，但也应该看到，患有不同程度官僚主义习气的人，却是厚厚的一层。所以，戈尔巴乔夫执政以来，一再抨击官僚主义是有道理的，它确实成了阻碍机制的主要社会力量。

阿巴尔金在1987年5月访华时，对阻碍机制也作了分析。他认为，所谓阻碍机制是指阻碍事物前进、相互作用的一系列因素，而不是个别的东西和因素。阻碍机制在苏联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教条主义理论；二是在这个理论基础上的经济管理方法；三是苏联国民经济比例本身的失调；四是干部因素，主要是官僚主义。

---

<sup>①</sup> 参见（苏）《真理报》，1987年6月12日。

## （二）阻碍机制对改革体现出来的阻力

在戈尔巴乔夫推行改革过程中，改革遇到的阻力是多方面的，表现形式也是各种各样的。改革的阻力是阻碍机制的具体体现。正如戈尔巴乔夫所指出的：“阻碍机制的具体体现者在反抗，而无所事事、漠不关心、懒惰散漫、不负责任和经营不善也是一种反抗。”<sup>①</sup> 现在苏联“正在就改革遇到的障碍进行激烈的辩论。人们感到担心的是，苏共中央一月全会和六月全会（1987年）的革新决议在实际贯彻中进展缓慢，困难重重。”<sup>②</sup>

### （1）阻力来自中央领导层对改革的不同认识

苏联从领导到学者，在公开场合一向否认苏共中央领导层存在一个改革的反对派。例如，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说：“我们这里没有人从政治上反对改革方针。”<sup>③</sup> 在第十九次全苏党代表会议上，苏共中央书记利加乔夫在发言中说：党的高层领导“是团结一致的，既没有保守派，也没有改革狂”。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普里马科夫在1987年3月访华时的一次发言中说，在苏联并没有改革的反对派。他举例说，在苏共中央一月全会上（1987年）有34位代表发了言，没有一个发言者是反对改革的。普里马科夫所举的具体事例，也许是实情。但并不能以此证明，苏共中央领导层对改革的认识是一致的，在改革的做法、进程等方面的观点是相同的。据各种材料来判断，中央领导层在改革问题上的矛盾不仅存在，有时还表现得很尖锐。戈尔巴乔夫的每次报告和讲话，往往批评阻碍改革的保守势力。保守势力存在于各个阶层，其中也包括中央领导层。戈尔巴乔夫把保守势力作为抵制改革、反对改革的代名词用。保守主义者对当时苏联改革的认识是这样的：改革是整容修理，是粉饰门面，是对现有机制的某种“小调整”，现有机制虽然运转不灵，但总还是在运转，而新机制会带来什么却不清楚。对保守主义者来讲，改革步子迈得大些，对旧体制作根本性的改革，对社会主义一些原则性问题进行反思，就意味着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正，放弃社会主义。

这里我们不妨分析一下在1987年召开的苏共中央十月全会上发生的叶利钦

---

①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著，苏群译：《改革与新思维》，第58页。

② 戈尔巴乔夫在1988年召开的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上的讲话。

③ （苏）《新时代》1988年第2期。

事件。

在这次全会上，发言很踊跃，争论也很激烈。一些人认为当前改革步子过急，慎重考虑不够。有些人不赞成领导层的更换面过大，也有人反对急于改革物价。有些人提出要修改党史，即对苏共历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重新认识，但另一些人则认为这并非当务之急。总之，有不少人不赞成加快改革速度，而是要求放慢改革步伐。针对这一情况，戈尔巴乔夫在十月全会之后的纪念十月革命70周年的报告中指出：“看不到保守势力的反对有所加强是不对的。”

1987年10月21日，叶利钦在十月全会上也发了言，主要批评改革进程缓慢，收效不大，改革主要停留在制订方案、立法与制造舆论方面，缺乏实际行动。叶利钦的发言，被认为是犯了“政治性错误”，而先后被解除了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和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改任国家建委第一副主席。

苏联最高领导层在改革的一开始，在改革问题上的矛盾是非本质的，只是表现为对改革的速度、范围等看法不一。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分歧的性质也逐步发生了变化，这突出表现在改革指导思想上的差别。戈尔巴乔夫等认为，要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必须对传统社会主义一些重要原则进行再认识，这就必然涉及斯大林问题。另外，为了解决人的问题，发挥和调动人的积极性，又必须实行民主化和公开性原则。而另一些人则采取各种形式反对这样做，认为这会引起思想混乱，否定社会主义。他们还认为会从公开性的瓶子里放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妖魔来。

## (2) 来自权力之争方面的阻力

我们常说，改革涉及权力再分配，因此，往往会遭到一些人的反对、抵制。这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会碰到的问题。但在各个国家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从戈尔巴乔夫头几年来的改革情况看，这方面的阻力主要表现在：

1) 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人，他们中间不少人害怕根本性的改革而失去权力。十分明显，苏联今后的改革趋势是不断扩大企业权利，实行企业自治，加强经济民主管理，要求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这样，必然扩大企业领导和行政领导的权力，而从事党的工作的干部的权力将大大缩小，所以，这些人对改革持不积极的态度。

2) 中央管理机关的阻碍作用。在苏联，经过几十年发展起来的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已是根深蒂固，纵横交错，本身就是进行根本性改革的重要障碍

之一。反映集权意志的原有的中央经济管理机关，十分习惯地、顽固地和本能地在起作用。它们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不断地反映出对经济集中控制的要求，不愿放弃自己的权力，总认为没有原来的一套领导方法，一切都会变得很糟，管理部门将不会正常发挥作用。这些也必将成为阻碍改革的一个重要因素。

3) 行政管理机关臃肿，人浮于事，是改革的一个重要障碍。苏联平均每6—7个工人中就有一个管理人员。在旧体制条件下，逐步形成了庞杂的管理机制，习惯于行政命令的工作方法，文牍主义和官僚主义泛滥，往往不能切实有效地进行工作和解决问题。而这次根本性的经济体制改革，要大大精简行政管理机构和裁减行政人员。因此，人数如此众多的各级行政官员的权力将被剥夺，他们就受不了；于是就紧紧抓住过去的东西不放，对改革和新思维持消极态度。这些干部的信条是：“宁可安安稳稳坐办公室挣150卢布，也不愿为500卢布累断了腰。”

这里，为了更清醒地认识这些干部对改革持消极态度的原因，要进一步分析这些干部的特点。在旧体制的长期培养下，出现了一大批富有惰性的干部。这些人习惯于机械地执行上级下达的任务、指标，履行公事，用行政命令领导经济。他们害怕为自己的行动承担责任。要改变工作方法，对这些人来说，是十分困难的。再从管理素质来说，具有积极的经济思维方法的领导干部只占1/4。

### (3) 阻力来自一部分企业领导人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一直把企业领导人视为最支持改革的一个阶层。当时企业领导人要求扩权，反对上级对企业的种种限制。但一旦进行根本性改革，企业要实行自负盈亏、自筹资金，大大扩大企业权限，使一部分企业领导人变得害怕起来，感到风险大，责任大，不希望进行大的改革。另外，还应看到，在企业这一级还有一个实际问题，即有不少企业经营条件不好，长期处于亏损状态，要自负盈亏在短期内不可能做到，这些企业领导人更害怕大的改革。

1987年5月25日，苏联《真理报》用了一个整版的篇幅摘登了来自各阶层人士给苏共中央和戈尔巴乔夫的信。不少信中揭露了基层企业领导人抵制改革的做法：

一是把改革停留在口头上，等待，观望，有时用时髦的口号掩护自己，改革在企业处于空转状态，结果使企业失去宝贵的时间；

二是对中央有关改革决议的态度是：“他们说得容易，他在那里说，我得在

这里和工人一起干”；

三是对基层企业的民主选举，借口目前只是搞试验而显得毫无热情，搞选举也是往往流于形式，有时变成一场闹剧；

……

#### (4) 阻力来自一部分劳动群众

苏联报刊摘登的一位读者来信说：“人民没有把党所开始进行的改革当成自己的切身事业，没有为实施改革承担责任。许多人对党的号召无动于衷，这似乎是一种普遍的气氛。”<sup>①</sup>《旗帜》杂志主编Г·巴格拉诺夫指出：人民是赞成改革的，然而不少人在等待着看看改革能取得什么结果。在苏联产生上述情况，可能有很多方面的原因。

一是随着改革的深入，越来越涉及千百万人的切身利益，涉及整个社会。但人们还没有很好地弄清楚已开始的改革的实质和意义，特别不清楚改革后自己在利益、社会地位方面将会发生什么变化，所以很多人持观望态度。

二是苏联长期以来，有相当一部分劳动者已习惯于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的分配，习惯于在劳动中懒懒散散，不愿受劳动纪律的约束。改革必然要求改变上述情况，而这些人并不想很快改变原来的习惯。

三是因为苏联广大居民的生活水平，虽然赶不上发达的西方国家，但可以说过着较为舒适的生活，达到了小康水平。因此，人们不太想为多挣几个卢布而紧张地劳动，加上多挣了钱，也买不到自己需要的高质量商品。这样，也造成一些人对改革持消极态度。

四是由于人们还没有从头几年的改革中获得明显的实惠。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它大大影响广大群众参与改革的积极性。戈尔巴乔夫执政以来，虽然一再强调要改善食品供应和住房条件，但进展缓慢。特别是食品供应仍令人失望，日用品供应也有很多短缺。总之，由于不少人对进行的根本性改革尚缺乏思想准备和充分的认识，因此，对改革的态度也各不相同。根据当时戈尔巴乔夫谈及人民对改革持不同态度的各种材料，有人加以归纳，大致有以下8种态度：

第一种态度是理解、拥护改革并“热情地投入工作”。

第二种态度是理解、拥护改革，但不主张“转得太急”。

---

<sup>①</sup> 参见（苏）《共产党人》1987年第3期。

第三种态度是“赞成改革，愿意参加改革”，但是“从纯消费的观点看待改革”，“用眼前的好处衡量改革”。

第四种态度是赞成改革，但“不知如何以新的方式工作”。

第五种态度是，“支持新办法”，但却认为“搞改革的不应该是他们，而是上面的某个地方，是另一些人，即党的机关，国家机关，经济机关，其他部门，协作企业，相邻的车间、畜牧场或者建筑工地。简而言之，是所有的人，唯独没有他们自己”。

第六种态度是公开反对改革，并真心认为彻底改革是向资本主义倒退。

第七种态度是“清楚地了解什么是改革”，“知道后果如何”，但却“不接受改革”。

第八种态度是“等待和观望”，甚至不相信改革能取得成功。

阿巴尔金认为，一部分群众对改革的消极态度，对改革是十分不利的。但要改变这种情况也是十分困难和复杂的，需要有个过程；另外改变消费结构和消费政策，使劳动者在消费方面有新的追求和刺激，不断地缩减社会消费基金，扩大付费范围等，这是更为复杂和要担风险的事。

#### (5) 来自“左”的、僵化的理论和思想方面的阻力

在改革过程中，戈尔巴乔夫一直在大力宣传新政治思维，要求人们改变旧观念、旧意识、旧习惯，并一再强调要抛弃教条主义、官僚主义和唯意志论的遗产。应该说，改革的头几年在这方面取得了不少的进展。阿甘别吉扬认为，当时“精神领域的改革正以超越的速度发展着”。这个说法是符合当时苏联情况的。但这远不能说，经过头几年的斗争，已经克服了“左”的教条主义理论。应该看到，对苏联来说，教条主义理论、旧的观念和意识形态，一直是阻碍改革的一个重要因素，它还在处处、时时地起作用。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雅科夫列夫在一次讲话中指出：改革已经两年多了，希望对社会上正在进行的过程和新观点的性质进行科学的分析和理解。然而，处在进步最前哨的社会科学有时却是保守主义的前哨和教条主义的保护者。他批评理论工作者落后于改革实践。<sup>①</sup> 由于教条主义和旧的观念的严重存在，一直有不少人对苏联几十年来第一次出现的思想观念上的社会主义多元论，毫无准备，很不习惯。戈尔巴乔夫对这些人作了以下描述：

---

<sup>①</sup> 参见（苏）《真理报》，1987年11月28日。

“直到现在，我们还听到和读到我们的某些正人君子的严厉指责。有这样一个人迂腐的‘正人君子’，一边走一边用手指着两旁说，这里乱七八糟，那里不成体统，这里不足，那里不够。当有人开始做一件有益的，但不寻常的事时，这位假社会主义者就大喊大叫：你们破坏社会主义基础！这也是改革中的一种实际情况。我们不得不同这些为‘纯洁的’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斗士们进行耐心地争论，他们把社会主义抽象地理想化，认为社会主义是‘一尘不染的’，我们不得不证明生活中没有这样的事。”<sup>①</sup>

讲到传统习惯，不能不提到苏联各阶层存在的严重依赖心理。各地方领导人什么事情都要找中央机关解决。在一些劳动集体流行的思潮是：有领导，让领导去考虑。从而形成以下的连锁反应：工人说，让经理去考虑吧；经理认为，市委或者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应当考虑，而市委和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则指望中央机关。这种传统习惯，白白地浪费了时间，延误了改革的时机和进度。

戈尔巴乔夫为了消除改革的阻力，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曾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提倡新思维，推行民主化方针与公开性原则，不断调整干部队伍，经常分析改革形势与揭示矛盾，加强法制建设，努力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和推行政治体制改革等。

尽管戈尔巴乔夫为消除改革阻力与疏通改革之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是，经济体制改革最后仍然没有取得成功，这是因为，戈尔巴乔夫在改革过程存在不少严重的失误。因此，要说明戈尔巴乔夫经济体制改革失败的原因，仅仅从戈尔巴乔夫上台时因阻碍机制已达到根深蒂固的程度这一个客观因素来分析是不够的。为此，我们还要集中分析改革失败的主观原因。

## 主观原因 —— 一系列改革政策的失误

### （一）在经济体制改革起始阶段，实行加速战略是走错的第一步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在推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不是着力地、及时地调整严重不合理的经济结构，而是实行加速战略，这是迈出错误的第一步。

长期以来，由于苏联片面发展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从而形成了国民经

---

<sup>①</sup>（苏）米·谢·戈尔巴乔夫著，苏群译：《改革与新思维》，第116页。

济结构的比例严重失调，是一种畸形的经济。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农业长期落后的状况，成了影响经济正常发展、改善市场供应、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一个重要因素。

十分明显，在这种条件下，在推行根本性的经济体制改革时，必须同时下大决心和采取重大战略性措施来调整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即在改变旧的经济体制模式同时应及时改变发展战略，使后者与前者相适应，并为前者创造有利的条件。

但是，戈尔巴乔夫在其执政后不久召开的苏共中央四月全会（1985年）上，在分析如何克服经济困难时，就提出了加速战略的思想。1986年二月召开苏共二十七大，正式提出并通过加速战略的方针。当时戈尔巴乔夫虽然强调，加速战略不是粗放的、纯数量的和速度上的加速，速度上的加速是要在集约化的基础上来实现。但从实质上来看，加速战略的重点仍是速度。

现在回过头来看，戈尔巴乔夫的加速战略的主要失败和消极后果有：

第一，加速战略的主要目标，是增强苏联的综合国力，而并不是调整经济结构，缓解紧张的市场，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正如苏联一些经济学家说的：苏联经济的发展政策仍是背离“一切为了人的福利”这个口号的，变形的国民经济结构“是背向人的”。

第二，从那几年的苏联经济发展现实来看，加速战略与经济结构的调整政策存在着尖锐的矛盾。由于加速的重点仍放在重工业，结果是国民经济比例关系更加失调，经济更加不合理，从而使整个经济增长速度上不去。

第三，加速战略的直接后果是，使消费品市场更加紧张，基本消费品在苏联市场上出现的是全面短缺，加上价格上涨，卢布贬值的情况下，只要有点风吹草动，就引起抢购风潮。这种经济状况，使广大群众感不到经济改革带来的实惠，从而对改革持消极态度，逐步失去信心，这又成为推进改革的一大困难。苏联一些学者在总结戈尔巴乔夫头几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时，普遍认为，没有把调整经济结构的政策与经济改革两者有机地衔接起来，而是实行加速战略，这是一大失误，并认为，在结构政策方面，戈尔巴乔夫已输掉了第一个回合。

## （二）经济体制改革未从农业开始，影响了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

根据苏联经济严重畸形的特点与市场供求关系的失衡，改革头几年，应把重点放在解决农业问题上。但戈尔巴乔夫并没有这样做。苏联农业问题的严重性表现在：

第一，长期以来，由于政策上的失误，苏联农业长期处于落后状态。尽管到了勃列日涅夫执政时，对农业投资大幅度增加，但因农业体制的问题，并没有保证农业的稳定发展。

第二，苏联在农业管理方面，一直忽视集体所有制的特点，从而不能使农业因地制宜地发展。这种管理体制，对农业生产所起的消极作用要比工业部门大得多，因此，改变农业管理体制显得更为迫切。

第三，市场供应紧张是苏联长期存在的一个尖锐问题。市场问题中，主要是消费品供应问题，而消费品中最为突出的是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食品问题。居民对食品的要求得不到满足的情况日益严重。据估计，未能得到满足的食品要求近500亿卢布，这相当于全苏食品产量的1/3。苏联通过国营和合作社商业销售的食品有1/6是进口的。解决食品问题，消除它的尖锐性，也就会使社会矛盾的尖锐状况消除70%—80%。

第四，苏联要调整严重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加速轻工业的发展，尽快地增加消费品的供应量，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农业的状况。苏联轻工业原料的2/3和食品工业原料的80%来自农业。

戈尔巴乔夫执政后，虽然一再提及农业和食品问题，但问题在于，一是没有狠抓和实抓，口头讲得多；二是根本没有意识到，根据苏联当时经济情况特别是市场供应情况，经济改革先从农业开始的必要性。只是在1989年苏共中央三月全会才作出了农业改革的决定。时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的阿巴尔金认为，农业改革晚了4年。农业改革的滞后，给苏联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后果是十分明显的。戈尔巴乔夫执政以来，粮食产量一直在2亿吨左右徘徊，1984—1986年，农产品年均增产速度为2.6%，而1987—1989年下降为1.5%。1986—1989年四年进口粮食1.37亿吨，年均进口量为3430万吨，另外，肉、糖、黄油、土豆和水果等进口量日益增加。由于农业改革没有先走一步，因而市场紧张等一系列重大社会经济问题也难以解决，挫伤了群众参与改革的积极性，改革的反对者也利用这一点，使大家厌烦改革。在苏共二十八大会上，农业问题也成为不少代表严厉批评的对象，批评戈尔巴乔夫不重视农业。可见，农业问题的尖锐性、急迫性，在苏联一直没有缓解。

农业改革滞后，是苏联经济改革中的一大失误，后来为苏联许多人士所共识。所以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应先从农业着手改革，这并不是要求搬用中国的做

法，而是在客观上确有其必要性。

### （三）在经济改革过程中，没有注意解决“四个结合”问题

第一，经济发展与经济改革相结合问题。经济改革的目的是为了推动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则又可支持和推动改革，这两者必须妥善地结合。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没有促进经济的发展，反而使经济严重恶化，这必然影响经济改革的进行。

第二，改革中人民的近期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结合问题。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既没有给人民带来近期的利益，也没有使人民看到美好的未来，在此情况下，使人民对改革逐步失去信心。

第三，改革的迫切性与长期性相结合的问题。由于苏联面临严峻的经济形势，人们十分容易看到改革的迫切性，但不少国家改革历史证明，改革的困难与复杂性要比原来想象的大得多，因此，要充分认识到改革的长期性与艰巨性，使改革稳步前进，像苏联这样的大国，旧体制有 70 多年的历史，如果在改革过程中只看到改革的迫切性而忽视其长期性，容易出现失误，会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改革纲领。

第四，微观与宏观改革措施相结合问题。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改革，没有使微观与宏观改革措施衔接起来。微观搞活了，宏观调控措施又跟不上，出现宏观失控。在企业经营机制改革过程中，形成了这样的局面：一方面刺激生产的机制十分弱；另一方面刺激分配的机制的作用却加强。最后的结果是，生产没有发展，而货币工资却大大增加，加剧了通货膨胀，助长了企业小集团利益的膨胀。

出现的另一种情况是，由于宏观调控措施不恰当，难以使微观搞活，像国家订货一度成了变相的指令性指标，这又卡死了企业。

### （四）政治体制改革从失控到迷失方向，使它对经济体制改革起不到促进作用

到了 1988 年，戈尔巴乔夫认识到经济体制改革的阻力主要来自政治体制，下决心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一思路并没有错，问题是如何进行，如何能使政治与经济体制改革互相推动。可是，苏联 1988 年以后推行的政治体制改革，又搞得过激，一下子铺得太宽。结果是旧的政治体制被摧毁，新的又未运转起来，人们的思想倒被搞乱了。这样，正如戈尔巴乔夫自己说的：苏联这艘船成了无锚之舟。它飘落摇曳，大家也随着摇晃。政治体制改革过激产生的主要问题有：

第一，推行“民主化”无度，“公开性”无边，结果是，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无政府状态，中央控制不了地方，法律约束不了行动，劳动纪律松弛，在推行各项政策时，往往出现令不行禁不止的局面。改革失去了稳定的环境，难以做到改革、发展与稳定三者关系的有机结合。这些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生活的正常进行，既阻碍了经济的发展，也阻碍了改革。

第二，在实行党政分开的过程中，由于行动过快，缺乏周密安排，形成了权力真空。在实行党政分开的政治体制方针后，戈尔巴乔夫提出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同时还大大精简政府行政机关和裁减人员。苏联政府原有 51 个部，后减为 28 个部。这样一来，政府的权力大大削弱了，政府十分软弱。最后使经济、经济改革等重大问题，处于“三不管”的局面：党无权管，最高苏维埃无力管，政府无法管。

第三，在对待干部问题上出现了偏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推行改革政策时，适当地调整干部是必要的，但戈尔巴乔夫执政后，干部调整过多，过于频繁。仅 1988 年一年，被撤换的各级领导干部达 13000 多人，其中部长级的 60 多人，共和国、州委一级的达 30%—40%。苏联部长会议成员几乎全部撤换。二是 1987 年召开的苏共中央一月全会，集中讨论了干部问题，目的是消除改革来自干部方面的阻力，但把干部的责任提得十分尖锐，使一部分干部精神很紧张，使他们不能以积极态度来对待各项决议。三是在党的威信下降、党的权力削弱的情况下，有相当多的党的干部，无心工作，更多地考虑自己未来的前途。另外，又看到当时东欧国家政局剧变后党的干部受到冲击，面临失业威胁，更对自己的前途增加忧虑。这些因素，也严重影响着苏联经济改革的顺利发展。

第四，1988 年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后，戈尔巴乔夫对苏联政治形势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处于失控状态，被牵着鼻子走，不得不把主要精力花在处理不断出现的社会政治问题上。1988 年一年，就开了八次中央全会，两次人民代表大会，两次最高苏维埃会议。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可能集中精力来抓经济和经济改革问题。另外，在批判旧的政治体制时，又过多地纠缠历史旧账，强调不留历史“空白点”，引发出一场又一场的大争论，在争论中，又缺乏正确引导，从而出现了对历史否定过头、人们思想混乱、党的威信急剧下降，最后导致苏共垮台，使改革失去了坚强的政治领导核心。对出现的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尖锐性又估计不足。这些情况，对苏联解体都起了作用。

### （五）戈尔巴乔夫把政治领域中实行的妥协策略，运用到经济体制改革中，导致经济改革踏步不前

从戈尔巴乔夫执政以来的情况看，他的政治策略是一种明显的妥协策略。他利用一个极端来削弱另一个极端。在苏共二十八大上，无论苏共纲领，还是他的政治报告，一方面尽量吸取激进派的观点，另一方面又吸收传统派的观点，从而保证以他为代表的主流派的纲领和主张得以通过。戈尔巴乔夫还善于使自己的今天与自己的昨天、明天妥协，即善于不断变化。他在政治领域中采用的妥协策略，在苏联存在各种政治势力、各种思想和流派的情况下，在社会严重动荡的情况下，对稳住他的领导地位，无疑是有用的。但是，这种妥协策略，运用到经济体制改革中来，就会带来十分有害的作用。

第一，要使经济体制改革取得成功，十分重要的一点是，正确的改革方针、方案和措施，一旦以决议的方式确定下来之后，就必须坚决地执行，不能因受到各种阻力而摇摇摆摆。这样会使改革缺乏连贯性和系统性，往往使改革半途而废。妥协策略的一个重要弱点是政策多变。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这类事例甚多。如1987年通过的企业法规定，劳动集体是企业的全权主人，为此，企业要实行自治，企业领导人要选举产生，但因执行过程中产生了一些问题，不久就取消了自治制度和选举制度。又如，为了使企业成为真正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发展商品货币关系，规定要尽快改革价格制度。但由于遇到阻力而一拖再拖。为此，雷日科夫在苏共二十八大的工作汇报中指出：“不管选择价格形成中的哪种方案，不进行价格改革就无法形成市场的道路。要是像1988年那样，表现出不坚决，再次把这样异常复杂但却是客观上必要的任务推迟‘以后’去完成，这将是最大的错误。”妥协策略的软弱性还在改革方法上体现出来。按苏联原来的计划，1988年提出零售价格改革若干方案；1989年第一季度进行全民讨论。这次进行零售价格改革时，甚至有人主张全民表决。在苏联70多年传统体制下生活的人，他们大多数人的心态是：“多挣钱、少干活、不涨价”。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全民表决来决定改革零售价格问题，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第二，使各项经济体制改革的决议内容本身包含着很多矛盾，很难在实际中推行。就拿《苏联所有制法》和《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土地立法原则》来讲，就是各种政治力量妥协的产物。因此，很多问题含糊不清，自相矛盾。以是否存在私有制为例，激进派认为，这两个法没有给私有制留下一席之地，改革难以进

行；传统派则坚决反对出现私有制概念。为了调和这两种不同的立场，在所有制法中用了含有私有制含义的个人所有制和农户所有制等概念。但两个法律通过不久，就遭到很多人的异议，在苏共二十八大纲领声明中，不得不明确地使用劳动私有制的概念。

第三，政策多变使经济体制改革的方针变得模糊不清，使改革的积极支持者和拥护者弄不清改革的方向。这样，改革的拥护者日益减少，对改革领导人信任程度降低，甚至连一些有名的为改革出谋划策的学者，也感到摸不清戈尔巴乔夫经济改革的底牌是什么，究竟朝什么方向发展。

戈尔巴乔夫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的上述失误，使苏联经济在困境中愈陷愈深，是改革彻底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 改革失败加速了苏联剧变的进程

有关苏联剧变与戈尔巴乔夫的关系问题，至今还存在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苏联发生剧变完全是戈尔巴乔夫的责任，说是戈尔巴乔夫对苏联社会主义叛变行为的结果，甚至说他是叛徒。这里只是从戈尔巴乔夫改革与苏联剧变关系进行简要分析。提出一些看法，以求得批评指正。

#### （一）先从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说起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各国先后发生剧变，根本原因或者说深层次原因是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丧失了动力机制，它的弊端日趋严重，成了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阻力，这种模式走不下去了，走进了死胡同。之所以发展到这种严重地步，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带有制度性与根本性的特点；二是斯大林逝世后的历次改革，都没有从根本上触动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这种制度模式，其问题与矛盾日积月累，最后积重难返，使危机总爆发，苏联东欧各国人民对其失去了信任。换言之，当这些国家人民看到世界发展的情况，发现自己的国家大大落后了，除了产生屈辱感外，人们要继续前进，振兴自己的国家，那就只好抛弃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寻觅另一种社会发展道路。也正是这个原因，苏联东欧各国在发生剧变后，无一例外地都宣布彻底与斯大林时期形成与发展起来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决裂，朝着经济市场化、

政治民主化方向转轨。<sup>①</sup>

## （二）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与苏联剧变的关系

人所共知，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时，苏联面临的是严重社会经济与政治危机的局势。戈尔巴乔夫力图通过改革来重建苏联，改变局面。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改革失败，又加速了苏联剧变的进程。苏联剧变发生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但发生在戈尔巴乔夫时期，却有其十分复杂的原因，主要是以下三个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一是经济体制改革本身的严重失误，最后导致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二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严重失误，逐步迷失了改革的方向，使苏共失去了领导地位，从而在苏联失去了领导改革的政治核心力量，最后导致政治局势失控，出现大动荡；三是存在严重的阻碍机制。

关于阻碍机制问题我们在前面已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它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其作用是不能低估的。

根据各种情况的综合分析，在梳理戈尔巴乔夫时期改革与苏联剧变关系问题时，应该作出以下两个不同层次的结论：

第一，戈尔巴乔夫改革的严重失误，特别是后期改革迷失方向，加速了苏联剧变的进程，是苏联剧变的直接原因。

第二，更应看到，苏联的剧变有其深层次的历史原因。正如有些学者指出的，“如仅仅停留在戈尔巴乔夫改革错误这一直接原因去分析苏联剧变，只能是一种浅层次的认识”，因为：“从历史的角度看，任何一件大事的发生总有它的基础的导因，这种基础因素是决定性的，是历史发展中带有必然性性质的东西，由于它们的存在，导致事物在一段时期内的结束。”因此，在指出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剧变问题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同时，应该看到，“这种责任只能是直接意义和浅层次上的，是表面上的，属于导因性质，它诱发了社会内部长期以来的根本矛盾，离开了这些根本矛盾，戈尔巴乔夫的作用便无法去理解，也不可能存在”。<sup>②</sup> 就是说，不要因为苏联剧变发生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而忽略了苏联

---

<sup>①</sup> 这里提出的关于苏联和东欧各国剧变根本原因的基本观点，是作者从1989年以来一直坚持的看法，详见宫达非主编的《中国著名学者苏联剧变新探》一书，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216—220页。

<sup>②</sup>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2年第1期。

历史上长期积累下来的问题，忽略引起质变的诱因，忽略量变背后更为重要的起决定性作用的东西。弄清楚这个因果关系，才能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失败为我们提供的深刻教训作出全面的符合实际的总结。

### （三）戈尔巴乔夫与东欧剧变的关系

1989年下半年波兰第一个发生剧变，接着东欧各国执政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接一个地垮台。

有些学者把东欧剧变的原因归结为戈尔巴乔夫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和对东欧的政策。这些结论是值得商榷的。

第一，要分析一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是在怎样的条件下提出的。1985年3月11日戈尔巴乔夫执政后，就着手进行经济体制改革，1986年2月提出“根本的经济改革”方针。强调苏联的政策是在“有计划地全面地完善社会主义”的方针下进行的。但后来发现，经济改革遇到很大阻力，1987年苏共中央一月全会对前几年推行的改革进程进行了分析，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是：改革的阻力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由于对社会主义概念的教条主义理解而产生的保守主义思想。当时苏共认为，必须迅速改变社会意识，改变人们的心理与思维方式，否则改革就难以推进与取得成功。1987年的下半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出版，接着，在庆祝十月革命70周年的大会上又作了题为《十月革命与改革：革命在继续》的报告。这期间，戈尔巴乔夫对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概念进行了分析与批判，提出改革的最终目的是使社会主义“具有现代化的社会组织形式”，充分揭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人道主义本质”。从戈尔巴乔夫发表的论著与讲话看，有关社会主义的主要论点有：目前的社会主义概念还停留在三四十年代的水平上，而那时苏联面临的是完全不同于现在的任务；在苏联并没有完全贯彻列宁的社会主义思想；苏联改革的目的是从理论和实践上完全“恢复列宁的社会主义概念”。到了1988年6月，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的报告中，首次提出了“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这一概念。但这次代表会议的决议并未采用这一概念，即尚未被全党接受。1989年11月26日，戈尔巴乔夫在《真理报》发表了《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革》一文，系统地论述了“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的概念。1990年召开的苏共中央二月全会，通过了向二十大提出的苏共纲领草案中，才作为党的正式文件用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概念。这个概念大致包括以下内容：人道主义与自由，强调人是社会

发展的目的；公有化的和高效率的经济；社会公正；真正的人民政权；高度的文化素养和道德；主张和平与合作。

从上述分析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概念到1990年才正式形成，在苏联也仅在付诸实践之中，而东欧国家1989年就先后发生了剧变。当时人们并不十分清楚戈尔巴乔夫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是什么含义。

第二，再分析一下戈尔巴乔夫对东欧的政策。1987年4月，戈尔巴乔夫访问捷克斯洛伐克的讲话，被认为是苏联对东欧政策转折的标志。在这次讲话中，他谈了苏联对东欧国家政策的一些最主要的原则：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谁也无权追求特殊地位”，“各国经济上应互助互利”，“政治上应以平等和相互负责为基础”，“各国党对本国人民负责，有权自主解决本国发生的各种问题”。这次讲话也谈了要“协调行动”，“关心共同利益”，“不能只关心自己利益”。与过去明显不同的是，戈尔巴乔夫明确宣布，东欧各国在国内建设上不必像过去那样把苏联的经验当成样板，可以从本国特点出发，制定自己的改革政策，不必遵守苏联制定的共同规律等。在外交上也不再强调一致行动。在庆祝十月革命70周年大会的报告中，他还首次把“和平共处原则”列为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必须遵守的原则”。

可以说，戈尔巴乔夫对东欧政策的调整内容无可指责。2002年1月25—27日，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召开了《冷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学术讨论会。在会上，笔者向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罗伊·麦德维杰夫教授提出一个问题：当东欧各国先后发生剧变时，当时的苏联、戈尔巴乔夫能做些什么？他回答说：可考虑的只能做两件事：一是提供大量经济援助；二是军事镇压。他接着说，从客观情况来看，提供经济援助对当时的苏联来说是不可能的，因苏联本身经济处于极其困难状况。至于军事镇压，那是不可想象的事。这些都说明，当东欧各国广大民众起来斗争，要求抛弃强加在他们国家的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寻觅新的社会发展道路时，不论是提供经济援助还是军事镇压都无济于事。戈尔巴乔夫在其以后的著作中也写道：“还有人说，我们失去了东欧的盟友，在没有得到补偿的情况下把这些国家‘交出去了’。但是，我们把他们‘交’给谁了呢？交给了他们自己的人民，那些在自由表达意愿的过程中选择了符合他们民族要求发展道路的人民。”有人提出，当时戈尔巴乔夫应“拯救”东欧各国，他回答说：“拯救”它只有一个办法了——开坦克进去（就像196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一样）……还

有就是这样做会带来一切可能的后果，包括发生全欧战争。”<sup>①</sup>

实际上，东欧各国先后发生剧变后，在1990年召开的苏共二十八大上就讨论了这个问题：苏联，当然主要是戈尔巴乔夫应负什么责任，是不是苏联外交的惨败。这是时任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在大会上发言时，有位代表向他发问的一个问题。外长回答说：“如果我们的外交尽力不让邻国发生变化，如果因此而使我们同他们的关系恶化和激化，那才是惨败。苏联外交没有也不可能抱着这样一个目的：反对别国消除别人强加给它们的、与它们格格不入的行政命令制度和极权主义政权。这样做就会违反我们自己行动的逻辑和新政治思维的原则。再有，即使东欧发生的事不符合我们的利益，我们也决不会干涉这些国家的事务。这样的干涉是不可取的，因为我们今天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承认国家平等、人民主权，不干涉它们的事务，承认他们有自由选择的权利。采取任何别的立场，就是滑向十足的沙文主义和帝国大国主义，这是违背真正共产党人一贯宣布的那些原则的。”<sup>②</sup> 苏共中央国际部部长法林代表“苏共国际活动”小组发言时指出：“把多数东欧国家共产党失去领导作用同我们的改革联系起来，完全是无稽之谈。小组会列举了许多事实，证明苏共中央了解这些国家的潜在进程，并在不干涉内部事务和尊重各国人民选择权利原则的情况下，努力对局势施加影响。”足以说明问题的是，从1986年起，戈尔巴乔夫同东欧国家领导人举行了103次会晤，苏共中央其他领导人同他们举行了147次会晤。<sup>③</sup>

## 对戈尔巴乔夫时期的研究应注意的问题

第一，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失败了，但不能因此对其在改革过程中、在对苏联社会主义重新思考基础上提出的新看法，采取简单的完全的否定。例如，戈尔巴乔夫一再强调，要把解决人的问题作为改革的指导思想，一切事情都必须从人出发。戈尔巴乔夫之所以把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与解决人与人权问题联系起

---

<sup>①</sup>（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著，徐葵等译：《对过去与未来的思考》，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259页。

<sup>②</sup>（苏）《真理报》1990年7月5日。

<sup>③</sup>《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资料汇编》，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22—223、454页。

来，这是因为传统体制的一个根本要害问题是践踏了人，不尊重人的社会价值和尊严，把人视为集权管理体制上的一个螺丝钉。这样，使广大劳动者疏远政权、公有制与管理，使人的精神与肉体处于麻木的半睡眠状态，导致思想的单一化和停滞不前，社会缺乏活力，从而产生异化，严重挫伤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生产效益低下，浪费严重，最终结果是使社会主义濒临危机，无法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些理论观点，是值得我们去研究的。

第二，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其本人的研究，由于十分复杂，有些问题不能说已弄得十分清楚了，因此，在一些问题上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是十分自然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再说，不同意见的争论，对深化研究也是有益的。戈尔巴乔夫执政近7年，在苏联历史上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正如俄罗斯总统普京于2001年3月2日向戈尔巴乔夫祝贺70寿辰的信中说的：“应该把戈尔巴乔夫的名字与整个时代联系在一起。”站在这样一个高度研究这一时期的苏联与改革，有利于研究的深化。

那种把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的改革，无论从整个国家来说，还是对戈尔巴乔夫个人来说，说成“改革早已成为一系列大大小小的背叛行为”，说戈尔巴乔夫“一次再次宣誓忠于社会主义，以此为烟幕，暗中实际上进行改变社会主义制度的准备”。<sup>①</sup> 这些结论，并不符合戈尔巴乔夫执政近7年过程中的行为。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戈尔巴乔夫到他执政最后一刻，还在为维护联盟作努力。1989年底以前，戈尔巴乔夫从未表明过有实行多党制的意向，后来，与叶利钦斗争过程中不断妥协，到1990年3月才同意修改宪法第6条。这怎么能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早已成为一系列背叛行为呢？的确应该理性地来研究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的改革。

第三，讨论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的各种重大问题，都应该本着双百方针的精神进行，不要把不同意见和不认为戈尔巴乔夫是叛徒的人，说成是“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叛徒开脱和辩护”。<sup>②</sup> 这种扣政治大帽子的做法不利于开展正常的学术讨论，也达不到追求真理的目的。

---

<sup>①</sup>（俄）尼·雷日科夫著，王攀等译：《大动荡的十年》，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380页。

<sup>②</sup>《真理的追求》2001年第6期。

## 76. 邓小平是如何看待和应对苏东剧变的？

林蕴晖

1992年初春，88岁高龄的邓小平从1月17日离开北京，途经武昌、长沙，于19日抵达深圳，23日到珠海，31日到上海视察，2月21日返回北京。沿途与当地领导人作了攸关中国社会主义命运的一系列重要谈话。对这次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当时很多人不理解，认为邓小平已正式退休，如此重大的问题，不在北京当面与中央领导层直接对话，仅从组织层面看，也是欠妥的。当我们把邓小平这次南行，放到当年的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下考察时，就不难看出这完全是客观形势使然。

### 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

1989年6月，波兰统一工人党在选举中遭到惨败，由胜选的团结工会进行组阁，波共由此失去政权。接着是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10月发生分裂，自动放弃了政权。11月，捷克斯洛伐克议会通过宪法修正案，取消了捷共在国家的领导地位的规定，因而也失去政权。11月9日柏林墙倒塌，民主德国并入联邦德国。在此同时，罗马尼亚共产党政府被群众推翻。1990年4月，保加利亚共产党改名为社会党，随后实行多党选举。1991年12月，苏共解散、苏联解体。当年的社会主义阵营，竟然在短时间内像多米诺骨牌那样倒了下去，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

就在东欧发生剧变的最初时刻，中国国内在1989年春夏也发生了一场政治风波。综合国内外出现的复杂形势，有人提出要反和平演变，一些人指责赵紫阳

主持的改革所选择的是资本主义改革方向。一时间，宣传舆论中反和平演变的声浪调高。报刊上连连发表反和平演变，批市场经济、私有化、民主社会主义的文章。提出经济建设、阶级斗争是国内的两项中心任务，甚至提出反和平演变是当前的中心任务。

在这种背景下，本来就存在的一种担心改革开放会滑向资本主义的思想情绪增长，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因而对改革开放中许多问题提出疑问和诘难：有人担心办经济特区是搞资本主义，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发展资本主义。有的认为，由于允许私有制和个体所有制经济的发展，中国内地正在产生一个新的资产阶级，正在出现一个企图摆脱共产党领导和公有制的利益集团和社会阶层，向我们挑战。有的认为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正在和可能导致两极分化，脱离了社会主义原则，等等。提出，当前的主要问题不是如何深化改革，而是要划清是社会主义改革，还是资本主义化的“改革”。主张改革开放的每一步，都要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

上述争论，突出反映在计划与市场问题上。一些人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直接同坚持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联系起来。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只能是计划经济”，“把改革的目标定位在‘市场取向’上，把‘市场经济’作为我们社会主义的目标模式，就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范畴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范畴混淆了”。进而断言：“市场取向等于资本主义取向”，“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取消公有制，这就是说，要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搞资本主义”。

以上表明，1989年国内的政治风波和此后发生的苏东剧变，使中国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改革开放走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摆在人们面前的问题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十三大确定的路线和发展战略是否应坚持下去？中国的改革方向是否要重新选择？

### 苏东剧变的教训何在

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各国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兴起的改革，竟然最终导致共产党失去政权的后果，其原因何在？可以说是见仁见智。相当一部分人

坚持认为，是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导致的恶果。事实果真如此吗？请看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究竟说了什么：

“我们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党和托洛茨基主义者及右翼资产阶级国家主义者进行激烈的斗争并在思想意识领域内解除了列宁主义的一切敌人的武装。这一思想领域内的斗争获得了成功，其结果是强化党，锻炼了党。在这里，斯大林起了积极的作用……如果1928—1929年前后兴起的右翼政治路线在我们中间得到蔓延的话，如果我们沿着‘复兴服装工业’（原注：指轻工业重点主义）及保护富农的方向前进的话，事情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呢？恐怕我们今天不会拥有强大的重工业了，恐怕也不会有集体农庄了，恐怕我们已在资本主义包围之下解除了武装而变得衰弱不堪了。

“众所周知，在列宁去世后，尤其在最初几年，斯大林曾为捍卫列宁主义而和那些列宁主义理论的敌人，那些背离了列宁主义的人们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党在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捍卫着列宁主义，并大规模地开始了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和文化革命，当时斯大林的威望很高，并得到了一致的支持。党必须和企图侵犯我国、背离马列主义正确道路的人们，即和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右翼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进行斗争。这种斗争是绝对必要的。”

“秘密报告”对斯大林所以犯错误的原因，如是说：

“同志们！为了不至于重犯过去的错误，中央委员会宣布，坚决反对个人崇拜。我们认为：以前对斯大林进行了过度的称颂。当然，在过去，斯大林无疑对党、对工人阶级以及国际工人运动作出了伟大的贡献。这些现在变得复杂起来了，因为我们现在指出的所有这些（指20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引者注）都是在斯大林同意之下做出来的。斯大林认为这些措施都是捍卫工人阶级利益，他是从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来处理这些事的。我们不能把这些说成是错误的暴君的行为。他认为，为了党和劳动群众的利益，为了捍卫革命的成果，必须这样做。这就是一切悲剧之所在。”

以上引文向我们表明：

“秘密报告”对列宁逝世以后，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斯大林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反对派的斗争作了完全的肯定，认为这是一场捍卫列宁主义的斗争，是在苏联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的斗争，没有这场斗争的胜利，也就没有苏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集体化的胜利，也就没有苏联的

社会主义。值得指出的是，这里肯定斯大林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中“起了积极的作用”，不只是肯定了斯大林的领导作用，而且把斯大林作为捍卫列宁主义的代表肯定，更是对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肯定，也就是对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的肯定。

正因为如此，国内的苏联问题专家对赫鲁晓夫的改革有如下评说：在国内改革问题上，与其说赫鲁晓夫失之于离开社会主义方向，还不如说失之于未摆脱传统的体制而改革不彻底。赫鲁晓夫既没有改变斯大林时期的经济管理理论和产业结构，也没有完全抛弃行政命令的管理体制和方法；既没有调动起工农群众真正的生产积极性，也没有依靠一批得力的智囊、充分发挥知识和科技的力量。<sup>①</sup>

如果说，上述看法只是学者的声音。那么，我们不妨听听从1954年开始就任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到1989年下台整整主政35年的日夫科夫是怎样反省的。

日夫科夫说：我们共同体各国的社会主义悲剧。我们将向马克思做什么样的总结呢？显然，在这个总结中不能漏掉马克思如何经常从源头、从主要方面被伪造。他被伪造得已不成其为马克思了。还有，不能漏掉马克思所奠定的原理怎样没有被进一步发展，以致使我们能从所处的死胡同里找到出路。特别重要的是，它没有被进一步发展到让我们能够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最使我失望的是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问题仍没有完全弄清楚。在很大程度上马克思仍旧像斯大林著作中已定型的那样。而这种情形，总的来说，在斯大林死后也一直保留下来。问题越来越紧迫，却没有找出那种决定社会主义本质的东西。这里指的是社会主义的原则。“几十年来，社会主义就是按照那些为它后来的垮台奠定了基础的‘原则’建立起来的。”<sup>②</sup>

那么，曾被认为是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原则是什么呢？简单说，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制+计划经济+无产阶级专政。日夫科夫称，这是斯大林著作中已定型的社会主义。这个社会主义是从源头“被伪造得已不成其为马克思了”。遗憾的是在斯大林死后也一直保留下来。

---

① 陈之骅主编：《苏联史纲（1953—1964）》，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10页。

② （保）托尔多·日夫科夫著，吴锡俊，王金柏等译：《日夫科夫回忆录》，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226—229页。

斯大林死后，苏联和东欧国家，曾经因长期积累的矛盾而不断试图进行改革，这就不可避免地要触动到被奉为经典的社会主义原则，于是就碰到了如日夫科夫所说的，“要还是不要社会主义”，<sup>①</sup>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是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成了所有社会主义各国领导人难以逾越的障碍。

历史就是这样发展过来的。国内东欧问题专家就东欧各国的经济战略、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存在的问题有过如下分析：一是东欧长期仿效苏联实行以速度为中心的赶超战略，其核心是“优先发展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化”，其结果是导致国民经济结构严重失衡，食品和日用消费品严重短缺。二是始终没有明确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一方面要建立产品的自由市场，另一方面又不让劳动和资本进入市场，各国对经营不善的亏损国营企业，不是向市场引导扭亏为盈，而是由国家直接包揽扶植（匈牙利每年以2000亿福林，占国家预算开支35%的资金补贴这些企业；保加利亚每年的补贴资金也达5.67亿列弗，相当预算支出的25%）。三是财政补贴与高举外债，为安抚人民对生活水平下降的不满，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1983、1984两年，东德就求救于西德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巴伐利亚州总理施特劳斯，从西德借了20亿西德马克。<sup>②</sup>日夫科夫说：“民主德国是当时我们常开玩笑说的‘尽管居民生活水平高，但还吃着两头母牛的奶的国家’”（从经互会和联邦德国得到援助和贷款）<sup>③</sup>，各国长期违背价值规律，实行大量补贴的政策而高举外债，以稳定物价，结果是加快触发了经济危机。正是由经济危机，导致政治危机。<sup>④</sup>这才是东欧和苏联共产党最后倒台的深层原因。

## 中共高层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对策

与日夫科夫等苏联、东欧共产党领导人不同，在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就

---

①（保）托尔多·日夫科夫著：《日夫科夫回忆录》，第227页。

②（德）克里斯塔·卢夫特著、朱章才译：《最后的华尔兹——德国统一的回顾与反思》，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第62页。

③（保）托尔多·日夫科夫著：《日夫科夫回忆录》，第237页。

④ 阚思静、刘邦义主编：《东欧演变的历史思考》，当代世界出版社1997年版，第11—15页。

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提出质疑，指出：总结历史经验，最重要的一条经验教训，“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sup>①</sup>又说：“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sup>②</sup>这可以说是提出了一个划时代的问题。它不单纯是从中国本身的曲折发展中悟出，更是纵观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悟出来的。因此，邓小平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取向，一经明确就坚定不移。

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取向，应该说是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步明确的。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认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开始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进一步明确了把市场经济作为深化改革的方向。赵紫阳在十三大报告中指出：“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国家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调节市场供求关系，创造适宜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以此引导企业正确地进行经营决策。”并提出要加快建立和培育社会主义市场体系。赵紫阳说：“社会主义的市场体系，不仅包括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等商品市场，而且应当包括资金、劳务、技术、信息和房地产等生产要素市场，单一的商品市场不可能很好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社会主义的市场体系还必须是竞争的和开放的；垄断的或分割的市场不可能促进商品生产者提高效率，封闭的市场不利于发展国内的合理分工和促进国际贸易。”<sup>③</sup>

根据十三大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必须积极而稳步地推进价格改革，理顺商品价格和各种生产要素价格的要求，1988年春夏，中央政治局多次讨论改革和经济形势，决定把价格改革提上日程。中央领导人和报刊舆论号召人民“攻坚”、“闯关”。当时，由于绝大多数人还缺少思想准备，这股价格改革之风迅速引发了一场经济风潮。价格改革受挫，中共中央不得不在9月下旬召开的十三届三中全会上，作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

从稳定经济形势，调整改革步伐来说，上述决定是必要的和正确的。但在同

---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7页。

③ 赵紫阳：《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1987年10月25日），《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7、29—30页。

时，也增强了一部分主张加强计划调控的领导人的分量。1989年夏季国内的政治风波，更使原来对向市场改革所持的不同意见占据主导地位。因此，还在政治风波尚未平息的5月31日，邓小平在同李鹏、姚依林谈话中就有针对性地指出：“改革开放政策不变，几十年不变，一直要讲到底。国际国内都很关心这个问题。要继续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连语言都不变。十三大政治报告是经过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字都不能动。这个我征求了李先念、陈云同志的意见，他们赞成。”<sup>①</sup>

与此同时，邓小平对东欧和苏联的政局一直给予密切的关注。1989年9月4日，邓小平在同中央常委的谈话中指出：“东欧、苏联乱，我看也不可避免，至于乱到什么程度，现在不好预料，还要冷静地观察。在这些国家动乱的时候，中国要真正按计划实现第二个翻番，这也就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成功。……现在的问题不是苏联的旗帜倒不倒，苏联肯定要乱，而是中国的旗帜倒不倒。因此，首先中国自己不要乱，认真地真正地把改革开放搞下去。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希望。”<sup>②</sup>

1990年3月3日，邓小平在同江泽民、杨尚昆、李鹏谈话时，针对国际局势的变化，再次向他们指出：“综观全局，不管怎么变化，我们要真正扎扎实实地抓好这十年建设，不要耽搁。”“现在特别要注意经济发展速度滑坡的问题，我担心滑坡。”邓强调说：“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工资增长被通货膨胀抵消，生活水平下降，长期过紧日子。如果经济发展老是停留在低速度，生活水平就很难提高。人民现在为什么拥护我们？就是这十年有发展，发展很明显。假设我们有五年不发展，或者是低速度发展……会发生什么影响？这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邓小平还严肃指出：“要实现适当的发展速度，不能只在眼前的事务里面打圈子，要用宏观战略的眼光分析问题，拿出具体措施。”<sup>③</sup>

鉴于对苏东剧变原因的不同认识，和对中国经济改革方向的争论。1990年7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邀集一批经济学家座谈经济形势与对策，座谈一开

---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6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4、355页。

始，就在改革是“计划取向”还是“市场取向”发生激烈争论。持“计划取向”观点的人强调，社会主义只能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市场调节只应在国家计划许可的范围内起辅助作用而不能喧宾夺主。他们认为，1988年的通货膨胀和1989年的政治风波，都是由于采取“市场改革取向”错误路线的结果。所以必须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口号。主张“市场改革取向”的人强调，必须坚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路线，维护市场取向的正确方向，批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口号是从十二届三中全会和十三大后退，应当恢复原来的提法。

12月24日，邓小平同江泽民、杨尚昆、李鹏谈话，针对十三届七中全会通过的新的五年计划和十年规划，邓小平表示赞同。同时向他们指出：“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资本主义就没有计划控制，就那么自由？最惠国待遇也是控制嘛！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sup>①</sup>

1991年2月6日，邓小平在上海视察。陪同的朱镕基向邓小平谈到还有不少人认为合资企业不是民族工业，害怕它的发展等问题时，邓小平说：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都要搞开放，西方国家在资金和技术上就是互相融合、交流的。改革开放还要讲，我们的党还要讲几十年。会有不同意见，但那也是出于好意，一是不习惯，二是怕，怕出问题。他再次重申：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sup>②</sup> 2月18日，在听取浦东开发规划汇报时，邓小平感叹上海开发晚了，他叮嘱说：要努力干啊！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sup>③</sup>

在上述背景下，1991年三四月间，上海《解放日报》以皇甫平署名发表《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等三篇评论文章，提出：改革要深化、开放要扩大；

---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4页。

②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册，第1326—1327页。

③ 《邓小平年谱》下册，第1328页。

“我们要防止陷入某种‘新的思想僵滞’”；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认为“如果我们仍然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还指出：“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这种科学认识的获得，正是我们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上又一次更大的思想解放”。此后，一些省市的党政负责人相继发表文章、讲话，谈论加大改革力度的问题。这既有邓小平内部谈话的背景，也是客观经济生活的要求，它使人们感到改革必须向前推进，既不能维持现状，更不能向后退缩。

然而，上海皇甫平的文章，在北京引起强烈批评。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各大报纸发表一系列文章，对“进一步解放思想，防止思想僵滞”的观点作严厉批评，认为现在不是解放思想不够，而是过了头。现在的问题不是思想僵化，而是到底改革是改到资本主义那里去，还是改到社会主义那里去的问题。文章诘问说：“为什么不能问姓社姓资？”“你不要问姓社姓资，且问你贵姓什么？”

事实证明，邓小平苦口婆心的耐心等待，没有得到应有的回应。

## 邓小平南方谈话拨正航向

1991年8月19日，苏联发生由副总统亚纳耶夫等8人成立紧急状态委员会，罢黜总统戈尔巴乔夫的事件。在此之前，邓小平对党内存在的不同意见曾经说过：“太着急也不行，要用事实来证明。”<sup>①</sup>这时，他从苏联局势的剧变中产生了一种紧迫感。8月20日，邓小平同江泽民、杨尚昆、李鹏、钱其琛谈话，议论19日苏联发生的事件。邓小平对他们说：总结经验，稳这个字是需要的，但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特别要注意，根本的一条是改革开放不能丢，坚持改革开放才能抓住时机上台阶。现在世界发生大转折，就是个机遇。我们不抓住机会使经济上一个台阶，别人会跳得比我们快得多，我们就落在后面了。<sup>②</sup>10月5日，邓小平在会见来访的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时说道：“东欧、苏联的事件从反面教育了我们，坏事变成了好事。问题是我们要善于把坏事变成好事。”<sup>③</sup>

① 《邓小平年谱》下册，第1327页。

② 《邓小平年谱》下册，第1331页。

③ 《邓小平年谱》下册，第1332页。

在这敏感时刻，《人民日报》10月23日发表《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掌握处理矛盾的主动权》的署名文章，指出：“我国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谁战胜谁的矛盾，远未解决。在现阶段，这个矛盾集中表现为四项基本原则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矛盾和斗争。”“由于国际国内历史条件的变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矛盾和斗争，比建国以来任何时期都要鲜明、激烈、尖锐。”“我们必须十分清醒地看到，我们的改革开放是在复杂、严峻的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环境中进行的。国际国内的反动势力总是精心玩弄诱导与逼迫两手策略，妄图把我国的改革开放引上资本主义轨道，融化进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去，最终把中国变为西方大国的附庸。因此，作为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改革开放与妄图把社会主义‘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的改革开放的矛盾和斗争，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如果我们不能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个矛盾，在改革开放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与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开放作坚决的斗争，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就会在上述矛盾的发展中毁灭。”文章强调：“全部问题的关键在于：执政的工人阶级政党能否掌握处理矛盾的主动权。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如果丧失了处理矛盾的主动权，失去了驾驭矛盾发展的能力，就会被矛盾的发展所埋葬。当代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发生曲折所提供的教训，应该牢记。”<sup>①</sup>

12月25日，苏联不复存在。就在苏联解体后仅20天的1992年1月17日，邓小平起程南下，开始他的历史性的南方之行。其不同寻常之处，在于在当时国际国内的大背景下，邓小平是带着对中国改革开放极其忧虑、极其紧迫的心情上路的。

邓小平在沿途与各地领导人的谈话，中心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方向不能动摇。他极其坚定地指出：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

---

<sup>①</sup> 《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掌握处理矛盾的主动权》，《人民日报》1991年10月23日。

答应，谁就会被打倒。这一点，我讲过几次。<sup>①</sup>

针对姓“社”姓“资”的争论，邓小平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他再次阐述了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的道理，并语重心长地告诫人们：“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的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sup>②</sup>邓小平强调说：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邓小平还要人们懂得，最终还是要由人民来选择。他说：人民，是看实践。人民一看，还是社会主义好，还是改革开放好，我们的事业就会万古长青！<sup>③</sup>

由上可见，真正看透社会主义在苏联、东欧各国失败根本原因的人是邓小平。如果说，1989年东欧各国共产党纷纷倒台，已经引起他的高度警觉，因而不断同中央领导人谈话。但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大国苏联，竟然也在一夜之间倒塌下来，这就不能不使邓小平产生一种紧迫感。也就是说，如果再继续这样喋喋不休地争论下去，中国就会错过时机，有导致改革夭折的危险。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邓小平这时何以采取这种不寻常的方式了。

中共十四大接受了邓小平的意见，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拨正了改革开放的航向。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之行，也以开启中国改革开放的新阶段载入史册。

---

<sup>①</sup>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371页。1989年11月10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在回答如何确保改革持续到下一个十年等问题时说：可以肯定地说，谁要走回头路，谁就要垮台。《邓小平年谱》下册，第1296—1297页。

<sup>②</sup>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5页。

<sup>③</sup>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1页。

# 苏联真相

## 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

本书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对苏联模式进行了客观的评析，指出它在苏联建国初期曾起过重要的作用，但后来由于思想僵化，对马克思主义采取教条主义态度，不能与时俱进，不能根据客观变化了的情况进行适时的改革，使得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成为妨碍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本书在分析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这一重要问题时，以邓小平“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一理论观点为指导，明确指出，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是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及体现这一模式的体制问题，并进一步指出，党的问题也只有从制度中去考察才能把握问题的本质，因为党的问题本身就是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可以认为，以制度与体现制度的体制作为分析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这就抓住了问题的实质。

——阎明复

（阎明复同志曾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翻译组组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第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民政部副部长、中华慈善总会会长，现任中华慈善总会荣誉会长。）

参加本书撰写的作者较多，既有许多德高望重的老学者，也有年轻之秀。他们绝大多数是长期从事苏联有关领域研究的资深学者，一辈子都在孜孜不倦地研究苏联问题。他们运用了许多新资料，也包括新解密的档案资料，对问题的来龙去脉进行研究，体现了实事求是、严谨治学的科学精神。历史是最好的老师，无论个人还是国家，都可以从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中汲取营养。研究历史不仅可以使我们更好地认识过去，也可以使我们更好地把握未来。本书反映了我国研究苏联问题的很多新成果，力图回答人们所关心的问题，值得关心社会主义事业的各级干部、学生和研究这一问题的专家学者重视和阅读。

——李凤林

（李凤林同志曾任中国驻俄罗斯联邦大使，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

